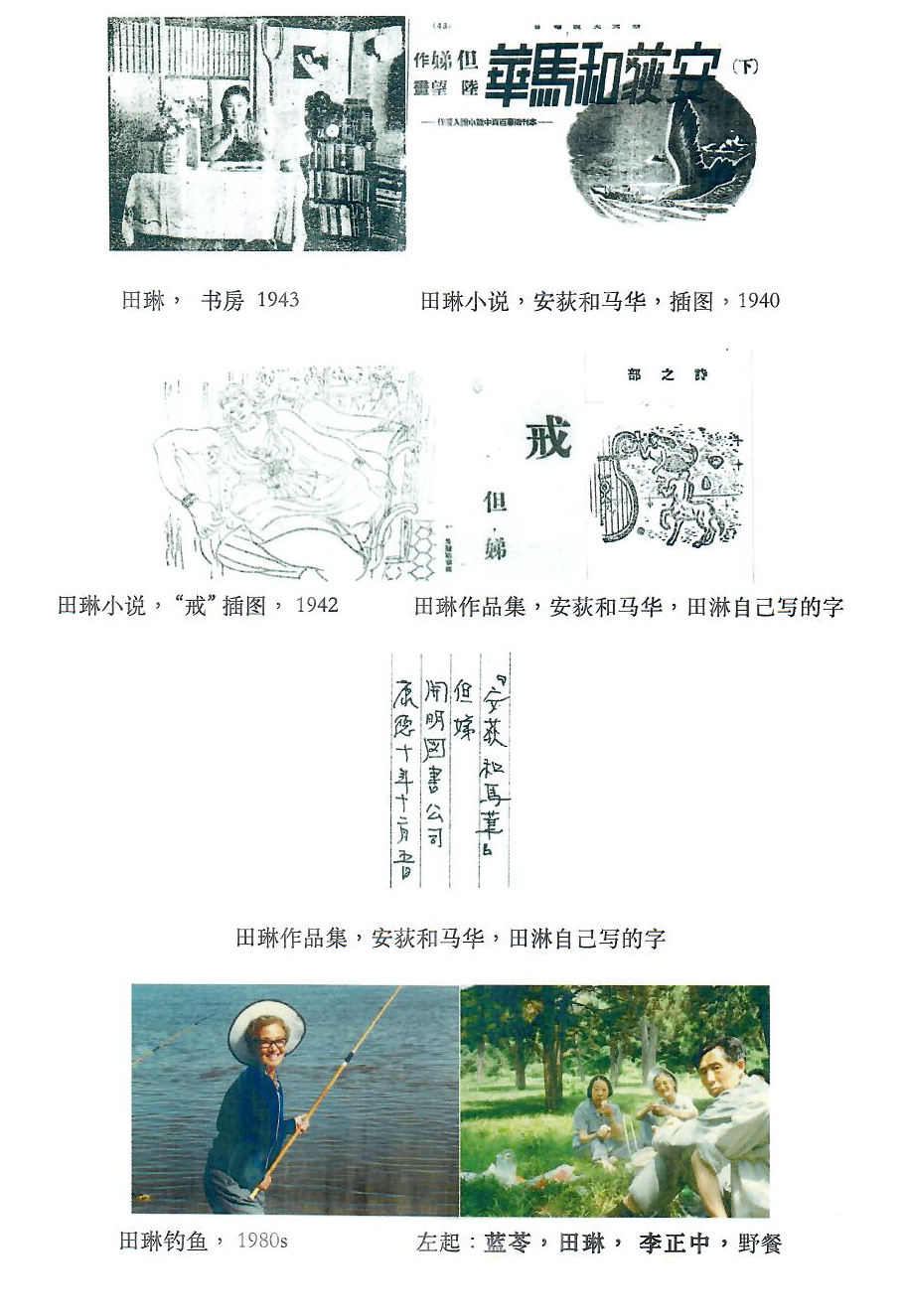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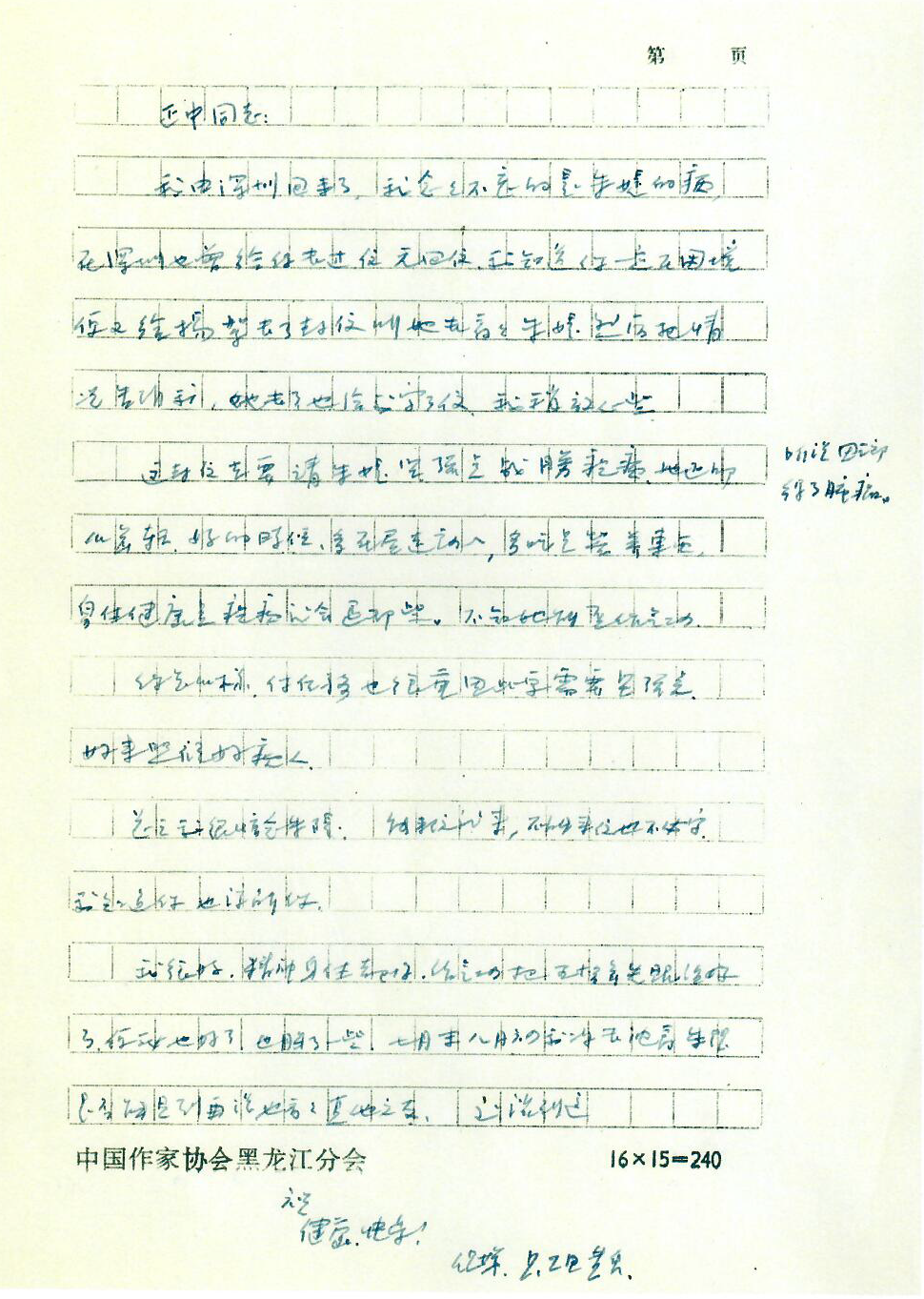


诺曼·史密斯, 编辑







目录

诺曼·史密斯： 前言

李正中: “临风无语致田琳”

(东北作家，书法家)

但娣生平

但娣作品研究

陈 言 , “但娣：她的自传与殖民伤痕的消除.”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越， 悄声唱悲歌： 但娣的生命体验与文学姿态

(青岛农业大学教师)

吕明純，“超克东亚地景： 但娣作品中的世界图像”

(中正大學教授*)*

谢琼， “漂泊，爱情，和正义: 论但娣作品中的漂泊者形象.”

(哈佛大学博士生)

陈实，“伪满洲国文学之“修饰的镜像”：以但娣《忽玛河之夜》为起点的考”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卢杰， “但娣作品的昔与今”

(圭尔夫大学硕士研究生)

**当代评论 75**

开明图书公司新刊: 安荻和马华, 但娣著

吴瑛, “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

韦长明, “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

**小说 78**

风——献给我的母亲

砍柴妇

安荻和马华

忽玛河之夜

旷野里的故事

售血者

戒

传尸病患者

血族

早晨七点的时候

感

**散文 225**

异国

像的故事

足音

沼地里的夜笛

白色的友情—纪念木下京子小姐

伙伴

XY城的人们

望乡

天涯寂寞

樱花的季节

两地

湘莪

徵吟

关于奴化思想及伪满作家：质之于要望先生

一颗不灭的星

我和大海

为《长夜萤火》诞生而欢呼

诗歌 272

未完结的故事

猎人

梦与古琴

我的歌

暮年

期待

吠

祈

马弟尼

思念

叫卖的老人

人生的奴隶

紫色的烦恼

诀别书

意识的叛乱

**自传 294**

日记抄（足音，角涯）

失掉太阳的日子

三入炼狱: 一个留日女作家的沉浮 **346**

悼田琳 665

柳三痴， “悼田琳,” “再悼田琳”

中流， “悼田琳”

刘树声， “小舟停航”

梁山丁， “悼田琳”

李默， “悼念女作家田琳”

陈隄， “哭田琳”

春子， “悼念田琳”

“悼念田琳的遥祭仪式在沈阳举行”

木风， “悼词”

方阡， “悼田琳”

朱媞， “安息吧！ 田琳同志”

李柯炬， “田琳：真诚而坚强的人”

杨絮， “哭田琳”

于雷， “悼田琳”

郭锋， “悼田琳”

里扬, “未曾相识人去远”

柳三痴， “遥奠田琳”

冯为群，”哭田琳”

李春燕， “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死”

梁山丁， “悼田琳老友”

李柯炬，”诗囊重拣忆田琳”

冈田英树，姜美兴（译者）, “悼念田琳女士”

梅娘， “纪念田琳”

蓝苓， “我为你哭泣， 也为你欣喜：悼挚友田琳”

李莫， “重拣诗囊忆田琳.”

前言

诺曼·史密斯

1992年，我参加了在长春吉林大学的加拿大西门大学夏季班。当我在那里学习当地文化的时候，我发现东北地区和我长大的地方——加拿大北部的相似性。自此，我每年都去长春和沈阳，还有去得相对没有那么频繁但同样很令人享受的大连，哈尔滨、吉林和伊通县。1998年，当我开始我的博士课程，我转而学习东北地区和它的现代历史。在读了Ronald Suleski(薛龙)的 《满洲现代化：一个附带说明的书目》［Modernization of Manchuri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1995)后，我发现没有任何一本英文专着出版是关于这个地区的女性历史，更不用说是关于最受争议的日占时期——满洲国。

1999年在长春，我找到了14册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里边有吴瑛和李正中写的两篇关于满洲国女作家的综述文章，这些摘录也被收录在本书。他们的文章让我注意到日占后期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吴瑛、梅娘、蓝玲、左娣、杨絮、朱媞和本书的主角——田琳，又称但娣。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里我找到了梅娘作品的合集和联系到了编辑者——她的女儿柳青。我真不相信，她告诉我她母亲刚离开加拿大回到北京去了。柳青不但让我与她的母亲联系上了，而且通过她，我与梅娘、蓝玲、杨絮和她丈夫张鸿恩、和朱媞和她的丈夫李正中见面了。我很惊讶原来他们还在世，但很遗憾的是在田琳于1992年（当时我还在长春学习中文）逝世后我才开始我的项目。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受到了朱媞和李正中挺大的支援，田琳委托他们将《三入炼狱: 一个留日女作家的沉浮》出版，因而他们将田琳的手稿完好地保存了二十多年，由他们的儿子李千将手稿复印了一份给我；我非常感谢千所有的帮助。我也很感谢冈田英树教授很慷慨地与我分享他的1943年《安荻和马华》复印件。在我看到那本《安荻和马华》书之前，我并不相信它还留存在世上，甚至不确定这书是否有被出版过。本书的《安荻和马华》里的作品都是从原本编辑的。我非常感谢在上海的刘晓丽教授，她总是帮助我，鼓舞我。在圭尔夫，有陈实这个可靠的同事来指导我这个老外关于出版的事，卢杰在这两年来也积极地帮忙我准备和处理这本书的出版工作。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吴芸茜也帮了许多忙。同时，我也很感谢家人和朋友们这几年来的鼓励和支持。

我很遗憾我没有与田琳这位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都饱受磨难并获得成功却又遭受入狱三次厄运的女作家见过面。田林因为她在伪满洲国和日本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经历而声名鹊起，但之后又因为这些而让她被监禁和令她的文学遗产被玷污。她写于1940 年的小说“安荻和马华”获得《华文大阪每日》征文一等奖。1944年，当代作家吴瑛是如此评论同年出版了散文小说诗歌集的但娣的：“但娣代表了一部分现代知识青年的痼疾之呼吁。[[1]](#footnote-1) 1946年，韦长明（李正中）赞美但娣作品里的自由主义。[[2]](#footnote-2) 后来，批评家上官缨认为但娣的作品“使人有‘后来者居上’的感”。[[3]](#footnote-3) 乱世中但娣因为企图逃离伪满洲国而被监禁，然而不幸却一直跟随她。直到1978年，悬在但娣头上多年的乌云终于消散后，她开始了第四阶段的也是末期的写作生涯。

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参加把田琳的作品辑录和将她的从未出版的自传出版。谈到她的作品，田琳在“三入炼狱”中清楚地写道：“我们这一代亡国奴的青年，是迷惘的一代，彷徨在痛苦、哀伤黑暗中，但也憧憬着未来的黎明。”[[4]](#footnote-4) 我希望本书诠释田琳生活和那千万个像她一样曾经面对不应该面对的挑战的青年。

**临风无语致田琳**

**李正中**

田琳离开这个世界倏忽二十五个年头了。从1940年的《华文大阪每日》半月刊上读到她的作品，到1944年初秋在长春的文化界朋友集会上相遇，虽未曾谋面却是通过彼此发表在报刊的作品如老友重逢般相契相近，对她的一段不平凡遭遇深表同情，并尽可能地帮助她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路。

之后，日寇投降，内战继起，经历过那个时代又不肯沉沦的文化界朋友，大半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崎岖路，历经艰险，重睹人民营造的新国家，重获新生活。田琳和过去的老朋友们又欢聚一起，依不同际遇纷纷重新拿起笔来，为新文运竭力添砖加瓦。我和田琳于是又重沐阳光，时相过从。我近来翻检往来信札，田琳总共惠寄我的信竟有60多件，是为数最多的。她总是不断的表达着对老朋友的关心，阐述近期阅读和写作的心得，更多的是告诉我她自己的近况特别是情感上的某些症结，仿佛像小孩子不时向老师求教样一一陈述，令我惶悚，也令我感动。

知田琳者莫若我，这样说可能不全对，但这是事实。

这次史密斯·诺曼教授着手编辑田琳的作品集，这当然是好事，我也愿意竭尽全力帮助。他提出我最好能写一篇确切真实的有助于了解田琳这位时代女作家面貌的序文，我也应允了。同时代的人几乎都已离开我们而去，这也是我这样残存老人的不可脱卸的责任所在。

一年多来，我重读了手边存有的关于田琳的历史评论资料，我也不断地思考那些飙逝年代留下的点点履痕，如何更真实地反映出一位无愧于时代称号的女作家的全貌，一定要尽全力作好，来回馈时代，回复田琳。

非常令我汗颜的是近期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记忆几乎锐减到模糊不清，随知随忘，提笔错书且不自觉，真真是较过去相差太远了。上月应朋友约邀来东北胜境之一的医巫闾山下休憩，诸事皆停，试着写纪念田琳的文字但力不从心，仍无可奈何的辍笔。想来想去，唯有找出一篇田琳逝世后不久在一家小报《晚晴报》上刊出过的我的一篇短文来应付过关吧。事迹还是不会差错的，心情尽管有诗句弥补，却仍未尽私衷。田琳在天之灵，原宥我吧。相见匪遥，一切如晤。

但娣生平

1916年8月5日生于黑龙江省汤原县，父亲田化南任工业学校教导主任

1928年考入黑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1935年秋，与于明仁（笔名努力，后改为白拓方、田瑯）恋爱

从黑龙江省女子师范毕业，到广来小学当体育教师

冬，于明仁从日语专修毕业，考上了官费留日

辞职，准备1936年的官费留日考试

1936年12月 参加官费留日考试，后被录取

1937年4月参加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被录取

1940年，田瑯从东京一高毕业，考进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

夏 回齐齐哈尔，写作《安荻与马华》

9月回奈良

《安荻和马华》获得《华文大阪每日》征文一等奖

1941年盛夏 回国，在长春与山丁见面

1942年秋，与田瑯正式分手 二人均大学毕业

10月毕业后回国

1943年1月，到开原女高任教，教地理、西洋史、几何、教育学，日语会话课，兼了舍监

1943年9月与陈致远躲避防空洞

秋，欲逃出“满洲国”，没成功

12月14日被日本宪兵队抓获，“逃亡”罪被判处两年，狱中《安荻和马华》出版

1944年5月左右因重病被释放监外执行，回齐齐哈尔

10月末由李大一介绍到“满映”工作

1945年9月，与陈致远恋爱

1945年10月2日，东北电影公司正式成立，和陈致远都被任命为东北电影公司编剧科的股长

10月10日，与陈致远结婚

1946年5月，东北电影公司决定撤退到大后方

参加学习会（实际是防奸运动），作为“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被批斗、被逼供，入狱，得淋巴结核肿瘤

1948年8月获释，回到齐齐哈尔的家中，

1949年8月，与陈致远离婚

8月，到齐齐哈尔一中任教

10月，到省政府文教厅的中教科工作，被委任为语文督学兼中教科秘书

1951年10月，被调到萌芽学校任教

1952年，左倾路线

1953年，调回齐齐哈尔，到黑龙江省文联上班，任《北方文学》编辑

1953年2月21日，和周煌威结婚

1954年4月，黑龙江省和松江省合并，成为新的黑龙江省，省会在哈尔滨，跟随省文联来到哈尔滨

1955年10月，生下女儿周晓琳

1966年，被贴大字报

1968年，作为“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被批斗

1968年1月16日入狱

1973年10月下放干部去清河干校劳动改造，进“消灭烙印学习班”

1979年平反，到《北方文学》编辑部

1979年12月号报告文学《燃烧》刊载在《北方文学》

1979年《忆奈良》，发表在吉林的《江城》

1978年秋，山丁从沈阳到哈尔滨参加庆祝萧红寿辰的会，二人见面

1979年10月，到北京采访巴来，在姜椿芳家遇见山丁、巴来的女儿、里栋、肖耘

1980年8月，去苇河体验生活

1992年辞世

但娣：她的自传与殖民伤痕的消除

陈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1945年，旧的殖民世界遭到摧毁，投降、解放，历史焕然丕变，国人充满兴奋与期待。“沦陷区”（日人眼里的“和平地区”）成为等待接收的“光复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尚未来得及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欢庆，他们就因目睹接收过程中所产生的诸种问题陷入不安与焦虑。接收大员对那些没有撤离后方的民众表现出一种俯视的姿态，从而引发了沦陷区民众的不满。据沈阳的一家报纸指出：那些“短视的人”错误地把东北视作一个“特殊”区域。但大部分东北居民实际是山东人和河北人，这些被异族压抑了十四年的东北人讲汉语，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热爱祖国。但日本人走后，新来的统治者仍然带有强烈的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最后总结道，这些新来者并不比当地人高贵，他们只是一群自私的政治投机者。[[5]](#footnote-5)历史地看，沦陷区从被（敌）践踏、遭（战时的后方）歧视、受（新政权）清算，被（历史）遮蔽，很少被正视过。那些对时代脉搏感受最为敏感的作家，在反右及随后的“文革”时期，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身世、经历被调查得底儿透；吊诡的是，到了可以拿起笔写作的1980年代之后，罕有沦陷区作家愿意写自传的，即便写了一些自述文字，也很难去面对沦陷时期的历史。我们所熟知的梅娘，她的写作生涯长达八十余年，在本质上是很善于描写她的私人经验的。从初登文坛开始，她的多数篇什都属于自传体式写作。然而我们发现，梅娘自身与作品的关系很疏远，我们很难从她的自传体式写作中探寻到她的真实家世，以至于在她逝世后的一年时间里，她的年谱混乱，谱主生平、要事、行实等模糊不清，各类回忆和研究文章依据不明。更不用说那些早逝的和战后沉默始终的作家了。

2014年9月，我从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诺曼·史密斯教授那里获得但娣的《三入炼狱——一个留日女作家的沉浮》，读来内心颇为吃惊。这是但娣于1980年代末持续了两年写的自传，详细回忆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80年代初的经历，特别是堪称“极限境遇”的三次入狱，传主把其间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命运遭际写得惊心动魄，让人深感边缘境遇下不可预知的灾变、人性的荒谬、命运的荒诞、两难选择和人的绝望，更可以看出政治制度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和规制个体的生存品质的。遗憾的是，不知何种原因，这部传记在传主已然去世二十多年之后至今未得付梓，它只是在小范围的学者圈内引起了讨论与研究的兴趣。笔者试图就这部传记展开讨论，希望在它的出版之际能够引发更多的关注。

一 从自传反观1940年的但娣及其周边

但娣的文名获得广泛认可，源于她留日期间（1937~1942）发表在《华文大阪每日》杂志上的系列作品：《未完结的故事》（诗歌，4卷2期，1940.1）、《异国》（散文，4卷4期，1940年2月15日）、《风》（短篇小说，4卷6期，1940.3.15）、《我的歌》（诗歌，6卷9期，1941年5月1日）、《忽玛河之夜》（短篇小说，7卷4期，1941.8.15）、《足音》（散文，7卷6期，1941年9月15日）、译诗《三好达治（十章）》（5卷10期，1940.11.15），与最为有名的《安荻和马华》（中篇小说，6卷1期、2期，1941年1月）等，她在此期间还发表了译作、奥亨利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叶》（《中国文艺》4卷2期）等等。作品在《华文大阪每日》上的集中发表，是因为受到该杂志的编辑柳龙光的约请。但娣在其自传中回忆道：

到了神户，去柳xx的家，见到他的妻子梅娘，高高的个子，一双有神的大眼睛，明亮而泼辣。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见到女编辑张蕾，小矮个，白白的圆脸，小眼睛、有些俗气。

田瑯那沉静的常态，出奇地突然变得谈笑风生，兴奋异常地跟主人寒暄，却冷淡着我。

我腼腆地默默坐在那里。

柳xx热情地约我写篇中篇小说。

回来，我思索着这戏剧性的一幕，我感到莫大的耻辱，很不愉快。我预感到我和田瑯这悲惨的一对，将导致分裂。

但娣并没有在这里点出柳龙光的名字，不知道是否因柳氏战后被视为文化汉奸的身份有所忌讳。柳氏以该杂志为舞台，扶植了一大批来自满洲的作家，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其时柳龙光和梅娘位于大阪和神户之间的家，成了满洲作家的一个聚点，同在《华文大阪每日》任职的“满洲国”作家李景新、陈漪堃和张秀霖等，住在同一个公寓，每天一起上下班，下班后到柳龙光家共同做饭、吃饭，饭后共同读书，分享读书经验。这个类似文学沙龙的圈子所结成的“读书会”译介了大量海外文学作品。他们的译介文字主要发表在如下刊物及栏目上：《华文大阪每日》刊载的“海外文学选辑”（1940.7.15—12.15，共6次（而不是日本学者羽田朝子说的“5次”，见羽田朝子：《梅娘的留日时期与“读书会”》，载《再见梅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海外文学选辑”的题字出自梅娘之手）；《华文大阪每日》的题为“日本现代诗选译特辑”（1940.11.1—12.15，共四次）；“满洲国”《大同报》的“海外文学专页”（1940.9—1941.7，共二十九次，其中“海外文学专页”题名由梅娘书写）；北京沦陷区《中国文艺》的“海外文学别辑”（1940.11.1—1941.4，共四次）。除了上述的译介成果，笔者从某破旧的资料上发现还有1940年8月15在《斯民》上刊出的“海外文学特辑”。但是笔者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也没有搜寻到《斯民》杂志。经过统计，笔者发现译介成果最多的，当属田瑯、鲁风、张蕾和梅娘。在这个读书会里，但娣是个边缘人物。从但娣上面的一段描述中，她的恋人田瑯对自己很冷淡，而但娣显然是不喜欢“俗气”的张蕾的。从这段引文的前面文字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但娣与田瑯之间发生了龃龉；而后面的叙述文字告诉我们，田瑯不自然的举动源于他跟张蕾之间暧昧的关系，而这层关系的捅破是张蕾的丈夫、满洲作家杨叶的一封信。“一天，突然，我接到杨叶的一封信。他揭发田瑯和他的妻子张蕾发生了关系。”后来“田瑯向我承认了他一切过错，坦白了他曾和十几个女人搞过关系的丑事。”更让但娣绝望的是，朝三暮四的田瑯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与此同时却不断地猜忌但娣，彼此之间的相爱基础已经不再牢固了，结果只有分手。

梅娘在怀念但娣的文章中是这么说的：“原来那位公子占有了她，还得意地哂笑她的幼稚，并把他家乡的夫人和迷恋他的日本女招待的照片显示给田琳看。原来，公子秉承着历史中男性的特殊地位在戏弄田琳，……利用了日本对男人宽松的环境，践踏着神圣的爱情。他告诫田琳，如要张扬，田琳就会被高师开除，且勒令回国。”[[6]](#footnote-6)其实所谓的“占有”并不是他们分手最为重要的因素，而是田瑯的不忠，和他自私的本性。但娣回忆，在她将小说《安荻和马华》投给杂志社时，田瑯提出要在文章前写上“献给楚珊”，楚珊即田瑯，他考虑万一作品获奖，这么做能够表明作者对他的忠诚。他的要求遭到但娣的拒绝。结果田瑯径自跑到杂志社的编辑部，让他们写上。但娣在散文《异国》同样透露了恋人之间因为有了第三者而痛苦的事实。散文《足音》里以不回信表明了斩断情愫的决心，不断鼓励自己：“为了生活下去，你总得想法忘掉过去，寻求着新生!”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是我的！”他毫不犹豫地说。

“你已经结过婚！我属于我自己，不属于你！”

我们争论了一阵，愤然分开了。

田瑯把但娣看成了他的私人财产，试图占有她的全部。深爱田瑯五年的但娣花了两年的时间摆脱这份感情，但内心的阴影却难以消除。这体现在她的小说里，就是书中的男性大多非正常死亡，即便不死，也是品行恶劣之人。如《风》中的渔妇是在丈夫死后剩下了孩子，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砍柴妇》中年轻少妇丧夫，婆媳二人相依为命；《忽玛河之夜》里的男主人公因与政府对抗被剁掉双手，其后悲惨死去；《戒》中的男子欺骗少女，并在少女怀孕后抛弃了她；《安荻和马华》中的马华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冒险远行，最后惨死异乡。男性的缺席逼迫女性强大起来，与苦难的社会相对抗。这与现实中但娣的命运轨迹有重叠之处。自1940年进入写作高峰期，成为一个把握自我命运的新女性。1944年作品结集为《安荻和马华》由开明图书公司出版，出版后“获得海内文坛高评”[[7]](#footnote-7)，后来人称赞她是“异军突起的充满了锋芒与写作力”的女作家。如果说是不幸的爱情成就了独特的女作家但娣也未可知。

大概是出于比较文学专业的敏感，我特别关注但娣留日期间是如何观察日本社会的，我试图从她的自传中寻找其时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人情事态，可是，我失望了。在1940到1942年这个时段里，似乎恋爱、失恋成为但娣的中心生活，战时下的生活用只言片语带过，如“日本侵略战争越打越激烈：奈良火车站，经常有日本人打着膏药旗，送亲人出征。未亡人（丈夫被战死的寡妇）的户数不断增加，法莲町的未亡人也在增加”，“日本特务机关，对中国留学生的管制越来越紧，不许留学生离开所在地。”再无更多的描述，生活细节也缺乏。作者着力描述的仍然是自己的感情生活，失恋之后，她详细记述了与马吉的见面和两人之间的微妙感受，然后是短暂回国期间与山丁的交往。但娣这一时期的小说，对异国的描述也不多。小说《忽玛河之夜》讲述的是戴西因为一篇文章激怒了敌人，被砍去双手后将其赶到残废院里。当恋人朱倪思赶来时，戴西的肺已经烂透。他死后，朱倪思跳进忽玛河里自杀了。这里的“敌人”，作者并没有明指，但是控诉意图是很明显的。作者的笔墨主要在描写中国人的苦难，而日本（人）作为造成苦难的源头，始终只是作为写作的背景存在着。

二 从三入炼狱看反抗作家在“满洲国”和中国的社会结构

在“满洲国”作家中，但娣是少有的被捕的女作家，也是少有的有三次入狱经历的作家。她的第一次被捕，是因为想离开满洲到重庆参加抗日。1942年10月，但娣毕业回国，到黑龙江省开原女高任教，教授地理、西洋史、几何、教育学，日语会话课，并兼任舍监。当她看到祖国疮痍的大地、贫穷的人们，她决定离开东北，寻找一条抗日之路。她逃跑的契机是在一次“勤劳奉仕”日的奴化教育课上。总指挥日本人守屋用皮鞭子抽打走错步的学生，激起了她和学生的愤怒。她得知其中的一个学生的姐姐在重庆，希望能在学生的姐姐的帮助下逃离满洲。1943年深秋实施逃跑计划，乘开往四平的车，又从四平逃往吉林，结果没逃成，返回后于同年12月14日被捕，罪名是“反满抗日”，刑期两年。但娣在狱中受尽折磨，结识的狱友因不同“罪行”被殖民当局逮捕，成为难友的这一群人在精神上相互扶助，默默地孕育反抗力量，有些看守也在暗中帮助他们，她同时见证的，还有阿谀奉承日本人的“哈巴狗”汉奸。后来但娣患重病差点死掉，于1944年5月左右被释放监外执行，回齐齐哈尔。

出狱后的但娣于1944年10月到了“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在编剧科工作。翌年8月，她目睹了日本战败时满映中国人雀跃欢呼的状况，而满映的头子下了一道“日本人要集体自杀！”的命令，之后“他自己首先在他的独身房子里喝下毒药自杀了”，但是“他死了，日本人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一个也没有自杀”。国民党接收满映之后，但娣被视为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而遭到审查。1946年5月，满映的后身东北电影公司决定撤退到大后方。但娣思想左倾，她决定跟随共产党的队伍。在历尽艰辛辗转南北的过程中，但娣和同事刘稼夫等人并没有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在防奸运动中，但娣被要求参加学习会，在学习会上，被同事揭发，说她是“红色大萝卜”，即“外表积极，是假的，思想是白的！”，其后以“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的名目遭到批斗、逼供，被软禁三个月之后又遭投狱，狱中患淋巴结核肿瘤。她在自传中描述了当时狱中的状况：

淋巴肿瘤要溃破了，牢房里没有手术刀，我用玻璃碴把筷子削尖，只好咬紧牙自己动“手术”了。往那红肿软化的肿瘤猛地一刺，于是红黄色的脓液淌了一碗。

没有药棉，把被子里的棉芯掏出来当药棉；没有绷带，把被单撕成条条作绷带。

我骨瘦如柴，颈部几个肿瘤，一个接着一个溃烂了，我便一个接着一个动了“手术”，流脓淌水，发出刺鼻的恶臭。

一群苍蝇围着我颈部嗡嗡飞着转。我不住地用手轰赶，轰走了又飞回来。正像鲁迅说过的，苍蝇倒有些韧劲儿。

难友们躲我远远的，皱着眉，捂着鼻子，用厌恶的眼光看着我。

人变成冷血动物。我百感交集，眼泪像泉水一样涌溢出来。

一天，我感到有什么小东西在我颈部蠕动着，我打开绷带一看，是生了蛆，我一阵恶心想呕吐……就是铁石心肠也禁不住流下泪来。

但娣在饥寒病痛交加中度过了五百四十九天，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六小时监牢，第一次被提审，以不做结论释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在黑龙江省文联工作的但娣被贴出大字报，两个右派联名写成，题名为“质问田琳”，内容是：“你在报告文学《女生产队长》中，为什么写桌子上放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田琳，你为什么给刘少奇唱赞歌，给他擦脂抹粉？” 1968年被视为“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遭到批斗，同年1月16日入狱，这是她第三次入狱。

但娣的第一次入狱，是在日本殖民当局对“满洲国”的控制日趋严苛的风口浪尖上。自1940年起，东北的抗日运动进入低谷。1940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颁发《思想对策服务要纲》，策划组建“思想宪兵队”，对“满洲国”管辖的所有区域的思想活动通过报告的形式上报宪兵队总部；1941年殖民当局在“满洲国”颁布《艺文指导要纲》，进一步强化对满洲文化界的统治。1943年殖民当局颁布《邮件检查指导要领》，日本宪兵将每月通信检阅情况汇总成《通信检阅月报》，向关东军宪兵队总部报告。自传告诉我们，但娣显然是因为于庆波被捕而受牵连，而他们只有一面之缘，但娣因为无法充分信任对方，在逃跑途中折返，就连这短暂的人际交往都被关东军掌握，可见殖民当局侦察网络之密不透风。殖民体制下因“反满抗日”罪被捕、牺牲者不在少数。其中被日本人称为最顽固的“反满抗日”者是赵尚志；而以民族协和为办学宗旨的建国大学，其学生中因为反满抗日被捕的人数在各个大学中最多。追求民族自决权和主体性是被异族压迫者的本性。

如果说殖民体制内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峙是必然的，那么但娣后来两次的被捕则掺杂了太多的复杂因素，比如私仇，比如两党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比如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成为牺牲品的根源，则在于但娣生于“满洲国”、活在“满洲国”的原罪。无论是但娣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实际行动，还是她的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抗日色彩。后两次被捕都被冠以“日本特务”，至于它是否属实，连但娣本人都无力去追究，她的自传只是在描述，并不去深入挖掘形成苦难的根源，我以为这将是读者无法感到满足的一个因素。她以及她的同时代人的生存品质和生存可能是如何被影响和受到限制的？它是一个我们必须去面对的本质问题。

三 如果1945年的《东北文学》能够延续

日本战败之初，但娣与东北作家李正中、张新实、张文华等共同编纂《东北文学》杂志。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真正的主编者是李正中一人，其他人几乎没有参与。李正中在2014年的访谈中提到：

（19）45年9、10月份，为了创刊号组稿，我忙得焦头烂额。日本人刚被打败，长春还有苏联红军，治安很不好，白天就有持枪抢劫的。有些作者离开东北了，有些作者因为看不清形势，不敢轻易动笔，还有的人生活太贫困了，根本没有心思写。有一次我去找田琳，到了她家却怎么也找不到入口，原来他们为了安全，把外面的门和里面的门都堵死了。我只好按照他们说的，先翻过墙头，再爬进窗户，才见到她。当时成了一个笑话，说我跳墙爬窗约稿也算是文坛奇闻了。

笔者以为，《东北文学》的价值在于，它是战后各沦陷区中唯一对沦陷时期在地文学进行清理、总结的文学杂志。该杂志撰稿人从概念、思潮、文学流派等不同角度总结了“满洲国”十四年的文学，是“满洲国”文学的赓续，同时开创了崭新时期的东北文学。用同行的话说，它是“震动这光复后的东北文坛第一炮，它是负有东北文化复兴的一翼而诞生的”[[8]](#footnote-8)。日本战败不久，肃奸运动即展开，在此政治背景下，文学领域内如何看待“伪满”作家及作品，成为《东北文学》讨论的热点。以该杂志1卷2期为例。署名“要望”者于1945年12月9日在《光明日报》副刊上刊登的题为《我读了东北文学》的评论文章，针对但娣的小说《血族》，要望质疑其中的奴化思想，作为证据，其一是作品中使用了协和语；其二，要望认为小说中的如下这段话充满了日满协和的意味：“哥哥又到高桥家看鸡了，高桥家的鸡长得那么美丽肥大，他真有些羡慕。”

但娣发表反驳文章《关于“奴化思想”及“伪满作家”——质之于要望先生》，指出：现在人人讨厌的协和语，在伪满时期，“却是一般日语不太通顺的人为了办事便利所常说的。”其二，那段充满了日满协和意味的话纯属断章取义，因为她在后文又说哥哥家的鸡瘦得可怜，以此暗示日本人对东北百姓的掠夺压制。恰恰因为这种隐约流露的思想，使得小说在伪满时期没有通过审查。此外，要望还指责了作者的“伪满作家”身份。对此，但娣反击道，在伪满时期，因为不写拍马、决战文学，被冷视，日本人也认为她不够满洲的女作家；但在光复后反而被戴上“伪满作家”的帽子，在除奸呼声高涨的当时，这种批评实在阴险。她进一步指出，是否属于“伪”，最重要的依据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接下来，吴谓发表题为《何谓伪满作家》，说如果“伪满作家”指的是伪满时代的作家，还算合理，如果指称协力殖民政府的作家，特别是指称反抗性强烈的但娣，非常不恰当。文章强调日本殖民的十四年对作家是一个陶炼的过程，作家必然带着旧时代的痕迹进入新时代，不存在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光复作家”。晓戈的《有感一题》指出《血族》的意义在于描绘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满洲市民的困窘处境，勾勒出了伪满社会的轮廓，以细读作品的方式为但娣正名。金华的《不是篇》严厉批评批评家当刽子手的社会现象，并进一步阐明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如果《东北文学》能够对“满洲国”文学进行很认真的清理，各种健康的批评能够持续展开，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能以一己之力承担起复兴东北文学的重任，也能很好地去清理殖民伤痕。遗憾的是，随着两党争夺政权的步伐不断加速，《东北文学》很快就停刊，那些围绕《东北文学》的作者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在从反右到“文革”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殖民伤痕的清理进程戛然而止。

为黑暗的历史作见证，并将其保存在公共记忆当中，这是亲历者的历史责任。但娣的《三入炼狱》是在试图承担这种责任，它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在黑暗的历史时代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过程，其中最为完整的，是作者的情感经历，它与作者的创作相互影响，是作者在其最旺盛的创作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素材。然而在自传中，由于情感经历的比重过大，它遮蔽了作者对异域的观察，以至于作者无论是在沦陷时期的创作中，还是在自传中，对日本的叙述都不够丰富。尽管作者对自己炼狱般的经历描述比较生动，但是由于缺乏对苦难根源的追问，也就降低了观察社会和批判社会及人性的力度。

陈言，江苏宿迁人。文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是殖民地文学、战争时期中日文学关系（1931~1945）、大江健三郎与冲绳问题，兼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悄声唱悲歌——但娣的生命体验与文学姿态

王越

正如Norman Smith教授在《评说梅娘》一文中所言：“梅娘的传奇在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评价”。[[9]](#footnote-9)事实上，殖民语境中多重文化身份混杂是东北沦陷时期作家的共同境遇。对女作家但娣来说，情况可能更为复杂。1937至1942年的5年间，但娣作为伪满洲国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她的部分主要作品完成于这一时期。特殊的留日经历使但娣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她首先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员，和其他东北沦陷区民众一样是受殖者（the colonized）；同时，留学日本的经历使其对宗主国（the colonial master）日本有更具体、更透彻的感知与体认；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作家，但娣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熏陶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些不同的身份信息交织混杂在但娣的作品中，本文试图通过对但娣作品的解读，呈现出这位女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文学姿态。

**一、生之哀歌：民族知识分子的家国之思**

现代的文学者，首先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借助文学创作表达主体的思想、意志、情感和价值取向。作为知识分子的东北沦陷区作家如何面对被殖民的处境，是坚守立场、反抗到底，或者屈从附逆，抑或明哲保身……这些不同的选择决定了文学者不同的文学姿态。

作为作家，但娣真正意义上踏入文坛的时间较晚，在萧红、白朗等后来成为“东北作家群”成员的作家相继离开伪满洲国之后，在梅娘、吴瑛等作家已经在文坛获得较高声誉之后，但娣才逐渐为东北沦陷区文坛所熟知。结合《三入炼狱——一个留日女作家的沉浮》及其他回忆性文章，可以大体勾勒出但娣走上文学之路的过程：1937年赴日留学之前，还是黑龙江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的但娣就接触过由共产党员金剑啸主编的《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这是一份具有左翼色彩和反满抗日倾向的文艺副刊，其主要读者群是包括但娣在内的在校学生和青年文学爱好者。金剑啸在齐齐哈尔进行的办刊、组织剧团、传阅进步书籍等活动对但娣早期文学观念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鲁迅、高尔基、屠格涅夫、茅盾、巴金、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的阅读，但娣的文学观念初步形成：“我的创作思想是很明确的，暴露现实，写那些被敌人统治压迫下过着灾难悲惨生活的人民。以此揭露敌人血腥的统治，激发读者仇恨敌人，激发读者起来反抗敌人”[[10]](#footnote-10)。这种文学姿态实际上是包括但娣在内的东北沦陷区文学者以新文学作家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做出的一种自觉的思考和应对，它以文学的面貌出现，附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功利色彩。

战争时期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常常处于纠缠状态，文学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被不断强化，这不仅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更多的是出自知识分子作家自身的认知。他们愿意相信，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以笔为枪同样可以起到驱除侵略者，解放民族国家的目的。但娣的第一篇习作《招魂》以“晓希“的笔名发表在《芜田》上，内容已不可考，据但娣回忆，这篇作品“企图把那些丧失民族魂、醉生梦死的青年唤醒”。[[11]](#footnote-11)这是创作之初但娣的文学姿态：“把我的笔当枪，来和敌人斗争”。[[12]](#footnote-12)

1940年但娣通过发表于《华文大阪每日》的短篇小说《风》正式进入东北文坛，此时已是东北沦陷后期，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文化统治日趋严苛。1941 年伪满洲国民生部弘报处颁布《艺文指导要纲》（以下简称《要纲》），全面暴露出殖民者摧毁东北地区原有民族文化，建构殖民文化情境，欲以日本文化取代东北地区民族文化的企图。《要纲》以法令条文的方式规定了伪满洲国文艺的宗旨、特征，强制性将全国文艺者纳入直接由政府领导的官方文艺社团中。《要纲》的本质在于消解东北民众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重新建构另一种本质上属于受殖者的“满人”文化身份，从而在思想文化上把东北地区独立于中国之外，通过民族同化最终达到文化同化。面对这种殖民文化身份的建构，伪满洲国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十分的困窘：一方面，生存于其中的作家被强迫与这样的一种殖民文化认同，但另一面, 隔绝在文化母体之外的境遇让这些在“五四”文化语境中成长的作家陷入巨大的文化漂浮感中，隐藏在他们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新的文化身份发生冲突。

就在但娣留日期间，以山丁为代表的部分东北沦陷区作家做出了不懈的文学解殖民（Decolonization）努力。山丁及文丛刊行会作家提出“乡土文艺”口号，主张通过描写乡土现实，真实再现社会时代，揭露社会黑暗。以书写乡土表达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文学创作中彰显中华民族意识。山丁等人的创作使这时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呈现出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特征。对故国的追思，对失去家园的痛惜，对掠夺者的控诉，这些都凝铸在东北沦陷区作家的乡土书写中。山丁的《绿色的谷》、王秋萤的《小工车》等作品真实表现出殖民统治下东北平民的生存苦难与心灵苦难，控诉伪满洲国的黑暗统治。“乡土文艺”思潮由此成为东北沦陷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思潮，本土作家面对殖民话语所做民族主义式的文化抗争使这时期的东北新文学进入鼎盛时期。

远在日本的但娣虽未亲自参与到这些办刊结社、文学论争等具体的文学活动中来，但她的创作却与这股文学思潮呈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从《风》开始，但娣一直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在她的小说中，“家庭的不完整“、“人物被迫离家”、“家庭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夫妻/恋人被迫分离”等小说情节和故事模式，成为但娣作品对苦难的主要书写方式。

《风》中，渔民丈夫因出海遭遇风浪惨死，年轻的妻子在巨大的悲痛中产下婴儿，一生一死之间，生活如同狂暴阴森的海啸，无情的摧毁与碾压掉人生存的希望。

《砍柴妇》中，丈夫意外掉入山底丧生，年迈的婆婆带着媳妇和孙子艰难度日，当小带弟失足滚下父亲的丧生之地时，婆婆和少妇“心宛如坠入死的深渊”一样绝望，生存的苦难已经将人的承受力打磨殆尽，小说描述了在绝望与崩溃的边缘挣扎求生的底层民众的心理状态。

《忽玛河之夜》较为特殊，这篇于1941年6月写于日本的短篇小说叙述了一对男女的爱情悲剧与命运悲剧。戴西“因一篇文章遭到放逐”并“被砍去双手”，在长期的囚禁中双目失明，在病痛中死去。爱人朱倪思在目睹爱人的惨死后，悲愤交加，最后投入忽玛河追随爱人而去。黑暗暴虐的社会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夺走了一对恋人的生命，随着女主人公的纵身一跳，故事由爱情悲剧上升到社会悲剧层面。忽玛河是黑龙江西北部的一条河流，小说中的“哈市”为哈尔滨的简称，但娣用这样两个清晰的地理坐标标明了故事的发生地——东北地区。小说中虽没有清晰说明故事时间，但从戴西的遭遇可推测当时正是东北沦陷时期，戴西是被统治者拘禁迫害的进步青年。但娣用这样一篇作品直接揭露了日伪统治者对青年的残酷迫害，控诉社会时代的黑暗与冷酷。

代表作《安荻与马华》中，为给妻儿更好的生活而远赴外地做工的马华最终难以忍受病痛而惨死异乡，苦苦维系的小家庭解体，妻子安荻带着年幼的孩子面对无望的生活“从眼角里流出血来……”。

这些作品勾勒出一幅东北底层民众的生存群像，但娣身在殖民宗主国，却与本土作家在文学创作姿态上遥相呼应，这实际基于其自身民族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但娣把“暴露现实”的文学追求熔铸到对每一个被黑暗社会伤害到的底层民众命运的表现里，用深切哀婉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最强烈的控诉。这些作品将“呼唤民众觉醒、反抗殖民”的意识与文学创作最大程度结合起来，表现出但娣作为民族知识分子和作家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反抗批判意识。

**二、爱之哀歌：动荡时代女性的自我书写**

如梅娘所言：“我们这一代从遥远的30年代末跨过来的知识女性，正值政治、经济的大动荡时期，正值新旧矛盾的大交锋大较量的时期，且不说政治上经受的狂风骤雨，在爱情上更是魔劫重重。”[[13]](#footnote-13)在家园沦陷、异族殖民、战火纷乱的时代，女性所遭受的屈辱与灾难较之男性更为沉重。书写女性的苦难，记录这个承受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等多重压迫的性别的所思所感，成为女性作家义不容辞的使命。萧红、白朗、梅娘、吴瑛、左蒂、但娣等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用各异的笔触书写与记录了动荡时代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

但娣的回忆录《三入炼狱——一个留日女作家的浮沉》中较为详细的记叙了她与田瑯相爱、后因田瑯隐瞒婚姻经历及不忠行为最终分手的经过。这次惨痛的失恋极大的影响了但娣的创作，表现女性的情感状态和生命状态成为但娣另一个重要的创作主题。她的作品多描写黑暗时代普通男女的爱情悲剧，表现爱的缺失，表达对至死不渝爱情的向往。但娣将自身的情感经历和体验熔铸在小说中，将动荡时代中女性的生命体验以哀伤凄婉的方式表现出来，书写出伤感动人的爱之哀歌。

《售血者》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我”是一个遭未婚夫抛弃的失意的中国女记者。小说采取双层叙事结构，主体故事讲述贫苦的中国留学生朱良与同样潦倒的美国少女伊丽耐的凄惨爱情故事。二人在售血站相识，共同的生活境遇使他们相爱，但是贫穷的灰色的生活逐渐消磨掉伊丽耐的生活热情，最终伊丽耐惨死在售血之后，朱良也在绝望和迷茫中消耗掉年轻的生命。小说表现出动荡时代青年，尤其是女性在自我身份确认中的焦虑与迷失，无论是伊丽耐在情感关系中的迷茫，伊丽耐出走与出卖肉体的选择，还是朱良与伊丽耐有关人生意义的对话，都折射出作家对爱、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思考。“人生是泪的种子，是苦痛，灾难，罪恶，错误。人诞生了，恋爱，贪欲，泥醉，忿怒，欺诈完了便死了”。“人生是在追求着真价值，一个人应当坚强的活下去！……为自己而活，为不幸的人们而活呵！”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的对人生、情感、死亡的理解与选择，是但娣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动荡时代知识青年精神困境的揭示。正如吴瑛所言，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女作家以这种大胆的坦露与剖析表达出“一部分青年的痼疾之呼吁”。[[14]](#footnote-14)

“青年女性失足”的主题无论在中国文学还是在世界文学中都较为常见，在《戒》中，但娣敏感的捕捉到战乱年代女性情感与心理的波动，并给与充分关注与表现。女作家在书写女性时往往能够动用性别优势，获得对女性复杂心理的更深入感知与理解，从而使人物个性更为独特和鲜明，这成为性别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之一，也成为女性书写存在的合法性之一。小说《戒》中表现女性对“苦海般”人生的焦虑、迷惘与苦恼，同时寄托着但娣对女性个体觉醒的思考。女主人公受欺骗和侮辱后生下孩子，陷入“无限的侮辱，惊恐，不安”中，小说着重刻画了女主人公踏入人生歧路后心理的悔恨、无所适从和焦虑感。当女主人公试图通过遁入空门来达到对茫茫苦海和残破人生的忏悔与洗礼时，爱国青年的劝解与激励将其抛弃掉过去“死的意识”，最终女主人公凭借“理性”之光坚定走向人生的黎明。

值得注意的是，但娣对《戒》在故事层面的处理方式上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性。“遇到可怕的灾难时，应该坚持下去，要勇敢；真理总会有的，什么也不要怕，拿生命反抗一切的损害我们的一切的仇敌，坚强，自信，最后是我们的。不屈不挠的作下去，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种话语方式明显受到左翼文学和东北沦陷时期表现反满抗日的“进步文学”的影响。同时，整篇小说也可以解读成一个巨大的隐喻，以受辱的女性比喻遭受殖民的故土，通过越狱的爱国青年之口向读者传达抗争之意，并暗示希望与胜利的到来。在《首警特秘发第一四一四号》文件中，伪满洲国警察厅就曾对但娣的《戒》做出类似解读：“通过浪漫色彩，表现革命信念”。[[15]](#footnote-15)这就是说，但娣的创作中，“书写女性苦难”与“表达反殖民意图”两种文学价值取向是部分重合的，但娣将自身两种身份——女性作家与民族知识分子——用文学的方式进行了重新融合与确认，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姿态。

**三、结语**

《安荻与马华》中，出外谋生的马华对同样背井离乡的犹太人说：“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的那岸，那里很好呢！到夏天，黄昏的时候，划着船到黑龙江上，多么快活呀！姑娘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晚上她们的响亮的歌喉可真迷人哪！”但娣借人物之口表达潜隐着的乡愁，这基于但娣对其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当殖民地的东北就像但娣小说《传尸病患者》[[16]](#footnote-16)中的充满病菌的、破败不堪的三等病房时，当被奴役的同胞就如同小说中患了痨病的瘦弱贫穷的病患时，但娣发出抗争之音，这来自但娣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1987年，71岁的但娣回忆起自己的文学生涯时这样写道：“在日本血腥统治下，和敌人面对面，不可能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可能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子’，我们只能隐蔽，只能悄声唱悲歌。”[[17]](#footnote-17)“悄声唱悲歌”较为准确的概括出但娣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姿态。但娣道出了绝大多数东北沦陷区作家的悲哀与无奈。时局的纷乱，统治的暴虐，多重身份错综复杂交织，其中甘苦也只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才能了解。梅娘也曾经发出“人间事哪有这么简单”的感叹：“日本人占领了我的家乡，侵犯了我们的民族，这是由不得我们的。我们不知道这种占领的时间要过多久，我们只知道做事不能违背民族良心。”[[18]](#footnote-18)

不违背民族良心，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这是包括但娣在内的大部分东北沦陷时期本土作家的创作底线。所不同是山丁、秋萤等作家受左翼文学影响较大，多从阶级视角出发再现现实，梅娘、但娣等作家则将相同的家国之思、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与反殖民立场建筑在性别身份的基础上，透过女性视角进行文学表达。应该说，所有沦陷区文学都是在政治、民族、国家、文化四个维度共同建构起来的文本，而但娣的作品又增加了第五个维度：性别。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但娣的创作至少能够表明中国新文学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而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但娣的作品真实的记录了特殊时空中人性与民族性，在殖民文化情境中，但娣同其他作家一起抗击殖民同化，他们的作品中共同暗涌着殖民地知识分子作家无法泯灭的乡愁 。

超克东亚地景──但娣作品中的世界图像

吕明純  
前言  
在日本军国主义规划中，1940年代初期形成的大东亚体制，在地理学上重新形塑了一个大东亚图景，并以此种空间感形塑了整个东亚共同体的想像。非但如此，在1941年颁布的「艺文指导要纲」，透过艺文统制手段要求各界文化人士以「笔部队」或者「现地报告」方式，响应或者共同打造这个大东亚的地理空间。但是一个宏观的帝国图景，是否真的这么容易由上而下地被建构出来，成为共同体想像的核心？而在这种外部压力下，满洲国的作家们，是否有因应的文化策略？  
本文试图探讨大东亚图景中女性作家与帝国空间的互动关系，希望透过女作家但娣的文本，梳理她在大东亚体制后期的空间认同，还有她心目中的世界图像。透过探讨但娣笔下背景模糊的地景书写，希望厘清她的地景空间和精神空间，是如何在急速扩张的共同体下，以另类方式回应着大东亚的疆界和国族想像。

## 模糊时空和异国情调

正如研究者所共同注意的，女作家但娣[[19]](#footnote-19)满洲国时期的作品向来有个鲜明特色，即文本中时间空间的模糊性。一般来说，对于地理图景书写有两大方向：一种是被动员起来、为了巩固这个「大东亚」地理想象的「现地报告」，另一种是有意识地书写满洲国的「乡土」，前者是官方主导由上而下的文化统制；后者则是以土地、风物的共同记忆来强化自我认同，隐约和殖民宗主国强权采取抵抗的姿态。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都把书写焦点放在满洲国国境之内的具体指涉，以强化人和土地的认同连结。

但对于在大东亚体制后期的青年女作家但娣，其时的作品，则少见对于满洲国境内特定的具体书写。但娣早期作品绝大多数富有人道主义色彩，饱含对于底层苦难的同情。比如但娣1940年的〈风〉(献给我的母亲)，这篇小说描述一个在暴风雨中等着渔人丈夫归来的临盆孕妇，却等来丈夫船难的消息，而最后这个女人在悲恸中，充满激情地产下孩子。[[20]](#footnote-20)相似的模糊背景还有但娣在1940年的〈砍柴妇〉，这是一个描写年轻寡母和婆婆上山砍柴、但小孩不慎落入山沟发生意外的短篇小说，[[21]](#footnote-21)不像萧红《呼兰河传》或《生死场》、《商市街》中对于东北地景的明确指涉，但娣写的是具普遍性的人间苦难，于是作品的时空背景多半模糊难辨，甚至于不特定于满洲国的风土人情。

但娣清楚指涉满洲国地名的，是一篇1941年发表在《华文大阪每日》的〈忽玛河之夜〉[[22]](#footnote-22)，这篇小说描述老处女朱倪思终于打听到失踪多时的爱人消息，匆匆赶去养老院，见因为文章获罪而被放逐、被砍去双手、濒死的情人戴西最后一面，在情人咽气在河边火化后，悲痛欲绝的朱倪思，就投入忽玛河殉情了。小说中这对悲惨的情侣种族未曾言明，也很难从两人的「朱倪思」和「戴西」的名称上去判别种族。但这篇小说明确出现了地名呼玛河，以致于读者能够得知：这个故事发生在少数民族混居的满洲国边境「呼玛地区」。

这个明确指涉当然引起统治者的秘密注意。在帝国主义统治者眼中，这个多次进出监狱、历经无数拷打刑求的女作家写出国境内「养老院」，这个暗示是非常可疑的。日后在一场九0年代的文学会议里，但娣曾揭露，在给警务总局长山田俊夫「首警精秘六六五0号」的侦谍报告中，首都警察副总监三田正夫对她创作〈呼玛河之夜〉的解读是「以此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避免这种罪名，可以推测，在紧缩时局下，也许营造一个笼统、不具体的时空背景，才是相对安全、避免引起关注的书写策略。

　　而在〈旷野里的故事〉中，但娣书写凶杀事件时空背景也是非常模糊不清的：

是怎样辽阔，单纯，寒冷的地带呀！静静的，赤裸裸的，一片辽阔的旷野，什么都没有仅有一条白色凝冻的江川，在日光下发闪。

在旷野的丘陵地带有着一座污秽的肮脏满是臭气的灰色聚落，我便住在那聚落里面。离我的房子不远有一座大旅店，这旅店住满了些流浪的过客。

刻意模糊的时空，笼统含混的指涉。但娣还有更多创作的时空背景，是完全远离满洲国的风土人情。比如她刻画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底层失业人民苦境的〈售血者〉。〈售血者〉的背景地点是美国的巴尔提摩尔城。小说是这么开始的：

　　　一九三九年，我的未婚夫死了。他死在美国的巴尔提摩尔城。不，实际他

　　　没有死，他和一个美国姑娘结了婚。我带着伤痛，从富拉尔基城出发，为

　　　了办理解除婚约的手续, 而到巴尔提摩尔城来了。

　　　是冬天的黄昏，我感到无限的悲哀，于是我便唱着我自己的哀歌。

小说的开端，即用第一人称描述者「我」诉说个人所遭遇的、未婚夫变心的苦痛，但这篇小说的真正主题，是描述另外一对情侣的故事。在社会底层，为了求生苦苦挣扎的一对异国情侣，留学生朱良和同居的伊丽耐，在长期失业和无可抵抗的饥寒交迫之下只得到输血局去卖血，或让伊丽耐到街上去卖淫。而当朱良专注于赶毕业论文之际，同居的伊丽耐为了让他无后顾之忧过度卖血，竟意外地惨死于输血局前。自责的朱良哭到眼瞎，而在向失恋的「叙述者我」和神父告解了这一个悲惨过程后，亦于几天后夭亡了。[[23]](#footnote-23)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故事背景之所以要设定在遥远交战国内的巴尔提摩尔城，有可能是要规避严格的审查。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中就明确地规定「不许写黑暗面」，严禁流露悲观失望的情绪，以至于这种悲惨的控诉只被许可放在敌对阵营。可是，但娣笔下的模糊时空和异国意象，早在《艺文指导要纲》出台之前，便大量地出现在她早期文本，尤其是她的诗作。比如在《华文大阪每日》上的诗作〈猎人〉中，她就这样书写着失意的英雄：

　山峰，古世代的片麻岩，

　为夕阳所涂紫了。

　断层崖下踉跄着猎人，

　背上没有羚羊，也没有山兔。

　他不再幻想催眠草和龙石了。[[24]](#footnote-24)

催眠草和龙石是欧洲文学传统中常出现的意象，但娣特意在诗作后方加注，说明「于龙睡眠之际，由龙首切取的宝石，曰龙石，可以做妙药」；「催眠草：切取龙石时，播洒于龙的四周，不使其惊觉」。这些和满洲国风土迥异的异国文化意象，一再地出现在她的文本中，显示她作为一个到奈良留学的女留学生，所学、所认知到的世界，都是非常宽广的。又如在小说〈旷野里的故事〉的开场：

那正是一个假日，我的房间里有陈希有马健。我们便兴奋地谈起来了。我们谈起战争。谈到缅甸，北菲，吉克佛利德战线，索罗门群岛……。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又谈到了史达埃尔夫人，察杜白里安，大仲马和大诗人雨果。我想起了雨果的哀史，巴黎的圣母寺……

这种不限于满洲国境的、宽广的世界地景叙述，正是女作家但娣很鲜明的个人特色。事实上，由于但娣在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所学为历史和地理学，她对于地貌地形的空间想象和感知，其实都奠基于现代的地理科学知识，所以但娣的文中会出现「古世代的片麻岩」、「断层崖」、「穿行着山的褶曲，密林的藻地」这类让人惊奇的诗句。又如她1942年写于奈良的诗〈征吟〉，面对被未婚夫欺骗的苦楚，她也是如此用外在地貌地形来对应着她内心的悔恨：

无慈悲心的运命落到我的身上。悲哀的魅力诱引了我的全生。

我在苦思着，手中拿把雕刻刀子，我在雕刻着阿尔布斯的山脉和峡谷……。我的意识里，往事也深深地雕刻了些山脉和峡谷……我在那里迷失了，仿佛天黑了，在那里我喊出绝望……但，一点也听不到什么反响的回声。

我继续雕刻着，我的刀子已走出了笔规外，我雕错了，把整个图型雕错了。许久我才发现我雕错了我的图案，我发现了我许多天的劳力都完了，我便哭了。雕刻刀从我的手中滑落下来。

悲哀像一条冰河剧烈地冲过了我的心谷，在那里它开始侵蚀，剥削。仿佛在那里有肉和灵的岩屑破碎而研磨……于是我感到了一种阴惨的沉痛的生的灭亡……我在绝望的断崖上摸索，迷惑……在无救里绝泣。

从北非、索罗门群岛、巴黎圣母寺，到冰河、山脉、断崖、峡谷，但娣笔下的世界图像已逐步打开，这不但直接反映了她的专业所学，更远一点看，这种空间感，恰恰反映了她在知识积累过程中，某种不为大东亚图景所建构（或者说局限）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国族」这个文化人工制品，是由地图、旗帜、建筑物、纪念碑、共同习俗或运动，以及政治修辞所共同建构而成。然而无论是地理学上的固定疆界，还是人种学上的族群分隔，这些足以用来建构共同体的文化符码，但娣似乎并不着迷，而是在小说文本中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回应策略。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版图扩张、而满洲国作为共荣圈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之际，但娣诸如此类的地景书写，是否暗示着女性对固有国家想象的一种抗议或解构？别忘了，彼时的杂志《新满洲》上正有许多「现地报告」创作，如第3卷第5期「东亚共荣圈现地报告特辑」中，乙卡〈纯情之乡的清原〉[[25]](#footnote-25)用优美的文笔介绍奉天东北边的一个如诗如画的小镇；雪茹〈古色古装的北镇〉[[26]](#footnote-26)、桐桢〈画意诗情的水都〉[[27]](#footnote-27)、冰壶〈寄自东南国境的安东〉[[28]](#footnote-28)、或是「女学生作品特辑」中绿苹〈龙潭山旅行手记〉[[29]](#footnote-29)等……。这些征文，都是当局有意透过文艺统制，来强化满洲国国境的人文空间建构，在地图上再造、加强着地理上的乡愁。而但娣在这方面的文化资产，让她对于所谓大东亚共荣的召唤，回应可说是非常冷淡，而是另行开展出自己的世界图景。

　　但娣文本中的空间感是很宽广的，她从土地或疆域中解放出来，而拒绝将其作为一种伪满洲国国族建构的要件。对照文艺统制中用强制手段「填补空白的满洲人文地理」，「间接地唤起我们不经意的乡愁」的「满洲现地报告」，但娣这种地域上的含糊其词，也许更能解消国境神话的虚妄。

## 边缘底层的移动叙事

但娣文本中一个非常吸睛的元素，是她对于「沙漠」的特殊偏爱。总是重复出现的「沙漠」意象，是但娣诗作中引人注目的异地风情。在《华文大阪每日》发表〈未完结的故事〉一诗中，但娣书写着马拉和马尔华这对在沙漠中长途跋涉情侣互动：「在寒星伴着兴安岭的月夜里。／于是，他们的驼铃响起来了,／「玛尔华呀！／我们走向哪里去呀？」／马拉跟在玛尔华的后面跋涉着」。或是〈我的歌〉中，她写着「沙漠呀，／无际涯的生命的沙漠呀，／宛如戈壁滩的沙漠，／我跋涉在沙漠中。[[30]](#footnote-30)」又或是一九四二年于奈良写成的〈紫色的烦恼〉：「梦之翼，／颤动了那紫色的烦恼，／如一滴／荷叶上之夕露，／如一只／春风里之夜歌，／如那无际涯的沙漠……」。又或是〈意识的叛乱〉：「沙漠呀，／无际涯的生命之沙漠呀，／宛如古壁的沙漠／古壁之白云／宛如挣扎在那沙漠之蒙古民」。

对于生长在齐齐哈尔的但娣来说，沙漠景象可能并不陌生。但她诗文中对于无边际的沙漠的爱好，除了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因素，也许我们可以试着用一种晚近的新角度解读。沙漠中没有明确的路径，不受权力核心的驯服和管制，而且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移动并且生活的场域。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利（1988）的《游牧论》（Treatise on Nomadology），就是把游牧者当成一种隐喻性的观念，藉以理解两种权力形式的机制。他们主张，国家权力，就是使流体顺服于路径和线条的力量。顺着「防范扰流的导管和河堤」来引导移动，「限制了从一点另一点之间的往来移动。」据此，在规训之下的移动总是「倚靠固体」，而流动则是「沿着平行、流线的层次」行进。[[31]](#footnote-31)

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路径和移动，并不是由「点」所支配，而是有其自主性和「它自己的方向」。游牧者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只是出于必要，而非为了某个即将前往的预设目标。这种游牧者占据的空间，迥异于我们迄今所呈现的空间：

「游牧者的空间」不是封闭且受管制的，像道路或公路上的驾驶那样。这种空间不被墙垣和其他围栏「留下条痕」。反之，它被视为开放(open)或平滑(smooth)的空间。由于游牧者的空间更直截了当，因而不受法律和控制中介。空间与游牧相互依存。游牧者「创造沙漠的程度，不亚于沙漠造就他们」。[[32]](#footnote-32)

与其说但娣着迷于一片黄沙滚滚的沙漠风情，不如更核心地说，她着迷于沙漠空间中不受国家权力规训的「移动」元素。在移动的前提下，学生会到四处求学，工人会到外地打工，在过程中会和不同的文化产生碰撞，并结识不同种族背景的人，更可能会建立亲密关系。〈售血者〉这篇小说，除了在北美洲冬季的异地色彩书写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朱良和伊丽耐这对跨越种族界限、相互扶持的异国情侣，而这种在满洲国所强调日满蒙鲜露五族协和以外的、不合当局政令的异族搭配，在〈售血者〉之外，也同时出现在她颇富盛名的得奖作品〈安荻与马华〉上。

〈安荻与马华〉这个在《华文大版每日》上大受欢迎的长篇小说，[[33]](#footnote-33)主要是陈述马华和安荻这对恋人在战乱下的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故事。然而这位男主角马华，却有着当时大东亚文学（或者说满洲国文坛）中非常不典型的一种人物设定──「波兰混血儿」。在这得奖长篇中，但娣写的是底层劳工伴随着战火，在国界不明的各大都市底层辗转流离，进行长距离迁移的故事，简言之，这是个关于移动中的、人的故事。

马华是波兰和中国的混血儿，在码头当苦力，和贫家女儿、送牛奶的姑娘安荻相惜相恋。一开始，安荻的爷爷对这个俊美混血儿充满疑虑──一方面是对于白种人惯有的优越感怀有戒心，一方面，老人家也难以接受马华父亲的回教徒身份──尽管马华本人的信仰是天主教。

战事告急后，海港完全封锁，马华这个码头搬运工人，在失手把贵妇人皮箱落入港口而全部财产判赔后，也完全失去了工作机会。身无分文的马华想带着安荻离开，去别的地方找寻生路，但孝顺的安荻却不愿意丢下病重的爷爷不管。在经历过破门而入的凶暴逃兵后，安荻和爷爷终于认知到：只有设法向外逃离，才是战时的生存之道，迫不得已，他们只好连同失业的马华，加入难民行列，向未知的远方移动。

在路上，年老的爷爷认识到马华的善良正直，可终于还是经不起一路逃难的折磨而死去，最后只有安荻和马华一路相依为命。「我们向哪里去呢？」「走吧！往前走吧！ 谁知道呢？」于是为了生活下去，他们在大地上漫无目的地行进。有时，他们在一片无际的荒原里遇到踉跄的牧人和羊群；有时他们跳上运煤的火车，到达某个不知名的大都会街头卖艺。

在西方某个有天主教堂的城市落脚没多久，在河边当挖石子工人马华，为了更好的生活，暂时离开了安荻和初生女儿，跟随犹太人斯拉其夫四处打零工。在当过墨水厂工人、监狱劳工等几个短期雇工后，马华在某次逃跑中脚受了伤，没有得到医疗的脚，终于在逃难中溃烂至无法行走，最后，无法再承受身体折磨的马华，在天亮前孤独地爬行进入泥沼地自杀。而带着女儿的安荻，一边在某地靠帮人务农采玉蜀黍刈麦等零工维生，一边苦苦地等马华归来，在犹太人上门报丧后，这个移工家庭悲惨的故事，才结束在安荻眼角流下的悲痛血痕。

值得点明的是，但娣把这个「底层移工叙事」的发生和结束，都设定在战争期间，把因「移动」所产生的戏剧张力推到极致。根据移动相关领域的学者研究，战争具有一种「移动性上的矛盾」，一方面，战争是以国家机器的力量动员，有大规模军队移动，同时也激起大批的难民跨国移置；但是另一方面，战争也管制边境，限制移动自由，让战火下的移动多了好几重平时没有的风险。[[34]](#footnote-34)

一直以来，「地方」的「神圣性」往往被过于高举，于是人类的「移动性」往往被视为「地方性」的直接威胁，而有了负面意义。尤其在标榜在地的乡土文学强化下，在一个地方安土重迁、让家族开枝散叶，彷佛才是传统上安身立命的方式，「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虽然封建，但也侧面地表达了这种地方性思想。而在这种中西共有的文化语境内，甚至有些早期学者会指责专供移动用的道路、铁路、机场空间是「负面的强迫施加」，会认为是这些空间「已然导致『无地方性』的蔓延」。在这种过于重视地方性的前提下，彼得．艾迪(Peter Adey)解释：

「老是在移动」被理解为一种偏离地方或「丧失地方」的方式。移动状态的人，因而是流离失所(out of place)，或是仅保有浅薄「场景和意象」的「无地方」(placeless)。[[35]](#footnote-35)

然而，在安荻和马华的故事中，但娣把「移动」的元素升华到比「固守在地」更重要的层次。「移动」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而不是被视作一种「在地性」的匮缺、一种「无地方」。她毫不迟疑地让笔下的男女主角离乡背井，不知去处地向遥远的未来迈进。于是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中，辗转游移的波兰混血儿马华，当过码头苦力、挖石工人、车夫、墨水厂工、街头艺人、监狱粗工，而他的伴侣安荻，也在不同场景中送过牛奶、刈过麦、应征当织袜厂女工，或是做其他短期农活。可以说，但娣在这个长篇中书写的不是农业社会中的生产模式，而是资本发展、交通便利后的都市底层生活形态。她敏锐地接收到新兴底层人群的苦难，感同身受，并以这群人在地球表面上为求基本生存的「移动叙事」，来对抗呼应着大东亚的固有疆界。

　但娣《华文每日》上的〈旷野里的故事〉，亦是一篇充满现代「移动」张力的小说，叙述者住在旷野里的丘陵地的一个灰色聚落，邻近着的大旅店，每日接待着各种各样的流浪过客。一日，旷野中来了一队马戏团，同时也神秘地出现一个每夜提着刀在附近晃荡的、神经衰弱的疯子，原来他是卖笑的小丑，不知何故离开马戏团，又和继任者有着极深的仇恨……最后在发生凶杀案、继任的年轻小丑送命后，马戏团的队伍，又在某个夜里消失在灰色的旷野。[[36]](#footnote-36)

流浪的马戏团，居无定所身份不明的人物，叙述者的妻子死在遥远家乡的丧讯传来时，好友正准备动身前往一个如西伯利亚荒原般荒芜野蛮、没有文化的地方。来来去去忙着移动的人群们，有着片断支离的感觉结构，让人们的认同和思考模式都不再固着于土地，也无关乎种族。

这种飘渺感，在但娣1943年的〈戒〉中也再度呈现。这篇小说是从一个躲进从林子中生产的女孩谈起。这个临盆的女孩，背负着巨大的身心创伤，未婚产子的耻辱和情人的遗弃，让她只能在林中孤独地承受生为女人的酷刑，在终于撑过「生产」这个刑罚后，她把初生的婴孩丢弃到林中，想就此出家找寻心灵解脱，但安定而固着于土地的尼姑庵，却拒绝了这个想要停泊的绝望女人，在巧遇一个化妆成乞儿的青年的激昂劝说下，这女孩鼓舞起精神，惭愧地觉悟到在这种难困时局下不应逃避「我们的责任」，终于她继续前进着她未完成的人生旅程。[[37]](#footnote-37)

在但娣〈戒〉这篇小说中，在纷乱时局下死守一地安养天年，似乎是个不切实际而且没有责任感的避世方式。「移动」是彼时的青年生命的常态，「移动」不是过程，它「就是」生活的本身。在这个基础上，〈安荻和马华〉的表现，也一如但娣其他作品，这些小说的地域背景都很模糊淡泊，战乱让小说中的这些人颠沛流离远离家乡，在漫无止境的旅程中重新和周遭世界建构自己的认同与人生。马华是个波兰和中国的混血儿──马华的波兰母亲死于病疫，[[38]](#footnote-38)而他的回教徒父亲又远行不知所踪，孑然一身的他可以说没有地域认同。直到遇上友伴斯拉其夫这个犹太人，他说服马华和他一道远行：「你没有家吧？我也一样，走到哪儿是哪儿。无忧无虑。」、「想回国吗？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的那岸，那里很好呢！」、「你不想翻翻身吗？在这里是没有出路的，不想走走吗？我是打算到别处去了！」为了更好更富裕的生活，马华留下安荻和女儿，随着这个犹太人出去打零工闯荡。虽然他的冒险最终失败了──被病痛折磨得无法承受的马华，悲惨地自沉于沼地，而被他留下固守土地的安荻，终究等不到心爱丈夫的身影。

## 结论

　　年纪轻轻就留学日本的但娣，她在学院所累积的文化资本，为她笔下的诗歌和小说文本开展出广阔宏大的世界图像。而她国际主义路线的人道关怀立场，也让她在生产方式面临转型时，能够掌握底层人民遭受到的生活变故，用和「地方性」完全不同的观点，来书写她笔下移动的人群。此外，对于种族问题，但娣对于维持血统纯正一事也从来没有执念，小说中不断出现非典型的、五族协和以外的跨越种族结合，比如〈售血者〉中的中国留学生朱良和美国人伊丽耐，还有安荻和波兰混血儿马华。透过书写马华、伊丽耐、犹太人斯拉其夫等五族以外的非典型人物设定，但娣笔下的小说文本，从来没有执着于特定的民族主义认同。

　　维持民族血统的纯洁性，向来是谱系民族主义的关注点，婚姻与性行为（特别是妇女）的控制，往往也成为民族「基因储备」的保证。在这种情形下，对于异族通婚的恐惧，往往就会变成民族主义话语的核心。但也许出于对民族血统纯正的不热衷，女作家但娣，能够较没包袱地书写这种跨越种族的结合，马华如此，他的女儿小荻也是。[[39]](#footnote-39)这种对于纯正血统的不热衷不响应，一定程度解消了满洲国官方五族协和的神话，而能用更广阔的视野，粉碎所谓「大东亚共荣」的文化想象。

　　此外，但娣这种把移动视为生命常态，在辗转流动中所建立的主体，也敏锐地挑动了时代的神经，这也许是〈安荻和马华〉在连载期间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重要因素。由于跳脱了泾渭分明的边界假设和地域主义，但娣用新的、现代性的视角，来思索更大规模的底层劳工的「移动」叙事，隐隐为一个二战结束后全球化的跨国流动世界拉开序幕。分析但娣在满洲国时期的创作，可以发现，她的人道关怀书写视野，非但超克了东亚地理图景；也透过种族跨界的方式，破除了大东亚的共荣想象，拒绝着帝国主义共同体的建构和召唤。

**漂泊，爱情，和正义** **——论但娣作品中的漂泊者形象**

**谢琼**

但娣（1916-1992）是东北伪满洲国时期著名的中文作家，她又是同期中文作家中的一个异类。1932年，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一直维持到1945年战败，给东北带来了长达14年的沦陷期。在此期间，大部分中国作家的作品都立足乡土或个人，或描绘东北城乡风景、或记录东北家族的兴衰史、或取材异乡的留学生活，总是明确地处于作家本人所在的生活和历史环境之中。即使到了文化控制严苛的四十年代，也顶多迈出时间的跨度，去写一些中国历史小说。[[40]](#footnote-40)但是但娣的不少诗歌或小说，却往往时间不明、地点游移、人物身份一团模糊，仿佛一些无根的草，不断被风刮到世界的不同角落，随处扎根，随处有了生活和死亡。与人物的不确定性相对，作家本人却和她的人物有着最确定的联系，她把自己的人生和理想，都寄托到她那些漂泊的人物身上。于是我们便常常能在那里发现作者自己的影子，以及她对一切压迫人民之政权的几乎是蔑视的回应。最近，从加拿大学者诺曼·史密斯那里，读到了但娣题为《三入炼狱——一个留日女作家的沉浮》的自传，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但娣作品中那些漂泊者的新的途径。[[41]](#footnote-41)本文将集中分析但娣在1945年前写的三篇小说《安荻和马华》、《售血者》、《呼玛河之夜》以及叙事诗《梦的沙漠》中的漂泊主题，探讨这些漂泊者的形象如何成为作者不同人生阶段的代言及内心世界的隐喻，又如何在现实的意义上构成对伪满政治的批判。

**一、《安荻和马华》**

中篇小说《安荻和马华》是但娣的文学代表作。1936年到1942年，但娣在日本奈良留学，1940年回齐齐哈尔过暑假期间写成此文，返回日本后向在日中文刊物《华文大阪每日》杂志投稿，一举入选杂志主办的“百页中篇小说”悬赏作品，得以发表。小说描写了中国人安荻和中俄混血的马华之间悲切的爱情故事。他们在中国结婚，因为战乱四处逃难，期间安荻生了孩子。马华为了求生，决定和他的犹太人伙伴一起到俄国做工，却惨死他乡。故事在安荻流血的泪眼中结束。

毫无疑问，这篇作品，着重描写贫苦穷人的爱情，饱含着作者对下层人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控诉。作品黑暗而凄惨的氛围，还可被解读为是对满洲国黑暗现实的影射。[[42]](#footnote-42)但除此之外，小说和但娣本人的经历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写作当时，但娣正面临爱情被背叛的打击，她把她的情伤投射在了她笔下漂泊的人物身上。

但娣生来就带有异族和漂泊的基因。但娣原名田琳，祖籍湖南。她的祖父在清末赴黑龙江边境瑷珲充军戍边，在当地和一位朝鲜孤儿结婚。[[43]](#footnote-43)也就是说，她带有四分之一的朝鲜血统。她的父亲曾先后流居在木兰、巴彦、汤原一代，婚后生了两男两女。1916年，最小的女儿但娣出生；1918年，在但娣两岁时，全家才在齐齐哈尔安顿下来，一住就是几十年。[[44]](#footnote-44)但娣因此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但她身上所承载的，却是一段长长的家族漂泊史。

在黑龙江省女子师范就读的中学时代，但娣既是排球队长，又是《黑龙江民报》进步文艺副刊《芜田》的热心投稿者。[[45]](#footnote-45)1935年，但娣中学毕业后去广来小学任教，并和邻家青年学生田琅（本名于明仁，田琅为其常用笔名）确定了恋爱关系。同年，田琅获得官费留日资格去东京留学，赴日前两人订婚。1936年，但娣辞职准备官费留日考试并顺利通过。1937年初去日本之前，但娣收到田琅的来信，说如果他们结婚，但娣就得回田琅老家侍奉他的家人，不然，只有同居。但娣选择了不结婚而赴日。

1937年春天，但娣考取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预科[[46]](#footnote-46)，从此与田琅开始东京到奈良的两地生活，每次见面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当年秋天，她在田琅的日记中发现一行字：“这天，我对不起琳。”她没有追问，但和田琅在东京办了一个正式的订婚仪式，将消息向在日亲友公布。[[47]](#footnote-47)可是订婚仪式之后，关于田琅此前已在家乡结婚的传言却纷沓至来，两人间的裂痕更大了。[[48]](#footnote-48)1938年，田琅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但娣8月怀孕，9月发现，10月休学并搬到东京和田琅同居。[[49]](#footnote-49)而但娣自己的记述和奈良校方的记述则是：1938年春，但娣顺利由预科升本科，第二学期因三叉神经痛休学，直至1939年春留级复学。[[50]](#footnote-50)在与田琅同居的日子，但娣阅读了大量日译西方文学作品，但因为要和田琅共用一人的奖学金，生活却异常贫苦，经常只能吃到面包蘸盐。1939年，田琅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学习。两人因地理距离的接近而感到欣慰，但娣却不知道，一连串更沉重的打击正等着她。

1940年，田琅已婚的传言越来越盛，但娣突袭了田琅在京都的寓所，发现了刻着别的女人名字的结婚戒指。田琅承认他的确在家乡由父母包办而成婚，但承诺两人一毕业就离婚，正式迎娶但娣。尽管但娣很痛苦，却并未与田琅分手。不久，田琅带但娣去见同为伪满留日文人的柳龙光和梅娘夫妇，他们当时在日本负责《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的编辑，柳龙光并热情地邀约但娣写中篇小说。但娣在那里还见到了《华文大阪每日》的编辑张蕾等人。当年暑假，但娣回齐齐哈尔，写成了《安荻和马华》，获得杂志中篇小说悬赏的一等奖，并在1941年1月号的两期杂志上连载。此前，但娣总会在作品前写上“献给楚珊”的字样，楚珊即田琅，这次她却没写，因为她觉得田琅已不是过去的他，她也就不再属于田琅了。可田琅直接联系编辑部，在但娣的稿子上加上了那一行字，但娣直到刊出时才看到。1941年夏，但娣突然收到某熟人的来信，揭发田琅与其妻张蕾的私通关系。张蕾正是但娣此前在梅娘家见过的《华文大阪每日》编辑。但娣拿着信质问田琅，才知道田琅与十几个女人有染。这消息如五雷轰顶击垮了但娣，她向梅娘哭诉，又向校方和同学宣布解除婚约，此后半年都沉浸于悲伤而无法自拔。次年1月，她完成了短篇小说《售血者》。[[51]](#footnote-51)

回到《安荻和马华》。写作当时，但娣正因得知田琅的婚讯而迷茫纠结，她难以和田琅决裂，却又要去掉“献给楚珊”的字眼。马华这个名字，可能来自但娣同年稍早的诗作《未完结的故事》，内容很明显是依照她与田琅的恋爱历程写下来的。[[52]](#footnote-52)但娣给诗中男女主人公分别起名叫马la(女字旁+拉）和马尔华。也就是说，如果说女主人公安荻的名字，在但娣作品序列中，是一个全新的名字的话，那么男主人公马华的名字 ，沿用了过去作品中对应田琅的人物的名字。这首诗写于1939年10月，应当是但娣因看过田琅日记感到不安，但还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打击的时候。诗是这样写的：

——一九三五年——

马la和马尔华结识了，

在寒星伴着兴安岭的月夜里。

于是，他们的驼铃响起来了。

“马尔华呀！

我们走向哪里去呀？

马la跟在马尔华后面跋渉着。

——一九三六年——

马la和马尔华忧愁了。

当着九月天，

暴风雨忽然就来了，

从哪里来的呢，然而来了。

“马尔华呀！

灾难到了，

丢掉我吧！

呵！”

马la在马尔华的背上哭了。

——一九三七年——

马la和马尔华，

当着太阳落下地平线下去的黄昏时候，

他们坐在一棵棕榈树下，

马la呀！

给我一个吻吧！”

——一九三八年——

马la和马尔华

在乳色的黎明里，

他们倦了，

并排地睡着。

那边——

有晓角响过，

马尔华醒了，

马la呀！

我去了。”[[53]](#footnote-53)

（一九三九，一〇，二六，奈良）

我以为，在但娣和田琅生活中的恋爱、但娣的诗歌《未完结的故事》、以及小说《安荻和马华》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文性的结构。诗歌中的年份次序和但娣与田琅的恋爱展开基本一致，而诗歌中提到的男主人公在暴雨中背女主人公、两人谈话到黎明才并排睡去等情节，都出现在但娣的自传里。当然，自传并不总是完全符合事实，但至少我们可以确认，但娣把她自身的人生和爱情体验写进了这首诗里。换句话说，这两位漂泊的主人公身上，承载的是作者对爱情的渴望、在异乡的漂泊，以及精神上对未来的不安。这首诗，正如其题目和结尾暗示的那样，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透漏着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

与此相对，但娣在一年之后写的小说《安荻和马华》，则可看作是她在被第一次背叛之后，对此前诗歌的一次改写和续写。正如诗中所写过的那样，在小说中，安荻和马华也相识相爱在兴安岭的月夜，马华在战乱中带着安荻逃难。而诗歌中最后一节里两人并排睡着，男主人公却要在凌晨离开的场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被一次又一次复写，男主人公的目的地却越来越远。先是两人在避难所睡着，每天凌晨马华起床去市场找工，然后是两人在贫寒的家里睡，凌晨马华去河边的工厂上工。后来马华为了方便，决定住在工厂。那以后，马华凌晨一别，总要很久才能回来。最后，马华决定和犹太人伙伴远走他乡，去俄罗斯挣钱，再度在凌晨离去，却再也没有回来。他在俄罗斯弄伤了脚，不能行走，每天爬行乞讨，又患肺炎，终于无法忍受而跳湖自杀。这边，马华不归，安荻找到村长帮忙，村长却提醒马华可能已经和别的女人结婚了，村长老婆又说现在的人都靠不住。安荻坚决不信，与村长争辩。她苦苦支撑着家，最后只等来马华的死讯。

在小说里，但娣把主人公写死了，并且坚决不接受他背叛的可能。我想，这是作者用写作在面对自己生活中爱情被背叛的打击。她相信至死不渝的爱情，宁可对方消失，而不愿接受他另娶她人。如果必须接受破碎的结果，她宁可他们两人是安荻和马华，但生活已经不给她这样的选择，她只能在小说中重写生活。马华死了，有着全新的名字的安荻尽管哭到双眼流血，却仍然活着。如果说《未完结的故事》的末节，对应的是1939年时但娣对未来的未知，那么《安荻和马华》的结尾，对应的则是她1940年时在心里埋葬了过去的田琅，带着伤痛在异乡继续漂泊的心境。

**二、《售血者》**

但娣想用文字来哄骗命运，命运却不放过她。《安荻和马华》发表的几个月后，她就又听到了田琅与十几个女人有染的消息，并最终和田琅决裂。在随后写成的小说《售血者》里，她只能面对现实。她写了这样的开头：

在一九三九年，我的未婚夫死了。他死在美国的巴尔提摩尔城。不，实际他没有死，他和一个美国的姑娘结了婚。我带着伤痛，从富拉尔基城（今齐齐哈尔附近——笔者注）来了，为了办理解除婚约的手续而到巴尔提摩尔城。

是冬天的黄昏，我感到了旅人的无限的悲哀，于是我便唱着我自己的悲哀：

悲哀的黄昏

寂寞的黄昏

悲哀的旅人

寂寞的旅人

屋子里——

没有燃着的炭火

生命里也没有燃着的爱情。

我望天涯

天涯尽处是流云

悲哀的黄昏

寂寞的黄昏

悲哀的旅人

寂寞的旅人[[54]](#footnote-54)

“不，实际他没有死”，标志着从《安荻和马华》到《售血者》，或说从1940年的但娣到1942年的但娣的转折。“我的未婚夫死了”，那不过是自欺欺人。“实际他没有死，他和一个美国的姑娘结了婚”，背叛才是那不能承受之痛。女主人公唱的歌，一些悲伤的词反反复复，仿佛唱歌人已经痛到无法说出自己的故事，只能无谓地重复一些短语。于是在小说中，但娣选择让这位主人公沉默，把她的悲哀嫁接到另外一位漂泊者的悲哀上。一位牧师造访了这位女主人公，请她去倾听一个叫做朱良的垂死的中国人的遗言。朱良的遗言，就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朱良和伊丽耐因卖血为生，在卖血站相识相爱并同居。伊丽耐为了维持生活，也为了将朱良让给她认为更合适的女孩结婚，一度离家出走卖春，最终被朱良劝回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但没过多久，她便因卖血过多死在血站，万念俱灰的朱良则哭瞎了双眼。朱良讲完故事的第二天，“我”又去看他，却发现他已经死去。“我”只能感叹，“他的梦完结了，如同那到处飘落的黄叶”。

如果说对《安荻和马华》的分析，展示了但娣的人生与其笔下漂泊人物的对应关系，那么通过《售血者》，我们能进一步看到这些漂泊人物与但娣精神世界间的对应关系。这些人物，为什么一定要是漂泊者？这些人物为什么不能仅仅是贫穷痛苦的底层人物？为什么他们总要漂泊在地理上遥远的一点，或是一处跨国的边境，或是地球的另一边？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和她的家族也有在异乡漂泊的身世，更因为那些人物在地理空间里的漂泊，成为她内心深处迷茫混乱的一种隐喻。换句话说，作家的内面，外翻而嵌进了她经历过或读过的外部世界的各处空间，于是漂泊的空间具象化了她精神的迷宫，而漂泊的人物成为她探索自身意识深处的领路人，并最终引领她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和困境

有读者和研究者感到但娣的小说像诗，富有诗的意向、结构和隐喻。[[55]](#footnote-55)但娣小说中地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对应关系，也可藉由但娣的诗作说明。其中最好的例子，便是她在写《售血者》的同时完成的一首散文诗《微吟》：

无慈悲心的运命落到我的身上。悲哀的美丽诱引了我的全生。

我在苦思着，手中拿把雕刻刀子，我在雕刻着阿尔布斯的山脉和峡谷…………。我的意识里，往事也深深地雕刻了那些山脉和峡谷…………。我在那里迷失了，仿佛天黑了，在那里我喊出绝望…………但，一点也听不到什么反响的回声。[[56]](#footnote-56)

在制作地形图的过程中，阿尔卑斯山遥远的山脉和峡谷，在诗歌主人公的雕刻刀下一点点呈现，正如她那被往事雕刻的坎坷回忆。阿尔卑斯的地貌，成为她内心地形图的表象。作者接着写道：“悲哀像一条冰河断裂地冲过了我的心谷，在那里它开始侵蚀，剥削。仿佛在那里有肉和灵的岩屑破碎而研磨。”外在的遥远的地理世界中的冲突，和内心世界里的冲击与崩塌，已经交融一体。最终，诗歌主人公在她的想象的漂泊世界中找到了路，也为自己迷乱的心灵找到了方向：“新生便在灭亡的悲鸣的回声里诞生了，” “于是我面前便展开了一带潮湿的哀愁，这哀愁倒不是诞生在回忆的田野，而是在雾霭的预想的高峰”。在诗的最末，作者重新开始展望爱情：“我企望幸福，我便看见了企望的宫殿里的桂冠诗人。……（略）他比谁都忠诚，更忠诚，十全的忠诚。来了，他来了。”

而在小说《售血者》中，甚至但娣所有有关漂泊的小说中，作者的笔触就如同诗歌中的雕刻刀，跟随她的漂泊者人物伸到外部世界中荒凉莫测的边远之处，同时也深入到自己意识那不可捉摸的最深处。漂泊者在漂泊中求生，与作者在迷乱中找路，需要同样的勇气和智慧。以此为线，再回头来看《售血者》，就会不同。就从男主人公共朱良的住处讲起：

跟同老人坐着车子，离开巴尔提摩尔城，一个钟头后便到了一个山根脚下，我们下了车子，步进巴哈尔的谷底。

在巴哈尔谷底，除了几个捉山鸟的孩子以外，再找不到什么人影来了。

我们踏着常年积埋的落叶，穿行在阴暗又潮湿的谷底的小径里。

不久我们便到了一间小小的木板屋，孤立在谷崖底的断丘上，房顶已经有些歪斜了，涂着的褪色的白粉，变成了难看的苍灰。四围的墙壁已坍颓。

“那便是朱良的家了。”

这是朱良的家，是巴哈尔谷底，同时也是但娣当时的人生的谷底。如果能把作者那时悲凉的心境具象化成世界的一点，那一定就是这阴暗潮湿的谷底里褪色的小屋。《售血者》中的“我”，悲伤而无法讲出自己的故事。但是，她从东方的富拉尔基城漂泊到西方的拉提尔摩尔城，又踏入巴哈尔谷底去聆听另一位同胞的不幸。最终，这位同胞和他的爱人都死了，可是伊丽耐曾对朱良说过的话，“人非坚强的活下去不可……为自己而活为不幸者而活呵”，却通过朱良的口传到了“我”的心里，又通过作者的笔传到了读者那里。整个故事中“我”的漂泊和其他漂泊者的不幸，恰如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她曾坠入谷底，但是，通过不断将自己的痛苦与其他的不幸者相联系，以及不断地在写作中鼓励自己，她终于走出来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但娣笔下漂泊的不幸者，成为了她探索自我内心世界的领路人。

在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但娣的专业是历史地理。[[57]](#footnote-57)在她写下“悲哀像一条冰河断裂地冲过了我的心谷”的前两个月，她在日记里写：“读完了……地学的冰河侵蚀篇。”[[58]](#footnote-58)而用雕刻刀雕刻阿尔卑斯山地貌，也正是她地理课的作业。[[59]](#footnote-59)但娣在日本的所学，为她沟通了内外两个世界，并使得她在书写那些漂泊者时，能够自如地把他们定位在世界的不同地点。

**三、《忽玛河之夜》**

但娣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总能将大世界里他人的痛苦和社会的不公，与自己个人的小世界联系起来。她的很多作品里，你分不清作者是在控诉负心的情人，还是在批判黑暗的现实；是在鼓励自己走出情伤，还是在号召读者反抗。不管在何种程度上和个人的精神与情感相连，总是不缺乏社会批判性。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但娣通过漂泊者的人物形象，抨击了给人民不断带来战乱和贫穷的政权，特别是伪满日本政权。[[60]](#footnote-60)这里，我想通过分析她的短篇小说《忽玛河之夜》，探讨但娣笔下的漂泊人物所具有的一种现实的社会批判性。简言之，它们虽然是作者个人小世界的象征，但同时也隐含着对伪满时期日本宣传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政策的无视和批判。

《忽玛河之夜》写于1941年6月，难以确定是在但娣与田琅决裂之前还是之后，所以暂不分析作品与作者人生之间的关系。故事的内容如下：女主人公朱倪思从哈尔滨来，到忽玛河畔的一处关押场所去看她的被放逐的爱人戴西。在前行的路上，朱倪思不断回忆起两人恋爱时的甜蜜。可是当她终于见到了她的爱人时，她发现戴西已经被砍去了双手，变成了哑巴，而且重病在身，奄奄一息。他让周围的人把一只铅笔插进他的鼻孔，给朱倪思写下一行话，“我见着你，我快活了，我什么也不要了！”然后就死去了。当夜，朱倪思跳进忽玛河自杀。

1986年出版的《长夜萤火：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中收录了这篇小说，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在山边呼玛河岸的残废院中，因一篇文章遭到放逐和被砍去双手的戴西——她的爱人，在等着她。”据此，很多研究者将小说读作对伪满日本政权文化高压的影射和批判。但是，在40年代的版本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因为在山边忽玛河岸的养老院中，有遭到逐放和惨运的戴西——她的爱人，在等待着她。” [[61]](#footnote-61)小说的其它地方也并没有交代戴西遭到放逐的原因。因此，过去的解读，其实是基于1986年修改过的版本，而非最初创作时的版本。本文的分析，将基于《忽玛河之夜》的最初版本，也就是发表在《华文大阪每日》1941年8月15日出版的第七卷第四期的版本。

但娣的漂泊故事，多发生在边境之地；漂泊人物，也常常是种族民族不明或混杂。这在小说《安荻和马华》里就可看出，在《忽玛河之夜》中则更为明显。忽玛河，今称呼玛河，在东北的最北端，是中俄界河黑龙江的一条靠近边境的支流，呼玛河口的呼玛县今天仍然是接壤俄国的边境县。呼玛河地区在兴安岭腹地，“呼玛”的名字来源于达斡尔语，是“高山峡谷不见阳光的急流”的意思。这里有汉、满、回、蒙古、达斡尔、鄂伦春、等多种少数民族，以及俄国人居住。

在小说中，作者没有交代男女主人公的背景。他们的名字朱倪思和戴西，也让人分不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但娣经常给她的人物起这种名字。即使读完下面这一整段人物描写，我们仍然无法判断主人公的民族身份：

黄昏来了，夕阳从山毛榉的隙缝滑落在她那瘦白的脸上，她那花一般美丽的青春在忧愁下早已凋落了。她边咳呛着，边用无力的手拨开前面的灌木丛，在一棵马醉木的树下，她停住了。她觉得胸中异常的热，她频频地干咳着。她的脸由苍白而晕红了，于是血从她的口腔和鼻孔中喷出。赤红的血液，在草丛中渗透流泻着。[[62]](#footnote-62)

这一段中，两次提到关于朱倪思的“白”——“瘦白的脸”、“她的脸由苍白而晕红”。可是由于没有别的线索，我们很难判断“白”究竟是因为种族（白人），还是因为疾病，或两者兼有。下文中关于戴西的双手被砍的情节，也继续营造着一种异国或异文化的氛围。主人公的身份之谜，直到小说的倒数第二行，才算有了解答。那是在朱倪思投水自尽时，“灰白色的波浪包没了她黑色的发丝。”这表明朱倪思是中国人，但她的民族却始终不明。

但娣小说中地理和人物的族群混杂或身份不明，当然可以看作是对东北地理人文环境的真实写照，或是像上节说到的那样，看作是但娣内心迷茫混乱的一种隐喻。不过，除此以外，在伪满社会环境中，在日本当权者不断强化民族意识的和民族等级的背景下，但娣的小说，从普通人的生存和生活出发，对国境和民族之间的界限提出根本性质疑，为生活在伪满洲国的中国读者展现了与政治宣传所不同的民族体验和民族认同。

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的“日、满、汉、鲜、蒙”或“日、满、汉、鲜、俄”的“民族协和”政策，[[63]](#footnote-63)本质上是一种民族等级政策，其中日本大和民族处于指导民族的地位，享有各种社会特权。不过，要确立民族等级政策，首先要明确和强调“民族”的概念，把民族宣传成为一种可以通过生物和文化特征来清晰区别的本质化的身份认同范畴，并以此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区分依据。这种区分方法，从伪满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编选中就可看出。在当时的各语言文学作品中，经常以人物的民族身份作为描写其生活的最主要依据，并在伪满政治允许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关系；此外，日本主导的文学作品翻译选集，也均按照不同民族的作家来划分。正因此，有学者指出，日本的伪满政权，大大固化了东北人的民族观念。[[64]](#footnote-64)

不过，也有很多中国作家，在写作中淡化这种民族意识或民族区分，与日本当局对民族的不断强调形成鲜明的对比。[[65]](#footnote-65)但娣的创作就是这样，尽管她会写到漂泊者人物的民族，“民族”作为概念却从未成为她创作的主题。《忽玛河之夜》里，我们甚至连明确的民族生活区域或民族身份都找不到，仿佛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在任何民族的一对男女身上。而《安荻和马华》与《售血者》，本身就是不同民族的人跨越地理和文化边境去相爱相知的故事。但娣以自己的故事展示，民族身份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交流和帮助，不起决定性作用；不仅如此，“民族”本身就是一个界限模糊的、混杂不明的范畴。她的故事，讲的是另一种民族间的“协和”——是超越了民族概念的、基于人类普遍的同情与爱的“协和”，而不是日本当局所倡导的以民族等级划分为基础的“民族协和”。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但娣的不同，我想引入另一位善写边境题材的伪满中国作家石军的作品来比较。石军（1912-1950），曾于1941-1943年作为伪满官吏在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的边境县城绥滨任职，并以此为基础写成系列短篇小说，于1944年以《边城集》为题结集出版。[[66]](#footnote-66)其中题为《混血儿》的小说，写了主人公“我”我与一家中俄混血家庭交往的故事。这家是“我”的邻居，死去的男主人为中国人，女主人是苏维埃革命后流亡到东北的白俄，辛苦拉扯儿女成人。她和她的孩子们都程度不同地会说东北话，而且家里的陈设也有汉族的风气，但又始终保留俄国的生活习惯。这家人总有一份抹不去的乡愁，期待有一天能重返故国，为在苏维埃革命中死去的家人报仇。作品最初在《青年文化》杂志上发表后，[[67]](#footnote-67)曾因“通过亡命满洲的白俄人的痛苦和感慨来唤起满洲民众的祖国意识”而遭到检举。[[68]](#footnote-68)或许作者在白俄女主人公身上，寄托了伪满洲国东北人丧国丧家的悲愤。不过，在描写边境地带异族人的手法方面，作者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日本当局所宣传的民族意识。

在小说中，主人公“我”被贬谪到一处“被历史的齿轮抛弃了的没蒸气”的边境小城，这正表明了强烈的地域等级观念：边境的小城，就意味着没有历史，也没有现代文明。主人公生活的环境，也带有明显的民族等级标志：邻家中俄混血家庭的孩子，要给县厅的日、满（指中国人）、鲜系官员送牛奶，而“我”作为副县长，也是他们服务的对象。可见，不仅官厅里只有日、满、鲜族任官职，而且他们之间的界限与排位顺序也很明晰。接着，作者发现邻家是中俄混血家庭后，心生好奇，不断想要查明这家人的方方面面，比如，“我要进一步明澈的知晓这一家的根底，想利用每日送牛乳取空瓶的时机，察询一番民族史上鲜有所闻的这一家的生活实相。”他记录下来女主人和其中三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是：鲁丽娜，马拉曼，思巴密尔，孟狄梭夫，打听了他们从俄国流落到满洲的历史，又利用职权便利尽可能给他们提供帮助，包括帮忙弄到各种配给及开店执照、给孟狄梭夫安排工作等等。同时，他很注意观察这个家庭的“民族性”，当看到他们家里已经有灶神、春联等汉族传统的陈设时，会感叹“汉民族对于其它异民族的同化力”，但同时也会饶有兴致地观察带有“俄国特色”的圣母玛利亚画像和烤面包机。他也想仔细辨识几个孩子的汉话都属什么水平。最后，他听说孟狄梭夫想要学开车，未来还想开坦克和战车，大为感动，决定资助孟狄梭夫上驾驶学校。

这篇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有“国策文学”的痕迹，比如对苏维埃革命的否定，对民族协和关系的思考等。孟狄梭夫的参战意愿，也和1943年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动员暗合。在写异民族的方法上，小说采取了一种尽可能详细记录的“民族志”视角，对民族的异同、作为民族标志的语言、信仰、历史等细节非常敏感，并且将民族生活习惯的融合清晰地定义为“汉民族对于其它异民族的同化力”。换句话说，这里“民族协和”的基础，首先是对民族边界的清晰定义，在此前提下再讨论混血的跨界。这一视角，在伪满洲国许多日本作家的小说中都可见到，它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权力关系。[[69]](#footnote-69)反观但娣的小说，人物的名字中鲜有身份线索，在写到异族之间的交往时，完全不存在地域或民族的等级关系，也极少把语言、信仰等民族差异描述为交流的障碍。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超越民族概念的不幸者之间的同情和交流，而不是在强调民族界限前提下的跨界。

但娣曾这样评价过自己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写作：“没写过一篇宣传敌伪国策的文章，更没写过亲日的文章。”[[70]](#footnote-70)这个评价不仅公允，而且贴切。在当时政治高压的环境下，直接批判日本当局的作品不仅很难发表，而且有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娣的小说，与日伪国策拉开距离，淡化民族问题，而强化跨民族的不幸者之间的连带感。由此，那些漂泊者的故事，不仅是作者个人生活与情感的曲折表达，对伪满洲国社会，也具有了现实的批判意义。

**四、《梦的沙漠》及结语**

时间走向了1943年，但娣作品中的漂泊者和但娣人生的漂泊，也快要迎来在伪满洲国期间的结局。但娣于1942年10月从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伪满洲国。不久，她就开始计划逃离这个地方，为此，她在1943年1月前往偏僻的小城开原教书，并找到了几位可以联系她逃走的学生。在自传中，她写道，“从此，我心中燃烧着希望的火，我盼望着逃跑的时刻早日到来。忧伤、烦恼都从我生命中驱走，心中充满阳光。”在1943年秋天，得知一位学生的老师能带人逃走，她立刻给那位学生留下她二哥在吉林市的地址，然后离开开原，只身来到吉林市，住在二哥的泥土屋里，等待这位老师来找她。

与此同时，但娣作品中的漂泊者形象，也已经和过去不同。在发表于《新满洲》1943年7月号的诗歌《意识的叛乱》中，叙事人“我”的形象和在沙漠或大海里艰难前行的旅行者形象相叠加，而带有鲁迅印记的诗句，如“希望产生于绝望的断崖”，或是“路是踏出来的，/ 勇敢，去踏！”等，成为对“我”和旅行者共同的激励。在诗的结尾，叙事人感叹，“在晨光里，我又找到了我自己的灵魂。”[[71]](#footnote-71)这首诗显然在表达作者努力走出人生困境、重新启程的决心。在暂住吉林等待逃跑的深秋十月里，她更写下叙事长诗《梦的沙漠——马弟尼与马路希》，发表在《艺文志》1943年12月号上。[[72]](#footnote-72)诗的主人公是一位叫做马弟尼的女性，她为了寻找多年前被胡匪掠走的伴侣马路希，一个人背井离乡，带着“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快活和荣光”，踏上穿越沙漠的旅程。途中她曾误入魔鬼的王国，被无辜囚禁五年，但五年之后仍然不改初衷。后来，她终于遇到一位侠义的骑士，带她越过重重沙原，找到了马路希。他们将马路希解救出来，三个人踏上了新的征途。

马弟尼曾经出现在但娣的诗中。在奈良时，她的题为《马弟尼》的诗，写了一个整日哭泣、发呆、无处可去的可怜女孩，显然是作者情伤时期的写照。不过，《梦的沙漠》中的马弟尼，已经变成了拥有钢铁般坚强意志的女性。她的伴侣马路希，也不再是真实生活中田琅的对应物，他象征了一种更高的理想，一种自由的爱和正义的光。联想到当时作者正在寻求逃亡，这首诗中的漂泊者，很可能正寄托了作者本人不惧艰险又充满希望的心情：她也正在等待自己生命中的骑士，去带她走向沙漠的彼岸。这个人物成为截止那时但娣笔下所有漂泊者中最积极、最光明的一位，它表明作者的人生意志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更为巧合的是，在同一期《艺文志》杂志里，就在但娣作品《梦的沙漠》的下页，是田琅和另一位伪满洲国女作家田嬛（笔名乙卡）的结婚启事。[[73]](#footnote-73)理想与世俗，旧爱和新欢，漂泊与定着，都在这几页纸间形成对照，但娣已经离她个人的情伤越来越远了。

谁知《梦的沙漠》却在意想不到的意义上一语成箴，几乎预言了作者此后的半生。那次在吉林，但娣没有走成。得知对方并不打算把自己带到日本统治区范围之外，而是要带自己去沦陷的北京做情报工作，她没有答应。1943年12月，正当她计划第二次逃亡时，几个日本便衣带走了她。就像《梦的沙漠》中马弟尼被魔鬼的王国囚禁一样，但娣本人被以反满抗日罪判刑两年，1944年夏因为重病垂危被抬出监狱。出狱之后，她却凭着坚强的意志死里逃生。1947年，她因替被诬陷的同事说话而同被诬陷为国民党，再次入狱一年多，得了淋巴瘤和肺结核，出狱时已奄奄一息，无法站立。没有医药，她通过晒太阳、练习走路、种菜劳动的办法，让自己康复。1968年1月，在文革中，但娣第三次入狱两年。她深感这是最难熬的监狱，在那里，连她最珍视的不幸者之间的连带感也没有了，有的只是仇恨、揭发和猜疑。接着，就是多年的下放劳动。直到文革结束，但娣才得以回家，并重新拿起笔来。人到暮年，她找到了一位相知相爱的老伴，远嫁南国，并于1992年在深圳过世。当年的马路希，终于在人生结束之前，走到了她理想中的目的地。

从对这些漂泊者的故事以及作者本人的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出，但娣一生看重个人情感尊严，追求自由和爱情，充满社会批判精神，并且表现出对弱者的超越民族和政治的同情心。她的同情和批判因而具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使得她无论在何种政权之下，都不能接受对尊严的践踏和对弱者的侵害，敢于和权威对抗。而她之所以如此偏爱漂泊者，或许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她看到了、寄托了她要追求的这一切人生理想。也许在但娣回头重读自己的作品时，会庆幸有他们伴随她走完那“三入炼狱”的人生。

伪满洲国文学之“修饰的镜像”

——以但娣《忽玛河之夜》为起点的考察

陈实

摘要：伪满洲国文学，是在日本殖民的“死亡阴影”里活着的文学。在伪满洲国存续的14年中，那些以文学为生命的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创作和精神的独立。这些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过极左思想的冲击，很多人的作品被误解、曲解，大部分人被打上“伪满作家”、“汉奸文人”、“落水文人”等标签而陷入缄默。新时期（1978年）以来，这一特殊时空的作家和作品开始得到公正的评价，一些作品也得以结集再版与读者见面。然而，这些几十年后本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镜像”的作品，却出现了一些“被修饰”的痕迹，或删除“殖民化元素”，或增补“抗日元素”……这种“修饰的镜像”增加了我们从史料上客观真实的研究伪满洲国文学的难度，同时，也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作家复杂的精神历程。本研究将以但娣短篇小说《忽玛河之夜》为起点进行考察，探索伪满洲国时期作品被修改后的影响和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伪满洲国文学 但娣 忽玛河之夜 版本

悲伤的《忽玛河之夜》

但娣（1916-1992），原名田琳，但娣是她最常用的笔名，除此之外还有安荻、晓希、罗荔、田湘、罗丽、马蒂尼、马尔华、马若、山鹰、田香、西西和小西等。1916年8月15日，但娣出生于黑龙江省汤原县，1935年毕业于黑龙江女子师范学院，1937年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官费留学名额，赴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42年毕业回国，任辽宁省开原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教师，翌年12月因反满抗日被捕入狱。至伪满洲国覆灭，但娣发表了《安荻与马华》、《风》、《戒》、《砍柴妇》等中短篇小说和多篇散文诗歌。

东北光复（1945）后，任东北电影公司编剧，1953年调黑龙江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发表散文、报告文学40余篇。文革时期因为政治原因停笔，1979年后又开始创作，1992年2月17日在深圳逝世，她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87年于哈尔滨开始初稿，1989年完稿于浙江梅城的12万字回忆录《三入炼狱》。[[74]](#footnote-74)

短篇小说《忽玛河之夜》发表于1941年8月15日的《华文大阪每日》。[[75]](#footnote-75) 是作者身在日本奈良“若草山下”完成的（1941年6月16日），[[76]](#footnote-76) 若草山是日本奈良著名的景点之一，此山位于奈良公园东部，海拔342米。立于山顶，可以俯瞰奈良景色，是令人愉快的旅游胜地。然而，但娣在山下创作的这篇《忽玛河之夜》，却充满着深深的悲伤。

小说讲述了一个“听到过路人传来消息”的“老处女”朱倪思，昼夜赶路去看望其初恋情人戴西的故事。“遭到逐放和惨运”的戴西因为肺病恶化，将不久于人世，而女主角朱倪思也患有严重的肺病，文章开篇就写道，“她那花一般美丽的青春在忧愁下早已凋落了”，“她频频地干咳着。她的脸由苍白而晕红了，于是血从她的口腔和鼻孔中喷出”。

戴西住在山那边草原上闩着门的养老院中，那里尽是身体残疾者，当跛脚的青年带着朱倪思来到残废室北炕上的戴西面前时，戴西“瞪视着走来的朱倪思”，他一直热切盼望着她的到来。17年前，两位年轻人曾“散步在葡萄林中，唱着初恋的紫色的歌”，而如今，戴西是一个“完全变像的歪苦的”样子。时光改变了恋人的模样，而境遇更是将他摧残成一个垂死的残疾人。戴西已然手不能写，口不能言，只好让另一个残废者将一只铅笔放入他的鼻孔，写下一句“我看见你，我快活了，我什么都不要了！”，随后双臂拥抱着朱倪思，死在她的怀中。由于“残废部的例规”，死者必须“立时便施行火葬”，戴西被抬到忽玛河边抛进火堆中，而悲痛欲绝的朱倪思选择了殉情，她“狂叫一声”，“投向忽玛河的激流里了”。

这是一篇悲伤的短篇爱情小说，整篇文章充斥着一种悲剧气氛。两个主角17年前相恋，15年未能见面，可谓桑田沧海，而15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就是永诀。作者设置了一些细节，让这两个人的爱情显得十分诚挚：朱倪思是一个“老处女”，这很容易让人想象她为了当初的爱情至今未嫁；身患咳血症，翻山越岭去看望戴西，一路“颤抖”、“踉跄”，暮色增加了她的“兴奋”与“恐怖”，但一想到戴西，她“苍白的枯瘦的脸上便浮现着梦一般希望的光”；当朱倪思赶到，跛脚青年告诉她“你来的正好，他盼得很厉害！”，表明戴西也一样的思念她；看到戴西的惨状，她“惊兴地流下了眼泪”，“疯狂地喊叫着”，“悲凄地哭倒在戴西的怀里”，她“咳呛着，她又呕吐了血”，可以看出她对戴西的疼与爱；戴西在垂死之际，鼻孔插入铅笔写下的遗言，却是见到她的满足和快活，这证明戴西也同样的爱着她；朱倪思最终选择了殉情，这是爱情故事里失去所爱后，对爱情最偏执的表达方式。

这篇文章还暗含着一些隐喻，如：戴西所在的地方是“养老院”，却没有描写那里的老人，而更多的是“残废人”；给朱倪思开门的看门人，本应该是强壮矫健的人，文中却是“吃力的跷着一只脚”的跛脚青年，看门的狗绰号叫“四眼”（对近视者的蔑称）；朱倪思与戴西15年未见，她甚至不知道戴西已经手不能写，口不能言；在月光中，戴西的尸体“由几个盲人抬出”，十分不合乎情理。限于篇幅，此处就不展开讨论了。

此文随着《华文大阪每日》在伪满洲国的发行而得以面世，与之前但娣的中篇小说《安荻与马华》相比,[[77]](#footnote-77)《忽玛河之夜》在伪满洲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与她同时代的著名伪满洲国女作家吴瑛（1915-1961)[[78]](#footnote-78)在1944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但娣当时的创作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论，提及《忽玛河之夜》，只是一笔带过式地写道：“歌吟着残废人的灭亡的命运”。[[79]](#footnote-79) 然而，同一篇文章，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却被作为“反满抗日”的作品被大量引用，其作品的思想倾向突然变得异常明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

反抗的《忽玛河之夜》

1986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伪满洲国时期著名作家梁山丁（1914-1997)[[80]](#footnote-80)主编的《长夜萤火》,[[81]](#footnote-81)这是一本收录了东北沦陷时期悄吟(1911-1942)、刘莉(1912-1994)、梅娘（1917-2013）,但娣、吴瑛、蓝苓（1918-2003）、左蒂（1920-1976）、朱媞（1923-2012）这八位知名女作家作品的选集，共计31篇作品，其中就有但娣这篇《忽玛河之夜》。[[82]](#footnote-82)

1987年，张毓茂在评论《长夜萤火》的文章中，论及了但娣的《忽玛河之夜》，他写道：“但娣的《忽玛河之夜》，有力地控诉了敌人的残暴罪行。戴西因为一篇文章触犯了敌人，竟被砍去双手放逐到残废院里。他的恋人朱倪思赶来时，他的肺已烂透了。他死后，朱倪思也跳进忽玛河里自杀了。作为女性作家，尤其同情妇女的特殊不幸，以悲愤的笔调展现殖民地社会中妇女的非人生活。”[[83]](#footnote-83)

该文中谈到的“因为一篇文章触犯了敌人”和“砍去双手”，显然是根据《长夜萤火》中的《忽玛河之夜》版本（以下简称“1986年版”）进行论述的，因为在但娣1941年发表于《华文大阪每日》的版本（以下简称“1941年版”）中，并没有如此的描写。笔者对照1941年版与1986年版，发现两处重要的改动：

1941年版中，描写戴西遭遇一段中，原文如下：

“耀动着的夕阳的黄金已褪了颜色，全山都罩在蓝银色的雾纱中了，一只山鹰从山林里，悲啼着穿过，她用那只颤抖的手擦去嘴边和双颊上的血，然后又开始踉跄地前进了，暮色添增了她的兴奋与恐怖，因为在山边忽玛河岸的养老院中，有遭到逐放和惨运的戴西——她的爱人，在等着她。”

1986年版中，改为：

“耀动着的金黄的夕阳已褪了颜色，全山都罩在蓝银色的雾纱中了，一只山鹰从山林里悲啼着穿过，她用两只颤抖的手擦去嘴边和双颊上的血，然后又开始踉跄地前进了，暮色添增了她的兴奋与恐怖，因为在山边忽玛河岸的残废院中，有因一篇文章遭到放逐和被砍去双手的戴西——她的爱人，在等着她。”

关于夕阳的描写、“山鹰”句中的逗号、“颤抖的手”是一只还是两只、“养老院”还是 “残废院”——这些都不是重点。“遭到逐放和惨运”变成“因一篇文章遭到放逐和被砍去双手”，这一处改写才是真正的关键。

1941年版中，写到朱倪思见到戴西，并查看他的手时，原文如下：

“朱倪思去抚摸戴西的双手，然而她，她疯狂地喊叫着：“这是怎么了，这手？’”

1986年版中，改为：

“朱倪思去抚摸戴西被砍掉的双手，疯狂地喊叫着：‘这是怎么了，这手？’”

这里的改动是前述“因一篇文章遭到放逐和被砍去双手”的对应，与原文效果大相径庭。原文中的手到底“怎么了”，并没有回答，只能猜测是一种很具有视觉冲击的惨状，但这种惨状未必就一定是“砍掉的双手”。

文章的其他部分，只是少数词句略有不同和错字的勘误。这两个版本最本质的区别正是上述两处“小修改”。这两处修改，成功地将原本“悲伤的忽玛河之夜”，变为充满恐怖和迫害的“黑暗的呼玛河之夜”。

自此以后，不少研究“东北沦陷区文学”、“伪满洲国文学”的学者，在介绍但娣伪满洲国时期的创作时，论及此文，大多参照了《长夜萤火》这一“源头”。

1992年6月，冯为群、王建中等编《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王建中简介但娣的《忽玛河之夜》时，认为该文“描写一个老处女朱倪思去会见十五年前的情人——因一篇文章触犯了刑律而遭放逐和被砍掉双手，现住残废院的戴西……从表面上看，小说似乎是为他们的忠贞爱情唱赞歌，可其思想内涵却是歌颂戴西的宁死不屈，他对爱情的渴望表现了他对新生活的向往，他和朱倪思的牺牲，是对敌伪统治的一种抗争。读过这篇小说，会使我们想起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戴西不正是具有这种高尚情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吗？！”[[84]](#footnote-84) 他从《长夜萤火》中但娣的这篇文章中，读出了“宁死不屈”、“牺牲”与“抗争”。而自此之后，关于该文“思想倾向”的分析，几乎如出一辙。

1993年，马伟业在其《但娣，生之悲歌的吟唱者》中，《忽玛河之夜》的“男主人公由于从事反对政府的事业，被砍掉了双手，但他却坚强不屈，死而无憾；女主人公则以殉死来表达对情人的满腔深情，表示对摧残情人的恶势力的绝对反抗。”[[85]](#footnote-85)同样因为参照1986年版，戴西成了“从事反对政府的事业”而被“砍掉了双手”，朱倪思则有了“绝对反抗”的精神。

1995年，游友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中，论及战时东北女性文学时，曾以《忽玛河之夜》为例，书中如此简述故事梗概：“戴西因一篇文章被放逐，砍去双手……反对政治迫害的主题因为借用外国发生的故事，而逃过了细密的文网。但那暗喻现实的企图不难窥见。”[[86]](#footnote-86)他提出但娣把“时间淡化了”，使“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悲剧”，从而隐性曲折地“透露社会意识、民族情感”，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创新性。但他所谓“暗喻”而“不难窥见”的现实，也是基于“因文章被放逐”和“砍去双手”。同年7月出版的徐迺翔、黄万华著《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简述《忽玛河之夜》时，强调了其对“恶势力的反抗。”[[87]](#footnote-87)

1999年，孙中田、逢增玉、黄万华等著《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中,对《忽玛河之夜》的简述是“朱倪思在爱人被迫害至死后也投河自尽。”[[88]](#footnote-88)在该著作中，论及东北女性作家的“呼声”时写道：“面对着东洋人的趾高气扬，面对着同胞们的度日如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良知促使女性作家们在日本宪兵和特务的重重监视下，仍然勇敢地拿起笔当刀枪和敌人作斗争。但娣就是在这样险恶的处境里创作了反日小说《安荻与马华》、《忽玛河之夜》，借以控诉敌人，激发读者。为此但娣被关进了日本宪兵队的监狱。”[[89]](#footnote-89)

前文已述，但娣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941年，创作时她在日本奈良，且不说不存在“重重监视”，至少是很难证明这两篇文章是但娣两年后（1943年12月14日）第一次入狱的直接原因，那么，又何以“为此”被关进监狱？事实上，根据笔者手头但娣遗作《三入炼狱》中的描述，她是因为与进步青年接触和试图逃离伪满洲国而被捕的，其《安荻与马华》（作品集）在伪满洲国发行时,[[90]](#footnote-90) 她正在狱中——“《安荻和马华》的境遇和我一样，写它的时候，是我在爱情崩溃的时候；交涉出版时，我孤零零地旅居异乡；出版的时候，我却被关在牢里。作者丧失了自由，而作品却面世了。现在它在我身边，宛如一个孩子伴着我在牢房。”[[91]](#footnote-91)

2004年，刘爱华在其著作《孤独的舞蹈：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中，也延续了上述“反日小说”的说法。[[92]](#footnote-92)当然，也有学者发掘并参照了但娣最初的版本，如2002年12月彭放编《黑龙江文学通史》中介绍但娣的《忽玛河之夜》时,[[93]](#footnote-93) 明显参照的是1941年版，但可惜作者只作了简介，并没有探究其版本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加入，伪满洲国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渐渐形成全球学术界互相烛照的局面。因此，重印版本中的修改，也影响了国外研究者的解读。以北美为例，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历史系诺曼·史密斯在其关于伪满洲国女性文学的著作中，两处论及但娣的《忽玛河之夜》，认为该文是但娣“以一种严苛的笔调对政治迫害进行了描述”,[[94]](#footnote-94)也说明“但娣明确认识到了违反伪满洲国文学规定的严重后果”。[[95]](#footnote-95)在他另一篇论文中，也认为《呼玛河之夜》“突显了文学工作的危险性”。[[96]](#footnote-96)对于如此解读的原因，史密斯坦陈自己当时已寻获《华文大阪每日》上《忽玛河之夜》的原作，只因《长夜萤火》是简体中文版本更易于阅读而选择了使用后者。同时，他表示完全没有料到原作在再版时会被如此修改。

可见，《忽玛河之夜》的修改，使得它在1986年以后被国内外学界重新解读，而这些解读增强并放大了修改的力量，两者合力将“悲伤的忽玛河之夜”变成了“反抗的忽玛河之夜”。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次修改？这种修改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

修饰的镜像

但娣的《忽玛河之夜》，是因为1986年的修改而明显地具有了上述“不难发现”的“隐喻”，而具有了公开的“反满抗日”、“反抗殖民统治”、“反对政府”的“牺牲”与“抗争”。如今《长夜萤火》的主编梁山丁和原作者但娣都已不在人世，我们很难去探究到底这些“删改”或“修饰”来自谁之手笔——我们也不必深究于此。弄清这些“删改”或“修饰”的“原因”，远比“源头”重要得多。

伪满洲国文学是特殊时代的文学，这一时空中的作家因为这一“特殊”付出了后辈很难想象的苦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殖民伪满洲国的14年中，很多作家于夹缝中求创作的空间，他们没有选择搁笔而沉默。一些作家在伪满洲国时期取得了文学上的成就，而这些成绩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成为他们头上最容易得到的“罪证”和“枷锁”。

但娣出生于1916年8月15日，《忽玛河之夜》发表于1941年8月15日，正是她25岁生日。她也是25岁生日前，得以与梁山丁第一次见面，并通过他结识了吴瑛、吴郎等作家。她这样描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山丁是个有才华的作家，从十六岁开始写小说，写诗，写短篇、长篇，还写短评。我很敬慕他。我是个24岁的日本留学生，没有社交经验，腼腼腆腆，羞怯地望着他。”[[97]](#footnote-97)

梁山丁成为她生命中很重要的知音，不仅成为她《安荻与马华》（作品集）的推荐人，还一直将这种文学者之间的友谊持续到她生命的尽头。1987年，在梁山丁主编的《长夜萤火》出版后，但娣为感激山丁为恢复她的名誉所作的努力，在文章中称他是“把被抛弃在冰河底层的枯萎的花打捞上来”了。[[98]](#footnote-98)因为她的“名誉”，自伪满洲国覆灭后，就一直被质疑。

但娣29岁生日那天，东北光复了（1945年8月15日）。伪满洲国的崩塌让长期生活在压抑之中的作家们感到轻松，而这种轻松并没有持续很久。但娣在1945年12月1日的《东北文学》上发表了她伪满洲国时期曾被扣压的小说《血族》,[[99]](#footnote-99)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外界对她的抨击。1945年12月9日，一篇署名“要望”，题为《我读了东北文学》的文章中,[[100]](#footnote-100)作者针对但娣的《血族》，提出她是“伪满女作家”，“《血族》稿子内含有奴化的思想”两大“劣点”。但娣很快在1946年1月新年号的《东北文学》上逐条进行了回应和反驳，她认为自己是在伪满洲国进行了创作，但“因为始终不拍马，不写决战文学，许多人都冷视我，连日本人都说我不够满洲的女作家”。她认为该作者凭空给她“按上一个‘伪满女作家’类似汉奸的名词”，“完全是诬赖，而不敢承认的”。[[101]](#footnote-101)虽然同期东北文学杂文栏目除了但娣这篇评论外，还有多篇声援的文章，但这件事必然让但娣和很多曾身处伪满洲国的作家意识到，殖民地的经历可能会带给他们苦难。

当时的但娣自然无法预料到，这次事件与后来等着她的惊涛骇浪相比，只是一朵小小的涟漪。一年后（1947年），但娣第二次入狱，这次是在运动中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受尽折磨，出狱后丈夫又和她离婚。但娣的第三次牢狱之灾，是1968年1月16日，这次因为文革中被定性为“日本培养的高级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但娣成为“双料特务”而吃尽苦头，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她的经历只是众多伪满洲国作家的缩影，前文1986年《长夜萤火》中收录的女作家除了伪满洲国时期逃亡在外的萧红和白朗，梅娘、但娣等多位女作家在解放后都因为伪满洲国的创作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讽刺的是，《长夜萤火》的主编梁山丁，也在1958年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汉奸文人”而被判10年监禁，出狱后恰逢文革，又被投入劳改队，经历22年苦难生涯后，1979年6月14日，才得到“平反”。由此可见，“伪满文人”这个帽子，对于这些伪满洲国时期的作家来说，是长期套在头上，沉重而无法摆脱的枷锁。

但娣是坚强的女作家，如诺曼·史密斯在《反抗满洲国》中叙述的那样，即使最亲近的人都不理解，但娣仍不能放弃写作：“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由于政治罪名的撤销，但娣竟于1979年又重新开始写作，叙述她之前和最后的职业生涯。但娣的女儿知道后疏远了她，她很反对妈妈重新写作，因为她觉得写作带给他们的只有伤痛和不幸。”[[102]](#footnote-102)

在如此背景下，1986年梁山丁主编的《长夜萤火》中，但娣的《忽玛河之夜》被“修饰”就不难理解了：一种原因可能是1941年但娣初稿中就是如此描写的，当时因为日本文化机构的审查被删除了，1986年出版时得以重新补全；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作者或编者利用再版的机会，对原作中的“含糊面”进行重新演绎，添加少许更具有“反抗性”的文字，以“重塑”当年的政治立场。当然，从读者的角度探究，四十年代的读者具有更复杂的生活背景和阅读心态，当时他们对此文中戴西悲剧缘由的揣度和解读，与八十年代以后读者的解读本身也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也正是研究伪满洲国文学的复杂之处。无论如何，修改后的《忽玛河之夜》，其“反抗”、“揭露”、“抨击”的倾向性变得十分明显，这种改变所产生的效果，由前文众多学者因为史料匮乏、信息不畅等原因而使用了1986年版的《忽玛河之夜》后的研究结论便可得见。1941年版的《忽玛河之夜》，作者隐去了时空的概念，通过描写一个残废人和其初恋爱人的悲惨结局，来诠释她心中的爱情，同时完全可以从这种“悲惨”中，读出一些对伪满洲国殖民官方宣传的“王道乐土”的解构；而1986年“修饰”后的版本则使《忽玛河之夜》成功的从一篇隐性、曲折、暗喻的作品，变成一篇隐含具有较为明显反抗性质的作品，从而被众多学者所关注。

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发现，这种伪满洲国时期作品“修饰的镜像”并非但娣一篇小说的个例。2005年，赵月华在其《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梅娘作品修改研究》中，针对梅娘“复出后企图通过斧劈旧作实现去殖民化”的现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指出“梅娘在致力于个人历史记忆再营造的同时, 有时甚至不惜伤害文本精髓, 将作品中流露自己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曾经历的迷惑、动摇, 艰于选择的心路历程以及表现殖民历史的复杂形态等内容,统统修改、抹杀, 作了‘纯净’处理——一种去殖民化的过滤, 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103]](#footnote-103)

然而，在我们评论这些“修饰”、“过滤”的时候，也必须反思。因为1978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都是一种“抗日”和“附逆”的两元论。早在2008年，刘晓丽就对1980年代东北地区出现的一个“拨乱反正”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高潮进行过研究，[[104]](#footnote-104)举出多个文学作品版本修改的例证，并提出以下观点：

“和日本人关系较为密切的‘艺文志’同人古丁、爵青、小松等作家及他们的作品，被研究者有意地忽略。那些有明显附和倾向的作品，也包括上述被研究的作家所写的有附和意味的作品，也被抹去。仿佛在伪满洲国时期只有反抗和抗争的作家……而附和作品更没有被提及，很多老作家也对自己过去的有‘问题’的作品回避着、掩盖着。甚至没有什么‘问题’的作品，再刊出时也要把它处理成有抗争意味的作品。”

为了从生活在伪满洲国时空下的作家中区分辨别，“抨击”或“正名”，多年来作家和学者们拼命在文字中寻找线索。直至今日，很多对伪满洲国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首当其冲的仍然是在作者的经历和文字中，寻找其政治立场、思想倾向、殖民地文化等元素，仍然不是如同评价其他文学作品一般首先考量其文学艺术价值。改与不改，成为老作品得以再版时，摆在伪满洲国时期的作家们面前的，一个不得不考虑的抉择。

伪满洲国文学这种“修饰的镜像”，随着新的文学史料被不断发现，将逐渐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些不同的镜像，增加了我们从史料上客观真实研究伪满洲国文学的难度，但同时也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作家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创作经验。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版本以及导致这些不同产生的复杂原因的研究，将使对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走向立体与纵深。

但娣作品的昔与今

卢杰

“一叶扁舟，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

台风几次袭来，风风雨雨，折桅断桨；

只能使我颠簸，却不能使我沦丧。

这一曲慨而慷的悲歌，我要引吭高唱！”

此诗是但娣自传——《三入炼狱》的序言，它高度概括了但娣一生的经历和表明了她面对苦难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这首诗也适用于但娣笔下故事的各个人物，虽然这些人物的背景与经历各不相同，但是但娣要引吭高唱生活悲歌的精神贯穿其中。这种积极激昂的进取精神在当时受到大众的追捧而令但娣跻身二十世纪初东北女作家中的一员。然而，她的作品在现今却一直遭受冷遇，除了部分学者诸如文学家、历史学家及致力于但娣其人、其作品的研究者，平民百姓几乎无人知晓但娣及其作品，而且要找到但娣作品的资源也并非容易。

我有幸接触大量但娣的作品全因机缘巧合。我的导师诺曼·史密夫教授近期致力于出版一本但娣的作品集，不但收录她的文学作品诸如小说、诗歌、散文，还包括此前从未出版过的她的自传《三入炼狱》。这些作品大多来自于当时（上世纪初）的报刊杂志和但娣的手稿。在史密夫教授这项目开始之初，我是负责将这些有关但娣的在复印件上模糊不清、繁体异体字混用并且文法与现代文截然不同的文章，输入电脑并进行校对的工作。其后，史密夫教授提及若是我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对但娣及其作品的看法，将是非常有趣的。说起来这是因为自己的背景令我站在一个与史密夫教授或其它学者大相径庭的立场去审视但娣的作品。我是一个出生在九零年代，在中国南方大城市广州生长直到本科毕业，然后到加拿大攻读历史硕士学位，一直以来研究领域是博物馆而非文学的学生，这个背景使我对于女性作家以及东北那一段过去的历史没有多少学术性的认识，因而我也只是以一个普通中国青年的身份而非专业人士的立场去探讨但娣的作品及其地位。

随着但娣作品集出版工作的开展，我对于但娣其人与她的作品渐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而认识到但娣作品在当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和在今天有着截然不同的角色。包括但娣在内的二十世纪初东北女作家群在当时是相当受追捧的，这从当时作家群为首的梅娘与张爱玲合称“南玲北梅”可见一斑。然而时过境迁，当张爱玲的作品仍然是现今文艺青年必读经典，东北女作家群以及她们的作品早已被大众遗忘。以我为例，若非史密夫教授的编辑出版工作，我对于但娣及其作品真是无从知晓。若要理解为何但娣的作品在当今遭受冷遇，先要明白为何其作品在当时如此流行。

但娣的作品大多是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报纸、杂志。她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故事，主要读者群是在日本侵略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东北地区的普通百姓。从时代背景方面而言，我认为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1919年-1925年）为但娣作品的流行打下三个方面的基础。首先，国人文化思想上的解放令封建主义文学被彻底抛弃，新文学的兴起不但广泛吸收外来文化，而且令文学作品有了多样化的体裁与风格。因此，但娣含有东洋风情的、体裁多元的作品符合当时文坛的趣味。其次，白话文的兴起与盛行降低了对作家和读者文学修养的要求，通俗易懂的文章更容易为普罗大众所接受，不但知识分子而且普通百姓也成为了文学作品的读者。因而，但娣的作品有了广泛的读者群。另外，女性的解放和新女性形象的树立使女性不但有了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而且鼓励女性作为职业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但娣作为年轻的留日女作家，她的身份和作品更是符合社会大众对于新女性的幻想，从而令她的作品受到热捧。

就作品本身而言，我认为但娣的作品符合当时大众对于文学作品的需求，特别是主题上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是作品在当时流行的主要因素。虽然在但娣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尽相同，或是中国东北、日本甚至美国，但是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诸如渔民、穷学生、孤儿、乞丐、流浪汉、伤残者、卖春妇等。[[105]](#footnote-105)另外，但娣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女性，讲述她们在面对艰辛生活时仍然不屈不挠、坚强面对的故事。例如小说《砍柴妇》描写两个农妇——婆婆与媳妇带着小男孩私自砍伐松枝的片段，透过描写小男孩不断向妈妈说饿了，以及婆媳严格限制土豆吃用的情节，反映出她们生活虽然艰辛，然而她们不屈服，仍想方设法继续生活下去。然而小说通篇并无直接点明农妇生活悲惨、贫穷的字眼，反而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描写而处处营造出充满希望、乐观积极的氛围：比如“雨后的空气，鲜美得宛如苹果汁”和“午后的太阳从密林缝隙透射过来光闪，绿色的叶掌上辉动着金色小星芒。”

小说《风》是另一个贯穿但娣引吭高唱生活悲歌精神的例子。但娣以极大的篇幅刻画了孕妇在港口寻找作为渔人的丈夫的动作细节以及她在得知丈夫遇难时绝望的心理活动，配合上通过描绘自然环境来渲染极其压抑的气氛，《风》通篇充满不幸、绝望的意味。然而，我认为小说结尾极为出彩——“于是，她在战栗的激情中合上了双眼。婴儿降生了。” 这简短有力的两句可谓点睛之笔，不但一扫前文压抑绝望的氛围，而且婴儿的诞生寓意光明、希望到来的伏笔。这正正符合但娣的诗“我的歌”里所说的——“希望产生在绝望的断崖，新生产生于灭亡的悲鸣的回声里。”正如另一位东北女作家吴瑛对但娣的评价“但娣作品的内容……几乎篇篇都为哀怜与热情的情绪充满了。”[[106]](#footnote-106)我认为但娣的作品在主题上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不但是因为但娣作品中写实手法构造的故事背景、现实的人物刻画相当贴近读者群的真实生活，而且她的作品充满积极、希望的精神，激励着当时饱受压迫的东北民众。

另一方面，但娣的作品除了在故事环境构造和人物选择上贴近读者，而且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法道出了贫苦大众辛酸的故事。但娣大量重复地使用语义类似的词语，诸如“忧郁”“忧伤”“忧愁”“忧虑”“悲哀”“悲苦”“悲惨”来描绘阴沉压抑的语境，例如在《安荻和马华》中，“悲哀”一词出现多达二十次。[[107]](#footnote-107)正如刘爱华的分析，但娣这种语言词汇的运用手法使其作品不但“在一种凄凉的氛围中透出哀惋忧郁的情调，”还全面展示了“人生所能呈现的种种苦痛灾难，让人在百感交集中品味了抑郁悲苦的个中滋味。”[[108]](#footnote-108)比起鲁迅的象征暗喻、萧红的比喻或其它作家所采用的更为隐晦的艺术手法，但娣如此直白重复地揭示和渲染凄凉、哀伤的气氛也更容易为普通百姓所理解、接受。

除此之外，善于运用对自然环境的描写来营造叙事氛围也是但娣的一大特色。比如在《风》，读者能够通过天气的变幻，一步一步地感受故事中气氛渐渐紧张的变化：开篇是较为平淡的“天，恶魔似的黄，太阳发着苍白的光，”接着是“从西方涌来了黑浓的云层，烈风开始吹来了，”进而是“云疾走在黑色的巨浪的头上”和“风照旧狂暴地刮着，嘶叫着。”[[109]](#footnote-109)除了引导故事情节的发展，自然环境的描写也通过对比的表现手法运用于作品中以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以《忽玛河之夜》为例，但娣先描述周围环境的寂静“忽玛河在遥远的夜光下闪着银色的鳞波，”再说到主人公敲打着“残废院”的门和狗在门里吠着。这细致的一静一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和给读者强烈的感受。

根据以上的分析，但娣作品的确是相当贴近当时下层民众的真实生活，道出普罗大众的辛酸故事并且以不屈不挠、引吭高唱生活悲歌的精神鼓舞和激励着人们。诚然，但娣的文学成就与其作品的学术价值在当代文学、史学范畴而言，尤其是其文学作品作为原始资料供学者们进行分析、研究的学术价值不可估量。但是撇开学术不谈，我认为在现今的语境下，但娣的作品对今天的中国青年的吸引力极其有限。上文所分析的但娣作品贴近当时读者的种种优势，现在已成为被现今读者冷待的原因。鉴于但娣的作品在当时属于流行文学，下文也将其置于流行文学的范畴，以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现代中国青年，对但娣作品的感受作为例子，去探析但娣作品在当代中国备受冷遇的原因。

首先是当时与现今背景上的巨大差异，这包括时代背景和读者背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已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革命，但传入中国的外国文学和国内文坛流行的作品在数量上、种类上仍是有限。随着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愈趋发展与多元，文学上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种类、题材、流派多不胜数。中国经典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流行小说故事等等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因而侧重在民国文学这一块的读者相对减少。

读者成长背景的不同限制了现今读者对于但娣作品的理解。上文提及但娣作品吸引当时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贴近读者的真实生活，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然而，当今大部分中国青年自幼成长在和平发展、生活基本小康的环境，要深刻感受到但娣作品中那种贫困悲惨的生活并且找到共鸣绝非易事，我个人对此深有感受。不可否认，我能透过但娣的文字描述，了解当时战乱中百姓生活的艰辛，然而我毕竟成长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对于但娣的作品中所讲述的那种生活只能停留于字面上的、想象中的理解和体会，无法“感同身受”，无从在其作品中找到共鸣。另外一点是我作为南方城市里长大的青年，对于但娣大量细致描绘的自然景物如崇山峻岭、静谧森林、荒野草原等并不感受到其“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110]](#footnote-110) 归根究底，我认为还是因为成长背景的巨大差异，令以我为例的部分中国青年对于理解但娣的作品有着诸多的局限性。

再者，文学趣味的改变令但娣作品不再符合现今读者的需求。我认为当今相当一部分青年读者，包括我在内，对于主题轻松积极、故事脉络完整、语言精采美妙的文学作品更为喜爱与接受。然而，但娣作品则不太符合现今青年读者的这三个要求。第一，在现今生活节奏快速的社会，读者在闲暇时光里大多希望暂时逃离高压忙碌的日常生活，以阅读文学作品作为放松身心的休闲活动。因此现在的青年读者更偏好主题轻松的作品而非题材严肃、令人感到悲惨的作品。然而，正如上文所分析，但娣作品大多是以写实手法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民众生活苦况，其题材、内容均是相当沉重压抑的。

第二，也是因为生活节奏快速，现今的读者缺少时间与精力去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文学作品，因此“流行文化快餐”式的即不需要过于仔细推敲就能明白作者意图的文学作品则受到更多青年读者的欢迎。相反，由于当时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况下，但娣作品多数只能撷取当时生活当中的单个片段或情节，隐晦地提及作者的意图而非一个个完整易懂的故事。因而但娣作品在故事脉络上的不完整，容易使今天的青年读者感到作品结构支离破碎和中心思想不明确，进而无法了解作者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深刻寓意。再加上但娣作品中有大量对自然环境、人物动作和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这也容易令当今的读者感到作品节奏缓慢。

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今的青年读者的文学水平比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读者有着极大的提高，因而对于文学作品的行文措辞和表现手法有更高的要求。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教育水平与环境，大量运用语义重复的词汇、较为缺少艺术手法的但娣作品，自然无法与或为辞藻华丽或为格调高雅等等的当代文学作品相提并论。以上三个方面均说明了令但娣作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艺术特色，也正是令但娣作品在今天备受冷遇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读者背景的不同和文学趣味的不同，是但娣作品在今天不如在当时流行的两个主要原因。然而但娣的作品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学术价值，贯穿作品的引吭高唱生活悲歌的精神，更是值得现在的青年读者去感受和学习。我深信只要找到连接但娣作品与现今青年生活的桥梁，便能引起更多青年读者的阅读兴趣，在欣赏但娣作品的同时受到其精神的鼓舞。我始终认为，但娣作品在今天不仅要作为文学资料供研究，更应发挥它们最初的功能——作为文学作品鼓舞和激励读者，让引吭高唱生活悲歌的积极精神在社会延续。

**当代评论**

开明图书公司新刊

开明图书公司新刊如下

安荻和马华 但娣著

作者但娣，大概不用介绍，读者也一定要觉得很熟悉的，她的作品早已散见于各文艺刊物上，读过她的作品的人，我想一定能体会出但娣小姐的写作技巧，确有惊人的地方！ 定价一·五〇

1943（麒麟 康德十年九月号）

“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

吴瑛

…

三

与《第二代》[1939] 作品的同时，在海外却有着与梅娘文学气质相近的但娣出现了。梅娘的出走和但娣的归来，恰成相等的对照。继梅娘之后，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信念坚持者之但娣的出现，真有使自由主义的文学中泛滥于满洲女性文学中的欢欣之感了!

由于《安荻和马华》[[111]](#footnote-111)在“华每”的发表，而获得海内文坛高评便崛起了的但娣，实为一讴吟着浪漫与自由主义的女作家，不只于小说，她还能以着热情与哀怜的情绪，写出极美极动人的散文和诗歌来。

我们从《安荻和马华》的内容，来检讨但娣作品的内容，无论诗、散文或者是小说，几乎篇篇都为哀怜与热情的情绪充满了，在这里试找出几个例子来。

《售血者》的开始，但由作者唱出自己的悲哀，曾用悲哀和寂寞反复的歌咏着黄昏和旅人。她说: “悲哀的黄昏! 寂寞的黄昏! 悲哀的旅人! 寂寞的旅人!” 是这样反复着唱出泪来的黄昏。在《安荻和马华》的小说中，也同样于阴淡的笔路中结束了这主人公的性命。在《忽玛河之夜》中更歌吟着残废人的灭亡的命运。

总之，对于但娣的文学观，从其作品来透视，世纪末的痼疾之意味，却含有在自由主义文学的视野之中了。

但娣从文自《安荻和马华》发表后，作为异常突起的出现，以后便走入自由主义的文学倾向中去了。譬如她那惟一的中篇《安荻和马华》，虽说是充满了锋芒灿烂的力量，但在偏向于为人生的意味之中，往往抛弃了一种理想，其中却用世纪末忧伤的痼疾来掺混在内，显然的，那是用着哀怜骨骼来撮成的创作。

用同样的眼光来展望但娣的散文和诗歌，那么无疑义其散文和诗歌也是陷入同一的创作之泥潭里。譬如在《安荻和马华》中的散文之部里，一共包含了九篇小品，这九篇小品之中，如《望乡》、《天涯寂寞》、《樱花的季节》、《雨地》、《异国》、《湘峨》、《徵吟》、《足音》、《骆驼吟》，几乎每一章里的吟风都流露出女人能有的哀怜人生与对人生热望的怀抱。

《望乡》中强调了 “家山呀!北望” 的乡愁，更用落雪了惨淡的背影来陪衬着寂寞的爱情。《天涯寂寞》里写着一个少女的情绪，用轻烟送走了孤独的天涯寂寞的夜。《湘峨》是纪念一位结识未几而迢遥远离友人的描写，由于梦幻的感到时光和人生的尘土，而朦胧了一切轮廓的意境。至于《角涯》和《足音》二篇，是她摘录自其手记的零乱的语录，从这些点滴的琐记中，我们窥及了作者对于生的怀抱，与其说是散漫的倒勿宁认为是孤寂的。这自由主义的女作者，最大的进境，我想倘如不能改换她内心悒悒，该会使其作品持续着痼疾的气氛了。

在这一点上，梅娘与但娣虽说是同一的理路，但收获上却不相同了。所以但娣只限于其内心的悒忧不全部的净灭，她的暴乱和阶级是不会到来的。

如斯，但娣代表了一部分现代知识青年的痼疾之呼吁。

…

(原载《青年文化》，1944年5月)

“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

韦长明 (李正中)

…

《安荻和马华》是但娣的创作集。我们最初注意到这个作者的时候，是当她在《华文每日》发表了《风》和《砍柴妇》。由于这两篇短小的文字，我们已深深地窥知了作者的极坚实的文学素养。其后，在一次征文的机会里，我们复读到了中篇的《安荻和马华》。

但娣回到东北来之后，把她的几年来的作品集付印了。这便是《安荻和马华》，我们试就《安荻和马华》来检讨作品的内容，实不难看出作者是如何的标榜于自由主义的文学信念而出发了的，无论是小说、散文或诗，到处飘扬着自由主义的气息，几乎完全控制于作者的热情与哀怜，而把整个文章的格调给渗透了。

《安荻和马华》里边收容了几篇很可观的小说，如《售血者》、《忽玛河之夜》和《安荻和马华》。《售血者》里边写出了生活的重压和爱的殉难。《忽玛河之夜》是歌吟着残废人的熄灭了的生命及悠久的爱情。《安荻和马华》是写着大时代下两个微弱的生命的结合及其破灭。作者的忧伤的气氛是相当浓厚的，她往往并不直面于那些由故事中产生出的问题，而只是给予了夸张的陈述和哀怜的歌吟。这一点，在时代的文学课题之下，作者的作品是免不了为时间所淘汰的。

同样，作者的散文和诗，也依旧是陷于同一的轨迹里。譬如在《望乡》、《天涯寂寞》、《樱花的季节》、《两地》、《异国》、《湘莪》、《徵吟》、《跫音》、《骆驼吟》这些篇散文之中, 几乎都在流溢着充满热情的对人生的渴想和对人生的迷惑。孤寂的、愁苦的生涯，假如今后若不能为作者打开的话，那又怎么能写出感动千万人心灵的伟大作品呢?

…

\*本文发表时署名林里。

(原载《东北文学》第一卷第四期，1946年3月)

**小说**

风

——献给我的母亲

一

她要临产了。她沉重地从井中汲出冰冷的清水，提到她的没有太阳的渔人小屋里去。她慌忙而且也兴奋了。然而她没有一点快活，因为她意识到生活……。她叹了一口气，又提起筐篮，到马路上拾马粪去了。低弯着身腰，十分吃力地走着。她的多骨的脸显得异常疲倦。赤裸着的双足，踏在一条敷着沙和贝壳的马路上，她感到一些凉意。

天——恶魔似的黄，太阳发着苍白的光。一切都象死一般的静止不动。

筐篮里已经装了一半马粪，她抬起她的头来:

“呵! 要变天!” 于是，她不安地走回了家。

二

吃晚饭的时候，果然，从西方涌来了黑浓的云层，烈风开始吹来了。松林里来了骚动和喧哗。

她决意到港口，去看她的丈夫。她出了破落的渔人小屋，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径走向海滨。

暴风雨迫近了。

海上已经有阴森的峰峦似的巨浪在击冲着。不时掠过鸣啸的海鸥。

许多渔船都忙着，加速度的拢近沙岸。渔人们没有规律的吵着，骂着，在沙岸上跑窜着。他们的声音已经变成十分低哑。

她穿着一件破绽的青色袍子，气喘地走进沙岸。不住地嗫嚅着什么，深陷的眼睛里放出不宁的闪光，来在人群中找寻她的丈夫。

三

太阳消失了。海啸着，震响着。云疾走在黑色的巨浪的头上。她在沙滨上慌乱了脚步。

浪象一面黑墙，愤怒地威吓地卷来，吞没了沙岸的海藻和鱼骨，连击在黑色的岩石上而粉碎了。

她往后退着，浪水浸湿了她的脚踝和衣襟。

“你们看见我的丈夫吗?” 她到处询问着，她望着那激怒的海，她的心痛苦地悸动着。

不久，远方又有船舶摇来，于是，她高高地摆动她的手。

船近了，她认出那是水上警察放去的救生船，救生船摆上沙岸，人们嘈杂地跪下来。她靠近去，心跳地注视着。人们都走完了，她仍然看不见她的丈夫。

她束手无策，从人群中穿来穿去，悲痛地喊着她丈夫的名字。泪就流动在灰的枯瘦的双颊上。

四

海的骚搅更大了。有如一匹地色饥饿的狼，疯狂地咆啸着，继续地有船舶拢上岸。

继续的有悲惨的消息传来。

“淹死了……!” 但是找不到尸体。大家集成一团议论着，大家恐惧之下匍匐着，脸都变成灰白的了。

“你们看见我的丈夫没有?” 她推开了一个老人，闯进人群中。大家仍然只有向她摇头。

她晕倒了。

一个渔人把她抬进附近的板舍。

“不要紧，不要紧!"

“拿凉水来……”

一个温和良善的渔人，弄些凉水在她苍白的前额上拍打着。

不久，她惊醒了。她确信她的丈夫死了。

“天呵! ……你劳苦了一辈子……。” 她沉痛地哭泣着。

渔人燃起了微弱的淡的油灯，看守着她，暗淡的人影，在周围晃着。

“别哭了，什么都是天给的。” 大家劝慰她。

她依然哭着。一些渔人也哭了。

渐渐她的哭泣变成呻吟了。忽然她从干草堆上挣扎着站起来。

“躲开，叫我回去。” 她弯着腰走出低矮的板舍。

五

风照旧狂暴地颳着，嘶叫着

夜空，被狂暴的风，裹成荒凉的了。

她用干枯的手捺着腰，痛苦地跋涉在暗黑的咸味的湿漉的沙路上。她感到腹部异常的痛楚……

“叫我死去吧! 永福 （她丈夫的名字，）呵! 把我也带去吧!"

她仿佛一条病老的狗，无力地爬着。

终于，爬到了她的家。她推开紧闭的门扉，颓萎地踅进雇去。

猫叫着，在地下跳过去了。

在没有灯光的小屋里，她慌乱地从锅内舀来一盆温水。

于是，她在战栗的激情中合上了双眼。

婴儿降生了。

奈良油留木町一九四〇， 一月尾

砍柴妇

暴雨过去了，海青色的碧空上，走动着轻缓的白云，象梦幻似的消失在天际里。山肤披蒙上一层新鲜而浓郁的色调。

一个年轻的少妇，从山洞伸出瘦长的头颈来，用一只手掌向外试探了一下又缩回去。

“娘，不下了。” 她向她的婆母说，立刻背起小带弟，同她的弯着身腰的婆母走出挂满藤须的湿潮的洞窟——她们的避雨所。

山坡上繁茂地长着赤松、榉、杉，间杂些低矮的灌木丛。在它们底下铺漫着长叶苇。

雨后的空气，鲜美得宛如苹果汁。

少妇把砍落的松枝摇动了几下，从它上面湿漉漉的滴落下来，残存在枝叶上的雨水。脱下自己的衣衫铺在枝条上面。

“妈的宝呀! 好好坐着。” 少妇和孩子做个鬼脸，便偷着把带来的食粮藏在衣衫底下了。随便紧了一下头巾，走开去。

婆婆和她站在反对方向，已经殷勤地开始砍伐了。

少妇也烦忙敏捷地挥动起光闪闪的镰刀。松枝从苍老的干上滚落下来， congcong从级着别的枝条，发出些声音。

“妈! 我饿。”

“饿，等一会。”

婆婆用枯瘦粗糙的老手捆好一大捆松枝。表面谨慎地遮蔽一层芦苇和草叶。

“妈我想吃一个土豆。”

“……”

“妈! 行不? 我要吃一个土豆?”

“为什那么馋?” 少妇温柔地申斥着孩子。

“肚子饿的响啦! “

“……”

“呵! 妈! 土豆。”

“不许再说话啦，想看林子的人来! “

少妇把自己砍下来的枝条也和婆婆一样捆好, 又遮好了草叶。——这样做，可以隐蔽一些。因为这里是禁伐的私有的山 。

五月的风，吹到山崖上丛林来。沙沙响着。象私语也象蹑行的足音。

“娘! 妳听见什么动静没有?” 少妇显得十分恐怖，不安。悚立不动，如一座石像。

婆婆战抖地把镰刀藏在腰间。她的老胸脯突突地跳动不止。

于是，她们彼此象可怜的小松鼠一样，伏倒在松枝下面不敢出一口气。小带弟也习惯了，和往回一样学着祖母和母亲的动作，卧倒不响。

好久，她们这样不敢动。

风从山上又溜到山谷里去，林里稍许静些。少妇胆怯地站起。在她那水晶般眼睛中闪动看过去的惊慌，向四围巡视了一周。

“娘! 许没有人!？”

小带弟也拾起头来。她比谁都害怕。因为她还记得守林人的那副堆满胡须和阴气的脸像，她想起那次追打她母亲的样予，她就吓得要哭似的。

少妇背起捆好的柴捆。她要把它送下山去。

“小带弟别闹你奶奶，等着妈去给你取土豆。”妈骗着。

“不，我不，我就要吃——” 小带弟哼哼唧唧地哭了。

少妇没时间去安抚她的孩子。背上的重负使她佝偻得十分难看。手里拿着舍不得穿的布鞋，让肉脚底板，踏在坚硬的石灰岩的山路上。

午后的太阳从密林缝隙透射过来光闪，绿色的叶掌上辉动着金色小星芒。风曳动叶子，那些金色的小星芒又被晃碎了。

少妇由山下转回来，她已疲乏不堪。喘坐在山坡上。

婆婆从衣襟下偷着拿给儿媳两个土豆。“去到那边吃吧，一会孩子看见又该要了。”

土豆——煮熟的马铃薯，这是她们的常用食。

“娘，吃了吗?”

“我和小带弟都吃了。”

“妈，我还要!” 小带弟听见了她们的对话。

“要什么?” 婆婆严厉的问。

“土豆。”

少妇微笑地分给小带弟一个，自己贪婪地把余下的一个吞食了。

“小孩子惯着她做什么! 我真没看见现在的年轻人。” 婆婆生气地叨咕着又去工作。

少妇忍着不满足的肚子，举起镰刀，手已疲倦无力，她的动作缓慢而迟钝。

“妈! 我还要!”

“没啦，要，等回家去再吃。”

“妈!什么时候回去? 我要回去!”

“不许再说话了，想看林子的听见。”

小带弟不出声了。

婆婆和少妇不停歇地砍伐着，松枝不断地折落下来。

“妈! 回不回家呀?” 小带弟坐得焦急了。

山风送来一阵人语声，山上现出一对年轻年青的情人。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他们象一对自由的山鸟，银铃似的歌声响彻林中美丽的杜鹃花，映红了山坡路。

“来呀! 花开满了!” 年青的姑娘旋风舞般轻快地溜下山腰，采满了一裙子淡红色的花朵。

穿制服的年轻的大学生又一下子坐在小带弟的身旁。

“小孩几岁了?”

“快说几岁了。” 少妇转过头来吩咐着孩子，在她脸上闪出几许艳羡的笑意。

大学生，从背囊里掏出一个橙子，送给小带弟。

小带弟摇着头，瞧着母亲。

老婆婆被生活弄僵硬了。对什么也不感觉刺激。老是一样阴郁，不愿意说话。少妇慌惑地命令小带弟:

“谢谢呀! 鞠躬! 先生是下山的吗?”

不久，一对情人走掉了，唱着：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歌声落到山坳去，低沉……消失。

少妇怅惘地望着远方，想起自己死去的丈夫……。

“妈! 剥不开!” 小带弟喊。

“给你奶奶，和奶奶一块吃。叫奶奶给你剥!” 她的心难过而且烦闷。

婆婆正在修理着砍掉下来的刀柄，默默地。

“妈! 掉啦! 掉山底下去啦!那果……。” 小带弟不禁倾出身子去捉。

少妇回过头来，看见小带弟迅速地滚落下去了，山坡是峻斜的。

母亲战栗了，慌忙地跑向密林中。枝桠和岩石的尖角划破她的腿部和脚部。

婆婆也追在后面。

孩子滚落下树丛去，看不见影子。

少妇顺着哭声跑去，然而哭声也渐渐听不见了。

“小带弟呀! 小带弟!” 她的心宛如坠入死的深渊。在山林中狂喊着，象一匹疯了的狮子。喊声凄绝的震荡着崖谷。

在湿漉漉的低洼的谷底，她看见小带弟的身子横躺在一条荒芜的小径上。

少妇伏下身去。将脸贴在小带弟的血淋淋的脸上。然后用手摸了摸小带弟的胸口。

婆婆赶来了， 婆婆也用手摸了一下小带弟的胸口，忙乱地从小溪里捧些水来拍在小带弟的额上。

“小带弟! 小带弟!” 婆婆喊着。

小带弟!”

“小带弟!” 她们齐声狂喊着。

不久，小带弟睁开了眼睛看看母亲。

“妈! ……” 小带弟无力说出更多的话。

婆婆重重地叹一口气说:

“丧日子，去年也正是这时候她爸爸死的!”

少妇把小带弟抱在胸前。

“小带弟! 你明白了吗? 妈来了!” 少妇的脸上流着泪水。

“妈! 我要那果……” 小带弟努力摇动着她的右臂，然而臂膀不能动转，她痉挛地哭起来了。

少妇觉到小带弟的右臂摔错了骨节。

溪流哗哗地穿过谷底，林间， 清而？。 底部铺着碎细的石子。两边披着苍老的青苔和大巴掌似的羊齿草。水边正横走着一个孤独的小蟹。四周漾浮着一股浓重的潮湿和朽木的气味。

少妇伤心地向婆婆说:

“娘! 我把小带弟先抱回去。娘，你再上山去把那没捆的树枝子，用草堆上吧! 明天我们再来背!”

傍晚了。山中罩来朦胧的黄昏。

婆婆望着儿媳的背影消失在夕雾里，自己抹一下眼睛又悄然转向山中。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京都大文宇山

安荻和马华

一

八月尾，太阳西沉了。

汽笛的悲鸣凄绝地震荡在光华的海原上，一只大汽船出航了。

不久，那西方天空的淡红色已变成苍白。遥远的岛屿蒙在雾霭中，宛如海豚之群，静静地睡在海面上一动不动。

夜来的满潮的海水，开始冲击着港岸的石礁, 激起水沫，飞散开。港上的杂音慢慢地静下来了。

码头夫们，围坐在给海水渗透的沙滨上，燃起一点野火在火焰的光闪中，他们晃动着强壮、宽大、赤露的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脊背。

“喂! 小伙子，来一个!”

马华便在腰间摸索出一只口琴来。海风吹动他披散在光赤的顶上的乌黑的卷发，仿佛一位快活美丽的女郎，暗蓝色的眼睛和温柔的脸相——一个典型的混血儿的脸相，在光焰中闪动着。

口琴响起来，低沉的乐曲传进潮湿盐味的夜风中。

“够了! 够了! 我受不了呵!"

将身子躺在沙上的一个有着刺猬似的黄头发的矮个子，急促地说。

“别听他的，那小子没正形!” 大家吵嚷地反对。

马华喘了一口气，他又从低音吹到高音去。

飞翔在四周的乐音，忽而象一阵暴风雨般急剧地震响，忽而又变成哀怨低泣一般的轻微。

码头夫们，仿佛在倾听着自己的命运一样，他们不住地叹息着。

突然琴声止住了。马华站起来，向着伙伴们摇手。

“明天见!”

“明天见!” 码头夫们，怅惘着，无意识地喊着。

马华迎着夜风，踏着给海水浸透的沙岸，朗朗地走开了。他吹着出色的口哨。从一带低洼的玉蜀黍田走过，又踏进松软的沙谷。

上弦月，照着北海岸的沙丘。银灰色的波光中，静卧着零散的贫穷的渔人小屋。

小屋里，悄悄走出一个赤脚的姑娘——美丽、温柔刚健的安荻。她向四周寻觅地闪动着乌黑的眼睛。因为她听见马华，的口哨了，她跷着赤裸的脚儿前进着。发辫垂在肩的下边。衣服已经十分破乱了。

“安荻! 我在这里。” 马华从沙谷中跑来。

“别做声。爷病的厉害了。” 她焦急地说。

他们静默地偷儿似地溜下沙谷，并排地坐在松软的沙上。

“我寻思你不能来了。”

马华从裤袋中，掏出几块花纸包的糖果，送进安荻的手中，于是温柔地说:

“为什么不来呢!"

“以后别再来了。”

“什么意思呢?"

“爷说你的母亲是波兰人，你也是波兰人。” 她忧愁地说。

“你也讨厌波兰人？”

“不， 爷说波兰人是白人， 白人看不起黄人的。”

“没有那事，而且我也不是白人。我父亲是黄人，我就是黄人。”马华显得十分悲哀。

“爷还说你爸爸是回教人，回教人尽杀牛，没有好东西，是吗?"

安荻边用衣襟擦着颊上的汗珠，她感到无限得悲哀，边握紧了马华的手。接着她说:

“你回去吧! 爷知道了会骂我!” 于是他们在沙谷中悲哀地走开了。

夜风吹动着破乱歪斜的窗子，哗朗朗地响着。安荻推开歪斜的门扉，走进去，屋中没有燃着的灯火，从破碎的纸窗，透进来微弱暗淡的月光。

老人颤栗地摇晃着头仿佛是一枝凋残的芦苇，在一个凋落季节中给骤雨击打得痉挛了一样，沉痛地滚在干草堆的一角，不住地贼叫着:

“天爷呀! 疼呵! 疼死啦!"

老人在壮年时代，遥远地离开了故乡，投向这海岸。二十年来，家人的死亡、疾病，悲哀，劳苦，将他变成阴暗、忧郁而陷入死亡的危惧了。他已为生活给打败，每天只zhi能痛苦转在干草堆上。

“爷! 你要点热盐吗?"

老人抬起头来。用那久病无光的眼睛望了一下安荻，然后又抱着头颅喊起来:

“天爷呀! 叫我死去吧!"

安荻摸索着，握住一个铁罐，里面放着白良的海盐。她用手摄出那结晶的盐粒，放进一个小铁锅中，然后在灶下燃起干木枝。

她把盐煎成红黑色，装进一个长形的布袋，小心翼翼地放在老人的头下。

“热不，爷热不?"

老人晃动着头。安荻坐在老人身旁，听着他悲哀的呻吟，便慌乱无依的哭泣了，她想；爷也许要死去了吧……她感到恐怖。

老人仿佛安静了些，沉重地转侧一下枯瘦的身子，用低沉的哑声说:

“这罪是受不完的，安荻你去睡吧!"

老人重又转动了一下，他疲倦地合上双眼，安荻也睡去了。

马华孤独沉默地走着。夜已深了，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足音。他的心情异常的零乱。他想起母亲的死，一九二〇年病疫的惨绝景象……。逝去的童年——在黄昏的树下，常和母亲学唱歌和读书的童年。他也想起父亲，远行了的父亲。他年青，他有丰富的感情，他仿佛受到了什么打击似地凝视着前方。他想: “怨谁呢?” 他解答不出。

不久，他从寂寞的沙丘中，消失了。

二

黎明，安荻从干草堆中爬起来，走出小屋，到牛栏去。自从爷爷病了，他们便买来一隻黄色牝牛，安荻每天送牛乳到城里去。

牝牛听到小主人的足音，用它那圆的黑亮的眼睛善良地注视着，然后沉重地用鼻腔哼出了声音。

安荻把一捆草料扔进栏中，她站在木栏上，用一只手拍着牛背喊道:

“去，嘶! 去，笨东西，去吃草，嘶! 嘶!"

她又忙着烧饭，洗玻璃瓶。

忙着背起乳瓶袋，从渔人小屋走开了。

朝阳照在沙谷中，软松的沙粒，在她赤脚下遗留成蛇一般的迹痕。

走过沙丘，踏进草原，一群水鸟从那枯萎凋落的苇草中拍着翅膀，飞向南方去了。凄凉的啼声，掠过一带幽寂荒凉的草原。

从城市那边，遥远地可听见叫卖声，机械的轰动声，许多杂音，混沌在一起的喧嚣。

市街上的无线电响着美丽的早晨的轻音乐。在安荻的胸中激起轻妙的爱的快感。她转进一条横巷，挨家去送乳瓶。

当她又叩一家白色的窄的门扉时，那里面没有回声。

“开门呀! 送奶子的。” “开门呀! 李先生。” 她轻轻地敲着。

许久，从邻近走出一个怀孕的女人，凸起着肚子，穿一条不适合的棉套裤，她瞧了瞧安荻不耐烦地说:

“搬了!”

“搬到那去了呢?”

“不知道!"

“什么时候搬的?"

“不知道!” 说完那女人就走进去了。

安荻慌乱地从衣袋中掏出一个册子，上面横竖地画着一些阿拉伯的字码。她计算着，喃喃地咒着:

“两个月，一天一毛二，……六，七元钱。”

她忧伤地走开，转进别一家。

傍晚，她提着洋铁桶，懊丧地走到牛栏中。那只黄牛，本能地摇晃起来笨重的尾巴。安荻把铁桶放在牛腹下面，蹲下膝头，开始工作了。乳牛用它的痴滞的善良的眼睛凝视着前方, 忍耐地站着，不时跷动着一只沉重的后脚。

“嘘! 嘶! 老实点!"

月从海面上升起，在重云之间透出了暗淡的幽昏的光。

安荻挤完一天最末次的牛乳提着铁桶走进低矮的小屋。祖父已昏沉地睡了。

她走到歪斜的嵌在那纸窗上面的一块小玻璃旁边，眺望外面的夜。

一切都寂静下来，乌云急剧地飞跑着，不时从重云中露出金黄的月光，不时又消灭在云后了。

遥远的天边，有灯火闪动着。从沙丘那边传来了海浪的汹涌的潮音。

她是在等待着马华。她聆听着，每一个响动都会使她惊讶地向四方寻觅，当她确知了那不过是一些夜鸟的拍翅声，或别的声音时，她伸出她的手指揉擦她的湿润的眼睛。

马华因着安荻说的话，他痛苦了一天一夜，他没有出去做工，然而当他冷静些他又想到了生活。

他走向海岸去，海朦胧在朝雾里。伫立在港口，深深呼吸了一口早晨的空气。

海上，一个渔夫正支着一艘小舟撑渡，小舟象玩具一样。有着圆形的席篷。阳光照着它，它的身影，给海上投下抑郁的调子。

海岸街上，楼房，铁桥，雕刻的铜像，耸高的纪念塔在晨光里耀动着金色的温暖，它们脚下，已有车马来往了。

马华叹息似地嘘了一声口哨，去看拥挤在小舢板上吃早饭的码头夫们。

“马华这小伙子倒无忧无虑呵!” 一个满堆着胡须的红脸的中年码头夫，他常有着这样羡慕马华独自的轻闲的口吻。

战争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恶化，人们都准备逃难了。

海十分平静，没有一点风，海水象镜面上浮泛着一些碎屑。远处的岛屿流泻着浓蓝的色调。

来往航行的汽船、小艇，交替地响着凄绝的笛叫，震破了海面的静寂。

某隻船准备出帆了。船上堆满行李和货箱。船舱中挤满了人群，喧嚣地吵叫着。

马华，他肩着船客的箱箧，缓慢地走在吊桥上，汗流过他赤裸的脖颈。他不住地想着安荻，担心和记挂使他内心慌乱了。

上午十时三十分，铜锣在响着，船要开行了。于是甲板上集聚了许多人。马华失神从吊桥上，把皮箱掉落下去。海水上击起来漪涟的光圈，然后皮箱不见了。

大家拥挤到一处，喊着吵着，不知是在替哪一方倾吐不平。

一个贵妇人尖叫着。

穿白制服的船警走来，恭谨地向那位贵妇人说:

“对不起! 这东西，一会来人能捞出来。”

贵妇人，吵嚷着:

“这还了得吗! 里面有地照和手饰。”

白衣船警安慰地说:

“不要紧!只要不被水冲走，很容易找到。太太贵姓? 最好明天的船走吧!"

他从制服里取出一个小册子，记明了损失的物件，然后向马华说:

“这他妈的两合水，你住在什么地方?"

马华紧握了一下拳头，他气愤地想打，然而他却说:

“娥家胡同门牌三百二十一号。”

“叫什么名字?"

“马华!”

“不能放走他，我的东西少一件也不能饶他。” 贵妇人象一隻饿鹰似地吵着叫着。

马华用他深蓝的眼睛望了她一下，他心里想: “这女人活象一个母夜叉。”

“太太放心，他跑不了。” 船警说。

马华懊恼地停立在铁桥下面，凝视着海。皮箱飘走了，终于不会捞出。

傍晚时候，他被判决了。他被罚去了全部的财产，补偿贵妇人的皮箱。他的胸中烈火般燃烧。他痛楚地徘徊在港岸上。

悲哀的雁群落在沙岸上，透过八月尾的薄明，感伤地啼着。

海风将他的发丝遮住了他的前额。他忧伤的脸相，宛如秋天凋落的黄叶。他的泪流下了。他离开港口，沿着海岸走去，愁苦使他闭紧了双唇。他无依地走到安荻的家门，门扉已闭，渔民们全已睡去。在沙丘中已没有灯光闪动。

他在安荻的门前徘徊，又悄悄地走开，回到自己的家中。

他痛苦地唱着悲壮的歌，然后用一点酒把自己喝醉了。

三

凋落的九月，落着骤雨。

战争十分紧急。大炮轰响在城外。飞机从早晨就鹰样地盘旋在北兵营的上方。炸弹不时落下。轰翻了近处的田野。

XX港已封锁，没有船隻通行。

马华便从那港口走开，他是想到别处去寻一些工作。已经没有一点吃的了。在一条破落的街上他狼狈地走着，街上没有行人，一切都抖索在黑暗和恐怖中。他饿着肚子，像山雉一样的濡湿。

佇立在暗澹阴惨的灯光下，伸长着脖颈，从玻璃窗望进去。那是一个酒店，因为在异常的警戒中，半开着窗扉，而且那里面也没有什么，只放着几块干面包和几条陈旧的炸鱼。

浓黑色的天空，没有一颗星光。猛烈的狂风在吹着。他愚痴地掏了一下自己的衣袋, 然而那里除了粉碎的尘屑而外再没有别的。于是他想: 怎样敲开玻璃，怎样偷出那里的面包，怎样的吃掉。他又意识到犯罪，恐怖罩在他的脸上，他看着自己，缩回的战栗了。

他转向一面生长着青苔的古壁。在不远的地方移动着苍白的物象，使他异常惊疑。他想会遇到什么妖怪吗? 好奇心，使他走过去。原来是一个孤独的女人，靠着墙眺望阴沉的天宇。她的脸，在夜灯下，苍白而且枯瘦，不一会她那憔悴的眼光移落在马华的身上，她说:

“雨不会住了。”

马华想: 她一定是在卑屈悲苦中，板着脸 面挣扎的落难者。

“唔!'

马华惶惑地应了一声，便走掉了。沉滞的步子，响在马华的后面，他的胸脯跳动了，一种难忍的不安袭击着他。

“先生! 我饿一天了。你有什么吃的吗?"

马华寒战地急行着。

“先生! 我不是说谎的，家里有三个孩子，饿得直哭喊……我们一天没吃到一点东西。” 女人追上了他。

马华站住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全都是一样。” 他低垂着头，远离她。

马华饿着肚子回去。投进他自己快坍塌的小屋。

细雨潇潇地敲在埋满落叶的窗边。在黑暗中，他摸索着自已壮大的身边，空的肚腹，寒战地蜷卧在炕上，听风从松林间掠过。

次日，他无力地走向港口，在那里，一群劳动者找不到什么工作。手背在身后，来往地闲荡着。饥黄的颜面，枯瘦的骨骼，眼睛深陷着闪出无智沉滞的光，忧心痴呆地相望。

“这他妈小子! 也没找着活计吗?” 老李的老婆总是疯子一样，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骂三骂四地鬼混在男人群中。

马华讨厌这女人，因此他很快地走开了。这之间，飞机翻着翅子在前方盘旋，投下几枚炸弹，大家窮迫地爬向海岸中去。炸弹轰响了，爆裂了，烟火漫遮着前面的村落。

大家，许多时候，匍匐在沙滨上：象傻子一样，呆望着，后来大家惊慌地四散了。

马华带着饥饿与恐怖走向安荻的家。

安荻正站在沙丘的顶尖眺望，风吹着她的衣衫。她象遭遇过什么不幸一样，脸色苍白而且憔悴。

“看什么呢?"

“你到那里去了? 我在望你。” 安荻用忧愁惊喜的眼睛看着他。

他们踏着柔软的沙粒，走向深谷。坐在一座沙丘的后面。

“怎么想起又来了呢?” 安荻悲哀委屈地诉说着。

“哼!……”马华低下头去，他心中难过，他想把他不幸的遭遇完全说出来，但他却问:

“有没有吃的?” 他觉得虚弱极了。

安荻急忙跑回家，替他拿来干杂米面饼，和一条小咸鱼。

“这你爱吃吗?"

“爱吃，什么都好……” 马华从沙床上坐起来，开始贪婪地吞食。

“人家都说仗快打到这里来了，城里的人都快逃空了。我想你也许逃走了。我想我们不能再见了。”

马华握紧安荻的手，他感到了离别的悲哀。许久，他说:

“你爷的病怎样?”

“好点，可是我爷说他那病不会好了……爷死了我可怎么好!”

安荻孤独而又无依地说。

“安荻!” 马华的脸色格外苍白。

“哥! 什么事? 你说呀!”

安荻看见马华从眼中淌下眼泪她焦急地问:

“说呀! 呵! 好华哥! 你哭什么?” 她自己也哭了。

“这是不可能的，说又有什么用呢!”马华自语着。

安荻明白了，因此她更觉得难过了。她想找一些安慰他的话，但她只能哀痛地哭倒在他的怀中。

“别哭! 想人听见。慢慢想法子， 呵！ 别哭！”

“呵！ 一会就好了。”

许久她抬起头来说:

“我该回去了! 想爷惦记。”

九月末的田野、村落……和城市，到处都有大炮轰响。烟火残酷地燃起，兵营炸翻了。

夜黑下来的时候，安荻在沙丘上张望马华，在远处她看到两个人，弯着腰跑来了。她慌乱地奔回屋去。

安荻的爷爷病重了, 他半呻吟半惊慌地问:

“安荻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枪声! 爷! 跑来了两个人，好象还拿着枪……”

“那是逃兵吧! 你赶快藏起来。”

“藏到哪呀?"

安荻害怕着逃兵的凶暴，将自己的身子埋在一个角落的干草堆中了。

“爷爷! 看见看不见?"

“脚，脚在外边，……再往里，……再往里点! "

不久，有两个人推门进来，慌恐地说:

“我们借借光，换换衣裳。”

逃兵象两个幽灵似地坐下了，忙乱着。

“你们是从那里下来的呀?”

老人颤栗着，声音发抖。

“从江桥下来的!"

“打败了吗?”

“喂!老爷子，我们这有两隻枪，藏到你这里吧!"

安荻在草堆里抖索着，她真怕他们去翻干草堆。她的牙齿在敲叩了。

“埋到房后的沙子里吧，那块儿最好!"

“我们晚上，再来取。”

两个逃兵走出去了。

安荻从草堆中爬出，她感到恐惧和无力。她不敢出去，然而为了惦念着马华她又悄悄地走出去了。终于马华从沙谷中跑来，他的脸色苍白着。

“你和爷说好了没有?”

“爷爷不答应，你逃吧! 你先逃吧!” 安荻催迫着而且她哭了。

“不，我死也不会那样做。”

“你逃吧! 你快逃吧! 在这里是没命的!” 安荻说:

“我去，我去和爷爷说。”

马华推开了安荻。

“你别去，爷爷会骂你的。让我去!"

安荻没有法子走进屋去。

“安狄! 你和谁说话呢?"

“马华来了。”

“安荻! 你愿意逃就逃吧! 我快要死的人了，我管不了你们!”

老人和往常不一样了，他对于马华消失了怒气。

“爷爷! 爷爷!” 安荻哭着。

“你快逃吧! 一会儿兵过来多了，不得了呀!” 老人催促着说。

安荻走出去，又和马华走回来。他们忙乱地收拾点东西，马华背起老人，安荻跟在后面。他们走下沙谷，在远处草丛间停着一辆车子。是马华从村子里弄到的，还借了一匹马。他把老人放在车箱中，把安荻抱上去，自己也坐在车沿上，挥动着鞭子，在一带被秋风吹斜了的高粱田中经过一整夜，他们不停地奔驰着。

黎明，空中浮泛着苍冷的云朵，在变幻着，在消失着。他们的车子走在沼地里。

黄昏时候，大森林中的空地上，挤满避难的群众。车辆马匹歇在一旁，他们的眼睛在发着暗淡的光。到处都可以听到悲凄的哭叫，到处都可以遇到苦痛的脸相。

大家用不安的、恐怖的眼睛互相凝视着。强烈的恐怖使他们的心境都变成窄狭的了。女人们骂着她们的孩子。老年人不住地叹息。

壮年的男人从田中采来了带着穗丝的玉蜀黍棒。在干树枝的野火上烧着。

马华蹲在火旁，忽然听到祖父的使人战栗的呻吟。他的神经痛发作了。他滚在草地上干瘦的脸颊奇怪地痉挛了。安荻替他cui捶着抽痛的肩背。

马华难堪地俯下头去。

祖父，紧闭着干瘪的嘴唇，脸发紫了。

大家拥挤来，好奇地观望。

这样发作一直继续到最后，老人捉住马华与安荻的手，流着无言的泪水，只是摇头，什么也没有说。

翌晨，老人的手和脚都僵硬了，身子蜷曲着。

“这年头死了倒有福!"

有谁走过来，这样说。

马华坐在老人的身旁，落下清冷的痛泪。安荻的凄惨的哭泣震荡了森林的郁暗。

终于, 他们在一棵苍老的松树旁挖掘一个土坑，秋风唱着悲痛的挽歌, 便把死者葬在了那里。于是他们带着沉痛的悲哀又前进了。

“我们向哪里去呢?"

“走吧! 往前走吧! 谁知道呢?"

在一带无际的荒原里，他们遇到了踉跄的牧人，遇到散乱的羊群。看到了远方的碉堡，威严地立在山脊上，或者绝壁之间。

路愈来愈险恶了。大家含泪抛掉了他们的车子，男人们牵着马匹，弯曲着身腰的群众攀行在赤铜色的山路上，爬越曲折的山岭。

“小心呀!”

每个人都异常担心。

“华哥! 行李重就扔了吧!”

安荻孩子似地说。

马华用沉默的眼睛望了一下，安荻的脸已经累红了。

山顶的松树下，马华把马系在树枝上，他们坐下来，吃了点带来的薄饼。

“你饱了?”

“饱了，你呢?"

“我渴!” 安荻说，马华走下谷去，在溪流边用铁罐汲来点水。他又从谷中摘来两朵野花。

他替安荻插在黑色的发辫上了。

夜里，安荻和马华忆念着死去的老人，悲哀地哭了。

四

避难群奔波了许多天，他们奔波过许多的村落，田野，山地……。他们的马匹饿死在山谷里了，背上的包袱满堆着尘土, 女人们已经走不动了，跟在远远的后边。

一个夕晚，他们到了荒凉寂寞的山麓下的一条驿路上。一连带地山蒙上了深深的暮霭，隐约可以看见大松林，古风的寺院，凋落的废墟，瓦屋的残骸。

避难民背负着疾苦和焦躁，他们已十足的疲倦了，仿佛不能再走下去，都板着一副狰狞的面孔。

“看呀! 那是车站。”

“呀!……”

大家喊着，他们看见前面闪烁起苍白的灯光了。

“走呵! 去坐火车!"

大家兴奋了。互相惊喜着，彼此重复着同样的话语。

由远处传来悲壮苦闷的汽笛声，冲开了夜寒。

不久避难民拥进了荒凉的车站。

“小柱子呀! 跟着你爸!"

“环呵! 环! 他大娘看见咱环没有?”

妇人们喊着孩子们的名字，男人也争先地吵骂着。

车开来了，大家起了拥挤的骚动。

一个铁路警用两手推着群众，喊着:

“往后，车来了，想轧死吗! 往后去!"

车停了，大家叫喊着爬进装煤的没盖的货车。孩子们挤在人群中喘不上气来。

“把头仰向天，仰向天吧，” 孩子们吵着，都把头伸向天了。

马华看见安荻挤在一个角落里，在张望着什么。

“安荻小心别掉下去! 靠住车厢板!”

汽笛放出最后的悲鸣，车便开了。

凄冷的风，白云茫茫的夜空。

十月，难民被载到西方的一个城市。他们都流浪在M市的商市街上了。

已经到了中午，马华没有一点希望，懊恼地奔跑在街上。天黑下来，他觉得异常的慌乱，饥饿，疲乏，忧愁，无力地坐在商店前的椅子上，想不出一点法了。

于是，他开始试着喉咙。他试着张几次嘴，但又闭上了。然而终于开始唱了, 唱着他母亲教给他的歌。

颤动的低沉的声音，从他的喉中迸出。行人围住了他。痛苦懊恼使他的声音变成哭泣的调子。渐渐他忘了一切，内心鼓动着他，使他提高了声音。一种颤动的彻骨的歌声震撼了听者的心。

马华止住歌声，羞红着脸:

“请大家帮帮罢!” 他站着伸出手去。

有一些铜币跌落在他眼前的地上。他麻木地拿着得来的钱买了一点干饼回去。

安荻正在一个街角等待他，不安地等待他。

他们流着眼泪在北风下，把一点干饼吃掉了。许多天以后，避难民从街上被赶到贫民收容所里去了。那里快坍塌的就地搭起来的破屋。从外面看去仿佛象破碎的鸟笼，墙壁上支撑着一些木棒。

安荻和马华爬进又暗又阴冷的地窖，壁上生满青苔和孢生植物，放散着浓重的腐臭味。

在他们后面又走进一个中年妇人，爬向土炕，立刻倒下了，半呻吟着，四个褴褛的孩子随着她。

马华在墙角发现许多烟蒂和血腥的碎布屑。他自语着 “一定有打吗啡的在这里住过!"

他用一隻木棒拖来拖去，把烟蒂和碎布屑集拢到一起。

“你有病吗?”

安荻问着那妇人。

“咳! 没病说什么呢。”

“得的什么病！"

“产后风! 那点儿疼，那点儿就肿呵! 不行了，早晚得死!”

她伸出她按着肚子的臃肿的手，给安荻看，安荻感到一阵寒颤，皱起眉头。

“孩子都是你的吗?” 安荻指着她周围瘦弱的孩子们说。

“五个死了一个，死的死了。活的活受罪。”

她从湿润的眼中淌出眼泪:

“自从他爸爸死了，什么都完了!”

安荻看见她在流泪，她觉到异常辛酸，她几乎也要掉下泪来了。于是她竭力安慰了她，她的一个孩子，无端地哭了。

夜深时，马华从纸窗的缝隙望着那暗黑的夜空。许多光彩的，开满花朵的幻想在他眼前展开，又慢慢地消灭了。

夜空的流云使他感到深沉的乡愁，他沉浸在一种单纯的悲哀里。

“快亮了吗?” 安荻冻醒了。

“还早呢! 冷?"

马华紧紧的靠住了安荻，温暖着她，于是她迷朦地又睡去了。

马华合上眼睛，想睡，但无益，无论如何他不能睡着，在他少年的心底，飞跃着妄想和渴望，而且他不断地听到他们近旁的，那病妇人的呻吟。

地平线上的星光消失去，榆林脱掉夜暗，天空透出了乳白。

不久太阳从雾中走出，照着苍白的大地。天主教堂的早钟响了。

避难群，幽灵般地从阴暗的坟墓似的破屋中爬出。黑色之群，象行葬的僧侣走向城内的施粥厂去。

青白的天宇，发散着严寒。

马华和安荻喝完粥时，他们感到了一些温暖。

五

冬来了，一切都到了暮年，衰老，忧郁，无光，而且沉默。

马华每天跑到工人市场去。

他找到工作，他的生活从落难, 饥苦, 迫害……又转向了。而且在工人区，他暂借到了一间低陋的房屋。

那是太阳快落下了，她最后的光芒强烈地照到丘岗上，赤裸的榆林，染成了金色的一个傍晚。马华和安荻离开了难民群，走向他们的新居。

“我们今天，就搬到我们的家去。” 马华快活的说。

安荻没有一句话，她想了许多事，心中充满无限的悲哀。因为她又想起死去的祖父。

“你想什么呢?”

“……”

安荻在心中燃着复杂的情绪，她沉默着不语。她在思索着: 不结婚就在一起这算做什么呢? 她又想到爷爷和她说的话，白人看不起黄人的……。她低着头，沉重地迈着步子。

他们走过了颇长的一条路。

“你怎的了?” 马华又问。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不是，我怕你后悔!”

眼泪湿润在那十六岁的少女的眼中了。

“我向你发誓不……”

“不许你发誓，没有什么，将来你不高兴我的时候，你就抛掉我吧!”

安荻悲哀地握紧马华的手。

马华觉得更爱她了。于是他说: “马华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安荻快活地，幸福地笑着，撫去颊上的泪。他们感到上帝之温暖了。

远方传来了晚钟声。

马华吹起口笛，他们踏过路上的落叶。

“获! 我们的家在那里……看见了？” 马华指着遥远的前方说。

“我看不见，是那幢?"

终于，她看见了。

他们走进那间房屋，马华拿给安荻看买来的一点家具。孩子似地抚摸着一切，微笑着。

“这是天国，我是亚当，你是夏娃!” 马华说。

“亚当，夏娃怎么会被逐出天国的呢?”

安荻忽然想起以前马华讲给她的故事。

“因为他们偷吃了禁果。”

他们快乐地笑了。

冷雪落了，北风掣动着他们的墙壁，使那不坚实的土壁的缝隙发出了嘶叫。

夜里，他们把头都藏在棉被里，缩成了一团。

“什么时候了?”马华问。

“小鸡叫了!"

“我得起来了!"

”什么事?”

“到桃河去挖石子。”

“你不吃点什么吗?”

“不，去晚了，不行。”

“你多穿点!”

然而穿什么呢? 他们什么也没有。安荻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她微笑地说: “把这穿上吧!”

“不，人家笑话。”

马华牙齿有些颤动了。

“谁笑话呢? 谁能看见呢? 穿在里边。”

她发抖地坐起来，将那破烂的短衣披在马华的肩上。

“别瞎闹! 你给我撂下，想冻着! 我能穿下去吗?”

他试着，那短小的袄遮不上肚皮，于是他和她都笑了。

“你睡吧! 别起来。在被窝里，还暖和点，别起来，听见吗?”

马华脱下安荻的小袄，替她盖在身上，便走出了他那低矮阴冷的房屋，冲向黎明前猛烈的恶魔风中。

天空，冻凝了一样的灰白。头顶上旋舞着雪片，马华闭着眼睛，逆着风走着。

当他走到时，工作厂门已经开了。马夫们走动着。马嘶声，吵骂声，车轮辗过积雪的音声，混成了一片。

马华走进马棚牵出一匹小白马。

成队的车子，在冰冻的雪路上走过。马华坐在车厢边，雪花飞落在他的袄上。

“他妈的! 真冷!”

一个车夫用阴郁的声音说。

“快冻死了!” 又一个车夫说。

“我x他奶奶的! 这天还得赶车出来!” 一个车夫在骂着。

“不赶车，挣啥? 吃啥?”

另一个车夫应付着。

天快亮了，马华和其他车夫，在冰冻的河岸挥着铁锹。他们在狂风中，不时把自己的手伸进嘴去，嘘着气，温暖冻僵的手指。

从积雪的河岸，他们挖出了各色的石子。

许久，车子才装满了。

安荻吃完早饭，走到榆林中，去拾树枝。在被北风掠荒了的榆林中走来走去，低弯着身腰，收集着埋在雪里的干枯的枝条。她的双手要给北风吹裂了。

风可怕地吼着。

她想到马华的饥寒，便不肯休息一下。

将近黄昏，她归去煮马铃薯。边煮边盼望马华的归来。

天黑下来，她焦急，慌乱地徘徊在门前。她想会有什么事发生吗? 会有什么不幸吗?

当她听到远处响起了熟悉的口笛，她才放心了。

安荻孩子似地抱怨着:

“这死孩子，怎么回来这样晚?"

“才干完活计，看你哭了?”

“人家不是等的着急吗? 惦记你。”

“来! 我告诉你，我带来了好东西……”他边说着边从裤袋中掏出两个烧饼。

“这是老王给我的!”

“冷吧!”

安荻替他温暖着冻红的耳朵。在灯光下，他们分吃了那两个烧饼。连落掉手掌上的芝麻粒也舔吃了。

“好香!” 马华摸着嘴巴。

“来! 咱们吃新煮的土豆吧!"

安荻说。

他们一边吃，一边又都藏到被窝里。透过一个纸窗孔，望着苍灰的北国天空的忧郁。

“天象要哭了!” 安荻说。

“天谁叫他哭的呢?”

安荻又问。

“他伤心了。”

“天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是女的，不，是男的，地是女的，太阳照在大地上, 大地便生了许多东西。” 他们格格地笑了。

“睡吧! 明天还得起早。”

“什么时候?”

“鸡叫前。”

倦意开始沉浸他们的身子。

六

一天，马华偶然向安荻说:

“我要搬到厂里去。”

“也好，省得来回跑。”

安荻掩过自己的悲哀。

“把头吩咐的: 回家住，晚间没人换班喂马。以后我要能挣多钱，自己挂辆车子就好了!”

马华默默地说。

于是就在那天晚上，他走出了家。

厂舍是没有太阳光的潮湿的房间，墙壁上挂满胡须般灰白的、结晶透明体的冰霜，屋中充满了酸臭。

工人们围着一盏微弱的油灯。在那里翻找破乱衣服中的寄生虫。

马华把背上薄薄的行李，放在炕梢。便坐在一角听伙计懒懒地谈天。

厨夫，一个老年人，脸上的肌肉松懈了，干瘦的双颊，集聚着成把的皱纹。象印度人似的用黑色市布包着头，颤动着眼睛，用低沉的声音讲了许多金矿的事。这带给工人们不少兴奋的梦想。他们插嘴地问:

“你没带出点金子吗?"

“哼! 那可不好带! 金矿的工人走出来，要脱光了衣服……”

老人敲掉长烟管的灰，接着说:

“可是也一样有带的，你们猜怎么带呢? 把金子放在哪儿? 他们把金子都塞在屁股眼里往出带。我是弄不来的。”

“他妈的真想的好!”

大家笑了。

“睡吧! 不睡明天又起不来!”

把头从窗前走过。

于是灯灭了。

夜里，马华把身子全裹在被里，然而耳朵和脸依然冻得发痛，马华冻醒了，他在黑暗中看见睡在他旁边的朱福在坐着。

“你还不睡!” 马华问。

“唔……”

你的夜班吗?” 马华问。

“唔……”

许久，朱福爬起来，走出去又走回来。

“你怎么还不睡呢?”

马华问。

“老马你知道我使的小青马死了! 它怎么会死的呢?"

“它有病吗?” 马华问。

“没有!” 朱福仿佛要哭了。

马华和朱福悄悄地跑出去看了一遍又回来睡了，带着寒气。

早晨，事情发生了。

“妈x的! 猪! 死人!”

把头涨红了圆圆的脸，他咆哮地喊着。

“滚，我这里不要你!”

马华替朱福很难过，他却无法安慰他。

不久，他们大队的车子又响在寒冷的街上了。

黎明前的寒星，颤栗在冷冻里。黑暗中，仿佛有几隻魔鬼的大手伸长着，使人生起可怕的情绪。

车夫们缩短脖颈，坐在木板的车沿上，不时摇动着鞭子，于是那鞭梢在空间转了几转，便嘶啸地发出一些难忍的暴虐的声响。

车子，从横巷走入大街，在士敏土的坚硬修长的道上，压轧着。

偶然，马华的车子停住了，几乎和后面车子的马头相冲。 他跳下车沿，缰绳绊住了马的右脚，他用手拍着马的臀部喊着:

“稍! 稍! 抬起来蹄子!”

于是他又用鞭杆代替着手，在马的臀部用力打两下，马瞪着聪明的眼睛，竖起鬃毛跳跃了一下。

马缰修理好，车又开始前进着。

从前方村落传过来的鸡鸣，鸡鸣的尾音，在拖长着。天际的星闪闪欲灭了。

中午，他们的车子，停在旷场上。在那里，有一幢低的木板屋，静静地躺在苍老的树林间。

前面是许多砂石，木材和砖瓦横散在积雪下。那是预备春天到来，好动工的。

车夫们从树上用粗大的黑手，打下来些干枝，枝杈的响动惊起一隻睡在板屋前的黄狗。它伸长脖子，向车夫们用粗低的嗓音吠着。然而它被一条沉重的铁索拴住了。

木堆前面燃起木火，很难燃红，大家扇着，吹着，烟未飞上车夫们破烂的肩头，和缺檐的帽子。

野火底下的积雪渐渐展开，融化了。

火燃盛的时候，大家围着它，吃起来杂米面饼子。

在他们沙漠样的生活中，吃饭已成了他们唯一的快活。

马华沉思地凝视着火焰，他的心有些阴郁了，他想到安荻，家里没有多少米了，又想到自己会不会遭到朱福那样的命运呢? 一切都象海潮一样涌到胸中。

夜，象一隻猫似地滑落下来。

车夫们嗖嗖地摇摆着鞭子催促他们的马匹。

天上闪着凄凉寂寞的星火，他们从马身上卸去了沉重的马具，他们仿佛谁都患了肝病一样，变成暴燥、野蛮、粗性了。

骂语不时从马厩中传出，马在疲倦地嘶鸣。

厂舍充满了浓重，一股刺激性的水蒸气。看不清一切。

“香! 真香! 什么味儿?”

马华看见厨夫用一隻黑瘦的手，擦着他的眼睛。

“锅里煮的马肉! 老朱走了! 临走时什么也没拿，手里也没有钱，不知到哪去了!"

老人伤心地说着，从眼中流出几滴清泪。

“他走时说什么没有?” 马华问。

“什么也没说，他咒着，真他妈熊透了。哭的不成样子，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把头没给他拿一文钱!”

“他往哪边走了呢？”

马华担心地问。

“往西去了，一过胡同，我就再也看不见了。”

“吃饭，吃饭，拿饭来……！” 秃头一边吵着一边走进屋里，仿佛象饿狼一样，眼睛闪动着可怕的饥饿的光亮。

马华紧紧地锁住眉稍，他在思索朱福的不幸。

“也许死去哪! 那小子没有一点主意!” 老厨夫叹息着。

“拿饭来!”

秃头揉搓着他那落满灰尘的头发。

“太可怜了!” 老厨夫又说下去。

“妈的! 没听见吗?” 秃头喊着。

“你骂谁? 你骂得着我吗?”

老厨夫说。

“为什么叫你拿饭来，你不拿。你是管做什么的?”

“你有人心吗? 老朱走了，你一点也不想他!”

“想他干吗? 他也不是我的儿子!”

马华的头感到有些痛，他走到外面去。院中从纸窗透出微弱的灯光，直射在窗前的一块土地上，闪闪的发亮。不时从窗里传来工人的吵嚷声。

“老马! 吃饭了!” 有人唤着。

灯光下，工人们的样子，十分狰狞，争抢着，要把前面放着的红色马肉全都抓去吃掉。他们足有一年不曾吃过一片肉了呢。

七

在厂里很快就过了三个月。

春天来了，贫民小屋旁边的榆树枝已挂满了黄色的榆荚。用枯枝围成的矮墙下，蒲公英也开了。旷野的草，象天鹅绒般绿了。孩子们跑到林子里，寻找着昆虫。大地飘散着香气。

安荻把凳子搬到窗沿下，替人缝衣服。

春天，在青年人的胸中撒下兴奋、烦恼和快乐。在安荻的心中也撒下了爱与新生。她偶然涨红着脸害羞地说:

“你知道小孩几个月生呢?"

她瞅一下站在那里修理鞭梢的马华。

“几个月呢? 十个月吧!"

“十个月?”

安荻喃喃地自语着。

“可真快了!”

“怎么的?”

“我觉得肚子有些疼! 你看有多么大了呵!"

门前的骡子，竖着粗长的耳朵，安静地等待着她的主人出来。

马华已经自己拴了一辆车子，每天到车站去拉些零货。

“快点回来呀! 呵! 华哥! 快点回来呀!”

马华坐在车上，浴在镀金的朝阳中，从林荫路穿过。

大地开满了野花朵。

安荻在窗下，望着远方，在路上走来一群村女。

安荻想着: 她们是到哪里去做工的呢?

那群村姑娘走近了，穷苦的脸相，仿佛是一些凋残的花朵。

“你们是到哪做工的呀?”

安荻问。

“到八里岗子去的!”

到那里做些什么呢?

“替人家铲地。”

村女们过去了。

村女后面有牛鸣了。一切是这样慵散而又温暖呵!

半个月后，安荻坐在有燕子轻轻掠过的窗前，她衰弱地微笑着，洗涤着她的婴孩的脸孔。 在阳光下，喂她的婴孩吃奶。

婴孩却象可爱的小猫似地哭泣起来。

教堂的晚钟响了。劳动者，牧人都归来了。

在窗前马华听到孩子的哭啼，他激动地走进屋里。他望着婴孩又望着安荻。

“你看这孩象谁?”

安荻笑着说。

“象爸也象妈。”

马华指着自已，又指了一下他的妻。然后他担心的问:

“你吃点什么呢? 我给你买点什么呢?”

“我不饿!”

她说着她有些感到了疲倦。

马华望着她苍白的脸感到无限地爱怜，他偶然意识到万一他们之中谁先死了，那该多么悲惨呢!

一星期中，马华不肯走出去，因为安荻产期的衰弱使他决心停在家中。

在他们的窗前，会听到安荻的呻吟和婴孩的哭啼，那微弱的声音永远象猫一样。使人听到会想像凄寒的秋夜。安荻弱极了，她很少吃东西，脸色苍黄，在折磨中她消瘦了。但当马华问她:

“你觉得哪不好过?"

她总是摇头。

马华忧心地走来走去。不安，焦燥，在内心燃烧着。他又问她:

“我替你请个先生吧?”

于是安荻慌急地说:

“怕什么的，哪个女人都是一样，几天就好了。”

安荻的病弱和营养不好，使她的乳很难供给孩子吃了。孩子饥饿的哭泣，刺痛着他们的心。

一天，终于马华叹一口气，赶着车子走出去。

安荻望着婴孩，听着车铃声消失在林中。

偶然一些黝黑的思想，恶魔般捉住了她的心。她想到死亡，孩子，坟墓……。她觉得异常混乱。

孩子在她的怀中，低弱地哭着。每个声音都会刺痛她，她努力克制自己的痛苦，把乳放进孩子的嘴去。然而孩子吮不出乳汁就又哭起来。

晚上，马华回来。

“我怎么没有听见车子响呢?"

安荻问。

“车子，放在老张那里!"

马华将代乳粉铁罐，和一袋小米，鸡蛋，放在炕上，然后他从衣袋中掏出一包药来。

安荻苍白地问:

“哪里来的钱呢?"

“借的! 用车子做抵押来的!”

“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东西呢?”

安荻看着鸡蛋，她难过地哭了。

“安荻！看你又哭了!”

马华边替她拂去颊上的泪水，边说下去:

“我们穷点怕什么! 借了几天再还，钱算什么，只要你好了比什么都强!”

“我们拿什么还!”

“想那些作什么? 等你病好了，就还他们!”

安荻因为身子不好受，辗转了一会，便昏沉地睡去。

“不, 我不……”

她在模糊地说着呓语。

“来呀! 马华! 你靠紧我，我怕!”

旷野、丘岗、榆树林……一切都在忧郁的薄暮中沉默了。

马华悲哀地蹲在门前，焦心地吹着火，在那里熬药。教堂的晚钟悠悠地响了。

马华不知为什么一听到这钟声，便沉痛地悔恨起来，自从母亲死后，就不曾再作祈祷的事。他熬完药，走到旷野去，那里的草丛已经很茂密 。马华让傍晚的露水，濡湿他的鞋子，他踱到荒芜的墓地，向一根木制的十字架，他虔心地祈祷:

“上帝呀! 保佑安荻好吧! 上帝呀! 慈善慈善! 救教我们吧!”

他的唇烧焦了。

祈祷使他得到了安慰。他轻松地归去了。风送来阵阵的草香。

次日，安荻病势危险，她不常睁开眼睛，热度非常地高。

马华替她请来一个医生，医生看完了，他摇着头说:

“我给开个单子吧!"

说完便走掉了。

安荻不住地昏迷地呓语着:

“马华别离开我呀!”

她用颤抖的手紧握住马华的手。

夜里，细雨潇潇地洒落了。没有月，没有星，什么都看不见，从榆林中，不时传过来难听的鸟啼。

在梦样的灯光中，马华坐在一个角落，疲倦地、伤感地摇晃着他们的孩子。

七月里，暖风轻轻地吹着密茂青深的大草原。许多肥大的叶子，许多野草在那里乱生着，仿佛一群美丽的少女，穿着各色的纱裙。

安荻的病，意外地竟恢复了，虽然她还显得十分消瘦。

“小荻呢! 小荻胖了，小荻长大了! 妈的小荻呢?” 她说。

“小荻！爸呢？爸在哪里呢？”

她又说。

“喂！小荻！小荻给爸一个嘴吧！”

马华从窗外送过一隻粗大的手来。

八

三年很快地度过了。

天气很坏，从早晨就象要落雨的样子，又阴又暗。

马华还在赶车，却找不到一点货物可拉，他把车子放在家中，自己走了出去。

他苦恼地走到市场中，许多农人和游民在那里走动着，他靠着一座墙壁忧愁地坐下。

“喂! 你抽烟?”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带着苦难的脸相犹太人问他。

马华摇着头。

“你没有家吧? 我也一样，走到哪儿是哪儿。无忧无虑。”

他说着划一棵火柴。

“你是几时从国里来的?”

犹太人用着俄语话说了。

“忘了。”

马华因为怕他轻视他，于是便这样答了。

“想回国吗? 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的那岸，那里很好呢! 到夏天，黄昏的时候，划着船到黑龙江上，有多么快活呀! 姑娘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晚上她们的响亮的歌喉可真迷人哪!”

犹太人抛掉手中的烟蒂，然后他又说:

“今年多大了呢?"

“二十四。”

“好年纪呢! 我在那时正恋着一个姑娘，黄头发的姑娘。她活泼得象一隻鸟儿。”

“你是什么职业?”

犹太人又问了。

“赶车拉货的。” 马华说。

“拉货?”

“是!” 马华说。

“你不想翻翻身吗? 在这里是没有出路的，不想走走吗? 我是打算到别处去了!"

犹太人说。

“别处去? 怎么样呢?” 马华问。

于是犹太人又谈了许多关于别的地方的事，然后走掉了。

自从那天起到别处的念头，苦闷着马华，他不时掏出衣袋中揉乱的地图，也不时用手指计算着。他热望起未来。

“你又在想什么呢?"

安荻一看到他在沉思，她便忧心地问。

“什么也没想。”

每次马华都这样回答。

“你说谎，你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呢?”

安荻追问着。

“没有，什么也没想。”

“我不信，一点也不信，你瞒着我，我会伤心的!”

“我想，我哪天可以拾来点钱，五百元。”

“五百元，二百元也好!”

“不用二百元，一百元也不错。”

“那管十元呢!”

于是他又和安荻谈到梦想和幸福上去。

安荻想把米铺来要米钱的事告诉她的丈夫。然而一想到丈夫的困苦便叹了一口气说:

“什么都贵得了不得，简直是过不了啦。”

“哼!”

他想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她，但他却又低下头去让苦闷啮住他的心。

夜里，他的念头在眼前展开了，仿佛自己已经雄赳赳地迈进在一条光明的大路上，那里跃动着梦幻的火花。

“你睡了吗?" 遭

安荻轻轻地推了他一下。

“没有。”

“为什么不睡呢?”

“哼! 睡不着。”

“安荻! 我告诉你点事!”

马华又说。

“说呀!”

安荻将脸低俯在马华的脸上。

“说呀! 呵!”

“我早就想告诉你我快走了!"

安荻，她不能说一句话。她想毕竟马华要抛开她了。

“安荻! 你明白我的话吗? 我到XX去，听说那里随便找得到好工作，” 马华说。

“到x x去?”

安荻惊奇地问。

“到那去，以后弄好了，把你们也接去。”

“不，我不愿意你去，你离开我，我怎么活呢?”

安荻痛苦地说。

“我把车子和骡子卖掉，我只带点路费，余下的都给你留下……你再找点针线活计，就可以对付几个月的吧!”

“我说的不是那个，你走了，我想你! 不，我不愿意!”

“你别想不开，我们还能见，几个月后也许就能翻一下身，不然，你老跟我受穷，我太对不起你，没有穿着，也没有吃着。”

“你说那个做什么，我不怕穷，我不愿意你去!”

“不行，我已经和人约好了!”

许久他们祇有沉默着。

“那么你什么时候走?"

“一星期以后，还没一定。”

于是，安荻委屈地悲哀地哭了。

出行的日子近了。

莫大的悲哀带来了莫大的恐怖。

安荻整天拖着一颗沉重的心，仿佛失掉了知觉一样，恍惚地走动着。

她拿着一件破旧的羊皮袄，想要叫马华试穿一下，但当她走到马华身旁时，她又忘去她是在做什么了。

她伸出两手，用沉滞的声音说:

“呵! 我想做什么呢? 我忘了。”

于是，她歪着头绞尽脑汁思索着，但她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她忧虑地说:

“我究竟是想做什么呢?"

她悲伤地走回原处，坐在炕沿上，凄楚地哭了。眼睛红肿了，她一想到别离，便失掉了希望，她感到空虚与无力……。

“不愿意，不让你走，不让，呵!....."

“是的! 我不走!”

“你说谎，是不?” 她低泣着。

她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整天的哭泣。

马华也十分难过，安荻走到那里，他跟到那里。

“你来呀! 你不要弄那些了! 来坐一坐!"

他在不时地这样喊着，唏嘘着，叹息着。

夜空，跃动着无数的星，静谧，无声。

突然从远方的黑暗中，悲愁地鸣响起火车的汽笛声。

马华伸过手去，抚摸着安荻:

“我走后，不许你同别人撕缠呀! 那你就没脸见我，我就永不回来看你啦。”

“你在说什么? 我是那样的女人吗!”

“那样我就杀了你!”

“你放心好了，一直到死，我是你的，不管男人的心是不定的。”

她又补着说:

“你走了要来信，想我惦心你!"

“一定!”

这些话，使他们又悲伤地哭了。

“睡吧! 明天还有一天的聚会呢!"

马华说。

安荻悲伤地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 她的头异常沉痛，而晕迷了。

翌日，安荻抱着孩子, 送马华到码头去。

“我去办点事，一会就回来。”

马华和那犹太人走了。

安荻望着他强壮的背影，眼睛湿润地伫立在票房的窗前。眺望着碧色的江水。

是落雨的天气，然而不时从白云缝中透射出蓝色的天宇。

汽船响着汽笛，从窗前航过，缓缓地贴近了江岸。

“你是到哪里去的呢?”

一个老太太问她。

“我的丈夫到XX去，老太太，你知道几点钟开船。”

“几点钟呢，大概快了。”

她盼望马华快回来，仿佛她再也看不到他似地焦急而痛苦。

一隻汽船正停立在她的前面，烟筒直耸着，从那里吐出乌黑的烟。船头挂着白色的救命圈。于是她想了一些不可测的危险……

天晴了，强烈的太阳光，直射着岸上的房顶。稀稀落落的几颗树在风中摇动着。

汽笛，嘶叫着。

马华走了回来，安荻擦着眼泪。

“别哭!”马华说。

“小荻! 去和爸爸亲近一下吧!”安荻说，流着泪。

“别哭! 你好好的吧! 实在想我，我会回来的，别哭!"

“嗯! 我不哭。”

安荻仿佛一个受委屈的孩子一样，低着头抚摸马华的衣襟。

马华意识到他就要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远行了。他感到酸痛而难过。他想她怎么样生活呢? 离开她? 绝望的悲哀，使他不想走了。

“你就坐这船么?”

“嗯!”

“我也跟你去!"

马华苦笑了。

人们都提着包袱，排成行列往船舱里移动着。于是他慌忙地拿起他唯一的包袱向安荻说:

“开船还得一会，可是现在就得进去了。你在这里望着我吧!”

马华仿佛去赴死刑一样，沉痛地排列在上船的队里。

“爸，爸!”

小荻张着手，她象是知道这悲哀的时刻似地喊着。

船到了拔锚的时候，开船的锣响了。

“爸! 我不让爸走! 爸!”

小荻天真地咕噜着。

安狄都要昏倒了。

船开动了，在江上前进着。

“回去吧!”

马华在船上招着手。

“来信呵!”

安荻颤动着嗓音。

“回去吧!”

声音遥远了。安荻哭泣着向远去的船隻，摇摆着她的瘦手。

船在江面上冲开了白色的浪花。浪花起来又凋落了。

马华坐在甲板上，轻柔的发丝，摩擦着他那年轻漂亮的脸庞。

马华走到三等舱去，那里异常闷塞。

“先生可以给我拿点水来吗? 我晕船了。”

一个女人象一隻被咬伤的狗似地在角落里。

马华替她到饮水处去弄了一杯水。

“谢谢! 我太难过了。”

年青的女人说。

“这孩子是你的吗?

马华看见她的身旁睡了三个孩子。

“是的!”

“你到哪里去?” 马华说。

“去找我的娘。我的丈夫死了。没法活了呀!”

从她的眼睛掉下眼泪来。

马华走向和自己同来的犹太人的身旁，他在舱铺上已经睡了，象一个傻子似地张着嘴。马华无聊地又走到甲板上去。从二等船舱中传来了留声机的音乐。悠悠的调子，弥漫在江上。

马华望着夜，悲伤地吹起口哨吹着歌，吹出自己的哀愁。他思念着安荻和孩子们。

早晨，汽笛悲鸣着。

马华和斯拉其夫混在人群中，从船上走到开动的岸上来。他们感到了迷惘。

“喂! 怎么样? 你看看，在这里开开眼界吧! 那是八层的高楼呀!”

他们通过拥挤的马路。斯拉其夫兴奋地谈起他要怎样去实现他的志愿。

于是他们的希望在前面发着光。他们都在心中感到了愉快。

一整天，他们在繁华的巷中度过。

太阳落了，西天闪耀着美丽的霞光的时候，他们找寻到了一家破落之街的小店。永没有阳光透进去的小店。他们走进那里去，他们仿佛站在黑暗之中，一切什么都模糊了。他们发见了一些比他们还穷苦的人，饥黄的脸，用沉滞无光的眼睛看着他们。马华和斯拉其夫因为店钱的便宜感到满足了。

夜间他们和店中人变成很熟悉的朋友。他们谈着各种职业的问题。

然后马华蹲在炕沿上，在灯光下忙着给安荻写信。

终于马华寻到了工作，在一条狭街的一家墨水工厂里当了墨水工人。

一幢低矮的板舍，宛如鸟笼子一样，在漆黑的板壁中间，开张着一些黑洞似的小窗。从里面常流出来一股带刺激性的恶酸味，和机器的轮转声……

马华最大的安慰是这里的工人，差不多都会唱歌。

当他们在深夜里工作着，唯一慰藉他们的，便是自己的歌声了。

谁在唱了，大家便合唱着。于是雄浑的歌声，宛如海之波涛一样，激荡在板壁上，发出响亮的回声。

每当马华想起安荻来，他便唱着:

“白云呀!

你到不到我的家乡去呀！

看看呀！

那些废墟呀！

看看那条河呀!

看看呀！

榆林里的小屋呀！

看看呀！

我的爱人呀!”

一天，马华从墨水工厂走出来，他被辞退了。

他忧郁地走到河边去。他靠着树干伫立，想起了家乡，想起过去的春天。他望着水和天，使他感到荒凉的寂寞。

偶然，他听到女人的尖叫，他回过头去，倾听，他发现了一隻停在芦苇中的木船。

他走近时，又没有了一点声息。他把耳朵贴在船板上，他听到了微弱的呜咽。为了好奇的冲动，他从船 口望着。

他瞥到一个女人，头埋在双手中，哭泣着，发丝披散在褴褛的肩上。一个男人坐在她的旁边。因为船舱非常暗，看不见他的脸是怎样的表情，祇听见他暴躁地说: “杀死你!"

“杀死吧! 没良心的人，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看你再跑到纪得勒那去，我连他都杀死!"

“杀死吧! 谁都是一样，没良心的鬼头。”

“有良心怎么样?”

他狮子似地咆哮着。

“从来，你说过，你要我吗? “

“你再说，我不叫你活!"

“活算什么，我什么也不怕，死了倒干净!"

女人哭得十分伤心，仿佛她尝味到了最孤独最不幸的辛酸一样。

“不许你哭，哭，滚出去哭!"

女人仍然哭泣，男人气愤地凶暴地捉住她的头往船底上摔打着。

“没良心的兽! 你们就会打人!” 女人挣扎踉跄地走出来。

马华忙将身子伏在船后的芦苇里，他看到了一个十分丑而且粗壮的女人。

“站住! 你在那里走?”

一个黑粗的男人，追赶上来。

“别管我!”

“回来! 不许你走!"

男人捉住她的肩膀。

“你放开，放开我! 已经够了。”

“你到哪里去?”

“哪里都可以，你管我作什么?"

女人用力从他的手中挣扎出去跑掉。

男人跟在后面，渐渐他们走远了，而且吵嚷的什么也听不见了。

马华，他仿佛晓得了，那是怎么回事，他想到自己的妻，想到如果那女人是自己的妻，他一定会杀掉她。他认为世界上只有纯情的人，是最可爱，是值得爱的。

于是他在那里走动了许久。

夕晚，他又看见那吵架的男女，并肩地走回来了。

男人将船划到河心去，张起了一隻渔网，摔向水中。女人在岸上，燃起一隻火炉来。炊烟袅袅在黄昏中升起。

“他是你的什么人?”

马华吃吃的问。

“你问他作什么"

女人惊愕地说。

“没有什么，我看见他那样的打你!"

马华低下头去，然后他又补充着说:

“为什么他打你呢?"

“我不知道，他常打我。”

“是他不要你吗?'

“他有主张，他说女人是猪，他不肯要我!”

女人边说着，边流下眼泪，将手中的鱼送进了铁锅里。

马华觉得那女入很可怜，于是他又问:

“为什么你不走开呢?"

“为什么要走开呢? 怎能走开呢?”

她把头低着，仿佛不敢抬起来一样，她自语着。

晚间，马华离开了那河岸，投向自己的家屋。

夜深，斯拉其夫从街中回来，他喝醉了。完全不懂人事。 他狂乱地歪斜地跄踉到屋里，他用手捶打着前胸，他悲痛的哭起来了。

马华极关心地照顾安慰着他。将他扶在炕上，斯拉其夫呕吐着狂喊着。

斯拉其夫和马华已经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了。

他的痛苦和他的模样，使马华的灵魂，仿佛被巨大的悲惨遮住了一样。他叹息地替他弄些凉水轻轻地拍在他的头上。许久斯拉其夫昏昏地睡去了。

马华异常兴奋，而且感到了痛苦。他找不到每人所遇到的运命的正当的解释!

他凝视着黑暗的屋顶，在那挂满蜘蛛丝的板棚上，有老鼠吱吱地穿过。

终于马华和斯拉其夫一齐寻到了新的工作。

离城二十里的山谷里，建筑一座监狱，在那里，他们做了三个月的工。

已经是秋天了，季节风在山间狂啸着。太阳透过松枝的空隙闪着光。

工人们，低弯着身腰，在林中砍伐木材。大木倒落在林间的草地上，隐隐地激起一种绝望的痛苦的响动。

马华累了，休息在山腰上，他想工头不发给工钱的事，感到愁闷。

于是，他唱一个褐色的歌，泄露悲苦。悲壮的音波在谷壁中激起更响亮的回声，于是工人们之中有谁也唱起来了，那完全是难忍的，悲凄的调子，哭泣的调子。

“他妈的! 被串了的野种! 要钱有你，做活找不到你!”

工头是一个恶汉，浓黑的恶眉下，红着两隻充血的眼睛，举起皮鞭子，抽打在马华的背上，马华纷乱而昏迷了，他感到背部在发痛。

“不许你们唱! 狗养的!”

工头象狼似地咆哮着。于是林中的歌声消灭了。

夜里，马华躺在谷底的板屋中，内心涌着凶猛的愤怒，背部的伤痛，使他不能睡去，他思索了许多事。

夜风在林里惊起了松涛。

次日，歇工的傍晚，工人们坐在苍老的松林里。穿过树枝缝隙的黄金色的夕阳，落在他们的脸上。

斯拉其夫集聚了些干枝，燃着了火。他们围成一圈，谈起女人来了，在他们里面除了马华而外没有一个人娶过媳妇。他们的生活过于干枯和疲劳，使他们变成粗野的兽性的了。他们无耻地谈着许多性的事体。

马华从那里走开，他被一个思想所苦恼。他在秘密地想怎样去逃跑，在四周巡视了一遭便回到他的小屋中，取出一盒火柴，他想起安荻告诉过他，在山中走路总得带一些火柴。

以后他冷静地假睡了。

午夜，马华悄悄地爬出板屋，穿行睡着的林里。

密草丛中，发出一种飒飒的声音。一隻猫头鹰箭似地在他的头上掠过。

他停在一个张着铁丝网的木栅。他踟躇了。

但，他鼓起勇气，他跳了。脚受伤了，血立刻渗透了鞋子，然而, 恐怖使他顾不到一切，连夜地奔驰在森林中。

他到了荒凉的河岸，他发现停泊在岸边的独木舟。

他解开了独木舟。滑进到江中。太阳上升了，江水上跃动着金色的涟漪。他默默地穿行在沙洲间，迅速地行进着。

晚间，他登岸了。

九

雨落着。

马华在村子里停留了几天，他被铁丝网伤害的脚有些溃烂了，他不能安易地行动，象一匹生癞病的野狗似地爬行。

他全身被雨淋湿了，哆嗦着，他想爬到前面的一条路上去，在那里，有来往的公共汽车，从村子到城里去的。他的脚在发痛，他笨重地爬着，他仍鼓励着自己:

“呵! 走呀!”

马华用不折不挠的毅力爬行着。

不久，在前面来了一辆大汽车，于是他提高喉咙喊叫着:

“来呀! 站下，站下，这呢!”

他的悲壮的喊声震荡着:

“站下，来呀! 人在这边!”

大汽车过去了! 大道扬起灰尘。

马华怅惘地继续爬行在朦胧的夜里，他好好容易爬到那条大道上了。

远处有火在发闪，大汽车又来了。

“站一下呀! 站一下!"

车站住了，车掌问他: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工的，工头不给工钱还打我，我逃跑出来，铁丝网把脚弄坏了，不能走路，先生救救我吧!将我载到城里去就行了。

“你到那里能做什么?"

“能做工!”

“你能吗?”

“能! 几天好了就做工了，先生救救我吧!”

车掌同一个穿茶色制服的司机人，将他扶到了车上。车中起了一阵骚动，大家用惊异的眼睛不住地扫射着他。

大汽车到城里以后，把他丢在了大道的道路旁。

马华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因为脚的伤处，完全溃烂了。不住地淌出一些污脏的脓水。

秋末，一切都凋落枯黄了。

在火车站附近的郊外，马华拖着一隻用灰色破布片包着的肿大的脚爬行着。

一天，他很吃力地挥动着一隻旧铁锹，黄色的土丘，迟疑地滚落下来些沙土。

他的周围，围着一群孩子。

“你挖这坑做什么?"

一个淌鼻涕的黄毛丫头问他。

“睡觉!” 马华说。

“那不冷吗?”

孩子说。

“冷能怎的呢? 你家里有破席头吗?”

马华问。

“我家有!”

站在他近旁的许多孩童喊着都跑掉了。

他们都愿替他去做点事。留在那里的，一个强壮黑脸的孩子说:

“看你挖不动，我来挖吧!"

黑脸孩子夺去了马华手中的铁锹，用力地替他挖着。

孩子们轮流的挖出来一面坑窝，里面铺着孩子们拿来的破席头。

沼地里腾起了薄蓝色的浅雾，西天的云彩，在发着透明的光色。四周散布着湿寒。

有一个过路的人，经过马华的前面时，迟疑地站住望着他。

“你从哪里来的呵?"

“远呢!"

“你的脚怎的了呢?”

“坏了!”

马华关于他的遭遇已诉说千遍，他已经十分厌倦那些语句。因此他便不愿再说。

过路人望了他一会便走开了，消失在远处。

马华被病给压倒了，他想念着安荻和孩子，他感到无限的悲伤，他流下了干涩的眼泪。

秋虫在草丛中，耐不住秋寒地叫着。宛如在低泣。远处散落着农人小屋，闪出微弱的灯光。

一夜，袭来了暴风雨，连命苦恼着马华，他想着许多事，想得心发痛了。

突然他觉到挂在头上的席头摇动着，于是他用他那干瘦的手，捉住席子的边沿，坐起来。他疑心地伸出头去张望，眼中闪出忧暗的光。

夜空里急跑着恐怖不安的慌云，在草原中，风呼啸着，渐渐呼啸变大了，仿佛山中起了野火，兽群在跳驰着一样。

许久，他缩回头去，用力地拉住破乱的席头。数分钟过去了。

暴风雨来了，顽强地在他的土窝上面敲打着。土丘上面冲下来污浊的急流，四周的泥土塌落了。

马华在等待着灾难的到来，他一动不动地凝视着。

不久，全身都浸湿了，他抬起他那只臃肿的脚，从坑中爬出，在泥水中爬行着，他向路北一幢孤独的院落爬去，那屋子里的灯已熄灭了。

积水几乎要淹没了他的膝头，爬在难行的粘土崖上。几度的滑落下来。终于他捉住着草根，爬向岗上去。

在那院落的墙壁下，他找到了一块避雨的地方。缩成一团。自语着:

“要命呵!"

他用一隻颤动的手将湿的包脚布打开了，一种痉挛的疼痛，使他咬紧牙齿，拧干了包脚布，然后他又苦斜着脸把脚包好。

在那角落里，他颤栗地听着雨的滴落，度过了漫漫的长夜。

早晨，暴风雨过去了，天气清朗的，从东方升出暖和的太阳。

马华在晨风中，靠着墙壁发抖。

一个老农妇，干瘪的脸相，穿着一双男人的水靴，从院落里走出来。

“这他妈王八小子，快冻死了!"

老妇人患着神经病，她不住地摇着乱蓬蓬的头，说出一些骂人的话。

随后她进院去，抱出来些干草，在马华的身前燃着了，她用一隻斜眼瞧着马华说:

“妈的! 傻东西! 快烤烤!”

“把我冻死了!” 马华移近火旁。

“二虎! 你把它穿上!”

老妇人把她的棉坎肩脱下来，替马华披上了，然后她走掉了。

马华守着一些残火坐着，孩子们又围住了他吵着。

老妇人送饭来了。

“走开，这群死不了的小鬼!”

老妇人骂着。

“死不了的小鬼!"

孩子们做出猴脸，学着老妇人的话，又恐惧地逃开，在不远的地方站住了。

“死不了的活长寿!”

老妇人气喘地骂着。

“死不了的老妖精!”

孩子们用手指点着老妇人。

马华虽然对于老妇人的粗野态度有些奇异，但因为她的关心，他感到无限的亲近。

因此，他很想探听她的身世:

“老太太! 你都有什么人哪?”

“什么人也没有!"

“这院不是你的家吗?”

“这是我姑娘的家。”

许久，老妇人又说下去:

“养姑娘白扯蛋，若是儿子活着多么好。”

“你儿子怎么死的呢?”

“长病死的，长病没钱治，活活地病死了。把我想坏了。我他妈哭疯了，那时一天到黑我跑着! 想儿子。……一遇见你这么大的，我就当做是自己的儿子。若不这时，我就有点糊里糊涂的了?” 老妇人擦着落下的眼泪。

老妇人，不久走掉了。

马华颜色十分苍白，老妇人的话，使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死。他格外地想着安荻。

他想，如果在她的眼前，他一定不会受到这灾难。他想，真的死了，就这样的诀别了吗?

周围的孩子们也沉默了。

远方的汽笛叫了，在潮湿的空气中震响着。许多接站的车辆，从他面前通过。马蹄敲在那一带士敏土的马路发出清脆的音响。

也有些步行的人们，从他面前通过，于是他又开始行乞了。

“老爷，帮我点路费吧! 帮帮吧!”

有些人，用好奇的眼睛瞧着他，盘问着他，然而却很少能扔出几个铜币。

行人盘问够了，便走掉了。又换了同样的行人。

晚间，最末的一次客车已经过去了。大道上，一切静下来。凄凉的寂默的夜空，浮动着几片薄绢似的白云，风在原野的暗黑中走动。

马华双手握住要来的铜币，在墙角睡着了。

初冬，车道那边的沼地里，芦草已经枯萎发黄。池沼快结冻了。

马华的脚烂掉了，而且又患了肺炎。

他异常地思念安荻和孩子。许多日子，他在绝望中流泪，死神已经向他伸出了一隻巨大的黑手。他痉挛地撑住脊背，挣扎地坐起来，干咳着，爬向崖下，伤肢的疼痛，和胸部的疼痛, 使他过于难于移动。

日落了，四周袭来澈骨的湿寒。

他从崖下又爬到沼地去，手捉到了芦苇，帮助他艰难的爬行。

泥泞和寒冷，使他抖动着。

终于，他爬到池沼里去了，薄冻的水面上激起来几条波纹。

他的浮在水面的脸，苍白的可怕，眼中闪耀着死的悲惨的光。

他在绝痛中喊出:

“安荻! 安荻呀!”

随着最后的绝叫，他在水面上不见了。

池面上激起了圈形的浪波，展开，扩大，渐渐又平静了。

天空上照着苍冷的月光。

十

把马华送走了的安荻，象失掉伴侣的孤雁一样，从码头回家。

她不安地在房子里走动。抱着怀中的小荻，仿佛在等待着马华回来。她只想: 他上街了，或到厕所去了，不久便会回来的。

她焦急地等着，然而，时间过去了，能有什么带给她呢? 于是她走出去了，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她不知道。抱着小荻走在荒野里。风吹着，天上的浮云仿佛山羊群急剧地飞跑。

夜风从树林经过。枝条鸣叫着。

“是不是马车的铃响呢?”

她神经质地寻觅四周，然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

安荻忧伤地痛哭了三天，心仿佛碎毁了一样，空洞洞地感到疼痛。

“想念，也许会想死人的吧? ”她无可奈何地意识到死了，于是她竟变得很冷静起来，不再无节制地哭了。

她想到了工作。她自语着:

“眼泪是什么东西呢? 无用的眼泪!”

次日，安荻走到一家织袜工厂去。

在门前她徘徊许久。终于鼓起勇气，不安地走进去。她惶惑地推开门。门里面的人现出惊愕的样子。

安荻不自然地朝他们鞠着躬。

“找谁?”

一个穿绸裤和拖鞋的胖子边喝着茶，边问她。

“不找谁，我想到这里做点活。” 她焦急地说。

“现在不用工人。”

别个有着八字胡的瘦身的男人说。

“先生们! 他爸爸走了，家中实在没有法子过活。先生就算救教我们。” 安荻哀愁地说。

“这几天，已经停工了!"

“先生! 最好留下我吧!"

“因为买不到棉线的关系，已经停工了，几天有线时，你再来吧!”

安荻感到十分不安，而且厌烦。她看到站在屋中央的一个把手插在裤袋中的中年人。在凝视她。她想立刻逃出这氛围。

她回转身，迅速地走出门去，带着懊恼和失望在路上走着。苦闷使她低垂着头。

终于她回家去了。

半月后，安荻和村里的姑娘们一同到玉蜀黍地去采玉蜀黍。

肥绿的大叶遮住了村姑娘们的身子，她们用年青的手将带着金丝穗子的玉蜀黍摘下来，放进他们的衣裙里。

阳光从密叶间，落到她们年青的脸上，摇晃出斑点。

安荻唱一支歌——一隻马华教给她的纪念他们思念的歌。美丽清婉的调子响在玉蜀黍田里，悠扬地 。

“马嫂! 你再唱一遍呀!”

从隔垄中传来一个村姑娘的尖声。

“再唱一遍呀! 我们学学! 我喜欢唱歌，可是没上过学，就不会，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好吗?”

在绿叶底下，她们开始生涩地发音。随后是一阵清脆的笑声。

他们从地这头走到地那头。裙子里采满了。她们没有忧愁没有担心，仿佛工作是他们唯一的爱的生活。

在思念和劳作中，安荻送走了秋和冬。

春天又来了。燕子呢喃地唱着。

安荻在自己的房前挖掘了一块田，她想在那里种些向日葵。等待秋天熟了，好把向日葵籽寄给她的丈夫吃。

从早晨，她就在挖掘。她带着愉快的心情播撒着尖形的种予。小荻坐在门前哭了‘

“好孩子! 看妈做活!”

安荻回过头来，她温柔地说。

夜里，孩子睡去的时候，她燃起一盏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替马华缝一件衣衫。寂寞孤独的心中，激荡着哀愁。 她过于思念了。她宛如听到一隻哀歌一样，有时许久地停止了工作去冥想。

深夜的时侯，灯油快干涸了，她才悲哀地睡去。

西风吹散着大地的麦香，天主教堂的晚钟和往昔一样悠长地响着。

郊外的村路上，有许多车辆走过。车夫们戴着破旧的草帽，坐在车沿上，倦怠地唱着小调子。

两侧的白杨树在晚风中摇曳着。

黄昏道上，走来一群包着头巾光着脚掌的村姑娘，她们是刈麦回来的。安荻走在她们的后面，迈着沉重的步子，头巾脱落了。

在道上，她向伙伴们摇着手:

“你们回去啦?”

“回去啦!”

“明天见!”

“明天见!”

然后，她孤独地走向她的家。

悲哀掠过她的灵魂，在那里投下了浓黑的阴影。

安荻走进门时，小荻正坐在门前哭泣。一隻狗在望着她。

狗看见女主人，便跑来，哼着鼻子，不住地跳向安荻的身上。

“哭什么?” 安荻问。

“妈! 李大娘孩子打我。”

小荻委屈地哭着。

“不要紧，你饿不?”

“她骂我穷光蛋，骂我是小毛子!"

“不要紧，她骂人，她不好!”

“妈! 明天我不愿在她们家呆，我跟你到地里去。”

“不行，你走不动，明天我和李大娘好好说说。她的孩子不能再骂你了。好孩子!”

安荻的心十分难过。

在暗的月光中，孩子睡了，她走到屋外去, 深蓝色的天幕上浮动着一片片的白云。

她徘徊在荒凉的草原上。

多少悲哀呀! 多少忧愁呀! 她望着那白茫茫的云天，唱不出她一颗思念的心……

秋已老了。

安荻忧愁地踏着薄明，走在草原里，走过了草原便是江岸了。一隻人影也没有。牧人也归去了。江水蒙在雾中，蓝灰色的一隻木船照旧地卧在那里，浪击打着江岸。马蹄草的圆圆的叶子，平铺在水面上。

她沿着沙岸走着，从早晨她便走在那里了。

终于，绿衣邮人走来了。

“有我的信吗?"

安荻向邮差问着。

“没有? 怎么没有呢?”

当她看到邮差的摇头，她忧伤而且失望了。

接不到马华的信使她慌乱了，完全在忧虑中度着日子。

她仿佛在等着他的不幸的消息，在等着灭亡。

她用手揉动着忧愁的眼睛。她仿佛受了弹丸的山鸟一样，紧靠着墙壁，一声不响地坐着，凝视着微弱的灯光。泪在眼里永没有干地流着，咬紧干枯的双唇。

一直坐到黎明，鸡在村里鸣了。

她走下去，打开米袋，她知道麦米吃完了。她拿着杓子在那里发愁。

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喊着:

“马嫂!”

“等一会啊!”

“快点吧!”

“你到屋里坐一坐呀!”

“不啦，三妹子也来了。”

“她不上学吗?”

安荻披上一件夹袄。

“他妈不叫上学了!”

她唤醒了小荻。她揉着可爱的朦胧的睡眼，安荻敏捷地替她穿衣。

“马嫂! 多穿点，今天冷呵” 远处又响来了姑娘的尖声。

“今天等妈回来带东西给你吃，听见没有? 家里没有米了。”

“嗯!”

“听李大娘的话，别想妈，听见没有?”

“嗯!”

小荻习惯了，也不再哭叫了。

安荻走出去了。她从邻家李大娘的窗前经过:

“李大娘! 醒了吗? 我走了，大娘费心照顾小荻别叫她乱跑!”

“还到八里岗子去割麦子吗?"

“不的呀! 到朱家园子去挖白菜，我走了。”

凉风吹拂着飘落的黄叶 草丛上起了些微波。

安荻同村姑娘们并排地走去了。

时光流着，安荻的面容显得憔悴不堪了。

她带着孩子徘徊在江岸上，她期望马华会有一天坐船回来，她的思想已变成了幻想。

“爸! 坐一隻大船回来吧! 爸何时回来呢? ” 小荻问着。

“爸一会就回来了!”

“怎么还不见船来呢?”

。。。。

“回去! 妈回去呵!”

。。。

“妈! 回去吧!”

“死孩子，你要死啦!"

安荻不耐烦地说。

安荻眺望着。

天空弥漫着灰色的云。江上是空漠的波浪。

她眺望了许久，然后走回去了。

教堂的晚钟，仿佛像唱哀歌一样地响着，那声音，深深地刺痛了安荻的心，在她秋霜般的脸上，流下了眼泪。

在门前，她站住了，无力地推开门扉。

她觉得全身在发疼，紧张、空虚……。她的双唇颤抖着。她神经质地在屋里绕着圈子。

她的神经几乎要暴裂了。脸孔随着那不安的沉思变成痉挛的了。

次日，她带着孩子到村长那里去问消息。

她说完了一切，用手擦去眼泪，两手交叠在袍子前面，有着悲痛和庄重的表情。

“这样的事，谁知道呢?”

村长的臃肿的脸上堆起愚蠢的笑:

“也许又和别的女人结婚了吧?”

“不能! 马华不是那样人。”

安荻抗议着。

“不是那样人? 现在的人靠不住呵!"

村长的夫人说。

“一定是病了，或者遇到什么事了。”安荻说。

“也许叫人捉去了，那也说不定。"

村长说。

“这年头说不定呵!”

村长夫人说。

他们说了许多无结果，无办法的话。

安荻的心仿佛在油锅中被煎了。

晚间，她走在屋前，用一隻手抚摸遍了窗沿。仿佛马华仍旧坐在那里一样，她喃喃地说:

“华哥! 你回来了吗?"

她宛如一个幽灵，日光照在她枯萎的脸上。

她痛苦地、昏迷地、发狂地走着。

邻家李大娘跟在她的后面走过来了。

“你听是不是马蹄声?"

安荻倾听着。

“呵! 过去了!” 李大娘说。

“她爸怎么还不回来呢? 不是死啦吗?”

她的眼中泄出了血流。

“别瞎想，瞎说，早晚会回来的! 不是告诉你别哭吗?"

“我的眼睛是不是要瞎了呢?"

“不能瞎，那是上火了，别着急？别哭了!”

李大娘，也流下泪来。

“我的马华呀! 我只盼你回来!”

李大娘叹口气，又自己回家去了。

安荻摸索着走到窗前，她跪下来，嗫语着:

“神呀! 你救救我们吧! 仁慈的神呵! 神! 保佑我的丈夫平安无事吧! 神呀! 我诚心地求你。”

她的湿润的眼睛，闪动着苍白的光，仿佛在梦里一样。从她干焦的双唇，迸出来哀怨的声音。

“神呵! 让我去做什么我都去做呀! 叫我的丈夫回来吧!”

她凝视着前方，她仿佛看到了光圈，仿佛看到了教堂里美丽严肃的圣母一样。

“神呵! 求神呵! 那管叫我死去呢！也叫我的丈夫回来吧!”

在月光下，她的脸越发地瘦削下去。森林中不时传过来猫头鹰的哀鸣，在夜里起了忧郁的回声。

忽然她瞥见一个人影，从榆林里闪出。她的心因为惊奇而悸动了。她想也许是马华么?

人影渐渐地走近了，安荻在月光中，辨出那是一个陌生的人。

“这里是老马家吗?"

那个人问。

“是呀! 你有什么事?”

安荻不安地说。

“我是从XX来的。”

安荻仔细看去，认出来是和马华一同走的犹太人，斯拉其夫。她怔住了，她仿佛意识到什么不幸了。

她把犹太人让到黑暗的屋里，点燃了灯。

斯拉其夫想把马华怎样从山里自己逃跑，和以后怎样流落自尽的消息告诉她，但当他看到安荻那可怜苍白的脸和因为预感恐惧而微颤的嘴唇时，他便沉默了。

过了许久，安荻不敢问他什么，只是悲伤地等着他开口。

终于，他说了出来，他说:

“马华死了!"

安荻的脸上被马华死亡的阴影所遮，苍白而灰暗。她发出骇人的狂喊，眼睛在发光。最后，她昏倒了。

犹太人失色地走过来，用急促的声音唤她，用凉水拍在她的头上。

一点钟后，她醒了。用她凄惨的眼睛望着灯光，从眼角里流出血来……。

一九四〇，九月二十日， 齐齐哈尔

忽玛河之夜

一

听见过路人传来的消息。老处女朱倪思从早晨就在山路上跋涉着了。

黄昏来了，夕阳从山毛榉的隙缝滑在她那瘦白的脸上，她那花一般美丽的青春在忧愁下早已凋落了。她边咳嗽着，边用无力的手拔开前面的灌木丛，在一棵马醉木的树下，她停住了。她觉得胸中异常的热，她频频地干咳着。她的脸由苍白而晕红了，于是血从她的口腔和鼻孔中喷出。赤红的血液，在草丛中渗透流泻着。

耀动着的夕阳的黄金已褪了颜色，全山都罩在蓝银色的雾纱中了，一隻山鹰从山林里，悲啼着穿过，她用两隻颤抖的手擦去嘴边和双颊上的血，然后又开始踉跄地前进了，暮色添增了她的兴奋和恐怖，因为在山边忽玛河岸的养老院中，有遇到逐放和惨运的戴西——她的爱人，在等待着她，当她一想到她快同戴西相见了，在她那苍白枯瘦的脸上便浮现出梦一般希望的光，她忘掉了这十五年的岁月，忘掉了因为忧伤而衰老了的自己，她忘掉了戴西的苦难。宛如在梦中一样她看到了十七年前的一对少男和少女，散步在葡萄林中，唱着初恋的紫色的歌……。

她咳嗽着，在流纹岩上攀爬，从她的额角上流淌出汗水，她的鼻孔加速度的张合，跋涉过了颇长的一段山路终于她到了山那边的草原了。忽玛河在遥远的夜光下闪着银白。她在养老院的门前站下了，她用手敲打着那上闩的门板。狗从门里吠着。

……

“四眼! 呆着，不许你再咬! 呆着!”

有粗低的声音和足音走近了门旁。

“谁呀?”

“我! 从哈尔城来的。”

门开开来，她随着一个跛脚的青年走进院子，跛脚的青年很吃力地跷着一隻脚悲叹着说:

“倒底到了!”

“完了吗?” 朱倪思焦急地问。

“你来得正好，他盼得很厉害。”

二

戴西室的北炕上躺着，戴西的身旁围坐着一些残废者，在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沉默地守望着。

戴西凝视着走来的朱倪思。朱倪思当她看见一个完全变像的戴西时，她惊愕地流下了眼泪。

“西哥，我来了!"

朱倪思去抚摸戴西的双手，然而她，她疯狂地喊叫着。

“这是怎么了，这手?'

她悲凄地哭倒在戴西的怀里。她又抬起头来，她咳嗽着，她又呕吐了血。

戴西试着要说话，然而无益，从口腔里发出些无意义的浊音。

朱倪思开始凝视戴西的脸，眼睛和双颊都在流淌着泪水，她颤栗地感到了惨绝的苦痛。她挨近他的脸庞，凝视着他。他们的泪落在一起了。

一些残废者们默默地也在流着眼泪，不住地摇头叹息。

戴西，他的肺已溃烂透了，他觉到自己快完了。

“西哥! 你觉着什么地方难过?” 朱倪思问。

戴西抬起身来，向旁边一个残疾者激烈地摇摆点动着头

于是那残废者走来，将一隻铅笔放进他的鼻孔去。(因为戴西曾给他们用鼻子写过字)。戴西颤抖的用鼻孔带动着铅笔在一张纸上涂出一排奇妙的字。

朱倪思辨认出那是这样的话:

“我见着你，我快活了，我什么也不要了!"

戴西抛掉铅笔，张开了他的嘴。

朱倪思发现她的爱人已不能说话了。她怔了，如同一隻木鸡一样，不再说一句话。

X X X

午夜，戴西死去了，他用双臂抱住朱倪思死去了。残废者们哭泣着从朱倪思的颈上拉开那僵硬的双臂，他们在暗淡的屋中忙乱地替他穿上了由残废部领来的寿衣。

朱倪思仿佛什么也没有想，然而她什么都静静地想过了，十五年如同一个悠长的恶梦，她象一匹受重伤的猫，蜷卧在一个角落里。没有眼泪，等待着最后的死亡。

X X X

依照残废院的例规，死者立时便施行火葬。

戴西由几个盲人抬出，在月光中，他们前进着。朱倪思跟在他们的后面。

尸体被运到忽玛河岸上了。朱倪思最后的惨痛的哭泣震荡了沉寂的忧郁的夜空。她的发丝零乱了，不住地狂喊:

“戴西呀，戴西!"

不久，在夜的幽暗里燃起了葬火，主事人以坚决的命令将死者抛进火堆中了。

朱倪思走近葬火，宛如一座大理石的神女，静穆地立着不动。

残废者们在火焰旁，伤心地走动着。

朱倪思狂叫一声向忽玛河跑掉了。追赶的人们随着跑来，她已投向忽玛河的激流里了。

灰白色的浊浪吞没了她黑色的发丝。

在梦样的薄明中，葬火也熄灭了。

一九四一，六月十六日若草山下

旷野里的故事

（1）

是怎样辽阔，单纯，寒冷的地带呀！静静的，赤裸裸的，一片辽阔的旷野，什么都没有仅有一条白色凝冻的江川，在日光下发闪。

在旷野的丘陵地带有着一座污秽的肮脏满是臭气的灰色聚落，我便住在那聚落里面。离我的房子不远有一座大旅店，这旅店住满了些流浪的过客。

那正是一个假日，我的房间里有陈希有马健。我们便兴奋地谈起来了。我们谈起战争。谈到缅甸，北菲，吉克佛利德战线，索罗门群岛……。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又谈到了史达埃尔夫人，察杜白里安，大仲马和大诗人雨果。我想起了雨果的哀史，巴黎的圣母寺……。

我感到了一点苦恼，感到了“路还远我已老了”的时不待人的苦闷的感悔。就这样无价值的死去吗？我沈默了。这种苦恼很快的便影响了大家，陈希和马健全都沈默下来了。陈希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子，把头伸向窗外，仰望着天际，他高声地唱了起来！

“多少希望集聚在我的胸膛里

多少好时光过去了

何年何日

我将带希望

去到那遥远

迢迢的

我的故乡

呵！

一个忘不了的地方……”

忽然他把歌声停住了，一声不响，回过头来向我们说：

“你们听狗吠得这么厉害！”

我们都把头伸向窗外，凝视着前方，我们在旷野的远处看到了一群人马，在朦胧的月光下蠕动……。

“是胡匪吗”

“那里会来胡匪！”

我们无声地凝望着，那群黑色之群向着那间燃着一只红色的灯的大旅店走来了“一定是旅行团了。”

“也许是兵队。”

那黑色之群渐渐地走进了。在那间灰色的旅店的门前停住了。他们便住在那旅店中了。

（2）

次日我过到了那旅店中的小老贾“昨夜你们那住了些什么人？”

“马戏团”

果然这灰色的聚落便开始热闹起来了。

突然间我有些不习惯这喧杂的环境因此我很早披着星光便起来了，走到旷野去。那旷野还闪着微笑般神秘的夜与黎明的那种颤动的透寒的光。我在那旷野中走着，渐渐地东方显出了蔷薇色的光闪，然而西方还是庄严的黑夜，我向着前方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迈着步子。忽然我看见一个黑色的影子徘徊在那林子里。

“一定是一个神经衰弱者”我这样想

我选了一块石块，坐在那土堤上了。

那迷茫的旷野的雾已渐渐的消失了。是怎样清新的空气呀！一只雄鸡啼在遥远的村子里。

白昼一来了，我便看见那片旷野里的森林已挂满了霜雪，成了一带银白，凹凸在天边在旷野的四周，展成了一片那么美丽的银林。

忽然我又看见了那徘徊在树间的那汉子走在那旅店的墙外。而且在他的手中握了一把刀子，在太阳光下发闪！

一个恐惧，一个黑色的灾难的预感，沈沈地压住了我，我便离开了那旷野……。

（3）

接连续多日，我没有再到那旷野去了。那日陈希来了，他伴着我又渡荡到那辽阔的旷野去了。

那辽阔的野原已朦遮了夜色，满天繁星，我和陈希望着那天宇，我们研究起来星座。

“哪一定是猎师星。”

“那么哪一个该是薄命的鱼星座了呢”

忽然我听到了一些响动，随着我们便看见那如幽灵的黑色的影子从那片旷野中穿过……

“希！那一定是一个神经病患者”

陈希寻免了好久才看见了那黑色的影子。

“你瞧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我们看见他那把力，在星光下发闪…。我们害怕了，满足恐惧地奔向我们的家。但家已消失在暗的夜色里了，我已看不见我的家，但是在遥遥地我看见了一点微光。我们门前的一只辉耀着的路灯！我们边向着那灯光迈着步子，边回过头去望着那黑色的影子。

那黑色的影子渐渐的消失了。

（4）

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知道我的妻终于在不幸的久病中死去了在遥遥的家乡，这使我悲痛地不想生活下去，懊丧地坐着，陈希他便不离开我的身旁，他硬把我拉去看马戏，这对我简直是一个更大的苦痛的娱乐。但我终于被他拉去了

我们看见了许多奇术，在空中走绳，在马身上跳舞，在墙壁上，在人头上变出来许多东西。真是奇妙的把戏。忽然地从后台走出来一个汉子小丑。他开始笑了起来，他开始抽动着歪斜他各部的筋肉，眼睛，将脸形变成了方的，圆的，像妖精似的三角形的。鼻子缩回去，又伸出来。他巧妙的作着各式各样的面形，伴着他那种各样的怪调子，全场哄动的笑出眼泪来，但我却凝想着死去的她，她是那般为我苦劳过的一个女孩子…。

忽然我听到了全场哄动的开始骚动起来。

“你看那小丑怎么的了”陈希推动我一下。我把视线移到台上，我看见了什么，那卖笑的小丑呆呆地凝视着窗口，他停滞得宛如一个死人，一动也不动。

“这是什么玩艺呀！”

台下的孩子便乱叫了起来，鼓起了那响亮的手。

“他怎么的了”？我向站在我旁边的一个马戏团中的孩子问！那孩子指向那窗口说：

“他看见了阿虎”

我望过去，许久我才辨别出来那便是整天渡荡在旷野的汉子了。

“他不是疯子吗？”我问。

“他是从前这里卖笑的老手。”他告诉我

“小丑作下去呀！”台后的人大声地催侍着他。

于是那小丑又开始了他的笑，是那么狰狞地笑呀。

站在窗口的恶汉，那汉子用着凶恶的红眼睛瞪视着他。忽然胸闷地奔向台去他吼着“杂种，我要你的命”

于是他们厮打成了一团。那恶汉宛如一只母老虎，雄赳赳地，恶魔似的露着牙齿，他们狗一样的匍伏地滚在地上。人们便拥了上去，我什么也看不见。

在人群的吵杂中，我听到了警士们的呼喊。

许久陈希从人群中走回来向我说。

“都打出血破淋漓的！满头是血”

我也实在是为了心中有不可言说的哀伤！我便无顾及地离开了那里。

（5）

失掉了一个曾经结合多年的伴侣，使我病倒了。许多天。我没有到旷野去。

唯一的希望便是盼望着陈希他来。

而马健来了。

“你的试验完了吗？”我问。

“完了”他答。

“在什么地方就职”。我问。

他从裤袋中掏出来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平铺在一条长案上，他一边指着地图一边说

“这是一个顶不开化的地带，荒僻的也许如亚伯利亚，也许什么都没有。没有礼仪，没有文化，人们都猪一样地肮脏的生活着。我就将要到这里去服务。”

“为什么要到那地方去呢，那将是一片死灭的地带。将会使你忘去你的灵智，将会使你停止灭亡。”

“正因为不忍看着我们的血族那样可怜的生活着的缘故，那是很恁久的事了，当我们第一次回国乘火车快过鸭绿江的时候，我带着一颗那么怀恋的心情，爱着那块乡土。我心跳着将我脸伏在窗玻璃上。但火车一过了鸭绿江时，我便看见了那群污脏的人群又愚蠢又无知地懒散在街头。我便感到了无限的痛苦和耻辱…

“因如我不该自私！应该想到我们的责任”我何正在谈着，门便开了，陈希便走进来。他的脸带着一股忧郁而兴奋的样子。

“为什么来得这么迟？”我抱怨着他。

“在那旷场杀了人！”

这消息使我颤憟。

“把谁杀了？”

“是那马戏团的那两个同行者”

“人类，人类该是多么残酷的兽！”马健说。

“那一个被杀了？”我急急地问。

“年青的给杀死了他有肺病”陈希说。

“那汉子捉住了吗？”我问。

“那汉子杀完了人，疯了，坐在旷野不动地狂笑起来！”

这悲惨的信见和陈希一样同样地使我感到无限的感慨。

（6）

在病中，我更想念着死去的妻。我很想到旷野去痛哭一次，我扶着一只手杖沧浪的走到旷野。接连着有许多日，是清朗的冬日。在没有那旷野整日刮着强烈的北风。因此那带丘陵已被吹落成一片凹凸的黄色土壤。

北方的冬天的太阳仿佛一位忧郁的女神，闪动着忧郁的光，灰色的天空胧罩着大地的上方凝冻得无一朵彩霞…。

我在凋落的枯叶的草地上躺着。在一棵树下，我着到了一座新坟。我想起了死了的年青的人，那仿佛是一点露水，那仿佛是一只蓝色的歌。一点雾在旷野消失了。

又是一个夜色朦胧的时候。那群流浪的马戏团在那大旅店的门前骚动了。我伏在窗玻璃上。我看着他们由大旅店走向那旷野去。我一直目送着它们的黑色的影子。消失在旷野的那边。

那旷野便留下了一片寂静……辽阔……。

售血者

一九三九年，我的未婚夫死了。他死在美国的巴尔提摩尔城。不，实际他没有死，他和一个美国的姑娘结了婚。我带着伤痛，从富拉尔基城，为了办理解除婚约的手续, 而到巴尔提摩尔城来了。

是冬天的黄昏，我感到无限的悲哀，于是我便唱着我自己的哀歌:

悲哀的黄昏

寂寞的黄昏

悲哀的旅人

寂寞的旅人

屋子里！

没有燃着的炭火

生命里也没有燃着的爱情。

我望天涯

天涯尽处是流云

悲哀的黄昏

寂寞的黄昏

悲哀的旅人

寂寞的旅人

我正唱出眼泪来了，便有人在叩着我的门。

“Come in——” 我喊。

他进来了，一个穿着教堂的牧师礼服的老人进来了。

我想这一定是为给我讲说痛苦而来的。因此，我意识到我的感觉寒顫， 但是我竟若无其事的请他坐下了。

“亲爱的孩子! 我是奉上帝的命令而来的!” 老人说话了。

我真怕他再说下去，我真怕别人讲说我的不幸。因此我急忙的说:

“我是快乐的!”

“是的! 我知道你是快乐的。你还这么年青，你怎么会懂得悲哀呢! 孩子! 我是为了一个病患者而来的。为着朱良而来的。他快死了，他是以人生最大的不幸来接受他的末日的。他为了不愿向异国人吐出他的秘密，他为了要完成他最后的一篇作品，他便向我再三的要求一个记者，一个中国记者。 我足足寻觅一星期多了，今天偶然在这旅社里，知道我所寻觅的毕竟寻觅着了。孩子! 帮助不幸的人是你的幸福! 这光荣是妳的!”

我的欲念——帮助一个将死去的不幸者的欲念，决非恐怖和羞耻所能阻止的。于是我便很勇敢的答应了。

跟同老人坐着车子，离开巴尔提摩尔城，一个钟头后便到了一个山跟脚下，我们下了车子，步进巴哈尔的谷底。

在巴哈尔的谷底，除了几个捉山鸟的孩子以外，再找不到什么人影来了。

我们踏着长年积累的落叶，穿行在阴暗又潮湿的谷底的小径里。

不久我们便到了一间小小的木板屋，孤立在谷崖底的断丘上，房顶已经有些歪斜了，涂着的褪色的白粉，变成了难看的苍灰。四围的墙壁已坍颓。

“那便是朱良的家了。” 老人说。

我们迈进一扇低矮的破坏的栅门，生长在院落里的植物，都枯落了。

我们很快的进了他那脏破的屋子。在床上我看见朱良躺着，他的苦歪

的脸有些苍白眉毛紧锁，他的眼睛瞎了。他大概听到了我们的足音，他把他那蓬乱的头昂起:

“牧师! 是你吗?”

老牧师用了最温柔最体贴的话安慰了他。并且告诉了我的来临。

在朱良的脸上，我看出了他的如同死亡一般的绝望。

我们没有需要一点礼仪上的形式。 他便开始他的述说，我便开始我的速记了。

“在生命线上全是贫穷的，我和伊丽耐。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在巴尔提摩尔城，在约汉何甫斤输血局的门前，站聚了一群寻找机会的售血人，我和伊丽耐便是那群没落者，没有职业和被生活所累的不幸群中的两个青年。

伊丽耐穿得穷嗖嗖的，一脸倒运的苍灰颜色。她的单薄的袍子和破鞋，使她不能久站在一定的地位。因此她不住地在我的面前走动着，她的饥饿的眼睛在发闪。忽然她向我身旁的一位老水夫说:

“老伯! 你带什么吃的吗?”

“没有。”

“连一片面包都没有吗?”

“是的，什么都没有。”

于是她不再出声了，许久她又在自语:

“没有比饥饿再使我空虚而不安的了, 也没有比找不到工作再使人忧郁而难过的了。”

X X X

第二次是一个春天，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再也想不出方法借到我的学费了。因此我又跑到约汉何甫斤输血局去。输血局的门前已经有一群售血人，在那里集聚一团，在那一团人的中间，我的眼睛悄悄的落到伊丽耐的身上了。她仿佛正在讲什么呢？坐在她旁边的一个老乞丐拍着她的肩，大声的苦笑起来:

“姑娘! 讲吧! 喂! 听听吧! 听吧!听这年青的姑娘会讲出我们爱听的话来，听吧! 那简直是我们怕听的字眼。但，我们却为了听那些字眼觉到安慰。正如我们等待输我们的血一样，兽一般的为了生活，这输血的机运，倒成了我们企望的幸运了。说吧! 有什么可以瞒的呢! 我们这些卖血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瞒的。”

“受苦的人们! 受虐待的人们! 被生活烦恼的人们! 被工作给累垮了的人们……”

“三十七号!”

她没有说完，输血局便喊着她的番号了。因此伊丽耐便消失在输血局门里。

X X X

我和伊丽耐在输血局已经遇到了许多次，但没有机会使她注意我，也没有心思去使她注意我，因此我们永久是陌生的。

一天，我们输血局的手术室中，看护妇从我的臂膀中，抽出针头来，便在我的臂膀上缚绷带，一切手术都告完结，于是我从凳子上试着站起来，我的感觉有些麻木，我的头昏迷，它渐渐低垂下去。我便倒在地板上了。

“拿威士忌来! 鬼们！妳们为什么不拿威士忌来呀!”

在昏迷中，我听到了那战栗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而且我熟悉那是伊丽耐的声音。

上帝就使我们这样的结识了。就这样我们很简单的无条件的同住在这巴哈尔谷底的一间破屋子里。

伊丽耐自愿的担任了所有的女主妇的工作，我也担负了所有的男家主的工作。那时我是在L大学研究史学。她是将从一个高中毕业找不到职业的孤儿。在形式上，在实质上，我们都没有结婚，我们在一起已经住了三年。

然而天知道，天知道在伊丽耐的内心里有什么生长了，她那年青的浓重的热情几乎把她给烧毁了。然而她向我什么也没谈过。除了她给我看过她作的一首诗 “梦的沙漠”外，什么都没有谈过。

一天在晚上，是除夕的晚上，在灯光下，伊丽耐替我缝着破被子，我坐在她的旁边，看望着她的脸，她忽然的哭了。泪珠流落下来，濡湿了我的被子。

许久她问我说:

“我在你的家里是不是错误的呢！”

“为什么要那样想?”

“那么你为什么不和阿玳结婚呢?”

她已发现阿玳在恋爱着我了。

在那次日，伊丽耐便失踪了。

X X X

我寻觅她整整一个月，我已经完全绝望，我的灵魂感到莫大的痛苦，于是我便喝酒了。一天我又去喝酒了，在酒场的门前有几个没落的流浪者，在围着篝火取暖。

我看见一个年青的女人，坐在酒场门前的靠椅上，样子十分懊丧。

“卖春妇! 来烤火吧!” 一个男人说。

“鬼头! 你为什么和卖春妇打招呼!” 另一个男人说。

“卖春妇不是卑贱的，卖春妇是人生的苦难者!”

我听见那女人的声音，那声音刺痛我的心，我知道那便是伊丽耐了。

远处的街巷，响着夜风，远处也有野犬在吠着, 我走向伊丽耐，我喊着她的名字她抬起头来，又低下头去，她沉痛的哭泣在我的怀中，在最大的踌躇后，她终于跟我重回到巴哈尔谷底。”

朱良深深的喘了一口气，他已喘了许多次了，他的声音是哭泣和哀伤。他又接着说下去……

“被人生问题所苦的伊丽耐终于病了。她病倒在床上，快一年了，那是秋天。巴哈尔谷底的密林里，已经有黄叶飘落了，阴暗的谷底，已经给黄叶遮埋。天空，是非常凄凉的景色。

“朱良! 你听外面落雨了吗?” 伊丽耐问。

“不是，那是风从林子里走过了。”

“芙蓉一定给风吹凋落了!”

许久她又说：

“我死了，就把我葬在这谷底吧!”

“不要说那些吧，我给你念一首诗吗? 一首希腊的诗吗？”

“不要讲诗吧，诗是幻想的奴隶!”

“你不是说过吗，朱良用你的灵魂写诗吧，那是灵魂的音响，那是灵魂的芬芳？”

“还是不要讲诗吧，给我讲一个天国里的故事吧。我死了就再也听不到那故事了。”

“妳错了，妳把人生的意义弄错了。”

“人生，人生是泪的种子，是苦痛，灾难，罪恶，错误。人诞生了，恋爱，奸通， 贪欲，泥醉，忿怒，诈欺完了便死了。”

“那么你甘心作一个回想的悲观者吗？”

“是的， 我快从自然的人生观走到自然的人生观里去了。”

她说完便闭上了眼睛，秋天的太阳照在她的脸上。秋天是静寂的，鸟的歌声也是静寂的。伊丽耐在寂静中睡了。

X X X

她的病沉重了，她便意识到她的死了。她躺在床上想了一些事……

“喂!良你为什么不结婚呀?”

“结婚?”

“是的，我希望你和阿玳结婚？”

“不要讲结婚吧! 喂! 在西洋史上你会看出西洋的文明是没有停止的，妳瞧那努力那欲求是没有停止的，结果那努力便遮掩了全世界。”

我为了把话转开，便和她谈到历史上去了。

“不见得，不能全体那样说吧!”

“为什么呢?”

“譬如黑暗时代艺术吧! 譬如造型艺术吧! 不是也停止过吗?'”

“那么从石器时代，到农耕……”

“我难过，别和我讲了。” 她说完便闭上了眼睛睡了。

X X X

我卖掉我所有的衣服，和我的书，替她请个医生，然而医生说她的病，是精神上的忧郁，因此，我便请来了我熟识的一位老牧师。

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我听到她的歌声，待我走进屋子的时候，我看见她倚着窗子替我缝一件破制服。脸是快活的，她兴奋地说:

“人生是在追求着真价值，一个人应当坚强的活下去!”

“是的! 妳快活了吗? 伊丽耐!”

“快活了! 你瞧! 要那忧郁做什么呀? 人非坚强的活下去不行，为自己而活, 为不幸的人们而活呵! 希望！精进! 噢! 朱良!”

“伊丽耐牧师和妳讲了什么?”

“为什么要他讲呢! 我喜欢的是老牧师的善良的心，倒不是他的言语，他永远不会说服我的，你瞧这本书，这比上帝还带着光明的，它启示我怎样去活，怎样为许多不幸者生活。”

医好了她的病的，不是牧师而是一本书了。

X X X

在十二日，我们连一文钱都没有了。许多日子我们就没有钱了，把我们的钱包倒光了，我们各自地从事去找寻一个抽屉，箱子，衣柜的每一个角落。一个铜币也找不出来了，而且我们都找不到工作。

于是伊丽耐走出去了。我守着寒冷，在写一篇毕业的论文。忽然我的心很难过，而且不安起来，我想她又去作卖春妇吗? 我发怒而且我想当她回来的时候，便把他从巴哈尔谷底逐出去，我的思想混乱了，心剧烈地跳动着，再也忍耐不住我的恶魔般的凶相和愤怒了，我奔出去，在谷口的路上，忽然我遇到了阿玳。

“你看见伊丽耐了吗?”

“她到输血局去了。”

X X X

输血局的门前，有一些人，在那纷纷地议论着什么。我仿佛预感到我的悸栗的不幸终于来了。我的脸在惊恐中苍白，待我找到她，她已经死三个钟头了。

“她的输血过多了!” 一个站在我旁边的售血者说。

“我悲痛的领出了她最后的售血费，背着她的尸体，回到了我的谷底。我什么都完了，绝望，死灰，多少迷离的长夜，在哭泣中度过。于是我的眼睛便瞎了。”

我在一边为他速记，一边我听着他的声音的震动和。我抬起头来，我看见他苍瘦的颊上，有泪水在流着，他的颈项在软绵绵地垂睡。

“我的梦完结了，如同那到处飘落的黄叶!"

他随着他幽微的声音，昏倒在床上。

X X X

翌日我再去看他。老牧师正在他的灵前面诵读圣经，是的，他的梦完结了，如同那到处飘落的黄叶……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奈良若草山下

戒

她带着生的灾难，无限的侮辱，惊恐，不安，懦弱，提着裙子，从那充满了朝雾的林子里走出来了。

在草野的风声里忽然听到婴儿的哭声了；那猫似的哭啼使她痛苦而止住了脚步。她回过头去望着那片草野，踌躇的站在那里，突然泪流下来了。是的，那是很使她惨痛的，于是她用一只被血涂脏了的无力的手，拨开那绿深深的草丛，又悄悄的回到林子里去了。

她踏过了那片草野，便在一带阴深的地带里寻到了她自己的孩子，她悲伤的望着那孩子，辛酸的，无所措的混乱了。她走近了那赤裸裸的孩子，弯下腰去将她抱在怀中，那孩子便又像猫似的哭了…………。

雾已经消失了，鸟儿在唱歌，太阳便出来了。

阳光从林子里的缝隙中透过来，于是，便有如斑斓的黄金光闪散落在她的憔悴的脸上了。

她想起了一个过去—一个梦丢失了。她凝视着那片林子，她无言的流着泪。她想起了孩子的爸爸—那残酷的男人。

许久，许久她仰着头，凝视着那片林子，宛如一个痴子，一声不响。但是，突然一个侮辱又落在她的灵魂上了；一个沉重而又无光的疚疾在她的心原上生长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烦恼。

她把孩子放在草地上，便又抛弃了她的孩子，带着哭泣，离开了那片草野。

她走出那林子，在旷野里走着，她心乱极了。突然一个牵挂，一个生命上的牵挂；一种母爱在她的灵魂上如一片红色焰蔓延起来。她无法再离开那片草地了；于是，她又重新回到林子里去了。

她无救的抱着孩子，在林子里徘徊着。她深陷的面颊，烧焦的嘴唇，不住的张动着，从那发出些含混的声音来。她是那般的可怜，她完了。

她完全给忧郁憔悴得如一只秋天的哨子，苍白而枯瘦了…………。

她望着那片林子，她想起了所有——记念在那林子里的一切………哭泣和欢笑………。

那是一片使她受辱的林子，她用着愤怒的眼睛凝视着那片林子，抱着孩子走来走去………发被风给吹乱了………。

她想起什么来了呢，她想起来那逃跑的罪恶的残酷的，她用生命爱过的男人了。

一只她看惯了而且理解过的苍白的脸，映在她的意识中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响来了。那宛如退色的歌，渺茫的响来了。她仍然希望他会找到她，或则他会给良心责备自己回来。她毕竟是太爱他了。她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她想他也许来到这林子里了，但是什么都没有，林子里是一片风声。他怎么会回来呢，他已经是忘掉了一个为他丧失了许多哭泣在秋声中的她，而又是别一个快乐的王子了。

一棵受辱的心是痛苦的，她便不再赞扬恋爱了。不再幻想人类是美丽的了。她忧伤得宛如黄透了的梧桐，凋落在风声中。

她想什么呢，是的，她是一个被侮辱的，被伤害的，被弃了的无罪恶，纯圣的牺牲的女孩子。

她仰望着天宇，在天宇有一片流云。但她什么都没有看见，泪水湿雾了她的视觉，她的脸为哭泣而抽搐地抖动着。

她忆起了那男人的一切诱惑……。卑贱的，兽一样的……。她开始了憎恶起来；她开始憎恶起来自己。为什么会把整个的灵魂轻易的献给那没灵魂的人呢。

她突然的泪流如注的难过起来。

一阵风声，惊动了她，她以为是有谁来了。她因羞辱的恐怖而不安起来。但是草野里什么都没有，她仿佛作了一件怕人的罪恶的事一样，她的灵魂被污辱而压得沉沉的，朦遮得黑暗了………。

她想到她的耻辱，她的一棵受伤的心，已流出了血，使她发疼。

她觉得她的过去的历史，全是死了的怪物，仿佛在恶地狱里，遇到了一个吸血的恶魔，她为了这恶魔丧失了她所有的一切。她交出了许多珍重的眼泪，于是她完了。

后悔啃蚀着她整个的灵魂。她后悔不该接触那污浊的伪善的懦夫。

她想起来他一切的谎骗，她便愤恨起来，眼睛充满了理智坚决的尖锐的光………。

在林子里，她足足的徘徊了一整日。

林子里一切都朦胧起来，一只猫在林子里叫着。

她带着一棵沉重受辱的心，把孩子放在草丛中走出了那林子，是想回去弄点钱，连看看她的母亲。

她不敢把头抬起来。在头上，为了遮避耻辱她便罩了一面青色的纱，但是，她的心是更被耻辱面痛苦了。她仿佛看见了许多面孔在向着她发笑，许多耻辱的眼风落在她的身上。于是她急急地迈着步子，在暗的，而又污脏的小通道里迅速的默默的走着………。

二

母亲正伏在玻璃窗上流眼泪，她的头发，竟为忧虑在两天中就苍白了。

她望见了她失去了的受辱的孩子归来了，她喜欢着说不出话来，仿佛她的生命得救了，但是，她已被那凶恶的父亲给打伤了。

她悄悄地走进屋去，她和她母亲抱住而痛哭起来，为命运而哭着。

眼泪和一阵凄苦的痉挛，塞住了她的一切的言话。然而母亲忽然止住了哭泣。

“小琴！你快走开吧！你父亲快回来了”母亲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的凄凉的哀痛……。

她推开了她的女儿，将仅有的钱塞在她的手里。

“小琴！到远远的地方去吧！然后来信我去找你”她走出了家，母亲将枯瘦深陷的面颊贴在玻璃窗上，遥远的望着她哭泣着。

她低垂着头，心被母亲的眼泪给痛伤得更厉害了。她懊悔地走着，忽然她听见了一声钟，由一个古老的枯寂的庙宇中传出来的。她站住了。宛如得救了一样，拉下了罩在头上的那面黑纱，眼睛放射出了光闪，一种为生而惊起灵之光闪……。而那庙宇的深沉的钟声一声声的还在夜里响着——。她便觅着钟声而去了………。

庙宇是紧闭着的，门洞里只有几个乞丐在那里蹲着，是想在那里过夜。

那些乞丐只有到夜里，只有到庙宇的门前，他们才重新的又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他们坦然了，没有听见谁的辱骂，和驱逐的难堪，他们才开始得到了自由，得到了人生的一切。他们安适的蹲在石阶上，捕捉着藏在破衣中的虱虫…。

她伸出一只手，想去敲那扉黑色的铁门，忽然她想起来留在草地上的孩子了。

但是她在朦胧的灯光上，她看见了一个木标，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

“苦海茫茫回头是岸”

她是那样的受感动的低下头去。

“你想找哪位师夫？”

一个老乞丐，也燃着了一只烟头一边说了。

“不，我不是找师夫，”

“到这里来的师夫全都是自愿的吗？”许久她又问。

“对了，全是看破红尘的！”

她为了生而苦恼着了，她开始在那庙宇的门前走动着。眼睛里充满了烦恼的焦虑的阴沉的光。是的，她想解决一条人生的路，于是苦恼便紧紧的跟随着她了。

她仿佛一个将赴战场上的勇士一样，仿佛在沙场上喝了许多酒一样，为了一种深的苦痛而折磨。她思索了好久，忽然决定了她的人生，她又重新走近那扉紧闭了的门，用手去叩那扉铁门。

“你是敲不开的，这是尼姑院。到晚上是不给人开门的。”

她回过头来，在暗淡的灯光下，她望见了一个青年，面色苍白，正在看着她。

那青年原是一个逃狱的，他也化妆了乞丐混住在这庙门前了。

她开始把她瘦弱的手从那冰冷的铁门上拿下来，她垂头无力的走下了台阶。

秋已深了，满是虫声。

她在一个暗的角落里坐下了。在静夜里，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侮辱又鼓开了她的意识之门。她想起了她将要结束了她悲惨的半生，于是她仿佛肉和灵分离了一样，痉挛的抱着头呜呜咽咽的哭泣起来。

“大姐！你有什么事这样的伤心呢？”那青年用一种极关心的声调问她。

“………”她没有答他。

“哭是顶愚蠢的一件事！顶没出息的懦弱者才哭，眼泪是下流的要不得的东西。有志气的人应该把苦痛，把眼泪变成坚强的意志，那才是伟大的！”

青年的言语，每个字都闯进了她的意识中了。起初她是愤怒，后来她便真的觉得自己太愚蠢了。而且他开始惊奇着那年轻的乞丐；她抬起头来，她说话了。

“你说什么？”

“说什么，遇到可怕的灾难时，应该坚持下去，要勇敢；真理总会有的，什么也不要怕，拿生命反抗一切的损害我们的一切的仇敌，坚强，自信，最后是我们的。不屈不挠的作下去，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为什么要流眼泪，应该坚强地去干我们应干的……”

他那又坚强，又有力的言语，一个字一个字都落在她的受伤的心中了。她望了望那青年，她惭愧的低下头去。是的，什么都是不值得的。那言语击醒了她将死去的意识。

她得救了。“人生是该有点光和色……人生是珍贵的……”那青年又说了。

“我们是有责任的………”

于是一个广大的，光闪的，纯圣的路便展开在她的面前了。

她站了起来，她仿佛一个将从恶梦中醒来的人，生之火焰在她的意识中燃了起来……。

她离开了庙宇向着前方迈去，又回到林子里去，找她的孩子。重新在林子里踏着，风在那片草野吹过，她找寻那被抛弃在林子里的孩子了。

在夜里，她暗暗地在林子中寻觅，但是，她找到了什么了呢？那一片林子里除了一片风声，什么都没有了………。

“被人拾去了吗？或者给狗吃掉了？”

她望着那片林子，宛如站在急流里一样，仿佛一丸弹子落在她的身上，使她受伤了……。

她在那片林子里寻觅了一整夜，终于她什么都没有也寻到。

于是，她的血冷了。

黎明将近，她的眼睛放出了一股理性的尖锐的光，走出了那片草野………。

传尸病患者

结核菌侵进了人们的身体，它便开始在人们的身上繁殖起来它的毒素；使人们的细胞凝结而死亡了，这种细胞的死亡逐渐的形成了大量的死亡之组织……，于是人们的肺子便变成了干酪，变成了巢穴，开始溃疡，血管破烈了，于是病患者便大量地咯起血来……，使患者渐渐地走入了坟墓……毁灭了……一生便完结了。

× × ×

许多年前，在荒漠的×县城东边一块地带，建筑起来了一座为穷人们治疗的赤十字医院，那真是有救于一些没钱的有病的受难者们的好事。然而战争开始了，那些传教师们和那些医生们便都迁移到印度去了。留下一片空房间。但是那医院仍然的由着一些爱人类善心的×县城的人们，继续了那救人类的工作，他们继续的诊疗×县城的所有的不幸的病患者们了。

一九四三年，我病了。于是我便住在那座赤十字医院的最低价的三等病室了。在那大房间里，我们混同的住了七个这样为结核菌而苦痛的病患者们。

那大房间里，一共有三十个病床，白色的墙壁悬挂着几副善慈的基督施药与病者们的宗教画，靠我们病床的那扉墙壁，贴着一张体温表和一张时间表。黑色的大字，写着我们这些病者们的一天行事：

上午

六时半 早餐

七时 检查体温

八时--九时 验病及治疗

十时半至十一时半 静息

下午

一时--二时 消遣

二时--四时 静息

四时 检查体温

五时--六时 晚饭

七时--八时 消遣

就寝

其外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的房间充满了忧郁的气味，是的，无论是谁得到了这致命的传尸病症，都会感到一种生的忧郁的……。病了的人们好像一隻狗似的倒在床上，期望着一些安慰，但是有什么可安慰我们的呢？我们宛如住在水晶宫中一样，静静地和世界隔绝了………。

我整天的依着窗子，望着窗外，在那里瞧着。但是我能瞧见什么呢，仅仅是一些悲惨，一些呻吟的苦痛的病患者被抬进来了；有一部分幸运者被医好了，又出了院，但另外一部分便死了。也许在清晨，也许在黄昏，死者便从这里抬出去火葬了………。

× × ×

肺病患者们是需要严格的静息的，所以我们都闭着口，默默的不说一句话。这静默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可耐何的寂寞。我是那么渴望听听人讲话，听听音乐。我渴望着能刺激我的一些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我被囚在这病床上，一切都隔绝了………。

一天，我们都在静静的躺着，我们为了太寂寞，我们便狗一样的灵放了我们的听觉。我们都听见了有人踏响了那通道。

“你听有人从通道走来了！”

于是我们这七个忧郁的病患者便高兴起来，将我们的眼睛都注视那扉绿色的门，等待谁来敲我们的门了。

果然我们的那扉绿色的门被推开了。睡在门旁的一隻黑猫被惊跑了。

一个神经质的羸瘦的青年，穿了一身青色的学生制服，有些褴褛而且不合身。一位沉默的女看护扶着他走进来了。

生活太枯燥的原故，因此一点点的变换便会带给我们一些生的温暖和生的兴奋。我开始获到了一点安慰，我不转眼的用着孩子的天真的眼睛瞧着这位新病患者了。

他住在我的隔床上。

“先生！你觉得怎样？”看护问。

“我的肺部有些湿杂的痛！”

× × ×

他的一身穷破，那贫寒苦折的样子却诱惑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些穷苦的人们，总是要发生一点感情，一点关切的和崇敬的同情的好感。

“你贵姓？”我问。

“姓范。”

“家在那儿？”我问。

“没有家。”

我从他的服装和他那脸上的严肃的灵智的样子，我便知道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

“在那里读书？”我问

“北大，地学系。”

“我也是一个学地理的！”

他用了一双热情的眼睛望着我，我仿佛是为了同行而感到了一点更密切的相通一样，许久他说什么研究起来都够有趣。

但是他的声音是那样的气闷，他的面颊赤热，在他那智慧的沉默的脸上出了一些盗汗。

“这里气闷极了！”他说。

“你觉得胸部闷痛吗？”我问。

“是的，胸闷痛，周身虚懒，疲乏，我的肩背部都觉得酸…”

× × ×

那一夜，我睡得十分不安静，时时的给他的梦语而惊醒。

“一隻没灵魂的狗，又愚蠢，又卑贱…。”

他骂谁呢，他一定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一个了。

“有什么呢，死………”

他的语音焦燥而含混，我知道他也是有着深沉痛苦的一个青年了！

× × ×

次日六时，我们都起了床，他也醒了，他的脸更憔悴了。不时的干咳着，脸红烧起来。

早餐每人一碗高粱米粥，一块豆腐，一块黄瓜。

范先吃掉了拿块黄瓜，就不再吃了。

本来我们这些中结核毒素的人们，全体的肌肉都给那细菌侵蚀，结核毒素伤毁了我们的消化官能，我们体内的脂肪便逐渐的消失了，因此我们的肌肉为之而枯消，羸瘦起来…。我们应该吃些多量的蛋白质，和脂肪质的肉类，牛乳蛋类等…。但是我们这三等的羸瘦贫穷的病患者们，是不能那样的讲求了。因此三等病室的传尸病患者该是最羸瘦，最苍白，现出一副最可怕的脸像的人们了。

× × ×

范，他闭着眼睛喘息着，气有些急促，嘴唇有些发紫，虚弱使他难以支持，我们真的怕他是急性结核肺大叶炎了。

为了实行卫生呼吸疗法，因此门窗都洞开着，让新鲜的空气在那里流动着。

我们这些为中结核毒而枯消的身子都藏在那病被单里，我们真瘦得可怜，仿佛一把骨尸似的只剩一个大的骨髅似的头颅躺在病床上。

我们这些病患者唯一的生之盼望便是大夫的验病和治疗了。我们都把眼睛不时的凝视着那面墙壁，墙壁上的那隻挂钟了。

范的体温到了法伦表的九十三度。

他常常的向护士们要一些水，湿润他的喉部，因为他咳痰太多的缘故，他出了许多的盗汗。

我们终于把时间盼来了。时钟孤独的，静静的敲了八下。

我们这些忧郁的病患者们都需要大夫来，向他求救一样的等待他来。

不久，我们便听见大夫踏着通道走来了。

我们的这间混合病室只有在验病的时候，是充满了生的温暖的气息。我们像得到了阳光的鸟儿一样的快活起来。

大夫照例的是从北床验起，向西转来，验到我的病床来了。他轻轻的用诊病器听了听我的肺病。

“怎么样？你觉得？”

“还是痰太多，大夫，给我点益母体吃吧！”

“也好，吃点益母体吧！”

随后便转至我临床的新病患者的范了。

大夫又用大力显微镜检查了一下他的痰，知道他是急性的肺结核了……。

②

头七天，范他一直是躺在床上的。新入院的肺病者全是这样。

那沉默的女看护不时的用着她那星星一般闪烁的眼睛瞧着范。

“这小丫头恋爱着范了！”一个病患者这样讲了。当那沉默的孩子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便谈论起来范的幸运了。

“不要胡说，我是不能恋爱的！”范总是板着脸孔辩别着。

但在沉闷如死一般的病患者们的生活，是需要一件喜剧发生的。仿佛我们期望那是一件事实了。我们认真的讲着………这件事引起了我们许多兴味，仿佛添满了些我们的空虚………。

一天我和偏侧肺病者阿秃和骨痨兼慢性肺病者盲人到河岸山丘上去施行日光浴了，为着我们想增加血色蛋白，增加血白细胞嗜食细菌的能力，为了解痛，使伤处成干结痂的缘故，我们便常常的作这种日光浴的治疗了。

我静静地望着那掀起波浪的蓝色的河，风吹撫着我的头发。我感到了一种平静………。

那骨痨的慢性肺病患者，正用盲人打字器在一些硬纸上打着字眼，他正给他的老师写信告诉他的老师他的病状。

“你怎么样？”

“不好！头晒得发昏！”

忽然身旁的阿秃推了我一下说：

“你看，来了一对野鸳鸯！”

“什么，你说什么”我从心里讨厌他这愚蠢下等的字眼。

我望过去，我看见了范和那女看护他们从静静的河岸走来。经过了那清润的一片绿意染遍了的河岸密林和旷野走来了。

范因为是急性肺痨，怕使肺炎肿，血管充涨的缘故，因此范便在密林的尽端的一棵樟树下坐下了。

我们全是躺伏在砂丘上的，因此范并没有注意到我们，而他们的坐位恰好离我们很近。我们足以能很清楚的听到和看到他们的一切。

阿秃和我紧紧的把脸压在砂石上，我们把头侧着是偷听些什么秘密，不，那时仿佛我不是为了要作那么不道德的事，而是为了关心他们而有了那种举动的。

他们首先谈起了那条河水，谈起来关于河岸的故事，谈起密林，谈起来童年，便又谈起了他们的身世来了。

范说：

“一年以前的今天，我在清晨给爸爸烧了纸，两年以前的今天便是爸爸惨死的日子！人生啊！遥远的梦境。”

他又接着说：

“我那么恨我的父亲，父亲吸大烟，胡闹，抛弃了我们。母亲完全是一个被弃的，被侮辱的一个，因此母亲把我扔给外祖母，母亲便去作了奴隶。！你不觉得耻辱吗？和一个奴隶之子要好？。”

“你不要说那话，我的父亲也一样，是用血换饭吃的。”

范又说下去：

“我的母亲一直作了二十年女奴，现在还是。我不敢去看母亲。我一看见母亲给人们支使的情景，我母亲到无限耻辱的苦痛，我恨我的父亲恨极了。父亲放浪够了回来了，他吸着更深的大烟。还带来一个走念的孩子回来了，我正在北大读书。（是的从小时候我便是一个极苦的孩子，没进过小学，在平民班学了几天后来便自修，没念过初中，高中便是官费，北大也是官费。因此救了我这穷孩子）。父了亲来父。正是一个秋天。我的棉袍便都给了父亲，父亲穿了两天便把它都卖掉了。每天有些不三不四的.破烂商走进进我们的房屋。不久我们的屋子什么都卖掉了。连我读书的桌子也卖掉了。我和父亲便从此反抗起来，父亲要杀掉我。”

“没有一点生路，父亲便做了黄包夫，我真不忍看父亲那样子，一个扎吗啡的黄包夫的父亲带给我许多耻辱和损害，因此我沉默的堕在不幸的生活中，我整天吃着什么，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很容易吃到些回头，但我还是每天吃着杂货米粥。我的肚子往往是饿着的…惨极了。”

他咳嗽了一阵，又说：

“两年前，我正在琴室里弹琴，便有人找我，我走出校门，原来一个警察他向我说：“范达生是你的父亲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时一听到了父亲的名子，我便感到了一种刺心的痛苦，我的脸又好便红商校又头俯着，我承认了那是我的父亲。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告诉我：“你的父亲出了一点事，需要你到西单去一会。”我随他走出了校门。他才告诉我，我的父亲死在西单了。惨极了，父亲死在热闹场所，身上盖着一面席子，旁边便是他整日拉的黄包车。当天我没有办法，没有钱把父亲装到棺材里去。那夜我便在街上守着父亲的死尸过了一夜。我又害怕，又孤独无救，母亲那时还在远远的青岛。我怕天落雨，濡湿了我死去的父亲…唉！真惨透了………”

那女孩子的眼睛从不离开他，看着他的嘴唇。而且眼泪停在她的眼中。突然的她捉住了他的手说：“范！你太不幸了！”又说：

“范！你知道我吗？我也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不过我向来不诉说我的不幸，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了解的话，那是一件轻松，但不了解的话，对人讲自己痛苦将是一个最大的耻辱…。”

“是的！”

“范！更苦痛的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生。”

范被他的话而感动了，他用了热情的眼睛望了望他激动的说：

“对了！我们应该！努力…显达…进展…复仇………。”

如是她们都又面向了那闪发亮的河水，静默起来：女孩子依然向远方望着，似有所思的不转动她的眼睛

“你想什么呢？”

“我想一个勇敢，一个遥遥的跋涉…”

“这是什么意见呢？是想离开这里了吗？”

那女孩子转过头来，点了点头说：

“我希望你好好的养病，健康起来，也离开这片死寂的草原，我明天的车，所以今天来见你…”

范若有所失的沉默了许久，悲哀的谈：

“祝福你！”

天色已经十分的晚了，我便离开了那块沙滨，但是他们还留在那里谈着，夜色朦胧了一切………。

× × ×

自从那天起，那女孩子就不再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范现于孤独的状态，我们这些病患者也感到了一种寂寞，仿佛失掉了什么，我们将要寻到它一样，在我们感情上仿佛都有了不可医治的渴望的寂寞与空虚………

× × ×

到秋天，落叶的时候，范的病势忽然沉重了，他常常同大夫说：

“大夫！我这里面痛，一定是肺子烂了！”

“你应当安静些！你有什么挂虑的事吗？”

“我想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他虚喘的出了许多盗汗，手足有些胖肿了。因此在那天大夫又给他施实了人工气胸手术治疗。

“把人工气胸箱和胸针拿来！”一个大夫向看护说。

于是那看护拿来了。但又忘掉了碘酒和麻药。于是他又去取碘酒和麻药。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大夫向范说：

“把胳膀抬起来！”

范很吃力地抬起来他的胳膀，他闭上了双眼，静待着医生给他行一切的手术。那位大夫在他的腋下先用碘酒搽了搽，便注射了2cc的麻药。气箱上的水表的负压力到了3cm时便开始给他向胸内注气了。注射完了医师向他说：

“你感到怎样？”

“有些疼痛。” 他说。

在他的脸上显出异常沉痛，苦涩，闷涨的样子。

× × ×

我们全是一样，结核菌，在我们体内生长繁殖……而杀菌素在我们的体内扑杀，使那些死掉的细胞复活起来，于是我们便感到痛苦了。

③

肺病患者，是需要静养的，但是我们的多感的范被一个欲念，一个铁火般的意志而使他焦燥。他常和我说：

“石！我真怕我不等迈向我的前程，我便死掉了，这可怕的疾病，将要永远的使我堕落吗！石：这不景气的病日子，死去的也好！”

“范！你要健康，你非克制你的感情不可，你应该远观些，你应该冷静！”我向他说。

“我知道，我仿佛什么都懂！而且比自己更应该想到的是我有一些责任。我应该坚强的活下去。然而我的肺异常的疼，这尖锐的感觉，使我全身发热，而颤慄。人家都有健康，我也需要人性中的一切……啊！如今我知道健康是生的唯一的武器，病了什么都完了！”

我们是那样的期待着我们健康起来，但是我们的身中的结核菌是不尽的在繁殖…。我们只有后悔我们起初没有医治，是的，我们这些人也全都不把病放在心上，其实我们也无力量来顾及我们的病…。但是待我们想医治了，而是我们再也没力量支持重病在床上的时候，于是我们才带着要死去的病来至这不十分讲求的穷人病院里来了。

× × ×

范一天比一天沉重了。他那沉重的呻吟使我们另外的七个病患者却感到了一种哀伤，我们都是些无人照顾，而贫穷的病患者，因此我们的悲哀宛如深渊的潭水，只要是一般浅淳的钟声，也会使我们悲伤起来。

我悄悄的寻问护士。

“范的病怎样？”

“怕不行了！”

“怕不行了，这话是真的吗？我问的是范！”

“是的昨晚大夫看了之后便发起愁来。”

这死的消息，使我恐怖而感到寒冷，我凝视着范，他闭着眼睛喘息着，那羸瘦的样子使人伤心。

我们这七个，都宛如被死神捕掠着一样，都感到了一种阴郁……。

因为范病重了，大夫便来了。

范苍白的无力的向大夫说：

“大夫！我要看看我的母亲！”

“是的已经打电报去了！你静静的养着。不要害怕！没有危险的，静静的养着吧！”

他又大量的喀了许多血。于是他闭上了眼睛，仿佛是死了一样。许多时间才又睁开了眼睛，用着凄凉的低声向大夫说：

“大夫快给我打一针强精药针，叫我多挺一些时间。我等着看看我的母亲…。”

“不要怕！静静的！不要焦虑！”

“大夫！我知道，我不会好了！我只希望看看我的母亲。快给我打一针强精针…”

大夫服从了他，给他注射了一针。随后把看护叫了出去，他们在门外低低地说了许多时间话。又转了回来。

× × ×

夜晚的时候，看护便和范说：

“这房间太乱，你须要安静的修养，一会搬到二号病室的单房里去吧！”

他快和我们隔绝了，我们便知道他的死已判决了………。

很快的范便被抬出了这混同的病室了，我怕激动他，我没有流眼泪，但他用了含泪的无光的眼睛望了我们，他的病床便被抬出去了………。

那一夜，我们像被损害者一样，像被命运摈弃者一样。悲哀的阴影是我们更感到了黑暗，我们沉默着，沉默得一声不响………。

我没有睡，静静的坐了起来，面向着窗子，把头伸向窗外，我凝视着那第二号病室。但我看见什么呢？那里只是静静的，窗子静静的开着，燃着一隻暗淡的灯………。

× × ×

悲哀和挂虑使我的热度增高，发起烧来，又喀些鲜红的血，于是我再不能坐起来了。

我不时的向护士们问

“范好了吗？”

但当我第四遍问及的时候，护士便向我摇了摇头。

“死了吗？”

“死了！”

我用了最大的气力，挣扎的坐了起来，我向着二号病室望去，那已经再没有灯光在闪了，暗暗的……。

血族

隔离病院的门前，停着一辆汽车。

哥哥扶着妹妹从病室中走出。妹妹苍瘦的脸和一双无光的眼睛，她病弱得那么可怜，不住的在石子路上打着晃。

哥哥满面的风尘，因为他是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的。

兄妹默默地走向门外，在汽车前停住了脚步。

车夫正在修理一件车上的机关，他一边扭动着发动机，一边向登进车厢的兄妹说:

“真是命大，几个进过病院的都是死着出来的。”

哥哥瞧了瞧病弱的妹妹，心中十分喜悦，也异常的难过。

汽车夫修理好了发动机，就将车子开驰向前面的一条大路上了。

在哥哥苦笑的脸上浮动着苦涩的微笑:

“连他也这样的说呢，你活过来真是幸运呀!"

妹妹靠着车背子，她感到有些寒冷，因为她病得太久了的缘故，她耐不住一点风寒了。

“我有些受不了，这风太硬了。"

妹妹望着那掉了玻璃的窗子颤声地向哥哥说。

哥哥伸出一只粗黑的大手，将自己的破大衣脱了下来替妹妹披上了。

妹妹向窗外望去，她看见街上的行人，全都是那么的健康，新鲜，明朗，喜气洋洋的走着路子。

“人们都是那么的快活!"

“唔……”

他仿佛没有听见妹妹在说什么似的哼了一声，便在膝盖上展开了一个破布包裹，那里面装着一些煮熟的土豆，递给病弱的妹妹了。

“吃点吧!”

“不，我什么都不想吃。”

“半夜三点钟就从八百垅出发了。”

哥哥低着头贪婪的吞食。

“嫂子好吗?”

“孩子一天把她快累死了，照从前瘦多了，也老了!”

“小茉莉好吗?"

“没有奶吃。”

“茉莉的哥哥不是因为没有奶吃死了吗? 这一个可别马虎了。”

“不马虎又能怎的呢?"

汽车闷的一声在车站门前便停下了。

哥哥掏五元票子，他道歉的向车夫说:

“太对不起了，没有更多的钱了，不然就多给你几个啦。”

哥哥扶扶着妹妹走下车向票房子走去，哥哥用手扒拉着拥挤的人群喊着说:

“借借光，借光。”

妹妹踉跄的跟在哥哥的后面走向三等候车室了。座位也没有，哥哥就把包裹放在地下，替妹妹做了一个座位。妹妹无力的倚着墙壁坐下了。

“你坐着等一等我去买票。”

她因为病得太久了，极度的衰弱，她觉得头有些发昏了。她倚着墙壁紧闭着眼睛，她想，六个月了，也许是没有人关心她已病得这样了吧? 思想使她感到了无限的忧伤……

哥哥买来票，就倚着一个角落里坐下了，烦闷的燃起一支纸烟。

候车室的壁钟到了三点。候车室的扩大机放送了。

“XX行的列车，请到三号出栅口排起来，不久就要剪票，请注意: 往XX行的列车……”

哥哥扶着妹妹走出候车室。

出栅口处拥挤着许多背着包裹的旅客群，乱嚷嚷的吵个不止。

妹妹被挤得几乎要跌倒了，她颤声地喊:

“别挤我呀，我有病。”

“这位老太太借借光，她有病，给她让个位置不好吗?”

“老太太，我病了。”

妹妹也恳求般地说。

“病了吗，看样子是病了呢，颜色这样的不好，就站在这吧!"

老太太让开了一个位置给妹妹了。”

“小妹! 你把东西放在地下，站不住，坐着等车吧!"

妹妹便无力的坐下了。

“这姑娘病得把头发都脱落了呢!"

“是的。她得了一场大病，差不多死了呢! 我从病院将她接出来的!"

“打算往哪去呢!"

“回XX去。”

“不要挤呀! 我有病。”

大队里又拥进了许多人，使妹妹喘不上气了。

“姑娘! 你得站起来呀，不然一会就被挤出去了。”

妹妹便站了起来，哥哥看一看时间还早，就走到卖店去了。他想替妹妹买点水果在火车上吃，但是掏掏衣袋，只有三块钱了，他又空着手走回来。

开始剪票了，大队拥动着。

“小妹，出了票口，我先跑上去找座，你慢慢走，小心别跌倒了。”

大队拥出了出栅口，便都向停着的列车跑去。

妹妹一个人慢慢的落在后边了。

妹妹赶登上车，在一个车厢中，她找到了哥哥，他们便坐在靠北边的一列车厢中了。

妹妹无力的倚着车窗在休息，她感到异常的疲倦。

哥哥将将包裹放置在车架上，他有些热了，敞开制服，于是黑脏的脱掉纽扣的衬衣就露了出来。

车厢对面的朝鲜人也热了，就将窗子打开了。

风吹进来。

妹妹用手挡着她的前额，向哥哥说:

“三哥! 我有些受不了这风。”

哥哥就把座位换过来了。

车在绿色的原野中穿行着。

哥哥看着妹妹那难受的样子，向她说:

“小妹! 你倒一会吧!"

妹妹的瘦骨骼被硬的车板硌得有些发痛，于是她便在哥哥的身后躺下了。

黄昏时候，就落起小雨来。

火车怒吼的进了XX站驿。

哥哥伏向妹妹说:

“小妹! 我先下车去找马车，你慢慢的下吧，小心别跌倒了。”

车停在站驿了，人们喧哗的拥挤的下了车。

妹妹落在人群的后面，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动着。

那时下车的人几乎都走尽了，她才移出了出栅口。

雨已住了，她无力的掩紧衣襟在风中打着寒颤。

许多从后边走来的男人、女人都赶过她的前面了。夜雾迷蒙着，找马车的地方站了许多人，她在人群中找不到哥哥，只好衰弱的坐在一个角落里休息。

许久，哥哥从三轮车的行列走出来，向妹妹摇着手喊:

“小妹! 我在这里呢!”

妹妹走过去。

“已经没有车了，这是同事找的车，让给我们坐了。”

哥哥就将妹妹介绍给一位站在车旁的青年了。

“这是家妹，我今天才从病院接出来的，她病了半年多。”

妹妹向那青年说:

“太对不起了!"

“哪儿的话呢!"

妹妹坐上了三轮车，哥哥喊:

“把这钱拿去!"

妹妹握着三元钱，向哥哥说:

“你怎么办呢?"

“我走着回去。”

妹妹的三轮车向前面的一条大路驰去了。

哥哥落在后边，疲惫的跋涉在泥泞的夜道上。

妹妹的车在夜街上驰跑着，那全是去年走过的熟悉的旧道，每个角落都给她莫大的感伤，她用眼睛望着那些旧街道自语:

“我又活了，又重新的见到这些了。”

松花江的波涛，临江的街房……

她瞧瞧自己，自己消瘦的样子。用一只瘦手搂了一下她憔落的发丝……

车子走到八百垅的时候，她便听到那旷野响着一片蛙声……

“已经是夏天了吗?"

老车夫喃喃地答:

“五月啦! 小姐! 还有多远路呀?”

“这条路子我很熟，但是我却看不清这是哪儿了。”

“前面便是火车道了，再走走便是柴草市啦!”

“过去火车道，那排红房子的近旁就是了。”

“站下吧!"

车停在一个长满芦苇的门外。门前面有潺潺的流水。一座灰色的灰砖小房，仿佛没有居住一样宁静的无一点声息，也没有灯光……

院落里响着一片寂寂的虫声……

妹妹走下车子，向里面喊:

“三嫂! 你睡了吗?”

嫂子搂着孩子，并没有睡，她听到了妹妹的声音，推开孩子说:

“你听，老姑回来了!"

她走下去替妹妹开了门:

“妹妹，你好了吗?"

“我又活过来了。”

屋子黑黑的，她嫂子看不见对面的脸相。

“怎么没有点灯呢?"

“老也没有倒出钱安电灯。”

嫂子燃一根火柴，点了一盏豆油灯，屋子便放亮了。

妹妹爬向炕上，看见了小茉莉，那孩子撅着屁股爬着，仰着头凝视着

新回来的姑姑。

“嫂子! 快给我倒出一个地方吧! 我有些耐不了。”

嫂子在炕头上将破褥子铺好，妹妹便躺在上面了。

在幽暗的灯光下，妹妹和嫂子相望着。

嫂子伏向妹妹的枕旁惊疑地说:

“怎么瘦成这样子了呀?"

“嫂子!,我差点儿喂了狗呢!"

“已经不像你了呀!”

“我想: 我不会再和你们见面了，就那样和人间没有说一句话的死了!”

妹妹用疲倦无光的眼睛瞧了瞧嫂子。

“三嫂! 你再靠近一点，我看看你。”

许久她又说:

“你怎么这样老了呢?"

“怎能不老呢? 生活把我弄完了。”

“小茉莉也长得那么大啦，茉莉你过来，你认识姑姑不?"

小茉莉看着病得可怕的姑姑，含着眼泪仿佛想哭了。

嫂子拖着破鞋，拿着油灯走到厨室去，她在暗黑的厨室里伸出只凸

露青筋的手，拿着斧子劈着劈柴，在锅底燃着了。

“鹭获呀! 把门开开!”

门开了，哥哥走进来，他疲倦地问嫂子说:

“小妹回来了吗?"

“一个多钟头前便回来了，她在躺着呢。”

饭好了，嫂子轻悄地摇着妹妹的一只骨头的手:

“小妹! 起来喝点稀粥吧!"

妹妹蒙蒙地醒了。

哥哥吃着高粱米红饭。

妹妹吃着黄色的粟米。

“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哥哥和嫂子都这样的瞧着病得可怜的妹妹叹息着。

夜里，孩子哭，嫂子便醒了。

妹妹并没有睡去，她很久便在失着眠。

“孩子怎么的了!”

“孩子胃不好，夜里就肚子痛! 你还没睡吗?"

“没有! 嫂子，我一想到爸爸我就难过。”

“想爸爸做什么呀?"

“爸爸不是也病了吗?"

“谁告诉你的!”

“三哥告诉我的。”

“你三哥顶不好了，我还嘱咐他别告诉妹妹，因为妹妹病将好。”

夜是那么长，妹妹觉得身子很难过，不住的在呻吟着。一只猫从她头上跳向地下去了。

早晨晨光从玻璃窗透进来，妹妹醒了。那时哥嫂都醒了。

“小妹!你好了吗?"

“很好，我算知道了，还是家里好，下半夜睡得很好。”

孩子不住的哭泣着。

“小茉莉!姑姑有病你不许闹呀!"

哥哥就将小茉莉背了出去，不一会又从外面背进来。

“小茉莉，你好好的，爸爸得喂小鸡了。”

″哥哥因为生活，他买来十只小鸡，预备下蛋好卖掉换些青菜吃。哥哥一边喂着那棉花团似的小鸡，高兴地说:

“六个月就会下蛋了。”

哥哥喂完了鸡，便戴着油污的帽子上班了。

嫂子在替孩子洗脸。

妹妹向嫂子说:

“卢先生结婚了码?"

“听说订婚了。”

“六个月什么都变了。”

“你是不是有些后悔了。”

“没有，我决不会轻意就结婚的，而且那时我绝对不能结婚。”

“真是错过一个好机会呢。家产、人品什么都很好。”

“那并不是我所希望的。”

“鹭荻! 把门打开呀!"

哥哥端着一个大木箱子，里面装满孵出的小鸡，唧唧地叫着。走进屋

子，他把箱子放置在炕上。嫂子望着那木箱子吃惊地问:

“你疯了吗?"

“又买来一百，这小东西，到秋天就给我们下蛋了呀!"

“你等着吧!"

“这就是一笔大财呀!"

他一边摆弄着木箱子中的小鸡，一边叽叽咕咕地自语着:

“这就是公鸡，这就是母鸡，我一看屁眼的凸凹就会看出来的。”

嫂子看着那些鸡就不高兴起来了，她就讨厌给她找麻烦的工作, 因此她不满地闷闷生着气。

“什么公的，母的，我问问你，你买来那些给人钱了吗?"

“赊来的。”

“动不动就赊，我看你拿什么给。”

“拿什么给，也不能拿你去还。”

“你说什么，难为你说出口来。”

哥哥小心翼翼地瞧了许久那白色棉花团似的小鸡，看一看表已经下午一时了，他又抓起帽子戴在满是灰尘的蓬发上，走出去了。

哥哥走后，嫂子就不住的叨咕着:

“穷光蛋竟想发财。”

妹妹坐了一会有些挺不佳，就又躺在破褥子上了。

小鸡不住的在箱子中唧唧地叫着。

一百个小鸡使哥哥忙乱起来，哥哥把整个的精神注意在他的一百个小鸡上了。很早的他便从被窝爬起来给小鸡弄食了。

每天他忙得很迟才肯休息。

妹妹向哥哥说:

“什么时候了，还不上班呀?"

“我得把小鸡喂完了才能去。”

每天哥哥喂完了鸡，就将木箱子从屋内搬到院中的窗前的土台去。临走的时候他总是一样的嘱咐着嫂子:

“你要好好地看着这些鸡呀!”

每天午间哥哥为了那些小鸡得从会社跑回来。

嫂子问他:

“你饿不?”

他总是摇着头说:

“我没有工夫吃了!"

哥哥从街上买来一本养鸡法，每天，上班下班都将那本厚书放在破衣袋中。睡觉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枕旁，守着睡着了。

日子滑过去许多，小鸡一天一天的长大了。唧唧的叫声也大了起来，那声音使妹妹异常的烦恼。

“嫂子，把小鸡拿一边去吧! 我心有些发焦。”

“不行啊! 你哥哥说养鸡法上说这是电气孵出来的小鸡，最怕着凉的。”

妹妹一点也没有办法。

妹妹躺在炕上，她想了许多好吃的，但是她知道哥哥是没有钱，自己也没有钱。

每天，哥哥很早的起来到鸭架去取回来两个鸭蛋，每天当他拿着蛋，从外面走回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高兴地喊:

“这鸭子真添乎人，一大一个大蛋。”

他拿回来蛋就向嫂子说:

“把这蛋煮了给小妹吃吧，她是需要养分的。”

嫂子每天就把蛋给妹妹煮上，妹妹每天辛酸的吃着那鸭蛋，自己吃半个，分给小侄女半个。

小鸡一天一天的大了，然而每天就有死亡的发生了。

哥哥开始对那些死亡的小鸡有些难过了。但他总是在安慰自己说:

“死的，都是些先天不健康的，一定是蛋黄没有吸上去的缘故。”

哥哥把死了的小鸡，用力将内脏解剖开，他精细地观察了许久，高声向嫂子喊:

“我说的一点也不错，果真是没有吸上蛋黄的呀!"

“你瞧着吧! 死了这几只算什么呀?"

“我一定叫他剩下九十多只。”

“九十多吗? 瞧着吧，五十就是好的。”

嫂子习惯了，无论哥哥在说什么，她总是想驳倒他，仿佛是仇人一样在反对着。

连天的阴雨。

小鸡便无法拿到外面去了，都留在屋子的地下。潮湿的土地，使那些怕冷的小鸡缩着脖子集成了一团，唧唧地叫个不止。

哥哥从班上回来，就看见那些鸡中有的闭着眼睛、不爱走动的鸡了。他有些焦急，抱怨起嫂子来:

“你死了吗? 这些小鸡都怎么打起蔫来了!"

“谁知道它怎的了，谁也不是神仙。”

“你给他们什么吃的了?"

“你不是告诉给稗子米吗?"

“那么到底是怎的了呢?"

晚上就从鸡群中拿出来两个死了的小鸡。

小鸡的死亡，使哥哥十分的苦恼。整天的计算那些死亡的数目了。嫂子不愿听他的计算，常常的一当哥哥用手计算死亡的数目时，她便照样地说:

“叨鬼呢!”

但是哥哥总是用手指数着说:

“两只是下雨那天死的，一只是那天夜里死的，再加上前几天死的四只，这一共是七只。不对呀，怎么还少一只呢?"

妹妹便向他说:

“你算上那只烂屁眼死的了吗?"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这都是吃苞米面的缘故。明天还是喂稗子面吧!"

“你给我留着那点稗子面吧，孩子还吃呢!"

哥哥和嫂子为了稗子面口角起来了。

嫂子将稗子面藏到后屋的缸里了。

哥哥早晨起来去喂鸡的时候, 大声地向嫂子喊:

“稗子面哪去了呀?"

嫂子打马虎地问他说:

“哪里去，不都叫你喂小鸡吗?"

“胡说，我记得还有半小口袋呢!"

说着就噘起嘴来了。

妹妹的病还没有太好，她觉得有些不耐烦了。但是她却找不到另外的一个养病的地方，因此她不时地劝起哥哥说:

“不要为小鸡吵嘴了，多么不值得呀!"

日子滑过着，小鸡渐渐地长出了翅膀，都张着翅膀从木箱中跳了出来，跑散了满屋，唧唧地叫着。

“不要踏了小鸡呀!"

哥哥整天的吆着，嫂子烦躁得常常背着哥哥向妹妹叨着:

“都踏死了才好呢，谁有那么大的时间一天老看着!"

一天，茉莉就在地下踏死了一只白色的鸡。

哥哥愤怒地伸出巴掌给了茉莉一个耳光。从那天起，茉莉就不敢在地下走路了。

她常常的哭叫着。

“妈妈! 妈妈! 你来抱孩孩呀! 孩怕踏死小鸡呀!"

嫂子实在不耐烦这些鸡了，但是她有时也在想:

“如果六个月能下蛋的话，就会有蛋吃了。”

哥哥为了鸡的房舍问题忧愁着，他整天的和嫂子商量，和妹妹商量。

“得给小鸡搭架了!"

“用什么搭呀? 要不我就反对这些了，没有地方还想发外财。”

哥哥用了种种的方法找了些木材，他开始变成一个木工了，在院子中钉捶着。同院的老头子向他说:

“那怎么能行呢? 木头也不够长呀!"

“老爷子你瞧着吧! 一定会成的。”

小茉莉在屋子里，将脸贴着窗玻璃喊:

“爸爸! 吃饭了，爸爸饭凉了呀!"

哥哥仿佛什么都没有听见，他弯着腰不住地捶打着，出了许多汗水。

饭都凉了的时候，他才从外边走回屋去。

嫂子就抱怨他:

“傻子一样，问你饿不饿呀，就好像没有知觉一样，哼呀哼呀的。”

夜里哥哥就常常地讲起来造成的鸡舍了。

“把门向东开好呢? 向西开好呢?"

嫂子觉得那些小鸡留在屋子中太讨厌了，所以她也十分希望鸡架早些完成，她边拍着孩子边说:

“不管哪边都好，你赶赶快搭吧!"

几天后，鸡栏搭起来了。他们将小鸡都放进鸡栏去。嫂子问妹妹说:

“这下子可好啦，可把人麻烦死了!"

一天，新生农园的伙计来要鸡钱了。

那时，大家都在吃饭，哥哥也正在吃饭，哥哥的眼睛充满沮丧的光，脸上浮动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向伙计说:

“你回去告诉你们场长一声吧! 晚上我还去，给带去。”

伙计走后，他懊丧地放下了筷子，嫂子向哥哥说:

“你说一会送过去，你借钱来了吗?”

“到哪里去借呀?"

“没有借，你说那话做什么?"

“你少管闲事。”

哥哥急躁地抓起被油污的帽子走出去。

妹妹向嫂子说:

“怎么办呢? 哥哥多余买那些小鸡。”

“活该! 叫他受去吧!"

午间，哥哥又从班上回来喂小鸡。他走进鸡栏去向屋里喊:

“鹭获! 把鸡食拿来呀!"

嫂子宛如没有听见似的，仍然坐着不动，燃着一支烟。

“鹭获! 你聋了吗? 拿鸡食来呀。”

嫂子仍然不动，她安然地吐出一个烟圈来。

妹妹向嫂子说:

“嫂子! 哥哥叫你把鸡食拿去呢!"

嫂子仍然不动。

哥哥走进来了，他气愤地厮打起嫂子来。

“他妈的，我知道你，你算没心思过日子。”

嫂子尖声地哭起来了。

“三哥，你这是何苦来的呢?"

哥哥用力地踢着嫂子:

“你她妈的不愿意过，给我滚出去，我这里不养活猪。”

门前已经拥挤了许多拉架的邻人。妹妹苍白地站在一隅。

“这是何苦来的呢? 算了吧! 算了吧!"

哥哥住了手，他又抓起帽子一边走出，一边向嫂子说:

“今天把你的大衣给我当了去，不当我拿刀杀了你。”

哥哥走出后，嫂子气恼的一边响着鼻子，一边咒骂着。

妹妹苦恼地睡去了。

欢喜岭村子里张老婶来了，她瞧着妹妹说:

“呀! 老丫头怎么病成这样了呢? 我一点也不敢认了。”

“瘦了吗? 我这还胖多了呢，差一点没有死了呀!"

“给你老妹子做点好吃的吧! 伤寒病都馋呀!"

“哪有什么可吃的呀!"

张老婶走了，妹妹就想了许多好吃的，她闭着眼睛，于是那些山珍海味都浮在眼前了，在诱惑着她。

小鸡渐渐的长大了，小鸡没有什么可喂的，只好将杂货面弄熟了喂，于是那些鸡，便有的烂屁眼了。

哥哥下班回来，伏在木栅外，呆呆地向鸡栏里望着，他发现几个打蔫了。

次日，那些打蔫的小鸡就死了一只。

过了两日打蔫的接连的都死了。

小鸡的死亡，仿佛带给哥哥无限灾难一样，他整日的烦躁，烦恼的不住地在院中走动着。他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来，于是他到邻家的高桥的鸡房去了。

他看见高桥的鸡，都长得那么肥大，那么光润……

高桥的太太背着孩子从屋里走出米，问哥哥说:

“早呀!"

“你早啊! 你们的小鸡都喂些什么呀?”

“我们喂的是鱼粉，你们喂什么呢?"

“我们喂的是熟杂货面，可是小鸡都拉稀了呢!"

“那个大大的不行啊! 熟的吃了小鸡会拉稀的。”

哥哥从高桥的家走回来，就把鸡吃熟杂货面拉稀的事讲给了嫂子。

“不许弄熟的了，喂生的吧!"

从那以后就喂生的了。

然而涂满了一地碎粉，小鸡拾不起来的。

嫂子一看见那地上的白粉就生气般地说:

“败家子的!"

杂货面是领来预备给孩子做饽饽吃的，但是都喂小鸡了。

每天，孩子向妈妈说:

“妈! 我饿了，我要吃饽饽。”

“哪有饽饽了，杂货面都叫你爸爸喂小鸡了。”

孩子就常含着眼泪叨念着:

“爸爸不好，爸爸爱小鸡不爱我了。”

一天爸爸听见了，爸爸也很难过，爸爸说:

“爸爸真不好，爸爸太穷了。”

“爸爸每天出去给人当马呀! 爸爸是马呀!"

妹妹听见哥哥的话，她十分难过，当她一看见哥哥苦劳得那么苍老了，她默默地想:

“我快点好了，就好了，出去赚点钱呀I"

一日，哥哥出发了，哥哥到远地方去看望病了的父亲，他临走的时候，只是告诉嫂子:

“要好好看着小鸡呀!"

嫂子很生气，她喃喃地自语着:

“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没有钱还想走。”

妹妹说:

“因为爸爸病了！”

“可是他回去，能当什么呢?"

“不能当什么，那是做儿子的责任呀!"

“责任! 临走一个钱也没留下，过什么呀?"

哥哥走了，鸡就在哥哥走的第二天死了一只，第三天就丢掉了两只。

妹妹一向是厌烦着那些骚乱的动物的，但她一想起了苦劳的哥哥就不安起来。于是妹妹便代替哥哥看守那群鸡了，黎明一过了她就走到鸡厩去饲喂那群鸡了。她一迈进鸡厩的时侯，那些鸡就围着她唧唧的叫了起来。

鸡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妹妹就伏着邻家的窗玻璃说:

“大妹子! 我们到野地摘些穷民菜去呀!”

因为大妹子家也养小鸡，她们常是到野地去采取穷民菜的。

六月的太阳暴烈的照着妹妹，她有些发昏了。

鸡的翅膀一天比一天大了，栅栏已关不住它们了，强壮的就从木栅栏中飞跃出来，跑散了满院。

妹妹耐心地将飞出来的鸡都用杆子赶了进去。

在傍晚，妹妹和嫂子将小鸡又装向那两个大木箱去的时侯，她们就发觉少了三只。

夜里妹妹向嫂子说:

“已经没了六只了，哥哥回来一定会发脾气的。”

“发就发吧!"

妹妹担心着哥哥，因此妹妹整天的守坐在鸡栏的外面，手中拿着一根长杆，她等待着鸡飞出来，就用杆子打了进去。

这样的看鸡工作，一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妹妹便开始对这种无聊的工作厌烦而焦躁了。而且妹妹是一个异常珍惜时间的女孩子，那时她已经恢复了读书的健康了。但是，她什么也不能读，整天的看守着那一群白色的鸡。

她懊丧而焦躁地自语:

“我变成鸡倌了，谁也不是看鸡的。”

但是她为了怕鸡损失，便忍耐的整天的看守在鸡栏的外面。

嫂嫂因为快临产乞，她就整日的坐在炕上，替没降生的小宝宝做被子、衣衫之类的针线。

妹妹有些倦累了，使没有恢复健康的身体又衰弱起来，因此她又无力地躺在屋中了。

木栅栏中的鸡，都张着翅子跃过木栅栏，飞出来了。

自由的跑动着，满院中，后园，它们开散的跑着，几只鸡就越过了门槛，向街道跑去了。

一只狗便衔走了一只白色的大鸡。

那只狗衔着鸡，从大道跑过了。靠街的房子里走出一些入来，大家嚷着:

“老陈家的鸡叫狗衔去了呀!"

妹妹随着喧哗声吃惊地从屋中跑了出来。

“你们的大白鸡叫狗衔跑了，是一只黑色大狗呀l"

邻家的女人一面用手比划着，一面向她说。

妹妹向街头望去，那只狗早已看不见了。

妹妹忧愁地又坐在鸡栏的门外了。

但是次日妹妹又病了。

于是那些鸡又跃过了鸡栏，跑散了满院，满堂屋地。

水缸中有鸡淹死了。

屎窟中有鸡淹死了。

街上的那只黑狗常来吃鸡了。

鸡走到后园的林子里去，寻觅虫子吃，黄皮子嗅到鸡的香气，于是将那些鸡很快地捉去吸了血。

妹妹躺了五天，又从床上走下来，将那些无人照管的鸡圈进木栏去，她数了数目，知道鸡已损失十七只了。

她含着眼泪，一边编织着，一边看守在那鸡栏外。

哥哥从家乡回来了，他背着行囊走进院的时候，他看见看守在鸡栏外的妹妹，不安地间:

“为什么坐在这儿呀?"

“这些小鸡翅膀长大了，一门往出飞。”

“飞就让它飞吧!"

“飞出来，就会叫狗吃掉了。这街上出来一只狼狗，常到这里来吃小鸡。”

“我们的小鸡，也被狗吃掉了吗?"

“是的!”

哥哥急忙地走近鸡栏去，看那些鸡都长得很大，张着翅膀在砂场上游戏着，决斗着，他就有些高兴起来。他看鸡栏被妹妹收拾得十分干净，而且家乡的父亲已经退院了，他便没有计较死几只了，向妹妹说:

“父亲退院了。”

妹妹听见父亲退院了，她激动的快活的几乎流出眼泪了，她跟在哥哥的后面走进屋去。

“哥哥，父亲好了，我们大家都高兴点活吧!”

“唔!”

哥哥将行囊放在炕上，就又走出去看鸡了。

嫂子向妹妹说:

“鸡倌回来了，这次该你休息了!"

妹妹并没有高兴，她担心着去看鸡的哥哥的发怒。

“嫂子! 怎么办，一会哥哥知道死了那么多的鸡一定会发脾气的。”

“不要紧，让我来说谎，发他就发。"

哥哥看了许久，就急忙的走回来向嫂子问:

“小鸡少了几个?”

“有十五六个吧!"

哥哥听到这个数目立时的暴躁地吵了起来:

“你们都死了吗?"

“这四只手，四只眼睛，都在看守着，死了，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都叫狗吃了吗?"

“有的阴天受寒抽风死了，有的烂屁眼死了，还有的耷拉耷拉膀子就死了，狗只吃了一只。黄皮子在夜里也来吃了……”

嫂子一边说着一边做着戏。

哥哥十分生气，不，他十分可惜那些失掉了的鸡，他在地下走来走去叹着气。

后来就又走到外面去，走进鸡栏中去。

“咕咕……”

他开始叫着那些鸡，他在地下撒些米粒。

于是那群鸡就都集聚在他的周围了。他用手开始数着那群鸡。

一二三四...七八… 十六…”

鸡吃着吃着就都跑乱了。

“她妈的，又跑乱了。”

他只好又重新的数了。

妹妹看见哥哥在数鸡，她便向哥哥说:

“三哥! 那怎么会数过来呢?”

“这得非练习数不可，然后好知道丢了没有?"

“太可笑了，这么多的鸡，而且鸡又不是睡着的，一门乱跑。”

然而仿佛哥哥没有听见妹妹的话一样，他蹲下身去，随着那些乱动的鸡转着身子左右的数着，他数着数着鸡又跑乱了。

嫂子看见他那傻头傻脑的转动的样子，她就尖声地笑了起来。

“大傻瓜! 真是头号的大傻瓜，那么多的鸡能数过来吗?”

哥哥仍然没有意识到有谁在旁边笑他，他继续不断地在一五一十的数着。

那群白色的鸡总是乱跑，于是哥哥的眼睛有些发花了。

后来，妹妹和哥哥商量着，就把能飞出来的鸡染上了红色，于是鸡栅栏里，就变成了红头的鸡、红背脊的鸡和红尾巴的鸡了。

从那以后便分出了大号的、中号的、小号的鸡了。

起初跑出来只有那大号的。

于是哥哥和妹妹就把大号的翅膀剪去了，使它们再也飞不出来。

妹妹和嫂子都放了心，去做自己的工作。

一日，哥哥站在木栅栏外，凝视着栅内的鸡群，他在跑动着的鸡群中，忽然发见了那些脱毛的鸡了。全部是从脑瓜秃脱，渐渐的翅膀的肩部也脱掉了，屁股也脱落了。

哥哥十分奇怪，整天的在叨念着。

“这都是什么原因呢? 毛都脱落了!”

这种病的现象，先发生在小号的鸡群中，一天比一天数目多了起来，竟有一只全身都脱落光了。因此大家就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作:

“小光腚。”

一天落大雨，在鸡群中，忽然小光腚就不见了。后来雨停了就发现小光腚在一个角落里了。

哥哥把小光腚从木栅栏底下提了出来，他喃喃地说:

“小光腚到底死了!”

哥哥就把它埋在地下了。

哥哥又到邻家的高桥家去看鸡了，高桥家的鸡长得那么美丽肥大，他真有些羡慕着。

“我们的鸡都脱起毛来了，这是什么病呢?”

“噢! 你不懂吗? 那是缺少动物质饲料的关系。”

后来，哥哥就把那木栅栏的门打开了。

于是成群的鸡都飞奔了出来，唧唧的，张着翅膀，在院中飞跑着，在后园子中飞跑着，在木柴底下找着虫子，在菜圃中寻着虫子，在屎窟吃着蛆虫……

院子是用秫秸栅的低矮的篱栅，因此小鸡就从没有门的篱栅遛出去了，跑到旷场去，跑到林子里去了……

傍晚哥哥从班上回来，就看见鸡栅栏里都跑散空落了。他问妹妹说:

“你一天做什么呢，不看看鸡呀!"

他的声调充满了抱怨的味道。

妹妹虽然恢复了，但还是那么弱，她总不能很快的恢复了健康，她听到了哥哥的话，心中觉得十分的难过。

到晚上收鸡的时候，鸡就少了两个，哥哥喃喃地咒骂着。

“难道都死了吗? 难道都是吃粮不管事的吗? 我这里不养活猪的!”

哥哥的抱怨深深刺痛了妹妹的心，她觉得十分难过。

妹妹整天里希望强健起来，希求自己去劳作。

但是妹妹还没有恢复，她的腿子总是打着晃。整日的留在家里，她望着天际的白云，她感到了无限的寂寞。她在黄昏落下的时候，想起自己的遭遇，想起一些远离开的朋友们，她感到了无限的悲哀，因此她向嫂子说:

“给我一支烟吸呀!"

嫂子向她说:

“吸什么烟呢，烟这么贵。”

妹妹就不向嫂子要烟了，她整天的在沙地上写着目已的名字，自己的诗，消磨她的寂寞了。

嫂子把烟藏了起来。妹妹没有雪花膏使用了，嫂子把雪花膏也藏了起来。妹妹的皮鞋该打油了，她拉开抽屉去找鞋油，但鞋油也被嫂子藏起来了。

妹妹的心中充满了辛酸，她想离开这里了，但是她一点钱也没有。

季节已经是盛夏时候了，旷野里盛开了许多芬芳的花朵。街上喊着一些叫卖声:

“香瓜甜脆!"

妹妹想吃一个香瓜，但是没有，于是妹妹只好走到园子里去拔些大葱走回来吃了。

妹妹常靠着墙壁，沉默着，她想再健康一点就离开哥哥的家了。

一天家中父亲来信了，父亲在家十分想看看远方的女儿, 希望女儿早些归去。女儿也十分想看看久病的父亲，晚上她向哥哥说:

“我想回家去。”

“唔……”

妹妹等哥哥放薪，她想向哥哥索取路费，她终于盼到哥哥放薪的时候了，哥哥将薪水交给嫂子说:

“不许随便花了。”

夜里，嫂子和哥哥又谈起妹妹来了。

“小妹有意思要回家去。”

“回去也好，可以省下一个人的负担了。”

妹妹虽然想回去，但她无法回去，只好又留在哥哥的家里了。

一天她出去抱柴，就被大木柴将脚扎伤了。

妹妹带着一只伤脚在厨房中烧饭。

家中来了一个女客人，她就向嫂子说:

“她是这家的老妈子吗?"

妹妹说:

“对了! 你们不想雇老妈子吗?”

那时哥哥正在替小鸡切白菜。

哥哥说:

“那是我的妹妹。”

“哟! 我认错了，我以为你们雇的老妈子呢!"

妹妹含着眼泪，什么也没有说，她又去烧饭。

季节由夏近秋了，家家都忙乱的搭着冬天的鸡舍了。

哥哥看着那些将脱毛的很多，然而没脱毛的却长得很好，哥哥就想将脱毛的卖出去。但是哥哥总不肯小价钱售出。

嫂子已经近临产三个月了。

她天天向丈夫说:

“鸡倌!我告诉你!”

嫂子因为哥哥天天看守着那群鸡，于是便给哥哥起了个外号叫做鸡倌了。起初的时候，哥哥一听到这样讽刺他，他就生气般向嫂子骂: “他妈的!” 然而长了，哥哥就将这外号自然的当做了自己的名字一样了。

哥哥听见嫂子在叫他，他便答应着:

“告诉我什么呀?"

“你得预备鸡蛋了。”

哥哥看了看嫂子的凸出的肚子，伸出一只粗而有力的大手指，算了算日子。

“那时我们的鸡就会下出很多的蛋了。”

“哪能那么快呢?"

“这是洋鸡，洋鸡六个月就会下蛋的，那时有五十只鸡的话，一天管保收四十个蛋，一个蛋九毛钱的话，一天总可收入三十元哪! 好了! 一年二年我就会发很好的财了。”

夜晚，哥哥、妹妹和嫂子，都走到大道上去捡砖头去了，预备给小鸡盖鸡舍。

哥哥将拾来的砖头都落在鸡棚的一个角落里，他想等待着假日来建造。

一天忽然落起雨来了，刮着暴风，于是那座高高的砖头堆都坍倒了下来，将躲避在那下面的鸡全都压死了。

妹妹走出来，她看见了那些死在砖下的鸡，她吃惊地向屋子里的嫂子喊:

“嫂子! 小鸡都压死了呀!"

哥哥回来了，他发见了被砖压死了那许多的鸡，他暴怒般的向妻子骂:

“你们都死绝了吗? 我这不是养活活猪的。”

妹妹听见了这些，仿佛有什么压迫在她的心中一样，气闷闷地说不出什么。

嫂子叨咕着:

“也不看看我是什么身子，这么大肚子!”

哥哥看着妻子的凸出的肚子，他就把气转向妹妹的身上了，他觉得妹妹也太不照顾家事了。于是他更气愤了。

他不住的抓着蓬长的头发粗声地喊:

“他妈的，都死了，我这不是养活活猪的。”

这种沉闷的隔膜，忧郁了整个的家，许多日才消失了。

一天，吃完晚饭，哥哥在鸡栅外，看望他的余下来的鸡，走进院来两个陌生的朝鲜青年，走进鸡栅，向哥哥问:

“这些鸡卖不卖呢?"

哥哥摇着头说:

“不卖，不卖!”

两个朝鲜青年就伏向鸡栅去。

“你们这鸡舍太糟了，你看看我们那鸡舍，那简直比你们这强一百倍。”

“你们养多少鸡呢?”

“一只也没有，只是把鸡舍先盖好了，然后想买鸡。”

“哈哈……这个时候正是快下蛋了，谁肯卖掉呢?"

哥哥一边说着，一边心里想把那些脱毛的不出息的都趁早卖掉吧! 于是他说:

“我很爱鸡，我也知道别一个爱鸡的人的心情。好在我的鸡很多，看了面子我倒可以匀给你几只，不过我可不是卖鸡的。”

于是那两个朝鲜青年低声地商量了一会，就向哥哥说:

“那么匀给我们些吧!"

哥哥走进木栅去，他向地下撒了些米粒, “咕咕……” 的叫了起来。

于是那些鸡都挤拢到一起了。

两个青年伏在木栅上向哥哥说:

“要那个，那个顶大的几个。”

哥哥笑了:

“顶大的，不卖，卖就拿小的，而且十五元一个。”

两个青年又商量了好久:

“好吧! 你抓吧!"

哥哥将小的捉了六个。于是被捉住的六只鸡喳喳地叫个不止，就被那两个青年拿走了。

哥哥拿着九十元走进屋去向妻说:

“我卖了六只鸡本钱就都回来了。”

嫂子将钱收了过去。哥哥就高兴地想了许多事，后来他又想到卖鸡的事上了。

“我应该把光腚的鸡都卖了就好了。那他妈小子是不认货的，噢! 我把瞎眼睛的也卖了，把瘸子也卖了，里边就是大马贼很精神，但是大马贼是公鸡呀! 不会下蛋的。”

妹妹伏着窗子望着天际的白云，她感到浓重的乡愁。

妹妹终于想出了法子，她把衣服找出来包上一个包子想到临江门去典当了。很早，她便夹着包子，走出去了，她的脚还没有好，因此走路十分吃力。

她走向临江门去。

但是她走了一天，傍晚的时候气愤地走回来了，仍然夹着她拿出的包裹。嫂子向她问:

“怎么又拿回来了呢?"

“只给我二十元，二十元够什么呀?"

她想了一夜。

哥哥把钱放在手中，他在想买些什么呢，什么能得一点利呢。

次日，妹妹就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一起，从早晨就走出去了。

她从临江门往北走，走向德盛门去了。

因为嫂子告诉她德盛门的当铺最多。

晚上她回到家的时候，天已很迟了。

次日的早晨她就离开了哥哥的家。

那时哥哥还在鸡厩中喂着第一次鸡食。小鸡唧唧的成群的叫着，跑着。

妹妹走到木栅栏去看了看那群鸡，就向哥哥说:

“哥哥! 我要走了。”

“噢!”

哥哥一边答着，一边捉住了一只鸡，那只鸡的腿被头拌住了。

哥哥将那些鸡养大了，但是哥哥已经变得那么老了。他走到亲戚家去弄鸡食去的时候，亲戚就对他那突急的苍老而感到惊奇:

“你怎么操劳成这个样子了呵?"

“人都是在生活中老了呵!"

在十月的一天，妹妹又回来了，从遥远的家乡。她走进院时，她便看见院落已不像夏天那样空旷了，堆满了许多柴草，几只田鸭在门前摆去走动着。

白色的鸡飞散了满院，蹲落在窗台上、柴草堆上。

小茉莉在门前玩弄着一只要死了的瘦猫。她看见便喊起 “姑姑” 来。

她又向妈妈喊:

“妈妈，我姑姑回来了呀!”

妈妈没有回声，姑姑走近了茉莉，弯下身去，向她那柔嫩的双颊亲着嘴不住地说:

“茉莉想姑了没有?"

“想姑了!”

姑姑抚摸着茉莉的头发:

“你妈在哪呢?"

“妈妈喂猪呢! 爸爸买猪来了!” 茉莉用小手指向后院，妹妹走向后院，她看见嫂子穿着哥哥的一件肥大的毛衣，破落的袖子卷到肘部，肚子更凸高了起来，头发蓬乱的，和一个乡下的女人一样，坐在柴草堆上在缝补一件破衣服。

妹妹看见嫂子便喊了起来:

“三嫂! 怎么坐在这里呀?"

“呀! 你回来了呀! 才下车吗?”

“怎么在这缝呢?"

“你三哥又买了些猪，我在这看猪呢!”

“猪看它做什么呀!"

“傻姑姑，不看就都跑掉了哪!"

“三哥呢?"

“你三哥去追猪去了!"

妹妹走向猪圈去，她看见那里有三只黑色的猪在哼着，用鼻子掘着泥土。

妹妹看见那些猪，她觉得十分讨厌，因为她认为猪是最污脏而最懒惰的东西。

许久，哥哥从栅栏后赶着两只猪回来了。

哥哥的脸和老头子一样涂满风尘埃，和庄稼人一样的污脏。他用一个长杆子赶着一边喊:

“圈! 圈! 圈!"

“三哥!”

哥哥抬起头来，她才看见妹妹:

“唔!小妹回来了!”然后他又喊道:

“圈! 圈! 圈! 赶呀! 你们赶一赶呀!"

“圈! 圈! 圈!”

然后他向妹妹说:

“家里都好吗?"

“都好! 父亲来了，到长春开教育委员会来了，明天到这里来。”

“到这里来吗? 那太好了。” 然后他又喊起来了。

“圈! 圈! 圈！"

猪顽固的不肯进去，哥哥用一根木棒打着那猪的屁股:

“他妈的，进去!"

猪就从木栅栏外钻了进去。

哥哥把猪圈进木栅后，他看见了弄他一手的尿粪。

“他妈的!"

夜里的时候，屋子里仍然没有电灯燃着，暗黑的。大家都躺下了。哥哥和妹妹谈着。

“怎么还不来呢?"

“也许今天晚上会到的。”

“父亲这次来，你叫父亲拿出钱来，我好给父亲买点肠子。”

妹妹许久没有回答，因为她知道父亲没有那么多的钱。哥哥又向妹妹说:

“这里肠子很好呢!"

许久妹妹说:

“怕父亲也没带来多少钱。”

哥哥有些气恼了:

“我更没有钱呀!"

妹妹没有回答什么，她只想父亲是新从病院中走出来的。

……

许久，哥哥睡了。妹妹也睡了。

外面是宁静的夜，鸡厩的鸡集成了一团闭着眼睛睡了。猪圈中的猪也互相拥卧着睡了。鸭子将脖子插在翅膀中也睡了。

静静的。

一条石道，浴在朦胧的月光中，一个影子，背着行囊走着，那就是父亲了。父亲赶着夜车走来的。车站已经没有往远处的车辆了，父亲就徒步赶着路子走来的。一个年迈的老人，他的脸还有些苍白和水肿，眼睛闪着衰弱的光芒……。但他想在今夜，就会看见自己的儿子和儿子的孩子们了。虽然他有些疲乏，但他仍然很高兴的在夜道上赶着路子。

他在一座无声息的静静的砖的平房前站住了。老人走近那无灯光的紧闭着的窗子，用棍子敲着窗扉喊:

“国栋! 国栋睡了吗?"

屋子黑黑的，炕土全都在睡着。

“国栋! 开门!"

老人仍然在敲着，那时妹妹醒了，她听见是父亲的声音，她喊哥哥。

“哥哥! 三哥! 父亲来了。”

哥哥仍旧打着呼噜睡着，因为他白日太苦劳的缘故。

嫂子却被喊醒了，她推哥哥，于是屋子中就传出来回答声:

“是了! 听见了。”

嫂子穿上衣服，她燃着一盏幽暗的油灯，于是屋子里就发亮了。

哥哥出去开门，父亲走进来了。

父亲将行囊放在炕上，就去看孙女小茉莉去了。茉莉正在那里做梦，

祖父就伏下身去亲了一个嘴。

“这丫头出息这么大了。”

于是父亲和孩子们就谈得很迟才睡去。

次日，哥哥和嫂子起来很早，哥哥走出去，先把鸡放出来了。于是那些鸡就开始欢耍在院子中，张着翅子在菜园中寻找着虫类。

他又走向猪圈去，猪仿佛是饿了，在吱吱吱的哼着，不住的用鼻子拱着地，将地拱成了许多深的坑。

嫂子在厨室中忙乱着。

妹妹因为想陪着父亲说话，就留在屋子中打扫，没有到厨室去。

孙女抚摸着爷爷的胡须，爷爷便向孙女喝喝地玩起来了。

哥哥去弄猪食，他把一些野菜和糠混在一起，放进锅里去了。他又去砍木柴。他将柴燃起来，一直等到锅开了，他将猪食用木勺盛向木桶中，掐提着走向猪厩去，然而猪已经都跑出去了。他向院中喊:

“来来来来来来!"

“鹭获! 来看看猪哪去了呀!?"

但是猪却没有在院中，他气恼着，他从那时更恨妹妹了。

“死了! 怎么不病死了!"

他喃喃地骂着妹妹，就走出院子，跑到后边的园子去喊:

“来来来来来!”

杜老哥正弯着腰在大地中锄地，他向杜老哥问:

“杜老哥! 你看见我们猪跑过来没有?"

“猪! 我没有理会猪呀!"

哥哥又通过菜园子走向一条大道，他遇到了高桥太太。他，向高桥太太问;

“高桥欧库桑! 猪的看见没有?"

“那边的跑了的有。”

她用手指向北方。

哥哥又问:

“拐弯的不用?"

“不用!”

哥哥照着高桥太太的指示，他便奔向欢喜岭去了。

他一边跋涉在凸凹的荒地，一边恨着妹妹。

他在很远的山坡下找了他的四只猪，他慢慢地将猪赶了回来。赶进了院，他气恼着将猪赶进圈了。

他走进厨房去，那时嫂子已经把饭做好，父亲在吃着早饭，哥哥看见妹妹还没有走出去喂鸡或到厨室去做饭，他十分的气恼，就喃喃地自语:

“混蛋! 怎不病死了。”

他的声音说得很低，只有他自己可以听见他说的什么。

他从厨房走进屋去，妹妹就替他打了脸水，他愤怒地洗着脸，将水溅了满地。

妹妹将自已碗中的肉块埋在哥哥的碗中了，她想哥哥吃比自己吃了好得多。

哥哥一边洗着脸，一边叨念着:

“人家毕业都受家中援助，咱们什么援助也没有。”

妹妹知道哥哥的话是说给她听的，也是说给父亲听的。她很生气，因为在事实上父亲帮助哥哥的最多。但她什么也没说，低着头抚弄着衣襟。

父亲听见也什么没有说，只是将筷子放下不再吃了。

哥哥很窘的就把话题转了。

“老陈家有钱，就他妈的不给咱们花。”

“这是什么话，人家有钱是人家自己的。”

哥哥就气闷地去吃饭，他喃喃地说:

“他妈的! 我一天就给你们当奴隶了!"

“……”

“一天喂猪打狗的!”

妹妹觉得这话真不顺耳，她便说:

“喂猪打狗的，那是你们过日子呀!"

“我们过日子，说得好。”

“那不是你们自己日子吗?"

“混蛋! 你没有吃饭，你在这里喝西北风活着了吗?”

“就吃三个月饭，你吃抱屈了吗?"

“当然了! 我也不是养活活猪的!”

“我早就知道你抱屈了，别说我是得了病，就不得了病，你当哥哥的也应该有抚养的义务!"

“义务! 养活猪的义务吗?"

父亲气愤地向哥哥喊:

“混蛋! 你还受过高等教育吗?”

父亲是一位正义的老教育家，他对于儿子的这种样子十分的失望。

“我知道我吃了人家饭就该受人家气的, 住三个月，可是这三个月怎样过的，你们自己也会知道。”

“自己会知道，养活老太太一样。”

“你们问问你们良心吧! 我哪天不替你们做活，饭也不是白吃的。”她说着就伤心的流下泪来了。

“混蛋，我非打死你不解!"

哥哥拿着碗向妹子打去。

那时邻人也都走来了，但是哥哥一边骂着，一边打向妹妹。妹妹便负伤了，她的一只手流了血。

哥哥仍旧汹汹地打向妹妹，他在邻人群中挣着，那些邻人解劝着说:

“你是哥哥，慢说妹妹没有不对的地方，就是有的话，还有你父亲呢，而且当哥哥的只有劝说并没有打的权力呀!"

“我没有那样的妹妹，趁早给我滚!"

父亲给了儿子两个耳光:

“是的! 你是我的爹，我算管不了你啦!"

哥哥被邻人拉了出去。

父亲向哭泣着的女儿说:

“收拾收拾走吧! 都是我不好，我要知道哥哥对你这样，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你上这来养病呀!"

女儿怕父亲难过，向父亲说:

“父亲! 没有什么，我知道哥哥是给生活磨成这个祥子的。”

“玲! 我们要饭，也不能在这呀!"

哥哥站在猪圈外看着那些猪气恼地想:

“有饭喂口活猪，也不能给玲吃!"

他站了许久, 又走到鸡栅栏去，那群鸡就唧唧的向他叫了起来，但是他的心焦乱极了。

门外走进一辆车子。

“马车站下！马车!"

父亲叫来车子，父女就上了车子，离开哥哥的家走向车站了。

车子通过了许多街道向站上驰去。

父亲悲伤地向女儿说:

“玲! 你说我老了还是上庙去呢? 还是上道德会去呢?”

“父亲不要说那样的话吧!"

女儿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一路上父女都是悲哀的。

但是父亲总想安慰着不幸的女儿，他向女儿说:

“无论对你怎样，他总是自己的血族，是不该往心里去的。”

妹妹看着自己受伤的手，心中很难过。但是她担站着不幸的父亲，于是她说:

“我了解哥哥，我也谅解他的一切! 唉! 他全是被生活给压得成那样的吝啬了。”

马车到了车站的时候，离开车还很早，女儿就在站前的卖店替父亲买了些高粱糖，买了些地瓜和黄米面饼子。

在车站上候车，父亲坐在椅子上，女儿替着父亲剥着地瓜皮。

在父亲身旁坐着的一个妇人，她向父亲说:

“这老爷子，真有福呢! 有这样的一个好女儿。”

父亲冷冷地苦笑了:

“有福! 可不是有福，有个豆腐。”

妹妹想也许一会三哥会赶来向父亲赔罪。

但是车开了，三哥并没有赶来。父女就很快的离开了XX的车站。

到长春，已经是夜了。父女就停留在一个旅馆里。

夜，渐渐的深了。父亲坐在幽暗的灯下，他低垂着头。他想到病后的刺激，想到了老迈的暮年，他向女儿说:

“我今年已到了退职的年岁了。可是到哪里去呢? 靠什么生活呢?”

“……”

这话深深地刺痛了女儿的心，她用一双哀伤的眼睛望了望伤痛的父亲。

父亲又向女儿说:

“我，这一生把希望全交给你三哥了，记得他在中学的时候，我拉着他到旷野去，我流着泪向他说: 爹就盼望你一个人了。可是现在他长大就把那话忘了。现在能想到我的只有你，可是你不定哪天就把我也忘了。”

女儿低下头去想了许久，她向父亲说:

“爸! 我一定不结婚了! 我来养活爸妈。”

“不要胡说，你一天不结婚，当父母的一天不放心。而且女人是要归宿的，怎能不结婚呢?"

那一夜父亲没有睡觉。他宛如秋深的芦苇，他感到了暮年的无限的凄凉……

次日很早，戴着星子，女儿就把父亲送走了，父亲是北行回家，女儿就留在长春就职。

在要离开车的时候，父亲向女儿说:

“没有钱的时候给我打电报吧!”

女儿低着头说:

“钱够了，我没有什么可花的。”

父亲说:

“凡事要小心!"

女儿向父亲说:

“是的! 不要挂心我，回去好好的保养着身体吧! 不要再病了!”

汽笛响了，父女便悲哀地分开了。

妹妹回到旅舍去，她就一个人低头伏在桌子上哭了。

她想了许多身世的不幸。过去的，未来的，那茫茫的未来的天涯路。

她正哭泣着的时候，有谁在敲门了。

她走近门旁，去开了门扉，走进来的却是哥哥。

哥哥仓皇地向妹妹问:

“爹走了吗?”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今天早车。”

“我来得太晚了，我以为父亲会留在这里的!”

“留在这有什么用?"

“父亲生气了吗?"

“父亲伤心极了。”

哥哥捉着自己的头发，他难过地说:

“我太不是人了!"

他就伏在桌子上也哭了。

“父亲会原谅你的!"

“那么你原谅我吗?"

“当然了! 我懂得这全是生活将哥哥变得这样的。”

“我太不是人了!”

哥哥望着妹妹那只受伤的手，一种痛苦堵塞住他的声音，他又低下头去……

(原载《东北文学》第一卷第一期， 1945年12月)

早晨七点的时候

走进女监的铁门，便是一个长通间，两面排着铁格子的监房，每个监房的地下，都满坐着形形色色的女犯，蜡黄的脸，饥饿的眼睛，蓬发垢面，受惊的样子，宛如是一群神经病患者一样，使人看了异常的可怕。我就同着这些女犯们过了许多日子，终日的忧伤，无依，受苦使我们变成了另一种人了。我们这一群无光的灵魂，无意识的在等待着被毁灭。我们三号的女监的铁格子内，在监房的地下坐着一群女犯——偷摸，杀人犯，花案，……

我们肩靠肩的拥挤的坐着，低着头从破烂的衣裳上捉拿着虱子。

马桶的尿屎的气味，直刺进我们的鼻孔，使我们时时想发呕了。

女看守，她手中拿着一条皮鞭子，凶狠狠的在铁格子外的通道间走动着。不时的从铁格子外投进来她那一双凶恶的眼睛，在监查着我们的行动。

我们坐得屁股发痛了，但谁也不敢动一动; 我们之间沉闷得感到十分窒息，但谁也不敢说一句话。

一直等待着女看守走累了，她离开了通道间走回她自己的看守休息室去，我们才从死一般的寂静中开始混乱起来。打着，骂着，争论着，讲说着。讲说着那些亡失的青春时代的回忆，讲说着那些受丈夫们虐待的苦日子，讲说着那些走过的熟悉的繁华街道，讲说看那些市场上诱惑人的好吃的东西，鲜红的肉……有的流泪了，有的十分哀伤，有的高笑了起来，整日地我们都是这样的机械的无光的从早晨盼到日落……

我们谈着一直谈到太阳从监房的铁窗消失下去，监房里渐渐的昏暗朦胧。

我们都饿了，我们听见自己的肚子在响着，我们便往监房的地下晃动起身子。饿得十分焦躁，不再讲说什么了，在瞪着眼睛谛听着送饭的男犯们敲门。

我们好容易等着有敲门的了。

杂役在铁格子外嚷着:

“把盆子拿来!"

女犯们全都饿狼般的伏在铁格子上，向通道间望着。

女杂役将盛满黑色腐烂的马铃薯皮的饭盆从铁格子送进来，我们便拥挤上去，眼睛闪着饥饿的光，伸出许多黑脏钓手，快开抢了，嚷着，骂着，打着。

“妈拉X的，家雀X屁股了吗，唧唧唧唧的!"

女看守用鞭子敲着铁格子骂着。

我们才静了下来，围着饭桶坐下，贪婪的吃着那腐烂的黑色的马铃薯皮。

我在群犯们之中，发现了只缺少陈焰没有来吃饭，她坐在监房一个角落里，将头埋在膝盖上，一声不响，痛苦的用手不住的抓着头发。

我忙着去喊她:

“陈焰! 吃饭了。”

她抬起头来，含泪的摇着头:

“我吃不下去一点东西!"

便又将头垂在膝盖上了，一声不响。

我们吃着马铃薯皮，吃得舌头发涩吐起酸水来不再想吃了，我们便唱起了歌

……

噢! 哈! 黑呀!

我们不怕死呀!

为了我们的祖国

我们不怕死呀!

噢! 哈! 黑呀!

我们不怕死呀!

……

不久男监也应和起来了。

我们唱得更有劲了，坐在地下肩靠肩的，一边晃着，一边拍着手。一股力量充满了我们的胸腔，使我们什么都忘却了，仿佛有一种光照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光，仿佛有一些花朵开放在我们的生命中吐着芬芳。

女杂役罗华伏在铁格子外也唱了起来，她微笑的激昂的敲着铁格子。

我也激昂的敲着铁格子唱着。

忽然，陈焰从角落里走向我的身旁，她哀求般的摇动着我的肩说:

“范黎! 我求求你们! 不要唱了，我的心快碎了。”

陈焰的泪水流淌在她痛苦的脸上，她的声音颤动着。

我从我的肩上将她的双手取下来，安慰她说:

“是的! 我们不再唱了。你安静一点!"

“姐姐! 我怎么能安静下去呢，秦坚也许宣判死刑了。”

她说完便伏在我的肩上哭了起来。

女思想犯们停住了歌唱，然而隔壁的男监们仍然在唱着。

陈焰无可奈何的将耳朵用两只大手指堵塞住了。许久她走向男监的墙壁处，伸出满凸露着青筋的瘦手，用力的在墙壁上拍着:

“我求求你们，不要唱了，看上帝的面上，我的心要碎了。”

男监便静下来了。

陈焰低着头，懊丧的走回到原处坐下了。啜泣着。

她的哭泣使我十分难过，我用我的衣襟替她擦着泪水:

“陈焰，不要哭了。也许秦先生不会宣判死刑的。因为我相信着真理，秦坚是为了真理而活动的。”

陈焰抬起头来失望而愤怒的向我说:

“真理! 藜，你忘了我们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的可怜虫吗? 哪里会有真理? "

“不过，为祖国而牺牲是光荣的!”

“我知道，然而从此我们便诀别了，我们之间也失掉了一个同志。而且他的家庭还有老母和幼小的弟妹们!"

“焰! 你不要想得太多了。”

她哭泣得那样的伤痛，使我也沉浸在痛苦的无言中了。

女看守走来了，用鞭子打着铁格子骂了起来:

“你哭什么?"

我替陈焰辩解:

“为了她的未婚夫。”

“妈的! 进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还想汉子，想汉子X痒痒了吗?"

她的话激怒了陈焰，陈焰反抗着:

“我们是思想犯，你说话要慎重一点!”

“思想犯，什么是思想犯，日本子就恨思想犯，打死你们也没有乱。”

“你是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应该爱中国人!”

“你们是犯人知道吗? 犯人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知道吗?"

女看守牛气般的打开了铁门，她似乎要来处罚我们了。

忽然女监的外门有用铁棍子叩敲的声音，女看守便又从三号监房跑了出去。

不久我听见从通道间响来刀刺和皮靴的声音了。

我们知道是看守长来了，便都老鼠一样吃惊的在谛听着，腰板挺得直直的，一动不敢动的坐着。

女看守开始在通道间报告了:

“报告! 全员一百六十人，出厅三人，现在一百五十七人。”

刀刺声和马靴声，渐渐的移近了。

女犯们都把眼睛注视到通道间。

一个看守长卫送着一个戴羞耻帽的女思想犯响着铁铐子走来了。在三号监房的门前站住。

女犯们对新来者都好奇的伸长了脖颈在看着。女看守便骂丁起来:

“有什么可看的，XX! 都是两条腿顶一个肚子，有什么可看的。”

看守长在新来的女思想犯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说:

“你的死了的好!”

新来的女犯的眼中充满了愤怒的火焰，并没有哭泣只回答了他一句。

“没有灵魂的狗!"

看守长因为是日本鬼子仿佛不懂她的话，便向女看守说:

“你的检查检查她!"

然后立刻走开了。

女看守检查完了，便将她关在三号间。

新来的女思想犯，因为受辱使她不住的咒骂着:

“王八蛋!”

然后她用一双惊奇的眼睛望着我们，我替她让出了一个空位子请她坐下，她没有向我道谢，高傲的坐下了，她瞧望着四面透风的监房和挂满蜘蛛网的墙壁、发臭的马桶发起愁来。她的眼睛望着铁格子暗淡无光了。低下头去沉默的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仿佛被灾难所苦。

我悄悄的问她说:

“你是思想犯吗?"

“是的，晚上就在地下睡吗?"

她懊丧的问着我。

“是的!” 我告诉了她一些狱中的生活，便将我的囚被借了给她说:

“这里的囚被是不够用的，差不多是三个人盖一条，这是我的先借给你吧!”

她谢了我便回过头去向四周瞧了一下。她忽然发现了陈焰在哭泣着。她便向我间:

“哭着的女人是运私米的吗?”

“不是。”

她自语着:

“我以为是运私米的呢，中国人活不了的太多了，生活迫得他们不得不运私米的也太多了呢!”

她叹息着在望着陈焰。

“那么她是偷摸吗?”

我告诉她:

“不是，她是爱国挺身队的女同志!"

新来的女犯吃惊的问着我: “这里也有女思想犯吗?"

“有的! 一共三个。在号里的有陈焰和我，在号外的女杂役有罗华，她判了十五年。”

新来的兴奋的向我伸出一只手来紧紧的握住，眼中充满了喜悦的泪水向我说:

“我的名字叫姚瑛，是王冈事件的叛徒。我高兴极了，有你们在这里!”

然后她兴奋的走近陈焰说:

“同志!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悲哀，受苦是我们中国国民的义务。”

我正想将陈焰未婚夫秦坚预判死刑的事讲给她。

忽然听见了哗啦哗啦铁铸的响声。

陈焰同我说:

“你听，一定是出厅的回来了。”

她惊慌的爬上了铁窗子。

于是我也和许多女犯都像猴子似的爬上了窗子，在眺望着。

我看见那扉黑绿色总监的大铁门被打开了，走进一群出厅回来的犯人;排着两列队子，哗啦哗啦的响着，穿过运动场向男监走去。

陈焰的眼中闪着不安的灾厄的光，在犯人的群中扫视着。

她将脸紧贴着铁格子，伸出一只颤动的瘦手，但是却被铁格子所阻。缩回那只颤动的瘦手，她仰着恐怖苍白的脸，凝视着秦坚。

我在犯人的队伍中看见了秦坚，他低垂着头，仿佛背负着生的沉痛一样缓缓的迈着步子跟随在犯人的队后。

犯人的队伍从女监的前庭走过，秦坚便抬起头来凝视着女监的铁格子。

陈焰绝望般的喊了起来:

“坚!你判了吗?"

秦坚听见了陈焰的喊声，用一双充满无限伤痛的眼睛望着女监的铁格子。

“X你妈的，瞧什么?”

一个看守用刺刀背击打着秦坚的头，秦坚无奈的踉跄的跟随着犯人的队伍往前走去。

陈焰望着秦坚的背影消失在男监的门里，她急忙的从窗台上跳了下来，走向靠男监的墙壁，将耳朵贴近墙壁，她听见了从男监传来的一阵骚动，吵嚷和开门的声音，铁铸响声和关门的声音。

陈焰用手敲着墙壁，许久从男监的墙壁发出了一种沉重含混的回声，仿佛是由男监秦坚敲来的。啪啪的手拍着土壁的响声。

陈焰高声的喊了起来:

“坚! 你判了吗?”

然而从男监并没有回答传过来，只听见由墙壁传来的一种奇特的 “咯吱咯吱” 的碎声。

我跑到铁格子前，我看见女杂役罗华正在通道间和洪涛在说话，洪涛是第七工场裁缝思想犯人。我看见洪涛一边捆绑着女监将钉完的纽扣的军服，一边擦着眼泪脸色沉沉的，他和罗华说着些什么，罗华也用衣襟擦起眼泪来了。

洪涛背着军服走了。罗华伏在铁格子上向我说:

“秦坚被宣判死刑了。”

这消息使我宛如坠入了黑色地狱一样，我的意识开始昏暗起来。

我去看陈焰，陈焰仍然的在拍着墙壁在喊着:

“坚! 你判了吗?”

已经是夜晚了。

通道间燃起一只幽暗的灯。

陈焰在弯着腰挖掘着靠男监的墙壁。

从男监的隔壁也咯吱咯吱的响着，忽然墙壁被他们挖穿了, 我听见了秦坚在喊了起来:

“陈焰!”

我听出秦坚的声音，我也伏向洞口去，我看见秦坚的眼睛闪动着死的痛苦的光在凝视着陈焰。

陈焰激动的说:

“坚! 你判了吗?"

我没有听见秦坚的回声，只听见陈焰的声音发颤着:

“死刑吗?"

“明天早晨七点钟。”

“坚!”

陈焰没有说完便哭泣起来:

“焰! 你静一下，我有许多话想嘱咐你! 焰! 擦去你的眼泪! "

“我希望你请求再出一次厅。”

“我不希望那样，我不是见时机不好，不肯牺牲自己，就牺牲了主张。我不是动摇分子。焰! 你不是说过吗? 我们应该为了祖国而流血而牺牲，这不是光荣的吗?"

“我没有忘，不过……”

“我懂了。不过这是我的光荣也是你的光荣，焰! 你应该坚强起来!”

新来的姚瑛便走向前去，她鼓励着陈焰:

“是的! 我们应该更坚强起来! 焰! 你允许我祝福他一句话吗!”

焰将位置让给了姚瑛，姚瑛兴奋的说:

“我是新来的姚瑛，祝福你的光荣! 秦坚，请你放心，我们一定用全力来爱护她!

“谢谢! 新同志! 你们应该勇敢的做下去，为了祖国，我们应该有牺牲的魂魄。”

“我不怕死的，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会为祖国做一点事的，以后的工作有我们来负担。”

姚瑛说完了话便退回原处。

我听见有敲打女监外边的铁门声，我知道是部长来点最后一次的名了。接着，女监的外门被打开了。

我便听见有马靴的响声走进了通道。我们都规规矩矩的坐到原位去。

陈焰垂着头，流着眼泪。

拿着犯人名簿的在铁格子前站住了。女看守站在旁边，拿着名簿的汉子粗声的喊:

“报号!”

于是我们便开始各自报起自己的号来了:

“一百二十号，一百三六号，四百〇六号，二干二百号，三干三百五一号，四千〇五号……”

看守兵们点完了名便将各监房锁上，然后走了出去。

是犯人就寝的时候了，女看守也回到自己的房间睡了。

陈焰又伏到洞口去悄悄的和秦坚谈着。

女犯们，都准备睡去，都为了挤的原故争吵着，骚动着。房间太狭窄的原故，我们只好腿压着大腿睡。就听见陈焰在悄悄的啜泣着，很久我才昏昏的睡过去。

忽然我被身旁的女犯给碰醒了，我听见更夫敲着梆子从狱墙外走过。

我抬起头来看陈焰仍然伏在洞口处在啜泣着，是那么悲哀伤痛。

秦坚在不住的劝着她，叮嘱着她许多话。

我听见从远处村子里，有鸡在啼叫着。铁窗外薄明了。

我听见有急促敲男监的铁门声，许久我听见有人喊着:

“把三十号房间打开!”

我听见有哗啦哗啦打门的声音了。我听见有人在喊:

“二千六十六号! 提出来。”

我知道这是提秦坚来的，我坐起来; 我看见陈焰痛苦地颤抖着。

“快出来!”

我听见男监骚动起来。

我听见了陈焰的一声绝叫，我看见陈焰溢动着死的恐怖、痛苦、泪水的脸苍白了，她疯狂般的爬上了铁窗子。

我慌忙的从囚被中爬了起来，也爬上了铁窗。

我看见秦坚被几个看守兵护送着从男监里响着铁镣走出来，在他的眼上用一块白巾蒙遮着。双手紧叩着铁铐，哗啦哗啦的从女监前的广场走过了。

陈焰的脸色更苍白了，她绝叫了一声，便从铁窗上昏倒在地下。

我和姚瑛几个难友，将她抬至一个角落，我伏下身去，喊着她的名字。

但是许久听不见她的回声，我伸出一只手去抚摸她的脉搏，我发现她的脉搏已经停止了。她苍白的憔悴的死了。

通道间的墙壁的钟敲了七下。

我从铁窗望去，我望见死刑楼里火烟在升起来了。

\*本篇发表时署名华莎。

(原载《东北文学》第一卷第二期， 1946年1月)

感

《安荻和马华》在偶然中侥幸入选了。这偶然的幸遇对于我仿佛暴风雨袭来了一样，我是怎样的感到恐怖，惶惑，和不安呵…

我开始想着自己，什么也没有可说的。我和别的女孩子一样，在中学毕了业便为激昂的渴望所苦，生活和感情的灾厄，便把日子是那样忧郁地不景气地度过了。我望着没有栽植一点绿的颜色的赤裸而空荒的过去的自己，内心充满了无限的追悔无限的悲哀……。

没有文学的修养，写作对于我是多么困难的工作呵！因此当微募中篇的启事发表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勇气想应征。然而我受到友人的热烈的激励，于是我终于在七月尾回到故乡后着手了《安荻和马华》九月初从故乡将写完的《安荻和马华》又带到异国。

我惭愧难堪地把它寄出了。当我听到了《安荻和马华》侥幸入选的消息，我更感到惭愧和难堪了。在这里，我仅仅希望读者诸位先生们能够来指摘《安荻和马华》的每一个缺点……。

一九四〇十月尾 ——奈良——

但娣廿二岁的充满青春气息外表和蔼静穆的少女，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学。曾有短篇风与砍柴妇发表，博得读者的热烈的期待。为满洲出身，继悄吟，梅娘，吴瑛等人之一有望之女青年作家。（照片即系但娣）

华文大阪每日， 5.10 （1940）**散文**

异国

留给我的，尽是凄凉。

不透明的云层，灰色的，像压住了多少不幸者的呻吟似的，沉重而窒息。枯萎了的黄叶被风给踢滚在人行道上的泥污里，闭上眼睛准备着灭亡。芭蕉叶呢，也瘦了。还有那单调平板的洞箫声，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听到它时，总会意识到一个盲人凭依着窗沿的悲哀的身影。是初冬了呢! 冬天的步子，带着寂寞和寒冷走近来了，这S区的一条落寞的街巷中也响起了它的足音。

“天冷了，喝点稀粥吧!” 我竟说出声来了，对着自己，烧好了粥，出去买大葱和酱。

柏油路被雨洗涤得湿漉而且赤裸。店铺的老太婆把手缩到棉的和服里去，像袋鼠似地难看，铺角上燃起熊熊的炭火。

“冷...好冷...”的声音充满着街道，行人的脚步更快了些。

我没有棉衣，也没有炭火，披着被子，喝稀粥充饥。看着滴落的雨，雨丝是细微的，地面上没有积起的小洼和水洼上被雨滴打起来的皱纹。我忽忆起家乡，嫩江畔的人们。他们可都温饱，天冷了，他们挣扎的青筋会更涨高了吧?

“生活用几千双无能为力的忧愁的眼睛看着人的心，它在请求着什么?”高尔基的话，在我的灵魂里有力的震响了，像海潮一样，澎湃着，冲击着石矶，激起多大的浪潮。

莎林来了，他好久不曾来了呢!我用着最大的欢喜迎接他，拉开了门。我忘了寒冷，屋子里仿佛拥动着几万条黄金的阳光，涌来无限的温暖。我笑着看他，他落下了雨伞，放下藏在他黑色短斗篷底下的小包。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点笑，脸上刻画着内心的悲哀，无力地解着鞋带。

“忙吧?” 边替他拧着裤脚管的雨水，边问他，但当我发现了他脸色的苍白，我觉出自己的话是多么不了解的问询。

他微笑了，那笑还没有展开，就又收敛起来。是苦涩的，里面埋葬着多少悲哀。他是想要说什么呢，或解释什么呢? 但在翕动的唇上，没有声音迸出，默默地递给我那小包。

小包内有两个册子和一件褪了色的线衣。我用着亲热的、满是爱的眼睛看着册子和线衣。

差不多感激的流出眼泪，我穿上他的线衣，我温暖了，身和心都温暖了，我幸福地笑着，卷着稍长的袖头，——因为男人的衣服总是比女人的宽大。——使我觉得很骄傲，对着寒冷，寒冷的冬天和人间。

“不喜欢吧?”他问。

“为什么呢?” 我说。

“上等的女人是不稀罕这样品质的。”

“我又不是上等的女人，我们的情感，就不会被染成相同的颜色，你穿它度过冬天吗?” 我孩子似地问着。

“它吗，我流浪在那极北的边城时，它曾是我唯一的朋友。”他显得高兴了。

我并没有叠起被子，我们让四隻腿子伸进被里去，背靠着窗沿。我们互相怀念很久了，但，我们谁也没说出一句思念和怀恋的语句。

不，他说及他病了，又说看护他的一个女人，那时，我是低着头。为他的病而悲哀呢? 抑是为着别的感情呢? 以后他筒单地问询了我的生活，我们便开始翻着册子。

“这是我暑假读过的，你要好好地、细心、严肃地读它们。学习吧!"

他的脸，严肃而恳挚。

我们之间，没有一句话，彼此谁也不想打搅谁，都开始专心地读书。他读一本英文杂志，我读着他带来的《藻林》。他沉静的、一丝不乱地集中着理解的思索。我呢，我也很努力，最后微感疲倦了，捶着胸，嘘一口气。

“那女人叫什么名字呢?” 我读到一个段落，偶然心情不安起来。

“问她做什么? 我……我是不爱她的。”

“不做什么，如果是可爱的，便……” 也许我的声音近于哭泣了。

“不许你胡说，胡想，不了解人，我有我的工作。除了工作什么是有意义的呢? 而且……唔 ……不许你再胡说。” 他急了。

“急什么呢? 我不过是无心地问问。” 显然我是更悲哀了。

许久，我们没有声音，也没有读书。

“你在呆望什么呢? 不看书。” 他责备我。

“我在想书呢?"

“想什么呢?"

“一句书上的话。”

“说说看。”

“而我们用别人的字句，唱着失掉了太阳的人的愁闷，XX的愁闷。”

他不觉也随着我重复了这句话。

时间流走了颇长的一段，我们之间闯进一个来访者，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活跃的像一只喜鹊，谈了一忽儿，就又喜鹊似的飞去了。

我送走了她，回来莎林在愤愤地生着气。

我知道是那姑娘惹怒了他。

“她不是笑你的，她特意来看望你的。”

“我需要她看? 她算什么臭货。两只吸食人血的嘴唇。” 他更气愤了。

“那么生气，对身子是有害的。” 我说。

“她瞧见我的破袜子笑得那么卑贱。臭货，你的灵魂比它还要丑十分。”他仿佛和我生气似的。

“我给你补一补吧!"

“怎么的，破，破，我愿意。你看难看吗? 不接近这穷孩子好了。” 他不了解我地说着，把袜子从后跟撕到前尖，愤激地拿起帽子和斗篷走了。我从窗上望着他的背影在寂寞的行人道上消逝了。

像的故事

在我的爱人那里，只存留着一张初恋时赠给他的像片， 它已经过五个年的岁月的洗礼，必然地褪色了。

结识未几，就是迢遥的别离。那前夜，我们坐在月光中，聆听江水击打砂岸，低微的吟响同我们悲哀的欹歔在一起。一想到明日，我便禁不住了哭泣。

远岸渔舟的灯火，已然灭去。

在灰色的银雾里，无声地我拿给他一件使我不会从他记忆上滑洛的礼物。 一件微博的，仅少的……。

它随着他，渡过了广漠的海。它不再是它，而是我，它魔术般地带去了我。

在江波上，我——怀着远方相思的我，凝视出自己的形影，是那样地空寞。从那里面飞去了灵魂，凝聚了思索。为了抚摸我的忧郁，不愿意再唱什么歌。

八月天，敲开他的门，带着一棵久别的心，走进他的屋子。他的书桌角上，一个紫檀色的镜框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像。它仍是往昔的模样，而我已不是那时的我了。走近它，我感到无限的怀伤，在人事的变迁中，我已长大了。

轻轻地，我又把它放回原处。

那是又一次的事，买了一篮紫色葡萄去瞧他，紫檀色的镜框中，换上了爱人自己的像。我禁不住孩子般地委屈，禁不住同我的爱人发生了嫉妬。

我梦幻的觉到时光和人生的尘土，朦胧了一切的轮廓。悲愁地想起秋霜中凋零的花朵……。

从镜中额上的皱纹，我读出了自己在沙漠般的旅途上留下的跋涉的足迹。

“看，我老了，怎么会老了呢？”

黄昏时候，坐在无花果树下，我忽然地向他说。

M市的夜街中，我停止在一家像馆的门前。我想摄一张新的，去替代五年前那张旧的。正如我要把现在的自己献给他替代过去的自己。

星期日，我搭着早晨的急行车带着新的像，去到爱人的家。

我恬怩着，不肯解开它的包纸。

但，它却立刻被装进一座银色的，圆月形的白铜镜圈中，放在他天蓝色的灯伞下了。

微笑着，他说：

“这是我的第一个爱人！”

因着他的欣悦，我感到了幸福。而且，那银色的镜圈，也是新的呢。

—一九四〇·六月九日—

足音

一

我归来了，是这样的背负着疲倦和哀伤归来了。

马车从绿色的原野、密林里通过了，在那里惊起了一些美丽的小鸟。我凝视着那些孩提时代熟悉了的景色，沉醉在一种追悼往昔的冥想中。

不久，马车便远离开了那一带静穆的原野和密林，向着城市里急剧地进发去。是的，那马蹄已经响在一条石子路上了。

太阳浓烈地照射在那灰色满是尘埃的街道上，在那里走动一些贫苦的苍衰的孱弱的人们……

夜里，我写信给一个远方的朋友，告诉他我归来了。

我的母亲，她老了，也瘦了，半驼着背。她坐在我的身旁，不断的讲给我一些故乡的人事……

“刘姥姥死了! 你大伯也出家了!”

这些信息已在家信上知道了，因此它就在我的心上也不会再惹起什么情绪来了。

母亲用她的瘠瘦的黑手在她的干枯的前胸吃力的捶着，发出一些空洞的震响来。

我结束了我的信。而母亲还在讲着:

“大姐姐又有了一个小孩，……我和你说过了!咳!我这儿年真不行了。”

七月十五日

二

我寻觅一点醉人的美丽的东西。在一个纯真的微笑里……

于是我开始回忆了，回忆几年前失掉了的微笑……

有一点冷的风，从夜林里走过了。

我吹起一只口琴，我听到了那沉郁的音响。于是在我的脸上有几滴伤痛的眼泪滑落了。

我寻觅到的那美丽的东西，不是在一个纯真的微笑里而是在几滴伤痛的眼泪里。

我渴望着一点能安慰我的东西，于是，我想到了醉人的烟卷。我幻想在那涩辣的苦味里，也许会尝到一些甜蜜的安慰。

因此当我每次走到一个小卖店的窗前，我是那样热情的凝视着烟卷了。

一次，我决了心，我想:

“人家都有着安慰，为什么我不?”

于是我真的走进了那小卖店里。从那里走出一个蓬发污面的老人。我向他说:

“给我两毛钱邮票!”

结局，我拿到手间的，不是能安慰我的烟卷，而是五枚邮票。

七月十八日

三

他骑一匹马来，他把马拴在我们的门前，满是疲惫地走进来。

他变得黑而瘦，穿一件青色的短衣。

在他的脸上现出他生活的辛劳和困苦。他拍一下身上的尘埃便坐下了，于是他说:

“是没有法子的，我是来借一笔钱!"

刹那间，我意识到了来的不是访我们的客人，而是一位我们缺了一笔钱的债主。

晚间，和父亲去访一个艺术家。他和我讲着他的艺术生涯，讲到他的苦闷、深思和苍白色的沉默。

他给我看了许多他的创作，是些灿烂的新的创作...

临走，他弹了一手好月琴，那一支古色的调子。

七月二十一日

四

X来信了，寄来一片忏悔。这是他的第三封信。这，我仍然不想回。

一个能说谎的人，是不使人亲近的。

当你一点也写不出来你想的东西时，你便遇到了致命的苦闷，你思索太久了，于是你感到有些倦了。叹一口气，只好沉默了。

记得有人说:

当你写的时候，你是会遇到许多故事为难你。如果你能克服了那许多复杂性的故事，那么你便成功了。是的，你没有克服了所想的故事，而连故事的十分之一也没有克服，这样你便失败了。

七月二十二日

五

一支歌唱完，总得再唱。一首诗吟完也得再吟。一个神话讲过了还得重讲，而这几本无聊的书看完了就不想再看了。

再也没有好做的了，便穿上一件白色的裙子，走出去。

到城门前的一个古老破旧的报馆。几位老人，他们看守着那一间破漏的狭窄的房舍。

在那里有着几只破凳和几个背负着灰尘的过客……

五年前我曾来过，也曾在那名册上留下我的名字。

五年后我又照旧的在那册上留下了我的名字，忧郁地而去了。

七月二十五日

六

“为了生活下去，你总得想法忘掉过去，寻求着新生!” 这是谁说过了的。

这样我便借来一个风琴，想在那上面弹出我的寂寞……

风琴拿来了，放在屋中的一个角落里。我将将弹到一个黑色的键子，便走进来一位年轻的疯了的女郎。她是我的一个同学。三年前，她曾在一棵葡萄树下给我讲过 “牛郎会织女” 的蓝色的故事。三年后我见到了她，她却疯了。

我站了起来，把琴让给她。

她开始弹了。弹着 “湘累” ——一支生之哀歌。

我边替她编着辫子，边听着她那凄凉的歌声。

她兴奋了，她哭了。她一定是听到了那生的悲哀的歌声而哭了。

她一直弹到深夜，才归去。

七月二十八日

\*本文发表时署名梦荔。

(原载《华文大阪每日》第七卷六期，1941年9月)

沼地里的夜笛

在一个盛夏里，我们五个裁缝女郎坐在樟林的浓荫下，替一家送丧的缝着丧衣。那几件白色的可诅咒的丧衣，在我们的膝盖上拉来拉去，彷佛在默谧地给我们讲说着那苍白色的死亡一样，于是我们不再像往日那样的谈讲我们面前的绿树和鲜花了，也忘了那香麝般的芬芳。我们大家都持着一副森严的脸，低垂着头沉默地工作着。

忽然坐在我们之中的一个忧郁的女郎——毕阿浓她埋下头去呜咽起来。

“阿浓! 你哭什么呢?” 我问。

她用湖水般的眼睛看了我一下，然后又垂下头去哭泣。

我们大家都知道阿浓在恋爱着了，她为恋爱而忧郁。

X X X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在一个晨光里，我们走出去，风温柔地吹拂着，我们吮饮着早晨的芳香的空气。露水没有消灭，我们便走到旷野里去。在那一片苜蓿草原中寻觅着幸福叶了—— (为苜蓿草的一种变态叶，传说为幸福叶。) 我们大家都渴望着那梦幻般的幸福会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彷佛是在寻求生命一样，那般热情的从这里走到那里寻觅。

许多的青蛙从我们的身边跳过了。我们寻觅太久了，有些疲倦，于是我们才停止了寻觅。走到一带无花果树下，从树上摘下来几支熟透了的果子，我们便在那草地上坐下了。

而毕阿浓仍留在旷野里寻觅。

“来呀! 不想吃一支无花果吗?” 我一边剥着那紫色的果皮，一边向她喊。

而那时，我看见一个青年，手中拿着一个笛子，从林子里走出来。他仿佛是看见我们的阿浓了。是的他向着阿浓走去，开始和她搭起话来。

阿浓从苜蓿草地里生气般地走开了，走到我们这里来，脸红红地向我们说。

“真倒运!”

然后她便整理一下她那破烂不堪凸露着膝盖的衣裳靠着我坐下了。

而那年青人，在我们不远的一棵树下也坐下了。他的手指频频地开始在他那笛管的孔眼上挥动起来，于是发出一些优美的甜蜜的音响。

我们大家都给那笛声沉醉了。

X X X

是的，自从那次我们由旷野回来，我们的阿浓彷佛有了什么闯进了她的生活一样，她每天沉没在兴奋、不安和沉思里面，她变得忧郁了。

我们大家已经知道她是和那个吹笛人恋爱着了。

X X X

我们为了想安慰一个不幸的女郎，于是我便开始向她说教似的给她讲了许多空洞的人生的意义。然而那对于一个不幸的人，一点用都没有。

阿浓哭得更伤痛了。

夕晚的时候，大家都归去了。在那草岸上留着我和她。

她抬起她那青瘦的脸艰难地向我说:

“我告诉你，我要远嫁了。”

“嫁给万村?” 我问。

“不，我的养父把我卖给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了。”

她说完了。她颤动地哭倒在我的怀中。

阿浓远嫁的日子，终于来了。因此我们都赶到她的家里去，替她缝嫁衣。在她出嫁的前夜我们围坐在一条长案上，夕晚的太阳照在我们的脸上，我们无言地在替阿浓做一件粉红色的嫁衣。

“听! 你们听见了什么吗?”

“是的，那是谁吹的笛声。”

“那一定是万村来了!"

“他的笛声是多么悲伤呀!"

“是的，他一定是为我们阿浓而来的!”

我说完了，便放下了我手中缝的嫁衣，轻轻地走近阿浓的病床。她正给她自己的哭泣所惊醒。她睁开了她那大而深陷了的眼睛伤心似的说:

“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了，我死了的母亲来了。”

“那一定是妳想了她。”

她拭去她脸上的眼泪忽然惊奇地说:

“喂! 你听! 你听见那笛声了吗?"

“是的! 一定是万村吹着笛子来的。”

阿浓抬起哭肿了的脸，眼睛潴满了泪水，她艰难地从病床上坐了起来，现出十分孱弱可怜的样子，披上一件紫色的短衣，提着裙子踉跄地走近了窗子。伸出一青暴的手来，推开了木窗。晚风吹着她那青年的头发。她凝视前面的一带沼地。而那片沼地已被在严肃的忧郁的神秘的浓雾中了。

许久，那游荡在沼地里的雾已消失了。上弦月悬在澄澈的天宇。那片沼地已浴在月光里了。我们遥遥地看见万村一面吹着那绝望的笛子，一面跋涉在那一片生长着繁茂的芦苇和充满了浊水和污泥的沼地里。痛苦敲着他剩余的生涯；使他的步子变成沉郁、庄严而且冷静了。他走到那带榆树群去，在一棵苍老的榆树下坐下了。他怅然地望了许久阿浓的窗子。他已望见了阿浓了。于是他激动地吹起他的笛子，那伤痛的音调便震响在湿润的夜林里了。

痛苦将阿浓的纯情的心烧成了一片火灰。

“琳! 这笛子太使我难过了!” 她剧烈地抱住了我的脖颈，他的言语被激烈的苦痛而塞住了。

许久，她停止了哭泣，站了起来，在她的眼中射出一种悲惨的阴暗恐怖，向她的嫁衣走去，从那几个女郎的手中，将那嫁衣提在她的手中激动的撕碎，然后迅速地走出门去，向那笛声走去了。

奈良清莲町

白色的友情

——纪念木下京子小姐——

白色的友情，宛如白色的花朵一样，开在我生命的原野，是那么的新鲜，芬芳……永远在我记忆中闪着美丽的光………。

一年，我竟病了，病得那么悠久，我躺在病床上，没有看见春天，也没有看见旷野里的花朵，整天的躺在病床上，听不见一点歌声，那时我寂寞得想起了家乡，但是却没有一个家乡的人走近我的病床，我躺着哀伤的几乎流下泪来，但是将我从这悲寂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只有一位异国小姑娘，她的名字叫木下京子，她常常的向我问；

“田桑！你想谁了吗？”

“没有，我没有谁可想。”

她总是照样的向我说；

“不要难过，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呵！”

夏天到来的时候，她就将我的病车推到院中去，她采了一些白色的花朵，放在我的病车上了。我望着那些白色的花朵带着无限的酸楚，她给与我的一种伟大的友情，使我感到一些寂寞的温暖了。

夏末的时候，我的病更沉重了。仿佛我已走近了死之门，我苍白的向她叮嘱了一些坟墓的事。

她流下泪来替我注射了一针，低声的向我说；

“静静的！不要多想呵！”

X X X X

夜里我从昏迷中醒了，

她在我的身旁，跪在基督神像前面，虔诚的祈祷着，我听见了他的声音；

“上帝！请慈悲—救助她吧！一个不幸的孩子！”

她祈祷完了，走近我的床边，她轻轻的将头伏向我的头上，她的泪就落在我的双颊了，

X X X X

在一个悠久的日子里，我生活在她的伟大的友情中，我在她伟大的白色友情中又复活了。

X X X X

如今，我又从病院走了出来，但是一个伟大的友情就栽培在我的心里。

白色的友情，宛如白色的花朵一样，开在我生命之原野里，是那么的新鲜，芬芳……永远在我记忆中闪着美丽的光………

1945（《新满洲》 康德十二年二月）

伙伴

我们三个家族住在一个楼房里，全是新婚的夫妇，我们六个人全都是穷光蛋，是从家走出来的流浪者，没有一点积蓄，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我们全都是靠着自己的手和脑度生活，因此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

当秋风一刮落了黄叶的时候，我们便都忧愁起来了，六个人都集会在我的房间里问我说:

“琳姐，天快冷了你们怎么办?"

我望了一下远，他说:

“怎么办，简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六个人围着一盏灯默默的想不出一点办法，在我的房子里只喝了一杯白水懊丧的走开了。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远用纸把窗缝都糊了起来，屋子仍然是冷冷的。我披着被子工作着，远吸着烟在思索着什么，我问他:

“你在想什么? 不工作。”

许久他问我说:

“琳! 你把花赶快拿到育婴堂去吧! 快冻死了。”

我看看摆在屋子里的花都黄了叶子，憔悴得十分可怜。

一天我到二楼上颖的家去向他们借点豆油，我看见他们夫妇躺在被子里没有烧饭。我知道他们没有米了。因为前天在上班的路上，颖告诉过我:

“琳! 日子怎么过，我们的米只够吃两天了!"

我请他们到我的房子去吃，他们不好意思而且很难过的说:

“我们一点不饿。”

因为我们是很要好的穷朋友，我便和他们生起气来，他们才到我的房子，我们四个人喝了一顿稀粥。

天气更冷了，我们三家的玻璃窗子都冻结成很厚的冰霜，大家都伸不出手来写东西，于是只好躺在被子里读书。

这种生活使我们有些苦恼。

李先生和刘先生来找远出去，他们三个男子都穿着短衣出去了。

他们的影子消失在一个旷野的林子里。

天已经黑了的时候，他们才回来，三个男子一边谈笑着一边走回来。

我去给远开门，我看见他的背上背着一捆干枯的树枝。他仰着流着汗的脸同我说:

“琳! 这回我们不会冷了。”

树枝放在地下，我们仍然发着愁，因为我们没有炉子。我们只好懊丧的将树枝放在屋子的角落里。

寒冷使我们都伤了风，头有些痛，什么也做不下去了。

后来大家又集聚在我的房间里商量着我们该怎样的度过这个冬天。

我们到市街上打听，一车煤一千多元，然而我们三家谁也买不起一车煤，谁也买不起炉子。

我们想卖点东西，但是我们又什么东西都没有。从黄昏一直讨论到深夜，才有人提议三家合并成一家来度这个冬天。

我起初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三家不但不方便，而且工作也不安静; 然而无论我怎样的不同意，但事实是一天比一天冷得厉害。

现实生活的贫苦使我不得不服从了大家的意见。

在一个刮风的星期日，我们雇了一辆车子搬到我们共同的新住宅去了。

从此便组成了六个人的共同家族，分成了男组和女组，分居在两个房间。

当天我们六个人都将用自己的力气获得的钱拿了出来，开始购买一切用具了。

初夜使我们很不惯，都没有熟睡。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便习惯了。

大家在一起过着苦日子，但是因为我们都是青年，因此贫穷却压不倒我们的志趣。

我们六个人担负起共同的生活担子，谁也不喊什么苦，在高高兴兴的工作着。

六个人全是厨夫，六个人全是扫除夫，六个人全是职场上的工作员。

早晨为了烧饭，很早的便得起床，八点钟的时候，一齐的走出去，一天的时日我们都过活在职场中。

由职场回走，我们又开始烧饭，吃饭。

最使我们感到困窘的便是因为搬到新居，我们从原住处房东借的桌子都被原住处的房东要回了。

我们只得伏在炕上写东西。

日子久了，我们都感到胸部发痛，因此，便各自发明各自的桌子。我将条包上面铺一块板子便做了我的桌子，远用围棋台做了他的桌子。

花了一笔钱买了一个无线电收音机，这可以作为我们六个人的一点生活上的安慰。

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工作着。

我们很关心着国事，一天听新闻也成了我们主要的期待的事件了。

我们的日子仍然是贫穷的，除了维持简素的生活什么都谈不到。

有时大家集在一起想起了许多好吃的东西，每人讲了许多诱惑人的好吃的，使我们都馋得难耐，大家只好和自已说谎:

“好的好的，等我们到街上拾来一笔钱再请客。”这是没有指望的谎言。

为了生活的担子，我们都一直工作到半夜。

我们苍瘦了，然而，我们始终不懈怠的埋头苦干着。

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是谁都有许多书。

无论怎么穷，我们也曾到书店去买书，无论怎样穷我们也不肯卖掉我们的书。

那是我们唯一的家产和灵魂的粮食。

女人们常为贫苦发愁，叹息着。

男人们常为了没有烟卷而苦恼着。

因此当无线电收音机一播送《王老五》的时候，我们也唱起来自己的苦来，唱着唱着忘了自己的苦便笑了起来。

夜里工作太晚了，我们的肚子饿得很，我们想吃点什么，然而什么可吃的也没有，只好忍着饥饿的肚子写东西。

我们六个人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衣服都是那么破旧，脸色那么苍瘦。

忽然间我们之中的颖病了，她病得很厉害，我们都焦急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搜寻自己的衣袋，然而在我们之中寻不出更多的钱。我们便到包里去找东西，然而什么可卖的东西也没有。

共同的家族中充满了忧郁，我们听到了她的咳嗽，我们感到十分难过。

她的丈夫刘先生只好一边叹息着，一边写剧本。他想用文章换点钱给颖治病。

润，要回家乡探望老母，她的丈夫从衣袋中拿出二百元悲哀的说:

“润，我真抱歉，这只够路费, 一点什么吃的也没给你买。”

我们也没有钱给她买点什么吃的，润，含着泪空着两只手别开了我们。

她走了我们十分难过。我走到厨房去，米袋子空了，油也没了。老鼠跑窜在地下，我懊丧的走回来。

“怎么办，米也没了，油也没了。”

大家忧郁起来，李先生和远走出去，他们走到外面去求借。

我们忧郁的在家等待着他们回来。

晚饭过了的时候，他们才回来，懊丧的低着头走进来。

我问他们:

“怎么样?”

谁也没有说什么，低着头，闭着眼睛。

失望使大家沉默着。

许久，我们决定我们应该用目已的力去换钱，吃饭，治病……

颖，在一个角落里，其余的我们四个人也互相鼓励的坐了起来，守着一盏暗淡的灯埋头工作着。

夜静静的。四个人的影子印在墙壁上。

老鼠在房子里跑动着。

十二月十三日

\*本文发表时署名华莎。

(原载《东北文学》第一卷第二期，1946年1月)

XY城的人们

（一）  
我的好友朱华姐姐：  
 一篇圣经感动了我，我爱上帝。他到处医治一些大麻疯，和受难的病人。我开始不再冷酷，享乐和自私了。因此当我接到民生部遣派令的第二天，我毫不迟疑地离开了我的故乡—那片原始的旷野，来到这南满的XY城从事女教师的生活了。  
 我怎么来讲说那城市呢，真是一座朴质的古城。灰色的城壁已颓坍的不堪述说。我所爱的要算那横流过城外的清河了。

XY城人，在那旧式的污浊的服装和痴呆涩滞没有一点光彩的脸像证明了他们是生活在缺少娱乐缺少刺激的人间了。  
 许多悲惨的事发生在这人世间，许多的悲惨事也同一的在XY城发生了。  
 在一个早晨，夫役那么晚的来升炉子，我​​问他：  
 “为什么这么晚？”  
 他一边弄着火柴，一边叹声的说：  
 “一个人跳井了，我去救了半天人！”  
 “救活了吗？”  
 “难说，好像喝的水太多了。”  
 到晚上，那老夫役来送饭的时候，我又问：  
 “那跳井的人怎么样？”  
 “死了！”他说。  
 “死了倒是有福的人！”  
 我不赞同他的话，但也没有方法批评他的话。

X X X X

XY城的粮米，开始配给制，因此XY城内所有的粮米都应该出合。粮米支配制公布了后，街公所的官员便到城内收粮来了。

我们的老大师傅来请假回家。他有一个瞎了两个眼睛的老婆子。和一群瞎了眼睛的孩子。  
 我看看站在门前的老大师傅，他的眼睛却流下眼泪来了。  
 “去吧！老李！把桌子上的两个梨拿回去，带给你的孩子吧！”  
 他匆匆地走出门去，但他却没有拿走那两隻梨。  
 他走了，我真替他感到生的担负的沉痛。  
 老李晚上没有回来，学校的饭便发生了问题，我打发学校的老警管去找他。  
 夜间老警管却没有和老李一同回来。  
 “老李呢？”  
 “老李一家子上吊死了！”  
 “上吊死了，是真事？”我梦似的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是的！老李太可怜​​了。”  
  
（二）  
华：我幼年时代的好友！  
 当我十分盼信的时候，而我却接不到我所盼的信时，我意外的又接到了你的信。  
 我的一位好友！好久被我忘却的朋友！  
 妳的问候使我欢喜，也使我难过极了。  
 我今天有些疲倦，头有些发昏。  
 昨夜我一整夜没有睡觉。事情是这样：  
 我另外在一个医院做了讲师。在医院教了十五个看护士。（一点钟五元钱。）我可以用这五元钱去帮助我的穷朋友了。  
 昨夜到那里去上夜课，恰好落雪，我没有能回来。于是便留宿在那里一夜。  
 恰好那夜十三号病室抬来了一个雅片中毒者。  
 华：再也没有一个雅片中毒者的现象使人感到颤栗而困惑了。  
 医生给他施行了一种中毒还元治疗。  
 雅片中毒者便在中毒还元治疗下开始痛苦，牙齿便从痉挛的唇间突露出来，狰狞的样子，使人感到害怕。  
 那可怜的被雅片诱惑了的青年，酒精在他血管中活动，在他身体中起始复活起来被雅片杀死的细胞，这种还原的组织，使他的肉体感到了剧烈的痛苦。他仿佛被鬼魔鞭打了一样痉挛地喊叫起来。他举起双手恐惧的求救的伸向我们。  
 华姐：他一定是被雅片的快感诱惑了，使他那样的堕落。  
 我们也如此常常的不肯跟随着我们的理智去吃苦。便被感情给毁坏了。  
 实在的，有毒的花开得最美丽。  
 当那雅片中毒者，鬼一般的狰狞的不住的打着喷嚏，伸懒腰，流眼泪的难看的样子时，我想起一件事。  
 便是我们这XY城今年风行雅片的事了。这一年，将会造成多少XY城的雅片中毒者呢？…………  
  
（三）  
亲爱的华姐：  
 你的“他乡”读了，挺爱它。  
 “女优之像”也读了。  
 《巴尔扎克的遭遇》也读了。巴尔扎克的朋友严格的批评了他的生活。但也正因此他完成了他的巴尔扎克的所有。他的一切变形的人格，全都是必然的。  
 无论是在女优之像之文章里，或在事实，女人总是被牺牲的一个可怜的分子。  
 我的一个女同仁，她将进三十，便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商人。不久，她的丈夫变成杀人犯进了牢狱。她的丈夫把前妻杀了。  
 这消息实在使人颤栗。

X X X X

妳嘱我好好的用良心去教学生们。  
 是的，我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决心了。  
 不过，我是一个性急爱发脾气的人。对学生我常常的发起脾气来。  
 譬如今天，我给她们讲教育的遗传问题，讲门德尔的支配和分离法则，讲母细胞配偶种子的成熟的**过程时**，她们之中便有几个发哭的，当时激动了我的愤怒，于是我便发了一顿脾气。  
 孩子们的无智实在使我耐不了。  
 其他要算我们的待遇了。待遇太低使我们的生活有着极大的不安。  
 我们十四个同仁，全是度着穷困的生活。我不用讲给你更多，只是告诉你，我们怎样的处置了我们午饭时间，你便知道了我们的一切。  
 我们都没有钱吃午饭，只好都忍受着饥饿的肚子伏在我们的工作台上，改着学生的笔记时，我们都会听到我们的肚子的鸣响了。  
 竟有一天，我们从大劳作回来，我们都饿透了。但，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笔钱买一点贵人们吃的点心，于是我们竟把土豆种子煮吃了。  
 只要妳到这里来，妳便会看见这些教师们全是一些荣养不良瘦弱而又苍黑的。  
  
（四）  
怀念着的华姐：  
 我倦极了，你的信是我从学生家庭访问回来读到的。  
 妳不要胡说，我会生气。恋什么爱，那都是传言。如今的我讨厌那把戏。你不要再提到郎，忘掉耻辱的人是猪。  
 华：我应该和妳讲到的是我三甲的几个虚弱儿了。那几个虚弱儿的样子，使我难过。于是我便实行了家族调查访问。  
 下班后，我便到民丰五条的一间破落的房子金珍的家了。寒冷的屋子，使我进去便打起颤抖。  
 她的父亲是一个矮个子红鼻尖的石灰石匠。身上和发上涂落着一些灰白色的石灰粉末，当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看见他那副歪斜的脸上也挂了许多石灰粉末。  
 她的母亲恰好快临产了。穿了一件破袍子走动在地下，阵痛使她的整个的脸变得苦歪了。  
 我本想走开，但是，她们的家是很需要人帮忙的。  
 这位石灰匠有了七个大小的孩子，乱喊乱叫的哭在房屋里。金珍要算是最长的姐姐了。她是那样耐性的给那些孩子们剥食土头。  
 因为他们没有钱请助产士，我便从事了那肮脏的使人呕吐的助产工作了。  
 产妇的骨盘狭窄，几乎近于难产，大出血使产妇的脸色苍白得宛如死了一样的卧在那黑色的半截的坑席头上呻吟着，狂叫着。当她第三次阵痛时，我大胆的将手伸进胎盘才将孩子替她产生下来了。  
 金珍的父亲取了些柴草，燃着，暖了暖那小东西。  
 她们贫穷如洗，找不到一块包孩子的布，于是我把我的包袱皮给了他们。  
 一切完了以后我和金珍的父亲谈到了金珍的虚弱，和她的咳嗽的上面去。  
 “陈老师：我们的家本来不配供一个女学生，金珍那要强的孩子，非想念书不可，所以她做夜工，我可怜的孩子，当父亲的真是万分难过。”  
 她的父亲却流下了眼泪，我从来不曾看见男人会在陌生的女人面前流下眼泪。  
 华：我才知道我是弱小极了，我有什么力量呢？我难过极了？  
 明天试试看能否替她请请免去学费。  
  
（五）  
我的好友华：  
 告诉你，我要离开这XY城了。  
 动机是在一个礼拜日，我为了太寂寞便去看电影去了。  
 伤痛的又太深了。  
 我正在快活的时候，便上映了NEWS片子，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我们那些愚蠢无知的蒙古女人，在众人面前跳着野蛮的蒙古舞，当那怪样子显得愈吃劲时，观众便愈哄笑得震响。  
 我的同伴田井信子她向我说：  
 “真有趣！”  
 我心痛的走出影院。  
 这便是所有的一切，我决计离开XY城了。回到我们的蒙古地带兴安岭去。有人说那里的风沙大，风沙算什么，但，我爱我的蒙古族，因此我一定要回到那里去了，去教育我们的野蛮的蒙古孩子，到那风沙的兴安去。  
 我的好友华，再谈，到兴安岭会有信给你！

你的朋友陈琳

一九四三年四月开原

[原来编辑器] 但娣:

奈良女高师出身的满洲女作者，以《安荻与马华》一篇小说，震骇了海外文坛，所作小说，极富田园风味，文笔灵颐，宛如春山幽谷，小品及诗亦均擅长，为满洲堪可期待之一女作者，刻供职于开原女子国高教员。

(原载《妇女杂志》[北平]

望乡

黄昏风过，天色薄暗了。一条街角的丽屋燃起了一只红色的灯……。

我和她回来了，回到一个空空的大院落，门却紧紧的上了锁；我和她在门前在那空漠的大院落里，望着灰色的云来回的走动着；仿佛一个古庙，静静的……

“家山呀！北望！”她和我望着北边的天云，我们都想起家来了。

我们的脚步低响着，我们的乡愁更忧郁了。

我们仰着头望着那凝冻的天，一群乌鸦飞过去了，黑色的影子落在我们的心的旷野上了。凄凉，寂寞……。我们就不再唱了。

**× × ×**

仿佛是下雪了，我和她默默的坐着，她似乎又想起了家，泪水含在眼中，不再说话，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低着头凝视着炉火……炉火快熄灭了……。

一定是落雪了，我们躺在被子里听见夫役在扫着门前雪，将一生掷在异乡的垂老的夫役，他从门外说话了：“老师们！落雪了！”

落雪了…………。

—开原—

天涯寂寞

天涯寂寞……我常常的唱着这一歌。

许多年前我们却是不懂这寂寞的歌的英雄。

去年的秋天。山里落着黄叶，我去诀别六年多的郎，他苍白的面向着西窗，吸一只烟，又吸一只烟。如今他忘却了我，我也忘却了他。

**× × ×**

从远方来了一封信；她告诉我：

“我吸一只烟，又一只烟；”

几月前她来了，她穷迫的样子，使人看到替她难过。她仰着面燃起了一只烟。她说：

“两年后我将作一个庙上的客！”

她一定也是一个流浪者。

**× × ×**

几日前，我到北方的落雪的站驿，去送一位从古城来的他乡人，在朦胧的食堂，她喝了许多酒，沉默的吸一只烟，又一只烟。

**× × ×**

天涯寂寞……我也常常的唱着这一只歌！我的朋友呵！我也常常的感到了天涯寂寞。如此我吸一只烟又一只烟。送去了我这孤独的天涯寂寞的夜……

—开原—

樱花的季节

四月的风，摇撼着生长在山腰上的丛林的尖稍一样，松，白桦，枫（还裸着体）和开花了的马醉木。它那雪白的成串的小花朵，在碧绿的叶子间发放着芬芳。丛林的根脚下稠密地生长着车钱草，羊齿，勿忘草…………。

在狭隘的，阳光透射不过来的一段山路上，一个修路的工人，低低弯曲着腰身，机械地转动着宽边的脊背，不间断地挖掘着枝洪积的砾成岩。

一个女人来了，从山上往下走着。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住，用手去摘断崖上盛开的樱花，然而那花太高了，她的美丽的消瘦的面庞，不禁浮出一抹哀感。

于是他无言地替她摘下一枝淡粉色的樱花。女人，用年轻的纯洁的眼光凝视他——一张长满黑雀斑和疮疱，有着狮子样的鼻子的脸。当她和那充血的眼光接触时，她有些恐怖起来。但不久她就安静了，因为实在他是很和蔼的，而且他带着热情的声调和她交换了两句简单的话语。

她微笑着向他道过谢，肩起她的货箱——那里面放着蜜柑，糖，青果……，折断樱花的小枝插在黑色发亮的长发上，便沿着山路去了，轻得像雾般地去了。

他望着她的麻布衣的背影，怅然地拾起落在路旁的松果，又无感觉地丢掉了。

猴子，倏地在树丛间穿过，显露出红色的屁股。

“喂，你站下呀！”他把声音低得几乎连自己都听不清楚。他的心颤动着，脸被羞根给染红了。

一匹不出色的狗，短短的黄色毛，跟在他的后面，不住地摇动着尾巴——那是他唯一的侣伴——，他用脚踢它，于是那黄狗发出一声尖锐的吠叫。

他完全无力地又继续挖掘着……………………。

若草山上，蠕动着蚁样的人群，在樱花树下，他们都喝得烂醉，无羞耻地，疯狂地唱着，笑着。舞着——他们不是在跳舞，只是膀子抱着膀子地恍动。

那些带角的鹿也在献媚地乱跑着，用鼻子不住嗅着游人们伸出来的手，而想索一些煎饼，或别的食物。

一对对的情侣从鹭池畔走过，没有忧愁地谈笑着。

远方的景色，渐趋朦胧的时候。

他从山腰走下来，满脸堆着哀愁，眼睛里荡动着郁积的欲望的光闪，在贪婪地寻觅着什么。最后他颓然坐在庙塔的石堆上！

“也许她回去了？…”他想。

归去的少女们，一边歌唱，一边在他面前走过。优美的，动的，激昂的，韵颤的，从低音转到高音去的音调，到处散播在袭近的暮色里。

夜来了，景色全都为蓝色的烟雾所覆遮，建筑物已看不清它们的形像，只更加浓了它们的阴影时，他离去这块嘈杂的地带。从一家酒店的门前经过，他想：“那管醉一回呢，那管一杯呢！”他绕着酒店的窗子瞧来瞧去。在暗淡的灯光下，他的衣服显得更旧更褴褛了。他做出各样的姿态，在那酒店的门前停立了许多时间。

一九三九，四，十二。 —奈良若草山下—

两地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我因为失掉一个友人的信息，便停止了所有的工作，整日地哭泣。邻人们以为我是有了意外的丑事，她们都用轻视的眼光注视我，议论我。

每天，我很早就走出去，徜徉在西郊的旷野上。

在那里，有几座死魂灵的坟墓，孤独地躺在雨丝的脚底下。因了年久风雨的浸蚀，已经残缺得十分难看。从来没有谁注意到这块土地，也没有谁来访问这些凋零的景色。因此枯萎的草茎中，常有土鼠一类的小动物穿过。从那里，可以望见远方耸立的忠灵塔，村落，黑色的河流……。

一日，我又照例地在那里踟蹰。

我和秋色一样的被葬在悲惨里，……空虚，无力，冰冷……。

我望着悲哀色的花岗岩样的天空，寂寞地流下来痛伤的泪。

那时，我的背后响起了足音。

——犯人过去了吗？——一个小姑娘问我。

——不知道。——我说，我用手抹擦我的眼睛。

——从这里，能走到西大营去吗？——她又问我，她的腊瘦的脸庞俯近我。

——不知道。——我低垂着头，不幸压倒了我。

许久，我又抬起我沉重的头，我看见她仍然徘徊在土岗上，因为她的衣服的单寒和濡湿的细雨，她在冷风里颤抖着。用褴褛的衣襟不住遮掩一个绿色的小包。

她的举动，使我很难过。我后悔，仿佛我虐待了她。

终于，她走开了。绕过一幢对称的红色的寂寥的建筑物。

我的怜悯使我不得不追从她。于是我也走下了土岗。

蓦地，从一条荒径上，走过来一队囚犯。已经许多日子了，我每天看这些囚犯，从这里走过。背负着愁苦，提着自己的饭碗，默默的走过。

那个小姑娘，她开始向囚犯摇手，点头，……做了好多的手势。

她用忧虑的，哀愁的眼睛注视着囚犯队伍的进行。突然她飞似地跑近前去：

——哥哥！她喊。

她捉住一个年青囚犯的手。但立刻她又被守兵给推开。而她的小包落在别个守兵的手里。

——去！滚开！——

——哥哥！——她的眼睛放射出寒颤的光，脸色变得格外地苍白。干枯的手指不住地揉抹着双颊处流下的泪珠。

当她从地爬起来的时候，囚人走远了。

冷风扫荡着树上的枯叶，因此那些枯叶，便簌簌地落在荒废的车辙里。

雨在落着。

—一九三九，八，十六。—

湘莪

在我那里，只存留着一张相片，它经过五个年的岁月的洗刷，必然是褪色了。

结识未几，就是迢遥的别离。那前夜，我们坐在月光中，看着江水击打砂岸，低微的吟响同我们悲哀的唏嘘混在一起。一想到明日，我便禁不住了哭泣。

远岸渔舟的灯火，已然灭去。

在灰色的银雾里，无声地我拿给他一件使我不会从他记忆上滑落的礼物。一件微薄的，仅少的……。

**× × ×**

它随着他，渡过了广漠的海。它不再是它，而是我，它魔术般地带去了我。

在江波上，我——怀着远方相思的我，凝视出自己的形影，是那样地寂寞。从那里面飞去了灵魂，凝聚了思索。为了抚摸我的忧郁，不愿意再唱什么歌。

**× × ×**

八月天，敲开他的门，带着一颗久别的心，走进他的屋子。他的书桌角上，一个紫檀色的镜框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像。它仍是往昔的模样，而我已不是那时的我了，走近它，我感到无限的怀伤，在人事的变迁中，我已长大了。

轻轻地，我又把它放回原处。

**× × ×**

那是又一次的事，买了一篮紫色葡萄去瞧他，紫檀色的镜框中，换上了爱人自己的像。

**× × ×**

我梦幻的觉到时光和人生的尘土，朦胧了一切的轮廓。悲愁地想起秋霜中凋零的花朵……。

从镜中额上的皱纹，我读出了自己在沙漠般的旅途上留下的跋涉的足迹。

**× × ×**

“看，我老了，怎么会老了呢？”

黄昏时候，坐在无花果树下，我忽然地说。

—一九四〇，六，九。 奈良—

徵吟

一

只有无言的悲哀，无哭泣的悲哀。

一个陌生者开我安静的门。

他去了，我的屋子便留下了凶恶的魔鬼的大手，我害怕了。我便等待我的末日到来，我想了许多没曾经验的事………铁锁和灭亡……………。

这样，我一直等待到天黑，还不见有谁来领我去，领我到一间黑房子里去。

**× × ×**

又有一隻手叩着我的门，在那次日。

我想…末日该来了，我从床上起来，我觉得我将和我的亲人们诀别走到那黑色房子去了，我寒慄地替他开了门。

又是一个陌生者，我一点也不敢辨认他是谁。他告诉我，他孩提时曾到过我的家。

是的，我记起来了，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我们有十几年不见，他长大了，他是从一个古城而来的。

他去了，我想起来自己的身世，如同到处飘落的黄叶………………。

只有无言的悲哀，无哭泣的悲哀。

二

无慈悲心的运命落到我的身上。悲哀的魅力诱引了我的全生。

我在苦思着，手中拿把雕刻刀子，我在雕刻着阿尔布斯的山脉和峡谷……………。我的意识里，往事也深深地雕刻了些山脉和峡谷……………。我在那里迷失了，仿佛天黑了，在那里我喊出绝望…………但，一点也听不到什么反响的回声。

我继续雕刻着，我的刀子已走出了笔规外，我雕错了，把整个胖圆型雕错了。许久我才发现我雕错了我的图案，我发现了我许多天的劳力都完了，我便哭了。雕刻刀从我的手中滑落下来。

三

悲哀像一条冰河剧烈地冲过了我的心谷，在那里它开始侵蚀，剥削。仿佛在那里有肉和灵的岩屑破碎而研磨…………。于是我感到了一种阴惨的沉痛的生的灭亡………………。我在绝望的断崖上摸索，迷惑…………在无救里绝泣。

新生便在灭亡的悲鸣回声里诞生了，他渺茫的来了，唱着歌而来的。

四

待我一天从工作完了，走入我的睡眠时，我合上我的眼睛，再睁开我的眼睛。于是我面前便展开了一带潮湿的哀愁，这哀愁倒不是诞生在回忆的田野，而是在雾霭的预想的高峰。

我企望幸福，我便看见了企望的宫殿里的桂冠诗人，他比谁都美，更美，十全的美。他比谁都忠诚，更忠诚，十全的忠诚。

来了，他来了。

我还正流着眼泪，我没有来得及擦去我的痛伤的眼泪，他便来了。

手里拿着玫瑰花环，那真是爱人的花环。他轻轻地放在我的头上了。

我用言语的眼睛谢了他的美意。

我看见他在愿望的树下站住了。

“我整整地寻觅一年了，一年该不是容易忍耐的日子，能为我而舞吗？姑娘！”

我有些动心了，我调整了我的步子，是想用我的欢悦跳一次狂恋的回旋舞。

在没有人类的荒岛上，我自己便是一位女王了。採满了幸福的花，在林子里随着鸟的歌声，欲念的音乐而舞了。

“舞哟！今宵！忘去吧昨夜的梦的烦恼！舞伴！”

我在唱着，我便听见我的父亲——理知的父亲。他在喊：

“孩子！你欲灭亡吗？”

一点风吹动我的窗子，我的思索便为之而颤动，梦想从甜蜜的图里惊醒了。

我的思索便在一些亡失的林子里亡失了。

—一九四二，一，四。 奈良—

关于奴化思想及伪满作家

——质之于要望先生

在十二月九日的光明报副刊上，登载着一篇题名为《我读了东北文学》的作品，是专对我的那篇《血族》而发的。据要望先生所指出的劣点有两条，一、血族稿子内含有奴化的思想，二、系为伪满女作家。看了后心里实在有些惊吓。因为现在正是除奸呼声高涨的时候，我写的文章既有奴化思想，而本身又被称为伪满女作家，事件实在是很重大的。所以为了各方面的利害关系，不得不来辩明一下，免得背谬了事实。

首先我要解释的是血族那篇稿子，确系伪满时代所写作的。因为检阅不通过，所以就没有出版。所以其中不但发生的故事是伪满时代的故事，就连我写那故事的立场，亦站在伪满的立场上。所以中间有日本人的故事，并且亦没有敢深刻的露出反抗的意味来，但在暗暗中自信尚有一种潜在的思想，而针对着当时的政治。所以在写作的当时，实在毫没有想使它含有奴化的思想。

但不幸现在却被要望先生指出来，说是确实含有奴化的思想。原因是为了说了日满协和的话。日满协和的话现在当然是人人讨厌的东西，但在伪满当时，却是一般日语不太通顺的人为了办事便利所常说的。要望先生说没说过我虽然不得而知，但在我自身，却实在是说过的。因此在这里我觉得写出来是件真实的事情，并不算什么奴化的思想。

其次是“哥哥又到高桥家看鸡了，高桥家的鸡长得那么美丽肥大，他真有些羡慕。”这一点也被要望先生指出有日满协和的意味来。其实要望先生也许没有细看那篇稿子，因为在下面不久，又写出自己家中的小鸡瘦得可怜了。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就是为了要暗示日本在东北，对于我们人们剥削的情形来。这是任何人看了后，都会明白的。至于写的不太明显，那也是伪满时代作者的不得已的苦衷，没有什么可以被人嘲笑的。就连这样，稿子检阅时还没有通过，一直在书铺搁到事变，不曾出版。

事变后，书铺因为没有稿子，就向我提议这东西这次应该出版了。我也觉得在事变前不曾出版生了次气。这回该是发泄的时候了，所以就答应了他。不幸在幸在排印时又不小心，把“新京”二字被编辑给改为了“长春”了，又没有注明年代，但这也不是什么大了不得的事，谁知就被要望先生大指摘了一遍。给按上了“奴化思想”的名词。自觉实在冤屈得很。

二、是关于“伪满女作家”。但不知这名词是要望先生依据什么而给定下的。记得在伪满时代我虽然也写过稿子，但因为始终不拍马，不写决战文学，许多人都冷视我，连日本人都说我不够满洲的女作家。不料想在光复后却长了身份，居然也被人列位作家的群里了。实在是可喜而又可怕的事情。尤其是按上“伪满”两个字，更令人感到批评者的阴险。

我是不是伪满的女作家，是要依据着我的作品而决定的。而我的作品是否伪满的东西，却又要依据我作品的内容而决定的。假如作品的内容并不是属于伪满的东西，而因为我在未满的买报纸上发表了，硬给我按上伪满女作家的名词，这恐怕有些不合公理吧？假如我们那时把非伪满的中国人的作品登一篇到报纸上，那么那人也就成为伪满作家了吗？假如说我“曾经借用了伪满的纸张发表稿子”那我倒敢承认，而凭空给我按上一个“伪满女作家”类似汉奸的名词，我觉得这完全是诬赖，而不敢承认的。

我想一个批评家批评作品，须要用正义的笔的。凭空的诬赖和有意的陷害，都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十二月十四日

（1946年《东北文学》第一卷第二期， 6-7页）

一颗不灭的星

巴来同志（本名金剑啸）上海艺术大学毕业。一九二三年在哈尔滨参加反日会，加入共产党，做抗日文艺工作。一九三四年在齐齐哈尔编黑龙江民报副刊《荒田》。组织白光剧团，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与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后被日寇逮捕就义于齐齐哈尔。巴来同志是画家，也是文学家，曾写过白行长诗《兴安岭风雪》（歌颂抗联）、话剧《黄昏》等篇。

——摘自哈尔滨烈士馆材料

巴来同志：听说，你死了的时候，没有坟墓，但我啊，我和人民用最沉重的感情为你筑了一座最庄严的坟墓，是啊，你的墓就筑在人民的心里！

听说，你死了的时候，没有谁献过花环，我和人民都在继承你的事业，用你理想的花，献给你的魂灵。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我的故乡齐齐哈尔就变成了地狱，人们在苦难的日子里熬煎……

那时，我虽然还年轻，但心灵已笼罩着一层愁云……常常吟唱着一只歌：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

…………

问君还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失掉祖国的哀愁，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呵！

正当这个时候，巴来同志，你来到我的故乡齐齐哈尔。听说你这个拓荒者就要在这个地方拓荒，你这个精神食粮的播种者就要在这个地方播种，听说你在黑龙江民报开辟了《荒田》（副刊）。

这消息象春天一样，带给我无限的喜悦和希望。我是多么期待着《荒田》问世啊！

记得一天，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我们一群学生围着刚刚诞生的《荒田》，静听着朗颂你的《兴安岭的风雪》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诗篇？

啊！巴来同志！你愤怒的火焰点燃了我们青年们的心灵。你的仇恨移植到我们青年们的心里……

从此，我们每天读阅着《荒田》，我们在荒田里听到了你的召唤。

你说：伤心是无聊，要的是力量。

我们便互相劝告：不要伤心，要的是力量！

你说：种子埋在地下，就会长苗。

是的，你亲手将革命的种子埋在人民的心里，它渐渐地在发芽在茁壮……

记得那是一个秋夜，我的阶前响过一阵足音，是谁的足音？抑或是西风吹刮着落叶？不，不是风，是谁在敲门？我开开门，进来了一位新客——高高的个子，满脸清秀的年轻人。

原来这位新客就是巴来同志，就是我们青年学生最敬爱的那位年轻的编辑！就是亲手修改过我第一篇文章的那位勤勤恳恳的良师，我惊喜地给你让坐，我等待着你的批评或指教，但是你却提出了另外的一个问题：

“我来找你参加我们的白光剧团。”

我低头沉默着，因为我知道父亲不会答应我出去演剧。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演剧的才能。

你张着一双希望的眼睛又说：

“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后来我告诉你：“等问问我的父亲。”你一边告辞，一边严肃地劝说：

“你应该参加！你好好地和你父亲说说！”我送出门去，你还再三地嘱咐我：

“你一定要说服你的父亲！”

秋天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告辞了；齐齐哈尔飘落的不是黄叶，却是白雪。

你披着一身白雪，踏着雪路，叫我去看看你们演的剧，你说可以受到教育。我也披着一身白雪，踏着雪路走进了剧场。

是多么动人的剧啊！如今我还深深记得那动人的情节：在一个深夜，在一个地下贫民窟里，横躺竖卧着许多赤贫者。一个鞋匠，端着一只蜡烛，弯着腰，在寻找着什么……他找遍床底，找遍鞋箱……他一脸焦急，他究竟丢了什么？他脸色变得那么苍白，终于张着两只手哭了，这哭声惊醒了全屋的人们。

“你找什么？”

“我的钱丢了！谁偷去我的钱啊！”

“你几时有过钱？”

“我借来的，借来给妈妈买棺材的钱啊！”

他一字一泪呵！是谁偷去了他的钱呢？

谁能够这么残忍，连买棺材的钱也给偷去了呢？一定是饥饿迫使他做出这样残酷的盗窃行为……

记得就在那夜，也上演了你写的《黄昏》。

是一个黄昏，黄昏从窗外落下。

一个老人在床上呻吟，啊！多么悲惨的呻吟啊！她一定病的很重，一定快要死去了。一个少妇在床边啜泣。

忽然门开了，是儿子来了。他一身褴褛，惶惑地掏出了一把钱，少妇吃惊地问：

“钱？哪来的钱？”

“车到山前必有路，快！你快给妈请大夫去！”

他的话还没说完，便听见外面一阵急骤的敲门声。

媳妇机警地提醒他的丈夫：

“警察！快！快打窗子跳出去！”

儿子惊慌地从窗户逃走，警察拿着枪冲了进来又冲了出去。外面响起一阵枪声，母亲脸色苍白地喊着儿子的名字，外面又是一阵枪声，母亲就在枪声中咽了气。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着一大堆难解的问题：儿子被逮捕了吗？母亲的后事怎么办？媳妇又怎么活下去？

啊，巴来同志，你真的给我上了课。从那夜起，我开始憎恶那不平的黑暗的社会；从那夜起，我开始憧憬一个自由幸福的生活！

春去，秋又来；花开花又落……多少日夜象流水一样逝去……

我到远方去了，终又回到故乡，听一个刚刚被释放的教员告诉我：

你从哈尔滨战斗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战斗到哈尔滨……

是一个春夜。

你刚刚送走了你的同志，你刚刚燃着一只蜡烛读起《母亲》，你忽然听见一阵犬吠，你听见街前响着摩托车声，你心想不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吧，你悄悄地掀起窗幔，你看见在你的门前旁停下一辆摩托和一辆囚车；你忽然看见几个端着枪的黑影，描准你的窗口，后来冲进了你的房子……你还没来得及和你的妻子告别，还没来得及亲一亲你的女儿……他们便把你捆绑着，拖出去，推进了囚车……

在哈尔滨你受尽了折磨，你又被一些拿枪的看守兵坐着一列夜车押回齐齐哈尔。

他说，他就是在齐齐哈尔监狱的铁窗口认识了你。他常常在一个铁窗口，看见你的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他说他常常看见你依着铁窗口哼着歌子，你常常用这歌子鼓励着你的同志，他说你常常吟唱着普希金的诗，他说你真是一个革命乐观者！他说你常常在深夜被拖出去，听见鬼子们象野兽一样吼叫着审问你：

“你说：你们白光剧团有多少团员？都叫什么名字？”

“你说：你借给谁红色的书籍？”

鬼子在等待着你的回答，可是你啊，你一言不发。

“剥光他！吊起来！”

你被剥光，你被悬在房梁上，但是你啊！你仍然闭着咀坚定地一言不发。

“你说！不说就打你个粉身碎骨！”

鬼子的皮鞭抽飞了你的肉！鬼子的皮鞭被你的鲜血染红！你啊！你咬紧牙关依然是一言不发。

他告诉我象这样的酷刑，你不知挨了多少次，数也数不清……你常常是遍体鳞伤地被拖回来，别人为你难过而流下了眼泪，你却说：

“不要哭，要的是斗争！”

啊！巴来同志：你真是一位坚强无畏的战士！你啊！你给予了同志们无限的战斗力量！

一天，你的牢门突然被打开。你昂着头，挥着手，向抓着铁栏杆为你的就义而流下悲愤之泪的同志们告别，你意识到这已是你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你高声地嘱告着你的同志们：

“要斗争！要斗争到底！”

这就是你留下的唯一的遗言，你没有一点悲哀之意，你从容地一步一步走向刑场。

是的，当一个人决心把自己献给人民的时候，献给党的时候，他会感到他的牺牲是最光荣的。

巴来同志，你的死更激起了人民对敌人的仇恨，人民都暗暗地发誓，一定要为死难者报仇！

巴来同志，你的死更给予了人民以力量，人民听到了你的召唤，沿着你踏出的路子前进……

巴来同志，今天你的意志已经实现：

祖国再没有你所憎恨的《黄昏》，也再没有你所憎恨的人剥削人的情景。

巴来同志！烈士们用鲜血灌溉的革命花朵，已开遍了祖国啊！祖国的今天有多么光辉灿烂！

党和毛主席引导着全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刚刚结束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开始了。到处飘荡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到处震荡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锣鼓。

巴来同志！在你足迹踏过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正在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工人们正在打着最高速度的快车，标兵苏广铭要把车床由四百五十转提高到六百转以上，到七月份他即将飞跃到一九六四年去了，孙茂松要把车床由六百转提高到七百转，七月份他也将跨进一九六三年度去。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人们正在总路线的照耀鼓舞下和时间赛跑！

在最后撒过鲜血的地方——我的故乡齐齐哈尔，现在变的多么美丽啊！嫩江边建设起无数灯火辉煌的工厂，富拉尔基由荒原已经变成了铁水奔流的钢城。

巴来同志！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人民都在继承着你的事业。在我故乡齐齐哈尔的《嫩江》编辑，和在哈尔滨的《北方》编辑们都正在发扬光大你的事业，巴来同志，过去曾经你亲手培养过的我，今天也在伟大的党的总路线感召下，愿用全部的心血和热汗为社会主义大厦多砌几块砖多垒几块瓦！

是的，巴来同志，你没有死呵，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你没有倒下去，你英雄的巨象正如同矗立在海岸上的礁石一样，永远竖立在人民的记意里……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初稿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修改

\*本文是作者为纪念剑啸就义二十一周年所撰

我和大海

我独自跑去看大海。

大海还在梦中，她的脸披着朦胧的雾纱。

我象大海的恋人一样，向他呼喊着：

“啊，大海！你早晨好？”

大海在我的呼喊声中醒来了。

一排排长长的海浪，唱着雄壮的歌，向海岸涌来。

大海捧起宇宙的生命——太阳之神。

于是，碧蓝碧蓝的大海，荡漾着一片金灿灿的光波……

我脱下衣衫，露着胸膛，赤着脚，走向那茫茫的大海。

大海哗笑着，涌起白色的巨浪，向我扑来。

我也嬉笑着，张着双臂，向大海扑去。

我和大海拥抱在一起。

我仿佛听见大海恐吓我：

“我很凶猛，会把你吞掉。”

“我不怕，因为我要向你索取勇敢。”

“我要淹死你！”

“我不怕，因为我要向你索取智慧和财富。”

“你还要什么？”

“我还要坦荡、开阔！”

“你还要什么？”

“要象你一样，无穷尽地探索！”

大海哗笑着，掀起一个凶猛的巨浪，打在我的身上。我被这凶猛的巨浪打得翻滚……我往下沉，往下沉……

我咬紧牙关，憋住气，憋住气……使足力量又浮向海面上。

我仿佛听见大海向我说：

“要索取，必须给予！

要获得，必须牺牲！”

我明白了，大海为什么这么勇敢、坦荡、开阔、富有、无穷尽地探索。大海只有给予，没有索取，大海只有牺牲，没有获得。

沙滩上

我独自在沙滩上跋涉……

在一片荒凉的、金黄色的、细细的、柔软的沙滩上，留下了我一串串的脚印。

我已在人生的沙滩上跋涉了漫长的岁月。

我的脚步踉踉跄跄，因为我背负着的忧郁太沉太沉的缘故。

一个脚印是一支歌，

我的歌似白云悠悠，

我的歌似秋风瑟瑟，

是谁在我的歌里注满了惆怅和哀伤？

是谁在我的歌里注满了鲜血和泪水？

我知道了，是我的希冀的翅膀受了伤，是我的梦想变成了泡影。

严峻的海风吹拂着我，使我蓦地清醒过来。

我仿佛听见海风在向我说：

“厌弃你的惆怅和哀伤吧！

擦掉你的泪水吧！

因为你还要继续跋涉……”

我在沙滩上的脚步，突然那么急促、矫健。

我在自己的脚步里，听到了我的歌：

“跋涉啊，跋涉！

跋涉也有珍贵的给予，练强了我的韧力。

我还要在跋涉中敲起战鼓咚咚，

我还要在跋涉中唱支前进的歌。”

我将采一束浪花的蓓蕾

我独自伫立在岩石上，眺望那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看见一只孤独的小舟，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

蓦地，海上起了风，大海波浪起伏。风越来越大，波涛汹涌，一波盖过一波，一浪高过一浪。

风呼啸着，象一只猛兽，在海面上横冲直撞，大海掀起奔腾的巨浪。

我看见那只小舟，在狂浪里颠簸。

我暗暗为他祈祷：

“驶向港湾吧！”

可是，茫茫大海，哪里有港湾？

我暗暗为他祈祷：

“快来一只救生船吧！”

可是，茫茫大海，没有一只船影。

那只孤独的小舟，已被巨浪打翻，船尾在浪尖上，船的桅杆已被狂风折断。

我大声呼喊。

我的呼喊被疯狂的风声和凄厉的涛声淹没。

我看见那只孤独的小舟，掉进了浪谷里，沉入大海。我暗暗为她流下泪来。

蓦地，我看见那只孤独的小舟，穿过浪花，又漂浮在浪尖上了。

啊！我明白了：那只小舟，是同命运拼搏的精灵。

我也是一只孤独的小舟，

我欲在人生的狂风里旋转，

我欲在命运的巨浪里翻滚，

我将采一束浪花的蓓蕾。

1986年8月于哈尔滨

为《长夜萤火》诞生而欢呼

一

《长夜萤火》的出版，我是很激动的。

这本书的出版不同于别的许多书的出版，她经历了一段曲折、艰难的历程。

这些作品是东北沦陷期东北女作家在日本血腥统治高压下写的，解放后这些作品被打进了冷宫，长达四十多年漫长的岁月，今天才从冷宫出来，重见天日。

用林莽同志的话说：

“是被抛弃在冰河之中的枯萎之花，是浮沉在冰河底层的。”

现在冰河解冻了，是党吹了暖风，是春风出版社吹来了暖风，冰河解冻。是山丁同志从冰河底层把这些沉积的小花打捞上来，重新开放了。

她枯萎了吗？没有枯萎！经过四十多年的冰冻，她生命力极强，象冰凌花一样，开得美丽，吐着芳香。

我写的消息题名叫《重新开放的鲜花。》

正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有着曲折艰难的历程，所以看到它，我是很高兴，很激动的，心象一片大海激荡不已。但在高兴中也渗透着一些苦涩的哀伤。

当我把这本书送给关沫南同志的时候，他指着封皮上底下一行小字“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颇有感触地打了个唉声，说：

“这行字标得好，过去，有些人污蔑我们沦陷期的作家是‘汉奸文人’是‘残渣余孽’。我们的作品拿出来了，叫人看看我们是不是‘汉奸文人’？是不是‘残渣余孽’。”

他的话引起我一些回忆。

那是在1945年，我在长春参加了革命，东北电影公司（现在的长影）一个姓崔的在报纸上向我开了一炮：

“但娣是汉奸文人”！我很生气，在报纸上也发表了一篇反击他的文章，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反对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蹲过监牢，我没有写过一篇宣传伪满国策的文章，相反，我写过日本侵略的小说，我怎么成了“汉奸文人”？这一炮把他打哑巴了，他没敢再发表攻击我的文章。”

还有一件事：

那是一九八五年了，我参加革命后经过了多少次火的烤焰，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了。可是我写了一篇悼念金剑啸的题名叫《一颗不灭的星》，这篇散文，我自己和别人也认为是那时期的最好的一篇。可是我给了某某杂志，不久就被某某主编退给了我。他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问，我一下就明白了，是因为我用了“但娣”这个笔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但娣”是伪满作家，怎么能利用伪满作家的文章呢，我是只好把但娣改掉，用我的真名田琳，投到另一个杂志，很快就刊出来了。

这件事使我很生气。我的笔名但娣，我用她写了些反对“不合理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小说，也写过几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小说，这名字我爱她，她没有罪，可是就硬把她押进了冷宫，直达四十多年漫长的岁月！今天，《长夜萤火》才重见天日。

还有一件事：

文化大革命时，抄了我的家，揪斗，把我脖子上挂的大木头牌子，上面写着“现行日本特务、现行国民党特务，汉奸文人”。关进了拘留所。

出动大批人马，到全国各各图书馆查抄我的文章，查询我认识的人，可是他们越查找越懈气，没找到一篇文章能把我打成汉奸文人，我没写，上哪儿去找。

左倾思想是在肃清，但它的影响很深，也很广，很难彻底肃清，有些人在灵魂中还有左倾的幽灵，在徘徊。

直到去年，我到某杂志社，有人对我说某某领导对《东北文学研究丛刊》说：“这本杂志里的人，大多数都有问题，都倒向敌人那一边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人因触犯刑律，现已被捕）。

怎样评论沦陷期的作家？

这是一个复杂问题，总之要实事求是，要具体分析。这主要在于拿什么作标尺，我看主要的是要看作家的作品（当然也要看他的言行）。

有的人把去延安的作家认为是革命的，把留在沦陷区的作家，统统看作是为敌伪服务的，是“汉奸文人”、是“残渣余孽”。这是错误的，也是不公正的。

“汉奸文人”是有的，可能是少数的，（或是极少数的）。

在沦陷区的作家，在日本血腥的统治下，有共产党员作家，他们是拿笔当枪和敌人作斗争的勇敢的战斗员。

但也有的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是爱国的青年作家，他们是民族气节的青年作家，他们是民族气节很强的左翼作家，这些人有些后来到解放区去了，有的仍留在沦陷区，如金剑啸同志就是最勇敢的向敌人冲锋的战士，后来，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

留在东北沦陷区的大部分非党作家，他们是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青年作家，也拿笔当枪和敌人作斗争的。写出暴露黑暗的小说，他们有他们的特点，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用隐晦的方法，写出沦陷期东北人民的悲惨生活，借以达到反对敌人的目的。

还有的人由于不了解情况，认为某些刊物怎能刊进步文学。

例如《华文大阪每日》是在日本出的刊物，但主编是中国人，由于日本总编并不检查这些文章，所以文艺的主编刊登了不少进步作家的作品。

我是很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那是我刚刚二十多岁，我的《忽玛河之夜》、《安荻和马华》、《怨》、《血方气》都是反映在敌人血腥统治下善良人民的悲惨生活的。

为了唤起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我都是用悲剧的手法。

在日本血腥统治下，和敌人面对面，不可能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可能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子”，我们只能隐蔽，只能悄声唱悲歌。

张毓茂同志，在他的《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时的空白》那篇文章中曾说了公道话。

他说：

“沦陷期东北作家，有些进步作家，他们同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期相比较，确实显得幼稚、薄弱一些，然而，不管怎么说是暗夜里的灯火，是沉寂中的呐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大潮在沦陷期的东北并未中断，即使化为潜流吧，它也是在滚动着，前进着，呼喊着。”

我们是在呐喊，但我们不敢高声唱反满抗日的歌，是悄声在嗓子眼里哼着反抗的歌，或者说，哭着唱着悲歌，以唤醒民众的觉醒。

我们是在发光，但我们不敢点起烽火，正如这本书的名字一样，我们象萤火虫一样，在夜里纷飞，发出绿色的金光，光虽不大但是飞的灯，有光就能划破黑暗，有光就能指明道路，有光就有希望。

这本书的出版，我很高兴，非常高兴，今天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不应该哀伤，我们要笑，最后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

二

这本书的出版，是有价值的，《长夜萤火》是第一堆抛出来的砖，以后还要继续引出大批的玉来，添补空白，充实文学宝库。

目前，大部分现代文学史书籍中没有提及沦陷期的东北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东北文学史中断了。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东北师大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到了东北沦陷文艺是很好的，是值得赞美的。

在国外已经有的国家研究“东北沦陷期的作家”，在日本有个叫村四裕子的，她专门以这个专题来研究取得博士的论文，为了研究东北沦陷期的作家，她特别到辽大学习二年，到东北各地采访东北作家，到哈尔滨住了二十天，访问了陈隄同志、关沫南同志和我，拿出了一千元，复制我们的作品，她也复制到了别的沦陷期的一些刊物的文学作品，如获至宝高兴地说：

“真好！这是宝贵的材料”。

在美国也有人开始研究，如葛浩文，他将要来中国东北参加在哈开的东北沦陷期作家讨论会。

在沈阳和黑龙江文研所也作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吉林的文研所的同志，他们辛辛苦苦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地组织工作在中央得了好评，他们已初步写出了东北沦陷期文学史。

这本《长夜萤火》的出版，在填补文学史的空白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本书的出版，对文学研究也是需要的资料。

另外，这本书的出版，让这些作品和读者见面，五十岁以下的人读读，他们可以了解，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期，东北人民过着的悲惨生活，对他们是有教育意义的。

三

在这里感谢中国共产党给予春风般的温暖。

感谢春风出版社的领导，文艺副总编是你们吹来了温暖的春风，把结冻的冰河吹开了，诗人石风同志给这个复活的婴儿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又有诗意，又象征那个黑暗时代的名字。

感谢责任编辑，郜文同志，你辛苦了！我当过编辑，我知道那是很辛苦的。最后，感谢山丁同志，是他把被抛弃在冰河底层的枯萎的花打捞上来，我知道他编这个集子花费了许多心血，也流了许多汗水。

四

今天，辽宁作家协会的领导在百忙中，能抽出时向参加这个会，我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

我们写这些东西时，是刚刚二十多岁，特别是在紧张学习的业余时间写的东西，是很幼稚的，请老作家、领导看完后多多批评指教，这是我最希望的。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

（《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五辑，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55-57，81页）

**诗歌**

未完结的故事

一九三五年

马拉和马尔华结识了,

在寒星伴着兴安岭的月夜里。

于是，他们的驼铃响起来了,

“马尔华呀!

我们走向那里去呀?”

马拉跟在马尔华的后面跋涉着。

一九三六年

马拉和马尔华忧愁了,

当着九月天,

暴风雨忽然就来了,

从那里来的呢，然而来了。

“马尔华呀!

灾难到了，

丢掉我吧!

呵!”

马拉在马尔华的背上哭了。

一九三七年

马拉和马尔华,

当着太阳落下地平线下去的黄昏时候，

他们坐在一棵棕榈树下，

“马拉呀!

给我一个吻吧!"

一九三八年

马拉和马尔华，

在乳色的黎明里，

他们倦了，

并排地睡着。

那边——

有晓角响过，

马尔华醒了，

“马拉呀!

我去了。”

一九三九、一〇、二六， 奈良

猎人

一

山峰，古世代的片麻岩，

为夕阳所涂紫了。

断层崖下踉跄着猎人，

背上没有羚羊，也没有山兔。

他不再幻想催眠草[[112]](#footnote-112)和龙石[[113]](#footnote-113)了

二

穿行着山的褶曲，密林的藻地，

凝望狭的、黄昏的天宇。

和往日一样，化眉鸟。

又蹲在枝上吟唱。

然而，他厌恶那只鸟了。

三

一片绿色的草原，

在林边上，静穆偃卧。

石楠花，黄色、白色的花朵，

——无数大地的星火。

他低首走过了。

四

恶魔的风抹消掉，

银色的月和雾。

山谷中有大的骚动,

猎人归至潮湿无光的草屋中,

他遇到 “饥饿” 和 “苦痛” 了。

注 (1) “龙石” 西洋古代传说中： 一于龙睡眠之际 ， 由龙首切除的宝石， 曰龙石。 可以作妙药。

（2）。“催眠草” 切除龙石时， 散播于龙的四周， 不使其惊觉。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东京

梦与古琴

由壁间取下一只古琴,

她从床上走下来,

披着轻纱，

“告诉我,

我可以为你弹一个曲子吗?

一个苍白的

含泪的曲子。

来，靠近些，

倚着我的窗子，

听吧!

这花去许多夜始调好了的琴弦，

喂!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些什么?

噢! 那是风声吗?

这么狂的风!

外面——那漆黑的夜，

风雨的夜，

摇灭了蜡烛,

敲落了白色的花朵!”

……

……

她轻轻地踱回床去，

藏起古琴，

俯下身子，

听见了自己的呜咽……

四月二日夜奈良

我的歌

一

忘掉他，

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的一个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二

在幻想的园里，

回荡着思想的旋律，

看到了迷人的彩画，

听到动人生命之歌。

三

沙漠呀，

无际涯的生命的沙漠呀，

宛如戈壁滩的沙漠，

我跋涉在沙漠中。

四

憧憬在夜里生长、开花，

在清晨，又枯萎、凋谢，

在梦里曾为一只鹰而狂欢，

在黎明，我又回到孤寂的园里。

五

孤独，

是一首美的诗，

充溢的人生。

寂静，

在人生的大海，涂上了颜色。

六

在回忆的林子里，

开满了痛苦的紫色的花，

希望产生在绝望的断崖，

新生产生于灭亡的悲鸣的回声里。

写于奈良

(原载《华文大阪每日》第六卷第九期，1941年5月)

暮年

她和她来了

一个白发的盲女人

推着车子来了

车里坐一个骨髅病患者

她们从民房中而来

太阳落下了

她和她在林子里停下来

落叶飘飘

骨髅病患者

掏出一丸药吃了

而那白发的盲女人驼着背

踏着落叶向林子那边走去

一只歌——少年时代和爱人唱熟了的歌

被她想起来了：

“我已五十了（那时偏爱变成驼背的老人）

每日攀登这山群

从这山到那山

秋已深了

这里，那里

落叶飘飘

这里，那里

野火燃起来了

…………”

白发的盲女人

她又从林子尽处走回来

她悄悄的，哀伤的向骨髅病患者问了：

“有野火燃起来了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

“有一对年青的伴侣从这里走过吗？”

“没有，有一只猫死在泥里了”

夜来了

她推着车子去了

夜的林子里

是一片虫声

秋已深了……。

期待

一定是她了，

从那草丛的荒径里走来的。

是的，她该来了！

我放下手中的锦织，

推开窗子。

是谁呢？

谁也没有呵！

透过沈思，

我听够了；

白杨叶的摇曳。

于是，我闭上了窗子，

又拾起我的锦织。

——一九四〇·十月里——京都

吠

你又何必这样伤愁

悲哀的女郎

已没有眼泪在流

幻想里；枯萎了一朵花

你曾记得，

野性呼声中的巴克

那冻天雪地的旷野

奋闘的一匹狼似的狗

你曾听人家为你讲过？

“受辱的心流的血最苦，投降了的微笑也最丑”

—新京—

祈

我托着腮，一动也不动。

在昨天，在很久；

我伸出一只瘦手，

接受了我的兴奋，激动和苦痛！

我的上帝，

请赐我以怜悯，

请卸下去这些兴奋，激动苦痛。

我：

已经耐不起……。

我的上帝请赐我：

一只宝剑，

一个英勇，

我愿追寻一只死掉的鹰，在绝崖。

曾挂示过他那风蚀了的尸身……。

—新京—

马弟尼

起初她只有哭泣。

不住流着伤痛的眼泪，

这样度过了些日子。

随后她什么兴致也没有了。

呆呆地卧在床上。

凝视着天花板上痴想中午的时候。

也不见她起床。

蓬乱着发。

头埋在被里。

一动也不动。

整日闭着颤索的双唇。

不和他说一句话。

一日在三月里，

还吹着春寒的季节。

她从那里走开了。

呵！

她走到那去了呢。

可怜的马弟尼！

—奈良—

思念

忧郁，

深了，

更深了，

我时常忧郁地望着天云。

九月的天云。

有着我的思念。

深邃，

那般的深邃。

—奈良—

叫卖的老人

车轮响在石道上，

两个老人拉着车来了

绕过了法莲町。

老人的叫卖声，

远了……近了……又远了……。

飘渺……

挣扎……又飘渺了。

—奈良—

人生的奴隶

妳欺负了她。

在黑夜，你拖着她的衣襟。

走进那埋葬了青春的凶恶的墓地。

在那里你悄悄地带给她一杯酒你叫她在哭泣哀送给你一个微笑。

在欢快中送给她一个沉痛的忧郁。

她无语沉默许久于是她昂起她蓬乱的头，

她开始学习在哭泪中她学习一个微笑。

在欢快中她学习一个沉痛的忧郁。

—十一月二十三日—

紫色的烦恼

梦之翼。

颤动了那紫色的烦恼，

如一滴

荷叶上之夕露，

如一只

春风里之夜歌，

如那无际涯的沙漠……

—一九四二，二月三日奈良—

诀别书

坚强地活下去。

我的宗教，信仰，

上帝的命令。

什么都消逝了

没有恐怖，悲哀，

泪，微笑。

一遍空虚，

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愿我们各向天涯去，

从今后，

我不是荻，

也不是莎

一个白色的灵，

一朵白色的花

—奈良—

意识的叛乱

回想的奴隶，幻想的奴隶。

**× × ×**

追想的林子里，生满了痛苦的紫色的花。

**× × ×**

忘掉她，

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的一出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忘掉她，

像忘掉一朵花，

他到湖北去了，只留下她一只忘掉的歌。

**× × ×**

太阳是最主要的热源，

我的生活失掉了热源；因此枯萎得苍灰。

**× × ×**

在幻想的构成园里

听到了象征的思想的音律

意识到了色彩的绘画

动人的生命力的言语…附号。

**× × ×**

沙漠呀，

无际涯的生命之沙漠呀

宛如古壁之沙漠

古壁之白云

宛如挣扎在那沙漠之蒙古民

**× × ×**

憧憬在夜里生长开花

在清晨枯萎凋谢

在梦里，曾为一只魔曲而狂歌

甜的幸福，甜的微笑

在清晨，

我们又回到我们自己的灵魂的国里。

**× × ×**

孤独——完美的诗

充溢的人生

寂静——人生之果，在寂静时，着了颜色

**× × ×**

我的指甲黄了，

是的我的指甲黄极了

吸烟——孤寂的坏孩子。

**× × ×**

希望产生于绝望之断崖

新生产于灭亡的悲鸣的回声里

**× × ×**

航海者的渴望是那远远的绿洲，

你的渴望是什么呢，

一只牺牲的灵吗，

愚蠢！

**× × ×**

历史是人类的自觉。

日记是人类的反省。

**× × ×**

肉块的女人

恶徒 荡妓的男人

**× × ×**

路是踏出来的，

勇敢的行动！

**× × ×**

你怎样能坚强。

能制服了懦弱的思想。

像一个男子汉的迈着步子。

不要怕！没什么可怕！

**× × ×**

没有人性的恶魔，

该教训的鬼徒

**× × ×**

我暗然的。

辛酸的想起一只歌。

忘掉的鹰

日记抄

足音

—一九三九年

过年了。

肉香,铁锅里煮着牛肉片和土豆白菜,我放进不少菜，心想着: 借着肉的味道弄两顿好菜吃吧!

夜来了，迈着轻轻的步子。窗外的景色全被雾给遮住了对面的楼房，从窗子透出寒冷的灯光， 道路上响着单调的木履声。

“什么都过去了，捉不住了，幻灭了。” 我想着过去: 那第五号教室，有十一个从十六岁到二十岁的年轻姑娘……每个人都散发着花朵似的青春。她们的心灵充满了活生生的葱绿的颜色，尽是笑，尽是唱歌。时光流着：……然而是为了什么呢，渐渐地变了。她们很少歌唱了，她们让沉默的忧郁剥蚀着……是为了什么呢? 为恋爱吗? 为生活吗?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看见了，我想着旧同学们的名字，我就看见了那十一张不同的脸……

—一月一日—

夜之街，人群，红衣女人，濶老， 流浪汉……

—三日—

我低着头看烧饭。

我开始和木炭生气，我吹它扇它。木炭好象一个颓废的青年；没有哭，没有笑，没有感觉，顽强地不肯燃烧。偶然从门缝投进来一份报纸; 我对于这意外的获得，一颗心涌出了欢喜。

夜深时，我失着眠，其实已不是夜深，不过在这里，四点钟还不曾吐出来鱼肚白的晓色，我又听到从门缝投进报纸的声音。

这第二次的报纸, 却给我带来烦忧，我怕月底向我索报费，我不象昨天那样地感谢送报夫了；开始咒诅他。

终于我想了法子，在门扇的外面贴上拒绝的纸条，同时把两份看过的报，夹在门缝中。

晚上，当我又在低着头烧饭，我又听到了送报夫的脚步声，送报夫过去了，我推开了门，又关上了门。

“都拿回去啦!" 我快话的自语。

—五日—

“她已经老了，青春消逝了。”

我每从简易市场回来，我就对那卖菜女人发生一种怜惜的情感。

“她很贫苦哪! 她那样耐心地照管弟妹们。她一定为生活而老了，她永不会摸到较比安适的生活的边沿吗? 可怜的老处女。”

每一次，我去买菜，都在回来的黑暗的巷中想着她。

我和她接触的次数，渐渐多起来，我觉得我和她更接近了。

“她是个好女人呢! 能干的呢，但为什么没人要她……” 我想着。我一看到从她手中买回来的菜，我就这样无边无沿际地想着，一直到我为了别的事而忘掉。

—七日—

那家死人了。

店铺的伙计，想看热闹。我后悔在这时候来买 。当我买完油，又告诉他去拿面粉时，我的心更不好过了。

他是那样的丑啊! 记得前些日子，他的项颈上捆着药布; 我会想到那里面一定有溃烂的东西在发着臭气……他用他粗大的手，给我包裹面粉，我看见了，那象大毛毛虫似的疤痕。

而且，那是怎样的情形啊? 在他的背后反映给我的一他的家。

—八日—

我倦了，累了， 烦了。 其实我是在病着。

我烤上三个土豆，土豆熟了，焦了，表皮变成黑炭质了，我用眼睛瞧着，一点没有吃的意思，一股土的气味。

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于是我慢慢地剥去硬的黑焦，把它吃掉了，因为我饿了。

—九日—

很荒凉，但不是什么坟场，一块三角地，草丛中蹲着一座低矮的房舍，象北方的毛厕，房顶盖上遮着一块破洋铁片和草席子，周围简直没有一块可以驻脚的地方，一些干树枝枯草茎、洋铁桶，破罐子，和米黄色的草帘子，乱杂地倒歪在那里。

在那边，绿色的木栅前面，升起火来了，有木材在燃烧是老太婆在烧午饭吗?

“她是太老了呢，还是害了中风病，使她的身腰永久直不起来。"

—十日—

我很兴奋，在被窝里:

“我想要一件什么样的外衣呢?"

“我要一双袜子，带光的丝袜子。"

我微笑着，心中开了一朵美丽的花。

我唱歌，我开始对寂静的天花板试着音腔。我由低音唱到高音去，当我听见自己的颤慓，激昂的声音时，我才意识到这里都是住着外国人。于是我忘掉我在唱歌，我呆呆地象等什么发生似的躺着。

我想到新宿的百货店去看衣服; 我想到中野去看病; 结果我哪里也没去了，因为钱包空了。

那是什么花呢？它迎着雪开了。从木栅那边透过来点点血样新鲜的颜色。

落雪啦，昨天。

—十五日—

天是明朗朗的，象这样的日子，实在很希罕。我靠着窗子晒脊背，读《三人》。我读到：孩子们偷钱买了许多书，离开大人们的丑陋的生活；用自己的智力开拓了新的世界。也读了这样的话: “……一个人应该做点事，一个人不专心于自己的工作，他的一生便没有意义。”

头痛，做了许多恶梦：我在拼命解答学校的考卷，没有一点灵机和智慧。我醒转来，窗子阴冷没有阳光。

—十七日—

听呀！音乐又响了，兴奋地，雄壮地响了。好象什么进行曲，我不禁托腮幻想着……

—十八日—

我生有两只手，和两只眼睛，却什么也不能做; 连安静地休息也不可能了， 神经在剧烈地痛。

免强把《三人》读完了。

我知道的太少，见到的也太少。学习吧! 我需要学习：一个人应该怎样行动，在每一种生活的场合。

—二十一日—

那歌声象蛇似地咬住了我的心。我怕听那歌声。——在不太远的地方，总送来一些叫喊，是女工们在鎚打着地基。那沉重的打夯，使她们不得不唱起来，唱着自己听不见自己声音的苦痛的歌。

“我吃点什么呢?” 在家里，我天天询问妈妈。我想起旧式的地主里的老头子来：老头子没有事，天天问他的老婆，”我该吃点什么呢?”

“不要买了，午饭已经吃过了。” 我管束自己。 然而，街回来，看到卖面饼的门前拥挤了许多人，我被诱惑着，又花去了五分钱。

于是回到家，带着后悔的心情。 吃面饼。

—二十二日—

愿我的灵魂，未来戴上一个美丽的花冠，与我的死一起走进坟墓。

人生没有目标，没有启示，没有爱好，便荒凉了。

病把我弄疲倦了，麻木了，而且发锈了。

—二十三日—

我作什么呢？我什么也没作，依着桌角，凝视天蓝色的青空，那里有白色的云沫。从半开的窗子，只望到斜对过个的一偶，那些窗子里面都紧紧的垂着窗帘。

我羡慕健康的人，他们象不受虫蚀的鲜花，而我正如一只生癞病的狗，心里想：到旷场走一走吧，寻点什么可口的食物。但；当我试着起来的时侯，我的神经又剧烈的疼痛。又使我不得不重躺下来只好蜷缩着晒一晒太阳。

我想写，什么我都想写：我写的欲念是极高潮了，好象我什么都不能等待。

然而，我总是写不出来，我缺乏表现的手巧，没有艺术的修养; 结果，我总是写不出来我所想的。几乎每天早产睁开眼睛，就开始构思；但，我仍然写不出来。于是那些东西，就都毁灭了，无声无息地毁灭了。我怔仲地瞅着他们毁灭。

—二十四日—

人总不能永远生活在某种不变的状态下：这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欲念，没有昨天那样光辉了，瘦了，干枯了，甚至于我不再有什么欲念了。我苦恼着，懊丧着，当我重读自已未完成的那片《马肉》。

黄昏在窗玻璃上抹上暗淡的铅灰色。我工作疲倦了，但我找不出适合我性的运动和娱乐，于是我就开始跳起舞来。我试跳着交际舞，然而我竟跳起原始时代的舞。我的身体不协和地摆动着，步子是那么样地笨重！我笑了，后来，我就厌弃我的跳舞了。

我完全疲倦了。我试想再摸一下书页，然而我绝倒我的右半身要却崩烈开似的疼痛。于是我合上了书本,坐着，和他并排地坐着。

—二五日—

我似乎看见: 拉夫列茨基，对着他的命运哭了。这样的脸我曾看见过的。

—二九日—

一九三九年一月——东京下北泽城南庄

角涯 （日记）

九月末，梦幻、绝望、烦恼，苦的微笑。震动、战慓、死灰、迷离。

每夜悲叹地从那退色的梦中醒来。浪费感情，悔恨充满了我的思索。

X X X

薄暮散步，悲哀的踏过了悲哀的旷野，沼泽地，墓地。

恐怖袭来了。执拗的生。

—九月十九日—

生涯悲的歌，暖昧的——少女时代的梦完结了。

散步到若草山下——

绿树、苔, 枯叶、沉默，期待……

宏壮的幻想的花园在忘却中荒凉了。

X X X

吃茶店之夜。诱人的音乐。醉人的红色葡萄酒。瞬间的迷醉。错误， 进步的壁障。

—九月二十日—

外面落着大雨，将芙蓉花打落了。一树芙蓉花凋落下去。

我的诞生日。一个忧郁的天。

X X X

一个银行家, 医生，工程师，文学家, 政客，只要是有名望的，便是一般女人的学科的对象。

人们却被虚荣吞食了，我不忍看这种悲惨的缺欠。

X X X

哲学——知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九月三十日—

愉快——工作的愉快。

读完了意大利的统一史。

地学的冰河侵蚀篇。

用稿费买了一点花生米——孤独的孩子。

从灾难者的心涌溢出来的懊恼，叹息，是有着那么动人的迫力。

—十月一日—

新闻纸上的故事:

“母子自杀”

儿子是白痴，母亲是一个知者。

所有的全过去了，恐怖、悲哀、苦痛，什么都没有了。空虚，生的空虚。

秋天了，秋天的风频频的从窗外吹动我的发。冷冷的秋天的风。

—十月二日—

苦痛的人，她的面容被苦痛的剥蚀而老了，凋枯了，然而她的灵魂却丰润起来。

依着窗子，太阳照在我的背上，读雨果的 “巴黎的圣母寺” 啊!一个又聋又驼背，又盲了一隻眼睛的撞钟者。

大仲马——一个大戏剧家。

在梦中，我梦见了楼阁，在梦中我是一个幸运之子。

—十月三日—

憎恶。

憎恶的人给予的爱，使我感到致命的痛苦。憎恶的人的语言，使我感到莫大的耻辱。

X X X

无价值的破坏了计划，无限的悲哀。在夜晚，我们谈出路，婚姻、职业……人生的一切。极度的疲倦。

收白玲信一封，一个苦难的女人。我仿佛听见她在人间地狱中哭泣……。她失掉了光明， 温暖。

X X X

烦恼，纲球没有出场，在草地上坐了一天。秋天的太阳照在我的脸上，静静的。到处飘散着麥香。

在静寂中听到了人生的叹息。

—十月八日—

月亮落下了，黎明啼声响在四野里。地平线便现出了微光。

X X X

几个同学都带笑的走出去，一个楼房里， 变得那么空洞、寂静。我躺在叠席上听见她们的笑声渐渐远了，渐渐听不见了。我一个人，便没有眼泪、没有梦的睡了。

最好一个时间过去了，她们笑着回来了，从学校偷来许多花。

她们给我送来一束白色的花。放在我的头边，我翻过身又睡了。睡在那盛开着的白色花下。 静寂的秋光照在我的悲伤的脸。

恶梦便来了。一只恶魔的大手提住了我的衣襟。我惊恐的醒了。不安、疲倦、悲哀、无依的孤独感。

白色的花，依旧在阳光下放着芬芳。

寂寞的推开辈子，走到窗前。

风吹着梧桐，黄了的叶，一片一片的飘落。

—十月九日—

太阳落下的时候、我走到奈良县立图书馆去。八时半退馆。走到夜街去，在书店里翻着些诗、小说……。在那里全是新鲜的力……

咖啡店，喝一杯热咖啡，一群流浪汉。

—十月九日—

在窗前待望着邮差的来，十二点了，邮差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子来了。又骑着自行车走过。

没有信息带来的秋。

孤独的人是最怀恋着那凋落的充满温柔光的秋了。

X X X

疲倦了，完全的疲倦了。当我由山上走回来。什么都忘掉了，憔悴地睡在落满黄叶的石阶上了。

X X X

灵魂的海愈深，痛苦便更无渊。

X X X

幻想是美的，也是骗人的。

很早便幻想走到远方去。然而一个女人是最不幸的东西，她除了有经济生活的灾难，还有一些诱惑……一些胡言…..。我想到了绝望，便想到了死亡。想到了死亡，又有了勇气 。

烦恼，梦幻的牺牲者。

X X X

到西宫去，在雪萤的家里，新遇到了两位新来自上海的姑娘。她们是那样的活泼，而我，我是一个沉默惯了的孩子。

一个可怀恋的夜宵。归来用一首《梦与古琴》安慰了我的痛苦。

—十月十九日—

读《白芙蓉》，《粟之果实》，秋风落叶，雨。

病的日子——休假一日。

—十月二十四日—

“白鸟之死” ——影片。

教育，人格的伟大。

自然的人生观，超自然的人生观。

X X X

在幻想中，我爱着我的远行。

在回忆中，我痛苦着我的亡失的年华。

X X X

晚间，图书馆、夜街书店，

コ——ボ"画家自杀……。

咖啡馆，一杯咖啡，一个苹果……满足了。这便是人生，人生啊!

—十月二七日—

冬天了，天一冷，该给病人带来一种沉痛的悲哀，病快发作了。生活该交给病魔的大手中，任他蹂躏。然而我有许多工作，我不能不挣扎着考试。

通夜， 一个不幸的孩子。更衰弱了。

X X X

麦子熟透了，割麦的人，从早晨割到黄昏，麦田是那般的荒凉。

文学， 持有着真挚的人生态度, 持有博大的人间爱、和热烈的真理探求的精神。

X X X

读文学史。

第一章: 感伤主义时代

第二章: 普希金 读完

第三章: 近代诗的一瞥

艺术派——以人间内部的世界为主。

社会派——以社会问题为主。

—十月二八日—

悠长的病了的人，是这样的忧郁、悲哀、 懊丧。什么都绝望。人生充满了苦恼。

到病院去。

在候诊室，坐着许多病人。

病患者该是世界中最悲惨最不幸的人了。因此，我们唯一的祈求我们获得我们的健康！即唯只为一的生的武器。

一个面色苍灰的、憔瘦的小女孩坐在我们的身旁。

“小孩！你患了什么病?” 我问。

“呵：是的！我病了！”

—十月三十日—

凄凉的落雨天。

寂寞的谷中，流泻着忧郁的云、雾。那云雾仿佛是动荡在孤独的少女心中的哀愁。

无可耐何的日子。背痛。

X X X

一个绝世的造型的美，是具体的通俗的美。一个牺牲者的美, 是超俗的抽象的灵的崇高的美。

X X X

好久忘却了我自己的日记。

在生命上产生了混乱。失去平衡和安静。

一二月一日—

这一天没有希望了，这一天该寂寞的一天。雨在落着。

小华她问我:

“什么样的男人是理想的呢?”

“天才、上进、善良、义气、严肃， 忠实、沉着、明朗化。”

“你什么时候结婚?”

“五十作新娘！五十一岁便死亡送葬。”

说完了连我自己也笑了，真是一个可笑的玩笑。其实，我真没有兴致谈这问题。 便开起玩笑来了。

X X X

作家应该懂得艺术的本质，艺术的职能，而且应该想到艺术的效果。

—二月二十三日—

从早晨便落雨，推开窗子。天宇是一面薄明。

受苦在欲念中。在路上，在教室，我想着毕业的事。

入大学吗？没有学费。

一个图书馆员， 但服务的问题难办。

求知欲燃烧得更烈。

我持有感情、苦痛、烦恼、不安，激动，别人也持有这些。我不懂他人如同他人不懂我。

—二月二四日—

春天的美丽的天宇，春天的太阳照在若草山上，那绿 草发闪了。

我们跳舞了，随着伴奏曲跳起来晨光舞。胸中为它而激动了。舞蹈使肉体狂醉。

X X X

我懂憬着亚尔然丁的大草原，大森林。在那里有生满了的苔癣的泽地，广大的牧场。

憧憬、追求，正确的生。

—三月五日—

作家必需有着史学、哲学的意识。有着人生的广博的学识，而且用真理的客观的思想去表现，去启示人们的行动。

X X X

考试该是一件乐趣。在忙中可以寻他 最崇高最单纯的想头。那是一个明显的慰安。

读天文学: 星座。

一〇五〇〇年近日点和远日点交换位置。

—三月十二日—

人想作一件事必须有勇气，才能使你的行动成功。

史学试验问题。

史观受时代影响。试就 “发生史观”和 “唯物史观” 解说时代影响。

言语学试验题:

试述身振语和感叹语的关系。

X X X

试场归来，冒雨到书店去。

买诗两册。

—三月十四日—

在一九四〇年京都北白川白樺的家里，遇到了他的同学，他是法学系的大学生。突然的谈到了女人上面了。

“女人越来越退化”, 他说。

“为什么你说女人退化呢?” 我说。

“你瞧原始时代，是女权时代，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女人。”

“那你不能说女人退化，女人是有着根本和男人不同的生理和其他的担负。而且你如果更认清了经济上的机构的展开和对女人生理上的分担，你便知道天生给了女人些不幸。”

一九四一年奈良女高师的史地系三学年添了一部门特别研究， 我们。便研究了女性史，在课堂上一些异国的姑娘发些议论，然而因为民族的关系，结论的标准自然也不同了。然而总还有些关心了女人。

一九四一年二月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H君，他带给我一本书，那恰好是中国妇女生活史。

一九四二年三月间，我预备女性史的考试，我读了它。

我更深切地懂得了生活在苦痛中的, 被忘却的女人被玩弄的女人的运命已经甚於她们的灭忙。

—三月十七日—

诗人是艺术里面最纯的艺术家了。诗人有着最美的最锐敏，最颤动的感情和感觉。和作曲家一样，在抽象的幻想的构成里面，他自己便听到了他自己的象徵的思想的音律。意识到了那些带色彩的绘画式的形式，动人的持有生命力的言语的符号。

因此诗人非锻炼他的感情的敏锐性和颤动性不可！

—三月十九日—

获得那最高的灵魂，寻找你自己要的东西。不该懈下去

X X X

左拉生於一八四〇死於一九〇二年。自然主义著名著酒店。

史丹台尔，《红与黑》。

都德——一短片小说家

—三月十八日—

到菖蒲池去划船。到地下室吃午饭。

上等定食一崮。奢华的午饭， 后悔。

十二时搭车回奈良。

躺在奈良公园的绿草上，我们三个女孩子没有梦的睡在那草原上了。

鹿不时用鼻子触动我们的脸。讨厌！

X X X

傍晚一个人到映画馆去看《岛》。

那些挣扎在荒凉之中的渔民们。

—三月二十日—

这里已经是春天了，我们举行去九州旅行。太阳从东山升上来了。我们通过了寂静的奈良街走向车站，搭六时十分急行火车出发了。在火车上送去了一天的时日， 黄昏时候我们到了下关港。乘入门司行的汽船。

苍茫的海漂浮在夕霧中。是怎样撩人的海的黄昏啊!

不久，船向南方开行了。岸边的人们和鸥的骚动消失在船的后边。

我站在甲板，忘却了自己。

船在朦胧的黄昏中滑进。

登门司港已是夜了。

到博多已是夜深了。博多的夜街吹动着夜风。

—三月二十六日—

在晨光里乘电车去访博多海湾。

我们带满了我们的欲望和欢笑向着博多海岸急速地前进。

博多湾是堆积的海岸，近处是一片砂原，海风是那般强烈。我们在海岸的防波堤上，眺望了一刻。这是一片无际涯的荒海。

那正是一个祭日, 追求幸福的群众频频的在海岸上洗涤蓝中的砂粒……一称宗教的美染遍了海岸的晨光里。

X X X

九时参观九州帝大。

—三月二十七日—

早七时访熊本的城郭。我们沿着盛开樱花的城壁回走了一圈。便登入了熊本的城楼。熊本整个的城市全包遮在晨雾中了。南国的强烈的太阳强烈的晖耀着。

—四月五日—

真理是时代之子。 Bacan之话。

X X X

追想过去的人，只有痛苦和悔恨。

未来是黄金时代——憧憬的生。

X X X

落雨夜，庙宇的钟声。

穷苦的我在读书守夜。

—四月七日—

失掉太阳的日子

1.被捕的一天

在一个年的秋天，我正准备南去，然而遵从着青年爱国挺身队方面的意见。我就被留在后方工做的地域的东北了。为了维持自己生活起见，我便在一个出版社的编辑部就了职。

那时我和一个流浪的独身女孩子在二道河子的一条破落之街租了一间板房子，便算是我的家了。

由家走到职场需要走一个多钟头的工夫，所以每天我都很早的爬起来赶路子。

十二月十四日的早晨，长春市恰好落着清云。当我走出门去，街道上除了从远处赶进市内的几辆大车和寥寥的行人而外再没有什么了。

我空着肚子一边赶着路子，一边想起从祖国来工作的青年们讲给我们一些关于祖国的信息，于是最大的喜悦竟使我忘却了寒冷和饥饿。

当我走到一家小商店的门前，那位小徒弟正在打扫着门前的雪。

店铺里响着清晨的音乐！

我走进铺子去，走到火炉旁取暖，那位小徒弟拿着扫子从外面跟我走过来！向我说：

“大姐！你的饭盒子没带来吗？”

我笑着向他说：（我因为每天不愿在日本人面前吃红色的高粱米饭盒子因此每天将饭盒子带到店铺去，于是这店铺便和我很熟悉了。）

“今天不吃高粱米饭了！应该吃点爱吃的油炸糕了。”

说完我给了他三元钱。我告诉他：

“今天我高兴了，请你吃油炸糕，十一时半替我买来，十二时我来吃。”

我走出那小店便走进我的职场去。

行完了早礼，回到我们的编辑室去。

一位同事，他是会计，他带给我一个包子：

“×小姐！你不是爱吃粘豆包吗？这是从乡下带来的。”

我高兴的接了过来，心里暗暗的想今天该有一个饱食的晚餐了，我坐下来由抽屉中取出来了一部稿子正在编改中，我们的总务科长便走进来向编辑次长说：

“喂！请田小姐陪我到工厂去一趟。”

我跟随着科长走出编辑室，门前有一群日本女工务员们脸色很严肃的在注视着我。

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大方的走出了门。

一路上总务科长不住的和我谈到食宿的问题，我只看见他的脸上和冰霜一样的严重。仿佛有一件重大的难解的案子临在他的头上一样，走出了一段路，我便听到在我的后面在喊什么，我回过头去一个日本鬼子，穿着便服，他喊着科长。我便让他走上前去，他和科长并肩的寒暄着，我跟在他们的后面心中暗暗的想：

也许是替他翻译演说吗？或是交涉工人的事？我有些怀疑了。

当我们走到艺文协会的门前时总务科长便和那穿便服的日本鬼子打着分手的招呼走进艺文协会了，我正想跟他迈进艺文协会的门时，他便把我交给了那陌生的便服的日本鬼子。

“你跟他去吧！”

我打量了他一下向他问：

“你想到哪去呢？”

于是在他那瘦黑的脸上便浮动着一种冷酷的狰狞的微笑歪着头向我说：

“到日本宪兵队去。”

他每一个字都深深地震动我整个的脑袋！但我却装得十分冷静，我笑着向他说：

“有什么事吗？”

“有一点事，有一点想问问你的事。”

我暗暗的想也许问我是一点对局时的感想吧！我暗暗的在祈祝着不要是我们的工作被发觉了吧。

很快的，他便把我从一个便门带进去了。

走进那深严的宪兵队的大办公室内，我就看见了一群紧张的宪兵们和特务们忙乱着，那便服的日本鬼子把我交给了一个朝鲜特务便走出了。朝鲜的特务向我说：

“你先等一会。”

我坐在那等候着，不到一个钟头把我转了三个特务看守着。

一个胖子就掏出了几块用花纸包着的糖果卑贱的向我笑了一下说：

“你不要害怕，请吃糖吧！”

为了想冷静的关系，我便剥开两块糖放进口中，一边思索着事情。

忽然我看见一个特务宪兵，拿了一分书类走来，上面附着我的履历书和像片。他走近我的身旁坐下了：恶狼的向我瞧了个仔细，然后在他的书类上添写上了，我衣服的种类，颜色，后来他又仔细的向我头部瞧着，又在书类上添写了我的鼻子耳朵眼睛的形状。最后叫我张开嘴，数了数我蛀牙的数目。

我那时感到了一种莫大的耻辱和灾难来了，恐怖和耻辱占领了我全部的灵魂。

添写完了书类，便走开了，又换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头子，他用大连口音向我说：

“有什么说什么，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像你这样被抓来的即或是嫌疑也是不容易的，在家门上来说都是做了缺德的事呢。”

我狠狠的瞧了他两眼，心中暗暗的想：

“像你这样亡国奴，才是祖先做了缺德事呢。”

我正在痛恨着那不知耻的日本走狗的中国人，忽然我被一个宪兵领了出去。从一个通道走过，那通道有着两排“投室”那宪兵拉开了几个投室的门，然而里面都满满的被投进许多犯人。

我从一个投室的门前走过，从门缝处，我看见了一个朱同志的后影，马上我预感到了灾难，我想一定是事件被发露了。

因为投室全装满了思想叛徒，便把我带到一个宪兵宿舍去了。

将我交给一个宪兵。那宪兵便开始和我谈起来了。

“我虽然装得很冷静，但心中却有些忙乱了，因为我想到了我衣袋中的信件。”

那正是前一夜我写给青年文化编辑叶末行先生的一封信——里面关于一些工作的事。

我忙着向那宪兵说：

“先生我想到便所去一趟。”

“便所，没有女便所。”

“男便所也可以的，因为我肚子疼。”

他犹疑的将我带出去了。

到便所后，他站在外面，命令我将便所门张着好预备监视我。我慌忙的将信件吞到嘴里，然而无论如何也吞食不进肚子去。焦急中我想起金矿中的伙计们往矿外带金子的方法了。我又把信件由口中掏出，急忙的将它放进大便中了；才走出了便所。

从便所走出，回到宪兵室后便开始第一次检查了。在我身上，只检察去一只表，两盒烟，一百五十元钱，和两张给杂志社寄稿挂号回收。其外有一封普通的信件。

那是一位由名古屋跑到北京去准备逃向祖国的一个爱国青年来的。我觉得十分的对不起他，但是因为他的信上只谈了一些简单的生活，而外并没有工作上的事。

检察完了后，我便被锁进会议室中去了，两个朝鲜特务看守着我。

就在那房间留置了一天。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我从楼窗上可以望见庭院中散步的宪兵们，可以看见临街的一条街巷，和街巷中行走的一些褴褛的中国人，于是我开始羡慕着他们的自由，也开始感到了生命完结的一种哀伤和灾难的迫害。

五点钟的时候，上来几个宪兵，一个秃头的壮汉子，由他的口音可以判定他是满内人。

由他开始又在我身上检查了一遍，将我身上所有的金属类的东西，和带子全都解下了，我对于这种检察十分生气。

那洲内的汉子毫没有一点同情的样子，雄赳赳的向我说：

“把裤腰带解下来！”

“没有裤腰带。”

“有的，我看见妳里头裤子还有一条带子。”

他说着便伸手要摸。我对他这种野蛮的举动气愤以极，我用力将他手推出，用力将裤腰带截断抛在地下了。

我提着裤子，跟着卫送我的几个宪兵，爬过一条狭窄的梯子，便降到暗黑地下通道了。

铁门外有一间广大的房间，几个红脸矮个的鬼子兵正围着一个火炉子坐着。

那几个宪兵将我交给了他们；把我由通道领进一间三号监室的门站住了，我迈进了铁门，走入一间空落落的房间那金洲大汉子便粗声的向我说：

“你懂得日文吗？”

“不懂。”

他指着墙壁上贴着的犯人规章大声的又说：

“不懂日文，那边有翻译的满文。”

我气愤的告诉他：

“我看不见，我是近视眼。”

于是他大声的念了一遍，然后他又告诉我便所在哪，监铃在哪，比比化化的说了一些便退到门口，那里站着几个日本宪兵，其中有一个宪兵用同情般的眼睛望着我说：

“怪可怜的呢，她也许没有什么事。姑娘！妳千万别上火，想病了。一两天就会放妳回去的。”

我望着他，听见他那同情的声音，感到了一种最大的悲哀。

他接着又说：

“千万不要着急想病了，那么我要锁门了。”

我几乎流下泪来，将头转向墙壁大声的说：

“锁上吧！”

我面向墙壁听见那大锁哗啦的被锁上了。

我向四周巡视了一下，那冰冷，满是灰尘的屋子，空落落什么也没有。天井上只悬着一盏电灯，放射着幽暗的光，我感到了一种奇特悲惨地狱似的恐怖。许久忽然我发见了一块发灰色的天窗我悄悄幽灵般的走近那靠天窗的一面墙壁，我望着那扉窗子，辛酸的想起了许多人，一些相关的人们。我想到了久别的××，和一些文化界的朋友，然而我想在长春竟没有一个人为我难过的。我感到了身世的凄凉。我意识到我的死亡，是那么凄楚的一个死亡呀！我竟想起了我的父亲和母亲，幸而他们都在遥远的地方，我慢慢的静下来，像一条快死去的狗一样，顺着墙壁坐在囚地上了。

我忧郁的低下头去。完全是一个囚徒一样，意识到了我自己的末日。

宪兵的皮靴声不断的从通道震响着：

“回到囚位去！”

一个又粗又野的宪兵，从铁玻璃洞门，露出一双凶恶的眼睛，在向我发怒的喊。我从那靠天窗的墙根走回来，走向我的位去。

我等待着夜深受刑，我意识到了我的苦刑，我意识到了许多同志落网的事。于是我宛如霜后的芦茸，垂丧着许多日来的热望都消灭了。我丧失掉了希望，我便一点也不珍惜我的生命，我想是我完结我的生命的时候了。

除了挂念着我的祖国和家乡的双亲而外，再没有什么顾虑的了。

死，是中国国民的义务，死在敌人的手里也是中国国民的义务。我确定了我的信念以后我就再没有什么悲哀了。

但是我仍然期望着会有一线希望，但愿青年爱国挺身队的事件不要被破漏了吧！

我虔诚的闭着眼睛向神祈祷着。

通道间，不住的有宪兵的皮靴声震响过去。

“睡觉！”

我只好躺在地下，像狗一样的无声的躺着。

从那扉铁窗，我可以听到了长春站的火车的悲惨的汽笛声从冬夜滑过了，这声音惹起我无限的乡愁，我几乎流下泪来。无言的躺着，我的思索很乱，想了许多又很快的移到我们的事件去了，我有着一个最大的绝心，以死绝不说出事件的密秘的。我知道我是应该无言的牺牲。我想得太多了，我的头有些昏迷。

忽然，我的地下室的囚室被打开了。走进一个凶壮的大汉穿着宪兵的服装。我惊愕的坐了起来，一种凶恶的灾难的预感使我发抖，我向他问：

“取调吗？”

他摇着头，我怕他有什么恶行为，我又急促的向他说：

“已经不早了，我要睡了。”

许久，他才走出去。

一夜不安，恐怖，悲哀侵袭了我整个的意识。

街道上的一切响声都静下了。夜已经很深。

通道不住的响着宪兵的皮靴声，我便昏迷的睡着了。

2. 最初被幽囚的四天

我昏昏的卧在囚地上，度过了一夜。次日的早晨，天还没有亮，我便被喊醒了。

一个宪兵他在通道粗声叩着我的铁格子喊：

“起床！”

我便从地板上爬了起来，我将囚被放到一个角落去便回到囚位，我冷清清的蹲在地板上，我看见映在墙壁上狼狈的孤独的影子，便意识到了我已经是一个囚犯了。一个孤独的禁闭在囚室里的流浪者。

因为是地下囚室，因此在昼间也燃着灯，那幽暗的灯光，仿佛在象征着不幸者的悲惨的命运一样。我凝视着那微光，想起了东北民众们悲惨的命运，感到了无限的苦痛……在我的憔悴的脸上流着泪水，我不知道那眼泪是什么时候流出来，我正想用什么擦掉它，但是我没有手巾，只好把衣襟撕下了一块，擦去这双颊的泪水，忽然门就开了。一个宪兵，他送进来一个水桶和擦地板的刷子。他用粗声向我说：

“扫扫除。”

我接过来刷子和水桶开始刷着囚地，我听到了一些响声，从别的房间传来那声音使我惊疑了许久；仿佛那声音是从一个亲族传来的言语一样，在我的灵魂上起了共鸣，给与了我莫大的安慰，我静静的听了许久，几乎将流下泪来，因为我意识到那是些同难的血族了。他们也许比我还苦，因为他们的家里也许有着为他们苦痛的妻子……。

扫完除，我就悄悄的回到囚位去，低头思索着，仿佛沉浸在什么梦中一样，我想到了一些我们工作的事，想一些远走了的同志们，我虔诚的祈祝他们平安。

我的头有些发昏了，我站起来向走出去，我走近门前，我的手推在铁门上时，我才意识到门是囚禁起来的，我失望的又走回来，我想我永远不会走出去了吗？一种不自由的痛苦侵袭着我整个的神经，求自由的欲念火一般的燃烧起来了，不安，焦躁，我开始战慄了，不住的在地下跷着圈子，我巡视了许久，想逃出那禁囚的牢室，然而除了有一块小天窗而外全是坚固的墙壁，渴望自由更炽烈起来。我激动的走向那坚固的墙壁，用拳头敲着，只发出了一些响声再没有什么了，我愤怒着，我几乎要暴啸的喊了起来，不自由甚于死亡的痛苦，沉沉的压着我的灵魂，我感到了我的灰色的命运将来临了。

我觉得头开始些沉昏，眼睛在爆着火花，神经痉挛着，仿佛发狂一样，失掉了一切平衡，我倒在一个角落里。

许久，我才清醒过来。

我想到死，但我为了未完的工作，我只好忍耐着。冷静着，在训练着我自己。

脑充血，使我头痛得厉害，无法救助我自己。只好用肉体的活动来医治过激动的情感，因此，我便开始运动，在囚室里做起操来，一直将脑中的血液静下去为止；我才重新回到囚位去坐下。

一天的日子，我在痛苦中度过了，太阳从地平线落下了，地下室的天窗完全的黑暗起来，到了开晚饭的时候，宪兵从洞口送进了饭我揣起饭碗，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知道母亲也许在哭泣着呢吧！我知道世界上关心和爱我的，也只有我的父母了，因此我流下泪来，滴落在饭里自己吃掉了。

那时宪兵推开我的铁门，又换了一个宪兵，他同情般的向我说：

“你想家了吗？”

我不愿把眼泪流给他看，我忙用袖子擦去。

他亲切的拿出一个白色的手帕：

“姑娘用手巾擦擦吧！”

我低下头，避免他和我说话，许久他走出去。

我闭着眼睛坐着。

我听见了，隔壁的囚犯说话的声音：

“喂！有没有烟卷呀！”

宪兵向他说：

“没有，你怎么不吃饭呢？”

“我吃不下去，请你给我一隻烟卷吧！”

“烟卷？不行。”

我心中十分难过，因为我们都是被监禁起来的同胞，我挂念着隔壁的难友的健康，不知怎样？虽然我们之间是隔着厚厚的墙壁，如同在两个世界一样，被隔绝起来。

我靠着墙壁，思索使我的头痛烈起来。

我昏迷的倒在地板上。什么时候我被一个宪兵给唤醒了，将药送进我的口中，我吃过了药。便到睡觉的时候。听见宪兵在通道间喊：

“睡觉！”

我便躺在地上了。

思索，使我不能睡。

夜已深了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些难友从囚室内被领了出来！

不久，我便听见了有鞭打的声，和人的绝叫的声。

那悲惨的号叫渗透了我灵魂的深处，痛苦宛如毒蛇一样，咀嚼着我，无言的悲哀，无限的悲哀……我躺在地下，流着泪水。

3. 囚室

住在地下的囚室，宛如生活在暗黑无光的地狱里一样，只能从天窗透进一点的薄暗的微光。我每天望着那一点微光，如同在我生命中燃着的灯光一样，我伏在那靠天窗的墙壁，想从那里听到一些声音，由宇宙的人间转来的声音，有时我可以听见渺茫的火车的汽笛声，有时可以听见电车的声音，有时可以听见马蹄敲着柏油路的声音；一天我又悄悄的去听！忽然我听见了一些声音，那声音是从宪兵队的操场中传来的，他们在不断的喊着。

“杀！杀！”

我知道他们是在准备杀中国人去，一种愤怒的火燃烧在我的内心。

午间一过。

从那天窗便会泄漏下一些渺茫的电车声，和凄凉的火车的汽笛声，那声音渺茫的由遥远传来，又消失去遥远，给与了我无限的哀愁，我想：我和人间隔绝起来？宛如幽灵一样被囚在人间地狱里，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思索使我苍白而消瘦………整天在地上不住的走着圈子。

铁窗外有许多宪兵轮流的来监视着我，宛如观览他们捉来的兽一样的观览着。

当我发觉铁窗外的观览的他们，一种耻辱使我愤怒，然而我只好低着头不住的走着圈子，几日后我已经决定不影响团体事件，而牺牲的死去。

我等待着审问后我才去走死的一条路子。我作了一个哀悼自己的歌刻印在墙上了。每天都是一样为思索而苦恼的绕着圈子。我疲倦了，我便去观查地下室的一切。

在墙壁上，我发现了许多条纹，我知道那是囚犯用它记着日子的标号，我便改变了我记日子的方法，我是用指甲在地板上刻日子的数目的。后来我也在土壁上刻画着日子了。

墙壁上，除了记日子的条纹而外，我仔细的看去，在灯光下，我发现了些手印，大的粗的男人的手印，那手印给与了我阴黑的，恐怖的感觉，我仔细看去，墙壁上有许许多多的手印，仿佛许多魔鬼的手张满了墙壁一样，我有些害怕了；但是我很快的便意识到那是些中国的爱国的同志们的手印，我对那些手印便感到了一种亲热，我用手抚摸着，我也在墙壁上印了我一隻手印。

很快的我又在墙壁上发现了许多发毛，贴在墙上的发毛，我用手去摸， ☐恶的印象使我发颤。

我想了许久，那一定是许多受难的男同胞们的发毛了。

四面的墙壁便诉说着中国悲惨的历史，我想不知有多少的中国同胞被囚过了，被杀死了。

我沉默的在哀悼着他们伟大的牺牲者，时间带给了我最大的痛苦。

我们都耐不了时间的慢长，从早晨我们便开始在黑暗，不自由里忍耐着时间了。

我唯一的办法只是不住的绕着圈子。

一天，一个监视我的宪兵从铁窗露出一双眼睛来向我说：

“喂！你在想些什么？”

我十分生气般的回答他说：

“你说想些什么？”

“我觉得你太可惜，做一个善良的满洲国民那是对的。”

“讨厌！我不懂日本话。”

宪兵是几个钟头一换的。

不久又来一个日本宪兵，他粗野的说了一声：

“喂！我的太太！”

我想去回骂他，但他喊了一声便跑掉了。

一天，又一个宪兵，用一双燃着同情的眼睛瞧着我，许久他问我说：

“我是名古屋工业大学生，妳看报吗？”

我因太寂寞的原故，我告诉他，我很希望看看报。

那时我很关心着战事。

他从铁窗送过来一份报纸，我仔细一看是我被捕前所读到的，我又还给了他，他向我说：

“妳受到那样好的教育太可惜了，你应该悔过，然后到日本去生活吧。”

我向他冷笑了一下，他便向我追问：

“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生气般的向他说：

“我生在东北，我养在东北，我的家是东北为什么要到日本去呢？”

我开始憎恨所有的日本人。

我痛恨着我们中国民族的不自强。

这悔辱是全中华的。

渐渐我的感情由激动而冷静。

我意识到我快死了，我挂心的是那些未死亡的同胞们！

我有时虔诚的向神祈祝他们，祈祝全中华民族健康起来！

我悲哀的流着泪，仿佛快和中国快和中国同胞们诀别了一样，我虔诚的祝福着中国，和中国的同胞。

每时每刻我都在准备着我的死。

那时我很想念我的母亲和父亲。

灰色的沉重的悲哀，压在我受伤的灵魂。

4.拷问的一夜

几天的幽囚使我头昏昏着。

感情爆烈极了。我从看守兵要来点药，吃过了，我晕迷的依着墙壁，正在那里受苦，忽然我的铁门被打开了。

我睁开眼睛，我看见走进来两个宪兵，一白脸的矮个子的军曹向我说：

“今天晚上取调你。”

我知道死离我很近了。我毫不怕死，因此我感到了一种轻快的兴奋。

他们走出去了向我说：

“一会就来领你。”

我知道暴刑一会就会临到我的身上的，仿佛我预感到了那惨酷的暴刑一样，但是我已决心去忍受那暴刑，决心去死。我决心不泄露一点事件的秘密。

刹那间，我预备死了。对我的生命我毫不珍惜，而且在世界上我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在刹那间，我虔诚的向遥远的祖国和故乡默默地告了别，便准备去死了。

我闭着眼睛在等待着他们来叫我。

十二时，我的铁门开了。我便穿上了鞋，跟随他们走出我的囚室。

通道里黑暗得什么也看不见，地下洞宛如地狱一样，我一边摸索着墙壁，一边往前走着，领我的兵士在前面喊着：

“这边走，快走。”

我跟随着他的声音往前进行着。经过了一段悠长的暗黑的地道。和一座大铁门便把我关进一间取调室了。那里坐着一个取调官，高高的个子，两隻发光的鼠眼睛，他装模做样的在翻弄着一些文件，拿着一隻笔。

我像犯人一样的被带到他的面前，死的恐惧使我发生了一种不安的剧烈的兴奋。他向我说：

“请坐下。”

我就在他的对面坐下了。

白脸的军曹坐在旁边。

取调官就开始审问了：

“你懂得日本话吗？”

“懂得。”

“××是你吗？”

“是的。”

“听说妳是一位有名的女作家。”

“不敢当。”

“我们对你这样年青有为的女人实在是佩服极了。因为我也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人。”

他和我谈了一些法国文学，我也趁着机会想征服他们对犯人的暴列感。我便向他说：

“日本到底是文明国，对国际犯人的案子是绝对冷静处理的。”

我稍安静些，因为我想用语言谈判一切，我不愿用刑法来审问我，许久他说：“最近到那去旅过行吗？”

“没有？”

“胡说！”

他一面敲着桌子，一面瞪起眼睛来。

我担心他忘却了他的假文明，便向他说：

“你应该冷静些，我是思想犯；而且你也是有教养的。”

他又低温了他的语调。

“是的，我们日本人是文明的，绝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

“妳没有到奉天旅过行吗？在十月三号。”

“去过的，不过不是旅行。”

“是做什么去的呢？”

“为了出版的事？”

“妳认识的男朋友，把名字写下来。”

“我没有一个男朋友。”

“那么妳不认识姓‘于’的吗？”

在我的意识中我想起两个姓于的，虽然离绝了我，我知道我绝不能在这提出他们的名字来的。于庆润是从南方来的同志，我更不能卖掉他，我告诉他：

“我不认识。”

“说实在的。”

“我说的是实在的。”

“你不承认吗？这里都有详细的调查书。”

他气愤极了，就把一隻笔摔在桌子上，他向我说：

“我再也没有看见妳这样的女人，顽强的女人。”

我低着头不再说什么了。

他不住的向我发问，后来他竟气愤得将茶碗摔碎了。

我一面拾集着他摔碎在我面前的碗，一面思索着应该怎样的应答他。

我听到了从对面的取调室传出来的鞭打声，和绝叫声，那凄绝的声音使我痛苦极了。

只有东北的人们才受到那惨暴的苦刑。我的灵魂开始暗黑了起来。

坐在旁边的白脸军曹，他把那取调官招到室外去。我急速的将取调官的秘密公文看了一过。那里我看到了一条关于特别诗局刊发的一条“凡是参加反满抗日的团体的，或图谋叛逆的都处死刑或无期。”

我将放下了那秘密公文，他们密秘的商讨了一阵又进了来。

许久他们用温柔的言语劝慰了我一阵。

已经快黎明的时候，然而我始终是低着头不去答话，无法他们只好把他们的书类给我看了。

厚厚的书类中，对我的行动和言语，都已经有详细的调查和记录了。

某处我看到了有许多比我还重要的事件的报告，我知道我们的团体整个的被破坏了，我感到最大的失望。我知道说不说仅仅是我自己的命运的事了，而不与团体有关。想了一会，只要我的话不影响团体，也不影响任何同志，而且我决定不承认参加团体，我只坚强我的逃亡罪，便可以了，因此我就自白：

“我是一个爱祖国的，和你们一样，我不忍心看着受压迫的中国民族，因此我想逃亡到祖国去，那么你可以处我死刑了。”

那时我听到了由隔室传来的暴刑和绝叫声，一种莫大的悲哀，使我流下泪来，我用着充满泪水的眼睛望着他们，向他们诉说着全民族被日本帝国压迫的惨痛。我一边诉说着，一边悲痛的哭了起来。他们用一种同情的眼睛望着我。两个取调官直视了一下说：

“是的，我们不必再往下问了。”

第一天取调告了一个段落。

已经天亮了，我才被送回我的囚室。

我躺在地上。我听见了从通道传过来的鞭打声，我痛苦的难眠。

5.读书

经过了一个月的取调，我的第一次取调书才完成了。他们从各方面知道我是写文章的青年。恰好，取调官中白脸的便是一个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的宪兵，因此，他对我非常同情。我向他要求读书。他便应许每天带书给我，他每天带给我一本法国文学研究，特殊的给了我一张桌子。

每天我的生活便开始有了纪律，那时我对法国文学便开始爱好起来。

在囚室中除了运动便是读阅了，孤独给与了我莫大的恩惠。我的思索异常的精敏，幻想是那般的深刻而清新。宛如一片蓝海静静的，幻想了许多美的诗篇。

每天读一本书，黄昏前我便读完了。

我已经决意，如果不死掉便在狱中度过半生。

后来我要求取调官，把我自己的荷马伊丽阿斯的史诗取来了。我便研究起荷马，我想判决了我便从事译那部史诗。

在我意识中我炽烈的燃烧着作诗剧的情感，我幻想了中国悲剧的巨大的体材。但是我苦于没有笔和纸。

仿佛在地狱中生活一样，仿佛和人也隔绝了一样，我异常的思念着生活在法外的亲族们和朋友们。我只好在地上画着地图，哪里是我的职场，哪里是电车站，哪里是青年文化社，哪里是第二国民高等……哪里是齐齐哈尔。我画了一遍，便仿佛我的魂出了囚室拜访他们一次一样，觉得安慰了。

因为我苦于知道东北的文坛。我便要求取调官购买杂志了。

他还不太啬吝，各种杂志他都买了来。

一天我竟在地下囚室中，读到了许多相识者的文章，诉写着他们的生活，我辛酸的读完了那本杂志，便在地下默默的流了一会眼泪睡去了。

× × ×

一天，我正在房子里低着头痛苦着。

门便开了。白脸的取调官拿着一本书走来。我接过来，原来是我的《安荻和马华》出版了。我兴奋的抱着那本《安荻和马华》喊了起来：

“我太高兴了。”

他走出去，我一边抚摸着它，一边流下眼泪来。仿佛是一个不幸的母亲看见了她自己不幸的儿子一样，无限的伤痛降临了。

仿佛见到了我的孩子一样，我哭了起来。

我想到了《安荻和马华》和我自己一样不幸的产生了。

写它的时候，完全是在我受难的最不幸的日子。交社出版的时候，我孤零零的带着悲痛漂泊在异乡，出版的时候，我却被禁在狱里了。

一夜我一边读着它，我过去的不幸的诗，我一边流着泪睡去了。

它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它在我的身边，宛如一个孩子守在他不幸的母亲身边一样，每天我翻读着它，每天我枕着它睡着了。

奇怪极了，为了寂寞，我什么都读了起来，在外边我永远不摸的《麒麟》，成了我最好的安慰书了。《电影画报》，《新满洲》，《艺文志》，《青年文化》。连广告我都阅读，使我最难过的，便是每个杂志都取消了我的文章了，我知道他们是害怕了。

我读了许多书，文学的社会的，医学的，侦探的，我竟也读起了《西游记》，脑子里忆些孙悟空，闭上眼睛自己也成了孙悟空。

6.孤寂

在地下室中，我每天痛苦的望着那扉狭窄的铁窗子，无言的伫立着。

一直我感到太累了的时候，我便像疲倦的孤独，仿佛是一隻受伤的狗一样靠着囚壁坐在地下，垂着头，我想着无光的，无希望的前途，我懊丧的将头埋在双手下，我想哭了。

我坐在地下，看见自己的两只袜子破了，脚趾凸露在外面，看着自己的裤子也破了。膝盖破凸露在外面，那难看的样子使我难为情极了，不时的用两隻手遮盖着。

一天的日子苦苦的度过，我苦痛的期盼着黑夜。

悄悄的我走到窗子下，我仿佛谛听着什么，仿佛在地狱里的幽灵一样，我将耳朵贴在墙上，我听到了一点声音，是从一间屋子里放送的音乐，在我寂寞孤独的脸上，浮上了朝露一般的微笑，我仿佛听到从天国降下来的福音一样，在我悲苦的心灵上，栽上一朵蔷薇的花朵，我感到了无限的安慰，我静静的听着，一直等到那声音消失了，我寂寞的离开了窗子，回到囚位去。

黄昏度过，到了黑夜，窗子暗了起来，于是我的灵魂也暗了起来。

在灯光下，我孤寂的坐着。

听宪兵的皮靴声从通道走过。

听夜里的耗子从巷中走过。

仿佛有秋天的雨落下了一样，我感到了无限的凄寂。

我望着墙壁，墙壁印着我的孤寂的影子，我低下头去，我孤寂的凝视着地板，忽然我发现了一隻蟑螂在地上爬动着，我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欢着，我用眼睛凝视着它的爬动，我不肯让它离去我，因此我再将爬走的蟑螂用手把它找回来，使它在我的眼前爬动着。

第一隻的蟑螂给与了我莫大的安慰。然而我也给与了它许多痛苦，我留恋着那匹小动物，一直到我快睡了，才肯放了它。

第二天，我便将我吃的东西留下一点，放在地上等待蟑螂来。

没有使我失望，夜一来了的时候，便有蟑螂爬动在地上了。它很快的便在地板上寻到了我放下的食物，吃着。

一些蟑螂作成了我的好伙伴。

在我寂寞的灵魂里我得到了温暖，走行在夜路里的旅人的一隻灯火一样，照亮了我孤寂的命运。

7. 声音

将我囚在地下室中，我感到了极端的苦闷，我有如囚在无人迹，无草木的茫茫的古壁沙漠地带一样，我的灵魂孤独得可怕，我几乎想喊了起来，但是我只能沉默，甚于哭泣的沉默，我仿佛一个被囚起的被蒙着眼睛的骡子，孤寂的在地下转着圈子。

我听到了从别的囚室中传来的咳嗽声，我悄悄的听着，忽然，这咳嗽不知为什么便成了全囚室的一点春风似的，从每个囚室中都有了咳嗽声音了，我咳嗽了起来。

这陌生的咳嗽继续了一阵。便消失了。

× × ×

我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是从隔壁四号室传来的，刹刹是衣襟摩擦着墙壁的声音，经过一个时间，我又听到了那种声音。

就默默的想着那声音，那象征着孤独的寂寞囚人的足音。

我也和那隔壁的囚人一样，在地下不住的绕着圈子，倦了我便靠着囚壁坐下。

我低着头思索着，我听到了一种微弱的声音，那声音是由隔壁指尖敲击着墙壁发出来的。

我默默的感到隔壁的难友的寂寞，那声音在墙壁上移动着，我知道隔壁有着和我同难的囚犯，有着一颗孤独寂寞的灵魂。

就寝的时候，我悄悄的走到囚位去在地下躺下来。我失着眠用手指在壁上划着道子，如作一首悲歌安慰，我破碎无光的灵魂。

8. 四号室

四号室是我左侧囚室，我除了听见他衣襟摩擦着墙壁声，早晚我只听见宪兵开打他饭洞的声音，我却听不见有取调他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他老也不受取调呢？

某夜，我站在铁格子旁伫立着，我听见他的门被打开了。

日本宪兵和他仿佛说了些什么，我悄悄的走向铁门扉去，我用手指将铁玻璃揭开，我看见闪在黑暗的通道的一道火光，那是由隔壁四号房间射出来的，在火光中闪动着两个影子，一个靠墙壁的宪兵的影子，另一个便是矮个子的长发的汉子，四号囚间的犯人的影子了，他站在监房的门内在比手画脚的讲些什么。

我只听见他向宪兵说，“没有法子。”“我的皮鞋破了。”他用中国话和他说，从他照映在通道间的影子我看见他揪着头发，一会又伸出一隻脚向宪兵说。“我的头发长了。”

宪兵忽然一把门关锁上了。我又悄悄的走回囚位坐下。

不久便有手拨动着我的门，我的门被打开，宪兵站在门槛上，我吃惊的望着；他塞给我一个纸条，他向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接过了纸条，在那上面歪斜的写着一行中国字：“你请刘先生来一趟，我明天想和他到奉天去，我要和他到街上理发店去，我的胡子长的太长了。”

我读完了便用日语翻译给他，他便把我的门锁上走去。

我默默的想，明天他怎么能到奉天去呢！难道我们都要过到奉天去吗？

我很奇怪，四号房监怎么还能到街上的理发馆去呢。

永远的一个谜，猜不透。

第二天从早晨我便等待着有什么变动，我被囚得太孤寂了的原故。我兴奋的坐在囚位上。

忽然我听见四号室被打开了，我忙着悄悄的跑到铁门前我用手指偷偷的推开铁玻璃，我看见一个宪兵将四号室的囚犯带走了。

我想也许会来带我们。但许久，并没有一点消息，一天过去了，也没有消息。

我知道四号室的难友已离开了这里，到遥远的奉天去了。

然而快睡觉的时候，四号室的门又被打开了，我又开始听到他的衣襟摩擦着墙壁的声音，我知道他又回来了。

但我不知道，他到奉天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而且一个囚犯怎能旅行呢，我不明白，永远的是一个谜。

我想这邻室的难友，也许嫌长犯，不日就可被释放的，然而我很奇怪着他的行动，有时他整天的被锁在囚间中，有时被领出去了一直到晚间才被领回来。

就只知道那房间住着一个不会说日本话的犯人，我很挂念着他，因为不会日本话的思想犯是受苦的。

许久我不注意他了。

后来有一天矮个子的取调官到我房间来，他向我说：

“十八号你们要到法院去的。”

我向他问。

“隔壁的四号室也一同过法院去吗？”

他悄悄的告诉我：

“他不去的。”

“为什么呢？”

“他，他是共产党。”

“共产党是不处分的。”

许久他又告诉我说：

“他现在是宪兵队的侦探了，白日到外边去为宪兵队工作，晚上再带回来。”

取调官从我的囚间走出去，我默默的想，四号室的思想犯那该是怎样痛苦，甚于死的罪刑啊，一个工作员违背着良心，那是工作员最耻辱的痛苦，和最大的悲哀。

我替他感到了生之悲哀和黑暗，虽然我也许快处了死刑或判几年的徒刑，但是我的灵魂却是安静，和明亮的。

我虽然放弃了人间所有的欲望，准备在黑屋子中度过一生，准备和我的父母诀别一生，准备和世界诀别一生，但是我却为了祖国尽忠而得到了所有的安慰。

我暗暗的祈祝他，上帝早些将他从这难中救出。活着逃出也好，死去逃出也好。

一直到我从宪兵队转送到监狱去的时候，我还听见他的衣襟摩擦着墙壁的苦痛的声音，孤独的悲哀。我还听见了他不住的咳嗽的声音，永远的一个苦痛和悲哀压在他的生命上，甚于死亡的受难者。

9. 六号通牒

我整天的被囚在地下独房监中，没有太阳透射过来，没有一丝新鲜的空气，从狭窄的铁窗，只透过来一块灰色，忧郁的冬天天空。

每天忍耐着时间的过去，我的灵魂被禁囚得阴霾极了。毫没有一点精神上的或肉体上的安慰。唯一的期望，便是黄昏了，黄昏可以带给法外人哀愁，然而给囚人们却带来了的是希望，结束了一日的苦刑。

而且太阳一落下了，犯人们便到了吃饭的时间。

当我一听到宪兵们在通道间开打着每个囚间的送饭的地下洞口的声音，我便感到了无限的慰藉，仿佛一个饿狼一样，期待着他打开我的送饭口，不久我的饭洞口被打开了。我伏下头望过去，在黑暗的通道间，就望见了一道火光，射印在黑暗的通道间的地下，我惊奇的再伏下头去，那条火光是从对过的囚监的饭洞口放射出来的，很快的我发现对过的囚监的洞口，露出一个人头，两隻眼睛充满了惊奇，疑问，关怀的热情的火光，他很快的便伸出一隻巴掌来，用另一隻手在巴掌上画了一个问号，我很快的明白了他在问我的姓名，然而因为他是一个建大的男学生，我便发窘的激动的无法答他，一个难友在囚监中相见了，会发生一种极激动的同情的，热血燃烧着我整个的灵魂。但是我仍然不能向他答复什么，我踌躇着，把头又缩回来，又伸出去。他仍然在很焦急的向我打着哑语，画着问号。我仍然的红着脸发窘的凝视着，而没有回答什么，不久那洞口便被宪兵给关闭上了。

过了些日，是送晚饭的时候，我又伏下头去在洞口，又发现了通道间的火光，我望过去，在对过的囚间的洞口，那个难友正在向外望着，他看见了我，便又伸出手来，在手掌上画着号码，我知道他除了问我的姓名而外再没有别的了，那天的中午我得到了一个信息，我便想将这信息传给他。我想告诉他“十八号转到检查厅”于是我在手掌上将“十八”两个字写给他，洞口便被关上了。

× × ×

“十八号转到检查厅”这几个字用象形转送到对方是非常困难，当时我便感到汉字的困难，和应该改革的事。

× × ×

一句话费了许多时日，还没有完全传达过去。对过房间的难友，便被转判别的房间去了。

一天，我的取调官到我的囚间来，惊慌的向我说：

“×先生！妳通牒了吗？”

“没有。”

“如果没有便算了，妳千万别通牒，这是犯规的。六号通牒被惩罚了。”

他嘱咐了一些走出去，我暗暗的想：

“六号转到别的房间原来是为了我的通牒。”

10. 元旦日

早晨，我将刷完地板，坐在囚位吃早饭。

门便开了，取调官他欢喜的走进来向我说：

“恭喜新年！”

我吃惊的问他：

“我被释放了吗？”

“不是的，今天是旧历的元旦。”

他谈了一会便走了。

我很难过，我想起了家乡的父母，静静的流动着泪水，我没有吃饭，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和童年，那亡失了的许多幸福的和不幸的新年。

忽然我听见我的铁门外的锁被打开了。

铃木走进来向我说：

“一会到×室去一次。”

他说完不久，我便被带出去了，将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坐着几个日本宪兵，凶狠狠的用一种奇疑的眼睛望着我。仿佛要处死刑的气分。

叫我坐在一个椅子上，命令着：

“好好的坐着，给你照像。”

我坐下，照像的走来，便给我照了一个像。

他们常时便把我的像洗了出来，贴在一张纸上这便是凶犯的证书了。

然后叫我站了起来，两个宪兵将我的手涂得黑黑的。然后便从母指按次的印在一个书类上，连手掌纹印在上面了。

那情势仿佛是处罚胡匪一样，将一切手续办完了，便向我说：

“妳是范法的人，这里有存案。”于是我的灵魂仿佛被蒙上了污浊的烟雾一样，暗黑了。

我带着两隻受辱的黑手，和一颗沉污的心，走出那房间，被护送到监室去了。

我蹲在监室中凝视着我的两隻黑手，默默的哭了。没有国家的国民，宛如一隻受虐待的狗。泪一滴一滴落在地下……

11. 传单

一天我正在读一本诗论，取调官仿佛有什么急事慌张地走了进来，他在我的囚位对过坐下了。从他的办公皮包中拿出了一打子书类，还没有开打便和我说：

“×先生，我来请教你点事。”

我以为他又要开审我，关于我的案件事，我异常的不耐烦。

他的表情是那么的严重，他将一些叠着的纸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他向我说：

“×先生我们昨天发现了一个事件，妳看这许多传单。”

我将传单接过来，是他们从墙上取下来的样子，用油印写的，后面还有着东北爱过挺身队的字样。传单写着一些唤醒东北民众的反满抗日的文字，我读到了那些传单我的心激动的为工做者高欢起来，几乎这欢悦就表露在脸上了。我忙着低下头去仔细的读着那传单。

他发问了：

“×先生，你看看这是满洲当地人做的，还是从重庆带来的呢？”

“这个我可不知道。”

我想了许久，我怕由我的话而影响了我同胞们的不安，我想他们如果认为是东北当地的人工做的，他们一定要设法在全东北的民众开始检举。因此我极力的使他的观念移向别处，移向他们的手达不到的地方为妙，所以我向他说：

“这也许是重庆的工做员吧！”

“那么这是东北爱国青年挺身队的人做的了”

我怕把这件证据移到我们团体的同志身上我急忙的辩护：

“我想东北的爱国青年挺身队，是没有做这种工做的。”

“还是在十月十号的一日贴的，贴在西三马路的日本人家的墙上了。”

我听见他讲着我就笑了！

“笑什么？”

“……我暗暗的想中国人真聪明。”

“这不是你做的吗？”

“我做的我敢承认，因为我并不珍惜我的生命。”

他很相信的样子又问：

“这是朱万章做的吗？”

“那我也相信他不会做。”

“那么就是于庆潮做的了。”

“我可证明不是他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第一次来是八月，在八月底就走了。第二次来是十一月，那时传单不已经贴了吗？”

然后他又把传单重看了一下，用手比化着的自语着：

“这是带在衣袋拿来的。”

然后他又给我看一大张漫画似的传单，漫画画着中国是一块肉，日本是一条狗。

我仿佛一个孩子报复了一个仇人一样，感到了一种报仇的愉快。

他向我问：

“你说这画是那一阶级层画的！”

“这可没法知道。”

“怎么的呢，你有些狡猾。”

“这是真的，因为中国的教育和日本不一样。”

“在中国真分不出那阶级会画这类的画，中国的大学生不会画的有许多，中国的小学生也有会画的，中国画家是奇形发展的，因此判断不出是那一阶级画的。”

“那么这纸那里可以买到呢？”

“纸我更不清楚了。”

“你不是常和书店有关系吗？”

“那是写稿子，与纸毫没有关系。”

“那么妳说，油印机普通在什么样人家有呢？”

“中国的家庭是没有那东西的，据我知道的印刷局是有油印机的吧，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我趁他不注意间便把他的公文偷看了一下，那是关于检举思想犯的，册子上面写了许多名字，我尽力的记在脑子里，以备有机会出狱就去通告他们，但是内中一个我认识的都没有。

他从我的手中将那名册夺了去。

我笑了说：

“你这册子完全是不可靠。”

“为什么呢？”

“在这已经没有思想犯，有的都被捕来了。”

“为什么？”

“你不知道中国的民族教养太低，全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人们，而是非常的懦怯。”

“这你可不知道，有的，有许多，我们都不知道。”

他没有得到什么结论，便走出去了。

他走后我高兴的在地下走着圈子，我想中国是不会死的。竟有这许多可爱的青年们。肯做这伟大的地下工做死了一群还产生一群，一直到中国得到了胜利。我希望即或我死了，这胜利在不久之中国会得到的。

12. 接见父亲

午间我凝视着那扉挂满蜘蛛网的铁窗子，我知道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我忍耐着度过半响，宛如一隻毒蛇咬嚼着我的生命一样，我苦苦的耐着，孤独的灵魂无所慰籍。

看守宪兵打开我的门，在门前两个取调官都来了，在他们的脸上我寻出了惊愕而怜恤的表情。一个向我说：

“妳的父亲来了！”

我带着沉痛的惊喜我向他们问：

“在哪里？”

“已经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我的声音颤动着。

“方才走的。”

“父亲很健康吗？”

“很好，样子十分沉着，他只问问妳有没有病？问妳要钱不？问妳用什么不？”

我低下头去，心里十分难过。

他们又告诉我：

“你父亲给妳带来许多馒头，还有糖……”

他们说完关上门便走了。

我靠着囚壁我激动的，我在幻想着父亲的痛苦，父亲的跋涉，父亲的脸，父亲从遥远来了，但是父女却不能相见。

我的心激动着， 思索的海在泛滥着， 我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不幸。

不久，两个取调官来了；他们拿了父亲从家乡带来的东西。我辛酸的打开了包子。包子里面有着黑面的馒头，和饭子，糖，烟卷，还有一条棉裤，我抚摸着父亲带来的东西，宛如在难中见了亲人一样，我对着那些东西哭了起来。

然而我什么也没吃，我向取调官问：

“我能见见我的父亲吗？”

“不可能。”

一个取调官走了，一个取调官留下悄悄的向我说：

“妳可以偷着给妳父亲写封信，明天我给你带去。”

事后他便偷偷的带给我一隻铅笔和几张白纸。

为了怕看守宪兵发见，我先悄悄的将它藏到厕所里。当夜巡视太紧我无法执笔。

临睡的时候，看守宪兵在铁窗外向我寻问：

“有危险东西没有？”

“没有？”

“有铅笔没有！”

“没有？”

这样的寻问每天是惯例，但是那天我却有些虚心了，然而我仍然很理直气壮的告诉了他。

一宿，我想着从遥远的家乡跋涉来的父亲。他老可曾睡了吗？可曾吃过饭？可曾流泪……

我一边想着一边吃着父亲带来的糖菜。糖是甜的，心是苦的。泪不住的流着……

一宿我多梦的睡去。

× × ×

次晨，铁窗还没有透出黎明的光，看守宪兵，便将我们喊了起来，每天都是一样，在北方的冬天的六点钟起床，天那时还没有微明。

起来我照例的刷地板，然后吃饭。

我将桌子——我的囚室特别的给了我一个看书的桌子，换了位置。

我低着头沉思着，不久我听见由通道响来了足音，那八字的足音，我会猜到那是矮个取调官的足音，他打带了我送饭的小洞口，投进来一张报纸和一本法国文学研究。我将这些取了过来，面向铁窗，背向通道的墙壁，我偷偷的将纸放在书中间，偷偷的给父亲写信了。很吃力，因为看守宪兵不过五分钟就来巡视一周的原故。

费了一上午的时间，我把信写好了，放在我囚位的下边，我坐在那上面，开始读书，我的心绪是如何的乱；挂念着父亲。

我等待着那矮个的取调官带来父亲的信，带走我的信，天已经很晚了，不见他来，我很失望。我想终于父女是这样无信息的别开了吗？

夜里到了就寝的时候我便睡下了，因为我想用睡眼葬埋了我的痛苦，然而失眠已成了我近几年的通病，无论如何也睡不下去，我躺在地上，拿起我自己的集子来读，从那里面能寻出我一些过去的亡失的生活……

已经是夜深十二时的时候了，忽然矮个子取调官打开门进来了，脸上的表情十分兴奋。

我有些害怕，因为这样迟的时间有人进入我的囚室，对我非常的不安，我问他：

“什么事？”

他悄悄的和我说：

“你的父亲来了！”

他仿佛为我而高兴的笑了。

“父亲来了，我能见面吗？”

“能的！不过要偷偷的，被宪兵队知道了，我们也得被砍头的。”

我兴奋高兴的起了床。

他向我说：

“妳见到妳父亲可不要哭出来呀！”

“不用你嘱咐，我不是小孩子。”

他把我写完的信偷着放进他的皮包去。

“妳稍等一会。”

他走出去，不久便又走回来。

我被他带了出去，走过一条暗黑的通道。通道间有来回巡视的宪兵，他向宪兵解释说：

“今晚还有要取调她的地方。”

我们便通过了留还的地下通道，走出了一扉大铁门，把我带进一间大屋子里。

大屋子是会议室，满摆着桌椅，进去的时候，父亲的脸是向着窗子，我只看见了父亲的一个背面。父亲听见我的脚步声，回过头来，我看见父亲的脸是那么的沉痛，宛如阴沉的冬天，满是痛苦和悲哀……

另外高个的取调官正在拉着窗幔，我知道他是为了怕别人看见的原故，我首先向他说了几句客气话，回过头来给父亲鞠个躬，我没有说话，但是我满面的微笑已经给与父亲莫大的解释了，父亲看见我的微笑，愁苦也从他的脸上消失去，仿佛很安心的样子。

我便急忙的向父亲说：

“我很好！”

父亲笑了，看出我是很安然，向我说：

“我想妳也不会那么心窄，这我很放心。”

“父亲这里许可读书，我只要有书读，十年徒刑我是不在乎的。”

父亲笑了。

取调官和我们寒暄了一会，便退出去了。

“你们父子好好的谈谈吧！”

我看他走出来，我急忙悄悄的向父亲说：

“赶快到我职场去，在我锁着的桌子内有信件，那是关于事件的文件，取回来烧掉，底下的桌子内有书类，想法带出去毁掉。”

我重复的嘱咐父亲两遍，然后又和父亲寻问了些家里的状况，我嘱咐父亲不要惦记我。

父亲问我：

“怎么样，妳觉得罪怎么样？”

“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特别时局刑法，凡是阴谋反满抗日或参加什么团体的都处无期和死刑的条文，所以我始终没有承认加入团体和阴谋，我只承认了想逃亡到中国去，所以我想也只是能处我逃亡罪而已。”

父亲听了也十分放心。

谈了一个钟头，我便被带出来了，我给父亲鞠个躬便决然的走了。父亲穿着斗篷也从通道走出去。

我被送回我的囚室。

13. 我的日程

没有人类再能忍苦的了，也没有人类再能顺应环境了。

起初我被关在留置场的地下室的时候，我整个的神经将要爆裂的激动着，我想用拳头将墙壁打破，想用拳头将铁门打破，我转着圈子几乎疯狂了，我也曾想到了自杀。但是为了还有未尽的责任和未完成的志趣，因此，我便忍耐，渐渐我的习惯了这痛苦……

我便开始了有规律的日程。

留置的犯人是在六时起床。

当宪兵从通道走过喊了一声。

“起床。”

当宪兵的手叩到自己的铁窗。

“起床。”

我便从地板上的囚被中爬起来，将囚被送到一个角落里去。靠着墙站着，不久，便有宪兵打开门送进来一个水桶和刷地板的刷子。我接过来刷和水桶便开始刷着自己的囚室了。

那时我会听到通道间每个囚室刷地板的声音了。

由于这点声音我们同样的都获得了一点安慰，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由于同难者的手发出来的声音。

地板刷完了，便回到囚位去，我默默的坐着等待着早饭了。

将眼睛注视着送饭的洞口，当洞口一被宪兵的手打开了，便跑到洞口去，仿佛一匹饿狼似的等他把饭送进来。每次我都是一样贪婪的将它吃掉，而且每次都是一样我的肚子总是添不满觉得空洞洞的。饭碗每次都是一样吃得一粒米也没有了。

吃完饭我便开始运动，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样坚强的每天继续的运动，起初我是为了想冷静脑充血的缘故，后来我便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体格好耐过悠久的牢狱生活。

运动完了我便静坐一会，然后再起来绕着圈子，每天数着我绕过了五十圈便坐下来。

我仰着头看看狭窄的铁窗透过来的阳光，我在地板上数着步子，我便知道时间是过去一半了。

早十一时我会从洞口处得到一份报纸。

那是我唯一的希望，将报纸拾了回来，我热心的读着战事新闻，每天我都一样伏在囚地上计算着地图上美国的进路。

一天一天日本的战势很不利，我一天一天的高兴起来。

在太平洋我读到了美国兵占领了某某岛，我高兴得在囚地上绕着圈子。

十二时，当我一听到从天花板漏下来日本的默祷歌，我们就有了希望，因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牢里的人是那么的饥饿。肚子里总是空空的发痛，空空的发着声。

午饭吃过了，我仍然的走着圈子。走得倦了才又坐下来。

那时我便开始读书了，没有一点搅扰，也没有一点希望和烦恼，心宛如一面静静的湖水，没有幸福也没有寂寞和悲哀了。只是耐心的消磨时光。子没有诱惑，也没有失望，静静的一心不乱的读着书。

是那么的专一，这种专一的读书力，往往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和幸福。

我很适合这样静静读书的狱中生活，我决心安静的度过二十年或三十年的囚狱生活。

不到黄昏。二百页的书我总会读完的。

读得疲倦了，我便偷着躺在地上休息，一直我听到有巡视的宪兵的足音走近我的铁门前我便惊坐起来。

书，给与了我莫大的希望和安慰。

宛如我走出了囚狱，我漂流向无际涯的海航行着的舟子一样，我享受了大自然的空阔和甘美……

宛如我跋涉了一带山崖，美丽的山崖。

我的灵魂听到了海的呼喊，听到了鸟的歌唱……。

一直等到晚间，我放下了书本，我绕着圈子，我才意识到了囚的束缚……我才意识到了无光的暗黑的孤独的日子……

我获得了孤独的悲哀，同时我在悲哀的孤独中，我恋着我苍白的思索。

我读完荷马的阿里留司的史诗，我便幻想着另外的一个诗剧……

灵魂仿佛是一片海，仿佛是沸腾了的海，孤独悲哀之波在激动着。

夜里我便整个的沉醉在我的思索之世界。

静静的，我听了自己的命运之歌，静静的，我听到了整个民族的命运之歌……

铁窗外我听到了狂风穿过了冬之旷野之夜，我听到了宪兵们之呼号……

孤独的魂，徘徊在暗黑的囚牢中……

我感到了无限的辛酸……一直到囚人们就寝的时候，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哀痛走进梦乡，那无色的梦乡留下了我一些创伤……

14. 难友们

我被投进地下黑屋里，我的灵魂便开始受伤，流血……

我关心着和我同命运的难友们，虽然我们都被关锁在暗黑的囚禁监中，虽然我们都是被宪兵看守着，谁也见不到谁，然而我却深深的关心着，这些没见面的难友们……

因此当我一听到有宪兵打着别的铁门时，我便悄悄的走向铁窗去，那只是一条一寸宽细长的小洞口而已，里面是厚厚的玻璃，外面有一扉活动着的铁板……我悄悄的伸出手指将玻璃挪到一边，将铁板用手指推出，我便从洞眼会看见发光的通道，会看见斜对门被打开的监房的门……会看见新兵们从那监房中领出的难友……

当宪兵转过身来，我便缩回来……

这样每个监房的难友我都看见了，只要看见他们的影子，我便觉得宛如无限的孤寂在沙漠之旅途中遇到了伴侣一样，在孤独的受难的灵魂中获到了一点安慰……

× × ×

我们是一星期入一回浴……

我每次被带出去的时候，从通道走过，便有监房的铁洞打开，拥挤着难友们的脸……他们在找理由和宪兵谈话，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虽然和我很陌生，却异常关心，急促的亲切的向我小声的说：

“要保重身体！”

我感谢这深切的关心，同样我也在关心着他们……因为我们全是被提到地狱中的受难者！

× × ×

有时我被第一个领出通道，到洗脸室去洗脸的时候，因为太早，轮流看守的宪兵们都睡在看守室的地板上，只有一个宪兵无精打采的在我前面走着，我便在通道间观察着每个监房中门的鞋，我知道每个室中被囚的难友数，每天我知道每个室内有些被转到别出去的，有的被领进来的新入者…从鞋子就可以知道有的是军官被捕了，有些是老百姓被捕了，有些是青年的大学生被捕了。

我默默的祈祝着那些受难的难友们……

我默默的关心着他们的健康……

虽然那都是些陌生的同志们……

15. 隔室之间谍

我住在地下留置场的三号房间里，我的右邻室的二号室里，也住着一个思想犯，当我被投入这三号房的初夜，我只听见他向宪兵喊：

“有烟卷吗？给一隻。”

我暗暗的笑了，虽然我也是初次被投进这黑房子里的，但是我推想为了防备火灾和犯人自杀，一定是不会允许他吸烟的。

宪兵向他喊：

“不许吸烟，你怎么不吃饭！”

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着：

“我不想吃饭！”

我猜想他也是新被捉来的一个难者。

许多日子过去了，我从通道走过，宪兵走在我的前面，我便大胆的悄悄的将他门前的姓名板揭开了，在姓名黑板上用粉笔写着马绯同三个字。

× × ×

当宪兵发现我第一次取调完全是说谎，立举第二次的取调，在取调室中，我看到了地下堆了许多书籍，有世界思想全集，有列宁研究……我翻着那些书籍问：

“这是谁的书。”

“是你邻室马君的。”

“他是学生吗？”

“是建大的。”

× × ×

许多日，我在洗脸室发现了他的取调书的底稿，我知道他是一个失掉母亲不幸的孩子。

× × ×

一天我试探着问取调官，取调官告诉我他是红色的。

有时我被取调时，另一个取调官走进来，便讲说着马君的事，我知道马君是一个年轻的十分热情的青年，因此他受到的刺激更是大的。

但是我们都是被囚禁的人，全都是没有自由的罪犯！因此我们总是被是被隔绝着。

× × ×

日子过去很多，我常在洗脸的时候，从他的门前走过，一日从他被打开的门经看见他低着头苦闷的在地下走着圈子。

我知道他和我同样是极苦痛的囚犯，灵魂受难的囚徒……

一日，我从他的门前走过，我发现他的门前放着三双同样的鞋子，我知道那间房子又添加了两个建大的学生。我十分为着这些青年的学生可惜，但是也为中国有了这些如同星火发光的子弟而欢喜……

我暗暗祈祷着他们会从这黑屋子逃出去，再为中国而流血！

我一直在宪兵队的地下室，在没有阳光透进的黑屋子里度过了一百天；沉闷的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们仿佛都快被闷死了……忽然一天取调官告诉我说：

“十八号你们便转到法院去了。”

我得到了这信息，我高兴极了，既或我判死刑，我也情愿，因为这样沉闷的不宣告徒刑期的囚禁实在闷死人。

取调官走了，我一个人便兴奋的，在地下转着圈子，走得疲倦了，我便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了。将头埋在双手下，我思索着到法院去的事，我思索着怎样去为自己辩护。

忽然从隔室的墙壁，便传出来一些声响，我知道那是他们烦躁而拍出来的声响。

拍得我也十分的烦躁起来。

但是我忽然想到十八号转到法院的信息，我很想把这消息转告给他们，想叫他们也在被转送以前预备——辩护的理由，于是我用手在墙壁上写着通信的字，我知道在厚厚的墙壁上，从音响是辨别不清字的象形的，于是用我五个手指大大的在墙壁上滑着“十八号法院”六个大字。

起初隔壁没有认清便不住的敲着我的墙壁，待我写了三遍以后便不再敲；我知道他们明白了这信息。

我很高兴，我想三个青年会在那夜商量怎样到法院辩护自己，怎样去说道说得周严了。

次日吃完了早饭，我便将我的衣服和用的东西整理，预备离开宪兵队，忽然铁门便被打开了，矮个子的取调官走进来，他的脸色十分慌惶。他急忙的问我。

“×先生你和隔壁的说话了吗？”

“笑话，隔壁隔着这么厚的墙怎么会说话呢？”

“你往墙上写字了。”

他爽直的说着：

“写什么了？”

“写十八号法院。”

我笑了，我知道我写字的事被他们发现了。

“你怎么知道的？”

“隔壁有秘探。”

我很奇怪，隔壁据我的观查，我知道里面住着的是三个建大学生，怎么会有了秘探呢？

许久——我才由他的谈吐知道了里面放进一个特务化装建大学生的。

我听到了这信息我有些颤动了，我知道生活日本帝国主义下真如生活在虎狼之口一样……

同时我非常的痛心，我想为什么中国人里有着这样的分子，吞食自己的骨肉，卖掉自己的同胞而活……。

我感到悲痛极了。

（待续）

（1946年《东北文学》第一卷第四期，三月号， 65-83页）

编者注： 《东北文学》第一卷第五期编后记载： 预定在本期刊出的特约中篇《失掉太阳的日子》的后半部， 。。。 该问作者但娣偶感微恙而中绝纸笔， 这不能如期刊出： 故本文连载未见下文。

三 入 炼 狱 ——— 一个留日女作家的沉浮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初恋………………………………………………………………

第二章 东渡………………………………………………………………

第三章 入狱（一）………………………………………………………

第四章 结婚………………………………………………………………

第五章 入狱（二）………………………………………………………

第六章 离婚………………………………………………………………

第七章 再婚………………………………………………………………

第八章 入狱（三）………………………………………………………

第九章 孤雁………………………………………………………………

尾 声……………………………………………………………………………

序 言

一叶扁舟，

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

台风几次袭来，

风风雨雨，折桅断桨；

只能使我颠簸，

却不能使我沦丧。

这一曲慨而慷的悲歌，

我要引吭高唱

我的祈祷

——泰戈尔

让我不要祈祷在险恶中得到

庇护，

但祈祷能无畏的面对它们。

让我不乞求我的痛苦会静止，

但求我的心能征服它。

让我在生命的战场上不盼望同盟，

而使用我自己的力量。

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望被救，

但希望用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允准我。

我虽是一个弱者，

只在我成功中觉到你的仁慈，

但让我在失败中找到你的紧握。

第一章 初 恋

这是肃殺的九月。

黑沉沉的天宇布满阴郁的云，暗淡无光，刮着瑟瑟的秋风，片片黄树叶纷纷飘落，树木变得光秃，草地也已枯萎。

一片凄凉的景色。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沈阳。

这个民族灾难来临，震动人心的消息传到北国齐齐哈尔。

愤怒的火焰到处点燃，

学生们组织起来示威游行。

我们黑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的游行队伍走出校门，穿过北城门，经过督军署，在西城门处和男子师范、蒙古师范学校的游行队伍汇合，这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像巨流，汹涌、澎湃走出南城门，经过南大街向日本领事馆走去。

我们一路上摇晃着小旗，高喊着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赶走日本侵略军！”……

我们个个挺着胸，举着拳头，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唱着歌：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

齐欢呼！

齐欢呼！”

一路上我们还撒着传单，传单像雪片纷纷飞落在群众的手中。传单是和敌人战斗的宣言：誓死保卫祖国，打倒敌人！

我们的游行队伍，在日本领事馆的门前站住了。

日本领事馆的大铁门紧紧关着，警卫躲进房子里, 像乌龟缩进脖子里。

学生们愤怒地高声喊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河山！”

“日本鬼子滚回老家去！”

喊完口号，学生们用砖头、石头往领事馆房子的窗玻璃掷去，窗玻璃被砸得粉碎。

砸了一阵，游行队伍，便转回去，经过永安街又绕回南大街。

一路上喊着口号，唱着歌，撒放传单。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火焰，使整个齐齐哈尔城燃烧了。

示威游行进行了一整天。

这些天，我的心沉甸甸的，有说不出来的酸楚。

我走进学校，学校充满忧郁的气氛。

球场上，没有人打球，空空荡荡。

树荫下没有人说笑，也没有人唱歌。寂寂寞寞。

老师们仨仨俩俩聚在一起议论着国家的灾难。

晚上，父亲回来了，脸阴沉沉，坐在桌前闷闷不乐喝酒，喝了一杯又一杯。

喝完酒坐在炕上吹起箫来了。

那箫声充满哀怨和哀伤。

灾难的消息频频传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长春失陷，这天上午，日本炮轰了锦州东北大学……

齐齐哈尔城笼罩着阴云，暴风雨快要来临，人心惶惶……

一天，学生聚集在操场上开校会。教导主任皱紧眉头，向同学们说：

“我来讲一讲。”

大家肃静地，张着几百双眼睛静静听着。

“同学们，日本侵占了沈阳、长春，看情况我们黑龙江省也快被敌人侵略，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要变成亡国奴！”

他停了停又讲下去：

“同学们，有国才有家，国亡家也破！同学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公民都有保卫祖国的责任，我只有一句话嘱咐你们：爱我们的祖国，恨我们的敌人！记住了吗？”

“记住了，爱我们的祖国，恨我们的敌人！”我们齐声回答着。

我开完会回到家里，看见父亲也焦虑不安，在地上来回踱着步，自言自语着：

“黑龙江省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这天夜晚，满天的繁星在夜空中闪烁，四周静悄悄的，只有秋风刮着落叶飒飒作响。

我虽然才有十五岁，但心中充满了国难当头的哀愁。这当儿，我隐约听到西面有许多人走动的声音。我站立在我家西墙头，探着小脑袋，向一中的院子张望。马占山的队伍就住在那里。（我家住在东院）

那漆黑的院内，燃起一堆堆篝火，篝火旁晃动着马占山士兵的影子。

突然，响起庄严的集合军号声，穿过静谧的夜空。

随着军号声，战士们 迅速地排好队伍。

一个高大魁梧的军官走到队伍前，慷慨激昂地说：

“弟兄们，沈阳、长春相继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了。我们是马占山的军队，我们的天职是保卫祖国，保卫黑龙江！”

就在暗黑的秋夜，马占山的军队，吹着军号，打着战鼓，雄赳赳地走出一中学校，开往江桥。

马蹄声，皮靴声，得得地响在那条大道上。

马占山虽然是绿林出身，但是上过讲武堂，战术上有一套，现在只有他扛起抗日的大旗，我佩服他，暗暗地祈祷他打胜仗！

我关心着马占山的战情，天天看报。

在报上看到《我军大捷》上面写着：

“汉奸张海鹏，替日本鬼子卖命，攻打马占山，被马占山的大炮轰得屁滚尿流。

为了战胜敌人，马占山烧毁了呼尔达河桥、大兴桥、江桥。

汉奸张海鹏战败了，日本鬼子便自己出马。

马占山和日本鬼子激战几天，日本鬼子也夹着尾巴逃跑了。”

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频频传来，我特别高兴，心里不禁高喊着：

“马占山是抗日救国英雄，万岁！”

“马占山是当今的岳飞！”

过了些日子，却传来了使人忧虑的战情。

日本鬼子不断增兵，卷土重来，马占山被打败了。

一个深夜，有人乒乒乓乓敲我家的玻璃窗。

“谁呀？”母亲问。

“是马占山的部下，借借光，我们换一下衣服！”

“给开吗？”母亲悄悄问父亲。

“开开吧！”父亲同情地说。

母亲穿上衣服，下了地，划根火柴，把油灯点着了。然后，母亲走出去开门。

我躺在被子里，睁着眼睛看。

不一会儿，跟着母亲走进屋两个穿灰军衣的兵。在幽暗的灯光下，看见他们一高一矮，脸色沮丧。

“打败仗了吗？”父亲关心地问。

“打败了，日本鬼子从朝鲜调来大批的援兵，我们是孤军作战，寡不敌众啊！”

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打了个唉声。

“老爷，能给两套旧衣服吗？我们把旧军服换下来！”

“行啊，没什么好衣服。”父亲答应了。

“自己都没穿的，哪来的衣服给他们！”母亲反对。

“他们是自己人，先给他们，我再说。”父亲怜悯地说。

母亲才从箱子里，把仅有的两套便服给了他们。

两个士兵匆匆忙忙地换上衣服。

“马占山投降了吗？”父亲问。

“没投降，他带着队伍退了。临退时，马占山站在战车上，脱下军帽向齐齐哈尔晃了晃说：‘齐齐哈尔，再见吧！马占山还会打回来的！’”

“能打回来就好啊！”父亲高兴地说。

“我们得赶路了。老爷，这军服、枪、子弹还得求您帮我们毁掉！”两个兵说。

“行啊，你们赶路吧！”父亲说。

“你不要命啦？这是武器、军服……”母亲担心地说。

第二天，天还没亮，外面还是一片漆黑，满天星斗。

父亲把军服、枪、子弹装进麻袋，背着走出门，赶往大江，半天才回来。我和妈妈焦急的心才安定下来。

我常常唱着李后主的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时间在动乱中流逝。

灾难终于降临，鬼子兵开进了齐齐哈尔市。

住过马占山部队的一中学校，现在住上日本鬼子兵了。

哪一个民族都有败类，中华民族也难免有不肖子孙。

伪政府成立了，说是要恢复社会秩序。

第一中学要复课，校长到我家劝说父亲回一中任训育主任。

“常言道，忠臣不侍二主，我不能给日本鬼子做事。”父亲坚决谢绝了。

不久，父亲的“忠臣不侍二主”的打算也破产了。一家人要穿衣吃饭，他任工业学校教导主任，家住在西城外郊区红色砖房。

出西城门，有一条嫩江支流，江上有座西大桥。过了桥，走一条大路，路南是一片地主的菜地。水车不停地隆隆地旋转着，哗哗地流着水。

路北，有几个学校：工业学校、蒙古师范学校；再往西走，有一座兵营，有男子师范学校。

再往西走是一片荒原，走过荒原就是嫩江了。

嫩江是从伊里呀里山和大兴安岭山脉流下来的，江水汹涌澎湃，波涛滚滚。

在葫芦头的江岸，是起伏不平的沙滩，被太阳照得金光闪闪。北面的江岸是五颜六色的江石。

传说：马占山投降日本鬼子了。

人民对他的投降很不满，在我心灵中，他那爱国抗日的英雄形象消失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听说：马占山是假投降，他回来把自己的队伍，重新武装起来又拉了出去。

我误解了他，还是热爱这位绿林出身的英雄；可是日本鬼子恨死了他，用纸扎了条纸马，烧掉了。

马占山把队伍开到苏联，经苏联绕道进了关。

我们这一代亡国奴的青年，是迷惘的一代，彷徨在痛苦、哀伤黑暗中，但也憧憬着未来的黎明。

只有发愤读书。

我读了不少中国名作家郭沫若、茅盾、鲁迅、巴金、丁玲、谢冰心等人的著作，也读泰戈尔的诗。

日本人不是风平浪静，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在齐齐哈尔刮起了白色恐怖风暴。

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兵骑着摩托车，突突地到处奔驰、进行逮捕。

黑龙江省男子师范学校，被逮捕了几十个学生。抗日的关山被逮捕了。

我们女子师范学校也开来一辆摩托车，把关山的未婚妻王×兰逮捕了。

女子师范充满恐怖，人人的脸上呈现着惊慌不安。

人心惶惶，老师没心讲课，学生无心听课。老师和学生仨仨俩俩悄声议论着。

老王校长吓得脸色苍白，他惊恐、焦急地在校长室不住地走来走去。

只一夜的功夫，他的头发变白了。

几天后他辞了职，剃了头，穿上和尚服，出了家。手拿一串念珠，一脸沈郁，老人的精神崩溃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光闪。

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一天，我走进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坐在报刊桌子旁读报，读到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

《芜田》在这个文化落后的齐齐哈尔，是第一个出现的红色文艺副刊。

有了她，我的心灵像打开一扇窗子，吸进了新鲜空气，映进耀眼的阳光，我兴奋、激动。

《芜田》像沙漠上的绿洲，像沙漠上的一泓泉水，又像漫漫漆黑长夜中的一盏明灯。

在《芜田》上，我读到了金剑啸同志火焰一般的诗篇：《布谷鸟》、《兴安岭的风雪》

“………

耐着严寒，不就是春天，

穿过黑夜的暗网，

不就是黎明的微光！

——只要有春天，

——只要有微光，

——活下去吧！

伙伴们用着他们真理的情热削着黑夜的网，

用他们坚利的剑，

………”

这首诗像火种一样，把我暗淡的心灵点燃、照亮。

我好像从迷茫的雾中走出，步入充满阳光的世界。我是这般受到鼓舞，我也要拿起利剑，削着这黑夜的网。

我的利剑，就是我的笔。我用“晓希”的笔名写了篇《招魂》，企图把那些丧失民族魂、醉生梦死的青年唤醒。

我的文笔虽然幼稚，却常常拿起它写小诗，投给《芜田》。这些小花虽然不美丽，但它吐着朴素的芳香，开始我文学生涯的萌芽时期。

生活宛如大海，起伏不平。

我这少女的心灵也闯进了爱的波涛。

那是一九三五年的秋天，各中学校开运动会。

这天，天高气爽，悠悠的白云在蓝天上飘动，太阳照射着金色大地。

我没有兴趣看运动会，便和几个同学溜出会场，去看王绍维老师的画展。

我们几个同学正围着一张山水画《山村的早晨》欣赏。

那是静静的小山村，环抱着群山，山脚下有绿树林，有一座农村小屋，有一条小溪，哗哗地流淌着，那条小溪正撞在岩石上，激起白色的浪花，然后又聚集起来向前奔流。

“我喜欢这条小溪，它撞起浪花，还在前进！”我回过头来向同学们说。

这一回头，看见站在我身旁的日语专科学校高才生于明仁（他笔名努力、田瑯、白桦，后改为白拓方。）穿身灰色学生服，戴顶灰色学生帽，中等个，白皙的脸，嘴角挂着微笑，正用一双火热的眼睛凝视着我，一股暖流穿过我全身，我的脸羞得绯红，我拉着同学的手说：“我们走吧！”

我们走开了。

这一天，我很不安宁，于明仁闯入我的生活中，那双火热的眼睛好似在述说着爱情。

这年，我刚刚十九岁，从黑龙江省女子师范毕业，被母校广来小学请去当体育教师。

我爱穿绿色的衣服，绿色象征着春天，绿色象征着希望。我穿着淡绿色的上衣，深绿色的裙子。

一天，我刚上班不久，便接到了一封信。拆开信封，几张信纸，写得密密麻麻，是一封求爱的信，落款是于明仁。

我接到这样的信不少，我都不理睬，可是于明仁的信却使我燃烧。

他那文质彬彬，超凡的傲气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这颗钢铁般的心，被软化了。

我回了他一封信。从此，我们的信，像钟摆一样来回地摆动着。

我的心灵充满了幸福的向芬芳，走路、看书，我的脸都挂着微笑。

一个早晨，阳光照在我的发丝，照在我的脸上，照在我的心上。

我刚进校门，就被收发室的老人唤住：

“田老师，你的小包！”

他递给我用牛皮纸包的一包书。

“谁送来的？”我问。

“不知道。”收发老人说。

“没留下名字吗？”我问。

“没留下名字。”

“什么样的人？”

“没看见那个人！”

“那怎么送来的？”

“是他托一个送牛奶的带来的。”

我有些困惑不解。

“送牛奶的说，是一个穿灰色学生服的青年求他带来的。”

穿灰色制服的？那是日语专修学生的制服。

我猜到了一定是于明仁送来的。

多么奇妙的传递，多么奇妙的礼物！

我打开包，全是进步的文学书。这包书，使我们俩的心溶合到一起了。

终于，我答应他到我家来作客。

一天，淡淡的晚霞染红了西边云的时候，有人敲门。我去开门，一看，是于明仁。他抿着薄薄的嘴唇，微笑着走进屋，穿着灰色的学生服，白皙的脸，一字眉下闪着一双智慧的发光的小眼睛。看出来他的心充满喜悦和激动。他虽不漂亮，但那超凡的傲气，却给我迷人的诱惑力。他一进来，就用那双燃烧着爱情的眼睛凝视着我。

我有些腼腆，脸羞得通红。

他用那双探索的眼睛打量着我们的房间。哪算是客厅呀？除了墙上挂的字画，就只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此外什么也没有。

我端来两杯热茶，我们坐在对面。

他又用那双燃烧的眼睛凝视着我，我有些害羞。还没有一个男人这么看过我，垂下我的睫毛羞怯地坐着。

沉默了片刻，还是他先开口：

“你认识刘茂钢吗？”

“怎么说呢，说认识也不认识，在运动会上看见过，他是跑马拉松的运动员，但没和他说过话。”

“他就是我们的介绍人。”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于明仁仰着白皙的脸，闪耀着喜悦的眼睛，滔滔不绝地讲着：

“那天，刘茂钢从长春比赛回来，在教室里和我们讲‘我爱上了一个小姑娘叫田琳，她是女排的队长，这小姑娘真可爱，一双明亮的笑眼，还有个小酒窝，很媚气。’

‘一上火车，她们女运动员像麻雀一样，唧唧喳喳，又说又笑。可田琳不说不笑，在车厢里独坐着埋头看书。

‘早晨她起来最早，洗完脸又坐在屋里看她的书。

‘午间都出去逛街了，她还是独坐屋里看书。

‘夜晚，人们都去看电影，她还是照样看书。”

“人家爱你吗？”

“我们还没说过话，谁知道呢？只是我爱她。”

“原来是单相思啊！”

于明仁用一双火热的眼睛凝视着我说：“从此，你闯进我的生命中，我渴望得到你。”于明仁的眼睛又燃烧起来，又兴奋又心醉地看着我接着说下去：

“第二天，我到图书馆去，恰好你们的校刊摆在书架上，我翻开一看序言是田琳写的。我心想田琳不但运动好，文学也好，我决心要赢得你！”

我瞟了他一眼。他正用迷人的眼睛望着我问：

“你不认识我吗？”他问。

“不认识，还是在那次讲演会上看到过你。”

“我以为你早就认识我了，你们家住在我们学校的东院。天天你上学、放学，我都在大道上堵你，你没看见吗？”

“我走路低着头，眼不四顾，怎么能看见你呢！”

“我都白堵你了，那么说在画展时是第一次看见了我。”

“……”我羞红着脸，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不语。

“你在《芜田》刊过稿吗？”他问。

“刊过小诗。”

“你的笔名叫什么？”他问。

“晓希。”

“啊，原来晓希是你！”

“你在《芜田》刊过稿吗？”我问他。

“刊过。笔名叫‘努力’。”

“原来努力就是你啊！这个笔名是努力向上的意思。”

“有这个意思，也包含奴隶的意思，警惕我是个亡国奴，不要忘记雪耻。”

“我也一样，忘不掉亡国恨！”

一提到亡国奴，我就有些哀伤、痛苦，便沉思不语。

我们谈得很融洽，谈文学，谈诗，谈前途……谈得很晚，他才离开我的家。

我第一次体验到，在幸福中，时间过得匆匆。

随着时间的前进，我们的感情也在前进，两个人的心连在一起了。那夜，我第一次接受他的拥抱，嘴角上留下了他甜蜜的吻印。

于明仁，天天来看我，风雨不误。他的学校在城东，我的家在西郊，他要走很远的路。

我们院的大门十点上锁，我劝他早点走。他不肯，天天到十二点，跳墙走。

星移斗转，一晃从秋天到了冬天。

飘着白色的雪花，那雪花像梨花瓣，也像鹅毛，纷纷扬扬地飘落。

齐齐哈尔变成银色世界。

于明仁常常披着一身雪，来到我家。

我劝他下大雪不要来，西郊风雪夜是很冷的。

“下雪怕什么？下刀子我也要来！”

冬夜，我家也冷，可是对我俩来说，都在爱情里燃烧，却是个温暖情深的冬夜。

我们靠着暖墙，谈着：

谈童年，我向他讲我的童年——

“我童年时，常去嫩江边，拣拾五颜六色的江石，寻觅斑斓的贝壳，捞鱼虾、捕螃蟹。

下雪天，堆雪人，打雪仗，滚雪球。

下雨天，到水池子边，我把它看成大海，放只纸船，喊声：“开航了！”我的船便在我的幻想王国里乘风破浪远航了。

春天，我挎只小篮，到野外挖野菜。

下濛濛雨天，到树林子里采蘑菇。

夏天，到野甸子采野花，把野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幻想里我就是仙女了。

秋天，到树林子，扫落叶回来烧炕。

冬天，拿着长杆子钩干树枝点炉子。

我常跟着大姑娘去拾麦穗、大烟葫芦。

我家穷，常陪着妈上当铺。我同情心很强，常常跟着乞丐去看他住的地方。

我很好奇，到处跑：到大车店，到杀猪场去接猪血，到造纸厂去看工人怎么造纸。

我也很爱劳动，帮妈妈干活，三岁烧火，四、五岁洗碗抱柴火，七、八岁做饭，十二岁洗衣服、挖地种园子。”

于明仁只听我的童年，他却不谈他的童年。

我们什么都谈，也谈文学——

“你什么时候，爱上了文学？”他问。

“四岁，我跟父亲学唐诗，五岁学古文。”

谈亡国奴的苦恼，也谈理想、谈爱情。

夜夜，我们俩的头靠着暖墙，身也靠着暖墙，天长日久，暖墙上留下了我们俩的头印。那是一首爱情的诗，散发着亲昵的温馨。

爱情是不可思议的，俩人亲密得如一人，有时也不免纷争。记不清是为了什么，我的话把于明仁刺伤了。这傲慢之子，竟从屋子里跑了出去，站在寒冷的门外边，靠着墙，紧闭着薄薄的嘴唇，流下两行眼泪，在他黑色的皮袍上冻成两条晶莹的泪溜。他哭了，伤心地哭着。

我向他道歉，好半天才把他劝进了屋。这个高傲的人，会流下眼泪，我第一次看见他哭。

一九三五年冬，于明仁从日语专修毕业，考上了官费留日。他要离开我去日本，刚刚结识半年，便要别离。

别离那个夜晚，他没有走，我们靠着暖墙谈了一整夜。

我们拥抱着、亲吻着，也流着泪，两个人倾诉着衷肠……话别，灯光照着我们的泪脸。

突然，于明仁激动地向我说：

“琳，我爱你，除了你以外，任何人我都不爱，只爱你一個人，永远爱你！做我的未婚妻吧！”

“这话是你从心里说的吗？”

“谁还骗你，我们就在今夜订婚吧！”

他激动地望着我说：

“我们终生相爱吧！海可枯、石可烂，我的心永不变。”

他向我要张纸，写下他的誓言：

“海可枯、石可烂，我的心永不变！”

给了我，说：“这是我们订婚的礼物，送给你！”

我望着这礼物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给了他一张相片：

“你带着她，漂洋过海，让我伴着你！”

这夜是别离之夜，也是订婚之夜。

他用两只手紧紧拥抱着我，狂热地吻着我，我在幸福中沉醉了。吻和泪写下了一首诗。

一夜没睡，到黎明。

朝阳射进了窗子，离别的时间到了。

我送了他一程又一程，我流着泪，他也流着泪。

我直送他到火车站，在月台上，我俩徘徊着，互相叮咛着，他在月台下捡起一块白色小石子交给我说：

“琳，留着它作为我们别离的纪念吧！”

火车鸣了汽笛，于明仁跳上火车，站在车门口，手拿着制帽。火车轰隆轰隆开走了，他不住地向我摇晃着他的帽子，两眼泪光闪闪。

我站在月台上，不住地向他摇着手，两眼泪滚滚地淌下。

火车轰隆轰隆奔驰，渐渐消失在远方。

我们第一次分别了，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啊！

一个在天涯，一个在海角。

虽然隔着大海，我们天天在信里对话。

也是一九三五年，刚落过大雪，那片片的雪花，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银亮的光。

“田老师！有人找你。”广来小学收发室的老头喊我。

我走出教员室门，下了台阶，看见收发室门前，站着一个高个子的青年，穿件黑尼子大衣，系一条雪白的丝围巾，没戴帽子，留着油黑的长发，戴一副黑边近视镜，样子文雅、潇洒。

我走向前，向他看了一眼，他白皙的脸上一双深邃聪慧的眼睛，显得格外英俊。

“我是田琳，您贵姓？”我腼腆地微笑着问。

他默默不语，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我看了名片，才知道他就是黑龙江民报副主编巴来。我高兴得很，原来这位新客就是写《兴安岭风雪》的诗人巴来，也是亲自改过我文章的敬爱的编辑老师。

他文雅地向我微笑着。

“请到屋里坐吧！”

我们肩并肩地，踏着一条铺满雪的小径走进教员会议室。

“您请坐！”我把他让在一只椅子上。

巴来在沉思着。

“请喝茶！”我端给他一杯热茶。

这位年轻的主编，凝视了我片刻，然后用低沉温和的声音，悄悄和我说：

“我今天来，找你谈个重要的事，我们成立了一个白光剧团，想请你参加。”

我低头考虑一会儿，难为情地说：

“我不会演戏！”

“大家都不会，练习练习就会演了。”

“我父亲一定反对我去演戏。”

“你说服说服你父亲，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呢！”

“让我考虑考虑！”

我的回答，给了他很大失望，在他的热情的脸上笼罩着失望的阴影站了起来，说：

“你好好考虑考虑，然后，给我电话。”

我真想和他多谈一会儿，可是他说：

“我还有事，要到男子师范去，还要到打字学校去。”说完便走出去了。

我把他送出会议室，又送到大门外。我望着，他那挺拔的背影消失在广来胡同的尽头。

我没有参加剧团，也没打电话给他。

隔了很多天，又是个落雪天，白色的雪花随风飘落下来。巴来又披了一身雪，来到广来小学校。我迎向前去，他从大衣兜里掏出一张票递给我，热情地说：

“田小姐，我来给你送票——我们白光剧团要演出了，请你去看剧。”

“谢谢你！”

“你一定去看看！”

“我一定去看。”

他匆匆忙忙地走了。

白光剧团演出那天，傍晚，我踏着黄昏的雪路，兴奋地走向黑龙江民报社。那是门朝北开的院落，我走进去，院子里静静的。

我走到剧场，剧场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观众，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

我找到一个座位，坐下了，等待着开演。

终于，黑色的幕布拉开了。

演出的剧是《夜店》，还有巴来写的《黄昏》、《母与子》。

看完剧回家，我一路上想：

这些悲剧，都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我仇恨这样的社会制度。我憧憬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

我和田瑯（于明仁去日本后，笔名改为田瑯），一个在天涯，一个在海角。

我们被大海隔在两岸，在思念的痛苦中度着悠悠的岁月。

我辞了职，在家刻苦学习，准备迎接一九三六年的官费留日考试。

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齐齐哈尔古城。窗外，传来日本宪兵队抓人的摩托车声。

我们红房子被日本宪兵包围了。

逮捕了民报社记者闫某和一中体育教员刘古学。

逮捕了黑龙江民报社社长王甄海。

逮捕了黑龙江省男子师范学校学生关山，这是他第二次被捕了。

逮捕了黑龙江省男子师范学校体育教师王柱华、崔大奎，学生刘真。

逮捕了日语专修学校的体育教师麻秉军。

………………

不多日子，又传来：

逃到哈尔滨的巴来戴着手铐和脚镣押回齐齐哈尔，关进了日本宪兵队的监牢。

巴来受尽了日本敌人残酷的重刑：上大挂、鞭抽、棒打、压大杠……

他遍体鳞伤，却毫无惧色，闭口不说一句话，让最难对付的敌人陷入困境。他被拖回牢房，他带着伤痕、血迹，还在铁窗下哼着国际歌、吟诵普希金的《囚徒》。

自由之鸟，飞去吧！

飞到那乌云的后面，

明媚的山峦，

…………

正在这个时候，田瑯放暑假由东京来到我的身边。

久别重逢，我格外高兴。但在这白色恐怖的城市，使人惊惧，我不能留他。

我含着泪向他说：

“你走吧！这里危险！”

“我万里迢迢来看你，我死也不走。”他说。

“你一定得赶快离开，不然你会被逮捕，那我们就更不幸了。”我苦苦乞求他。

他只在我家停留了一天一夜，便走了。

刚刚相见，又匆匆别离。甜蜜的微笑，又变成一滴滴泪水。

离愁别恨折磨着我；更痛苦的是他一去，没有消息。出了什么事？是病了，还是被逮捕了？我整天徘徊在西郊的旷野上哭泣。

荒凉的旷野，有几座坟墓，躺在雨丝的脚下。在枯萎的草丛中，有土鼠一类小动物穿过。

我的心风雨飘零。

我仰望着茫茫的天空，流着担心的眼泪，祈祷着“田瑯平安无事！”

秋风吹刮着树上的枯叶，簌簌飘落，秋风摧残着生机，大地一片焦黄。

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巴来牺牲了！”他死了，没有墓，也没有墓碑，可是他的火焰永远不会消失。

我流下哀伤的泪，我愤恨！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举起他的旗帜，踏着他的血迹，参加抗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丢掉悲哀，擦干眼泪，埋头用功。

窗外，不时传来烈士闫某女儿卖烧饼的喊叫声：

“卖烧饼来，谁买烧饼！”

这小姑娘，自从她父亲被捕后，她家的生活担子就由她挑，开始卖烧饼。

这凄楚的叫卖声，使我的心碎。

秋去冬来，雪花又在飘落。

十二月，参加官费留日考试。

一天，终于送来被录取的通知，我十分高兴。

一九三七年，春节，我接到田瑯长达26页的信。

他的信，使我沉陷在痛苦中。

他说我们结婚，我必须回到他家去，帮他妈妈侍候老人和弟弟们；不然，只有同居。

我并不要求结婚，因为我还要上大学深造，我反对同居。

终于，到了该走的日子了。

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离开父母。

我心里充满悠悠的哀思。

这天，父母送我到火车站。

我站在火车门口，望着父母亲。父亲直向我摇晃着手，母亲两眼泪吟吟。

汽笛鸣叫一声，火车离开站台奔向前方。我含泪望着站台上的父母，渐渐父母的影子消失在远方。

乘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沈阳车站，在月台上，我一眼看见田瑯站在那里，戴个白口罩，张着一双明亮的小眼睛，在寻找着我。他是特意从日本回来接我的。

在沈阳他家，稍住几天，过了元宵节，我们便一同去日本。

第二章 东 渡

我们偎依着坐在一起，田瑯不住地给我剥着桔子。他高高兴兴。我忧忧郁郁，沉默不语。

“琳，你怎么啦？”

我什么也没说，流下眼泪，一滴一滴落在衣襟上。

“琳，你怎么哭了？”

“我不愿意同居！”

“你又不愿意结婚，又不同意同居，那怎么办？”

“结婚，就得到你家做家务，我还要上大学；同居，意味着彼此不负责任。”

“你是怕我抛弃了你，我说过：海可枯石可烂，此心不变。我不会抛弃你，你相信我好了。”

火车过了安东，通过鸭绿江大桥，便是朝鲜的土地了。

东北还是一片冰雪，可朝鲜飘着凉润的春风，这里已是绿色的春天。山也绿，水也绿；树也绿，草也绿。穿过朝鲜南北，下了火车，在釜山码头乘上海船去日本。

我们的海船航行在一片碧蓝碧蓝的茫茫大海上。

我是那么迷恋着大海，海浪不停息地撞激着，变成一朵朵白色的浪花。我刚刚二十岁，一颗少女的心灵充满着幻想，用双手去捕捉那洁白、美丽的浪花，使人迷醉。只有这时，我脸上的愁云才稍稍消失直至无影无踪。

我凝视着大海，大海在不停地拼搏着。

大海的生命就是拼搏。

田瑯望着大海上飞翔着的海燕，他想起高尔基的《海燕》，低声向我说：

“琳，让我们都作一只海燕吧！”

“但愿如此！”

只有这时，我们融在一起，两颗心在拥抱。

我们的船航行了不知道多少小时，多少海里，终于停泊在神户港口。

我们下了船，在神户码头，等待着乘车去东京。

已是黄昏，夕阳把天空抹上了霞光，是那么迷人，把那片大海照得金光闪闪。

我坐在海岸上，又想起心事，又流下泪水，这泪水和海水一样咸。田瑯高兴地买了两板巧克力，给我一板，他自己吃着一板。

我在哭，田瑯在笑，他那一字眉，他那薄薄的嘴唇都浮现着一个胜利者的微笑，在海岸上走来走去，不时向我投来傲慢的一瞥。

我把那板巧克力抛在大海里，表示我的反抗。但我在爱情战场上始终是个俘虏，好像被捆绑着的弱者，只有哭泣。

我跟着他乘火车到了日本首都东京。

在这异国，我只有跟他到了他的公寓，别无他招。

一进他的公寓，在他的桌上，我看到一只檀香木镜框，放着我的像。那是在齐齐哈尔，我们分别时送给他的。

我凝视着那张像，心里驱散了愁云，充满了喜悦。

“我们分离后，在异国就是这像陪伴着我。”田瑯说。

一瞬间，我好像想起了什么，坐在窗台上，又在发愁。

脑子里翻腾着：“我是走开，还是留下？”激烈地斗争着。

“琳，你在想什么？”田瑯问。

“我想走。”

“到哪儿去？”

“上我二哥那儿去；再不，去我同学那里。”

田瑯并没和我争吵，他沉思了一阵，便在窗台上放了一大碗酒，一把刀。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你要是不爱我，你就走；这把刀，这碗酒，就是我的命运。”

我惊呆了，我望着那碗酒，那把雪亮的刀，颤慄着。

田瑯脸色苍白，凝视着那碗酒，那把刀。

纯朴、善良的我，向他投降了：

“我不走了，可是，我有个条件！”

“甚么条件？”

“你要老老实实，不许动我！”

“可以。”

就这样，我留在他的公寓了。

夜里，我把守着我的情操，他也没动野。

我们住一间房，没有过格。

四月的日本，是樱花盛开的季节。田瑯送我去奈良，参加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我们从东京乘火车去奈良。

奈良，这个日本的古都真美。

奈良座落在盆地里，四面被群山拥抱着。遥望是连绵起伏的峰峦；早晨的雾霭笼罩着，像披着轻轻的蓝纱。

近处是长满郁郁葱葱原始森林的春日山。在绿色的树海中，露出金碧辉煌的寺塔。

满山遍野的樱花开了。大街小巷的樱花，庭院里的樱花都开了。到处流溢着樱花的芳香。

奈良是鹿的王国。到处可以看到梅花鹿，窈窕的身姿，像个舞蹈演员，歪着细长的脖子，仰着俊秀的脸，闪着一双温柔的眼睛，凝视着游人。

我们住在一条偏僻胡同里的一个下宿。因为简陋，楼上没有住客，我们便住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楼下一大间，住着贫苦的工人。

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紧张地准备功课。

有时，我也到公园里的樱树下看书。田瑯陪着我，他躺在草地上读诗；有时，他去看猴子。

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改为奈良女子大学）入学考试的日子到了。我参加考试，田瑯等在外面。

发榜那天，我们去看榜，我提心吊胆，在榜上寻找我的名字。

“琳，你考上了！”田瑯高兴地握着我的手，使劲摇晃着。

“祝贺你！祝贺你！”他薄薄的嘴唇挂着微笑，嘴角上出现了几条笑纹。

这天，夜里我们激动不已，田瑯紧紧地拥抱着我，狂吻着我。他终於冲破了我的防线。

第二天，田瑯送我到奈良女高师后，便回东京了。

从此，又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奈良。

我苦苦地思念着他。

时间，在紧张的学习中度过。

暑假，田瑯回到他的家沈阳，我回到我的家齐齐哈尔。

暑假一过，我急忙去东京看他。

我发现田瑯在日记上补写了一页，上面写着：“这天，我对不起琳。”

这句话在我心中打了个问号，但我没有追问他。

从此，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鸿沟。

田瑯常常在沉思着，我常常在忧郁着。

这年，我患了严重的三叉神经痛，痛得两眼直掉泪，只好休学，去东京休养治疗。住在田瑯公寓：下北泽城南庄。

两个人靠田瑯一个人的官费，过着贫穷的日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失掉了欢乐，也失掉了亲密的交谈。

不幸在我们生活中降临。

我除了被病魔折磨着，便是在痛苦中读书。

我想去找我二哥，他就在东京日本一高。我也想去找我的同学杜玉芝。

可是田瑯说：

“你去，我不放心。”他摇着头，不许我走出一步。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把身心都捧给你了。”

田瑯又疑心，又嫉妒。

一天，我们上新宿。回来，在途中，田瑯喊我：

“下车！”

“没到地方，下什么车？”

“叫你下车！就下车！”

我只好下了车，我抬头看他，他在生气，气得脸色苍白，嘴唇发紫，两手颤抖。

“你怎么了？”我惊奇地问。

“那个大学生紧挨着你。”

“什么大学生？我没看谁一眼。”

“你们俩，把着一个吊环，手挨着手！”

他充满嫉恨的眼睛瞪着我。

“人这么多，同把一个吊环的，有的是；那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你没关系，我可有关系！”

“…………”

我想批评他，又想也许由于爱才引起嫉妒，只好原谅了他，还安慰他说：

“难道你还不理解我，不相信我？我心中只有你。”

他渐渐平静了，说：

“我们还是乘车回去吧！”

我们乘了下趟车回到家。

回来，我拿起镜子照了照，镜中的我，额头上，有几条浅浅的皱纹，那是忧愁在我额头留下的痕迹。这是凋零的花朵。

我刚刚二十一岁，便饮着人生的苦酒。

除了贫穷、疾病折磨我外，还有田瑯郁郁寡欢的沉默，使我不安。

一天，我向田瑯提出：

“我们虽然口头上订了婚，也应该举行个仪式才对。”

“……”田瑯沉默不语。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同意吗？”我逼问他。

“那都是形式，俩人心心相印才是主要的。”

“但形式也是必要的，免得议论纷纷。”

“……”他还是沉默不语。

“请几位客人吃顿饭，照张相，向大家宣布我们订婚了。”

“……”他还是沉默不语。

“你如果不同意，我们分手吧！”

“分什么手？那就照你的意见办！”他答应下来，又埋头他的翻译。

我买了一件浅灰色的呢子连衣裙，回来，穿上给田瑯看：

“你看，漂亮不漂亮？”

他抬起头来，没有表情，看了看说：

“漂亮！”

又低下头去译他的文章。

订婚是件大喜事，可田瑯无动于衷。我站在窗前，有些哀伤，预感到我们的爱情，不再是春天，是凄凉的凋零的秋天，雾濛濛，雨濛濛……

订婚仪式，是在一间饭店举行的，来了几位客人，都是同乡。

大家向我们祝贺，频频举杯。

宴会完，照了相，客人便纷纷散去。

在回来的路上，二哥悄悄对我说：

“有人跟我说，田瑯已经结婚了。”

“谁说的？”

“方才吃完饭，孙叔的儿子说的。”

“不可能，我不信。”

“无风不起浪，田瑯很狡猾，你不要相信他。”二哥说。

“他向我发过誓。”

“你不要相信誓言！”二哥说。

我难以相信，田瑯对我一直很好。

我忆起：有一次，我们散步，走得很远，回来没有电车了，是他背着我回来的。

每次，我们分别时，他送我都是跟着火车跑，直到火车消失在远方。

可是我又怀疑，想起暑假回来，他补写的日记“这天，对不起琳”；想起他常有的沉思。

我陷入忧虑和痛苦中，我坐在窗台上，两手抱着头，抽泣起来……

“琳，你哭什么？”

“人家都说你结婚了，这是真事吗？”

田瑯皱着他那一字眉，那薄薄的嘴唇也颤动不止，为他自己辩护：

“这是造谣！”

第二天，我二哥约我出去。

这天，东京风很大，像野兽般的凶猛，刮得天昏地暗。

狂风撕乱我的头发，撕扯我的衣衫。

命运的狂风，也凶猛地撕着我的心。

“田瑯已经结婚，你打算怎么办？”二哥问。

“这不可能，我不相信。”

“那么多人跟我说的，你怎么还不信？”

“田瑯不会做出那么残酷的事来。”

“我看你应该快刀斩乱麻，和他解除婚约一刀两断。二哥另给你介绍一个，我们一高不少秀才。”

“别说了，我只爱田瑯，谁也不爱。”

“田瑯是骗子，有什么可爱的？”二哥说。

“你不要侮辱他！”我和二哥争辩着。

二哥苦口婆心地在大风中劝导我。我们从这条街走向那条街，走了整整一天，劝了一天。

回来，我的双眼哭肿了，我陷入迷茫中。然而我除了愤怒和痛苦，我要弄清事情的真相。

田瑯推门进来了，他看我的样子便问：

“你怎么啦——怎么这么伤心？”

“你真的结过婚了吗？”

“你怎么老问这——？”

“都这么说的，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结婚了？”我追问他。

“你别信他们好了！我没有结婚！”

他苦笑着，薄薄的嘴唇出现了几条皱纹，显得有些尴尬。

我半信半疑，我望着窗外，沉浸在忧伤中。

爱情的裂缝和疾病的折磨，几乎把我压垮。我和田瑯的关系好像有一条无形的深沟相隔着。我们虽然天天并肩读书，天天在一起生活，可天天默默无语。

我感到困惑和孤独，感到一个少女的痴情被人愚弄的悲愤。

除夕，我才买点肉，下进不少白菜，总算过个年了。

那晚，我伫立窗前。窗外的景色，全被雾给遮住了。对面的楼房，从窗子透过来寒冷的灯光。

街上响起单调的木屐声。

我想着过去，一切都幻灭了！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我一个人时，常常不吃饭，烧土豆吃，有时土豆烧焦了，还是把它吞进肚里。

我们穷得连报纸都订不起了。

我们吃的常常是面包蘸咸盐。

晚上我们到那条寂静的路上散步，我常常把鞋子脱下来，光着脚走，为的是省鞋子。

女孩子都爱美，我也不例外，总想把自己打扮得美点，躺在被窝里幻想着：

“我想买双亮光的丝袜子。”

“我想买一件漂亮的外衣。”

“我想去医院看病。”

结果，我哪里也没去，什么也没有买，因为我没有钱。

天气晴朗，太阳温暖。

我靠着墙读《三人》，读到：

“……一个人一生应该做点事，一个人不专心自己的工作，他的一生便没有意义。”

我的三叉神经剧烈地疼痛，勉强把《三人》读完了，我还读了拜伦、雪莱、普希金的诗。

我也读裴多斐的传记。裴多斐同残酷的不幸进行超人的斗争。

裴多斐说：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时的斗争。”

是的，我要担当起疾病的痛苦，还要担当爱情走向崩溃的灾难！

这就是要前进，要斗争。头疼也要读书，头痛也要写作。

我开始写作生涯。

写了第一篇散文《樱花的季节》。

写了第一首诗《猎人》。

痛苦中也有幸福，当我的作品发表时，我便陶醉在幸福中。

田瑯也为我发表作品而高兴，他鼓励我：

“琳，写吧！你找到了你前进的道路。”

越是不幸，越要奋发。

头痛也读书。读一会儿，停一会儿，停一会儿，读一会儿。

我读了不少世界名作家著作：屠格涅夫的、契可夫的、巴尔扎克的、狄更斯的，我最喜欢的还是高尔基的，他的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

爱情真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儿，有时候真难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我和田瑯是爱呢，还是不爱呢？我迷茫。

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散步，一起登山，一起看海。

这天，我们去登山，我们买了十只熟鸡蛋，并坐在山脚下，吃着鸡蛋。

在山路上，有个农妇穿着蓝花和服，一双草鞋，背着一捆枯树枝，从那弯弯曲曲的山径上走下来。满脸汗珠在往下淌，活脱的一个“阿信”。

我们开始登山了，我是运动员出身，两条腿还很灵敏，一步一步往上攀登。我在前面，田瑯在后面。

山风不时吹来，吹拂着我的头发，阳光照在我们身上。

这是一座登山运动员攀登的高山，越登树木越稀少。登到高处无树无草，山壁光秃秃的，裸现出五颜六色紫绿赤红的岩石。山顶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四面是绝壁。

我有些胆怯了，想回去，向后一看，那条小道只能容一个人。

“没有回头路！”田瑯说。

只好横下一条心：勇往直前不退却。

下边是万丈的悬崖峭壁，为了安全，我们小心翼翼地攀爬着。

这是一次考验，从畏惧中渐渐增强了勇气。我们终于胜利地下了山。肩并肩地坐在山脚下，战胜困难的幸福感在我心中激荡。

“文学是高山上的红玫瑰，如想取，必须不怕艰险地攀登，要勇气和毅力！”我说。

田瑯向我点头说“对！”

我也爱大海。田瑯陪着我去横滨看海。

我们肩并肩地坐在海岸上看海。

大海碧兰碧兰的，辽阔、坦荡。

汹涌澎湃，海涛声是海的拼搏……

我正在望海，迷醉中，忽然天变了。天空涌来了乌云，狂风呼啸着，宁静的大海，顿时咆哮起来。

那高高的巨浪，像一面面墙，排山倒海向我们扑来。

“琳，快跑，海潮来了！”田瑯拉着我的手拼命地往岸上跑。我们刚攀上岸，海潮已扑向岸边，溅起几丈高的水珠，我们的衣衫、头发都被潮水打湿了。天，真有不测风云啊！

“好险，我们差点儿被海潮吞下去！”

只有这时，我和田瑯才像一对难友，心连着心，紧握着手。

游山、看海是偶尔的事。经常是田瑯上学，我一个人留在家中，病魔和书陪伴着我。我读完《铁流》、读《静静的顿河》。

读得很艰难。

但我在想：越是不幸，越要奋斗前进。

理想和探索，是我的生命。人如果没有理想，生命便会枯萎；没有探索，生命也会失去意义。

我想写作，写作的欲望燃烧着我。

我写了散文《两地》，又写了叙事诗《未完结的故事》，都发表在《华文大阪每日》上。

苦恼，病痛苦恼着我，爱情苦恼着我，创作苦恼着我。国难也苦恼着我。

我和田瑯都不愿当亡国奴，都憧憬去延安。田瑯拿本地图给我看：

“我们毕业后，从这条路逃往延安。”

延安像盏明灯召唤着我们。

一九三八年，我离开东京，回到奈良女高师复学。

时间在哀愁和拼搏中度过。

一九四零年，田瑯从东京一高毕业，考进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我来到京都向他祝贺。

我们进了一家面条館，静静的，除了我们俩没有顾客，一只小花猫咪咪地叫着。

一个老太婆微笑着弯腰行礼说：

“您来了？”

“ニツ乌冬下サィ（来两碗面条！）”

久别重逢，格外亲密高兴。田瑯说：

“琳，这回我离你近了，我们可以一周见一次面了。”

我们边吃边谈，田瑯说：

“奈良到东京得乘火车十几个小时，到京都只一个小时。”

“你住在我这儿，天天早晨乘车上学，放学回来！”田瑯闪动着一双快乐的眼睛凝视着我说。

“不行，那叫学校知道，还不开除我么！我们学校规定女的不许交男朋友，更不许结婚。”

……

从四面八方传来：

“田瑯结婚了。”

这件事使我痛苦太久了，我想彻底弄清这谜。一天，我突然袭击，去京都田瑯的北白川的公寓，我用钥匙打开他锁着的门。

我查找着他的秘密，我找到了一只锁着的手提包。我从来没动过这只手提包，迫不得已，为了揭开田瑯的谜，我顾不得其它，我迅速将皮包撬开，东翻西翻，找到了藏在底层的一只金戒指，上面刻着“孙淑贤”三个字。

这无疑是一个女人的名字，确认那就是田瑯结婚的戒指。坐在叠席上呆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心中完全绝望，我把头埋在冰冷的手里。他结婚了是真的！孙淑贤三个字使我的心痉挛地疼痛，强烈的悸痛扩张到全身。我哭泣着，为我的命运哭泣着。

田瑯回来了，他走近我问：

“琳，你怎么哭了？”

我手里拿着金戒指，带着绝望和愤怒的眼神望着他，问：

“你到底背叛了‘海可枯，石可烂，此心不变’的誓言！”

我哭倒在席子上，心像插把刀子一样剧痛，人像被暴风雨吹打蹂躏过的花朵。

田瑯跪在我面前，流着泪乞求着说：

“琳，你原谅我吧！是我妈逼我和一个女工结了婚。”

“什么事都能原谅，这件事不能原谅！你为什么不反抗？”

“我妈说，花六十元，就当雇个老妈子，等你们毕业再和她离婚，你和田琳再结婚。”

“你妈的心真够狠的！六十元把人家姑娘毁了，把我们也毁了！你为什么同意这样做啊！”田瑯无言可对。

“怪不得你要求同居，原来是个阴谋！你欺骗了我，也侮辱了我！”我又气愤又难以忍受，我哭着冲出屋，坐电车回奈良了。

这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苦恼着我。

时时问苍天：

“怎么办？怎么办呢？”

我徘徊在痛苦的悬崖上。

功课很紧，我天天关着门，一边哭泣，一边看书。

我不愿意叫别人看见我的眼泪。白天听见脚步声，便急忙把泪擦干。夜里，蒙着被子哭个够，泪珠儿都快流尽了。

我刚刚二十二岁，就遇到这沉重的打击。我几乎承担不起这命运的重压。仁慈的上帝呀！

悔恨、绝望使我好像沉陷在无底的泥淖中，我被折磨得瘦削了。我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同学们见我消瘦，都关心地问：

“琳，你有什么心事，这么难过？”

“没有”，我勉强地笑了笑说。

“你饭也吃少了，瘦多了！”

“……”

“脸色也不好，憔悴得很！”

“……”

我咬紧发颤的嘴唇，竭力把悲痛埋藏在心底。关上心扉，忍受这悲痛的啮噬。

雨濛濛，雾濛濛。

我穿着浅蓝色的雨衣，浅蓝色的雨靴，在一条小路上走着。

我在沉思，我该怎样对待这不幸的命运，是被它毁掉，还是把不幸变成力量？

想来想去，终于我有些清醒。

爱情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还有更主要的追求，我自己警告自己。

——要挺起胸来，往前走，卸下沉重的包袱。上帝呀！请赐我英勇和宝剑，我要像山鹰一样在穹空中腾飞。

噩运风暴似乎减弱了。激荡在生命云海的浪涛似乎也趋于平静了。

这年，我写了小说：《风》、《砍柴妇》、《售血者》。

我写了散文：《湘娥》。

我写了诗：《猎人》、《马弟尼》、《祈》、《思念》、《期待》。

我拼命地读书，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读《意大利的统一史》。

自从我发现那只金戒指——田瑯结婚的事实后，我们的爱情就蒙上一层浓雾、阴云……我感到失落了什么，也感到屈辱。

我们是每周一见面的，见了面再没有欢乐，只有埋怨和哭泣。一次，我哭着离开田瑯的公寓乘车回到奈良。

拭干眼泪，进了飘着桂花香的法莲町，进了我的下宿，推开窗子。

我惊呆了：站在窗下的是田瑯，他仰着一张苍白的脸凝视着我。

“上楼吧！”我的心被他突然到来软化了，忘了他的欺骗，高兴地迎接他进来。

“你怎么来了？”

“你哭着走了，我不放心。”

他东张西望，东翻西翻。

“你找什么？”我问。

“我找信。”田瑯说。

“信？有什么信？”

“男人的信！”

他一边答话，一边寻找，翻来翻去，翻完抽屉，翻提包。

我皱着眉头，心中充满憎恨，望着无端嫉妒的田瑯，说：

“你对我不忠实，倒来猜疑我！告诉你，田琳的灵魂纯洁，没有污点！”

除了他的信外，没发现一封别人的信。可是他抬头，看见对面楼上，有一男孩在拉手风琴，他盯着那个男孩，他的脸变苍白，嘴唇发紫，两只手颤抖着，嫉妒使他克制不住他的感情，逼视着我说：

“不许你开这扇窗子！”

“为什么？”

“那个楼里有男人！”

“你胡说什么，人家才十五、六岁的孩子！”我有些气愤，白了他一眼。

“不许开，就不要开！”他有点像发了疯。我又气又有些可怜他，答应他：

“不开就不开！”

“你起誓！”

“起什么誓！”我不起誓。

两个人争吵起来，他气愤地走了。

过了些天，田瑯邀我和他去《华文大阪每日》编辑部。

我们乘火车去神户。

火车在急驰，田瑯非常激动，他在看书，但书页没有翻动。我看得出他心中有个谜，他在幻想什么？他在计谋什么？我都猜不透。

到了神户，去柳××的家，见到他的妻子梅娘，高高的个子，一双有神的大眼睛，明亮而泼辣。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见到女编辑张蕾，小矮个，白白的圆脸，小眼睛、有些俗气。

田瑯那沉静的常态，出奇地突然变得谈笑风生，兴奋异常地跟主人寒暄，却冷淡着我。

我腼腆地默默坐在那里。

柳××热情地约我写篇中篇小说。

回来，我思索着这戏剧性的一幕，我感到莫大的耻辱，很不愉快。我预感到我和田瑯这悲惨的一对，将导致分裂。

我想：越是不幸，越得发奋图强。

一九四〇年，暑假，我回到齐齐哈尔。

七月是百花盛开的季节。

我在一间小屋子里，赶写中篇小说《安荻和马华》。

九月，我胜利地写完《安荻和马华》，回到日本奈良。

田瑯嘱咐我：

“不要写真实的通信地址。”

“为什么？”我问。

“我担心有人给你写情书。”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万一有人给你写情书，不许你回信，把它烧掉！”

“行！”在没解除婚约前，我绝对忠实于他，所以我答应了。

他进一步要求我：

“万一你中了奖——作品发表了，前面写上献给楚珊。”

“不，你已不是从前的你，献给你做什么？我谁也不献。”

我把《安荻和马华》投给了《华文大阪每日》征文。

果真中了一等奖。

发表时，前面又写上了献给楚珊。我很生气，问田瑯：

“谁叫写上献给楚珊？”

“我专程到《华文大阪每日》编辑部，叫他们写上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是我的！”他毫不犹豫地说。

“你已经结过婚！我属于我自己，不属于你！”

我们争论了一阵，愤然分开了。

我虽然写的假地址，可是在奈良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一个女的姓田，所以给我来的不少信都准确地送到奈良女高师。

我忠实地履行我的诺言，一封信也没回，看完，全都烧了。

花开花落，又一年。

一天，突然，我接到杨叶的一封信。他揭发田瑯和他的妻子张蕾发生了关系。

这封信，像十二级台风向我的命运凶猛袭来，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仿佛跌入绝望的死水，感到窒息昏迷。我气得浑身发抖。我带着那封信去京都找田瑯。

田瑯故伎重演，他又可怜兮兮地在我面前下跪，流着泪乞求我：

“琳，我错了，饶恕我吧！”

温柔的我，变得坚强，我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打了他一个耳光。

田瑯向我承认了他一切过错，坦白了他曾和十几个女人搞过关系的丑事。

“琳，其实我和她们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我最爱的还是你。”

“别再骗我了，我再也不相信你的鬼话了！”

他的行为，我无法再容忍，我痛苦地思索了好久，决不再犹豫：

“田瑯，咱们分手吧！”

他沉思了半天，坐在我身边，默默地注视着我：

“那么，你真不爱我了？”

“不爱了！你的灵魂太肮脏，太丑恶！”

“没有考虑的余地吗？”

“还考虑什么？你的行为把我们的爱情毁掉了！破碎了的东西，怎能复原啊！”

他握住我的手说：

“那么，只有分手了！”他哭了，鳄鱼也有流泪的时候；我心中一阵厌恶之感油然而生，挣脱他的手，愤怒地大步走出他的公寓。

那天，我哭着离开京都，回到奈良。我向同学们宣布：我与田瑯解除了婚约。

我把五年中，田瑯给我的1800多封信，满满一大提包，交给我的同学说：

“求求你，替我把这些信烧掉吧！”

我的同学在她的下宿，把那一大提包的信投入火炉，据说烧了大半天才烧完——1800封信全化为灰烬——让田瑯那些谎话见鬼去吧！

傍晚的天空是如此阴沉，外面下着淅淅沥沥冬雨，落在残存的梧桐叶上。我体味着爱情崩溃的凄楚！忽然想起“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词句来。带着伤痛，做我地理的作业——去雕塑地球模型。我手里拿着刻刀，雕刻着阿尔卑斯的山脉和峡谷……

我的心灵深处，往事也雕刻着那痛苦的山脉和深谷……

我啊，在人生的坎坷路上迷失了方向，仿佛天黑了下来。难道我走进被上帝遗忘的角落了？

我继续地雕刻着，我的刀已走出了笔规外。我雕错了，许多天的劳动报废了。我哭了，刻刀从手中滑下来。

悲哀像一条活动的冰川冲进我的心灵，在那里它开始融蚀、破碎，仿佛在撞击着灵魂的岩石。我感到了一种苍凉的生命的死亡！突然我忆起雪莱的名句：“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希望之神向我走来。我又燃起生命的火焰。我要直面这惨淡的人生。我舐干了伤口流着的血，拿起笔写下了《意识的叛乱》。接连写了：《思念》、《人生的奴隶》、《紫色的烦恼》。我的思想感情的激流，从悬崖上的乱石间跳下，撞击成珍珠一样的飞沫，在空中旋转，又集聚在一起向下淌去。

我写下了：

忘掉他

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的一个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

我在幻想的园里

听到了思想的音乐

看到了彩色的绘画

那是动人的生命之歌

希望产生在绝望的断崖

新生产生在灭亡的悲鸣的回声里

决心不再哀伤，不再流泪，把生命献给祖国。

我和田瑯分手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开，求爱的信纷至沓来。有河南文学主编××来的，有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学生××来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来的，有天津、青岛……来的，我都没有回信。奇怪的是，留日学生刊物上登载一篇文章《把生命献给祖国》的作者深深地吸引着我，他就是名古屋工业大学的学生马吉。

他闯进了我平静、孤独的心灵港湾，激起绚烂的涟漪……

“和他一起逃到解放区去，参加抗日！”

这个希望在我心中燃烧，我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给马吉写了信。

信发出了，我便等待回音。

我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依着窗子谛听。盼着骑自行车的绿衣使者，吹着口哨到来。

一天，果然吹着口哨的绿衣使者投进信箱一封信。

我高兴得像燕子一样飞下楼梯，走向无花果树下的那只信箱。打开信箱，果然有一封从名古屋发来的信。

我急忙拆开信，那工整的字迹，透露着无比的喜悦。

我像迎来了开满鲜花的春天。

我们开始通信了，两颗心在撞击着，叮叮咚咚响个不停。

他在名古屋，我在奈良，不能见面，只好寄张相片来。他方圆脸，浓眉大眼，是个相当英俊的青年。

可是，从信中知道他小我四岁。理智告诉我，他只能做个弟弟，不能作爱人。

年龄像座大山，把我们阻隔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扩展起来，侵略了华北又侵略华南。珍珠港事件也快爆发了。

日本物资越来越匮乏，副食品买不到。马吉从名古屋却不断地给我寄来邮包。

一包香蕉干，一包巧克力糖……

在世界上有个关心我的朋友，我感到温暖。

日本侵略战争越打越激烈：

奈良火车站，经常有日本人打着膏药旗，送亲人出征。

未亡人（丈夫被战死的寡妇）的户数不断增加，法莲町的未亡人也在增加。

日本特务机关，对中国留学生的管制越来越紧，不许留学生离开所在地。

就在这个时候，马吉来信说，他宁可违反管制而冒险来奈良看我。

我为他担心，也为他的来而高兴。

夜已深了，静静的，奈良像在梦中。

我和我的同学王××伫立在静静的火车站的站台上。

过来几趟车都不见马吉的影子，我想：“他也许不来了。”

“呜——呜——”最后一趟火车响着汽笛进了站。车一停，寥寥几个旅客走出车箱。

在旅客中，我看见了一个青年学生，中等个，方圆脸、浓眉大眼，端庄严肃，和他的相片一样，我认出是马吉。

我迎上前去。

“你真来了，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说来，一定来，爬也要爬来啊！”

这句话代表了他的赤诚。我向他微微一笑表示感谢。

怕被日本特务发觉，我们默默地穿过奈良街，走向法莲町我的下宿。

马吉举止谦恭地走上楼去，那是个六铺席的房间。

在灯光下，我望着马吉。他有些腼腆，低着头，红着脸，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浓眉下的两只大眼睛向我看了一下，嘴角浮出微笑，显得和蔼可亲。

“奈良，我第一次来呢！”

“夜里，你什么也看不清，这里很幽美呢！”

“这儿是日本的古都。”

“你休息休息，我去打洗脸水，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不必麻烦你了。”

我打来洗脸水，他三把两把洗了脸。

“天不早了，你早些休息吧！”

我给他铺好了被子，便走出屋，到同学屋去了。

这一夜，我住在隔壁同学屋里，我听见马吉在叠席上走来走去，可能他没睡好觉。

第二天，我进屋时，他正面向着窗子在沉思。听见我的脚步声，回过头来说：

“你房前有棵无花果树，你来信说‘风吹无花果，摇落了一个黄昏’这句子多美！你是搞文学的，读你的信，是文学欣赏！”过了一会他又说：

“我是学电学的，我自己会制作收音机，我每天深夜，偷听祖国之音。你要不要一台？”

接着他从提包里取出一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我：

“这是送给你的小礼物。”

我打开一看，是枚金戒指，我立即交还他：

“我不敢收这礼物！”

“为什么？”

“我比你大四岁！收下是个错误。我不能要这礼物，我们还是做个姊弟吧！”

他低下了头，脸色有些难堪，喃喃地自语：

“是我没有资格——你是个作家！”失望地把那只小盒放回提包。

沉默不语，闷闷不乐。

气氛一下子冷下来，仿佛在我们之间下了场冰雪。

他是冒着风险来看我，我不能待他太冷淡。

“我陪你去奈良公园玩玩吧！”

第二天，我们去了奈良公园，在樱花树下，在杜鹃花丛中，在松柏树间，我们肩并肩地走着。

其实我很喜欢他。他是个严肃、朴实的青年，很有分寸，也有涵养。我不时看他一眼，在那双大眼睛里闪着疑惑的光——仿佛期待着什么，不时地偷看我。

我们在一棵樱花树下，坐下来，阳光从树上洒下来像碎金，落在他和我的脸上。

微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白云在蓝天上飘动，鹿在我们身旁走过。

我有些内疚，不知怎样安慰他才好，只能用温柔的眼睛看了看他。

马吉突然高兴起来，在草丛中采了一朵红玫瑰，插在我的发辫上。

“让这红玫瑰永远开在我们的记忆里。”我说。

马吉用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凝视着我，有些不解，又低下头去，在思索着什么……半天，他嗫嚅着说：

“我也许不该来！”

“为什么？”

“……”

他沉默不语。

这天夜里，我送走了他。他恋恋不舍向我摇晃着一只大手，消失在远方的黑暗里。

一九四一年的盛夏，太阳烧得像下了火，这儿那儿发着白光。

学校放暑假了，我整装回家，乘船加乘车四天下来，很疲乏，中途在长春休息两天，住在姨家“满映”（“满映”是伪满电影制片厂的简称）家属宿舍。姨夫是“满映”演员。

这天，晴空无云，烈日炎炎。我穿了一身海蓝色透花纱连衣裙，梳两条小辫。饭后，姨夫带我们到“满映”电影院看电影。电影演完，我刚站起来，姨夫领来一位青年，高高的个子，白皙的脸，高鼻子，一双热情的大眼睛。

“这位是但娣小姐！”姨夫向他介绍说；又向我说：“这位是作家山丁。”

山丁伸出一只大手紧握着我的手摇晃着说：“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我读过你的作品，写得很美，给我的印像很深。”

我很腼腆，脸红红的，微笑着。

“但娣小姐，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请你吃顿饭。”

“别客气了，谢谢你！”

“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他的语气那么亲切。

“……”我望着他没说什么。

“这个面子，一定得给！”山丁扬着热情的眼睛凝视着我，等待着回答。

“好吧！”我说。

他忙着张罗，给一些在长春市的文友打电话。

他打了一个又一个，一连打了十几个。

山丁是个有才华的作家，从十六岁开始写小说，写诗，写短篇、长篇，还写短评。我很敬慕他。

我是个24岁的日本留学生，没有社交经验，腼腼腆腆，羞怯地望着他。

山丁打完电话，走到我身边热情地说：

“晚上六点，请你到××饭店去吃饭。”

我什么也没说，只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便走开了。

傍晚，微风吹拂着我的发辫和纱连衣裙。我去赴宴，一路上心里编织着梦的花环。

我独自一人走进饭店。

一张圆桌旁坐满了人，是那么陌生，我一个也不认识。山丁一一给我介绍：吴郎、吴瑛、李大一……

我第一次和这么多男人坐在一起吃饭，窘得很。大家有说有笑。我低着头，红着脸，谁也不看，默默地坐在那里。

大家鼓掌请我讲话，这下我的脸发烧，心忐忐忑忑，一句话也挤不出来。

山丁瞧了瞧我，替我解围说：

“但娣小姐是个学生，不习惯社交，讲话免了吧！”

我用感激的目光向大家微笑点头，表示谢意。

从饭店出来又到《新满洲》编辑部坐了一会儿便往回走。

七月的骄阳发完了疯，不无遗憾地向西坠落了。夜空悬着弯弯的月，月光洒落在夜街，洒落在树、花上，温馨的微风吹来驱散了暑意。

山丁陪着我在柏油马路上肩并肩走着：

“但娣，你怎么这样憔悴？病了吗？！”

“没有！”

“我知道你在爱情上跌了跤！你知道英文里有句谚语吗？Let bygones be bygones！（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该往前看，难过也没用。”

“……”我沉默不语。

“我很同情你，我想帮你出版集子好吗？”他用热情的眼睛凝视着我。“你回去把你的文章整理出来寄给我。”

“你的话是真的吗？”我问。

“怎么不是真的！”他歪着头笑着说。

“我们初次邂逅，还是新朋友，你能伸出友谊的手，帮我出集子，有什么比这还珍贵的呢？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什么叫友情，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在顺利的时候关心他。友情的幼苗长在忠诚的土壤上。”山丁诉说着。

在这世界上，我并不孤独，我还有一个关心我的朋友，我为这突然幸遇激动不已。

“谢谢你！我谢谢你！”

在“满映”门口，我们分了手。他回他的单身宿舍（他还没结婚）。我回到姨妈家。

这一夜，我没睡。

想着山丁那双紧握的大手；想着他一双热情的眼睛；想着他深情的话语……在我心灵深处萌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

回到日本奈良，我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整理出来寄给了山丁。

为了出版集子的事，我和山丁通了几封信，那信很简单，像清清的溪水。

一九四二年，秋天。我和田瑯都毕了业。

在他回国的那天，我去东京和他诀别。我们从海誓山盟的恋人，到将要分手成为陌路人，其间相爱了七年，这次就要分道扬镳了。

那是个凄风苦雨的傍晚，我们走出田瑯北白川的下宿。我回头望了望那幢楼房：在那里曾留下我们的爱与恨，欢笑与哭泣，也留下了争吵与谅解。我俩没哭，也没有笑；只有叹息，默默地沿着被雨冲洗过的石子小路走着。我像喝了一杯苦酒，又苦又涩……

田瑯领我走进一间乌冬屋（面条铺），这是普普通通的小吃店，里面暗暗淡淡，一个老太婆弯着腰向我们施礼说：

“您来了——要吃啥？”

一只小花猫，咪咪地叫着，在桌底下打圈圈找寻吃的。

“来两碗‘乌冬’（面条）”田瑯说。

这是我们吃最后的一顿晚餐。

田瑯张着一双深情的眼睛，似乎有说不尽的哀愁，诉不尽的苦衷，东瞅瞅，西看看。站起来，用手东摸摸，西摸摸，摸摸窗子，摸摸桌子，又抱起小花猫，亲了亲放下。然后走到我身边，流下眼泪，唉声叹气地说：

“琳，你记得吗？你第一次来京都，我们就在这儿吃的‘乌冬’。”

“是吗，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一晃三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就要诀别了。”我默默地看着他。

“琳，我们相处七年了，就要分手了，我很难过！”他泪汪汪地凝视着我。

“你还难过？你还会流泪？你做出那么多缺德的事……别骗我了！”我冷笑了一下说。

“我是人啊！”他说。

“我为你流了多少泪，现在欲哭无泪！”我说。

“琳，说实在的，我后悔——失掉了你，再也找不回来了，我确实非常难过！”

“难过的是我，你背叛了我！”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老太婆端上两碗面条，我们默默地吃着。

吃完这顿最后的晚餐，走出门去。

我到花店，想给田瑯送最后一束鲜花。

那儿有五颜六色吐着芬芳的鲜花。

“送我一束（forget-me-not）勿忘我花吧！”

“不，我不能送你那花了！”

“为什么？你不是常常送我勿忘我花吗？”

“我已经被你忘掉了，我不再那样乞求了。”

“琳，我是不会忘掉你的，我临死也会想起你——你是我第一个妻子。”

“不要骗我了，我很清楚——你是个喜新厌旧的人！”

我买了一束白石竹花送给了他。

“这白色的花，象征你。琳，你又纯洁又神圣，一尘不染啊！我也许不会遇到比你灵魂更美的了！”田瑯边看花边向我诉苦。

“我是白痴，被你骗得好苦呀！”我说。

“你是日本留学生，又是个女作家。”他说。

“我给你的是一颗金子的心！你给我的是花花绿绿的肥皂泡呀！”我说。

我们边谈边走，搭上去火车站的电车。

在电车上，我们肩挨肩站在一起，彼此的手共拉着一只吊环。这样搭电车，我们有过上百次。而这回是最后的一次，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永远分手了。

我看看他愁苦的脸，那双一字眉，那双傲慢的小眼睛，那紧闭着的薄嘴唇，是多么熟悉的脸啊！就要永远看不见了。我骤然产生了痛楚的感觉，两串泪水顺着眼角往下流……

我们下了电车，走进火车站。

火车鸣着汽笛，进了站。

田瑯登上火车，我们握了最后一次手。随即递上我给他最后的一封信说：

“车开了，你再看，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一封信。”

火车又鸣了一声汽笛——轰隆轰隆离站了。

田瑯站在车厢门口，摇晃着一只手：

“再见！……”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田瑯的影子消失雾中。

送走了田瑯，我回到奈良。

我坐在窗前，冷静在想：

爱情首先意味着对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而田瑯对我的命运、前途没有承担责任，只有残酷的损害。

我凝视着窗外：

梧桐树、无花果树，摇曳着黑绿的叶子，摇落黄昏。

我拿起笔写首《诀别诗》

“……

……

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愿我们各向天涯去，

从今后，

我不是荻，也不是莎，

是一个白色的精灵

一朵白色的花”

（过去田瑯通信曾称我荻和玛莎。）

第三章 第一次入狱

我带着苦涩的回忆，踏向前进的路。

十月，我也毕业，离开奈良回国。

我独自一人，要乘船飘过那茫茫的大海。山峰似的浪涌，一排排，你追我赶，前浪涌着后浪，冲向海岸、天边。

这是我在人生大海上又一次起航，我要冒着风险逃亡，去参加抗日。

从日本的下关，乘海船到了朝鲜的釜山，又乘火车纵穿朝鲜，回到祖国的东北。

车窗外是一条波涛滚滚的鸭绿江，过江便是安东了。

一排排的泥土屋，人民衣衫褴褛，小孩光着腚。我看见这些贫苦同胞就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我决心把生命献给抗日救国事业，献给祖国。

十月，东北已是早也萧萧，晚也萧萧的秋天了。

我首先去看望山丁。他已结婚了。人也变得苍老，热情从他的眼中消失了。

除了作品出版的事之外，我什么也没谈，便告辞了。

为了逃跑方便，我便只身去开原。

一九四三年一月，我到了开原古城，那里是一片冰雪，白茫茫，雾朦朦。

一条弯弯曲曲结冰的清河流经这儿，河上有一座清河桥，过了桥，便可望见远处那座高高的古塔。红色的朝霞，映照着古塔，别有一番奇妙的幻境。

这静静的古城，更使我这远离家乡的流浪女，感到孤寂。

我背着行李，拿着提兜，迈进开原女高的校门。门前有一棵歪脖子老榆树，叶子已经掉光，一树枯枝在寒风中摇曳。

一排平房是校长室和教师办公室。

后面一排平房是教室。

西面是一个广阔的体育场。

中等个、黝黑脸的朱校长接待了我。

教导主任分配我教地理、西洋史、几何、教育学，日语会话课。

除了繁忙的教学工作，还兼了舍监。

与学校隔一条大道的是女宿舍大院。这年我才二十六岁，要照管上百个女孩子。

我仿佛进入了荒凉的世界。夜里独自坐在舍监室，守着火炉沉思，幻想着逃亡。

我想逃往延安圣地。我在等待，等待时机，焦灼地等待着。

我像一个园丁，我想把爱国种子播在学生灵魂里，只要种子播下就会发芽。

我向学生们灌输爱国主义和仇恨日本思想。我告诉学生多读书，珍惜时间。书是知识的源泉，也是思想的窗子。

我相信书会启发她们慢慢觉醒起来。

黄昏过去，天色薄暗起来，一条街燃起一只红色的灯。

我回到空空荡荡的宿舍大院，把大门锁上。

我独自在空寂的大院里，来回地徘徊着，大院静静的，我望着天上的云，想着祖国。悄悄地吟诵着岳飞的《满江红》：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我的脚步低响着，我的亡国哀愁更沉重了。

我回到舍监室。

夜里，我守着火炉，外面落雪了。

孤独也是财富，我在这间舍监室里写下了散文《望乡》、《天涯寂寞》，小说《传尸病患者》、《悬崖》。

一天，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奴化教育课：“勤劳奉仕”日。

学生集合在操场上，我代替三年级班主任，站在三年级学生前边，我向学生宣布：

“你们班主任没来，我代替。今天的任务是背沙子，你们每人少背点，回来别单放，倒到大堆去，懂了吗？”

“懂了！”学生齐声回答。

大队出发了，总指挥是日本人守屋。这个矮个日本鬼子，圆圆的脸，一对三角眼，嘴上留着八字胡，凶恶的面孔，膀大腰粗像个熊，手里握条皮鞭子，看哪个学生走错步，就狠抽一鞭子，我很气愤，上前制止他：

“你不能用鞭子抽打学生！”

守屋横楞我一眼，说：

“满洲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好。”说着，又扬起鞭子抽打另一个学生。

我气得嘴唇直哆嗦，心想：

“你不用逞凶，早晚有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我和三年级班长并肩走着，她歪着红润的稚气的脸，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我说：

“老师，你很像我姐姐。”

“你姐姐在哪儿？”

“她逃到重庆去了。”

重庆不是延安，但是祖国的地方，总比“满州国”好。我悄悄对她说：

“晚上，你到我舍监室去！”

“好的！”

夜空明净，满天繁星。

我对着一盏灯，等待学生来。

不一会儿她来了。

我们师生围在灯光下，谈着她姐姐逃跑的事，我们谈好了，接着我把我想逃走告诉了她，求她帮我联系逃往重庆。

从此，我心中燃烧着希望的火，我盼望着逃跑的时刻早日到来。

忧伤、烦恼都从我生命中驱走，心中充满阳光。我常常哼着一首歌，

为了祖国，

这颗心燃烧着火，

闪着光。

我焦躁地等待、等待，但没有消息。

我心急如焚，有些忍耐不下去了，便嘱咐学生高××帮我联系，问清他老师的姓名和模样，把我二哥的地址留给他，便想逃跑了。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深秋。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满天星星在夜空中闪耀，寒风吹刮着树叶沙沙响。

我把所有的东西，收音机、被褥、书籍和衣服都抛弃在那间宿舍里，我轻轻走出舍监室关上了门，走了。

秋已深，蟋蟀唧唧凄凉地叫着。

我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潜逃了。

我像逃犯一样，心惊胆颤穿过一条街又一条街，赶到火车站。乘开往四平的车逃走了，又从四平逃往吉林。

我逃到吉林，是一个早晨。

蓝蓝的天，飘着白云。秋风扫着落叶，草木黄落，大雁南飞。

我沿着吉林的临江街走啊，走……

那条临江街又寂静又萧条，也像充满亡国的哀愁。

那条清澈的松花江水啊，呜咽着向东流去……

那滚滚浪涛的松花江，像充满屈辱和愤怒。

在那荒凉的江岸，有一只船停泊在渡口。一个贫穷的船夫，孤独地坐在船头，但没有一个乘客。他愁苦地抽着烟，叹着气，打着唉声。

有一座桥，默默地站在那里，它承担着亡国的痛苦，人民从它的身上走过，旅人也从它的身上走过。

我拖着精神的锁链，痛苦地踱过那座桥，走啊！走！到了白山区二哥那幢泥土屋。

我躲藏在这泥土屋里，等待高××的老师来接我逃跑。

我常常在傍晚，悄悄到那条临江街散步，从那里，可以望到江南的荒野，稀稀疏疏的树林和枯败的野草。近处，一群麻雀在枯枝上叽叽喳喳，跳上跳下。沉思中我来了诗兴，不觉吟诗一首：“西风凌空树，群雀压枝头。频频相慰藉，穿衣剪裁否？”

几只乌鸦从上空飞过，呀呀地叫着停在附近高高的树上。

我心中一怔，掠过一个暗影，不免思虑重重。

时间在焦急地等待中流过。

一天，有人敲泥土屋的木门扇，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前。

“你找谁？”

“找田琳。”

我上下打量着他：中等个，方圆脸，闪着一双大眼睛，二十多岁，这模样就是高××讲给我的他老师的模样。

“我是高××的老师。”

我高兴地把他让进屋。

屋里只有我和他。

我悄悄地把我要逃出“满州国”，参加抗日的想法告诉了他。

他用一双严肃的眼睛凝视着我，思考着。然后问：

“你的意志坚决吗？”

“坚决，怎么不坚决！”

可是他还有些不放心，追问一句：

“这要用生命来换取，你不怕？”

“我不怕，为了祖国我愿献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他沉思一会说：

“我还决定不下来，需要你去沈阳（当时叫奉天）和另一个人谈谈。”

送走他后，我兴奋极了。

我没有路费，便把田瑯送给我的纪念品手风琴卖掉。

是个深夜，我走出二哥的泥土屋，经过那涛涛的松花江，穿过迷濛的临江街，奔向火车站，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第二天清晨到了沈阳。我下了火车，按高××老师给我的地址去找了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把我领到他的家——在喧闹的牛马市场的一个小店，那是下层人住的雀笼子一样的小屋。

这天是阴历八月初五，是我的生日。可我手中的钱无几了，只好饿着肚子，肠子咕噜咕噜直响。

在深夜，两点，马老师带来一个陌生人。个子高高的，介绍给我说：

“他是从重庆来的大学生，你和他谈谈吧！”

我便把我要走，或参加抗日、或进大学的想法告诉了他，可他百般不答应，要我留在北京，给他们的王老板当秘书，我问他做什么工作？

他说：“你不是懂日文吗？翻译日文电报。”

“怎样工作？”

“夜里地下室。”

我一听这是密探工作，我没胆量便百般不应，并且告诉他我得回齐齐哈尔一趟。这样，我们便约定下次见面的日子和地点。

我回到齐齐哈尔去找我的同学王子荣，她坚决反对逃跑，还劝我说：

“琳，你不要逃跑，这是掉脑袋的事。”

我心想，于庆波是个陌生男人，和他一块逃是件担心事。原想找个女伴，女伴没找成，便犹豫起来。

待我回到吉林，约会的日期已过。

这次没走成。

这年冬天，我在一家书店任编辑，马老师又来找我，问我走不走。我告诉他：“这次一定走了，有伴没伴都走。”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总务科长喊我：

“田小姐，请你出来陪我走一趟。”

我跟他走出编辑部，门前有一群日本女公务人员，用惊疑的眼光注视着我。

总务科长把我交给一位穿便衣的陌生人便走开了。

我跟着那个陌生的穿便衣的日本鬼子边走边问：

“你要我去干什么？”

“你跟我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那黑瘦的脸，显得又冷酷又狰狞。

他领着我，东绕西拐，走进一座建筑物的后门。

原来这是日本宪兵队，我预感到是发生了不幸。

走进那森严的宪兵队的大办公室内，看见一群宪兵紧张地忙乱着。显然这天是他们大逮捕日，会有不少爱国青年被逮捕了。

那个穿便衣的日本鬼子特务，把我交给一个朝鲜特务看守着，不到一个钟头换了三个日本特务看守着我。我心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我担心着从重庆来的大学生可能遭到不幸。

忽然，一个日本宪兵，拿了一张表格之类的东西走来。我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这表格是我的卡片，上面贴着我的半身像，下面写着我的履历。他走近我的身旁坐下了，恶狠狠地向我瞧了个仔细，然后在他的表格上填写我的衣着样式和颜色，又在我脸上盯着瞅，他在表格里填写着脸型、鼻型、眼睛型、耳朵……最后叫我张开嘴，数了数牙齿的数目。

我感到人格、国格受到莫大的耻辱而愤恨，我也感到灾难来了，恐怖和耻辱占据了我的心灵。

那个日本特务填写完了，走开又换了一个日本特务，他打开一间门，我看是于某关在里面，他又把我押送另一个房间里。

我忽然想起我的裤袋里还有一封马吉的书信，我担心连累了他，我必须消灭掉，我问看守我的特务说：

“我要大便，到便厕去一趟。”

他皱紧眉头，说：

“没有女便厕。”

“男便厕也行！”

他犹疑了一会儿，不耐烦地领我到了男便厕。

我进去，慌忙地把信从裤兜掏出来，好不容易吞进肚里，然后走出来。

从便厕走出，进了又一个日本宪兵办公室，搜身检查。搜去一只手表，两盒烟，一百五十元钱，和两张给杂志社寄稿的挂号收据。

检查完后，领我进了会议室，两个特务看守着我。在这里呆了一天，我心里慌乱又焦急。从前充满希望，我是自由人，现在我被监视着，看守着，一会儿想到从重庆来的于庆波，一会想到我是否会判死刑。只要是反日的，凶神恶煞般的敌人就会把你处死。阴森恐怖的思考像恶鬼一样，缠绕着我，这时，我更思念的是我的父母亲……也想起马吉。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我从窗上可以望见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宪兵们。我意识到他们是侵略者，我更加仇恨，我也意识到生命完结的哀伤，凄凄惨惨戚戚。我正在胡思乱想，一个秃头的壮汉子进来开始在我身上检查。

“检查过了。”

“我还要检查！”

“检查什么？”

“住口，不许说话。”他恶狠狠地向我说。

“把裤腰带解下来！”

我解下腰间的裤带给了他。

“还有。”他说着便伸手要摸。我对他这种野蛮的举动气愤至极，我用力将他手推开。我把裤衩的松紧带拉出抛在地下了。原来他们怕囚犯用裤带之类上吊自杀。

我提着裤子跟着他，爬过一条狭窄的梯子，便降到暗黑的地下通道了。

铁门里有一间广大的房间，是宪兵看守们休息的地方。

那个宪兵把我交给他们便走开了。

几个矮个子日本宪兵围着火炉烤火闲唠着，看见我嘻笑着。

“姑娘给我做老婆吧！”

我瞪他一眼，一个宪兵便把我领进了一个幽暗的通道。通道两旁全是牢房。

把我投进80号牢房，铁门哗啦在我身后锁上了。

我向四周巡视一下，那冰冷、满是灰尘的牢房，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天棚上悬着一盏小电灯，放射着幽暗的光。我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悲惨地狱的恐怖。带着血腥味的恐怖。

我心里只考虑到一件事，我宁受毒刑拷打，不能从我口中透露任何事和人。

我不怕死，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也是死得其所。这样我就没什么悲哀了。

通道里，不住地有宪兵的皮靴声。

我牢房的小铁窗，不住地有一双眼睛监视着我。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流逝，真是度日如年啊！

“睡觉！”

我只好躺下，躺在地板上，没有褥子，也没有被，蜷曲地躺着。

从那扇铁窗，我隐隐听见长春车站的火车的汽笛声，这声音引起我无限乡愁，几乎流下泪来。我默默地躺着，我的思绪像大海波涛起伏。忆起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和那些亲人。

我昏昏沉沉地卧在牢房地上，度过了一夜。

次日早晨，天还没有亮我便被喊声“起床”惊醒了。

我从地板上爬了起来，我冷清地蹲在地板上，看见映在牢壁上狼狈的影子。我意识到我已经是被禁锢在牢里的女囚了。

我站起来想冲出这座铁牢，可是四面是水泥墙、铁窗、铁门、铁闩、铁锁，一种不自由的痛苦啃啮着我的心，要求自由的欲念在燃烧，不安，焦躁，我不住地在牢里绕着圈子走着……

深夜的时候，我听见隔壁的难友，被拖出囚室。

不久，我听到了鞭打的声音，和惨痛的绝叫声。

那悲惨的喊叫声，透进我的心灵深处宛如刀绞。他是谁，我不知道，但那叫声代表着民族的危难，折磨着我。

住在地下的囚室，实际上就是生活在地狱里，只能从小天窗里透进薄暗的幽光。我每天朝着那幽光，向往着外面自由世界。有时可依稀听到火车的汽笛声音，有时可以听见马蹄敲着柏油路的声音。一天，我忽然听见从院子里传来：

“杀——杀——”

我猛地冲到小铁窗边，原来是这些杀人犯，日本宪兵们在练习杀中国人的本领。这声音引起我愤怒的火燃烧起来。但我无法和这些野兽对抗，他们把我囚在铁牢里了。从小监视铁窗不住地露出一双凶恶的眼睛，怒视着我。

一时我又想起我们的案件，我猜测出来是于庆波遭了敌人的残害，我为他难过。我决心不透露一个字，我宁死也不说，我在等待着审问，我要以死报国，人生自古谁无死呢！

我发现墙壁上刻着道道，那是囚犯记录日子的方法。我也在墙上刻划着我的囚禁的日子。

在墙壁上我发现一些手印，那是一只只粗大男人的手印……是许多只爱国青年反抗的大手。我也在墙上印上了我的一只小手印，这也是一只反抗的手。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悲惨的历史，不知有多少爱国青年被囚死了，被杀死了。离开他们的父母、妻子、子女、或未婚妻死去了。

他们都是些有教养的青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敌人的凌辱和屠杀，只能激起更多的人起来反抗。谁种下仇恨，到头来谁就会自己遭殃！

罪犯是他们，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土，他们是刽子手，把我们的优秀青年逮捕、囚禁，残酷地施刑、杀死。

忽然我的牢门被打开了。

走进来一个宪兵，白脸的矮个子军曹向我说：

“今天晚上审问你，你好好准备准备。”

我知道酷刑一会儿就会临到我的身上，我闭着眼睛等待着叫我。

深夜时分，我的铁门开了，我穿上鞋，跟着鬼子兵走出我的囚室。穿过那长长漆黑的通道，我摸索着往前走。

“这边走，快点走！”领我的鬼子兵踢了我一脚。

我心里骂道：“这该死的畜牲！”

我跟随着他的声音往前走着。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暗黑的地道和一座大铁门，便把我推进一间取调室了。那里坐着一个取调官，高高的个子。一双奸诈、狡黠的鼠眼，瞟了我一下，说：

“坐下！”

我便在他对面坐下了。

有一个白脸的军曹坐在他的身旁。

取调官开始审问了：

“你懂得日语吗？”

“懂得。”

“田琳是你吗？”

“是我。”

“听说你是个留日学生，又是个有名的女作家。”

“……”我沉默着。

“你最近到哪里去过？”

“哪里也没去！”

“胡说！”他一面拍着桌子，一面把那双鼠眼瞪得圆圆的。

“你在十月三号去过奉天？”

“去过，不过是旅行。”

“旅行，胡说！”他又杀气腾腾地拍下桌子：

“你把你认识的男朋友的名字写下来！”

“我没有男朋友！”

“你不认识姓于的吗？”

我认识的人中有两个姓于的，一个是抛弃了我的于明仁，一个是从重庆来的于庆波。于明仁虽然抛弃了我，但我无论如何不能出卖他。于庆波是爱国青年，我更不能说。

“我不认识。”

“老实点！”

“我本来是个老实人。”

“你不承认吗？这里都有详细的调查书。”他翻了翻案上放着的一本调查书。他气愤地把一只拳头砸在桌子上吼叫起来：

“我再也没见过你这样顽强的女人！”我没理他，还是不说话。

他不时地向我发问，我还是摇着头说：“不知道。”

他气极了，把一只茶碗摔在我的脸上。我的脸立时流下血，鲜红的血一滴一滴滴落在我的衣裳上，脸变得血糊糊的一片。

坐在他身旁的白脸军曹给他使个眼色，两人走出去了。

我迅速地将取调官的秘密公文看了一下。我看到了“关于特别时局刑法”的一条：凡是加入“反满抗日”团体的，或图谋叛逆的都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我决定只承认逃跑，不承认参加“反满抗日”。

我又战战兢兢看到叙述我的一段中有马瑞林和于庆波的名字。我又迅速地把那文件放到原处，低着头坐在那里，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寻思于庆波的事他们全都知道了，看来说不认识他是犟不过去的了。

两个取调官又进了屋。

那个高个子的取调官，用劝慰的口气说：

“你是个日本留学生，又是个女作家，你还年纪轻轻，你要考虑你的前途。”

我低着头，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那个高个子的取调官问，

“你知道不知道于庆波他们是什么团体的？”

“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东北爱国青年挺进队’？”

“不知道。他们没谁和我提及这个名称，和于庆波也只见过一面，谈不上认识。”

“你是不是想参加‘反满抗日’活动？”

“没有，我只希望他们把我带到重庆上重庆大学。于庆波没有答应我的要求。”

“说谎。”

“没说谎，我的行动就是证明。”

“你什么行动？”

“我没有跟于庆波走。”

于是我大哭起来。

哭得两个取调官说：

“今天，就问到这里吧！”

我走回牢房，我受伤的脸还在疼痛，还在滴着血…

一天，我正在牢房里痛苦思索着。

忽然牢门开了，白脸的取调官拿一本书进来。

“祝贺你！你的《安荻和马华》出版了。”

他给完书，便走了出去。

我一边抚摸着书，一边滚下了泪来。

《安荻和马华》的境遇和我一样，写它的时候，是我在爱情崩溃的时候，交涉出版时，我孤零零地旅居异乡；出版的时候，我却被关在牢里。作者丧失了自由，而作品却面世了。现在它在我身边，宛如一个孩子伴着我在牢房。

在地牢里，白天我面对着铁窗，无言地伫立着。我仿佛是一只笼中鸟，靠着牢房的墙，低垂着头，想着灾难的于庆波……

黄昏一过，到了黑夜，窗子暗了起来，我的心也暗了起来。在那幽灵一样的灯光下，我孤寂地坐着：

听通道里响来宪兵的皮靴声。

听巡夜的梆子声。

我看着牢墙上映着我孤寂的影子。

在地牢里我被关禁了一百多天。

一天，把我从地牢里提出来，领我到外面照了张囚犯的像。

然后又走进一个屋子，用墨水涂了双手掌，在一张纸上按了两只黑色手印。

这一连串的侮辱，给我的刺激很大。这留下了我是囚犯的烙印。我的心是像万把刀子在割着，在流着腥味的血……

一九四四年。

三月，北方的三月，冰雪还没融解，北风在凄楚地呼啸着……

这天，下着大雪，这死掉了的雨的精灵裹着刺骨的北风，在空中旋转地飘落着。

我们几个“反满抗日”的政治犯，戴顶木制的政治犯高帽（是木板条做的，从里面可看到外面，从外面却看不到犯人的脸。）拖着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哗啦哗啦迈着艰难的步子，走出日本宪兵队的地下牢房，吃力地爬上囚车。

这辆黑色的囚车，穿过雪雾迷茫的市街，行驶在铺满冰雪的街道上。

又穿过一条又一条大街小巷，奔驰了好长一段路，最后开进一条偏僻的，挤满低矮房屋的清真寺街，在街的尽头“长春第一监狱”门前囚车停住了。

这是一座森严的监狱，高高的围墙，上面安装着铁丝电网，两扇沉重的大铁门，紧紧地关闭着，铁门两旁有两个监视犯人的岗楼。

从岗楼走出两个持枪的日本鬼子兵，哇啦哇啦地和拿枪押送我们的鬼子兵说了几句话后，便伸出两只粗大的手，笨拙地推着两扇大黑铁门。沉重的铁门，发出吱吱嘎嘎的怪声，被打开了。

囚车停在监狱办公室门外。

我们在鬼子兵的推搡下，踉踉跄跄地爬下了囚车。

“哗啦哗啦”的脚镣的撞击声，如泣如诉地敲着我们囚犯的心。

我们走过一条长长的阴冷、昏暗的通道，被推进了一间办公室，摘下那木制的高帽。办完犯人登记手续后，便背着双手，面朝墙壁，站着等待。因为不许走动，脚站得麻木了，可是还得站着等待，痛苦地等待着。到了午间，我的肚子却又饿得咕噜咕噜地响着。

黄昏已过，夜将来临，天色越来越暗。屋内一盏昏暗的落满灰尘的小灯亮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们几个犯人，才被一个一个送进监狱的牢房。我是个女犯，最后一个送走。

防止我们观察到逃跑路线，又用一块黑布把我的两只眼睛蒙上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像瞎子一样，这个世界变成一片漆黑。

“听着我的口令，往前走！”日本鬼子兵用枪托抵着我的后腰，粗野、沙哑地吼着。

“往前走！”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试探着迈着步子。

“跨门槛！”鬼子兵吼着。

我迈过门槛，突然，鬼子兵用皮靴子踹了一下我的后腿。这一脚使我打个趔趄。

“往右拐，下楼梯！”

我愤愤地想：这个践踏我们祖国土地的畜牲，我真想把蒙住双眼的黑布撕下来，往他脸上吐口唾沫。无奈，我的双手被铁铐铐住了。

这个畜牲又命令着：

“往前走！”

我感觉到我是在一条阴冷黑暗的长通道里走着，走着，走了好长通道，又听那畜牲在命令我：“迈门槛，往前走”，走出了办公室的大院，进了监狱的院子。

“送来一个女犯人！”押送的鬼子兵对监狱的鬼子看守兵说，然后才把我眼睛上的蒙布取了下来。

夜空黑魆魆的，北风凶猛地刮着，挟着冰冷的雪抽在我的面颊上，钻进我的衣领里，我感到寒冷。

我在雪地里走着。

阴森恐怖的监狱，高高的墙上安着电网。四处的瞭望塔楼上探照灯巨大的光柱，穿过漆黑的夜，把监狱的四周照得雪亮。

满院子落了很厚的雪，八卦式的低矮的男监的牢房已被半埋在雪里。

当……当……当……

沉闷的钟声，在监狱里响起来了。

我在前边走，押送的鬼子兵在后边监视着。

我单薄的鞋子，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凄凉的响声。

雪地上留下两行我这政治女囚的脚印。

雪地上也留下了日本鬼子兵罪恶的铁蹄印。

在这个监狱大院的南边，有一排灰色砖房是女监。那个鬼子兵把我押到女监铁门前站住了，用枪托敲打着女监的铁门。

“哗啦哗啦”女监的铁门被打开了。

一个女看守拿串钥匙，站在我们面前，她鸭蛋型脸上有一双细长的眼睛，梳着卷发，穿着蓝长衫，瘦瘦的，中等个子。

鬼子兵押着我进了女监，用嘶哑的声音向女看守训话：

“她是个政治犯，心大大的坏了，你们谁也不许接近她，接近她，砍头的有，懂吗？”

“是，懂了！”她低下头答了声。

“你重复一遍我说的话。”

“她是个政治犯，心大大的坏了，不许接近她，接近她砍头的有。”

然后，鬼子兵押着我，走过一条弥漫着臭气的昏暗的长通道，在最里边的一间独牢的门前站住了。

那鬼子兵瞪着眼向我说：

“我要搜查你身上。”说完他从上到下用他那双粗大的手，将我身上搜查了一遍，把我的裤腰带，鞋带都拿走了。

我被推进那间独牢的铁门里，用大铁锁锁上了。

鬼子兵的马靴声响在通道里渐渐消失了。他滚蛋了。

这是一间低矮的独间牢房，很小，只有五平方米大，有两扇带铁格子的窗子，一扇朝南，一扇朝着通道。四壁挂着蜘蛛网和灰尘。墙皮剥落下来，有些血迹，还粘着一缕缕的头发。

天棚上，有一盏五度的小电灯，上面落满灰尘和苍蝇屎，发出暗淡的光。

“喂！姑娘你吃饭了没有？”

我转过头来，看见两张脸紧贴在铁格子上。一张瘦长的脸上，有一双坚毅、深邃的眼睛；另一张是胖圆脸，两只黑溜溜的眼珠正在注视着我。

“没有。”我摇了摇头。我是饿了，一天没吃饭了。

“我们俩也是犯人，是杂役，白天出来干活，就寝时回到牢房去！”

“你犯了什么罪？”我问

“我是侦查敌军情报的共产党员，判刑十五年，你呢？”她说。

“我是‘反满抗日’的政治犯。”我说。

“别上火，保住生命是头等大事，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那个圆脸的女杂役，端来一大碗包米粥，一小碟大酱，两棵大葱。这家乡饭，我好久没吃了。我狼吞虎咽吃了下去。

“你多大岁数了？”瘦长脸问。

“二十六岁！”

“还年轻！有爱人吗？”

“有过爱人，他欺骗了我，又离开了！”我说着眼泪快流出来了。

“你呢？”我问：

“说起来话长了，第一个丈夫去苏联了，两个孩子，因为我进监狱死了，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不知道。第二个丈夫，带走了我在狱中生下的孩子。现在又结婚了。”她说着泪流满面。

我隔着铁格子帮她擦泪。

“算了，男人都是一样，不可信，为他们落泪，不值得！”我安慰着她。

那个圆脸小胖子，打开了我的牢门，扔进两个草袋子说：

“一个铺上当褥子，一个盖上当被子。”

牢房内就寝时间到了。

通道里漆黑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窗外，风在狂啸着。雪还在飘落，一片冰冷的世界。

这是两条脏脏的草袋子，我蜷缩在草袋子上面，刺疼了我的皮肉。

我躺着望着窗外，思念着远方的妈妈和爹爹，也思念我的亲友。

静静的走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渐渐走向我的窗前。

我惊恐地凝视着那扇铁窗。

铁窗前出现了一张鸭蛋型脸，一双细长的眼睛。啊，我认出来了，她就是今天值班的女看守。

她伸出一只手，从铁窗扔进一卷手纸，一块肥皂，一个苹果，一块小镜子。

然后迅速地走了。她的脚步声消失在通道里。

这是梦吗？这又不是梦。

我拾起我最需要的手纸、肥皂、苹果和那块小镜子。我流出热泪，人世间并不都是吃人的野兽，也不全是趋炎附势的小人。黑暗的牢房里，人类的正直善良同样在闪耀着光芒。

我在想，难道她忘了鬼子兵训她的禁令？

“她是反满抗日的政治犯，不许你接近她，接近她，砍头的有。”

不，她没有忘记，她是冒着砍头的危险，送来这些我最需要的物品。

她是个女英雄，我爱她，敬佩他，也感激她。

我的心燃起一团火，中华民族不会亡，因为有千千万万的儿女，都在同侵略者战斗不息。

我在兴奋中睡去。

天还没亮，起床哨子嘀嘀地响了起来。

女监的铁门哗啦啦打开了。

日本鬼子典狱长领着一帮他的随从走进了女监。

通道里响起一阵马靴踏着水泥通道，踢踢哒哒的脚步声，和稀里哗啦刺刀的撞击声。

典狱长开始点名了。

“1100号“

“有”

“他妈拉×的，大点声。”典狱长吼叫着。

“是”女犯重新大声回答了一遍。“1100号”“有！”

“1105号！”

“有！”

…………

…………

我蹲在牢房的墙角，等待着点名。

踢踢哒哒的马靴声响到我的铁窗前：

“1991号”

“有！”

“你的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好！”

典狱长瞪着那双凶恶的蛤蟆眼，伸着细长脖子，朝我咒骂着。

“畜牲！”我也用中国话回骂了他一句，他不懂。我轻蔑地瞥了他一眼，转过身去。

日本典狱长点完名滚蛋了，马靴声和刺刀声也消失了。

女监的通道里静下来，两个女杂役又从牢房里出来，开始她们一天的劳动。

过了一会儿，女监的铁门又被敲开了。

脚步声响在昏暗的通道里。

接着，我听见判刑十五年的女共产党员小付的点数声：

“一件、两件、三件……”

这是男犯从被服厂送到女监的棉大衣，叫女犯钉纽扣，锁扣眼。

我正站在我的铁窗前，忽然一个穿土红色囚衣的男犯走近我的铁窗。他瘦脸上长满了胡须，两只有点浮肿的眼睛充满机敏，迅速扔给我一张纸条，关心地注视了我一眼，说声：“多保重！”便走开了。

我回到牢房墙角，偷看那张纸条，上面写着：

“在阴冷的监狱，

我们同你在一起，

在一起，

坚持就是胜利！

——男监狱全体抗日者”

字里行间，注入了那么深厚的爱国感情。这几句话，鼓励着我，安慰着我，给予我无限的勇气和力量。

我并不孤独，牢房的厚墙，铁门铁锁，关不住抗日的热潮。我们是一个集体，爱国抗日的集体。

我正叨念那几句，突然一声吼叫：

“你哼什么？操你妈的，闭上你的嘴！”

铁窗外露出一张凶恶的麻胖脸。

女看守换班了。这是又一个女看守，她胖得圆圆的像啤酒桶。她皱起秃眉，立起肿眼泡的三角眼，狠狠地瞪着我，她迅速地打开我的牢门，向我奔过来，一把揪起我的头发，吼着：

“你他妈的站起来，谁叫你哼唱？你哼的什么？‘我们同你在一起，坚持就是胜利’!”

说着，她恶狠狠地举起皮鞭，发疯似地抽打着我。我的棉囚衣被打开了花，我的脸被抽打破了皮，鲜血流下来，流在我的衣襟上。我的嘴唇哆嗦了一阵，被我咬住，我绝不能向她告饶。

她抽打累了，门又锁上了。

我的脸被抽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伤口流着血，在疼痛。

这个民族败类，为虎作伥，是日本鬼子的哈巴狗。

我的独间牢，是一间矮狭小牢房，充满潮湿发霉的气味。

人怎能像动物一样关起来，我想冲出这间铁牢，我想推倒那厚厚的墙壁。怎能推倒啊？那是水泥墙。我用双手想掰开那大铁锁，那是铁打的，怎能掰开啊！

我失掉了自由，我才意识到自由的可贵，没有自由比死还痛苦。“不自由，毋宁死”啊！可是我们的民族正在遭难，我的暂时不自由，正是为了民族长远的自由啊！

我多么需要阳光，可是我出不去。

我多么需要新鲜空气，可是这里是污浊的臭气。

我急得团团转，要发疯。

我只好在这间牢里绕着圈子走，走了一圈又一圈。直走得天旋地转。

我用指甲，在墙壁上默写着泰戈尔的诗句：

“我的祖国呀！

在我的心里，有烽火在燃起，

在我的心里，有战斗的旗帜在飘扬，

在我的心里，有号角在召唤。

我的祖国呀，

为了你，我愿把铁牢坐穿，

为了你，我愿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你，我还要战斗下去！”

我用这首诗鼓舞自己。我用指甲在墙上划着道道，刻记着蹲牢的日子。那是在痛苦中煎熬的日子。

污浊的牢房，弥漫着屎和尿的臭味，充满从地道透来的死刑间死尸的腐烂味，空气中漂浮着各种病毒和细菌……

我常常感到精神不振，疲乏睏倦。

极度的痛苦，使我头发脱落。一缕一缕地脱落，墙上、地上都是我脱落的头发。

地下道是通往死刑间的地道，有时，从地道跑出一只老鼠，是吃死尸长大的，肥胖得很，胆子也大，大模大样地逛来逛去。

晚上，爬到我的头上，咬我的耳朵、鼻子，我常常被它咬醒。

有时在深夜，我会听到隔壁死刑间一阵阵极悲惨的撕心裂肺的喊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这是在秘密处死“犯人”。

有时我睡不着，听见极刑牢响起沉重的鉄镣哗啦哗啦响声。过了一会，我便听见刽子手对处死刑的犯人说：

“你尽量吃一顿吧！有肉、有酒，吃完喝完快快乐乐上西天！”

我也听到摔碗声和愤怒的喊声：

“谁稀罕你们的酒肉！”

“你们杀我一个，会站起来千个万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必胜！”

接着，我便听见绞刑板的开关声。

他的生命结束了，抛下了他的亲人离开了人间。

这样的夜晚，我不能睡，我在为死者哭泣，我也为死者愤恨。然而我却为我的民族骄傲。

我最怕孤独，关在牢里，我与外面隔绝了。

一个人坐着，坐着，坐着……

一个人走着，走着，走着……

五平方米宽的小独牢，像座坟墓。

我没有表，不知道时间。时间对人的一生多么宝贵！可是监狱的犯人时间被迫浪费了，孤独使人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我一无所有，只有身上穿的一件囚衣，一条裤子，一双鞋。我最爱书，书是心灵的窗子，但我没有书读。我最爱笔和纸，笔是文人的舌头，但我没有笔和纸。

我最喜欢和文友促膝谈心，但我失去了文友。

一个人最需要知己分担我的忧愁，但我没有。

一个人最需要爱情，有了爱情才有春天，但我没有。

一个人处于困境，最需要对未来抱有希望，希望会给你力量和勇气。但我没有。

我一无所有，有的是痛苦，有的是眼泪。

我坐着，坐得屁股生了硬茧，坐得裤子磨出了大窟窿。

坐够了走，像蒙上眼睛拉磨的驴子，一圈一圈地走着。我的脚底板磨出了硬茧，我的鞋子磨破了底……

我的伴侣是铁窗前的蜘蛛，我常常仰起头，呆呆地看着蜘蛛织网，织出各种漂亮的几何图形。忽然我想起了苏格兰王布鲁斯，（Robert Bruce,1274-1329）,看蜘蛛结网后重振雄风的故事。我也要振奋起来。

我的伴侣，还有夜晚的飞蛾。那小飞蛾有点像我，眷恋着光明，连铁牢里天棚上的五度的微光，她也恋着。她竟不管这是铁牢，它一次又一次扑向铁窗。她到底飞进铁牢。扑向牢棚上的五瓦灯泡。她不怕烫，一次又一次向滚烫的灯泡扑去。她的生命已接近死亡，但她还在热恋着那光。终于她被烫死了。尸体直落在牢房的地上。可爱而又可怜的小飞蛾，追求光明，死而后已。

我很想念朋友，就在这长春市，有一个抛弃了我的薄情“瑯”。他早已把我忘掉，另有新欢。

我也很怀念一位被我拒绝了的真诚朋友马吉。

我可以告诉他，他有一个可骄傲的大姐，没向敌人投降。

我的生命，像沙漠里的一粒沙石，没有绿的颜色。

铁窗外，只有狂风在呼啸，我的心冻结了，结了冰，我像一片枯叶，被凛冽的北风吹飘着，随风飘落。我的心像苍白的冬天。

三月，到处还是积雪，风还很寒冷。

我的牢房，靠女监院子那面，有一扇铁窗，我可以从那扇铁窗向外张望，看天上的云，看太阳，看星星，看月亮。

我可以看那歪脖子树，有时飞来的小鸟，在树上跳上跳下，叽叽喳喳地唱着。我羡慕那些小鸟可以自由地在空中飞翔。

我没有表，太阳光映在墙上的树影就是我的“表”。我看那树影就知道快吃饭了。

那女监的院子，什么也没有，空旷旷的，光秃秃的，很肮脏。坑坑洼洼，到处都是石头和土块。

有时可以看见一只黑猫，它有时也亮着一双黄眼珠对着我咪咪地叫，它是不祥之兆。

每天，我盼望着午间，午饭一过是女犯们运动的时间。因为我是政治犯，不许我出去活动，我便躲在铁窗的一角，偷看。只有这时，我能看到大部分的女犯。

女犯们排着队，穿着土红色的囚衣，一个个脸色苍白，有些浮肿，一双呆滞的眼睛，流露出忧愁、痛苦和焦虑……长时间的监禁恐怖和不幸的命运，使她们的眼神异常神经质。像一群精神病患者，给我一种难以忍受的恐怖感……

她们排着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判刑十五年的女共产党员小付。

高高个子瘦削脸的小付，口里叨个哨笛。哨笛就是号令，哨笛尖声尖气地响起来了。

“手拉手，拉成个圈子。”小付命令着。

于是，那些穿土红色囚衣的女囚们，手拉着手，拉成个圆圈儿，便向着一面迈着步子走着，走了一圈又一圈。

在她们中间，我突然看见一个没有穿囚衣，穿件褪了色的蓝大衫的中年白俄妇女。

她就是昨天新进入邻监的女犯。她一头金发，蓝蓝的眼睛，挺着个大肚子，看得出她已是临产了。

我还看见一个美丽的年轻朝鲜女囚，长得非常漂亮，椭圆型的脸，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两腮有一对迷人的酒窝儿。她就是每夜敲着铁饭碗跳舞的妓女。

还有个爱骂粗话的白俄姑娘。

这些女囚已经走了十多圈了。

“停，解散，自由行动！”小付喊了声。

女犯们散开了，仨一帮，俩一伙，找个地方晒太阳，有的唠嗑，有的抓虱子，有的打闹着……

那个快临产的白俄妇女走到我的铁窗前，我悄声问她：

“你怎么穿中国大衫？”

“我丈夫是中国人。”

“在哪儿结婚的？”

“在西伯利亚。”

“他是干什么的？”

“烧锅炉，他总想回祖国，我就跟着他来到中国，可是他突然得了脑溢血瘫了，两只眼也瞎了，一家人生活担子落在我身上。”

“有孩子吗？”

“一大帮，又要生了。”

“你怎么进来的？”

“他们认为我是小偷，抓了进来，其实，我不是小偷，我专门拿日本鬼子的鞋，日本鬼子才是强盗，我没罪！”说完她挺着大肚子走开了。

我向那骂粗话的白俄姑娘招手，她也走到我的窗前，她苍白的脸上长着许多雀斑，黄黄的眼珠，翘翘的小鼻子，头发掉光了。

“你是什么犯？”

“小偷。”

“你偷了什么？”

“我偷了日本军官的钱。”

“你胆子真大，怎么能偷日本军官的钱。”

“我是龙沙饭店的女招待，那个军官强奸了我，还给我传染上了花柳病。我问他要钱治病，他不给，我就下手偷了他的钱。”

“偷了多少？”

“好几百元钱。”

“那么多钱你都干了什么？”

“治了病，还买件皮大衣，吃了，还给了一些穷人……都花光了。”她连说带笑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女犯们在呼喊：

“老毛子跳一个舞！”

愁苦的犯人，也要寻求欢乐。

她挺着大肚子，掐着腰，扭动着屁股，抖动着两肩，踢踏着双脚。

站在她对面的那个满脸雀斑的白俄姑娘和她一样，两人跳起恰司登舞来。

那些囚犯，忘了愁苦，拍着手，张着嘴哈哈地在笑。

过了一个钟头，女犯们又排着队回到牢房。

有时，我伫立在铁窗前背诵普希金的诗句鼓舞着自己。

“我们飞去吧！是时候了，

我们原是自由的鸟儿，飞去吧！

飞到那乌云的后面，

明媚的山峦，

飞到那里，到那兰色的海岛。

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在作伴。”

我突然觉得，我现在更需要战斗，为祖国而战斗。

我爱我的祖国！

杂役犯中有个矮个子，白胖胖的，圆脸，一双黑亮亮的眼睛。我给她起个外号叫“小白熊。”

在监狱里，人的感情很奇妙，不管是教授、医生，是小偷、杀人犯，都是难友，都一样被囚禁、遭难，没有一点轻蔑，也没有隔阂……

“小白熊，你是什么犯？”我问。

“杀人未遂犯，判了八年徒刑”她笑着回答着。

“你要杀谁？”

“我是女仆，我要杀我的老爷。”

“你胆子真大，敢杀老爷。”

“我是他们家女仆，老爷是色情狂，比我大二十岁，天天缠着我，我得自卫，我准备一把剃头刀。

一夜，他偷偷摸进我的屋，强迫我和他睡觉，我不从，他就扑在我的身上，逼我脱衣服。

他嬉皮笑脸，骑到我身上，把他那玩艺掏出来。

我也把剃头刀掏出来，一刀割得他血淋淋……他猫着腰，逃了，他没有死，便诬告我杀害他。

就这样判了我杀人未遂罪，判刑八年。我宁可蹲牢也不叫他奸污了我。”

我很喜欢她，开朗，爽直，大胆。

有时，她从铁窗送来好吃的给我。

猪头肉、烧饼、猪蹄子……

我问她哪来的，她说：

“打花案的情夫送来的，我揩下点油，分给女看守，剩下咱们三人分，小付、你和我。”

遇到我发愁时，她就劝我：

“别愁，愁也没用，愁出病谁管？不如想开点，高高兴兴的，你看我，天天乐呵呵的！”

我的活动量很小，担心长此以往身体会垮。

“小白熊，进来摔摔跤！”

遇到好看守值班时，她手中有独牢的钥匙，便哗啦哗啦地把我的铁门打开了。她一边捋着袖子，一边呲着小白牙，笑嘻嘻地说：

“你不是我的对手！”

“谁说的，我是运动员！”

“什么运动员不运动员的，是驴是马拉出来蹓蹓！”

她像个拳击手，往手心吐了些唾沫，搓了搓，弯着腰，像条斗牛向我扑来。我也弯着腰，把全身的力气使出来，向她冲去。我们俩扭在一起。

小胖子把她的拳头高高举起，这一拳头要落在我的脸上，一定得打个鼻青脸肿，但她从不把拳头打在我脸上，只在上空绕了个圈子就收回去了。我用头猛顶着她的胸部，想把小白熊顶倒。她用两手使劲抱着我的脖颈，不后退一步。我不是她的对手，她一下把我按倒在地上，神气地问我：

“服不服？”

“不服！”

“不服就不叫你起来！”

我们俩在牢地上滚来滚去，出了一身汗。她伸出一双棒棰样的手，一下把我抱起来冲出牢房。

在暗黑的通道里跑着。

我没办法，只有往她的脸上吐唾沫。

她这才放开了我，笑嘻嘻地问我：

“服了吧？怎么样，出汗了没有？”

一天，我的牢门被打开了。

那浓眉大眼，凶恶的日本典狱长出现在我的牢门口，他用仇恨的眼睛看了我一下，吼着：

“1991号，出来到法院去过堂！”

我慌忙地穿上棉鞋，披上我的卷绒的黑大衣。

“はやく，ちくしょう！”（快点，畜牲）他咒骂着。

我用手梳下我的头发，走出我的独牢。“咔喳”一声，日本典狱长将我的双手戴上了铁铐。我被拿枪的日本鬼子兵押着走出那条长长的幽暗的通道，出了女监的铁门。

东北的三月，仍下着雪。大雪纷纷扬扬在空中飘落。

日本典狱长在我前面，日本鬼子兵拿着枪押在我的后面。在那空荡荡的、落满积雪的监狱院子走着。咯吱咯吱的踏雪声，像给我奏着哀乐，我感到国破山河在的悲哀。

走到监狱的铁门口，鬼子兵把那沉重而森严的铁门打开，我们才走进监狱的前院，那里停着一辆大卡车。

鹅毛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天空灰濛濛，寒冷的北风呼呼地刮着。

几个男犯在囚车前等着，他们的头上，身上都落满雪，穿着薄薄的棉囚衣，打着寒战。

突然，我看见两个日本男囚犯，戴着沉重的脚镣，哗啦哗啦地走来。

我一听见镣铐声，就像听见了苦难的哭泣声，我的心在痉挛，抽搐。

两个日本男犯，中年人是中等个，黑黑的脸上长着大胡子，闪着一双聪慧的眼睛，身体很健壮。另一位年轻的男犯，穿件黑呢子大衣，戴顶日本大学学士帽，瘦高的个子，脸色十分苍白，憔悴。英俊的脸上凝结着痛苦的哀愁，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又像是病了，不住地咳嗽着。那个中年的男犯像父亲一样照顾那年轻人，用两只手不住地替他提大衣领子，扣紧大衣的扣子。不用说，他们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重犯。

日本人不都是坏蛋，也有反法西斯的战士。

大雪还下着，鹅毛般的雪片往那大学生的头上，脖子里落着。中年男犯不住地给他围围巾，用身子紧紧偎依着他。

犯人到齐了，大家的腿脚都浮肿了，又都戴着沉重的镣铐。慢吞吞地爬上大卡车。

几个囚犯戴上思想犯的高帽，把整个头都罩在里面。

囚车开出了监狱的大铁门。

监狱门前站着几个犯人的家属，在大雪中等着，睁着焦急的眼睛望着……

突然，在人群中我看到一张熟悉的年轻智慧的脸，浓眉下一双大眼睛，啊，那是马吉。他焦急愁苦的双眼在囚车上寻找着。

我抬起我戴着铁铐的手。他一下子看出来穿着卷毛黑大衣的我，就向我摇着一只手，跟着囚车跑着。

马吉毕业后在北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一定是接不到我的信，千里迢迢找来的，他不怕被连累吗？

我们的囚车迅速地过去了，我回过头看着他还跟着囚车在跑，摇晃着一只手。

这个赤诚的马吉，我拒绝了他，他应该记恨我，但他却痴情地不远千里来找我。

他瘦多了，脸也憔悴了。

一路上，我不免怀疑，这是不是梦呢？

他那跟着囚车跑的身影，那张焦虑的脸，那只向我摇晃的手，总在我眼前浮动着。

雪不住地下着，在雪的迷雾中，囚车在一条雪路上奔驰着。

法院到了。

我们这些政治犯，被押进审判厅。

我被押进一个小独间里，这是一排圆柱形的独牢，只能坐下一个人，我像装进了罐头盒子里一样。

独牢的墙壁是厚水泥的，只留着一个小窗口，又黑又闷，我感到窒息得很。

我向这四壁看了看，那墙壁上涂满了为祖国而战的诗。有的是用指甲划出来的，大多数是将手指咬破，用血写下来的。

这些政治犯，待审时写下了爱国赤子之心。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日本侵略者赶回老家去！”

“头可抛，血可流，

祖国山河不可丢！”

“忠贞不二，威武不屈！”

我也咬破手指，写下了我的誓言：

“誓雪民族耻，莫负少年头！”

这些诗，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过了一会儿，我的独牢，响起钥匙声。

“出来！过堂去！”一个持枪的日本鬼子押着我，走出独牢。过了一个大厅，一个走廊，进了一间审问室。

一个高个子的日本法官，向我看了一眼，样子很文静，他一面翻看日本宪兵队送来的材料，一面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田琳。”

“多大岁数？”

“二十七岁。”

“什么职业？”

“编辑。”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

“我没有罪。”

“啪”的一声，他猛地拍着桌子，撕掉了文雅的假面纱，凶恶的眼睛逼视着我。

“混蛋，你招认吧！”

“招认什么？我不懂！”

“装什么，我们统统知道了。”

“知道什么？”

“你参加了青年爱国抗日挺进队。”

“没有参加，我连这个名称都不知道。”

“狡辩，你同于庆波接触过没有？”

“接触过。”

“为什么和他接触？”

“为了逃出‘满洲国’。”

“为什么要逃出去？”

“为了要上重庆大学。”

“你不是已从日本奈良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了吗？”

“但我没上过中国的大学。”

我心里早拿定了主意，只承认逃跑，不承认反日，这样罪就轻些。

“你都干些什么‘反日’活动？”

“我什么也没干。”

“你没贴过标语？”

“标语，什么标语？”

“反日的标语。”

“没有贴过。”

“撒过反日传单？”

“没有撒过。”

这是一场战斗，我耐心磨下去，守口如瓶，什么也不承认，胜利一定属于我。

“你不是答应给北京的抗日头子当秘书吗？”

“没答应。”

“胡说！”

“胡说什么，我答应了怎么没去，我没去是铁的事实，说明我没答应。”

他翻来复去的逼问，审问了一个多小时，他命令我退出审问室。

下午四点，我们被押来的政治犯，又押上囚车，出了法院。

大雪还在飘落着，一片片雪花落在我身上，落在我的脸上。也落在其他政治犯的身上、脸上。

那个年轻的日本大学生被打伤了。一道道伤口，还在流着血。

我们乘坐运送死尸的囚车回到了监狱。

女监的大铁门被打开了。

那个麻脸女看守，像母夜叉一样，双手叉着腰，凶狠狠地望着我。我蔑视地扫了她一眼，便走进那幽暗，充满臭气的走廊。

我独牢的铁门打开了，我走进去又锁上了。

我蹲缩在独牢的墙角里，呆呆地坐着。窗外是一片迷濛的雪雾。

我的心很乱，想着在监狱门前大雪里的马吉，那张焦虑关切的面孔……那跟着囚车奔跑着的身影，那只摇晃的手。

我的心像风浪中的海面，浪花拥着浪花。我想念着他。他是世界上唯一关心我的朋友。

时间在痛苦中流逝，冬去春来。

铁窗外的天，布满乌云，下着濛濛细雨，我的心好像被那细雨湿透，是那么沉重。

忽然，大个子小付来到我的窗前，她高兴地趴在窗前悄声说：

“那个好心的女看守告诉我，在她的班，可以给你点自由，你在走廊活动活动。”

从此，当好心看守值班，“小白熊”干完活就来给我开门。

我走出独牢，走过那条幽暗的通道，便站在女监铁门前，从窗玻璃往外看。可以看到整个监狱的大院了。

大院宽广而光秃，院子里全是黄褐色的土，没有一点绿的颜色，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棵小草，像没有生命的大沙漠。

远处有一个八卦型的男监，像迷魂阵，使犯人认不出东南西北。矮矮的牢房，有小小的铁窗，像鸽子窝。

囚在里面的男犯，等待他们的不是阳光，不是妻儿，而是死神和终身的监禁。他们大多数是思想犯，是爱国的志士，全判了死刑缓期执行或无期徒刑。

早晨，他们穿着土红色囚衣，蓬头垢面从牢房走出，有的到印刷厂，有的到被服厂去劳动，一个个垂头，沮丧。

有时，也会看到戴着脚镣的重犯，被拿枪的看守兵押着去受审……

有一次，我竟看到一个被剥光衣服的犯人吊在柱子上，旁边站着一个凶恶的日本鬼子，在用皮鞭狠狠抽打他，另外几个日本鬼子在哈哈狂笑。

他赤裸的身上被抽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发出揪心裂肺的惨叫。

有时，会看到用担架抬出来一个快死了的囚犯，瘦得像一把柴骨，那苍白憔悴的瘦脸上流着泪水。他已奄奄一息了，是把他送到万人坑去活埋。

有时，也看到一付担架抬着死了的囚犯，脸上盖块白纸，两个抬着他的囚犯流着泪水，是把他扔到万人坑去。

每当囚犯死了，我的心就揪在一起，难过极了。

我暗暗地为他们祈祷，祝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在监狱里，也有另一种囚犯，吃得胖胖的，在院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像肥猪一样。这些是最卑鄙的民族败类，他们专靠汇报囚犯的动态，讨好日本典狱长，是哈巴狗。

我蔑视这些民族败类。

一天，我从铁门玻璃窗，看见一个囚犯从绞刑房里拖出一具尸体。当时小付和我站在一起，她惊呆了，蓦地她眼里闪出晶莹的泪水。

“怎么了？你认识他吗？”

“认识，他是共产党员，他还很年轻，还没结婚，他应该有许多事要做。他应该得到幸福，可他却被日本鬼子折腾死了。”

每当那个矮胖得像啤酒桶的日本鬼子的走狗——麻脸女看守值班的日子，女监像地狱一样，格外恐怖，阴森。

她吃完早饭，便提着皮鞭，在女监走廊里来回走着骂着：

“闭上你们的鸟嘴，叽叽喳喳地叫个没完，像家雀操屁股啦？”

这个母夜叉，真可恨，记得我刚来的第二天，她便给我“三百杀威棍。”

“你他妈的，是龙得给我盘着，是虎得给我趴着，你是四楞得给我变成圆的。”

一天，我听见这哈巴狗和一个刽子手谈天。

“你今天又绞死一个？”

“是的！”

“你又发了财！”

“发什么财，绞死一个才给五元钱。”

“五元钱绞死一个还不是发财呀，一个月你不知绞死几个！我要是男的，就干你这行，多他妈带劲！”

这些靠喝人血养肥的民族败类，早晚会得到报应。

这里也有民族气节的好看守。

一天，我在铁窗口，看见她穿件褪了色的蓝大衫，梳着光光发髻，坐在通道里的被服堆上背朝着我。那苗条、挺拔的身材，就是第一夜给我送来肥皂、手纸、小镜子和苹果，又给我小自由的好看守。我真想再好好看看她，可是她一直背朝着我，脸没转过来。

她是爱国者，我爱她也敬佩他。

一天，小付告诉我：

“小田，又有好消息，那个好女看守允许你每天可以看看报了。”

“我没钱订报啊！”

“看女看守的报。”

我最缺乏精神食粮，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

蹲在牢里，我与外界隔绝了，好像聋子、瞎子。从报上我可以看到我想知道的一些政治形势。

这天，是好看守的班，我的独牢门被大个子小付打开，她把我领进女看守室。

这间房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些餐具。

桌上放一张报纸。

但是，没有看见那位好女看守，她到哪儿去了呢？

“女看守呢？”

“你不用问，看报吧！半个小时就出来！我在门口放哨，如有人来，我把你放进厕所，你就说拉肚子了。”小付嘱咐我说。

我贪婪地看着报纸，思索着，推测着。知道不少事，解除了我的孤独，减轻了痛苦，我真感谢那位好女看守。

我很想念亲人，妈妈和爹爹，我是最小的女儿，两位老人最疼爱我。

我的独牢，像大海中的一个孤岛，我像孤岛上一棵孤独的树。

我整天望着铁门，铁窗，铁锁，呆呆地坐着。

这天又是好女看守的班，小付告诉我：

“小田，过几天你就有杂志看了。”

“我没钱买。”

“已经给你订了份文学杂志！”

“谁？”

“你不要问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是那个好看守！”

我的心有股暖流在流淌，热呼呼的。

我在牢里虽然遇到一些好心人，但毕竟是关在铁笼子里，心烦意乱，使我不停地走着、走着……

我这双布鞋啊，经不住脚步的走动。鞋底磨破了。鞋帮也挂不住脚了，大脚趾露出来了，脚后跟也露出来，无可奈何！干脆光着脚底板走着、走着……

一天，我的铁窗伸进一只手，是小付拿了张纸喊我：

“小田，过来！伸出你的脚来！”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没有动。

“愣什么？叫你伸出脚来！”她有些愠怒。

我只好把脚伸出铁格子。

她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迅速地画了脚印，然后悄悄地走了。

第二天，天刚亮，日本典狱长点完名走了，走廊响起一阵脚步声，我知道是男犯送被服来了。

我听见小付和男犯说：

“明天带来些红蓝白布条子！”

“不给。”

“胆小鬼，不给不行！”

“怕你寻死？”

“寻什么死，我还要活！一定带来！”

“好！小付要哪能不给！”

过了几天，是哈巴狗的班，我听见从通道传来噼噼叭叭皮鞭抽打声，我轻轻地走到铁窗前向外张望。

只见小付跪在通道里，两只手抱着头，咬紧下嘴唇，那个哈巴狗女看守还用皮鞭子猛烈地往小付身上、头上、脸上抽打……

小付脸上淌下血来……

我的心像被撕裂一样疼痛。

“说，布条子哪来的？”

“……”

“说，你给谁编鞋？”

“………”

“打死你这共匪！”母夜叉女看守拿着皮鞭子狠狠的抽打。

小付真倔强，没听见她求饶声，也没哭。

“好，你这‘共匪’，罚你蹲黑牢！”

“蹲就蹲！”

从此，小付不见了。

我悄悄问小胖，她告诉我：

“小付为了给你编鞋，蹲黑牢了！”

黑牢我蹲过，那是牢里的牢，没有窗子，四面都是墙壁，只有天棚上五瓦的小电灯。黑牢像坟墓，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

蹲黑牢的人不许坐着，更不许走，整天直着腰面朝墙跪着。膝盖跪痛了，也不许坐下。从起床跪倒睡觉，一天一天地跪着。

我想小付为我蹲了黑牢，我的心像被刀割。

过了不少天，小付出来了，还在走廊当杂役。

这天，是那个好女看守值班。小付来到我铁窗前，我看见她脸上留下的几条伤疤，忍不住哭了，她却在笑。

“小付，真对不起，都是为了我，你受苦了。”

“哭什么，别哭！”

“我不要鞋了，你不要编了！”

“要编，只是不能在哈巴狗值班时编。”

“你受那么大的苦，我心不好受。”

“你不要管我，我不听。”她两手捂着耳朵走开了。

我光着脚走，脚底板磨成厚茧，走起路来可真疼。

过了几天，小付来到我独牢铁窗前：

“给你，拿去，只是在那哈巴狗值班时你不要穿。”

我接过这双鞋，啊，这是多么漂亮的一双鞋，鞋底用蓝色布条编成的，鞋帮用红色白色布条编成的，编得精巧别致，简直是一组精美的图案花纹。这双鞋她费了多少心血啊！

我默默看着这双鞋，全身的血沸腾起来热乎乎的。

望着她脸上被母夜叉抽打落的伤痕，想着为了这双鞋，她蹲了多少天黑牢。她的这种深情厚谊实在感人肺腑！

我抱着这双漂亮的鞋，兴奋激动，涔涔泪满衫襟。

这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一双鞋，是用黄金也买不来的。

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双鞋啊，是用炽热的感情编出来的。

小付微笑着说：

“穿上试一试，合适不合适？”

“我舍不得穿啊！留做纪念吧！”我紧紧抱着这双鞋。

“你不穿，我白编了，穿吧，看你脚磨的，穿坏了我再编。”

我感动得想紧紧地拥抱她；可是这该死的无情的铁窗，把我俩隔开了。

六月初，按时间应该是夏天，可是在北国，却像是春天。

我独牢前的那棵歪脖子树，已发出绿叶，鸟儿常常飞来，唱着歌。

可是囚犯们的心里，春天和冬天一个样，都坐在狭牢里，孤独，凄苦，灾难……死亡。

女监的那条幽暗的通道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菌、结核菌、伤寒菌……在污浊的空气中到处飞扬，到处传播……

充满霉气、潮湿的监狱，成了老鼠的天堂。他们在绞刑房里吃够了死尸，便带着满身的细菌、病毒，在各个牢房里窜来窜去。

从通道里传来皮鞋声，缓缓地向我铁窗走来。

我向铁窗望去，只见两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站在我的铁窗前。

一个四十左右、中等个圆脸的中年人，脸色苍白、忧伤。

“怎么样？身体好吗？”医生问。

“很好，我原来是运动员，不会病倒！”

“你说的不对，细菌不管你是运动员！”他关切地说。

他又向站在他身后的一位穿白大褂的青年说：

“给她留下点药。”说完走了。

年轻的卫生员从他挎着的红色药箱里拿出几包药放在铁窗上。

“你是不是政治犯？”卫生员问。

“是，‘反满抗日’的，你呢？”

“我也是‘反满抗日’的，是平顶山事件的一员。”

我听说过平顶山事件。日本鬼子把平顶山的老百姓召集起来说是开会、照相，然后用机关枪把老百姓都打死了。后来人们组织起来，在鬼子兵营四处点火，把鬼子兵全烧死了。

“你是放火的？”我问。

“不，我是运柴的。”

“那个大夫是犯人吗？”

“他也是政治犯，他给抗日联军治过多次病，被日本人抓进来了，大姐，珍重！”说完便走开了。

我想：中华民族是战不败的，迟早会把日本侵略者赶回他们老家去。

我说，我不会病倒，可是没过几天，我却病倒了，浑身发冷，牙齿不住地叩击着，全身打着寒颤……

如果，我在家里，我会躺在热炕头上，盖上厚厚的被子，母亲会端给我一碗姜汤……

可是在独牢里没有热炕头，只有冰冷的水泥地；没有被子，只有又脏又扎人的草袋子。不消说，更不会有人给我端姜汤了。

蜷缩在草袋子里，忍受着阵阵的绞痛，打着寒战，我的心也冻成了冰块。

一会发起高烧，头晕晕的，脸烫烫的，嘴唇干裂，嗓子里冒火，我想喝水。

“水—水啊—”我不住地喊着。

可是没有人来。我真想家，想妈妈啊，如果有妈妈守着我该多好。

“水、水……”我喊着，没人来。

我睁着双眼，盼小付来，小付没有来，望着的是漆黑的通道，落满灰尘的墙壁，铁窗、铁门、铁锁，还有那角落里的蜘蛛，还有窜来窜去的灰老鼠。

我渴得很，有气无力地喊着。

“我渴—渴，水—水—我要水—”

没人回答我，也没有人来。

我整夜在折腾着，睡不着觉，我好像听见暴风雨在我的铁窗上扑打着。

我预感到我生命中的暴风雨来了。

我病得很重，像是要死了。

人的感情很复杂，变幻莫测。

在病中，惶惑、焦灼、忧伤……一齐向我袭来，思绪像涨潮的大海，不停地翻滚着。

我思绪的小船，满载着泪的珍珠，驶向回忆的港湾。

想念我的母亲父亲，想念我最好的朋友马吉，我虽然拒绝了他的求婚，却留下了对他的思念。

我的眼泪从脸颊上滚下来，一滴一滴的…

一连几天，我都在发高烧，都在昏迷中度过。

小付知道我病倒了，她知道我渴，便在铁窗台上放一碗开水。

我发高烧，意识不清。

我仿佛看见在牢房的墙上爬满了毒蛇，乌蛇、眼镜蛇；五步蛇吐着鲜红的蛇信子，发出咝咝的叫声，凶猛地向我袭来。

蓦地，这些毒蛇又变成了一张张凶恶的脸，向我恶眉恶眼地示威，狰狞的面孔后面伸出无数双毛乎乎的黑手，要来抓我。

我颤抖着，用微弱的声音喊着：

“救命！”

可是没人来。我想躲，可是这是铁牢，往哪儿躲啊。

我病了多少天了呢？我不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呢？那个医生没有来。我的意识因为发高烧，不清楚了。

夜静极了，牢房阴森恐怖，走廊里放出微微的幽光，像鬼火在游荡……

我听见有脚步声向我铁窗走来，然后又听见“滋滋”喝水的声音，我害怕得很，我闭上了眼睛。我隔壁是绞刑房，我想到那些冤死的鬼魂，我不迷信，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发高烧时确实怕鬼。

以后，一起床，我的牢门被打开了，小付帮助我穿衣服，梳头洗脸。晚上小付进来帮我脱衣服。

我病得爬不动了，小付进来一匙一匙喂我水，一匙一匙喂我稀粥，我摇着头。

“我吃不下去呀！我不想吃！”

“吃点吧！吃点你有力量和病魔做斗争！”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不愿她离去。

“付姐，万一我死了，你设法告诉我的家。我的家是齐齐哈尔西郊菜园子胡同一中宿舍，我父亲是一中校长，名叫田化南。”

“别胡思乱想，好好养病吧！”

“付姐拜托了，别忘了，谢谢你！”

“你死不了，今天好看守请大夫来给你看病！”

我又昏迷了过去，临死的人，躺在独牢的潮湿的角落里。

忽然，我从昏迷中苏醒了。我看见我的身旁蹲着几个人，有医生，有日本典狱长，有小卫生员，有那个好女看守。

医生蹲在我身边，关切地注视着我，然后用听诊器仔细地检查着我的身体。他的表情有些沉重。他检查完，卫生员给我注射了两针药，站起来，他轻声和日本典狱长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那个典狱长皱起眉头，厌恶地瞥了我一眼。

医生和典狱长的谈话断断续续，我听到了几句：

“她这里有家吗？”

“没有。”

“她家在哪儿？”

“在齐齐哈尔！”

“给她家发个电报吧！”

那位医生看了我一眼，安慰我说：

“没什么，好好养病吧！”

我知道，他在说假话，对一个要死的人，医生都是这样哄人的。

他们走后，那个好女看守告诉小付：

“给她洗洗脸，把囚衣脱下来，穿上她自己的衣服吧！”

她关切地看了我一眼便走了。

小付把小胖喊了来，她们帮我洗脸，换衣服。边换边掉眼泪。

我预感到我要死了。

“你有什么话吗？留给你的亲人？”小付问。

我有话，有许多话，可是我的舌头硬了，说不出来了。

我望着她俩，热泪流了出来。

过了一个小时，女监的铁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人，命令着：

“把她抬出来！”

小胖和小付架着我的两只胳膊，把我抬出牢房。

我虚弱极了，全身没有一点儿力气，两只胳膊软绵绵地搭在她们的肩上，脑袋无力地垂在小胖的肩膀上，我的头发散乱地落在小胖的身上。我感觉到眼皮很沉，已经无力睁开了。

我被她们架着，向前拖着走。

我用力睁开眼睛，看到她们在掉眼泪。

我再也忍不住了，便哭了起来。

把我往哪儿抬呢？是活埋吗？我还有气。但我奄奄一息了，无力挣扎了。

我想到双亲，想到祖国，心在想：

“请你原谅你们的女儿吧！我没尽到最后的力，就死了！”

我被架到女监的大铁门外，那个好女看守像座美神的雕像，用一双哀伤的眼睛望着我。我深情地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

在女监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小付和小胖架着我上了小汽车，小付紧紧握了握我的手，把车门关上了。

就这样我和两个难友分别了。

我躺在小汽车上，坐不起来。

因为我病得要死了，没戴手铐，也没有解差。

只有一个穿一身短夹克的年轻司机。

他坐在开车的座位上，回过头来看看我。

他那么年轻，圆圆的脸有些稚气，什么也没说，又转回头去。

汽车鸣了一声喇叭，开出了那座阴森、恐怖的监狱，向一条大道驶去。

不知跑了多久，才卡的一声把车停下来。

年轻的司机，伸出一双手，搀扶着我。我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全身无力地依在他身上，他慢慢把我扶下车。

我虽然病得不轻，又长期蹲在独牢里，但第一次看见蓝蓝的天空，第一次看见耀眼的阳光，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好像在我身上注射了强心针，我一下子来精神了。

微微的春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吹拂着我的脸，好像驱散了我的病魔。

走下小汽车，啊！这是座病院。我一眼看见一棵榆树下，有一丛盛开的金黄色的蒲公英。孩提时，我曾用蒲公英花编织过花环，戴在头上，像仙女。霎时见到这花，格外兴奋，迷恋地望着它。那年轻的司机看出了我的心意，便搀扶着我，慢慢地向那金灿灿的蒲公英花丛走去。我弯下腰，伸出一只苍白瘦弱的手，把它采下来。一个女囚犯手执一朵蒲公英，那年轻的司机便把我搀扶着走向病房。

这是一个独间病房，因为我是个政治犯。

一个生命快熄灭的女囚，什么也没有，更没有来探望的亲友，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只有一朵蒲公英花放在我的枕旁。这鲜花带给我春天和希望——我还想活下去！

我刚躺在床上不久，走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夫，高高的个子，黑瘦的脸，一双和善的眼睛，凝视着我。我信任他，因为他的眼睛告诉我，他会尽力来给我治疗。他用听诊器仔细听过，又用双手扣敲，临走时，他关切地凝视着我，忧心忡忡地走出病房。

在走廊，不知他在跟谁说话：

“她病得很重！”

“能救活吗？”

“不敢保，我尽最大努力吧！”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已经好几天不省人事了，难道我真的会死了吗？

独病房，只躺我一个濒死的病人，四壁冷冷清清，凄凄凉凉，只有一朵蒲公英花陪伴着我，有些萎黄了。

一个穿着白衣的女护士，眉眼很媚气，她的眼神充满敬佩与怜悯，给我服药、注射……然后又悄悄走出病房。

外面下着春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我的心里也下着凄凉的雨。

那位医生，不分昼夜，注视着我的病情，给我认真的治疗……

终于我被从死亡线上夺回来了。我感谢那位救命恩人——医生。可惜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然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我不再发高烧了，也能吃点稀粥。

我想吃水果，我是个政治犯，是个囚徒，有谁能给我送吃的？

日子，一天，两天，三天……半个月过去了。

一天，我的病房门开了，二哥田翥来了，他看见我高兴地说：

“琳，我接你出院回吉林！”

“二哥，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病院？”

“是监狱打电报给家，叫来领取你的尸体！你活过来了，比什么都好啊！”二哥苦涩的脸也出现了笑容。

我憔悴得很，两腮瘪陷，四肢无力，站不起来，更走不动。

那位媚气的护士帮助我脱下住院服，换上了我自己的黑绒衣、蓝布裤。

二哥搀扶着我慢慢走出病房。

在院子里，我又看见榆树下的蒲公英，还在开着黄黄的花儿。

二哥和我乘一辆马车去火车站，回吉林他的家。

路上二哥告诉我：

“法院判了你‘逃亡罪’，判刑两年，因为你得了重病，被释放监外执行。”

我们乘火车到了吉林。

我和二哥坐一辆马车，又经过那条临江街，又看见那条“春来江水碧于蓝”的松花江，又经过那座桥，又回到白山区，住进二哥的那间泥土屋。

我躺在泥土屋的炕上呻吟着……

一直躺了四个月。

我得的是重伤寒。好了后，身上脱层皮，头发掉光了，像个小尼姑。

我听说父亲也蹲了监狱，我想回齐齐哈尔的家。

一转眼是秋天，秋风刮着落叶，是大雁南飞的季节了。我惆怅地离开了吉林我二哥的家。

我独自走过那条临江街，又凄凉地在那座桥边伫立良久，沉思默想，我什么时候能再逃跑，什么时候才能参加抗日队伍……

我一步一回首，恋恋不舍地向与我共度灾难的吉林告别。

我乘上火车回到齐齐哈尔老家。

一走进院，便听见母亲的哭声，推开门，母亲满脸是泪水，哭着向我诉说：

“你爹，被警察厅逮捕了，关进了监狱。”

第二天，我陪着妈去警察厅探望父亲，给父亲带了换洗的衣服和吃的东西。

我和母亲坐在一条通道里等着，出来一个胖警察、圆脸、冷酷的两眼，仇视着我，傲慢地坐在桌子上问：

“给谁送东西？”

“给我父亲田化南。”

“你就是田化南的女儿田琳吗？”

“是！”

他恶狠狠地用手指着我，威胁说：

“你们父女都是‘反满抗日‘的，今天扣下你换你父亲！”

“扣就扣，我愿意换我父亲！”

他白了我一眼，跳下桌子，气呼呼地走开了。

我蔑视地看着他的背影，骂了一句：

“民族败类，总有一天算你的罪孽帐！”

我和妈妈坐在一条板凳上等着见父亲。

到吃午饭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个囚犯从地下囚室走上来，穿着破烂的囚衣，一张张愁苦、浮肿的脸，瘦骨嶙峋。一个囚犯满脸伤痕。一个囚犯十个手指，只剩下两只小指，他用两只秃手艰难地往嘴里扒啦着饭。

我悄悄地问他：

“你的双手怎么只有两个小指？”

“逼一回供，我不说就被砍掉一个，我过了八次堂，砍掉八个手指！”

他的两只秃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我愤怒地想：“这仇一定要报！”

我和母亲在那通道里，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也没看见父亲。他们不允许我们见父亲，只把那只包拿走了。

我和母亲只好带着酸楚失望的心情，含着泪走出警察厅的拘留所。

在回家的那条大道上，传来一声声叫卖声：

“卖烧饼呀！谁买烧饼？”

这是同院的烈士闫家的女儿的叫卖声。

天气十分寒冷，她还在街上叫卖！

“她和她一家怎么活？就靠卖烧饼度日吗？”我想着。

我父亲蹲在牢里，实际上我母亲也是处在饥寒交迫中。

我的心紧缩了，“亡国奴”过着猪狗不如的苦日子！

愤怒的火又在我胸中燃烧。

我原想在家陪着妈妈多住些日子。可是妈妈劝导我：

“琳，你走吧！敌人还在打你的算盘，你在家也不能安宁。”

父亲关在牢里，不得一见，就要远离，这父女深情真是难以割舍！然而我也只好在一个深夜离开母亲，离开齐齐哈尔，回到长春。

第四章 结 婚

由李大一介绍我到了长春“满映”工作。

那是十月末，秋风肆虐，到处飘落着枯叶，树底下，大道上，阴沟里，南湖边……那些枯叶随风飘滚着。

草黄了，花早凋谢了，大地一片苍茫。

当我走进计划室的时候，我看见许多双眼睛惊奇地望着我。

他们都很年轻，十八、二十来岁，最大的二十七岁。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高个子，穿一身笔直的黑呢子制服，一头黑发，黝黑脸，高额头，两道浓眉下，一双深凹进去的眼睛，沉着、文静。他凝视着我。他就是陈致远。在他身旁有一群小伙子，望着我，议论着：

“她就是女作家但娣！”

“她刚从监狱出来的！”

“她是日本留学生！” ……

我默默地坐在那里。

这时，一个日本男同事，长脸，高鼻子，友好地看了看我，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自我介绍说：

“我的名字叫八木宽，请多关照！”

我也向他行个见面礼，自我介绍说：

“我叫田琳，曾在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大学）读过书，今后，请多多关照！”

“奈良是我们日本的古都，奈良女高师是国立有名的大学，在那里读书的都是高材生！”

谈着，又走来一个日本人，八木宽介绍说：

“他叫西村，你有什么事找他！”

这个西村，中等个，闪着狡诈的眼光。他上下打量着我，没有笑，沉着脸说：

“把你头上的纱巾拿下来，上班不许戴纱巾！”

我没说什么，但我也没取下头上的纱巾，因为我病后，头发都掉光了。

一个高个瘦子青年走过来对我说：

“我叫刘思平，田小姐，你的行李我替你扛到女宿舍去！”

刘思平扛着行李，领着我走进了女演员独身宿舍。

从宿舍房间传出说笑声和歌声。

在幽暗的走廊里，站着一个女演员，中个，方圆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正望着我问：

“你是不是田琳？”

“是，是编剧科新来的。”

“送进我的房间吧，我就一个人。”

这是一间演员宿舍，一进门靠北墙有一架梳妆台，有一面大镜子，是供演员练习表演用的，靠南面一张大木板床，靠东边也有一张木板床略小。

“我叫姚颖，是演员，你就住在东面那张床吧！”她高兴地说。

她的床铺上只有一条毯子，一个枕头，别的什么也没有。这天，她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大衫，短发，朴朴素素的像中学生，不像演员。

我们俩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

晚上，躺在被窝里亲亲热热地谈着。

“琳，听说你是从监狱出来的。”

“是的，我还是刑期未满的犯人呢，判了‘逃亡罪’，刑期二年。因为害了大病，现在是监外执行。和你往一间屋，你不害怕吗？”

“害什么怕？就因为你爱国，我才愿意和你住在一起。”

她那双大眼睛闪着喜悦的光。可是过了一会，她沉默了，似乎在想什么，然后，打了个唉声说：

“其实我也想逃跑。我认识一个建国大学的学生，我很爱他，打算和他一起逃跑。可是他却抛下了我，和我妹妹逃跑了！该死的，我恨死了他！”

说着说着她泪流下来，不断唏唏。

“您恋过爱吗？”她问。

“恋过，他是个喜新厌旧的负心汉，我们分手了。”

这块伤疤怕碰，一碰便流血，难忍地疼痛。我控制不住感情，哭了。

“一个喜新厌旧的，最卑鄙，为他掉眼泪不值得。可是我们是人，我们有感情，我也是一样，一想起那伤心事，也不免掉泪！”

这夜，我们谈得很多，谈到很晚才睡。

早晨，醒来，姚颖便唱起歌来：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映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

我很爱这只歌，便跟她学着唱。

我们的感情很复杂，有“亡国奴”的悲哀，也有个人失恋的痛苦，还渗透着战斗的渴望，憧憬着光明的未来。

这间小屋常常激荡着笑声和歌声。

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去小白楼读书、聚会。

我们有一些伙伴，李福山（后改名李芒）、刘思平、张汉斌、李广则……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爱祖国，仇恨敌人，又无法逃避现实。

但我们也不能公开谈论。

有时打着唉声，有时叹着气，有时用拳头打着桌子，发泄我们的愤懑。

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找到了交流思想的奇特方法：唱歌，悄声的唱，用歌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一个人引唱，大家就跟着吟唱起来。

我们唱《开路先锋》：

轰！轰！轰！

我们是开路先锋！

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

唱着这歌，我们的心像燃起烽火；我们的心，像升起太阳……

唱了一个，又唱一个……

夜已深，在回来的路上，风吹拂着我们的头发，脑子特别清爽。

我们肩并着肩，膀挎着膀，边走边唱，一路洒着歌。

我们最爱唱的是《大路歌》：

大家一齐流血汗，

咳嗬又呼咳，

为了活命，

哪怕日晒，筋骨酸！

咳嗬呼咳

大家一心，

努力向前，

大家一心，

努力向前！

压平路上的崎岖，

碾碎前面的艰难！

我们好比上火线，

没有退后，直向前！

大家努力一起作战！

大家努力一起作战！

团结一心朝前走，

自由大路快筑完！

唱完《大路歌》，唱《五月的鲜花》，又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这些歌，像战鼓咚咚，激发我们爱民族爱国家的热情。

早春三月，大地的积雪还没有溶化，屋檐的冰柱，一滴一滴地滴水，预示春到了人间。

是一个夜晚，满天的星光闪耀。

一间男宿舍的灯光还在亮着。

屋子里摆着一桌丰盛的晚餐，这是大家集钱欢送几个年轻朋友远行。

李芒站起来，微笑着举起杯说：

“来！让我们干一杯——为这个有意义的晚餐干杯！”

大家兴奋地站起来举着酒杯。

李芒微笑着说：

“祝我们的友谊像泰山一样牢固！”

姚颖也举着杯：

“来再为我们的友谊像海一样深，干杯！”

我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

“……

……

我们是自由的鸟儿，朋友！

让我们飞向云外的山头，

飞向那碧波浩瀚的海上，

在那儿伴着清风翱翔！”

接着又唱一只歌：

“红烛将残，

瓶酒已干，

相对无言，无言……

擦干腮边泪，

脱去绣花衫，

温室不是我们的家，

要的是满天的风沙……”

这是欢送几个要逃亡的朋友的最后的晚餐。

留下来的，把自己的钱掏出来支援将要远行的朋友。

远行的冒着风险——投向祖国的怀抱。

留下的，继续过着难以忍受的“亡国奴”生活。

我们默默地喝着酒……

酒干了，挥泪告别。

第二天，几个年轻的都不见了。我暗暗地为他们祝福。我暗暗地期待着刑满，再次逃跑。

我还年轻，我也有人的一切感情。我需要爱情，需要一个温暖的家。但为了逃跑，为了祖国，我必须让爱情冻结，让爱情熄灭。

我遇上了陈致远，他常常深情地凝视着我。我有些害怕，常常避开他。

我讨厌他吗？不，应该说我已爱上了他；但我现在必须关上爱情的闸门。

在没人的时候，在走廊里，我们常常相遇。我们不说话，默默地相爱，又甜又苦。

一天，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俩，陈致远像对我说话，自言自语：

“我高攀不上啊！”

我也同样像对他说话，自言自语：

“我也高攀不上啊！”

他眼睛闪着疑惑而兴奋的光辉。

金乌逐玉兔，日日夜夜，周而复始，又是一年芳草绿的时候了。

我听到一个消息：“陈致远订婚了！”

这消息使人痛苦，我伏在桌子上哭了。

“但娣小姐，你怎么哭了，有什么伤心事？”

我抬起头来，站在我身边的竟是陈致远。

“祝贺你！”我哭着向他说。

“祝贺我什么？我有什么可祝贺的？”陈致远有些惊奇地望着我。

“你订婚了！”

“这是谣言，不要信！”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心中有个人，可是这个人不一定爱我。”

他心中有个谁，我没问，我也不想问。

我们之间有座难越的山，我们之间也有一条难涉的河。我们之间，像有一层轻纱，像梦，又不是梦。可谁也没有勇气伸手把轻纱撩开。

有一天我病了，躺在宿舍里昏睡着。

我醒来时，看见陈致远坐在我的床边。

“我看见你没上班，我一打听，说你病了，我就来看看你。”

“谢谢你！”

他带来一包苹果，掏出一只削着皮。

“你一半，我一半吧！”

“为什么？”

“我愿意这样吃了。”

于是，他把一只苹果分成两半，他一半，我一半。

从此，陈致远常来我宿舍，我们在一起研究电影剧本结构。

但谁也没有透露心中的话，谁也没向谁求过爱，把爱情锁在心底。

一九四三年九月。

战争的风云在变化着。

“满映”大楼周围挖了不少防空洞、防空壕。

一天，我坐在班上写小说，听见防空警笛鸣叫着。

天空有一架美国飞机嗡嗡地飞旋着。

编剧科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跑光了。

陈致远跑到我面前说：

“田小姐，快快！飞机来了，快去防空洞！”

我忙弯下腰结鞋带。陈致远也弯下腰帮我结另一只鞋带。鞋带结好了，陈致远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往外跑，嘴里叨咕着：、

“这是美国飞机，没有膏药旗！”

陈致远拉着我的手，跑进附近一个防空洞，把我安置在洞里边。他站在洞口探着头，向空中的飞机张望。我担心他被炸，焦急地拽着他，说：

“致远，把头缩回来！”

他看了一会儿向我说：

“田小姐，这个防空洞，离办公楼太近，不安全，咱俩到远一点的防空洞去！”

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灾难临头的时候，我们俩的心才靠得更紧。我的生命是他的一部分。

我们从这个防空洞爬出来，往远一点的防空洞奔跑。

我们进了一个防空洞，他紧紧地用身子挡着我，突然一声巨响，一只炸弹落在我们防空洞旁，防空洞被炸塌了一角。

陈致远的头上、身上落满了土，他忙问我：

“田小姐，你受伤没有？”

“没有，你挡着我呢！”

我急忙拍去他满身的土，问：

“炸伤了没有？”

他摇摇头说：“没有！”

从这天起，陈致远晚上睡在男宿舍，不肯离开我。我问他说：

“你该回家看看。”

“不，在这战乱时候，我要跟你在一起。我们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

一天一天过去了。

终于，我们等待的黎明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这个消息使我们激动不已。

幸福和欢乐之花在我们心灵中盛开。

我、陈致远、李芒、刘思平、姚颖、王郁润，互相拥抱着，互相翻滚在地上捶打着，疯狂地跳着、喊着。

“我们祖国光复了，解放了！”

“满映”的头子下了一道命令：

“日本人要集体自杀！”

他自己首先在他的独身房子里喝下毒药自杀了。

他死了，日本人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一个也没有自杀。

独身宿舍的人，几乎都跑光了，有的回家了，有的跑到乡下去了。宿舍里没剩几个人。

突然，一天，李福山（李芒）走进我的房里，他望着我，笑着说：

“我是陈致远派来的使者。”

“什么使者，我不懂。”

“陈致远求我问问你，他想和你结婚，问你同意不同意？”

“叫他自己来问！”

“他不好意思，怕你拒绝他。”

李福山（李芒）走了。

晚上，陈致远走进我的屋，腼腆地坐在那里不说话。

“你怎么叫李福山来问我？”

“我有些不配你，你是日本留学生，又是个作家。”

他低着头，红着脸，搓着两只大手。

“是我不配你！”我也红着脸低下头。

“为什么？”他凝视着我。

“我结过婚！”

“我不封建，我爱你，不知你是否也爱我？”

“我也爱你！”

我们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

一九四五年九月某天，李芒、我、陈致远、王郁润、刘思平、姚颖，走进“满映”大礼堂。那里已坐满了人，兴高采烈地等着开会。走上讲台的是一个穿粗布衣服、中等个、圆脸、黑皮肤、目光锐利、精明能干的中年人。

“他是谁？”我问坐在身旁的人。

“他是刘天民，地下党员，伪满时在一间高级宾馆伪装跑堂的（服务员），专门窥探伪满的高级军官的军事秘密。”

“我今天讲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共产党是抗日的，国民党不抗日，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打共产党。共产党主张民主，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满映’要改为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电影公司’。革命的留下来，不革命的可以走……”

他讲完，会场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我向陈致远、李芒、王郁润、刘思平、姚颖他们说：

“我早就憧憬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我留下来，你们呢？”

“我们也留下来！”他们齐声说。

“满映”开始第一次分化了。有的走了，有的留下来，筹备成立东北电影公司。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东北电影公司正式成立了。

我和陈致远都被任命为东北电影公司编剧科的股长。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我和陈致远结婚了。

陈致远穿一身崭新的咖啡色料子西服。我穿一身淡绿色的绸夹袍。

不知为什么，我在这喜庆幸福的时刻却产生忧虑，是幸福是痛苦还待来日分晓。我捧着一束鲜花，陈致远也捧一束鲜花并排走进结婚仪式礼堂，举行了婚礼。

在吃饭的时候，陈致远频频给我挟菜。他很高兴。

回到新房后，我默默不语，在沉思。

“琳，你在想什么？”

“我担心你会像田瑯，有一天抛弃我！”

“不会，你相信我好了，我俩白头到老！”

苏联红军进入了长春，不多日子又退出长春。

国民党党部像雨后春笋到处成立。国民党接收大员接收了长春，国民党军队也进驻了长春。

在东北电影公司隐藏着的国民党势力也猖狂起来。

在东北电影公司的草包副厂长张某和有些部长都被逮捕了。

东北电影公司笼罩着乌云。

一天，我们刚走进东北电影公司的大门，便有人通知：

“到大礼堂去开会！”

我们走进大礼堂，刚坐下，大礼堂内就闹哄哄的吵个不停。

一个穿工人服的人跳上讲台高声喊：

“开会了！今天开会研究卖机器的问题。”

“卖什么机器？”下边的人在问。

“卖摄影机、录音机、洗印机……”

“卖了做什么？”

“给大家开支！”

“反对！那是电影事业的基本设备，不能卖！”

“反对，也要卖！”台上的人在喊。

“打倒卖机器的！”下边在喊。

“滚下台去！”下边在喊。

会场展开了一场舌战。

舌战了一阵，人们纷纷走出会场。我们也站起来想退场。突然有一个人，一手拿枪，一手拿黑名单满脸杀气地大声喊：

“田琳、陈致远、李芒、马寻留下来不许走！”

我意识到东北电影公司里出现了逆潮。但我没有害怕，我两眼充满怒火逼视着他。

拿枪的大个子，把我们四个人押进了一间小屋。那间小屋，只有一张床，什么也没有。他凶狠地命令我们：

“不许走出这屋子！”

然后给我们每人胸前戴上一个标牌。我把那标牌扯掉，对拿枪的人说：

“我不戴！我抗议把我们关押在这屋里！”我把那块标牌撕得粉碎。

那个人恶声恶气说了声：

“田琳，走着瞧！你不会有好下场！”便出去了。

我们四人愤怒地呆呆地坐着。

被关了一整天，晚上才放我们回家。

我们四人，没想自己的事，在商议怎样能把被关押的几个头头救出来。

于是我们到中苏友好协会，提出由苏联红军把他们要出来。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东北电影公司上班。

我一个人坐在编剧科，沉思。一个穿黑大衣的大个子，拿着枪朝我喊：

“田琳，你出来！”

“出来干什么？”我问。

“你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

“是又怎么的？”

他拿着枪逼我说：

“走！跟我走！”

“走，就走！”

他又把我押进那间小屋。李芒、马寻、陈致远也被拘留在一起。直到半夜，几个拿枪的把我们四人推进一辆囚车，送进洪溪街派出所的拘留所。

我们四人被分别押着，到了深夜，我被提审。

在审讯室里，一个穿便衣的老头，胖胖的圆脸，一对小眼睛眨巴眨巴的对着我，还算有点礼貌对我说：

“请坐！”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

“你们是不是合伙把公司的机器偷卖了？”

“胡说，我们没卖机器！”

“你分到多少钱？”

“没卖，分什么钱！这是个阴谋，诬陷我！”我很生气，大声抗议。

“我知道你是个作家，又是日本留学生，所以对你很客气。你要说真话，对你有好处。”

“我不说假话！”我把头扭过一边。

“没有卖吗？可有人告你们偷卖机器，我们再调查，你也消消气！”他把话题转了：

“我和你谈谈另外一个问题！”

“谈什么？”

“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没什么区别，只是一个主张吃苞米碴子，一个主张吃高粱米。你不要反对国民党！”

“你胡说些什么，我不听你的！”

他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喊叫：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气得背着手来回走着。

“今天就问到这里。”

审问结束了。

深夜三点，才把我们四人放了。

四月，还下着鹅毛大雪，雪花漫天飞舞，整个城市白茫茫一片，变成晶莹、迷人的神话世界。

大雪积有几尺厚，道路被阻塞，电车停开。

“琳，没有电车，你怀孕五个月了，今天你别上班了！”陈致远说。

“我不能被大雪吓住，我要上班！”

“时间来不及了，你要迟到，苏联经理会批评你！”

“我跑步去！”

陈致远知道我有个牛脾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九条牛也拉不住，只好任我去了。

我在雪地里跑，跑得很急。中午，我的肚子疼起来，才请假回来。

这天夜里，我流产了！没有出世的女儿离开了人间，我很悲痛。

“悲痛也没用，不如把消极变成积极！”

我便拿起笔写《失掉太阳的日子》。

生活像退潮的海，平静无波。

偏偏从二哥处转来马吉的一封信。

琳：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你的信突然中断。我念念不安，从北京乘车去长春，近泽书店编辑部找你，才知道你被捕入狱。我到监狱去看你，不许接见，我只好在监狱门前天天等待机会。一天下大雪，从监狱开出一辆囚车。我看见车上一个女犯披着卷毛黑大衣，我认出是你。我向你摆手，无奈囚车无情，迅速驶过。我跟着那辆囚车跑了一段路，车无影无踪了，我心怅惘不已。到教堂为你祈祷，愿上帝与你同在！之后，我几个春秋，在默默等待着你。

我果真失去了你吗？

我用生命唱着恋歌呼唤着你。

一九四五年光复了，我又乘火车去东北三省，到处找你。

我爬过高山呼唤着你，我趟过大河呼唤着你，但没有回声。

我带着永恒的爱在等着你，寻找着你。

琳，你在哪里？你结婚了吗？请告诉我！我还在等着你！

……

马吉

我读完信，愕然站在那里。

我仿佛听见马吉的呼唤声。

这是信吗，这是一颗赤诚的心声啊！

这是用血谱写的“绝唱”！

我内疚，我结婚了。

我心中仿佛起了急风骤雨，久久不能平静。

给他回信吧，可是对不起我的丈夫。

没有回他的信，蒙着被子哭了一场。

我在谴责自己。

一连许多日，我都沉浸在懊悔中。

一九四六年，五月，大地染上了绿色，山也绿，水也绿。

国民党反动势力高涨，敌强我弱，东北电影公司决定撤退到大后方。

愿跟共产党走的报名去。

我和陈致远、李芒和王郁润、刘思平和姚颖、王静和马寻，都在报名册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六月的一个早晨，阳光灿烂。

我们迈着轻捷的步子，欢欣鼓舞地登上了北行的火车。

车轮咣当咣当响着，仿佛奏着胜利的进行曲，为我们送行。

从长春出发，坐了好几个钟头的火车，顺利地到达了哈尔滨。

这东方的莫斯科，美妙、奇特，到处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教堂。

建筑物有的是圆形平顶，有的是方形尖顶……

街道两旁种有成行的街树，道里是柔情的垂柳，南岗是法国梧桐……

好一个风景幽美的城市。

街上的行人，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白俄。

白俄，男的穿乌克兰花边衬衣，女的穿着花花绿绿的连衣裙。

卖鲜花的女人，走在街上叫卖：

“谁买鲜花？卖鲜花！”

卖牛奶的女人，站在街旁叫卖：

“谁买牛奶？卖鲜牛奶！”

原定，我们撤到哈尔滨的。但过了几天又奉命再往后撤，撤到佳木斯。

这时，有些同志犹豫起来，有的要跟着撤，有的不愿再走。王祖鹤提出来，要回齐齐哈尔。

陈致远恰好这时病了，发烧，体温37.5℃。他对我说：

“琳，我们不要走了，我患感冒了。”

“你不走，我自己走！”

陈致远什么也没说，躺在床上流下两行眼泪。我不理解他，还生他的气，因为这是大问题，这是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我对他说：

“我已决心，党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跟着党走，我跟定了！”

他知道拧不过我，也不再强调留下来。

从哈尔滨出发那天，我和姚颖一人买个有小锅盖那么大的面包，还买了些红肠，兴致勃勃地上了火车。

“买这么大的面包做什么？”刘思平问。

“饿了当饭吃，困了当枕头。”

陈致远忧心忡忡，两眼暗淡无光。我扶着他上火车。

六月，是北方最美的季节。

草原是一片绿色，像绿色的海洋，风吹草动，像绿色的波浪。蒲公英花像闪闪发光的星星。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正在开放。多迷人的六月啊！

我和姚颖、王郁润咧着嘴唱着：

红旗在飘，

希望的火在燃烧，

共产党，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的前夜！

……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火车在草原上爬行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像老牛拉车，走了好几天才到佳木斯。

为了更安全，决定东北电影公司和后方病院还要撤，撤到附近的兴山市。

于是，我们又乘小火车去兴山市。

兴山市（鹤岗市）是一个煤矿区，是一片丘陵式的山岗，这里有取之不尽的黑金子——煤。

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只有掠夺，没有建设。

这里荒凉、闭塞，没有繁华的大街，只有一条落后的狭窄的小街，没有像样的百货商店，也没有电影院。街道两旁尽是破破陋陋的小铺子。

煤矿局附近，有一片比较好的日本鬼子的住宅区。

在山岗下，有一片低矮的破土房，是矿工们的住处。

刚解放，这里还很贫穷落后，矿工们过着艰苦的生活，衣衫褴褛，形容枯槁。

时局动荡，工作还不能开展。

花开花落，物换星移，冬天又来临了。

大雪在飘落，兴山市的山岗被雪遮盖，由于这矿区总是冒着煤烟……漫岗的雪呈一片灰黑。

天冷了，我们发棉军衣。姚颖和我兴奋得像个小孩，跳着、笑着去领棉军衣。

每人领来一套崭新的草绿色棉军衣，一顶八路军军帽，一条皮带。

急急忙忙跑回家，脱掉便棉袍，换上了棉军装，高兴地对镜端详。

“嚇！真神气，年轻的女八路。”这年我三十二岁。我向刚换上军服的陈致远，两脚一并，打个举手礼，顽皮地说：

“队长，田琳报到！”

陈致远也忙还个军礼。

我们像俩个孩子，拥抱在一起咯咯地笑着。

姚颖也新换了军装推门进来：

“嚇！这么亲密！”说了拽着我：

“琳，抽签去，领军大衣！”

“远，我运气好，你看家，我去抽签！”

我和姚颖搂着脖子，快步跑去抽签。

我果然走运，抽到一件皮大衣，乐颠颠地跑回家。

“远，你看，真给你抽来一件皮的军大衣！”

远看着我，笑着说：“你真有运气！”

“来，穿上！”我高兴地帮他穿上。

这个书呆子一下子变得英俊起来了。

姚颖又来了，她闪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笑着对我说：

“琳，我太爱这军装了，这才像个八路军！”

“我也爱！”

“来，来！我们三人站在一起唱个歌吧！”

三个人张着大嘴唱起来：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

我们的歌声，在这间房子里回荡着。

我们的队伍扩大了，从延安来了不少革命老干部，田方、袁牧之都是著名的演员。

著名的摄影师吴丕咸，作曲家黄淮，还有一些演员和技术干部。

到处飘荡着解放区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

东北电影公司成立了工会。田方被选为主席，我被选为妇女部长，兼图书馆馆长。

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太多了。医院住不下，东北电影公司要把独身宿舍楼腾出来住伤病员，独身同志都挤到家属宿舍去。

陈致远回来和我商量：

“我们科里有两个独身的小同志想搬进我们家来。”

“谁？”

“刘稼夫、李维仁，你同意吗？”

“同意，这是支持解放战争啊！”

1. 姚颖来对我说：

“今天，我们演员小组学习会上，张×说：‘田琳是红色大萝卜。’”

“这是什么意思？”

“说你外表积极，是假的，思想是白的！”

我听了火冒三丈，气得浑身发颤。

陈致远说：

“你还是假积极？忘了在哈尔滨往后撤时，我病了，你还说‘你不走，我走！’连丈夫都不要了，要跟共产党走！”

我伤心地掉了眼泪。

那是对我的政治迫害、侮辱！最痛苦的莫过于政治上不信任。我饭也没吃，披上棉军衣冲出门去。

“琳，你上哪儿去？”

“找张×去算账！”

“你不能去，你去问她，不出卖了我吗？”姚颖拽着我。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的思绪像起了暴风雨。

我和张×矛盾已久。她丈夫王则被捕入狱。张大草包出狱后便毫无顾忌地泡在张×家里。张×投进大草包的怀抱，当了他的情妇。我便看不起她。她也忌妒我地位比她高。东北电影公司成立之初，张大草包当了副厂长。他专为他的情妇成立个书记处，让张×任书记。她没什么文化，只知整天擦脂抹粉在书记处和张大草包谈情说爱……我对此很有意见。

张大草包闹派性，他想把东北作家拉拢在他手下，成立个“红粮社”。陈致远问我：

“参加不参加？”

“我不捧大草包他的臭脚，我不参加！远，你也不要参加！”

张大草包记恨在心里。

“琳，得罪十个君子，也不能得罪一个小人。张大草包非找机会给你穿小鞋不可！”

“我走得正，不怕，我会找组织。”

我去敲严文井的门，严文井打开门欢迎我进了屋。

我气愤地把张×在演员小组会上说的“田琳是红色大萝卜”的鬼话，向他汇了报。

他安慰我说：

“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也真不了！你放心好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搞创作的要参加土改。我因为在产期，不能参加。陈致远则要去。我们结婚后，第一次要别离了。

陈致远在走前，晚上睡得很迟。他在外屋叮叮当当又钉又刨，给我做书架。这书架已经做了好几天，这是最后一道工序。

“致远，快休息吧！明天你还要起早下乡！”

“不忙，快完工了，做好了，你好放书。”

十二点了，他还没上床，我又喊他：

“致远，夜深了，快睡吧！”

“一会就睡，书架做好了，我把刨花扫干净，收拾收拾，你爱整洁。我走后，你好在这间屋子看书、写作。”

时钟敲了一点，致远才睡下。

第二天，天还没亮，集合号声吹响了。

陈致远一骨碌爬起来，急急忙忙洗了脸，吃口饭，进入卧室，深情地吻了吻我（谁知这竟是最后的一吻）：

“我走了，你好好保养，我会常给你写信。”

我不能送他，从床上爬起来，趴在窗前向外看。

外面一片漆黑，满天星斗，连致远的影子也没看见。我们婚后一年多，就这样别离了。悲哀袭上心头，眼泪流下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啊！

致远走了，留下我一人。我望着他留在屋里新为我做的书架，离愁别恨涌上心头！想着他临别的叮咛：“不久，我会回来和你团聚的。”

他走后的第三天，忽然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一个陌生人一手提着两只鸡，一手提着两只包说：

“我从佳木斯来的，这是陈科长给你捎来的！”然后，他拿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忙拆开信：

琳，亲爱的妻：

离开你，很是想念、惦记。

鸡是求人杀的，我在烛光下替你摘好毛，还给你买了一斤红枣，一斤红糖，望你把身体保养好，不要想念我。过些日子我们会幸福地团聚的。

我盼望着我们幸福团聚的日子快到来。

陈致远走了不久，那独身宿舍的李维仁、刘稼夫两个搬到我们屋里来了。

他们知道我有个文人的怪癖，不愿人到我家串门，因为我要写作、看书，要清静。

我们只在走廊里相遇时，打个招呼。

1. 我从他们门前走过，李维仁把我叫住说：

“琳姐，有密探！昨天深夜，到我窗前来鬼鬼祟祟！”

“别胡说，哪来的密探！？”

“真的！昨夜我在帐里洗相片，我听到咯吱咯吱的踏雪声。我趴在窗上往外看，看见一个人猫着腰，蹲在窗底下探头探脑！”

他的两只小眼睛闪着神经质的惊慌。

“我不信。”

“真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第五章 第二次入狱

一个月后，我病好了，准备下去参加土改。可是通知我参加学习会（实际是防奸运动）。

这天，我进了会场，全场气氛紧张，正在批斗刘稼夫。

七嘴八舌地质问他：

“刘稼夫，你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我没参加国民党，怎么成了国民党特务？”

刘稼夫边说边掉眼泪。

“你不是国民党特务，为什么天天说怪话，打唉声？”

“我觉得委屈。”

“怎么委屈？”

“我为了到解放区来工作，就和未婚妻分了手，怎么还说我落后？！”

“刘稼夫，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口号声响成一片。

我刚参加革命，还不知运动中会有错案。我忍不住站起来说：

“刘稼夫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这下子引火烧身，于是七嘴八舌向我开炮：

“田琳，你为什么替刘稼夫辩护？”

“我是实事求是的，并不是为他辩护！”我分辩着。

“我想如果他是国民党特务，他就会秘密行动，不会乱说怪话，随便打唉声，还有这样做特务的？”我说。

“他是在搞破坏，企图瓦解革命队伍；说怪话是煽动不满情绪。这不是特务，是什么？”

大草包张××腾地站起来向我开炮：

“田琳，你就是他的后台！”

我想起陈致远曾对我说过：“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能得罪一个小人，他非给你穿小鞋不可啊！”这是穿小鞋，这是政治迫害！

大草包张××的情妇张×也站起来：

“田琳，你是个红色大萝卜，外面红里面白，我看你就是国民党特务！”

接着大草包张××又站了起来逼问我：

“你和满××是什么关系？”

“是朋友关系。”

“我看是政治关系，他是国民党党员，你也是！”

“你们可以到佳木斯去调查。李正中是满××最好的朋友。我曾当着李正中面劝过满××：你退出国民党吧，国民党反动、落后！”

“我们是要调查，不仅调查，还要把李正中找来和你对证。”

“找来对证好了，我不怕！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也真不了！”

斗争越来越激烈。有人点名姚颖：

“姚颖，你是田琳的好朋友，你们经常在一起，你应该站稳立场，揭发田琳！”

姚颖沉思了一会儿，站起来说：

“我揭发田琳拉拢我！”

“说详细点，她怎么拉拢你的？”

“她借给我书看。”

“借给你啥书？”

“《大众哲学》，艾思奇著的。”

“还有什么？”

“她帮我改过稿！”

我难过地想：

“姚颖啊，姚颖！我们同盖一条被，同吃一锅饭。你竟把我的一片好心当炮弹来打我！”可也难怪，形势所迫！不然她就要泥菩萨过河了。

炮弹一颗一颗向我轰来：

一个清扫工人老头站起来说：

“那天，我在马寻科长室扫地，在他转椅下发现一个纸团，打开一看是东北电影公司的财产目录，那一定是田琳给他的！”

“那时，我正休病假在家，再说财产目录归李芒管，我怎么能知道？”

“我们院子大门口常停小汽车，那一定是国民党部接田琳的！”

“我和王郁润、姚颖住一个屋，一块上、下班，你们问她俩好了，我从来没坐过小汽车！”

几个从延安来的同志，解下皮腰带狠狠地向我抽打、逼供：

“田琳，你说你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不是！我没参加过国民党，也没参加活动，也没领过国民党证。”

就这样，上千人斗争了我三天，我的家被查封了，我被软禁在一个老干部家的一间空房子里。一个拿枪的小鬼，监视着我。

我体会到政治上的误解和诬蔑是最大的悲哀和苦痛。

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啊！

我焦急得不能睡觉，不能吃饭。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地走着。走完，坐在地上抱着头痛哭起来。

命令我写自传，我便整天写自传，写了一遍又一遍。交上去，又摔给我说：

“你没交待你当国民党特务的事！”

“我不是，我怎么写？难道你们叫我瞎编？”

“叫你写真的，不许瞎编。”

“我不是国民党，我也不想瞎编！”

他们便施行“优待”政策，每顿给我做几个好吃的菜，可惜我一口也吃不下去。

每天来一个老干部向我说教，找我谈话。

“你是国民党也没关系，坦白了宽大你！”

“我并不怕死，只是我不是国民党！”

“你承认了，给你提升一级、两级或三级。”

“你承认了，给你赏钱！”

“……”

“你要是害怕，我们给你手枪自卫！”

条件越来越优越，但，我不是国民党。

逼供，逼得我快要发疯了，我想死。

一天，老干部领来一个穿黑制服的公安人员，他两眼露着敌视的光，怒视着我，逼问：

“你叫什么名字？”

“田琳。”

“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没有隐瞒，我是爱共产党的，才跟到兴山市来了。”

“别往脸上贴金、骗人。”他愤怒地拍着桌子威逼我：

“说！你做过些什么特务活动！坦白出来！”

“我没做过什么特务活动。”

“狡辩什么？”

逼得我难过得哭了起来。

“哭什么？委屈你了怎么的！”他向我冷笑着。

“不要做戏啦，坦白是你唯一的出路！”

这种政治迫害是最残酷无情的悲剧。

我痛苦得难以忍受，浑身发抖。

“……”我只有沉默。

“死顽固，告诉你，不坦白，从严处理你。”

他逼了一天，走了。

这个公安人员一连来了几次。

几次都是残酷地逼供。

他一来，我就恐怖，浑身发抖。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我的心被这残酷的逼供粉碎了，只想死。

夜风敲打着窗玻璃，心理作用，总觉得鬼影幢幢！

我迅速地把被单撕成一条条，搓成一条绳子，准备上吊结束我年轻的生命，解脱这痛苦的折磨。

这时，我想起我的双亲，仿佛他们流着泪向我说：

“琳，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怎么活？”

我想起我的丈夫陈致远，好像也含着泪水向我说：

“琳，坚强点，不能轻生！”

我的手停下来，冷静地想：

“不能死，死了谁给我洗清历史！”

屈辱和恐怖，折磨得我十分消瘦。

我被软禁着。

我看见一条狗在大道上走着，我想：

“我还不如一条狗，它可以自由走来走去！”

我看见姚颖、王郁润说说笑笑走过。

我有些心酸，在我得志的时候，她们认识我。在我遭难的时候我认识了她们。

我像落进了枯井里。谁来援我以手呢？我只有等待着命运的摆布。

软禁了三个月，我年轻的脸，失掉了红润，变得苍白、憔悴，像秋风秋雨打过的芭蕉。

这天，天低云暗，下着蒙蒙细雨。

通知我去佳木斯，我在梦想着：到东北局，那里有高级领导干部，会实事求是处理我的错案。

我坐在一辆马车上，装着我的行李，洗脸用具。我穿件草绿色的棉军服、咖啡色的料子裤。戴顶灰色的毛绳帽，我望了望贴着封条我的家。心想那间房子曾是我和陈致远幸福欢乐的家，如今却被贴上了封条。

我望了望那条小路，那是我天天上班下班走过的路。

风凄凄，雨切切。凄楚的离愁在我心中荡漾……。

我心想，我三个月没吃好饭了，到了佳木斯小馆吃碗面条。

可是车却停在佳木斯公安局门前了。

我惊呆了：心想：“我没有偷，没有抢，没犯什么罪，怎把我送到这里？”

我想哭，哭不出来。欲哭无泪更伤痛，更深沉……

我走进科长室，一个中年人板着脸，叫我坐下。

我盼望他能实事求是地处理我的问题。可是我的希望变成失望。末了他说：

“你好好反省，反省好了再谈！”他命令一个拿枪的兵押着我，走过一条幽暗的通道，下了一个陡坡阶梯，我心慌意乱起来：

这回不是软禁了，是真正的进监狱了。

“站住！”

我站在一扇狗洞子似的牢房门前。

我木然站在那里。狗洞门哗啦地打开了。我猫着腰，低着头钻了进去。

这是一间狭小的牢房，又暗又脏又阴冷，墙上的泥已斑剥了，爬着臭虫，弥漫着屎尿味。

两张木床，墙角放个马桶。

我把行李放在一个床上，对面床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犯。她脸色苍白，向我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又消失了。皱着眉头，沉思起来。

我仿佛堕入无底深渊，两眼漆黑，不知如何是好。

“你是什么案？”她问。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你怎么进到这里来的？”我问。

“我弟弟为了讨好共产党出卖了我。”

我猜想，她可能是国民党。

“113号，你家给你送东西来了。”

铁门打开，嚇,给她送来的东西真多：一饭盒饺子，一饭盒酱肉，还有咸鸭蛋，手纸、肥皂、衬衣、衬裤。

她给了我一个咸鸭蛋。

我没有家，亲人陈致远还在乡下。

我盼望着提审，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等待着。

囚犯最好的时刻是黑夜来临，黑夜是提审的时刻，黑夜也是睡觉进入自由自在的梦乡的时刻。

一过十点，走廊里便响起看守的皮靴声，哗啦哗啦开关牢房的声音。提审了。

那个四十来岁的女犯，跳下床去趴在门侧谛听着。听了一阵又沮丧地上了床，失望地呆坐在床上，不住的咳嗽着，她有肺病。

终于，一夜她被提审了，但她哭着回来了，一边哭，一边骂着，一边咳嗽着。

我敲牢门要求提审，回答是：

“提审，你得承认你是国民党！”

“我不是国民党！”

“不承认就不能提审。”

真的，一直不提审我。我变成了未经提审宣判的长期囚徒。

后来，女犯不多了，我们住到一个大牢房。

这里有女大学生小白脸，有和公安局科长私逃的妻子地主女儿，和那个四十来岁的女肺病患者。

从男牢房，有时传来歌声：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

来一个，消灭一个，

来一个，消灭一个！

……

这是一个大学生唱的，他是男低音，歌喉圆润。

唱着唱着，歌词变了：

没有酒，没有肉，

没人给我们送，

没有酒，没有肉，

没人给我们送。

……

“不许你唱，闭上你的臭嘴！”看守吼着。可是他还在唱，听说他疯了。

他还那么年轻，他还有事业，他还需要爱情……可是他却疯了。

我们长期的囚犯，肚子里没油水，伙食很坏，高粱米，冻土豆汤，没有一滴油珠。

短期女囚，不稀罕冻土豆，把皮子吐在地板上。我们长期女囚，饥饿难忍，把她们扔在地板上的土豆皮捡起来也吃了。

一天，进来一个地主婆，背一面袋粘豆包。

那白脸女大学生闪动一双光亮的眼，说：“咱们分吃了吧！”

她说着便把地主婆的口袋抢过来，三下五除二给分掉了。

地主婆反对说：

“为什么抢我的豆包？”

“那不是你的，是佃农种的果实！”

“是我的，我去告你们。”

“你是剥削者，你是斗争的对象，你敢告！”

地主婆一听，她是斗争的对象，便不再说什么。

就这样，我们饱食了一顿。

再没有长期囚犯受罪的了，那四十来岁的肺病患者是个例外，我们都是除了身上的衣裳，别无所有。

整天坐着，裤子磨出一个大窟窿，多不雅观啊！虽然没有针，没有线，但是却还有做人的尊严。

穷则思变，变则通。

没有针，自己造。

在放风的道上，捡得一根铁丝，有时捡回一小块碎玻璃。用玻璃碴把木梳齿刮成针再用铁丝钻个眼，便是一根针了。

没有线，也自己造。偷着把被单抽出一根一根布丝，偷着在被子里搓成线。

就用这木头针，穿上自造的线，背着看守的眼睛，硬是把破裤子缝连上了。人的生命力是惊人的。

过年了。我们长期囚犯盼望着吃顿好饭菜。

大家商量着：

我们多打点菜，多吃几天，可是我们盒子不多，还有两个漏的盒子，没法装汤。

“我来修理漏盒子。”我说。

我用棉絮把漏眼紧紧堵上。对着光透看一下，没有一点亮，用水试试，不漏一滴水。

我们盼望着吃点好菜。开早饭时，满脸喜悦，一人提着一个盒子，准备装好菜。

我们的牢门被打开了，几双眼睛盯着饭和菜。

依旧是高粱米饭，没有油珠的冻土豆汤。囚犯还想过年，真是尽想美事！我们垂头丧气，闷声不响地吃着。

吃完饭，那个四十来岁的女囚说：

“今天，过年了，我们谁也不许哭！”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都是人呀，此时此刻谁不想亲人呢！

一个哭了，连锁反应，另一个也哭了，四个都哭了。

我从来也没有放弃我的理想：

“我要为革命献出力量，我还要为革命写作！”

我便拼命读书，读了一本又一本。

我劝慰自己：

“你这块金子，要经得起火炼啊！”

监狱，除了坚固的四壁，铁窗、铁门外，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昏暗、潮湿、肮脏，是细菌、病毒繁殖的理想场所。

苦痛吞噬着我，病菌猖狂向我进攻，身体衰弱下来，发着低烧。我颈部生了几块淋巴结核肿瘤，发展异常迅速，逐渐在软化；照了照镜子，淋巴结核瘤肿大、发红、发亮，开始流脓，酸胀疼痛起来。

淋巴肿瘤要溃破了，牢房里没有手术刀，我用玻璃碴把筷子削尖，只好咬紧牙自己动“手术”了。往那红肿软化的肿瘤猛地一刺，于是红黄色的脓液淌了一碗。

没有药棉，把被子里的棉芯掏出来当药棉；没有绷带，把被单撕成条条作绷带。

我骨瘦如柴，颈部几个肿瘤，一个接着一个溃烂了，我便一个接着一个动了“手术”，流脓淌水，发出刺鼻的恶臭。

一群苍蝇围着我颈部嗡嗡飞着转。我不住地用手轰赶，轰走了又飞回来。正像鲁迅说过的，苍蝇倒有些韧劲儿。

难友们躲我远远的，皱着眉，捂着鼻子，用厌恶的眼光看着我。

人变成冷血动物。我百感交集，眼泪像泉水一样涌溢出来。

一天，我感到有什么小东西在我颈部蠕动着，我打开绷带一看，是生了蛆，我一阵恶心想呕吐……就是铁石心肠也禁不住流下泪来。

“901号你哭什么？”看守从眺望铁窗眼望着我问。

“我脖子长蛆了！”

……

过了几天，我们的牢门打开了。

“901号出来，到医务所去看病！”

我用手拢了拢头发，迅速地穿上鞋子打起精神走出牢门。

被拿枪的看守押着，从那八掛式的牢房的长廊走下来，下了楼梯，走出那幢牢房。

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春风吹拂着我的头发。

新鲜空气，像新鲜牛奶。

监狱院子的树披上了绿衣，草也绿了。墙角的蒲公英也开了黄灿灿的花。

我走进医务所，白衣护士给我洗掉颈上的蛆，上了药，缠上了绷带，顿时感到轻松多了。

从医务所回来，在院子里，我採了一只蒲公英黄花，带进牢房。

牢房里的女囚们，把这只蒲公英花传来传去。她们像看到了春天之神，微笑着，却不住地叹着气。

是的，我们是囚犯，我们心里只有秋天或者是冻结的冬天。人生几何，时间多么珍贵，可我们却在囚牢里白白浪费掉。时间对囚犯们一点价值没有。

结核菌从淋巴病灶蔓延到我的肺部。

我身体虚弱级了，头有些疼痛，常常打着寒战，有些烦躁，傍晚发烧，夜里出冷汗。不住地咳嗽着，吐痰。

我得了肺病，双手如柴梗，暴起的青筋像缠在柴梗上的枯藤。我面色苍白，说实话只比死尸多了一口气。

如果在外边，我可以到医院治疗，吃点营养品，可是我是一个囚犯，束手无策，只有眼睁睁地等待死亡。

我气喘吁吁靠着墙壁，呆呆地坐着，不断地咳嗽着，吐痰。

我还年轻，刚刚三十二岁，是写作的黄金时代，可我却要死去。

一天，我发现，我痰里带着血，我凝视着那鲜红的血，我知道我肺部血管被损伤了。我胸部有些疼痛，我坐不起来了。

从此，我卧倒在牢地上。

“901号，你怎么躺下了？”

“我吐血了，坐不起来了。”

看守没说什么就走开了。

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快结束了。我这块黄金到底没禁得住火炼。我不怨党，因为他不了解情况，是那张××大草包瞎编一套，向党汇报，他同狼一样狠，明明知道我不是国民党，为什么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呢，很明显他是想踩着我的尸体往上爬了。我还年轻，难道我也得像萧红一样“留下半部红楼他人写”吗？

我想起远方的父母。我想起丈夫陈致远，我们刚刚结婚一年多，就已生离，难道又要死别了吗？

我也想起诚挚的马吉，想起当年他在监狱门前守望，跟着囚车奔跑，摇着一只手的情景。

想着想着，我的眼睛湿润模糊了。

我没有怨气，我想，我死了，只要全国人民得解放，我就高兴。

眼泪流尽了，我在等待死亡的到来，等待着离开人间。

一天夜晚，看守把监视的小铁窗掀开，露出一双仁慈的眼睛凝视着我，说：

“901号，你快出去了！”

“真的吗？”

“真的，不要过多久，你就会出去了！”

没过多久，我被提审了。

我蹲了五百四十九天，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六小时监牢，第一次提审。

我勉强站了起来，全身浮肿，两条腿肿得像粗木头，两只肿胀的手扶着墙，艰难地迈着沉重步子，走出牢房，往前移动着走进审问室。

审问官板着严肃的脸，一双锐利的眼睛看了我一下，开始审问了。

一连审问我三天，又写了三天自传。不过都是重复着过去问答的那些老话。

一天吃完早饭，看守长找我谈话，他说：

“我们没发现你有反动言行，今天释放你，不过你的问题还是没作结论。”

“没做结论，我不出去！”

“释放，是我们的决定。结论还有待慢慢调查后再说。你的爱人陈致远已到煤矿去劳动改造了，你家的东西都在这里，你能带吗？”

“我带不动了，以后再取吧！”

我在看守长门前，看见刘稼夫，他的脸孔肿得圆圆的，他已站不起来了，坐在一张爬犁上，一脸哀伤，用一双忧郁的眼睛看着我。他仿佛有许多话要说，嘴唇颤动着。

这小伙子病得比我还重。

他还年轻，才二十几岁。他能活吗？

这是天高气爽的八月。

我拖着病弱的身子，移动着两条胖肿的腿，艰难地走出拘留所，走出公安局大门。

“你到哪里去？”门前还坐着一个刚被释放的男人，他看了看我，问。

“齐齐哈尔”我说。

“你是不是陈致远的爱人？”

“是，你认识陈致远吗？”

“我们是一个牢房的难友，他提起过你，他告诉我他的岳父在齐齐哈尔。”

“他身体好吗？”

“很好，他在监狱里学了不少做菜的本领，还说等出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霎时我眼泪涌了出来。

我两条腿已爬不上火车，是押送我的战士拉着我上了车。

我坐在车厢里，忽然想到我分文没有，到了齐齐哈尔走不到我的家。于是我想到我手提箱里还有一块衣料，把它卖了吧。

我得到战士的同意，便在车厢里叫卖起来：

“谁买这块衣料？”

“多少钱？”

“这块料子是二十元买来的，我卖七元吧！”

“我要！”

“我要！”

都向我伸出手争买这块便宜货。

我是个日本留学生，女作家，竟在火车上叫卖起来。那块料是婆母在我结婚时给我的礼物，竟被我卖掉了，心里很是难过……

火车到了齐齐哈尔，那战士又把我送到齐齐哈尔公安局。在那里停了一天，登上记，才把我释放了。

第六章 离 婚

我乘一辆马车，回西郊我的家。

马蹄在柏油马路上得得地敲响着。

一路上，我百感交集。

我从小是在充满欢乐、骄傲、赞美声中长大，可是今天的我却是刚从黑牢里放出来的犯人。

车子经过龙沙饭店，南大街，西城门，才走上西大桥。

桥下的嫩江支流，哗哗流淌，往事不堪回首。

过了桥，便走上一条砂石大道，两旁的杨树长得枝繁叶茂。

车子在一座灰砖房前停下来，我付了钱。

我推开灰砖房的门，迎接我的不是我的妈妈，却是个山东小脚菜农老太婆。

“你找谁家？”

“田校长家。”

“什么田校长！他早被我们菜农撵到那土岗上的公共厕所去了。”

我提着手提箱，一步一停，停停走走，好不容易爬上土岗的红砖的公共厕所门前。

门旁高高地摆着兔笼子，笼子里蹲着长毛兔，笼子旁边放着一堆剥下来的兔皮。

门紧关着，我推开木板门，进了屋。

是一间狭小的房子，原是公共厕所，只有一扇小窗子，没有玻璃，糊的纸，已被风吹雨打破碎了，塞些破棉絮，屋子里暗暗的，没有一点阳光。

父亲白发苍苍，穿得十分褴褛，愁眉苦脸坐在桌子旁，正一边吹着口琴，一边流泪。

“你找谁家？”父亲惊呆地问。

“爹，我是琳啊！”

父亲放下手中的口琴，眯着一双老眼，歪着头仔细地看我：

“你是琳？这不是在做梦吗？”

一个错案，把我关进监狱，到处传说我被共产党枪毙了，所以父亲有些怀疑。

“琳，都说你已死了，你还活着？”

父亲两眼含着泪。

“我没有死。一个错案，我被关进监狱。”

我抬起头，看见母亲瘫在炕上，蜷缩着不住地咳嗽。

我向母亲走去。

“妈，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

“两条腿得了类风湿，瘫了！”

我望着可怜的瘫妈妈，心里难过，流下眼泪。

“传说你死了，我和你爹，天天想你啊。”

母亲看见我脖子缠着药布，吃惊地问：

“你脖子怎么了？”

“得了淋巴结核。”

一家人，虽然有些哀伤，但总算团聚了。

父亲被清洗下来，便以养兔为生。

“爹，养兔挣钱吗？”

父亲打了个唉声，没有说话。

母亲叨咕着：

“一个钱没挣，倒往里搭了不少钱。”

“怎么搭了钱？”

“你爹花高价买的长毛兔，又买兔笼子，可是兔皮扒下来，没钱熟，放在那都长了虫子，谁要？”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还有心熟皮子？”

地下蹲只黑猫，亮着一双眼睛，朝四面环视一会就咪咪地叫着跑出去了，大概它饿了。可这儿没有残羹剩饭。

晚上，没有被子盖，只好盖床破棉絮了。这一夜，有父母在身旁，总比在监牢里幸福多了。我香甜地睡了一宿。醒来，从小窗子射进了一线阳光。

淋巴腺结核，一夜淌出不少脓水，把枕头湿透了，冒出一股腥臭气味。

“吃饭了！”父亲起得很早，高兴地喊着。

我在监牢里太苦了，真盼望着吃顿香香的饭，解解馋。

这是一顿什么饭呢？白水煮的茄子、豆角，一粒米也没有，一粒盐也没有，一滴油也没有。还不如监牢饭。

一边吃着，母亲一边向我诉说着：

“琳，你那些预备结婚的料子，全被你爹给卖了，我不给钥匙，他把你的箱子砸开了。”

父亲皱着眉头，耷拉着脑袋，抽着烟，打个唉声说：

“爹真对不起你呀，你结婚爹什么也没给，反倒把你自己预备的东西卖掉了。”父亲几乎是哭着说的。

“卖就卖了吧，顾命要紧，那些东西能帮爹妈济燃眉之急，度过难关，卖了，我也高兴！”我安慰父亲说。

“孩子，能说什么呢！一个曾是堂堂的校长，落得今天连起码的生活都没办法解决！……”母亲没完没了地抱怨父亲。

“什么校长，被撵到厕所里来，……还有什么办法！”父亲向母亲吼着。

吃完饭，我想站起来，可是我的双腿在膝盖处长出一圈疙瘩，疼得很，站不起来了。

父亲吃惊地望着我问：

“这是怎么了，是长的什么东西？”

“可能是骨结核吧！不要紧，爹，给我找两根棍子来。”

“干什么？”

“我要拄着棍子站起来。”

父亲找来两根旧拖把的棍子交给我。

我拄着双拐，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慢慢站了起来。

父亲扶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两条腿打着颤。

“天啊，这可怎么办？怎么办？”父亲心疼地说。

“爹，我只要有口气，就有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不要愁！”我安慰着父亲。

“可是，你病成这样子了！”

“爹，我一点也不怕，你也不要怕！保尔瘫在床上，双目失明，还坚强地活着，活的很有意义。我要向保尔学习！”

“琳，你有这样的信心，那就好啊！”

“爹，我一定会战胜疾病和其他灾难！”

我拄着双拐，父亲搀扶着我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疼得额头流着黄豆粒大的汗珠。

父亲看着我满脸淌着汗水，心疼地说：

“琳，不要走了，歇歇吧！”

“不能歇，越疼越要走，慢慢就好起来了！”我咬紧牙关继续地走。

母亲看着我叹气说：

“我的琳，你原来是多棒的运动员，现在竟病成这个样子，真可怜！”

“妈，我还会康复得像原来一样棒起来的！”

我心灵里有保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保尔像盏明灯照耀着我的前程。

没有钱吃饭，我便告诉父亲：

“爹，我提包里，还带回来几件衣服，都拿去卖了吧，买点米。”

那是结婚时穿的一件淡绿色绸子夹袍，一件深蓝色金丝绒夹袍，还有一件呢子大衣。这些应该作纪念品，留着才是。可是为了三个人活命，非卖不可。

父亲一眼看见我以前在家用过的口琴说：“我把什么都卖光了，只留着这只口琴舍不得卖，一想起你，我就拿起它吹；今天你回来了，就把它也卖了吧！”

父亲提着手提包去破烂市场，晚上，他乐颠颠地回来了。那是值几十元钱的东西，才卖了十几元钱。

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这十几元钱，具有强大的魅力，使全家激动不已。

第三天，是阴历八月初五，是我的生日。

我爱八月，天高气爽，蓝蓝的天，飘动着白云。

这是成熟的黄金季节，瓜果都上了市。

父亲这天破天荒买了一斤面条，一斤豆油，半斤盐，还买了一个香瓜。

“我们的琳，回来了，今天给她好好过个生日。”父亲高兴地说。

我刚刚三十岁出头，年轻轻的却遭到这般苦难。有的生日是在泪水中度过的，有的生日是在狱中捱过的。

自从我回来，父亲变得有生气了。

一夜，父亲对母亲说：

“我打算出去赚点钱。”

“你都六十岁了，能干啥？”

“我去卖烟卷。”

“哪来的本钱？”

“卖琳的衣服还余些钱，少贩点。”

第二天，天还没亮，满天星斗，父亲便穿件破大衣，挎个破篮子，走出我们的小屋，去赶早市，想买点便宜的纸烟。

我病倒躺在炕上，不断地咳嗽着。

母亲瘫在炕上，不住地呻吟着。她瘦骨嶙峋，双颊潮红。

“妈，你哪儿不好受？”我望着妈妈问。

母亲睁开她那双无光的眼，皱着眉说：

“我喘不上气来，两条腿像木头，还疼痛。”

我想，连给妈妈看病的钱都没有，难道看着妈妈等着死吗？心里很难过。

母亲因为有喘病，躺着难受，便倚着破棉絮坐着。贫病交加，她已疲倦了，头耷拉在膝盖上睡着了。

父亲挎着一篮子烟卷，进了屋，忙去做饭。他那布满皱纹的脸，有些兴奋掺着苦涩。我理解父亲，过去是个中学校长，现在要沿街叫卖，他一定有种屈辱感。但为了女儿他情愿。

吃完饭，父亲便叮叮当当用旧木柴，钉个烟架。他一盒一盒把纸烟摆在烟架上了。休息一会儿，他背着烟架走出小屋。

我趴在窗口上望着年迈的父亲，驼着背，背着烟架，沿着那条栽着杨树的大道走去。他边走边叫卖：

“卖烟卷，谁买烟卷？”

这阵阵的叫卖声，像一把刀子割着我的心。

过了几天，父亲又找些旧木头，叮叮当当又钉又锯，做个小推车。

推车上一边放着火柴，一边放着烟架，天天推着车到南城门去卖。

一天，回来对我说：

“琳，我为了多卖点钱，便把推车放在最热闹的南门旁边，可是来来往往走着的人群中常遇到我的学生，唉，他们一定会笑话我：往日的尊严的校长，今天变成了叫卖的小贩！人到了倒运的时候，顾不得面子不面子了！”

有时，父亲多卖了些钱，便给我买几条烂鱼带回来，有时买回些胡萝卜给我做营养。

没有油，我只好埋在火灰里烧着吃。

父亲每天要隔着栅栏从畜牧场里买瓶牛奶和破皮鸡蛋。我早晨便可以吃一碗牛奶和一个鸡蛋了。

深秋了，冷风刮落了树叶，田野里的草也枯黄了，是一片凋零景色，真是：

“芦花碎，红叶堕，水寒人憔悴啊！”

我的两条腿，由于坚强地锻炼，膝盖上的疙瘩消失了。我扔掉双拐，可以走路了。但我身体还很虚弱，还在出冷汗，痰里还带血丝。

有一天，父亲起得很早，他没去卖烟，拿把镰刀到很远的地方去收割他的“雪里蕻”，赶着他借来的毛驴车走了。

这天，刮着大风，把挂着几片枯叶的树刮得摇摇晃晃。

缸里没有水了。父亲那么累，我得分担他肩上的重担，去挑水。

井离我们家很远。我病弱的身子，挑一担水，在狂风里，一步一摇晃，艰难地走了一段漫长的路。

风在呼啸，像匹野兽，横冲直撞，吹乱了我的头发，掀起我的衣襟，几乎把我刮倒。

我气喘吁吁，冒着狂风，两腿发颤，我吃力地往前移动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底走到家门口。推开木板门，把两桶水放在地上，我竟然累倒在地上。我喘息好一阵，才站起来，把两桶水倒进水缸里。

黄昏时候，父亲赶着毛驴车，装着满满的“雪里蕻”回来了。

年迈的父亲，割了一天“雪里蕻”又装车，累得精疲力尽，布满皱纹的脸，淌着汗水，坐在炕沿上喘着气，但很兴奋，笑呵呵地说：

“一春一夏，我没白费力气，咱们的‘雪里蕻’长得真好，嫩嫩的，拿到市场，管保一抢而光。”

我把做好的高粱米粥，盛一碗端给父亲：

“爹，你喝碗热粥，再好好休息休息！”

父亲一边喝着粥，一边兴高采烈地盘算着：

“这车‘雪里蕻’有几百斤，能卖一笔钱，我们买车柴火，买点米，好过冬。”

父亲在希望中躺在被子里睡着了，打着鼾声。

天一亮，天空布满乌云，淅淅沥沥下起雨来。

父亲听到雨声，急忙爬起来。

“爹，下雨了，你还去卖‘雪里蕻’吗？”

“去，不去这车‘雪里蕻’不白割了吗？”

“爹，我看下雨，怕没人上市场啦，你别去啦！”

爹起来伸出头向外面看看，他的脸也像阴天。吃了两口饭，急急忙忙套车上路了。

我从窗口望见父亲披着破麻袋片，坐在车沿上，扬着鞭子，赶着毛驴车在那条大道上走着，在濛濛的细雨中渐渐消失了。

雨，很细很密，草上树上都挂上了雨珠，闪闪发光。

我暗暗祈愿着：

“但愿父亲把‘雪里蕻’卖掉。”

“我看白跑，这天谁还上市！”母亲说。

我盼望雨停下来，可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天快黑了，我趴在窗口盼望父亲。

在濛濛雨中，我看见父亲还是披着破麻袋片，赶着装满‘雪里蕻’的毛驴车，从那条泥泞的大道回来了。

我走下地准备迎接父亲，我打开门。

父亲在雨中待了一天，被雨淋得像落水鸡，麻袋片、衣服、裤脚都滴着雨水。

父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拍着大腿，打着唉声。

“老天爷真不睁眼睛，早不下，晚不下，偏赶今天下雨！”

“爹，快换衣服吧！没卖就没卖吧，愁也没用。”

“我用血汗侍弄了一春一夏，换来的……再说，指望卖点钱买柴买米过冬啊！”

“爹，快换换衣服吧！”

“哪有衣服换，就这一套破衣服！”

“那就吃完饭，脱下来，进被窝吧！”

夜里，父亲不住地叨念着：

“老天爷，明天别再下了，我再去卖卖。”

第二天，果然天晴了，父亲吃完饭，高高兴兴地走出去，可是不大一会儿，满脸愁容进了屋，一屁股坐在地下，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完啦，全完啦！捂了两宿一天的‘雪里蕻’全捂黄了，卖不出去啦！”

父亲是个硬汉子，当中学校长时在日本鬼子统治下和日本鬼子斗；蹲监狱，倒过霉，都没掉过一滴泪。今天，因为一车‘雪里蕻’却哭得这样伤心。因为一家人靠卖了它买柴米过冬。

冬天来了。北方的冬天很冷，刺骨的北风呼啸着，鹅毛般的大雪飘落着。

冷风摇晃着我们的小屋，从门缝、墙缝钻进来。

我们的水缸已经冻上一层冰。

这没有火炉，没有阳光的小屋和外面一样冷。

一家人，老弱病残，挨冻受饿缩成一团。

“爹，我们想法搬搬家吧，在这屋会把我们冻死！”

“我的学生，他对面空着一间房，可是我们不能去住！”

“为什么不能去住？”

“我的学生成份不好，是地主。”

“我们在政治上和他划清界线就行啦。爹，咱们暂时搬去度过这个冬天吧！”

第二天，父亲把那间破房子修理修理，父亲借来一个毛驴车，把家里破烂装在车上，母亲也坐在车上；我们离开了那间厕所。

父亲在地下走着，扬着鞭子赶车。我拖着病弱的身子跟着车走着。

车子下了坡，顺着大道往东走去，走过大道，过了江桥，在江岸下边有一间快倒塌了的破土屋，那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那是残墙断壁的低矮土房，原来住着家贫农。解放了，贫农把学校老师赶出来，他们住进了去。这房子除了被撵出家的地主，没人肯住。

中间是厨房，后墙倒了一半露着天。我们的一间小屋，窗子很小，墙有些歪斜。父亲用几根木桩支撑着。我有些担心，不知哪天墙倒下来，我们全家就会被活埋在里边。

母亲睡在炕头，我睡在炕尾。

我的淋巴结核没有好，仍在溃烂流脓；我的肺病也没有好，天天咳嗽，出冷汗，痰里仍带着血。

贫穷、疾病像两座大山，压着我们一家人。没有钱买米买柴，严冬怎么过？我忽然想起在佳木斯公安局还存有我和陈致远的东西，便和父亲商量：

“爹，你想法去趟佳木斯，把我存在公安局的东西取出来，卖掉，我们好度过冬天的难关。只是没有路费，借贷无门。”

夜里，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商量：

“这路费就得你拿了。”

“我哪来的钱？”

“你不是有个镀金的发箍吗？”

“那不是我们结婚时，你送我的纪念品吗？”

“我知道，可是我们在饥寒交迫时，也顾不得那些了。”

母亲什么也没说，找出她唯一的财产镀金发箍。

夜已很深了，父亲弯着腰低着头，在一盏暗淡的油灯下，专心一意的用刀刃刮着发箍上的那层薄薄的镀金，金沫飞下来，父亲小心翼翼的不叫失掉一点点。

夜静静的，窗外刮着寒冷的朔风，发出凄厉的呼啸声，我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第二天，父亲便把金沫子拿出去求人换了一点钱。

母亲坐在炕上，拿着刮掉镀金的银发箍子，打着唉声，流着眼泪。

“妈，你不要难过，等以后日子好了，我给你买个纯金发箍。”

“傻孩子，咱们还有什么好日子！”

“有，会有的！”

父亲用碎金沫换来的钱乘火车去佳木斯了。

我躺在炕上，捧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这本书我读过，现在不是在读书，是从保尔的书中吸取力量，学习他坚强地活下去的精神。

保尔是我的精神支柱。靠他鼓舞战胜疾病。好像他在说：

“战胜疾病是英雄，被疾病战败是狗熊！”

我想，我需要加强锻炼。于是到了黄昏我便走出门去，在院子里，开始走步。

一二一，一二一……

我的额上出了汗，身上也出了汗。

心想：

“不能倒下，倒下就是死亡。”

“要扬起你的风帆，向前航行！”

每天，我都走出小屋，在院子里锻炼。

夜晚，圆圆的月亮悬在天空，洒下一片淡淡的银光。

洒在这破落的院子里，洒在那光秃秃的老树上，也洒在我苍白的脸上。我踏着月光走着步，喊着：

一二一，一二一，向前走！

一二一，一二一，向前走！

我在和病魔搏斗，我在和不幸的命运搏斗。

地下是我孤零的影子。

响着我孤独的脚步声。

我从院子这边走向那边，又从那边走向这边。

夜是这般宁静，我的思绪却不宁静，我在望、在憧憬。我想：总会有一天，我健康起来，回到革命队伍去。

父亲去佳木斯，我和母亲在家里等着。

终于，一天，父亲带着满身风尘，满脸疲倦回来了。但父亲很高兴，笑了笑说：

“东西卖了，还留下几件。”

“卖了多少钱？”

“去了路费、宿费和吃饭钱，余下二百元。”

“好呀，二百元够我们三个人一年用的了。”

我给父亲端碗高粱米粥，父亲一边喝着粥一边说：

“等我吃完饭，再把钱给你，我放在里边裤兜里了。”

“爹，你到矿里看见陈致远了吗？”我急着问。

“没有，我去矿上两次，还给他买了猪头肉和烧饼，都没找到他，也许他回去了！”

父亲有点内疚地继续说：

“琳，爹对不起你，爹老了没用了！”

“没看见算了，他总会出来的，我等着他！”

“爹把你们的东西卖了，心里也不好受，特别是把陈致远的一套料子西服卖了，那套料子服很好，很值钱，也叫老岳父给卖了。”

“陈致远知道为了我们活下去，卖了他不会生气！”

我心里可惜的是我珍藏的书当废纸卖了。那几套世界名著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可我没说出口来。

父亲吃完饭，上炕掏他藏在裤兜里的钱。他用一只手掏着，摸来摸去，掏不着钱。他脸色变得苍白，两眼出现了暗影，两只手还在不停地摸掏，还是没掏着钱，急得满脸是汗，自言自语着：

“我怕丢了，放在里边裤兜里，怎么不见了？”

“爹，别着急！丢不了，慢慢找吧！”

父亲又在裤兜里摸来摸去，还是摸不着。便一屁股坐在炕上，用力打着自己的嘴巴：

“我该死啊，怎么把二百元钱丢了！”

接着他哇的一声哭了。

“爹，丢就丢了吧，哭也没用。”

“琳，你不怪爹吗，那是卖你们东西的钱啊！”

“爹，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是你的女儿啊。”

“可那是咱们买米、买柴过冬的钱啊，丢了，怎么过冬啊！”

“爹，天无绝人之路，再想办法吧！”

父亲把棉裤脱下来，两只发颤的手，把衬裤抖着，抖着……

突然，从衬裤腿里掉出来一捆钱。

父亲眼泪还没干的脸一下子笑了。

“找到了，没有丢啊！”父亲拿着钱笑得像个孩子。

“你老糊涂了，根本你没揣进裤兜里，幸好你的棉裤腿扎着，不然也掉了。”母亲说。

父亲把钱数了数，二百元，交给我。我说：

“放进箱子里吧！买车柴，再买点米，够咱三人生活一年的了。”

父亲给我五元钱，叫我去看病。

我坐在医院走廊里的长椅上，一个病人家属看了看我说：

“姑娘，你的淋巴结核很重。这病重了一样死人啊，我的女儿就是这病死的！”

我听了后，心情很沉重，我还年轻，刚过三十岁；我还要写作。就这么离开人间，心不甘。

从医院回来，在南门书摊上，我一眼便看见我的《安荻和马华》。

“这本书多少钱？”我问。

“一元五。”

“五角钱卖了吧！”

卖书的矮个老头说：

“你再读这个作者的书，不可能了，她已经死去了，五角钱不卖，少一分钱也不卖！”

“她没死，还活着。”我说。

“都说她死了，你怎么知道她还活着？”

“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是我儿子校长的女儿写的，你是谁？”

“我是一中校长田化南的女儿田琳。”

“对，儿子的校长叫田化南，他的女儿叫田琳。你没死就好啊，五毛钱卖给你了！”老头高兴地向我笑着说。

我的《安荻和马华》和我的命运一样，她诞生在我蹲日本宪兵队牢房的日子里。

出版不久，就被查禁了。我出狱后，我到处找，想买，可是怎么也没买到。

今天，在书摊上偶然买到了，多高兴呀！一个作者失掉了自己的作品，像丢失了自己的孩子一样痛苦。今天买回这本书，也像找回丢失的孩子一样高兴、激动。

我和年迈的父亲母亲三个人，在那间快倒塌的小泥土屋，伴着贫穷、疾病度过了漫长的风雪迷漫的严寒的冬天。

我渴望着春天，但北方的春天姗姗来迟。

四月，春天的脚步才悄悄来到这里。

天空不像冬天那样苍灰，有些蓝意。

冰雪在融化，江面的冰层在颤动，道路泥泞。冬天终于过去了。

我家门前，从来没有人探访，冷冷落落。突然，有人敲门，父亲有些惊慌，担心祸从天降，皱着眉，战战兢兢地去开门。

一个穿军装的警卫员，在他稚气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看了看我父亲问：

“这是老田家吗？”

“是，你找谁？”

“我找田化南。”

“我就是，你找我干什么？”

“你认识王梓穆主席吗？”

“他是我的学生。”

“他来看你。”

父亲那张惊慌严肃的脸立刻满面笑容问：

“在哪儿？”

“他的小汽车在门外。”

“赶快把他请进来！”父亲边说着边跟了出去。

不大一会儿，一个高干模样的人，高个子长脸，一双锐利的眼睛，五十多岁，拄着拐棍，一瘸一拐走了进来。他歪着头，眯着眼，仔细地瞧着我父亲说：

“田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你的旧体诗写的很好！”

“那还不是田老师教的吗！这回还要向老师学旧体诗呢！”

师生俩说着笑着。

这低矮、阴暗、快塌了的小屋，第一次迎来了客人，第一次充满笑声。

我们家太穷，没有炉子，没有水壶，想烧开水也没办法，只好给王主席从锅里盛一碗高粱米汤。王主席没有喝，向四周看了看，说：

“老师，你怎么住这破房子？”

“我的房子叫贫农住了，把我撵到公共厕所，那里冬天会冻死人，才搬到这里来了。”

“他们做的不对，你是教师，不该占你的房子。”

父亲打了个唉声，没有说什么。

王主席看看瘫在炕上的病母亲，问：

“师母怎么瘫了？”

他又看看我，问：

“师妹怎么躺着？病了吗？”

“她参加了革命，一个错案在监牢里蹲了一年半，得了淋巴腺结核和肺结核。”

“你们怎么生活？”

“卖书，卖东西，全卖光了，才卖烟卷。”

“这不合政策，你是教师，应该给你工作。老师，明天我用小汽车来接你，我们师生好好唠一唠。”

“好吗？你是主席，我是老百姓啊。”

“你是我的老师，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老师，什么时候我也是你的学生。”

“你的腿怎么了？”父亲看他瘸了的腿问。

“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这是一条假腿。”

谈了一阵子，王主席一瘸一拐地走了。

第二天，父亲穿件破大衣，被王主席用小汽车接走了。

傍晚，父亲被王主席用小汽车送了回来。

父亲变了。我几乎认不出来了，穿了一件新皮大衣，他那饱经风霜的忧郁的老脸，变成满面喜悦和微笑。

警卫员扛进来一麻袋高粱米，走了。

“这回饿不着了。”父亲说。然后又一件一件拿给我和母亲看。

“看，这是王主席送给我的一副老花镜。”

“这是王主席送给我的一条前门烟。”

“这是五十元人民币。”

父亲，戴上了花镜，抽着前门烟，拿着五十元人民币，乐呵呵地说：

“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呢！”

“什么好事？”

“我也要参加革命了，王主席给我安排了工作，我再也不用到街上叫卖了。我到图书馆整理古籍。”

然后看了看小破屋又说：

“王主席要给我找个好房子，再不用担心破房子把我们活埋了！”

父亲真是时来运转。他感到骄傲、自豪地说：

“还是当老师好，我的桃李满天下。王梓穆主席是我的学生，于天放主席也是我的学生。”

夜是这般宁静，但我们的小屋不宁静。我们够幸运，被党的关怀激动得难以入睡。

冰河解冻了。我们生活上的冰河也解冻了。

我们从那间快倒塌的小泥屋搬出来，搬进有阳光的三间砖房。

绿色铺满了大地，榆树长出树叶，金黄色的蒲公英花像星星挂在草丛中。

我身上的结核菌开始活动，又咳嗽，又出盗汗。

我思考着，病魔向我进攻，我得向病魔反击。

怎么办？没有钱医治，我走出去，让阳光氧气杀死结核菌。我决定出去劳动，种菜。

我便扛着铁锹带着病弱的身子，摇摇晃晃走了出去。

院子里，没有黑土地，全是石子、砖头瓦块……

我弯着身子，伸出两只瘦手，将石子、砖头、瓦块，一块一块拾起扔出去，直到把那块地收拾干净。

很吃力，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滴一滴地流着汗水。

啊！好新鲜的空气，甜丝丝的。

阳光暖烘烘的，照在我病弱的身子上，照在我苍白的脸上。

大地散发着芳香的泥土味。

晚上，我躺在炕上，浑身疼痛。

“你有病，不能和命争。”妈妈说。

“不，我一定和病魔争个高低，我不能叫它打倒我，我要打倒它！”

第二天，我仍然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铁锹走出屋。

我用两只瘦手紧握着铁锹，一只无力的脚踏在铁锹上，使尽全身力气往下踩！但那铁锹在硬硬的地皮上晃动，不往里进。我用很大的力往下踩，好一阵子才进去一寸深，累得汗流浃背，大口大口喘着气。

我呆在地上，两眼望着那一寸深的土层，并没泄气。心想，愚公能移山，我总会有一天挖好这块地。

中午了，我扛着铁锹回家吃午饭，一头扎在炕上起不来了。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响，手拿个包米面大饼子，大口大口吃着，吃着吃着睡着了。

吃的香，睡的也香。醒来，母亲心疼地劝我：

“琳，你忘了你有病，看累成什么样子了！”

“妈，你错了，你没看见我吃的多了，睡的也香？”

母亲知道我的犟脾气，十头老牛拉不动，便任我去了。

不知我挖了多少天，不知我流了多少汗，到底挖好了那块地，种上了菠菜和西红柿。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干劲更足了，我挖好一块，再挖一块……

整天劳动在大地上，天天晒太阳，天天呼吸新鲜空气，我的结核病退却了，两条腿不再发软了，两只手不再发颤了。

种子播下地，我盼望下雨。

这天是谷雨。天空聚集着乌云，不时在闪电，远处响着低沉的雷声，一刹那下了雨。

我没有雨衣、雨鞋，光着脚冒着雨跑到地里，急急忙忙把包米、豆角籽埋进土里。

雨浇湿了我的头发和衣衫，浇得像似落汤鸡，但我却很兴奋，种子播下就会发芽、结果。有耕耘就一定会有收获。

我种完包米、豆角，又到另一块地种土豆。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飘着晶莹透亮的朵朵白云。

我穿了件黑呢子上衣，蓝色土布裤，头戴一块蓝纱巾，光着脚，挽着裤腿，乐孜孜地吹着口哨，去把未种完的土豆种子埋在土里。

突然，我听到喊声：

“田琳，田琳！”

在这荒野里，谁在喊我？我抬起头四下寻找，啊！我看见了，那瘦长个子，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朝我走来。

我认出来了，是王梓穆主席。

我望着他，心里热乎乎的，不一会他走到我的身边。

“王主席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到你家看你，师母说你在种土豆，我就来了。”

“谢谢主席，你腿脚不便，还在野地里行走，我真过意不去！”

“有什么过意不去，你是师妹，我就应该关心你！你是留学生又会写文章，又会种地，文武兼全，真了不起！”

“王主席，我不是种地，我是和我的结核病战斗啊！”

“看来你好多了。”

“我到底战胜了病魔。”

“全好了吗？”

“没有，还有时咳嗽，痰里还带点血，但好多了，再好些，我就会回到革命队伍中去了。”

“师妹，我真对不起你。我事情忙，照顾你不周到，你早就该免费到医务所治疗。明天我给你开个条子，去医务所治病吧！”

和王主席谈了一会，他又一瘸一拐走向大道，望着他拄着拐棍的背影，我心里有一股暖流在流淌。

大道上停着一辆小汽车，王主席过了野地奔向大道进了小汽车，走了。

经过艰苦地锻炼，又到医务所治疗，淋巴结核、肺结核从我身上全线退却了。

我带着激动的喜悦，要回到革命队伍中去了。

齐齐哈尔一中，请我任教。

八月，天空万里无云，太阳明亮而温暖。盛夏过去了，浓茂的树林，开始黄了叶。

秋风吹刮着黄叶飘落，一片肃杀秋色。

我等待陈致远从矿山回来团聚。

有多少话要对他说，有多少情要向他倾诉啊！

但是事与愿违，他竟来了一封要求离婚的信。

信上写着：我已斗争了两个月。今天，组织又找我谈话，问我为何还不同意和你离婚，我只好同意了……

……

在结婚时，他还向我发誓：“我不能像田瑯那样抛弃你。不管遇到什么风浪，我都和你在一起，白头到老。”

我们刚刚结婚一年多，就要离婚了。

这是梦吗？这不是梦，是残酷的现实。

这封信，像晴天霹雳一样，我被击昏倒。我清醒过来时，觉得一切都完了，我哭得全身抽搐，不住地喊着：

“怎么办？怎么办啊！”

父亲看见他的小女儿，遭到这般不幸，也流下泪来，向我说：

“琳！和爹妈一起过吧！”

我哭成了泪人了，我想：

“难道真的，夫妻只是同林鸟，灾难来时，各自飞东西吗？”

这悲惨的命运，使我要疯了，我一会儿跑到外面，一会儿跑进屋里，脸上流着泪，嘴里喊着：

“怎么办？怎么办啊！”

父亲对陈致远要求离婚的事，很是气愤，对我说：

“琳，陈致远这人，不值得你为他痛苦。你还年轻，有比爱情更重要的写作事业呢！”

父亲的话，使我冷静下来，我清醒了一些，心想：“跌倒了要爬起来，再走，往前走！”

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一天，我心一横，擦干眼泪，到齐齐哈尔一中上班。我很兴奋，又回到革命队伍中了。

我开始人民教师的生活。学生都是十五、六，十七、八，朝气蓬勃，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

我理智了一些，控制住哀伤。

我愿把我的一切献给这崇高的灵魂工程师的事业。

我很穷，我原工资一百二十元，这里只给我三十元，还要交家十元，余下的二十元，除了伙食费，还要给母亲买点营养品和零花钱。

我没有钱买穿的，一双鞋，一条裤子，一件衬衫。洗了没有换的，只好等星期日才洗，洗了就躺在被窝里等着它干了才能起来。

我虽独身一人，形单影只，但我像一团火在燃烧。

从天亮到夜深我都埋头工作，把悲哀埋在心底。每到深夜，想起薄情郎陈致远，带着受伤的心，忆起甜蜜的初恋，忆起最后的一吻，常常泪湿衣裳睡去。

贫穷和被遗弃的痛苦，都压不倒我，我像一匹烈马奔腾向前，把一颗赤心献给党。

可是我却遇到政治上的冷遇。

呼风老师开评工资会回来，她和我说：

“在会上我说你教课很出色，应该给你提四级工资。可是丛教导主任说：田琳是什么人？她是挂着的干部，你和她站在一边？不能提四级，给她提两级就不错了。”

“她是什么人？她是挂着的干部。”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插进我的心脏，在疼痛，在流血，使我难以忍受。

一个革命干部被挂起来，是什么滋味？

我想起山峡花，她离开泥土，离开水，挂在树上，但也在活，也在开小蓝花儿。我想我虽挂起来，我也要“开花”……

我是个作家，可是把我埋在冰层下，分配我教一年级语文。

政治上的误解和冷遇，使我常常流下眼泪。心头笼罩着一层浓浓的迷雾。

教育厅要来观摩教学，起初教导主任决定观摩呼风老师的教学。

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教育厅的督学却来到我的教室，听了我一堂课。

下课时，教育厅的督学笑吟吟地向我伸出一只手紧握着，说：

“我叫马天启，你是不是但娣？”

“是我。”

“你是有名的作家，怎么在这教一年级课？我是田瑯的中学同学。”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的朗读课教的很好，我要组织全省中学语文教师来观摩你的朗读课。你这颗珍珠被埋没了！”

“你过奖了，我只是想做一只萤火虫，能发一点光便满足了。”

“不行，你这颗珍珠，我要把它挖出来让她发出灿烂的光！”

临走时，他说：“你等着吧！发光的时候将会来到。”

过了一星期，果然全省语文教师都来听我的语文课。

过了一个月，果然教育厅来了调令。

校长通知我：

“田老师祝贺你，你被调到教育厅任督学。”

十月，我走进了省政府文教厅的中教科。我被委任为语文督学兼中教科秘书。

这个挂着的干部，却被重用。我十分感激！热情燃烧，凡是我遇到的，不论分内分外的工作我都抢着干。

有一次我跑步十多里，代表文教厅去迎接从南方请来的教师。

修飞机场我也抢着报名，我和男同志一起打夯。

刚刚来厅一星期，高衡厅长就领我出差做他的秘书。

高衡厅长很年轻，刚刚三十二岁，就担任这么高的职务。他高高的个子，思维敏捷，感情火热，很有魄力，一双热情智慧的眼睛，刚毅的下巴，是个有相当威望的首长。

那是十月，我们一行三人，除我外还有小韩，乘上去北安的火车硬席车。车厢里我和小韩坐在一面，高衡厅长坐在相邻的另一面。

忽然，车厢里播送《白毛女》歌曲。

高衡厅长静静地听着，他的感情融化在白毛女的命运中。他那双炽热的眼睛，蒙上了一片浓重的哀伤，听着听着竟流下泪来，那是同情之泪。

音乐停了，高衡厅长好久才转变过精神来，面向我们说：

“闲着也是闲着，来，我们来玩扑克！”

“我不会。”我摇着头说。

“还不会打扑克？我不信！”他吃惊地说。

“真不会呢？”

“来！不会我教你！”

我再也不好意思推辞了，于是我和小韩都坐到他对面座位上。

他耐心地教我，什么样花色叫什么名字，什么牌，管什么，怎么打。

一边打，一边说：

“田琳，听说你很有才，文章写得很好，不过一个人，生活要多样化，什么都应该会。工作学习外，也要好好娱乐，你连打扑克都不会，我给你补上这一课。”

我第一次学会了打扑克。

我们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打了几个小时的扑克。

火车鸣着汽笛，到了北安。

北安是祖国北部的城市。

在十月，“唯有北风号怒天上来，”刮得树枝已落叶，田地已荒芜了。

我们乘车到了农学院。

我和小韩共住一个房间，高厅长住在我们对面的房间。

一早，高厅长告诉我们：

“和我一起吃饭！”

“不，我俩去大灶吃！”我和小韩说。

“要和我一块吃，这是命令！违反我的命令我会生气！”他严肃地说。

我们怎敢违反高衡厅长的命令，只好和他一起吃，很拘谨，谁也不肯多吃菜。

“客气什么？革命队伍还客气！”高衡厅长不住地给我们挟菜。

这里出了什么事，空气很紧张。

高衡厅长和农学院长谈了一整天。

夜已深了，风也小了。

一片淡淡的月光洒在这静谧的院落。

一切都进入梦乡。

只有高衡厅长的窗子还亮着灯光，我担心高厅长睡的太晚影响他的健康，轻轻地走向他的窗下。我听见他和院长在谈话。

“我不同意你把学生打成反革命！”高厅长的声音。

“在地下写毛主席的名字，还不是反革命。”农学院的院长说。

“在地下写个‘毛主席’便打成反革命？”高衡厅长说。

“我怕给我扣上右倾的帽子！”

“你就不怕给学生打成反革命！要实事求是。你怕，我不怕，我负责！”高厅长的声音。

我敬佩这位年轻的厅长，他不用左倾路线鞋鞭子抽人。这样的领导，我第一次遇到。

我不便再听下去，悄悄离去。

第二天，农学院的气氛缓和了。

冬天，东北的大地、房屋、树林，已被大雪覆盖，白茫茫一片。

我又一次和高衡厅长出差，这次一行四人，有中教科长杨国权、小韩和我。

我们是从齐齐哈尔经过北安去萌芽学校。

我们乘一辆汽车，在白茫茫的雪原上奔驰着……

天空灰暗，冷风卷着鹅毛大雪飘落着。

高衡厅长兴奋地向司机说：

“司机同志，咱俩换换位置，让我开开车！”

高衡厅长生气勃勃，两只手握着方向盘旋转着。

汽车在奔驰，高衡厅长高兴地哼起歌来。

汽车在冰雪的大道上，爬过一个坡又一个坡……

走了很长一段路，高衡厅长才把方向盘让给司机，高兴地说：

“开车真有意思！”

汽车仍在那条冰雪大道上前进……

傍晚，天晴了，雪也停了。

突然，汽车出了故障停了下来。司机下了车，高衡厅长也下了车帮助司机修理。

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

月亮升起来了，月光洒在雪原上，闪着银色寒光。

“你们下车，跑跑步，暖和暖和。”高厅长亲切地向车内的我们喊着。

我们都下了车，在雪道上跑着。

冻僵了的脚暖和了，身子也暖和了。

跑一会儿停一会儿，停一会儿再跑一会儿，跑跑停停，停停跑跑……

夜深了。

“看来，咱们得在老乡家过夜了。”高衡厅长向杨国权科长说。

我们便向远处一个村子走去，敲开老乡家的门。

开门的是一个老农，把我们让进屋。

高衡厅长命令我们进屋睡。他和杨科长睡在厨房草堆上。

第二天，汽车修理好了，我们又向萌芽学校奔驰。

这里是茫茫的雪原，没有村庄，连棵树也没有，萌芽学校孤零零地座落在这无垠的雪原上。

车子在萌芽学校门前停下来。

一轮红日升上来，阳光把雪原照得耀眼。

那里的学生穿着黑棉袄、黑棉裤，戴着狗皮帽子。高衡厅长向我介绍说：

“这都是些小牛倌、小羊倌、小马倌，还有童养媳。”

说着说着梁军走来了，高衡厅长高兴地说：

“这个童养媳，是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你将来会载入史册，多光荣！”

“这是高厅长给予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傍晚，在院子里举行了庆丰收会。

在雪地上，燃起一堆篝火。

院中间堆放着丰收果实，玉米棒子、葵花籽、高粱穗……

响起一片锣鼓声。

咚咚咚，铮铮铮……

学生们围着丰收果实，跳着东北大秧歌。

一片欢腾声在上空回荡……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庆丰收会。

次日早晨，我们从萌芽学校回到省教育厅。

一九五〇年，镇反运动开始了。

我十分担心我这一叶扁舟又可能遭到十二级台风的袭击。

在教育厅的大会议室里，充满了森严的气氛。

我被许多人围着，一只只带着仇恨、憎恶、冷酷的眼光看着我，突然向我开炮了：

“坐在我们这里的，就有日本特务！”

我的心一下沉入海底，有些窒息。

我在大家的逼迫下，讲我的历史。

高衡厅长站在窗前，他的热情的双眼变得冰冷如霜。

中国颠倒的事情太多了。

我委屈得想哭，但我咬着嘴唇忍着，可我忍不住，到底眼泪流下来，从脸上簌簌淌滴。

高衡厅长仍严肃地站在窗前。

难道高厅长也把我当成日本特务？

我痛苦得不想活。

从会上回来，我躺在床上痛哭。

我沉浸在苦难中，饭也不想吃，觉也不想睡，一个劲地流着眼泪。

“不要哭了，党是实事求是的！”单素痕劝我。

“吃点面条吧，不吃怎么行？”单素痕端碗面条来劝我吃。

“素痕，你离开我远点吧。”

“为什么？”

“怕瓜连你！”我拉着她的手哭得更厉害了。

夜间，我睡不着觉，忆起那些眼睛，仇恨、憎恶的眼睛。

忆起高衡厅长那冷如冰霜的眼睛，我想活着不如死了好，我走出门去。

“你上哪儿去，不睡觉？”跟在后边的是小韩。

“睡不着啊！”

“睡不着，也得睡，不睡觉身体会垮下来。”

小韩把我从外边拽了回来。

我有些怀疑，仿佛都在监视着我。这不成了没有铁窗的监狱了吗？

一天，传来一个消息：

“市一中的呼风被捕了，她是反革命！”

这消息如一颗炮弹击中了我。我想在一中时我和呼风形影不离，一块吃饭，一块留在教研室里备课，睡在一间房子里。她被逮捕，我也会被逮捕。

我每天便往身上加穿裤子，穿了一条又一条，等待进监狱。

最使我难过的是高衡厅长那冷如冰霜的眼睛。

啊！我无法解释我的不幸，我茫然地思索着：

我刚刚三十多岁，我还有美好的理想，我还要创作……难道我就这样完结了。想着想着眼泪又淌了出来，一行一行在脸上流着……

我在痛苦中等待，等待着铁铐。我在等待，等待着推进囚车，我在等待着把我关进铁牢。

可怜的我在痛苦中，憔悴、消瘦了，

一天，揭示板上写着：

“田琳到公安局来！”

这几个字像把刀子插进我的心脏，我非常痛苦，非常恐惧！

“不去，我就不去！”

我擦掉了那几个讨厌的字。

擦掉了又写了出来：

“田琳马上到公安局来！”

这条通知激怒了我。

“我犯了什么罪？”

不知道为了什么我来了勇气。

“去就去！我无罪怕啥！”

我来到公安局，刚进办公室，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年轻人就站了起来，笑着对我说：

“田老师来了！”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逮捕呼风时，把田老师的笔记本也收来了（我调到教育厅，有些东西还放在一中）。”然后他从一个角落里，拿出一摞我的笔记本，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本，有我自己的日记本。

我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日记上写了些什么，一上纲就了不得。

回来我翻阅了我的日记本，全是想争取入党努力工作的记录。

这些日记本，镇反办公室也检查了。

我在忧虑中度过。

终于，镇反运动结束了。高衡厅长找我谈话。我一进屋，他双手紧握着我的双手说：

“田琳同志，你的问题，我慎重分析过，我对党负责，不放过一个敌人；我也对人民负责，不冤枉一个好人。你不是特务，你被误解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竟哭了起来。

“你怎么哭了？”

“我参加革命，领导都用左倾路线鞭子抽打我，只有您没有那样打我。”

高衡厅长松开两手，接着说：

“田琳同志，你很不幸，政治上不幸，生活上也不幸。我还了解你，你的政治热情很高，工作也认真，也有才华，别泄气，好好干吧！”

他的一席话使我深深感到希望在召唤着我。

党的阳光照耀着我。

回到宿舍，几个女同志围着我，单素痕对我说：“高衡厅长在运动中，给我的任务：照顾田琳吃饭睡觉！”

小韩也和我说：“高衡厅长给我的任务，保卫田琳的生命，避免她寻短见！”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你要谢，就谢高厅长，就谢党吧！”

“是啊，我爱党，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我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党！”

一九五一年十月，高衡厅长找我谈话，他调我到萌芽学校。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夜已深了，年轻的汪泽滨同志来到我的宿舍。我正在捆行李。

他一把拽开我的行李，说：

“不去，你不能去！”

“为什么？”

“那里是一片荒野，你到那里连个对象都找不到！”

“找不到！找不到！我不找！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汪泽滨小我几岁，像个弟弟，关心地问我：

“你真的去定了？”

“去定了！”

“我知道我劝不住你，不过我相信，你还会被调回来！”他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本书说：

“人走了，我没什么送你，送你一本书吧！”

是马克思论文艺，我珍惜地收了起来。

临出发前，高衡厅长又找我谈话。

我坐在他的对面，他语重心长地说：

“萌芽学校是一座新型的学校，你读过《教育诗篇》没有？那是苏联把流浪儿、小偷集中起来办的一座学校。这些孩子在这学校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成长起来。这是一座有意义的学校。萌芽学校是把孤儿、牛倌、羊倌、猪倌、童养媳集中起来，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给农村培养乡村教师。”

说完，他似有所思地望着我，说：

“我担心两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那里很艰苦，又冷又荒凉，你不怕吗？”

“我不怕！”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婚姻问题，那里是一片荒野，你怎么找对象？”

“有就找，没有就不找，独身一辈子没问题。”

“你是人，也需要爱情，需要丈夫和家庭！”

他走来走去，停了一会儿才说：

“这样吧，你先去，写一部教育诗篇吧。婚姻问题，我们在这里帮你找。”

说完紧紧握握手，说：

“一切保重吧！”

就这样我告别了教育厅。

十月一过，北方已进入深秋。

凄凉的秋风把树上的枯叶吹得簌簌飘落，只有几片枯叶颤颤抖抖不肯离开故枝。草也枯黄了，大地裸露着一片黄土。

大雁往南飞。

我这只孤雁却向北飞了。

到了北安萌芽学校招持所，一位二十几岁年轻的教导主任来接我。他白里透红的圆脸，一对笑眼，总在谦虚和蔼地笑着。他对我说：

“田老师，这几天连绵阴雨，道路泥泞，汽车不能走，等几天再走吧。”

“开学了吗？”

“开学了。”

“不能等，不能耽搁学生的课。”

“不等，怎么走？从北安到萌芽学校是八十多里路呀，而且你得在泥泞的路上跋涉！”

我什么也没考虑，只考虑不能耽误学生的课。

“八十多里路算什么？红军不是走两万五千里吗？”

“那是敌人逼出来的！”

“可是学生的课也不能耽误啊。”我说。

他沉思了一会问：

“田老师，你会骑马吗？”

一提骑马，我忆起儿时骑马险些摔死的事，便摇着头说：

“我不会骑马。”

“我带你骑，我们俩骑一匹马。”

“不行，不行，我害怕骑马。”

“那怎么办？”

“有什么怎么办？开11号车用两条腿走吧！”

“你走得动吗？”

“走得动！”

因为我坚决要走，第二天，吃完早饭，便出发了。

刚走出城门，年轻的主任，笑了笑说：

“田老师坐下来，休息休息，再吃点东西。”

我们俩在一棵大树下，坐下来，一边吃东西，年轻教导主任一边给我讲故事。讲了一个还要讲，我看出他的鬼主意，说：

“你耍什么花招？上路吧！”

“要我看，还是回去吧，路远着呢。别说你，我都没走过八十多里路啊！”

他思考了一会儿，用狡猾的眼睛看了看我，说：

“再不，我骑马，你走。”

“你骑马，我跟得上吗？”

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说：

“跟不上，我看还是回去吧！”

“你别打回去的主意。”

他只好领着我走。

那是一片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辽阔无边……

我们在泥泞的路上跋涉。

走着走着，我的两条腿跟不上他了，只好跟在他后面小跑；跑着跑着，跑不动了，喘着气，大汗淋漓。

他回过头来看了看我，笑着问：

“田老师累了吧？”

“不累。”

“我们走出四十里路了，连我都累了，你不累？我不信，你在说谎！”

他露出两颗小虎牙嘻嘻地笑着，说：

“休息，休息吧，咱们该吃午饭了！”

我们便到道旁小饭店去吃午饭。年轻的教导主任笑着说：

“我也是第一次徒步赶路啊，我每次出门，不是坐汽车，就是骑马！”

他用一双炽热的眼睛凝视着我，又说：

“田老师，我也该认你老师了。”

“你是教导主任，我是你的下属，认我什么老师？”

“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可贵的东西！”

“我有什么可贵的东西？”

“有。原来，你成了作家，就是靠着你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啊！我也很爱文学，可是我写不成就泄了气，就不再写了。以后我得向你学习！”

吃完午饭，我们又开始在泥泞的路上跋涉了。

从黎明上路走到夕阳西下。这时遥望远方，只见山抹微云，天连衰草，景色壮丽极了。

我们从北安走到德都，又从德都走了十八里路才到了萌芽学校。

传来了轰隆轰隆的拖拉机声。

我看见梁军坐在拖拉机上，开着收割机在大田里奔驰。

我已经十分累了，两条腿像灌满了铅似的，但我非常高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徒步走八十多里路的路程。终于战胜了困难，我有着胜利者的喜悦。

我到了萌芽学校，校长是个瘦瘦的中等个，四十多岁。他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我手说：

“欢迎你来！”

他把我领进女教师宿舍。

这是一间土房，但墙壁粉刷得雪白，拾掇得窗明几净。

宿舍里住着一位年轻的生物女教师，她正在培养一批昆虫。

她健壮开朗，自我介绍说：

“我叫曲竞男，你一听我的名字就知道我的性格，我要和男人比高低。”

她直率，泼辣，刚见面，就把她失恋的事告诉我。她很乐观，幽默地说：

“找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找两条腿的男人有的是！”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秋天，就是漫长的冬天。

这里是一片旷野，除了这座学校，什么也没有，没有村庄，没有合作社，更没有电影院。

死一般寂静，沉闷、空漠。

连乌鸦也不到这里来。只有狼，一到晚上，有成群的狼在嚎叫……

我们的任务很神圣：把这些小猪倌、小羊倌、小马倌、流浪儿、童养媳培养成乡村教师。

我们在用青春和生命谱写着教育诗篇。

一九五二年，左倾路线的狂风刮到这草原。

萌芽学校进驻一个领导班子，批判萌芽学校的教育思想是陶行知的唯心主义的产物。

我和曲竞男联名给高衡厅长（他是创建学校并任这校的校长）写了封信，请他考虑人们这样搞是否对头，他是否将检讨。

高衡厅长回了封信。

“萌芽学校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学校，是一块金子，不是狗屎，我坚决不检讨。”

这个学校在左倾路线的狂风下被砍掉了。

学校搬到克山，改成师范学校。

第七章 再 婚

半年前汪泽滨给我介绍个对象，叫周煌威。我因为争取入党，一直把见面的日子拖到寒假。

在这隆冬季节，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我乘火车从克山来到齐齐哈尔。

一下火车，周煌威来接我。我上下打量着他，白净的圆脸，大眼睛，小嘴，鹰钩鼻子。一种不愉快的情感向我压来。

他送我进了旅馆。我心里厌烦，脸上也表现出来。他敏感到了，坐在椅子上很尴尬,皱眉抽着烟，坐了一阵只好失望地走了。

第二天，我和介绍人说：

“不行，明天我要回克山。”

汪泽滨劝我说：

“周老师是个好同志，品质好，性格好，聪明，教学能力很强，能和他结婚是幸福的事。”

“再好，我不爱；谁劝也不行！”

第二天我便回克山了。

许多同志纷纷来信劝说。越劝，我心越烦，我一一回信拒绝了。

半年过去了，我接到周煌威的一封信：

“我们没见面，通了半年信，在我这方面建立了感情，但你不同意。我虽然爱你，也非常痛苦，可是我不愿意把我的幸福建立在你的痛苦上，我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幸福给你。我尊重你的意愿。”

这封信，把我冰冻的心融化了，竟回了他一封信，断了线的信又接上了。

一九五三年来了调令，调我回齐齐哈尔。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周煌威。我向他提出黄了这门婚事，可是周煌威流下眼泪。男人有泪不轻弹，他竟流出泪来。

周煌威的学校给我们预备了新房。

我痛苦地想：

“这不是逼婚吗？”

结婚日期公布了，礼物送来了，新房布置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我被迫和周煌威结了婚。

洞房花烛夜，我很不愉快。

我任性地撕下墙上贴着的“互敬互爱”……

嘴里叨念着：“什么互敬互爱，不敬不爱！”

然后，我把床搬开，告诉他：

“我神经衰弱，不能和你同床，你也不要上我的床！”

我憎恶地看了他一眼，他满脸愁云。

春节一过，我便到黑龙江省文联上班。

下班也不回家，直到很晚学校大门关上了，我只得跳墙回家。

每当我进屋，周煌威都和蔼亲切地问：

“回来啦，吃饭了没有？”

我闭嘴不和他说话。

和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应该是一出悲剧。或者像托尔斯泰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死亡的婚姻。”

星期天，我痛苦地蒙着被躺在床上。

有人敲门，周煌威不在，我只好下地开了门。进来的是一位陌生人。

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化工学院的工会主席。我敏感到他是做我的思想工作来的。

“怎么病了吗？”

“头痛！”

“我来和你谈谈。”

“……”我低下头没有说什么。

“这些天，周老师情绪很不好，今天，他在生活会上当着四十多位老师谈了他的思想。

周老师说：我和田琳结婚基础不够牢固，她有波动。但我已下定决心，她对我不好，我对她好，她不爱我，我爱她。”

“……”我还是沉默着。

“看一个人，不要看外表，要看他的灵魂。我看周老师灵魂很美。他教学能力很强，常帮助同志解决难题。他也爱学生，他是理工科主任，他又担任最低能班的课。他不厌其烦地讲解，直到学生会了为止。我们都尊敬周老师。能得到这样一个丈夫是幸福的，我希望你们好好相处！”

工会主席谈了不少，走了。

工会主席走后，我躺在床上，反复想那句话：“她不爱我，我爱她；她对我不好，我对她好！”

这句话在我思想上引起了一些波动，但在感情上还是转不过来。我总认为结婚应有爱情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痛苦的。

过了不久，化工学院要迁到很远的郊区去。

周煌威像遇到了大灾难，呆呆地躺在床上唉声叹气。

“搬就搬吧，我带着启纯（周的前妻的儿子）到省文联去住。你自己跟学校去。”

“这不等于我们分开了吗？”

“分开，就分开吧！”

学校搬走了。我和周启纯搬到省文联。

人的感情有时真有点莫名其妙，很难说清。

我们分开了，我觉得屋子里冷冷清清，每到星期六都盼着他回来。

每星期六的下午，他从学校二八里路回家，到家时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笑着对我说：

“我回家心切，我比小伙子走的都快！”

每次都先到家看看，然后才到过街小饭馆去吃晚饭。

我们人分开了，感情却近了。

一次，我下乡体验生活，分开了四个月。回来，我破天荒地到学校去看他。

周煌威高兴极了，他给我端来了一碗热茶，说：

“喝杯热茶吧！你走了二八里，累了吧？”

我第一次向他笑笑，说：

“不累！”

后来，他们学校又从郊区搬回城内。

省文联给了我们一间暗室做宿舍。

周煌威从来不会谈情说爱，但他的行为却是一篇火热真挚、叫人心醉的爱情诗。

夏天，我睡午觉醒来，看见他坐在我身旁摇着一把扇子。

“你怎么不睡？”我问。

“我给你扇风，轰苍蝇！”周煌威笑着说。

我睡午觉，屋子里静得很，我睡的很熟。

“你怎么一声不响？”

“我不敢高声语，唯恐惊醒天上人！”他说。

我心想这个书呆子，还有点文才呢。

我神经衰弱，睡时怕声音。

冬天，他起早做饭，悄悄地从床上爬起，两手提着棉衣棉裤，轻轻地走到厨房去穿。

我知道后，告诉他：

“厨房冷，还是在屋里穿好，再出去！”

“冷，我不怕。在屋里穿衣怕惊醒你！”

天长日久，他的行动，表明他情深义重，是个好丈夫。我心上的冰被他的赤忱彻底融化了。

一九五四年，四月，黑龙江省和松江省合并，成为新的黑龙江省，省会在哈尔滨。

我跟随省文联来到哈尔滨。周煌威还留在齐齐哈尔化工学院。

我们又成了两地鸳鸯。

直到五五年春节，周煌威才从齐齐哈尔回到哈尔滨的家。

久别重逢，我第一次给予了他妻子的温暖。

就在这年的十月，生下了我们的女儿周晓琳。

就在这年，周煌威调到哈尔滨工学院。

刚刚团聚，刚刚充满欢笑声。

灾难又将这欢笑声湮灭。

周煌威患了脑出血，病倒在医院，挣扎在死亡线上。

审干运动又整到我头上。学生时代我是运动员；留日回国后每次政治运动我都毫无例外地被“运动”着，堪称“运动健将”了。

我一边受审，一边看护病人。

我站在会场门口，我听见省委派来的领导班子组长王处长，高声讲着：

“省文联，干部不纯，竟有日本特务！”

这句话像颗炸弹，在我的头上爆炸。我的头发晕，几乎倒在地上。

神经颤栗，我呆住了。我尝够那残酷的斗争的滋味，不想进会场，我想逃跑，可又不敢逃，只好走进会场。

森严的会场，几十双怀疑的眼睛望着我。

我战战兢兢一个劲地发抖；直到开完会。会后又命令我写检查。

晚上，回到医院，周煌威还在脑出血，躺在床上呻吟，疼痛使他的脸在痉挛着。

我担心他离开人世。

我担心我又将被无辜地关进牢里。

生下来的小女儿晓琳刚满月，没人照顾怎么办？

周煌威的病很重，他骨瘦如柴，坐不起来了，脸色苍白、憔悴，瞎了一只眼睛，用一只眼睛望着我，用低哑的声音劝说我：

“琳，运动来了，不管你处在什么恶劣的境遇，都要把心放宽点，坚强点！”

我守护着病危的丈夫，痛苦吞噬着我，但我得把痛苦隐藏在心底，安慰他，说：

“你好好养病，我挺得住；你也要挺得住啊！”

其实我已挺不住了，故作镇静。

周煌威的脑已经出血七天了，大夫为他作背部穿刺，抽出来的血还是鲜红的，说明他的脑继续在出血。

周煌威预感到死亡来临，他用一只瘦手紧握着我的手，喃喃地嘱咐我：

“琳，我什么也没给你留下，一点储蓄也没有，只给你留下两个孩子（周煌威前妻留下个儿子）的重担，叫你一个人挑，我真对不起你啊！”

说着从他那充满痛苦悲伤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才结束了生离，死别就要来临了吗？我的心在哭，嘴却在说：

“大夫说不要紧，你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养病吧！”

住院的丈夫生命垂危。

班上还催我写检查。

还得抽时间去照顾刚满月的小女儿。她已没有奶吃了，饿得哇哇哭，我只好买牛奶求人喂她。

我在沉重的灾难中熬煎，我背负着沉重的痛苦给周煌威准备后事。

我们刚结婚两年，感情刚好起来，难道他就要撇下我离开人世！

他头痛得脸抽搐，痉挛得扭曲，我守护着他，等待着不幸的来临。

第九天，医生把两只手消了毒。一些护士围着他准备着给他穿刺。

周煌威趴在床上，满脸流着黄豆粒大的汗珠。

我按着他的手，不住地鼓励他：

“挺住！”

血抽出来了，大夫看着玻璃管里的血，突然他脸上有了笑意：

“血是黑色的，是沉淀的血，不是新出的血，这说明他脑子不出血了。”

在死亡线上挣扎十几天的周煌威，果真活过来了。

但，他却愁起来，用仅有的一只眼睛盯着我说：

“我真害怕呀！”

“怕什么？”

“两只眼睛都瞎了怎么办？”

“有我，你就不要怕，我就是你的眼睛，帮你穿衣、吃饭……给你读小说。”

“我的腿要瘫了，不给你添累赘吗？”

“你真瘫了，我买个小车，推着你上街，散步……有我，就有你，风雨同舟！”

照顾完老周，回去参加审干，写检查，检查什么？没完没了地写检查。

刚满月不久的晓琳，没奶吃，哭啼着……

我抱着哭啼的小琳心想：

“你是个苦瓜呀，生下来爸爸就病倒了，妈妈走恶运。”

孩子在怀里哭，我也在哭。

孩子的泪和我的泪流在一起了。

写完检查材料，便受审。

王处长用仇视的眼睛盯着我，板着铁青的脸问：

“你从日本宪兵队出来，你给日本宪兵队做过什么特务工作？”

“我没做过特务工作。”

“那么容易，你不承认也不行！”

“人都在，你们可以调查！”

“你参加过国民党吗？”

“没有，这也请你们调查！”

“你在日本参加过什么团体活动吗？”

“没有！”

“没有？那你在《华文大阪每日》发表文章是怎么回事？”

“那都是文学作品，文章都在，请你检查！”

折磨和屈辱，我不想活。但我丈夫病倒了，孩子还小，死也死不得，只好咬紧牙关痛苦地活下去。

漫长的忧愁生活，使我患了忧郁症。

一天一天忧郁症折磨着我。

周煌威住了四个月院，出院了。他一只眼睛失明，头晕，万幸的是他没有瘫。

时间永是流逝。

周煌威身体强壮了些，可是我的忧郁症没有好。

我心情特别不好时，周煌威便陪着我到儿童公园散步，我们肩靠肩地在雪地上走着。他劝我说：

“琳，想开点，坚强点！”

我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害怕，怕有一天我会得精神病！”

“不会，你一生遇到那么多的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怎么会得精神病？”

“万一得了怎么办？”

“不怕，得了也不怕，有我陪着你。”

“我要满街跑怎么办？”

“我跟着你！”

他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了。

不管是北风呼啸的天，还是大雪纷飞的天，周煌威都陪着我在儿童公园走来走去，直到我情绪稍好，我们才回家。

在风风雨雨中，我们度过了多少时日。

终于，审干结束了。

我的忧郁症也好了。

一九五八年，省文联调来一个新主任武新春，他对编辑部主编说：

“田琳是个好同志，她过去写过不少东西，今天得叫她出去走走，叫她写东西吧！”

这一年，是我迎来的春风得意的一年，充满阳光的一年。是我从左倾路线解放出来的一年。

这一年也是我创作丰收的一年。

我写了

《五大连池散记》、《花香满目春》、《扬帆万里》、《东方红来到人民公社》、《节日欢腾》。

周煌威开始钻研文学，他埋头读诗，读小说，读散文……我以为他读书是为了消遣。

我每写一篇文章，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读完他会提出意见，有时，我和他争吵，吵得他有些伤心，说：

“下次，我再也不提意见了。”

可是到了下一次，他又提意见。有的意见很好，我接受了。有的意见我不接受，又和他争吵起来。

一次，我写了篇散文，连我自己也不满意，便撕了扔进废纸篓里。

周煌威竟弯着腰从废纸篓里捡出来，用浆糊仔细地粘贴复原，认真地看，认真的思考着。

“老周，你粘起来做什么？”

“我看看怎么改。”

我用惊奇的眼睛看着他说：

“那是废品，改什么？”

“我看怎么能改好。”

“你外行，能看得出什么？”

“我不是外行，我已经写诗寄给《鸭绿江》，他们回信说他们要用了。”

“你也想当作家？”

“我不想当作家，我想支持你！”

我望着他，心想：

这人貌虽不扬，却有颗金子般的心啊。

他什么也不说，悄悄地在支持我。

我看他在剪贴报纸，分门别类地贴在册子上，还编上了号像个资料员。

有一次，我写《蜜蜂之歌》，我自言自语：

“我要有蜜蜂知识就好了。”

周煌威从床上爬起来，找出他的剪贴材料拿给我，那是一篇有关蜜蜂的资料。

“你剪贴为什么？”我问他。

“支持你，当你的助手！”

他真是我的助手，在支持我。

家务事他都包下来，采买、做饭。他说：

“把时间都给你！”

有时帮我修词,有时帮我起题名。

《花开满园春》这标题就是他起的。

一九五九年，动员干部下乡、退职，周煌威被强迫退了职，他愁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老周，你愁什么？”

“我是个中层干部，上班头痛头晕，挺不下来；不上班，家庭经济负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我又不忍心。”

“退下来吧！我们艰苦点，保住你的生命要紧！”

我们相濡以沫地过着紧日子，但思想上却宽松多了。

第八章 第三次入狱

一九六六年，是中国遭到浩劫的一年。

政治上，像一场泛滥的洪水冲击一切，破坏一切，直弄得天地翻覆。

街房的墙上，电线杆子上，贴出一张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和标语。

“誓死保卫毛主席！”

“打倒×××！”

“打倒×××！”

我惊呆了，心里充满了疑团。

“怎么啦，谁反对毛主席了吗？”

回到家，我惴惴不安向周煌威说了这情况。

周煌威摇了摇头，嘱咐我说：

“琳，你只听着、看着，不要乱说，有句成语‘祸从口出’。”

第二天，来到省文联只见大门紧紧关着，充满了恐怖阴森的气氛。

办公室大楼，台阶上放着两条白纸黑字大字块。

许多同志围着看地，议论着。

我眼里放着异光，心中划着问号。

工作完全停下来，时间白白流失。

杂志停刊了。我上班来，下班走，靠边站。

到处响着高音喇叭，到处看到大卡车载着戴高帽、涂着黑脸挂着大木牌子的当权派游街示众。

省文联的造反团，一个接一个成立。

大厅里挂满了火药味很足的大字报，揪出了一批当权派。

其中给我贴出一张大字报，是两个右派联名写的，题名：“质问田琳”

“你在报告文学《女生产队长》中，为什么写桌子上放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田琳，你为什么给刘少奇唱赞歌，给他擦脂抹粉？”

我很气愤，扭过头走了。

造反派把揪出的当权派编成个黑帮队。

一切都颠倒了，整人的，挨整的，有笑的，有哭的……

挨整的，夜里早熄灯，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焦虑不安，愁肠百结。

整人的，扬眉吐气，说说笑笑……

风云变幻，蹉跎岁月，送去了春和夏。

秋天了，秋风飒飒。

秋雨绵绵。

乌鸦是不祥之鸟，我家院子里的树上飞来一只乌鸦，聒噪着。

我的心笼罩着一层愁云。

灾难像瘟疫一样在蔓延……

一九六八年，灾难降临到我的家。我这个老“运动员”又该上场了。

我正在家中养病，一道勒令，叫我上班。

这天，我带着惶惶不安的心情迈进了省文联大厅。

一进门，竖着一块大木牌子，上面写着：

“反革命，要投降！不投降，叫他灭亡！”

这是特地为我贴出的，但我不明白：我怎么成了“反革命”了呢？

我的心一下像沉入无底深渊，两眼暗黑，心紧缩在一起，两只手颤抖着。

大厅里挂满了给我的大字报。火药味极浓，向我万炮齐轰。

“打倒现行日本大特务田琳！”

“打倒现行国民党大特务田琳！”

“把她打翻在地，踩上一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地上铺了一张又长又宽的大字报，题名：“地下王国”，这是刚被解放的当权派×××贴出来的。

“地下王国”几个字，像妖魔张着血盆大口阴森森的，使人毛骨悚然。

这个车老板、厨师出身的书记整人最里手、最狠毒。他脸在笑，心却藏把刀。

这张大字报涉及不少人，不用说其中也有我。

他把我找了去，板着脸逼迫我说：

“你交待你当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的罪行吧。”

“我不是特务，我的历史已坦白交待了多遍了，毫无隐瞒。”

他瞪着牛眼珠子威胁我，说：

“你抗拒，从严处理你！”

接着是一顿训斥。

我气恼、委屈……说不出来的苦痛。

这剧烈残酷的精神折磨，我难以忍受。

黄昏时候，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回家。

我走上楼梯，一眼就看见：我家的门上用粉笔涂写的口号：

“打倒日本特务田琳！”

“打倒国民党特务田琳！”

晓琳用抹布去擦，几个孩子按倒她，揪着头发拳打脚踢。

我扶起晓琳，拉着她走进屋。

病老头用担心的眼睛望着我：

“琳，叫你去干什么？”

“整到我头上了！”

“老周，我不是特务，你要相信我！”

“我理解你，相信你！”

“假的绝不会变真的！你等着我做出正确的结论！”

“我不会在你受到政治迫害时抛弃你！”

病老头，出去端进来饭菜说：

“琳，吃饭吧！”

“拿下去吧！我吃不下啊！”

“要吃饭，不吃饭，身体会垮了！”

“顾不得那些了！”

“要抄我们的家了，必须把我的书都烧掉！”

“那不是出版的文艺之类的书吗？”

“是！也一样，都说是大毒草！”

开始烧书，病老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帮助我，把书搬到厨房。

这些文学艺术书籍，是我的精神食粮。一个文人没有书，意味着饥饿，创作枯竭。

我痛心地一页一页、一本一本撕着往火焰里扔，一页一页吐着火舌，一本一本变成灰烬。

我望着那些灰烬，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烧完书，烧相片，把朋友的相片，把亲人的相片都扔进火里烧掉了。

父亲已离开人世，每每想念他拿起相片看看。如今我流着眼泪把相片贴在胸前，默默地为老人家祝愿，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然后我两眼一闭，把相片也扔进火里。

烧完相片，烧画。

最后，只剩下我的《安荻和马华》不肯烧，东藏西藏。

但想来想去，又怕造反派无限上纲。理智些，还是狠下心来，我也把它一页一页地撕下投入熊熊的火里。眼睁睁地看着它一页页变成灰烬揪心断肠。一个文人烧自己的作品，等于自焚。我想起了《红楼梦》中黛玉焚稿的情节。

一个文人的命运就这样悲惨吗？

第二天，我家门前，停着一辆大卡车，从车上跳下一帮戴红袖标的造反派。

“咚咚”在敲门，敲得山响。

造反派头头于惠林领着一帮造反派，耀武扬威，杀气腾腾进了屋。还跟进了两个穿黑衣服的公安人员。

“田琳，抄你家来了！”

说完，便七手八脚地动手翻箱倒柜，贼眉鼠眼到处寻找。他们异想天开，要看看我藏没藏国民党旗。他们找到一摞笔记本，如获至宝以为我写着什么秘密，翻开一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

在一个箱子底层翻到两张纸，以为是秘密，仔细一看是“入党申请书”，狠狠骂了一句：

“这个特务，还想入党！”

没什么可抄的，把父亲留给我的字帖抄去了。

这帮凶神恶煞把屋子翻得乱七八糟的滚了。

第二天，是我挨斗的日子。

在我胸前挂块大木牌，上面写着：

“日本现行大特务田琳”

“国民党现行大特务田琳”

在我的名字上打着红××。

我宛如要上断头台，心怦怦跳个不停。

陈××押着我走进斗争会场。

屋子里坐满了人，黑压压一片。许多双眼睛望着我。那是些什么样的眼神啊！凶狠的、恶毒的、侮辱的眼睛是一支支毒箭向我射来。当然还有幸灾乐祸的。

会场上响起一片震天的喊声，一个个瞪着眼，张着嘴，举着拳头喊着：

“打倒日本现行大特务田琳！”

“打倒国民党现行大特务田琳！”

“打倒汉奸文人田琳！”

在那群人中，只有刘畅园，没有举拳头没有喊。她用一双怜悯的眼睛望着我。

刘畅园啊，你怎么不举拳头，你怎么不喊口号，不怕挨斗吗？

你举起拳头来吧，你喊‘打倒田琳’吧！但她一直没举拳头，一直没喊打倒田琳！你没看见×××吗？她不也是我的好朋友吗？她就用仇视的眼睛瞪着我，她就举着拳头喊‘打倒田琳’。她慷慨激昂。

人啊！人！人世间的事就这么难测，这么残酷无情吗？

我在一片打倒声中走进会场中心。

主席台上，坐着一排造反派头头。

于惠林拿着毛主席语录瞪着眼睛，张着大嘴领念毛主席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他念一句，群众跟着念一句。

我是反动的东西吗？我不是。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

本来就阴森森的会场，一下子变成了阎王殿。

那些造反派，像群狼，张牙舞爪猛烈地向我进攻：

于惠林拍桌子吼着：

“田琳，你是不是特务？”

“我不是！”

“你是日本训练出来的高级特务！”

“我学的是史地，没学过特务。”

“田琳，告诉你，老实点！”

“……”

我用沉默反抗这野蛮的瞎嚷嚷。

“怎么不吱声？说，你是不是日本大特务？”

“我没做过特务！”

“老实点，告诉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

我用沉默反抗这无理的“旱天雷”。

主编李×走到我面前，他两手叉着腰，摆出一副白相人的姿态，说：

“我看你是老奸巨滑的特务！”

他在我面前显示威风，把眼睛一瞪，眉毛一竖，吼着：

“我问你，你都出卖了谁？”

“我谁也没出卖！”

“看你嘴硬！”

于惠林腾地站了起来，边拍桌子边吼着：

“田琳，你是双料货，是日本特务，又是国民党大特务！”

然后他张着大嘴，高举拳头喊着口号：

“打倒日本现行大特务田琳！”

“打倒国民党现行大特务田琳！”

一片喊叫声，高分贝使我有些头晕。这些惨无人道的造反派，进行精神折磨还不够，又进行肉体折磨。那个酒鬼司机，恶狠狠地用他那只粗大的手揪着我的头发往前拽，被他揪掉一绺绺头发，疼得我汗珠滚下来。我咬紧嘴唇，没有哭。我不能在这些疯子面前掉眼泪。

又是逼问，又是训斥，又是往脸上吐唾沫，又是揪头发……无所不用其极。

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在折磨中煎熬。

直到造反派累了，斗争会才结束。

骇人听闻的大字报，从文联贴到大街上。在市场的门口，也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

“九鬼登台”

这九鬼有己波、严辰、沙鸥、鲁琦……少不了还有田琳。

诬陷我的小册子，撒到哈尔滨，撒到我的故乡齐齐哈尔，撒到黑河。

我的亲属都受到了株连。

勒令我写检查，检查什么？但不能不写。

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检查必须写。我只能任人宰割了。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漆黑。落着大雪，朔风狂吹。

家家的灯光已经熄灭，只有我家的灯光还亮着。我伏案写检查，晓琳睡在床上。病老头没有睡，他驼着背，两只瘦手抱着头，坐在床沿上陪着我。

我没完没了地写检查。

我感到做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活着比死还痛苦，我想到死。我放下笔，站起来，看看抱着头的病老头，心想：我们要永别了。

我凄然泪下。他抬起他那愁苦的干瘪的脸，我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老周，我想死！”

他惊呆地望着我，紧攥住我的双手，两肩抽动着，泪如雨下。说：

“琳，你死了，我们怎么活啊！”

“老周，我估计这些丧失人性的造反派非把我关进牢里不可，我实在蹲够了牢房！不自由，毋宁死啊！”

“琳，你死，我也和你一起死吧！”老周痛哭起来。想到女儿还小，我犹豫了一阵，反而安慰他说：

“那我就挺着活下去，我们睡吧！”

躺在床上，我想来想去，还是想结束这受苦受难的一生。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总是对我不公平，我的苦难有没有个尽头啊！我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共同生活二十多年（应该是十五年左右）的病老头，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唯一心爱的小不点的女儿，含着眼泪像幽灵一样走出去。

外面是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

北风凛冽，我的心也像被冰雪冻僵了。我把绳子掏出来，挂在院内一棵歪脖子树上。刚把脖子要伸进绳套，一只手拽住了我。是病老头哭泣着央求我：

“琳，不能走那条路啊！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和孩子吧！”他把绳子从树上解下。

老头是个重病号，孩子还小，我不能只想自己，抛下他们不管，我得对他们负责。是啊，死都不怕，还怕折磨吗？

我从死亡的边缘走回来，决心挺起腰板在痛苦的折磨中煎熬。

我又伏在案上写检查。

病老头弯着腰，低着头，坐在床沿上陪着我。

墙上的挂钟响了两下，是下半夜了。

我上了床，老头也躺下，我们俩谁都没睡着。这么大的灾难，怎睡得着！

我嘱咐老头：

“老周，你相信我，我不是特务。我看这些造反派要向我下毒手。万一把我关进牢里，你别上火，领着孩子好好过。实在没办法，就领着孩子去要饭吧！”

老周伸出两只干枯的手，紧握我的手也叮嘱我：

“琳，无论到什么时候，心要放宽，坚定地活下去！”

我们意识到我们面临着生离死别，忍不住俩人抱头痛哭。

睡在我身边的女儿晓琳，刚刚十二岁，她被我俩的哭声惊醒，爬过来，抱着我俩的头也哭了起来。三个人哭成一团。

“妈妈别哭了，妈妈别哭了！”

女儿的哭声使我肝裂肠断。

我用手擦着小女儿的眼泪，安慰她，说：

“妈妈不哭了，晓琳也不要哭了。晓琳，你记住、哭没有用，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强点，活下去！”

孩子太小，那里知道人世间的辛酸！金色的童年变得如此黯淡，孩子也有罪吗？

天快亮了，黎明的曙光从带冰花的窗子射进来一丝寒光。

这天，我们被斗的黑帮被挂上木牌子，被推进大卡车去接受批斗。

大卡车出了省文联的大院，行驶在大直街经过喇嘛台、烈士馆，往道外驶去。车子开到京剧院门前停住了。

我们被推下车，走进京剧院剧场。那里已有不少被斗的人，排着队面向墙壁。

我们一个个被红卫兵押向舞台的后台，会场坐满了造反派，喊的口号震天响。

两个京剧武把子（武生）按着我的头，架着我的两只胳膊（称为喷气式飞机的斗争法），押着我走向后台。

“打倒日本现行大特务田琳！”

“打倒国民党现行大特务田琳！”

我在口号声中被押进后台。

一个武把子，用一双粗大的手按着我的头往水泥墙上狠劲地撞，撞得砰砰山响。我两眼冒金花，头发晕，天旋地转。

“这是人过的生活吗？”

撞完墙，还不解渴，又按着我的头，往水泥地上撞，几乎把我撞昏过去才罢休。

哨笛一响，斗争会开始了。

几个被斗的胸前都挂着木头牌子，弯着腰低着头，一个一个押上了台。

轮到批斗我了，我弯着腰低着头。看不见斗我的是谁，听不清他的吼声，他疯狂地吼着变了调。偶尔一句我听清了，那是张×的声音，几天前我还为他抱不平，替他说话。几天后他站在台上成了斗争我的闯将。

人啊，人，知面不知心。

晚上，回到家，一进门，病老头用关心的眼睛望着我，问：

“挨打了没有？”

我摇摇头。病老头急急忙忙到厨房，给我端来热乎乎的饭和菜。

可是，我已被侮辱和痛苦填饱了肚子，一点也不想吃。病老头的两只眼睛盯着我看，吃惊地说：

“看你的头流了血，你的脸还有血迹呢，还说没挨打。”

病老头驼着背，弯着腰，急急忙忙找来红药水。

“看你的头撞出好几个大包，还有伤口。”

两只瘦手颤悠悠地往伤口上擦红药水问：

“疼吗？”

“不疼。”

我疼也不能说疼，他又病又老，是棵秋天草，禁不住风吹雨打。我只好把实情瞒着他，把苦水咽进肚里。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预感造反派要向我下毒手，把我关进牢里，便把老头给我买好的两双尼龙袜子穿上了，一把木梳，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打手纸放进手提兜里。

“万一我进了牢，你等着我下结论。我不是特务！”

“你放心，我等着你！”

“你要保重！”我酸楚地流下眼泪。

晓琳，还不懂灾难是什么，但她望着流着泪的妈妈也流下了眼泪，抱着的娃娃从她手中滑落在地上，跑过来，抱着我哇哇地哭着说：

“妈妈，我想你！”

我亲了她一下，嘱咐她：

“别哭，你每天少出门口，别叫那些孩子揍你，躲着点！”

我走出门，回过头看看他们。

病老头两眼含泪望着我。

晓琳的眼睛还在淌着泪。

这天，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果然不出所料，我的双手戴上铁铐，被推进囚车。

囚车的窗子挂着黑布帘，我什么也看不见。车子在一条大道上缓缓地开着，又转了几个弯，好像走了一段漫长的路，车子才停下来。

仿佛是监牢的后门，或者是便门。

高高的围墙，安着铁丝网，一看就知道是监狱。

一排排带铁格子的牢房挨挤在一起。

四外站着持枪的卫兵。

我下了囚车，被一个持枪的卫兵押着。他命令说：

“低下头，背过手走！”

我带着一颗受辱的心，低下了头，把双手背在身后，往前走着。

走进牢狱的办公室，登了记，拿掉我的手铐、近视镜、手表和裤带、鞋带。然后又命令我背着手，低着头，走过一个长通道送进一间牢房。

这间牢房是最底层，地板铺在土地上，潮湿、阴冷，有一股刺鼻子的土腥和屎尿味。

这间牢房，还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囚，圆圆的脸，一对小眼睛。

一个看守正在铁窗口和她对话：

“你为什么嫁给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老头子？你看他是高干？看他有权有势又有钱！”

人进了监牢，就像动物被关进铁笼子，烦躁不安。人失掉了自由，就更渴望自由。我想冲出去，可是四面是坚硬的水泥墙、铁窗子、铁门、铁锁，插翅也飞不出去。

外面传来一阵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原来今天是除夕。

除夕往往是亲人团聚的日子，我不禁想起我的女儿。

我控制不住思念之情，想回家去看看我的孩子。我急得几乎要发疯。我用拳头狠狠地砸着铁门。

“干什么？100号？”（我的代号是100号）

“放我回去，我想我的孩子。”

“想什么孩子！你是罪犯，不许想孩子！”

“我没有罪！”

“你是日本大特务，是国民党大特务！”

“我不是，那是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是诬陷！”

过了好一阵子，我才安静下来。

铁门哗啦哗啦，被打开了。

“100号，你家给你送来了行李！”

这是病老头送来的，这狗皮褥子是他的，还有这厚厚的褥子也是他的，被单也是他的。

我看着这东西想着病老头，他又老又病，经得住这血腥的风暴吗？

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同在一个月亮下，却一个在天涯，一个在海角，棒打鸳鸯两离分，心中一阵酸楚，泪珠夺眶而出了。

这一夜，我没合眼，一家人妻离子散，“虽无罪而就死地”，怎能睡得着啊！

天亮了，从小铁窗射进一线阳光。

从通道里，看守喊：

“起床！”

不一会儿，开饭了，铁窗口被打开了。

高干老婆，乐颠颠的拿去一个大盆说：

“多给我点儿！”

“你能吃得了吗？”

“吃不了，以后慢慢吃！”

我没心吃饭，坐在那儿没动。

“100号，拿碗来打饭！”

“我不吃了！”

“不吃不行！”看守说。

“我吃不下去！”

“你想用绝食吓唬我们吗？”看守说。

“我不是绝食，更不是吓唬人！”

“把碗拿来！”

我只好拿着碗走到铁窗口，刚盛一勺，我就缩回手来。

“多打点，在狱里吃顿好的，不容易！”打饭的劝我说。

是饺子。打来了，两眼望着饺子想孩子。两眼含泪，吃不下去，呆呆坐在那儿。

“100号，你还想绝食，罚你站，站起来！”

我只好站起来。

大年三十，就罚站，凭什么？难忍的屈辱和愤怒充满我胸中。我的心在抽搐，神经也在抽搐，木然站在那里。

一点钟，一点钟过去了，我一直站着，站得头有些发晕，身子有些摇晃。

“100号，好好站着，晃什么？不许晃！”

“我头晕。”

“装什么蒜，晕也得站着！”看守像狮子吼着。

这是人的生活吗？像僵尸，肉和灵都在受折磨。

从牢窗传来阵阵鞭炮声，噼噼叭叭响个不停。

牢外的人在欢乐。

牢里的人在愁苦。

白天过去，夜来临，满天的繁星。

凄凉寂静的牢房的通道，响着看守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在我牢房前停住了，响起一阵哗啦哗啦钥匙开锁声，我的牢房被打开了。

“100号，出来，提审！”

无辜的犯人最盼望提审，把事情搞清楚好早些出狱。我急急忙忙走出去。

“把手背过去，头低下走！”看守吼着，像头狮子。

我把两只手背在身后，低下头，就这样眼睛朝着地往前走……

走过通道，上了楼梯，便进了审问室。

这间审问室森严，空荡荡的，放一张桌子，两个审问官板着阴沉的脸孔，用冷酷轻蔑的眼睛盯着我，我坐在被审席位上。然后拿出毛主席语录念着：

最高指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念完语录，开审了。

“你叫什么名字？”

“田琳。”

“多大岁数？”

“五十二岁。”

“什么职业？”

“编辑。”

“你们当编辑的，就会瞎编，这回可不许你瞎编！”他白了我一眼。

“我没瞎编过。”

“那就老老实实交待你的特务罪行吧！”

“我不是特务！”

“胡说，你是双料货，日本现行大特务，国民党现行大特务！”

“我没当过特务，也没有特务过谁！”

“胡说，你是日本官费留学生，日本培养的高级特务！”

“我学的是史地、天文学、地质学……没学过特务。”

“你是蹲监狱的老手了，也有一套狡滑的经验。告诉你只有老老实实交待你的罪行，才有出路。”

我听了这些话，像被毒蛇咬了一样，五脏六腑都被蜇得难忍，也像吃了一个苍蝇，直感恶心。

我是蹲了三次监狱。

一次是反抗日本，两次是冤案。

“你这老牌特务，坦白吧！”

“……”

我只有用沉默来反抗。

“怎么不说话？哑巴了！”审问官有些失态拍着桌子吼着。

“……”

我仍是沉默不语。

这个审问官逼了一阵，只好说：

“你是个死硬派！老实告诉你，今天是除夕，我们要看看你这老牌特务什么样！”说完呵呵大笑起来。

原来，除夕，他们拿人取乐。

“回去吧！”

我被看守押回牢房。

我靠墙坐下了，沉痛地想：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可是文化大革命却拿人的生命当儿戏、糟塌！

中国在上演悲剧，多少人在这悲剧中结束了宝贵的生命，羽化而登仙，到极乐世界去了。

牢房的犯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我们的牢房进来一个二毛子，高高的个子，高鼻子，蓝眼珠，叫崔英。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白俄。她跟着母亲回了苏联。这次独自探望父亲，被认为是苏联特务。

还有一个朝鲜少妇，她的婆母带一个孩子回了朝鲜，她和丈夫在中国，被认为是朝鲜特务。

那个高干老婆，过去做外事工作，常到苏联领事馆去，被认为苏联特务。

一屋子特务：日本特务、朝鲜特务、苏联特务。

谁是真特务？谁是假特务？无法分辨。是难友？可谁和谁都没有友谊，只有仇恨，谁也不同情谁。而且，谁都想把牢里的苦难转嫁到“难友”身上，让自己轻松点。

监狱开始军事管制。

老看守长和看守都撤换下来。上来的看守长是军人，看守是战士。

对犯人进行残酷的管制。

不许走动，不许说话，不许彼此看一眼，不许动一动。我们都变成喘气的死人。

但，我们没有死。有思想，有感情，有悲伤。活着的死人，比死了还痛苦。

这座监狱，变成地狱，犯人变成鬼。

在这座监狱，度日如年。

日伪时的监狱，有针、有线。女犯要给被服厂的棉衣钉钮扣、锁扣眼。

刚解放时的监狱，允许走动，允许说话，允许互相抓头上的虱子,允许带木梳。

没有针，没有线还可以自己制作。

在这个监狱，不许带木梳，什么也没有。

做根针难上难，只得把自己手指甲，弄下来，把尼龙丝牙刷的尼龙丝拔下来。

缝一针，得两道工序：用指甲把布扎个眼，用尼龙丝穿上线，穿过扎的眼，就算缝一针。

线，还是背着看守用被单抽出来的布丝搓成的。

囚犯最怕裤子破，可裤子偏偏容易破。

别的囚犯，趴在地板上，从门底下的缝会看见看守的脚，耳朵也敏感，能听见看守的脚步声。看守来了便老老实实地坐着，看守过去了，便可以自由说话、做事。

我耳朵聋，眼睛近视，看不见看守走来的脚步，也听不见看守的脚步声。常常看守来了我不知道，说了话，或干了活，被看守看见的次数最多，罚站的次数也最多。

一天，我往座位上一蹲，嘎吱一声，裤裆裂开个大口子。我苦笑了一下，被看守从监视窗口看见了，吼着问：

“100号，你笑什么？”

“我没笑，我在哭。”

“你多能说谎！我明明看见你在笑，你还说你在哭。”

“那是苦笑！”

“什么叫苦笑？”

“是痛苦的笑，和哭一样！”

“你真能狡辩，站起来！罚你一个钟头的站！”

我只好站了起来，心想：

我是个留学生，是个作家，都五十多的人了，还像小孩一样，罚站。心里难过，打了个唉声。

这唉声也代替苦笑，不巧，被看守听见了。

“100号，你打什么唉声？”

“我不知不觉出了口长气。”

“为什么出长气，委屈你了吗？好，这回你多站一个钟头，站两个钟头！”

苦笑站一个钟头，叹气站一个钟头。

我只好站了一个钟头，又站了一个钟头。不能苦笑，也不能叹气，有泪只好朝心里流啊。

我心里在哭。

看守真有本事，专会想法折磨人。

那是冬天的一个早晨，刚起床，看守命令我：

“100号，把窗子打开！”

他以为我五十多岁了跳不上那高高窗台，可我运动员出身，腿脚灵便，跳上了那高高的窗台。怎奈我力气小，打不开冻上了的窗子，只好认输了：

“我打不开，冻上了。”

“×××号，你去开。”看守叫二毛子去开，二毛子也跳上了窗台。她年轻力壮，一下子把冻上的窗子拽开了。

“100号，她怎么能打开，你为什么打不开？”

“她年轻，力气大，我又老又瘦，力气小。”

“胡说！是你不愿意打开，罚你站，站一个钟头！”

我有理也难讲，只好站起来，两手垂着，低着头。

我站的时间长了两条腿麻了，我用手捶了捶，被看守看见了。

“100号，你捶什么腿？”

“我腿麻了。”

“什么麻了，是你不愿意站。这回加倍罚你，多站一个钟头！”

这回更糟了，腿麻了也不敢捶一捶，只好挺着两条麻木的腿站着，像个木头人。不许动一动，一个活人变成了木乃伊。

有一次，我没注意，用一张报纸盖饭碗，恰好那张报纸有毛主席头像，被看守看见了，问：

“谁盖的？”看守在铁门上的监视窗上露出一双凶恶的眼睛。

“是我盖的。”我回答。

“你没看见毛主席头像？”他吼着。

“我没注意。”

“你瞎了，你反对毛主席才把它盖饭碗。”

这次罪大，他申斥了我一顿，还是罚了我站，一直站到睡觉。

长时间站立不动，两条腿充血，成了木棍，但是连捶也不能捶。我像座雕像一样站着。人变成了雕像。活人变成了死人。那位看守似乎患有虐待狂，喜欢欣赏囚犯的痛苦。

一天，进来一个比我岁数大的女囚，六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她患了严重的肾炎，尿血两条腿瘫痪，不能走路，爬着进来的。

她很坚强，也很勇敢，脸上一点愁容也没有，整天拿着笔写材料。

她耳不聋，眼不花，她能听见看守的脚步声，从门底缝能看见看守走过来的脚。她和那些年轻人一样，趁着看守走开后，自由自在地唠着。偶尔被看守看见申斥她，她像没听见一样。因为瘫了不能站，没有罚过她站。

开饭时，她像一条狗，爬到门前，盛好饭又艰难地爬回来。

有一次，我替她打了饭，端到她面前，我还在向她微笑，可是听见看守在喊：

“100号，谁叫你给她打饭？”

“她不能走。”

“不许你替她打饭，饿死也不许替她打饭！”

“再不替她打了。”我答应着。

“100号，罚你一个钟头站！”

瘫老太太看见，我站着没吃饭，她含着泪吃着饭。

我想哭，又不能哭，因为凶恶的看守在监视着我。

囚犯们最盼望的是夜，睡着了忘掉了痛苦，得到了做美梦的权利。

可是在军管的监狱，睡觉前要过鬼门关。

快睡觉了，开始过鬼门关了。

“都站起来！”看守在铁窗外喊着。

女囚们都站了起来。

“你们今天都犯什么错误了？自己坦白，也揭发别人。揭发坦白的睡觉，不坦白、不揭发的站着！”

这些囚犯们，为了自己睡觉，便纷纷揭发别人。揭发完睡了。

我挨罚的次数最多，一来我有时听不见谁说了些什么，二来我不愿出卖人。

常常是别人睡了，我站着，直到看守什么时候发了慈悲才命令我睡。

难友，是在困难时的朋友，应该是互相关心，互相同情，互相安慰。难友是世界上最无私的高尚的朋友。

可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难友最残酷无情。互不关心，互不同情，互不安慰；反而互相残害，互相仇恨。失掉了人性，比野兽还不如。豺狼虎豹算是够残忍的了，可是它们同类之间并不想互相吞食！

那个老干部老婆，刚来时我送过她一双尼龙袜子，可是她整天用仇视的眼睛望着我。因为我没给她肥皂。

最大的矛盾，是她和某个看守在铁窗口谈话怕我听见。每次看守和她唠之前总要先训斥我一顿，然后叫我远点站着看。

有一次，那个看守看见我在看自己穿的鞋。

“100号，你看什么鞋？”

“天热了，我的棉鞋有点捂脚。”

“不许看，罚你站，远点站着！”

有一次，那个看守问我：

“100号，你聋吗？”

“聋。”

“真聋？假聋？”

“真聋。”

“我们说话，你能听见吗？”

“听不见。”

“听不见，也不许听，远点站着。”

因此我也轻蔑和仇恨那高干老婆。

一到那个看守的班，老干部老婆就站在铁窗前等着，两个人唠着。有一次，我看见她拿回来一封信，背着我看。

过了些日子，那个战士不见了。老干部老婆天天提审，天天写认罪书。

弄不明白，他们是在恋爱？还是那战士溜她的须，通风报信？

她以为是我揭发的。我敢揭发吗？我不怕她，我怕那个看守啊。

从此，她更仇恨我，我俩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

牢房里的那个朝鲜小媳妇，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一对小眼睛。她忌妒我肥皂多，不给她，便向看守告状：

“100号她家送的肥皂多，她天天洗衣服！”

洗衣服，还犯错误吗？我狠狠瞪了她一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也犯人。

她每次洗衣服用手拍打，噼噼叭叭拍个没完，我制止她：

“拍打什么？”

“拍打怎么的，碍你什么？”

“拍打得我心烦。”我狠狠瞪了她一眼，以牙还牙。

夏天，天气炎热。

二毛子崔英，没衬衫穿，天天穿件羊毛衫。天热没办法，她脱了羊毛衫，光着膀子披条毛巾，遮不住身子，露着半截乳房。一个女人赤身露体，实在难看。

我把白衬衫从身上脱下来给了她。她个子高，穿着我的衬衫遮住了乳房遮不住肚脐。但总比赤身露体好得多。

“×××号，你穿谁的衬衫？”

“100号给我的。”

“100号，谁叫你给她衬衫？”

“她赤身露体不好看。”

“不好看，也不许你给她。100号，罚你两个钟头站！”

我这善良的人挨了罚，难道我做错了吗？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病老头，把他的一条花条褥单送来了，我天天铺着它，感到温暖。唉，一个囚徒在幻想里追求幸福，够悲惨的了。

这被单老头铺不少年了。我天天铺，磨破了。我把好的撕下一半当包袱布。那破的一半准备扔掉。

一屋子女囚向我打着手势要，我撕成一条一条给了她们。

她们个个用花褥单条在头上打个蝴蝶结当发夹。

余下的我扔进厕所。二毛子从厕所捞出来，在洗脸池子洗了洗，晒干，也在头上打个蝴蝶结。除了我的头上没有蝴蝶结，全屋女囚个个头上都有蝴蝶结。

“二毛子，你头上的蝴蝶结谁给的？”

“100号扔进厕所，我捞出来的！”

接着又一个一个盘问，都说是：

“100号给的！”

“他们向我要！”

“要就给，100号站起来！”

我又被罚了站。要的没有挨罚，给的却挨了罚。我垂着两只手，低着头，心里充满了愤怒。这年头上哪儿说理去！

囚犯吃不着什么，很馋，但什么也没有，都把咸菜留下来，馋了吃一口。

我用手纸糊成厚纸片，用厚纸片摺条船，用它盛咸菜。

这件事，在一个月一检查时才被发现，只这一次我没挨罚。可是那些纸船全被毁掉了。

囚犯最幸福时刻是就寝，睡了忘掉痛苦。

可是，我失眠睡不着。

冷酷无情的看守又向我吼了：

“100号，你怎么不睡觉？”

“我睡不着。”

“睡不着也得睡！”

“给我点安眠药吧！”我哀求着。

“这是监狱，不是你家。”

我期望我的灵魂被死神拥抱。

我期望我的灵魂离开我的肉体。

在这里，有腿不能走，整天坐在地板上，一天一天地坐，一月一月地坐。坐了一年又一年。屁股磨成茧，裤子磨出大窟窿。

有嘴，不能说话，变成了哑巴。

有眼睛，不能看，变成了瞎子。

活人变成了喘气的僵尸。

活着不如死了好，但在这里连死也不允许，不是保护你，是怕死了捞不到材料。

漫长的血腥，难以忍受的监禁，把人逼疯了。

隔壁的疯了，常常用拳头咂门狂叫。

隔着一面墙我不害怕，可是挨着我坐着的工人家属，苏联特务也疯了。蓬头垢面，有时哭，有时笑，流着眼泪笑，笑着流眼泪。

“别哭了！”我劝她。

“别管我，你是谁？”她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害怕，把头扭过去，她生了气：

“你看不起我，你这日本特务！呸！”

真是个大悲剧，可是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落幕呢？

我们的铁门被打开了，看守向我喊：

“100号，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出来！”

是转移牢房？还是释放？我忐忑不安地收拾着我的东西。

那个圆脸小眼睛高干老婆，假惺惺地帮我收拾东西。我看见偷去我的香皂，揣进她裤兜里。我不记前嫌，装做没看见算了。

我两只瘦弱的手，抱着我的大行李，走出牢房。走过那条幽暗的长通道，跟着看守走进看守长办公室。

我一眼看见王雪燕，她没有表情地坐在那里，没有说话，是在划清界线才这么冷。

我俩乘一辆吉普车出了省公安厅的拘留所。

我在这座拘留所，整整被拘留了五万三千个小时。我瘦得像芦柴棒，还长了一脸黄水疮。

是高兴，是悲哀，我说不清。

在这出荒唐的悲剧里，我是主角。

王雪燕在这场荒唐的悲剧里是配角，她的丈夫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黑帮里的一员。

我心里想着病老头，鼓了很大勇气问她：

“我的病老头死了没有？”

她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我才放了心。

吉普车开到省党校院内停下了。

省文艺界都集中在这里批斗。

王雪燕帮我把我行李搬进一个房间。

在这间房里，住着的有××，还有张×和我。

我走出有铁窗的拘留所，又进了这所没有铁窗的拘留所，不许回家，不许走出院外。被软禁着，除了写检查，便是劳动，刷厕所，刷痰盂，打扫走廊，扔废纸……

一天，我正低着头写检查，门被打开了。走进来一个秀秀气气的少女。

“你找谁？”我望着她问。

“妈妈，我是晓琳！”晓琳向我扑来，抱着我哭了起来。

我多次糊里糊涂进监狱，又糊里糊涂地被释放，眼泪快流干了。可这次我禁不住还是抱着女儿晓琳流下泪来。母女俩又悲又喜，哭了一会儿松开了。

我上下打量她，她长成少女了。个子高高的，鸭蛋形脸，柳叶眉下一双细长乌黑的凤眼媚气可爱。

“晓琳，你长成大姑娘了，妈妈都认不出来你了。”

她穿件草绿色的上衣，下身穿条我的破旧的人字呢裤子，脚穿的是露脚指的大布鞋。

“晓琳，你穿谁的鞋？”

“爸爸的，连袜子也是爸爸的，没钱给我买。”

我看见这身穿戴，知道他们日子过得很艰苦，泪如泉涌。我抚摸女儿的头发说：

“晓琳，你和爸爸太苦了！”

“妈妈你别哭了，你出来了，我和爸爸多高兴啊。”

女儿用她一只修长的手擦干我的眼泪。

“看你穿的衣服，像没娘的小乞丐！”

“咱们家一个月只发三十元，苦一点就苦一点，没关系！”

“看你瘦的，脸色也苍白，缺乏营养啊！”

晓琳，从提兜里拿出一条床单说：

“这是爸爸叫我送来的床单。”

我看看很脏的床单说：

“怎么不洗洗就送来了？”

“洗了，妈，咱家把发的肥皂都给你送去了。家里用碱洗呀，我又洗不动。”

“爸爸身体好吗？”

“你入狱后，爸爸生了场重病，连饭都不能吃，差点儿没死了，现在好了。”

接着向我诉起苦来：

“一院子的孩子都欺侮我，往我脸上吐唾沫，往头上掷石头，骂我是‘特务崽子’。有一天上学回来，被小三按倒在地上，骑在我的身上揪着我的头发，打我嘴巴子，打得我鼻青眼肿。我实在受不了这欺辱，回到家躺在地板上打着滚哭，央求爸爸：‘爸爸咱们搬家吧！’爸爸才要求搬家，搬进一间房子。妈妈，小点小点吧，我不受气就行啊！”

我想给女儿点什么吃，但我什么也没有。

“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不知道，我也盼望回家啊！”

过了一会儿，女儿要走，她恋恋不舍地一步一回头走了。

这个没铁窗的软禁，也不好过啊，许多双眼睛监视着你。那是什么样的眼神啊！冷酷、蔑视、仇恨，再加上虐待狂的眼睛。

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深挖思想，把人整糊涂了，没有的也往上写，自己埋汰自己。

我在这没铁窗的大监狱软禁了一个秋天。“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真是一笔“残民以逞”的糊涂帐！

一九七〇年，冬天，北风吹，雪花飘，年要来到了，我才被解脱从党校走出来，往家走。那不公正的结论像孙悟空的紧箍箍在我的命运上。那口黑锅我这辈子算背定了。我的心像这冬天一样，冰天雪地，很不是个滋味，看来要到西天取完经才能退掉了！

我走进省文联的家属宿舍，马家街红楼。这是我们的新居。

推开门，看见病老头，比以前更憔悴、衰弱，两腮塌陷，脸色苍白，但他看见我回来了，忧郁的眼睛都发出喜悦的光辉。他颤颤抖抖下了地，两手紧握着我的手：

“琳，你总算回来了，我总算见到了你！”他的声音有些欢喜，又渗透着哀伤。

“老周，你怎么样？”

“挺过来了！”

“难为你啊，又病又老，还经得住这么大的风浪！”

“琳，为了你，我才挺过来了。”

“听晓琳说，你生场大病！”

“是呀，那时，我以为我们不能见面，就死别了呢！”

在灾难中重逢，应该高兴，可是我们竟流下了眼泪。

流吧！人在痛苦的时候，还是痛痛快快哭一场好。

我一边哭着一边说：

“我以为你们被赶下乡去了。我以为你们去要饭了。我以为你离开人世了。我以为你和我划清界线，不能和我在一起，我回来没有家了……”

“你怎么能那么想啊，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们风雨同舟吗！”

我望着老头，才感到世界上最亲的人是他啊！

晓琳是个孩子，妈妈回来了，她只知道高兴：

“妈妈，我是被斗的孩子，没人和我玩，我看了不少书，《红楼梦》我看了十几遍，《水浒》也看了，读了不少古典小说了。还看了些大毒草小说。”

“好啊。”

这是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放了三张床，两个桌子，两个箱子……挤得很，连走人的道也窄窄的。

“这是家吗？像仓库。”我感伤地说。

晓琳坐在我身旁向我诉起苦来：

“妈妈，我的那么多毛主席像章，都叫那帮孩子抢光了。”

“我的金鱼也被他们抢去了。”说着掉下眼泪来。

文化大革命连孩子也成了悲剧里的角色。

我忽然想起我还有没烧掉的一箱子书，打开一看空空的。

“书呢？”

“咱们搬家，叫一院孩子抢走了。”

我陷入沉思。

文化大革命剥夺我的太多了，剥夺了我宝贵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啊！剥夺了我的自由，剥夺了我的笔，又抢走了我的书……

我叹着气，皱着眉，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一九七三年十月。

十月深秋，真是“依稀暗淡野云飞，使人心也碎。”

这天，是我们下放干部去清河干校劳动改造的日子。

松花江快封冻了，最末一次航船，停泊在道外码头上。

松花江笼罩在晨雾中，白茫茫一片。

开往佳木斯的轮船，鸣着汽笛，准备开航了。

送行的家属含着泪站在江岸上，不住地晃摇着手向亲人告别。

病老头，驼着背，远看像一棵矮小的枯树，他拉着晓琳站在江岸上，不住地摇晃着他那只瘦手，频频地叮嘱着：

“要注意身体！来信啊！”

晓琳向我喊着：

“妈妈，快回来，我想你！”

我的两眼被泪水模糊了，向他们恋恋不舍地摆动着手。

汽笛鸣叫一声，轮船开航了。

我望着病老头和晓琳的影子消失在晨雾中。

我的心被离别的悲哀吞噬着……

我们是去劳动改造，颇像十几个被流放的囚犯。

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或许要飘雪。

船在江水中向北航去……

一阵冷风吹来，我浑身打着寒战。别了哈尔滨！别了亲人！

轮船在松花江上破浪航进……

两岸的房屋、草原……向后退去。

我们坐了一夜船，天还没亮，浓雾在弥漫。

我们的船到了通河的码头，鸣着汽笛停泊了。这是一个县城的渡口，冷冷清清，凄凄凉凉。

我们被改造的一行十几人，心情沉重。

我又背着沉重的行李，还要跋涉几十里路。

干校的口号是：

“越苦越红”

“越苦越红”这是那些造反派想出来残害干部的口号。苦与红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也被这口号愚弄。

我患着胃病，五十二岁的老太太，年老体衰，背着沉重的行李，气喘吁吁地走了很长的泥泞路，精疲力尽，汗流浃背，多么渴望坐下来休息，哪怕就一会儿也好。可是领队的造反派，却逼着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们满怀愁苦，还拖着疲惫不堪的两条腿忍受着。痛苦地在那条泥泞的大道上跄跄踉踉地往前移动着。

我们不红吗？我们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爱党爱人民。可是那些造反派硬说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需要改造。

我们从早晨走到夕阳西下。脚底板走出了大泡，已是“寸步难行”，可是还得走啊走……

太阳落山了，我们才到达了清河干校。

我看见那些先来干校的“五七战士”，惊呆了。

一个个穿着黑色的破棉袄，上面补着五颜六色的补丁，补丁摞着补丁，戴顶狗皮帽子，腰间扎条草绳子，脚穿着黑棉胶鞋，两眼发直，比劳改队还不如。

我的心往下沉，往下沉……

这个干校，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方圆一百里，在小兴安岭山下。

几百个“五七战士”在这里劳动改造。

第二天，宣布分配连队，队长大声宣布：

“逯裴到伐木连去！”

“田琳到基建连去！”

我俩是年岁最大的，可竟把我们分配到劳动强度最大的连队。

逯裴哭着苦苦哀求：

“我都五十三岁的老太太了，能伐木头吗？给我换换连队吧！”

可是回答是：

“越苦越红，在苦中锻炼得更红，不能换！”

我低下头，默默不语，承受这灾难的命运。

在小兴安岭下，是三个营，风景很幽美。

高高的山岭，长着繁茂笔直的红松、柏树、白桦……

山连着山，在盘旋的小道上，整天奔驰着拉木材的拖拉机……

我们劳改干部却像劳改犯一样，在这里从事强劳动。

除了强体力劳动，还有难忍受的精神侮辱。

到了连队不久，通知我参加“消灭烙印”学习班。

这是中国发明的《学习班》，谁说中国人脑子不灵！

《消灭烙印学习班》设在农业连。我从基建连去那里，需走二十多里路。

那是一个隆冬的黄昏，我背着行李，提装着洗脸用具的网兜。

路被埋在二三尺深的雪里。

这天是暴风雪。狂风旋转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我在狂风的白茫茫二三尺深的雪地里跋涉，一步一摇晃。

小兴安岭的隆冬，零下四十多度，仿佛空气都冻结了，叫人连气也透不过来。

暴风雪扑打在我的脸上，撕裂我的棉大衣，暴风雪还几乎把我吞没。我筋疲力尽倒在雪地上，我又爬起来，拼命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又跌倒在雪地上。再挣扎着爬起来，又艰难地往前跋涉……

参加《消灭烙印学习班》是政治上的迫害侮辱。是对人的尊严的嘲弄！

我有什么烙印？有的不过是被左倾路线鞭打的遍体伤痕的烙印而已。

在那空旷的茫茫雪原上，什么也没有，时时传来狼在嚎叫。走着走着，狼向我追来，我只好把手电筒拿出来，当狼向我扑来，我用手电的光照退了它。

走了一程和狼拼斗了一程。

黄昏已过，夜便来临。

远处风雪里，隐隐约约地有一排土房，露出暗淡的灯光。那就是农业连。

我向亮着灯光的土房走去。

在那土房的门前，我停住了脚步。掀开草帘子，推开木板门。

“你找谁？”一个穿破棉袄，扎着草绳子的“五七战士”惊奇地看了我一下，问。

“我找‘消灭烙印学习班’！”

“就在这！”

我抖掉了满头、满身的雪，扫掉鞋上的雪进了屋。

屋子里坐着十几个人，我一下子认出了那摘掉右派帽子的工人作家张德裕，错打成贪污分子大老虎于虹，还有些不认识的，围坐在一起，一脸忧郁地抽着闷烟。

满屋子弥漫着烟雾，呛得人直咳嗽。

脖子围条毛巾的张德裕看了看我，说：

“你也来了！”

我放下行李和提兜，问：

“张德裕，你在哪个连队？”

“我在豆腐房，磨豆腐！”

“那好啊，可以喝豆浆！”

“好什么，像个驴整天围着磨转。”然后他给我介绍：

“这位是咱们‘消灭烙印学习班’的班长。”

“我是华君武的得意门生，华君武被打成大右派，我是大右派的得意的学生，被打成小右派！”他说着冷笑一下，又接着说：

“什么班长不班长？都是消灭烙印学习班的学员，一起消灭烙印吧！”

个个都抽着烟，越是苦闷越抽烟，抽了一棵又一棵……

屋子里的烟雾越来越浓。

全班只有我一个女学员，说在那间房子的尽头挂一个布帘，算是我的独间。

第二天，《消灭烙印学习班》开学了。

领导学习班的是我们三营基建连的政治指导员。他是林业局的技术员，他瘸了一条腿，一瘸一拐的走进屋，三十多岁。他向大家宣布：

“我们清河干校的《消灭烙印学习班》是来自各个营各个连的学员，今天正式开学了。大家都是来自旧社会，都打上不同阶级的不同烙印。有的在日本留过学，打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烙印，有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阶级，打上了封建剥削阶级的烙印。有的念过资产阶级的大学，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

通过这次学习，把身上的烙印消灭掉！”

我们低着头，默默不语。

他布置完学习，发了些学习材料，说：

“你们自学，看材料，我还有个会要参加！”

说完一瘸一拐地走了。

大家，谁也没看材料。打着唉声抽着烟，抽了一棵又一棵。以烟消愁，愁更愁！

不知是谁，哼起京剧来：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

一个人唱，另一个人也唱起来。

十几个人都张着嘴：

闭着眼唱着，不是唱，像是在哭，听了使人难受。

男愁唱，女愁哭。他们在唱也在哭。

唱了一阵，不知是谁猛喊了一声：

“我们都是受左倾路线迫害者，够苦的了，愁有什么用？眼泪有什么用？不如擦干眼泪，把愁踩在脚底下，把唉声变成笑声！来打扑克吧。”

仨一伙，俩一伙围在一起打起扑克来。

第二天。

政治指导员，告诉我写检查。“好好写，干校要当典型。”

我又当典型了。当什么典型都好，当《消灭烙印》的典型，实在痛苦。

我只好搜索枯肠地写着检查。

检查写完了送到干校校部，他们又撤销了原来的打算，退回给我说：“不够典型。”

消灭烙印学习班，学习了七、八天结束了。

在我们十几个人的心灵上又一次打上了左倾路线鞭打的烙印，带着伤痛回了连队。

我在基建连当搬运工。

搬运红砖，一只手提四块砖，两只手提八块砖，二十斤重的砖，一车车地搬，一天天的搬，成千上万的砖都是我一个人搬运。

搬运完砖，搬运石头。十几斤的大石头，几十斤重的大石头，用两只手，一车一车地搬。

搬运完石头，搬运沙子，一锹锹地挖，一锹锹地装，装了一车又一车。

搬运完沙子，搬运大木头。一棵一棵粗大的红松，水曲柳……堆在大道上，我们一棵一棵搬运到基建连。

六个人一个组，搬运那上千斤重的大木头。一边站着三个人，我又矮又老也站在一边，把扛子放在肩上，把铁钩子挂在原木上。

打头的喊着号子：

“大家使把劲啊！

迈着大步向前走！

嘿哟！嘿哟嘿！

……”

这号子声在小兴安岭上空回荡，这号子声在风雪中回荡……

我们心中被愁苦填满，这号子声像哭泣。

我们搬了一根又一根，磨破了肩，腰也疼得直不起来。

我是被改造的对象，干什么活，累了不许歇一歇，一歇就得挨批斗。

劳动量超出我的负荷量，我的两只手累坏了。十个手指，得了腱鞘炎，火烧火燎地疼痛。疼也得劳动。我是戴着罪名下来的，像犯人一样，强迫劳动。

十个手指头，嘎巴嘎巴响，十个手指肿胀着，十个手指疼得变了形。

夜里疼得睡不着，睡着了，又疼醒了。十指连心啊！

手指疼痛，又要坚持劳动，我发起愁来。

怎么办？怎么办啊？我不知怎么办好。

上帝啊，您在何方？

十个手指都得了病，干不动活，只好用手腕子使劲……

干了好长时间，手腕子也累病了，两个手腕子也变了形，突出个大骨头。

只好到干校医务所看病。

这个医生看了看变了形的手指头，又看了看变了形的手腕子说：

“你得了腱鞘炎。”

“怎么得的？”

“是你的劳动量超过了你的负荷。腱鞘累坏了。”

“大夫，你给我想法治治吧！”我苦苦哀求着。

“这病没法治，只有休息！”

“大夫给我开个诊断书吧！”

他皱着眉，摇摇头说：

“我不能开！”

我含着泪一遍又一遍央求他。

“你不开诊断书，可我没法子劳动啊！”

他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也有历史问题，开了我会挨批斗。”

“那怎么办？”我哭了起来。

他也有难言之隐呀！他说：

“你还是挺着痛，坚持劳动吧！”

我得了病，坚持劳动，疼痛得忍受不了。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那个医生像没听见一样。

一个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啊，可这医生怕挨斗，说什么也不肯给开休息的诊断书，把我打发回来了。

我凝视着变了形的两只手，哭着往回走，一步一把泪地走回来。

手指不能劳动，手腕也变了形，疼痛，只好两只胳膊劳动。从此用两只胳膊代替手劳动。

用两只胳膊挖沙子，装车，卸车,两只胳膊推不动，就用胸脯帮着往下推。

一车一车沙子都是用胸脯推下去的。

今天这样推，明天也这样推。

后来两只胳膊也病了，胸脯也病了，没有办法，就用脚来帮忙。

基建连的饭厅盖好了，往房顶填锯末子。我只好用两只病手把锯末子装进麻袋，把麻袋挂在钩子上，然后用两只胳膊一只脚抬着往上送。

我就这样用残废的两只手，残废的胳膊和一只脚，联合起来坚持劳动。

我愁得不想活，当我一走近大水泡子我就想：

“跳进去吧，结束这非人的痛苦生活吧！”

不知有多少次，脑子里涌出跳水泡子结束我的生命的念头，但我走近水泡子，不知道为什么，病老头、小女儿的影子就出现在我眼前，我又从水泡子边走回去。

班长看出我的两只残废的手，看见我常常流眼泪，便分配我打草绳子。

我用疼痛的手，从稻草垛，把稻草选出来，然后用两只胳膊一抱一抱抱进基建连队屋。

我便坐在打草机前，两只脚踏着打草机的底板，机器便咯登咯登动起来。于是用疼痛的手一绺一绺的把稻草往打草机里絮。

一捆一捆草绳子打出来了，我高兴地看着那些草绳子一垛垛起来。

那草绳子可以给五七战士扎腰，那草绳子可以捆这个，捆那个。还可以卖出去赚钱。

两只残废的手，不好使，有些僵硬，机器转动得又快，一下把我手指卷进机器里，手指甲压掉了半截，手指也压掉一块肉，血往出喷，鲜红的血染红了稻草。

我的手流着血。

我的心也流着血……

“越苦越红”造反派这项荒谬的残酷的发明应该到联合国去申请专利。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都被它愚弄得可怜亦复可笑。

本来一天劳动够累的了，我们这些被改造的想“红”，便自找苦吃，下完工又去干活，想学雷锋。

小老于和大老韩天天早起刨厕所，扫院子，到处找活干。我也参加了这个学雷锋队。

跟着他们用担子挑……

谁知道，这下子招来了灾祸，命运真能捉弄人。

“一打两反”运动在干校展开了。

人们用反常的眼神看着我，这侮辱人的眼神，使我感到暴风雨又要向我袭来。

果然，基建连一夜挂出满屋子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向我开炮：

“田琳破坏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愣住了，我不明白我怎么破坏了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了？

我望着那张大字报，想起一件事：

我有一天到校部去看病，一个工农兵学员求我给他买毛主席著作，我说：

“你不要买了，我家里有几套，送给你一套！”

家里，没有及时寄来，这也成了罪过。

人，变得多么可怕，多么可悲！

开始批斗了，被批斗的是我们学习雷锋的三个人。

“于××，韩××你们俩，天不亮就到厕所干什么去了？”

“我们刨尿冰，打扫厕所去了。”

“那是借口，你们搞阴谋去了！”

“我们想做点好事，学雷锋！”

“你们是什么人？还配学雷锋？”

“……”

“不只他们俩个还有一个人！”

我知道指的是我，过了一会儿就点了我的名：

“田琳，你和他们俩吃完晚饭干什么去了？”

“打扫院子垃圾去了。”

“你不是手疼吗？”

“我用肩挑，把砖头瓦块挑走！”

“真不可思议，你们是搞阴谋去了！”

“我们想学雷锋！”

“别往脸上贴金！”

这是什么世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我紧咬住嘴唇，不叫眼泪掉下来。

这样批斗了十几天，忽然“一打两反”运动结束了。

原来干校要把一批人送到乡下插队。

真是一场滑稽悲剧。

昨天挨斗的对象，今天胸前给戴上了大红花。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在校部的大礼堂，坐满了插队落户的干部。

屋里敲着锣鼓，咚咚铮铮……

外面放着鞭炮，噼噼叭叭……

“插队落户光荣！”口号喊得震天响。

插队落户的干部，都是被戴着各种政治帽子的干部，有摘帽子的右派，有美国特务，有日本特务，有苏联特务，还有历史反革命……

给我一朵大红花，我没有戴，藏在衣襟下，这不是光荣花，是耻辱花，我不戴！

就这样，第二天我们被逐出清河干校。

我们被迫插队落户的干部有几百人，排着大队，浩浩荡荡在一条公路上走着。

打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喊着：

“插队光荣！”

奔向农村。

我被分配到大林子大队。

这是春天，途中经过一个方圆二十里的大水泡子，结的冰已经融化，成群的鱼鹰和水鸟在水面上飞翔。

分配到这个大队五个人，但只来了三个。像被流放的犯人，乘一条小船横渡这大水泡子。

个个心事重重，愁眉苦脸，沉默不语。

过了大水泡，我们三人下了船，走上一条大道，便看见一片绿色的波浪……

我背着行李，拖着疲惫的腿，走得很慢。

我们到了大林子大队，见了队长，把我们分配住在贫农老林家。

贫农老林太太笑着欢迎我们说：

“我盼望你们来！你们可来了！”她用一双粗手帮我卸下行李。

这几年，向我伸出的是什么样的手啊！揪斗的手，扭我胳膊的手，揿我头撞墙壁的手啊！老贫农向我伸出的，却是一双温暖的手。

几年来，朝我看着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眼睛啊！是一双双仇恨的、是一双双侮辱的、一双双冷酷的眼睛。老贫农向我看着的是一双热情的眼睛啊。

我感到温暖，感到安慰。

因为我的两只手疼痛，留在插队干部队部里做饭。小队长老包呆了几天便回家了，只剩下我和老冯两个人了。

我们到这里，愁苦加了一倍，烟量也增加了一倍，一棵一棵接着抽。纸烟抽不起了，换上抽旱烟。

我的疼痛的手，饭也难做，连锅盖也掀不动，是用两只胳膊在推，饭桌也拿不动，是用两只胳膊搬动。

老冯不住地张着大嘴唱着什么。像哭，我听了难受。

“老冯，你别唱了好不好？”

“男愁唱，女愁哭，我心里愁啊！”

“我看你不如哭，眼泪流出来好，眼泪不流，变成毒汁，更伤身体！”

“顾不得那些了，死了更好！”

他一边唱，一边抽烟。

我一边哭，一边抽烟。

我的两只疼痛的手，卷不上纸烟。贫农林大姐帮我卷纸烟，她卷了一棵又一棵，放在柜子上，摞成一大摞。

我对她说：

“林大姐，你不要帮我卷了，我是改造对象，你不怕挨批斗，划不清界线！”

“你是甚么改造对象，我看你是老实厚道的好干部！”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了，对党对祖国忠心耿耿，可是我没听到一句表扬的话。今天，是贫农老大姐说了这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哭了。

我望着两只越来越疼的手在发愁。

“我给你想出一个不用手的劳动。”林大姐说。

“什么劳动不用手，难道还有用脚的劳动吗？”

“有，你去看青，只用脚在地头上走，看见猪、乌鸦来了，你大声吆喝一声就行了。”

我高兴地笑了，但这笑马上又消失了。

“这个工作我不能干！”我摇着头说。

“为什么？”

“我要干，便把原来看青的老农挤下来了，这等于我抢他的饭碗。损人利己的事，我不干！”

两只手越来越重，连衣服也不能洗。

我便用脚踩。林大姐抢过去替我洗。

裤腰带也不能解了，林大姐替我解。

一天，领队的队长王守信来了。

林大姐对他说：

“你们怎能把病干部放下来，我们贫农看了难受，赶快叫她回家治病吧！”

王守信看看我的两只病手，说：

“你怎么早不说？”

“说了没用，干校医生看出我得了腱鞘炎，可他有历史问题，怕挨斗不给开诊断书。没有诊断书，就说我装病，只得挺着干。”

王守信沉思了一会，说：

“我也有责任，官僚主义，老田，叫你受苦了，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家吧！”

“队长你给假了？”

“我给了。”

“你不怕挨批斗吗？”

“我不怕，我就是因为坚持原则，校领导不得意我，才把我下放了！今天和我一起走。”他又对老冯说：“老冯你护送她回家。”

一辆大车，停在林家大门口。

老林大姐把煮好的鸡蛋、粘豆包装在一只篮子里，放在车上。王守信和老冯搬着我的行李也上了车。

车老板扬着鞭子，车往前走了。

老林大姐跟着车子送我，嘱咐着：

“回去，把手治好！”

“嗯！回去吧！”我向她说。

老林大姐不肯回去，跟着车子送了一程又一程，直送到村口，不住地摆着手喊着：

“来信啊！”

车子走远了，我回过头望她，她还是晃着一只手。

第九章 孤 雁 吟

回到哈尔滨，走进了马家街副8号我的新家。

病老头高兴地迎接我说：

“你可回来了！”

我望着我病了的双手，沉思默想：

“我这个作家，日子可怎么过啊。有笔不能写。”

“你还写什么呢？写了也不能发表！”

“唉，一个作家，不写作品就等于灭亡。”

生活像一潭死水。

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多过去了。

我像是被生活遗弃了的人。

我在唱无音的悲歌。

我在写无词的“离骚”。

我在弹无弦的竖琴。

我在浪费这宝贵的生命。

北方的春天，像个唱歌的姑娘“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地来到人间。终于用滚热的胸膛把冰融化了。

松花江冰面下，响着嘎吱嘎吱冰层碎裂声。

太阳闪射着温柔的光。

映山红，迎着春风开了，把芬芳洒向人间。

我们的祖国被四人帮统治的冬天，已一去不复返了，祖国也迎来了春天。

收音机传来北京的声音：

我们伟大的祖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列车已经开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列车开动的汽笛声。

请同志们尽情地唱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最强劲的进行曲，请同志们用你们手里的琴弦拨出时代的最强音。

我也要用我的笔写出时代的歌来，我激动不已，暗自思忖：

“我要回到编辑部去！我必须回到编辑部去！”

果然《北方文学》的副主编黄益廉来到我的家说：

“编辑部请你回去！”

我已离开编辑部十年了。头发从乌黑变成雪白。文化大革命，把我无辜地驱逐出编辑部。此刻我兴奋地走进编辑部。

同志们向我伸出一只只热情的手握着我的手，使劲摇晃着，说：

“老田，你活过来了，真不容易啊！”

“是啊！我到高尔基那儿报到，他说不到时候，你回去吧！我就回来了。”

同志们听了哈哈大笑。

我重新坐到办公桌前，重新从稿筐里拿出稿来，审稿、退稿、改稿、定稿、校对……

一天，在省文联的会议室里召开平反大会。

在大会上宣布：给打错了的同志平反。

也给我平了反。

我那结了冰的心解冻了，我向病老头说：

“我要写文章了，我要攀上写作生涯的巅峰！”

“我支持你，家里的活，我都包下来，把时间给你！”

我第一篇写了篇报告文学《燃烧》，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号的《北方文学》上。

我像一团火，在燃烧。

又写了一篇散文《忆奈良》，发表在吉林的《江城》杂志上。

一九七八年，秋天。

碧蓝碧蓝的天空，飘着白云。

阳光明媚。

山丁同志从沈阳来参加庆祝萧红寿辰的会，到了哈尔滨。

我们在中山路肩并肩地走着。

“但娣，你还记得吗？我们邂逅时，你还是少女，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你那乌黑的头发变成雪白了。”

“是呀，那时，你还是年轻小伙子，热情奔放，朝气勃勃，现在也白发苍苍了！”

“一个错案，蹲了十年监狱，老婆和我离了婚，儿子不认父亲，现在平反了，妻子也死了！唉！”

他说不下去了，低下头，沉浸在痛苦中。

“山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吧！你很有才华，还是拿起笔，写吧。让你的才华重新焕发光彩吧！”

“笔被夺走十几年了，都锈了！”他朝我看了看又说：

“是要写，我回去就写篇《我的文学故乡哈尔滨》。但娣，你也要写！”他拍了拍我的肩说：“写长的，写你自己，每天写一点，积少成多！”他深情关切地望着我。

其实，我早就在写，但我没告诉他。

“你也很不幸，蹲过三次监狱，离过两次婚，够坎坷的了！我很同情你。莎士比亚有句名言：Frailty，Thy Name is Woman（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可是你却是强者。愿我们今后在前进的路上彼此帮助吧！”

“你过去帮我出版了《安荻和马华》，有什么比这个更珍贵的友谊！我很感谢你！我不会忘记你的厚意！”我向他说。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你失恋的时候，我同情你，才帮助你出版《安荻和马华》。今后我仍然关心你，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我一定帮忙！”

他的话像春风一样，吹进了我的创作生命中，我感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个人关心着我，支持着我，一股暖流淌过我的心窝。

我们肩并肩地在中山路上走着、谈着，亲如兄妹。

在这条路上留下了我们友谊的脚印。

那是一首友谊的诗篇。

友情的幼苗长在真诚的土壤里，友情的成长更需要不断的关怀。我们的友情将似松竹梅这岁寒三友一样，经得住严冬的考验。

不知不觉我们到了107门口，山丁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说：

“进来坐一会儿吧！”

“不进去了！”

“记住，有困难，告诉我，我一定帮助你！”

“谢谢你，我没啥困难。”

他的友情在我心里激起了浪花，我说：

“我们无论谁先死，后死的要给先死者写篇悼念的文章！”

匆匆相逢，又匆匆别离。他站在107门口，摇晃着一只大手说：

“以后常通信吧！”

以后他没来信，我也没给他去信。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在北京采访巴来。一个黄昏，我坐在姜椿芳家的客厅里，等待着姜椿芳同志回来。

我低着头，忽然走进来一帮人，姜椿芳同志回来了，还有巴来的女儿、里栋、肖耘，意想不到还有山丁。

山丁坐在我对面，他吃惊地说：

“你也来了！”

“……”我什么也没说。

山丁在沈阳，我在哈尔滨，我们并没有通信，却走在一起来了。

我们都围坐在桌子旁，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姜椿芳用低沉的声音讲着巴来……讲完了，静默一会，他提议：

“明天，咱们去香山玩玩，有萧军、罗烽、塞克、舒群，山丁你也去，自吃自，每人拿两元钱，我备车；肖耘当秘书，你来张罗。”然后他转向我说：

“田琳同志，你也去玩玩！”

“我要回哈尔滨，我不去了。”

“去吧！我掏钱请你！”山丁说。

“我要回去！车票已经买了。”

“把票退了，你和我一起走，我回沈阳，你回哈尔滨。”山丁劝说。

“不，我决定回去！”我固执地说。

最后，大伙纷纷走出姜椿芳的家，只剩下我和山丁。

“我送送你吧！”山丁说。

“不用送了，我自己能找到旅社。”我说。

“我是有些累了，你知道我今天，为亡妻左蒂移坟，办完才赶来。”

我们走出西盛胡同，过横道。

“但娣，快点走，当心，别碰车！”山丁像哥哥一样拽着我的手跑过横道。

我们站在电车站默默地等车，过了一会儿，山丁拉着我说：

“不坐车了，我送你走，走！”

“坐车吧，这么远，你累了。”我说。

“不坐，我愿意走着和你长谈！”山丁热情地说。

我默默地走着，我在生山丁的气。他曾说通信，可他没给我信。

“但娣，你还是把车票退了吧！我们一起去香山玩玩。然后，我们一起回东北不好吗？”

“不退！”我不高兴地说。

天黑下来，月亮在夜空中升起来了。

银色的月光泻在树上，泻在柏油路上，也泻在我们的脸上。

“唉！你多幸福，有个家。我还是一只孤雁。”

“你找个老伴吧！”

“……”他沉默不语，打了个唉声。

这唉声是从他心底打出来的。我想安慰他几句，但说什么呢？只好不说了。

我们默默地走着。

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在我心底搅动着。

过了一阵，他歪着头，用两只热情的眼睛瞅着我，说：

“但娣，你很有才华，可你太不幸了，我同情你，关心你，又怜悯你！”

“我是不幸，但我不要人怜悯！”

“为什么？”

“怜悯对我来说是侮辱，我能自强，不需要谁来怜悯！”

他喃喃地说：

“你真是个倔强的女人！”

我们又沉默了，沉默地走着。

女人，特别是我，不愿把感情外露出来。

“你怎么不说话呀？我们做个文学的知己吧！”

“你还不理解我，知己谈何容易？”

“我怎么不理解你！你的文章我都读过了，你的灵魂很美！”

“……”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他又说。

然后，他讲他坎坷的身世。我很同情他。

山丁画龙点睛地说：

“你离过婚，蹲过三次监狱；我也离过婚，蹲过监狱。我们同病相怜，所以我们在晚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相濡以沫吧！”

月光自古以来在诗人笔下带有神秘浪漫的色彩，有的要羽化而登仙；有的要人约黄昏后，然而大多数则是用以渲染温馨宁静的气氛。山丁和我在月下漫步，各人多少有些“进入角色”。

我们俩像无弦的琴，不敢弹出心之梦来。

我们走了一站又一站……从西盛胡同直走到沙滩。这时，他站住了说：

“你往里走，就是你下榻的旅馆北池子。”最后他晃着一只大手说：

“回去把巴来写出来！”

“我会写出来的，你等着看吧！”

我回到哈尔滨赶写了一篇《忆巴来》。

一九八〇年三月，哈尔滨还是一片冰雪，但有了春意，灰色的天空透出了蓝意，有些树木冒出柔嫩的叶蕾。

三月十四日，我突然接到北京外语学院教授闫纯德同志的来信。他说他在编《中国现代女作家》及《女作家作品选》，叫我从速写一千字的小传，选一张精美的照片和一页手迹，选有代表性的短篇或散文一、二篇，三天内完成即寄他家。

我这被遗忘的作家，作品一直冻在冰层底下，此时此刻，怎能不激动！这一夜我没有睡。

只两天我就把小传、两篇短篇、相片、手迹打成一包邮寄出去了。

我冥思苦想：

“是谁没把我忘记？是谁向闫纯德同志推荐了我？”感激之余，便向闫纯德同志询问。他回信告诉我，是山丁亲自到北京他家和他谈起我。回到沈阳后，山丁又给去过一封长信，对我的作品评价很高。

山丁曾给我出版《安荻和马华》，今天又这般支持我。有什么友谊比在事业上的支持更为珍贵！

山丁！我感谢你呀！

四月十三日，我接到山丁一封火热的信。他像一团火，在燃烧！这团火，也把我点燃……埋在心底几十年爱的种子，竟在几十年后萌芽了。我们的心碰撞在一起。

天天接到他的信，一字字一行行，一行行一字字都埋藏着爱。我天天给他回信，字里行间，同样报以爱。

我愿作春燕，飞到他屋梁上，呢喃在他身边。

可是，我有丈夫，我怎能把他抛弃。这一点山丁也理解我，他也不肯那样做。这团火，不久便被我们的理智扑灭了。我切实告诉他：“我们决不会干那不道德的事！我建议你找个老伴吧！我们今后就做文学上的知己，在文学事业上互相支持，共同前进！”

就这样，我们成了文学上的知己。

这年我写了《破损的小舟又扬起风帆》。

一个作家要写出作品，必须到生活中去采蜜。

一九八〇年八月，我去苇河。八月的山村真美。

绿色的山，绿色的谷，一片绿色的世界。

我走在稻田埂上，看见田埂边水菠菜开着小蓝花。据说她长在泥土里，若把她拔起来扔在水中漂浮着仍然会长，照样开花。

我走在山道上，看见山径上，盛开着山峡花、小兰花……一朵朵像小兰蝴蝶。有人说这种花的生命力强，把它拔下来挂在树上，它能吊着活，也照样开花。

我望着这些花，沉思默想：

我就是小兰花——扔在水中飘浮着活，挂在树上吊着活。

在苇河，我参观了人参园、木耳园，也去看了马林果园。

这迷人的山村啊！真使我陶醉。

从苇河回来，我写了散文诗：

《小蓝花》、《人参园》、《山村的早晨》、《难忘的灯》。

一九八〇年八月一日，姚颖来信告诉我，我离婚的前夫陈致远得了不治之症——癌，住进了空军医院，他想吃巧克力糖，叫我给他买点。

这消息，如轰雷掣电！我久久说不出话，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过去我恨他，在我被左倾路线打进监狱时，他抛弃了我，离婚了。今天，他快要离开人间，我黯然神伤，往事不堪回首！

是的，我们相爱过，我们幸福过。回忆新婚之夜，他和我说，我们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可后来他背叛了，我为此流过多少泪！

我不咎往事，还是给他买了一斤纯巧克力糖，托人捎给他。

我知道他平日爱吃巧克力糖。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他常买这糖给我吃，我也常买给他吃。

这些日来，不知为什么，他的影子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为他祝愿，祝愿他会好转。

过了几个月，突然我接到陈致远小儿子一封信，告诉我，他爸爸在1981年1月22日停止了呼吸，咽下最后一口气，闭上眼睛离开了人间。

临死前陈致远想起了我，和他小儿子悲痛地谈起了我，并嘱咐他小儿子转告我；他对不起我，请我原谅他。

这封信，如同一场暴风雪向我袭来。

我们夫妻一场，连一面也没见，就这样永别了。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滴落。

两座山走不到一起，两人却能相逢。

一九八一年，四月，北方正落着大雪。

我正坐在编辑部看稿，有人给我打来电话。

我走过去拿起电话筒，传来了男同志的声音：

“你贵姓？”

“我是田琳，你是谁？”

“我姓马，名古屋工业大学的马吉，这名字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怎能不记得！你住在哪儿？”

“花园村，你能来吗？还是我来看你？”

“我去，我去，我马上去！”

我放下电话，走出编辑部，来到了花园村，站在门口我有些踌躇。

我的心像大海，波涛起伏，那流逝的青年时代的岁月在心中浮沉……

我反复在思考：去见一位曾被我抛弃的恋人，是件很难为情的事。他来看望抛弃过他的我，更是件尴尬的事情。

我徘徊在花园村的门前，我忽然看见院子里的小道上有一个仪表像学者的老人，在那儿等待着什么。

他穿一件米色的羽绒服，浓眉大眼，一边看表，一边向外张望。

我没勇气进去，仍在门外踟蹰。

过了一阵，壮着胆子进去，可那个人却不见了。

我去传达室打听，按他住的房号走去，那是一间高雅的宾馆套房。

我敲开了他的门。

开门的就是马吉，他伸出一双热情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有四十几年不见了，要在街上遇到，真不敢认了！”

“我们相识时，我才二十几岁的学生，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了！”

他彬彬有礼地把我请到客厅。

马吉热情地给我倒杯茶，说：

“请喝茶吧！”

“你怎么找到了我？”

“我找你找了四十年了，总算找到了你，你过得好吗？”

“一言难尽啊！蹲了三次监狱，一次是日本鬼子抓去的，后两次是错案……你怎么样？在哪儿工作？”

“在北京邮电标准化研究所工作。”

“具体工作是什么？”

“特级总工程师。”

他沉默着，他那兴高采烈的光泽的脸一下子笼罩上一层阴云。

我也默然，我在后悔、内疚！

他突然向我抛出一句话：

“琳，你知道非洲有一种名叫‘赢果’的果子吗？”

“不知道，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果子很奇特，当你开始吃的时候，它极甜，甜极了；可是那甜味越吃越淡，最后变成苦味，而越吃越苦啊！”

“这是什么意思？你还是直说了吧！”

他沉默了一阵，说了一句：

“我恨你，你太残酷了！”

“……”我能说什么呢！只能低头不语。

“你真狠心把我抛弃了！我从名古屋毕业后就在北京工作，我等你来。1943年冬接不到你的信，我乘火车到长春近泽书店编辑部找你，他们说你被捕了。我到监狱去看你，他们不叫见。我在监狱门前等了好多天……有一天突然发现一辆汽车从监狱大门开出来，那车上有个穿黑卷毛大衣的很像你，我向你频频招手，可那车很快驰过，我跟着车跑了一段路，直到车去远了，看不见了……我怅惘地跑到教堂为你祈祷了一番，才悲痛地回到北京。我苦苦地等你，直到光复。

光复以后，我又痴心的乘火车到东三省各处找你，没找到啊！你怎么出狱不给我一封信呀？”

“入狱时，你的信在我裤兜里，我怕连累你就把它吞入肚子里，那上面写的通信地址也进了肚，出狱后都忘记了，无法给你去信……”

“我等了你八年，你真狠心啊！”

“你说错了！”

“怎么错了？”

“我比你大，大四岁呀！你那么年轻有为，我不配做你的妻子！”

“年岁能衡量爱情吗？黄芦隐的爱人比她小十几岁呢！他俩过得很幸福。爱情是灵与肉的拥抱啊！”他用一双迷茫的眼睛凝视着我，脸孔很严肃。他在生我的气。

过了好一阵，他又说：

“你知道，我特制了两根金项链，都嵌着一块大理石，一块雕着你的像，一块雕着我的像，前者准备我留用，后者打算送给你。可是，我苦等了你八年，我失望了，一次过三峡，我伤心地把它扔进滚滚的长江，让那山、那水作证吧！琳，有个赤诚的青年在爱你呀！”

我被感动得流泪，他也不禁潸然泪下，两对泪眼互相凝视着。

有什么比真诚的爱更可贵，这金子般的心却被我抛弃了。我从来没有一个真诚相爱的朋友，内疚挠动着我的灵魂……我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来。这正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他又继续向我倾诉曲衷：

“在北京我租了一间屋，我又焦急又痛苦地等待你啊！我常倚着窗子，望着月亮，望着星星，想念着你。

好容易盼到光复，我走遍东北寻找你。

我望着长白山在呼唤：‘琳，你在哪里？’

我望着渤海在呼唤：‘琳，你在哪里？’

回答我的是我自己的回声。

没办法，我写了封信，交给留日学生你的老乡求他替我找你。他没找到你，却找到你的二哥。这信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收到了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我已结婚了，无法回啊！”

“结婚了也应该给我回信啊！你太残酷了！漫长的八年，我在痛苦中煎熬！”

“别说了，我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我们又沉浸在闷海中。

半天，他又说：

“我也恨我自己，太幼稚，太傻气，没有谈情说爱的经验……其实，那次我去奈良看望你，送给你一只金戒指，你不肯要，这不是明显的拒绝了我吗？我还苦苦地痴恋着你，老等着你，这无疑是自讨苦吃！”

“在日本，房东有个姑娘，叫妙子的，她对我很好。我毕业后在北京，她从日本专程来北京找我，可被我拒绝了。”

“你为什么拒绝了她？”

“还用问吗，我心中只有个琳呀！”

“我始终没忘你，我找你找了四十年，总算找到了你！”

他扬着脸，用那双大眼睛凝视着我，又有所感地自语着：

“唉！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

是什么在我灵魂深处萌动，我发现此时此刻我也在爱着他呀！可是迟了，他已结婚了，我也结婚了。

已经夜深了，我不得不离去。我走出花园村。他送我一程又一程……

大雪纷纷扬扬还在飘落。

“你请回去吧！别送了！”

“再送你一程吧！别时容易，见时难啊！”

他从花园村送我到北方大厦；从北方大厦又送到中山路口。他才站住。

我回过头看他，他在迷茫大雪中伫立着。我慢慢的往前走，再回头看他，他还站在老地方。彼此距离相当远，好一会才看不到他的影子。

这一夜，我的心很不平静……

第二天，他要走了，我去送他。

当我推开门时，我看见他正面对着窗子在沉思。我走到他身边，他还没有察觉。

当他转过头来发现我时，他两只眼睛突然闪着喜悦的光。

“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天这么冷，冻坏了吧！”

“不，都四月了，不冷！”我摇着头说。

“我昨夜，一宿没睡啊！”他说。

“为什么？”

“我替你难过啊！你在这么冷的地方多苦啊！你要不抛弃我，你就会在北京，那我们就能共同生活在一起……”

“过去的事，已无法挽回了！”

“所以我恨你！”

“……”我暗自悲伤，内疚，说不出话。颤着手把一盒巧克力糖送给他时才说：

“四十年前，你从名古屋寄给我一盒一盒的巧克力糖，你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那时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年月，在日本副食缺得很。我千方百计用高价买到巧克力，我自己一块也舍不得吃，都寄给了你。后来还给你寄过香蕉干，你忘了？”

“没忘！在那困难时期能吃到这些东西真不容易，太谢谢你啊！”

“你该明白那是一颗赤诚的心呀！你竟把我抛弃了！……”

“我们双方都成家了，谁也不能破坏谁的家。往事已过去，要面对现实。”

他低下头，流下泪来。

我也流下眼泪。

我们相对哭了一阵。他抬头望了我好久才说：

“我想听听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唉！一言难尽，总之我走了一条坎坷的路！那遭遇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那么就简要地告诉我吧！”

我扼要的讲了我坎坷的大半生。他说：

“我问你，那时你想逃跑，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能随便讲吗？”

“我们相处几年了，难道我是爱国的还是卖国的，你还不了解吗？”

“那我也得慎重！”

“在留学生刊物上我发表的《把生命献给祖国》那篇文章，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无法回答。

“那次，我去奈良看望你，我曾告诉你，我是学电学的，我自造了一台收音机，天天夜里偷听祖国之音。我也给了你一台。琳，我怎么对待你，你又怎么对待我，难道我是特务吗？”

他生起气来，来回踱着。

“都叫你弄糟了，害得你遭那么大的罪。受那么大的苦！从而害得我俩天各一方！”

其实，我比他难过，我需要的是真诚的爱，可我这一生也没遇着，只遇到他一个，又被我轻意抛开！我想哭，又哭不出来，真难过。

他走近我，扶着我的肩说：

“因为我真爱你，才生你的气！原谅我吧！”

我向他倾诉着不幸的往事。

他两手托着腮静静地听着，含着泪凝视着我：

“琳，我以为你很幸福才抛弃我，原来你却这般苦呀！”

说完，他站起来，走向窗台，凝视着窗外，一声不响地伫立着。好久他才转过身来。我看出他此刻心情沉重，就问：

“你怎么啦？”

“我在为你痛苦啊！我总觉得你对生活处理得不当。”

“怎么说呢！那时我不想结婚，只想逃跑！”

“不对！你有虚荣心，看不起我这个普通的留学生！你是名作家，要找个门当户对的！”

“你比我小四岁，我不敢嫁一个小弟弟！”

“小四岁，就是小十岁，我也心甘情愿！我曾想只靠我的技术也能养活一家，让你专心攀登文学高峰啊！”

我被说得哑口无言，想走。我走到门口，他用两只手拦住我说：

“琳，我爱你，话说重了些，你就原谅我吧！唉，都白发苍苍了，你还像从前一样盛气凌人啊！”

他把我拉回来，给我倒杯热茶，说：

“再过一会我就离开这里了，只有几十分钟了，时间比金子还珍贵，我为你痛苦了那么多年，你就原谅了我吧！”

“……”我沉默不语。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说什么呀！我不配和你这特级工程师谈了。”

“是你不配，还是我不配，你是名作家。我要配，你也不会叫我苦苦等了你八年，苦苦寻找了四十年啊！”

“我欠你的情无法偿还了！”我望着他哀伤地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觉到了他该离开哈尔滨的时刻。我们并肩走出花园村。

这回该我伤心流泪了！我送了他一程又一程，泪如雨下。

他临上火车时告诉我，他将要去日本，参加世界科学讨论会，他被聘为执行主席。

送走他，回来我在日记上写了：

我失落的是珍珠，

我拾得的是泡沫，

泡沫闪过五颜六色，消失了，

失落的再也找不回来，

我为失落的珍珠哭泣，

我也哭泣我的愚蠢……

在爱情上我有失落，在文学事业上我要艰苦地攀登那绝壁上的绳索，去采那高峰上的红玫瑰——创作之花。

我在81年写了《苦菜花和我》（发表在吉林“江城”）、《铺路石》（发表在“北方文学”）、《回忆金剑啸》（发表在“龙沙”）、《致吉林》。

创作像生孩子一样，阵痛难熬，但一旦发表了也会带来欢欣。

这一年，病老头，眼又出血，双目失明了。他怕我担心，没有告诉我。

我很忙，早晨起床翻译《海誓》，上午上班，下午看作家之路的辅导文章，吃完晚饭又翻译，直到深夜才就寝。

一天，我意外地接到张忠和同志的信。他告诉我他保存一本《安荻和马华》，不久又收到他寄来的这本书。

失而复得，甚为高兴！

我拿着这本书，像找回走失的孩子一样高兴。

这本书，和我的命运一样，灾难重重！她有一只悲歌。

《安荻和马华》出版时，我还被关在日本宪兵队的地牢里。

我出狱后，已买不到她了，她被查封了。

直到1949年，我在书摊上偶然买到一本，可“文革”时我怕无限上纲把她火葬了。

幸而被读者保存下来这一本，是唯一的一本。

我像一条小溪，日日夜夜不停地流淌：遇着礁石，我会绕过去往前流淌；遇着蓬草，我会穿过蓬草往前流淌；遇到悬崖，我会跳下去摔得散碎，再在崖下聚集起来往前流淌——唱首前进的歌：“前进，莫后退！”

82年，我写了：

《难忘的鞋》，发表在《江城》；

《天涯海角》，发表在《北方文学》；

《母亲》，发表在《沈阳妇女杂志》；

《蜜蜂之歌》，发表在《江城》；

《春雪》，发表在《哈尔滨日报》；

《镜泊湖，我为你歌唱》，发表在《江城》。

这年十月，我去海南岛。

海南岛是个椰乡，满岛都长着椰子树。

海岸、街道、庭院、宾馆到处都有椰子树。它摇晃着像孔雀开屏的大叶子，结着像篮球大的硕果。是一片迷人的南国风光。

海口是座落在海岸上静静的海城，街道两旁椰树成行。

市场设在椰林里。卖甘蔗的，卖海螺的，卖珊瑚的……杂陈其间，十分热闹。

海南岛也是花的世界，到处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爬在墙上的珊瑚藤、爬在凉亭上的珍珠藤。

宾馆院子里的花更多：红宝钟、凤尾球、吊钟花、万里香、米兰、桂花……

到处飘着花的芬芳。

我到五公祠去游览。

在一棵蛋黄树下，有个凉亭。苏东坡被流放时，曾在此流连。我沉浸在梦幻中，我仿佛看见苏东坡头戴竹笠，脚穿木屐。他的小儿子苏过陪伴着他。

苏东坡是个爱国诗人，屡遭流放！

我赞美他，敬爱他。

我还参拜了海瑞之墓。

我默默的伫立墓前。

思绪万千。

海瑞是民族的骄傲；

海瑞没有死，他的英灵像日月照耀着后代！

十月二十七日，我来到鹿回头。

这里是珊瑚海滨。

月朦胧，海也朦胧，我坐在朦胧的珊瑚海滩上，耽于朦胧的遐想……

流连忘返，坐了很久很久。

从海滩回来，躺在床上，我还听见海涛轰响……我在海涛轰响中睡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又独自跑到海滩去看大海。

我惊呆了，一夜间海岸变成珊瑚之海：五颜六色的珊瑚，更闪耀的是红的、绿的、白的，简直是一片迷人的珊瑚海，多壮丽啊！

我贪婪地捡拾各色珊瑚、海石花。

我也在贪婪地拾着一首一首诗和一个一个梦。

我醉了。

我又来到天涯海角。

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

海连着天，天连着海。

海岸上矗立着两座岩石，近在咫尺，却是“天涯海角”。

举目南望，烟波浩渺。

从海南岛回来，我把海石花、珊瑚、海螺布置在博古架上。

我没有离开大海。

大海被我背回来了。

我写了：

《海思》；

《相思树》；

《雨声》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又迎来了1983年。

病老头的眼睛又一次出血，双目失明。我问他：

“你看见我吗？”

“只能看出个轮廓，能认出是你！”

“那还好，有我你就有眼睛。我给你读报，我替你做这做那，你放心好了，我就是你！”

他干瘪的脸泛起笑容，悄悄说：

“有你，我就有依靠！”

说是说，我心里却在为他愁，打着唉声。

病老头反劝我说：

“琳，别愁！水来掏沟，乐观点！”

我的好老头，他自己病了还在安慰我。

过了些天，他的眼疾似乎好些，他又能用那一只眼看见点光。

这天下大雪，我在书房。他偷偷上了街。

当他一瘸一拐地艰难走进屋时，我吃惊地搀扶着他问：

“你怎么了？”

“在大道上，我跌了一跤，昏了过去；幸有一个青年扶起了我。我心想回不来了，但到底还是爬回来了。”

“老周，这么大雪天，你怎么还出去？”

“我想给你时间，我上街买鸡蛋去，省得你自己去。”

他的手还提着一兜鸡蛋。

我把他扶上床，才看见他的腿跌伤了，他的脸、手、背部都摔肿了。

我忍不住地爱怜他，也抱怨他：

“这样的大雪天，这么冷，路滑，你两只眼又看不清，唉！看把你摔成什么样子了！”

他低下头说：

“我帮你干点零活，支持你写作呀！”

他的腿骨摔裂了，卧床三个月，吃药敷药，渐渐地他又能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在书房听见厨房响起切菜的刀声。我跑到厨房，看见他在用左手切菜。

“我右手摔伤了，还有左手哩！”

我真的生气了，把他左手握的刀抢下来，他又从我手中夺回去。

“琳，我得分担点你的生活重担啊！”

“不行！你这样分担，我不好受！”我又从他手中抢过刀来。

一九八三年，这一年我赶译完了《海誓》，写了散文《海思》。

二月一日，为了我们结婚三十年纪念日，病老头做了些好吃的庆祝。

“琳，今天是我们银婚纪念日！来，干一杯！”

“来，为你健康干杯！”

三十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真是“路漫漫兮，风雨同舟！”

三十年的岁月，风风雨雨，渗透着多少泪和血呀！

译改完《海誓》，是在中秋节那天，我和病老头去儿童公园散步。

儿童公园，曾留下我俩多少脚印，有幸福的脚印，也有灾难的脚印。

在审干的那年，我患了忧郁症，是病老头经常陪着我在白桦树下一条小路上散步。

多少风风雨雨的日子都是他陪伴着我挺了过来。

今天，又在白桦树下那条小路走着。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蓝蓝的天宇像无垠的碧海。

秋天来了，公园的花大部分都凋谢了。

病老头瘦瘦的身子拖着两条瘦腿，走累了就坐在椅子上喘气，吸一支烟。提了神，又笑着跟我说：

“琳，你今年太忙了，连一次公园也没来过。”

“你来过吗？”

“我单独来过四次了，那时正是万紫千红，清香四溢。可惜，你没来！”

确实，这一年是我最忙最辛苦的一年，既要审定外国文学稿，又要辅导“作家之路”的学员，还要翻译长篇，从早六点忙到晚十点。

我们从那白桦树下的小路并肩地走回来。老头又老又瘦，他皱着眉头，眯着眼睛吃力地走着。

想不到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散步！

这夜，圆圆的月亮，照在我们的窗上，窗下洒着一片银色月光。

老头和我望着窗外的月。老头吟起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一九八四年春天，我独自去杭州西湖。

这天雾朦朦。

西湖像睡在朦胧的雾中。

远处的天竺山、美人峰都浴在云天里。

山连着天，天连着山，飞来峰、玉泉山也只能看见朦朦胧胧的倩影；近处的山却在雾中透出绿影。“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技抹总相宜。”这是苏东坡的一首诗，诗意盎然。

我伫立在西湖苏堤边，沉浸在遐想中，仿佛听见自己的歌，这般温柔、情深……

啊，祖国，你如此多娇，不管我怎样忧伤，我都要为你歌唱。

1985年，《海誓》出版了。这是我最大的快乐。老头为我祝贺，他也分享着快乐。

这年写了《冬泳》，发表在《哈尔滨日报》；

写了《海恋》，发表在《北方文学》；

写了《女监》；

写了《一只思念的船》，发表在《诗林》；

写了《献》，发表在《诗林》。

五月，我去北戴河。从北戴河回来，老头高兴地说：“我盼啊盼，你总算回来了！”

老头不知为什么不愿我去远游！他说：

“我不明白，你为啥那么爱旅游？”

“有啥不明白的！我是文人，文人要写作。李白不是游了一辈子吗？”

他的确愿意经常陪伴着我而不外出。

我们母女俩常常出去看电影，他独自留在家里孤寂难耐，便对我说：

“晚上别出去看电影了！”

“看！”

他默然地低下了头。

六月八日，是我最悲痛的日子。

一早，我问老头：

“几点钟了？”

老头是我看钟的人。他为了照顾我睡眠，不敢把闹钟定时闹，一直为我看钟三十二年。

我睁开眼看看他，他挪了一下身子，不动也不语。我一骨碌起来，见时间不早了，就急忙穿上衣服去跑步。跑步回来，听见老头在呻吟，我快步走进卧室，见他已躺在地下，他一只脚弯曲着，一只脚挺直着，仰着头望着我细声说：

“你们想法吃饭啊！”

老头病得那么重，还在惦记着我们吃饭的事。

女儿晓琳也从她的卧室跑过来。她是医生，仔细地观察了她爸爸，说：

“爸爸，你好好躺着，别动，你脑出血了！”

我顿感到大难临头，不知所措！

我忙着给他穿衣服，去省文联要车。

我们七手八脚把他抬上车，送往医院抢救。

我用两只手托着他的脖子。他那无神的眼睛紧盯着我，微微动嘴：

“……我……我要死了！”

“别胡思乱想，住几天医院就会好的！你放心！”我为了安慰他故作镇静，装着笑脸对他说。其实，我的眼泪往肚里流呀！

送到医院急诊室时，他已说不出话了，只能用他一只手伸出来紧握我的手，以示告别！他还有一只眼睛流着泪！

他在挣扎，用另一只手拉着女儿晓琳的手，向她作无言告别。

他那只眼睛的光芒快要熄灭了，却还呆呆地望着我们。

医生嘱咐我：

“他病危！回去作善后准备准备吧！”

我把女儿留在他身边，我赶紧回去给他预备后事。

下午一点，我才赶回医院。

老头已闭上眼睛，离开人世。他死了！

晓琳，哭着站在他身边。

我忙着给老头更衣，伏在他尸体上失声痛哭、泪如泉涌。老头，你走得太匆匆，我哭你啊！……

料理好老头的后事，更感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在悲痛中，我写下了《孤雁》。

从此，我是一只南来北往的孤雁。

一只悲鸣的孤雁。

我木然凝视着远方，不能自已；于是又写下了《孤雁吟》，献给我的亲人。其词曰：

雁生北国兮，学于东瀛，

翱翔九天兮，壮志凌云。

三遇弯隼兮，险遭不测，

野鸦聒噪兮，不忍更闻。

侥幸生还兮，折翅落羽，

裂肝断肠兮，诉于黄天，

弋人何慕兮，我飞冥冥。

南上回峰兮，念群地横，

引颈北望兮，意结涕零。

尾 声

我和晓琳母女俩相依为命，

如今女儿就要远离我了，

两颗难于分离的心碎了。

我在车窗外抹眼泪，

她在车窗内哭鼻子。

无情的火车终于轰轰隆隆地开了。

“妈妈，我想你……！”

女儿在远方召唤着我。

秋天，我乘着思念的白云去探望她。

深圳是花城，

杜鹃花开得火红，

在花香弥漫的气氛中，母女俩拥抱在一起，

喜听女儿生活美满，科研进步，

我的心顿时灌满了蜜。

可我还是怀恋着老窝……

春天来了，我又飞回哈尔滨。

岁月如流……

田琳

一九八七年初稿于哈尔滨

一九八八年改稿于深圳

一九八九年完稿于浙江梅城

悼田琳

柳三痴

一

听罢噩耗泪不干，知音再见已难难。

铁窗苦度花容减，人海飘零两鬓斑。

尝许文章惊塞上，独怜才女殒江南。

芳魂寂寂尘缘断，何处曾托离恨天？

二

龙江才女忆田琳，负笈东瀛志未伸。

世路崎岖风雨骤，人间冷暖气萧森。

低眉一曲抒幽愤，妙笔成文铸国魂。

傲骨嶙峋真本色，且留后世漫评论。

三

斜阳西下又黄昏，独坐书斋忆故人。

江上泛舟浑似梦，长街漫步已成尘。

戏呼琳姐常玩笑，旋叫痴哥时反唇。

遥阻人天情漠漠，一番回首一伤神。

四

漫挥老泪写哀思，旧恨新愁只自知。

重读遗书心恻恻，再尝新蕊意迟迟。

无私友谊昭千古，有限年华又几时。

遥望南天荒冢下，孤魂何日可安栖！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九日，诗人中流以电话告余曰：“田琳于二月十七日病逝于深圳女儿家矣。”余骤闻之下，眼前忽现昏黑，瞬间而神志清，乃老泪横流。田琳笔名但娣，毕业于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当其留日时，课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中篇小说“安荻和马华”蜚声文坛，成为著名女作家。此说部已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早年以抗日罪系狱多年。后又以莫须有罪名饱尝铁窗风味，未届退休之年，被迫退休，尝耿耿于怀。于三十年代留日时邂逅于某生性多疑，限制其正常交往，甚至在公共汽车中手被或男相碰亦深受斥责，田琳不堪其扰乃愤然离异，返国后婚事亦屡受挫折。迨晚年，始遇知音，卜居于梅城，余方庆其所遇，不料未数年即罹恶疾弃世。综观其一生可谓坎坷极矣。田琳少余一岁，而余尝戏呼其为“琳姐”，彼屡屡抗议而未成，反唇相讥，呼余为“痴哥”以报复，彼晚年耳聋殊甚，非大呼无以应。当彼独居本埠时，曾约余泛舟江上，亦曾漫步长街幽巷共话桑麻。当彼远在江南时，屡以新茶邮赠，并附书信。余往往十复一二，盖无暇所致耳。田琳生性忠厚，作风朴实，以德报怨之事时有所闻。天才卓逸，抱有宏大著述志愿，当其远行前，曾告余，长达数十万言说部已写出十余万言。余嘉其壮志才高，并言拭目以待。孰料壮志未酬而身先殒、恨何如哉？恨何如哉？

(文学信息1992年2月28日)

再悼田琳

柳三痴

冰解松江终有日，待君北上已无期。

夜深忽梦年前事，相会酒家德信时。

写罢“悼田琳”七律四首之后，意犹未尽，补以“再悼田琳”。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五日，在长春德信酒家举行东北沦陷时期国际文学研讨会时，田琳曾由梅城到北京再到长春与会，约定九二年夏六月再会于哈尔滨。孰料好事多磨，九二年之约顿化乌有，田琳有知，岂能瞑目于地下！

(文学信息1992年2月28日)

悼田琳

中流

惊闻噩耗泪湿襟，极目雪飘泄流银。

故乡冰灯今犹亮，热血虽凝情未尽。

松江仍储千滴汗，蜜蜂身裹万里尘。

兰花风骨化为歌，捧出春光悼田琳。

注：田琳生前喜爱蜜蜂，不畏艰辛远飞采蜜。田琳生前著有文章题为“兰花”，以兰花自况风骨。

（文学信息1992年2月28日）

小舟停航

刘树声

我似乎感到东北女作家田琳，有些喜欢飘流。八十年代初，她的文学与生命的小舟，经过一段险阻，又启航了。十年后，本月十七日，当她飘流在遥远的南国深圳时，她的文学与生命的小舟，却突然停航。

有位哲人说人生就是旅行，她好象也不反对这个论断。所以，尽管暮年也要远行。89年，她带着乡愁离开黑土地，到南方与黄老师结缘。她告诉我生活得快活，而且在美丽的山水间，写出了十万字的《文学回忆录》，来了一次文学上的自我超越。东北有些文友，还为她的文学与生命的小舟飞溅出的浪花而高兴。

遗憾的是她到南方后，我没有与她再通信。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念及她，都想到她的中篇小说《安荻和马华》。当年，这部描写爱情、不幸遭遇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小说和她24岁文人照片，载于《华文每日》时，我都看过。那时，我觉得她在奈良女子高师读书，离我很遥远，但又很近，因为她的家在嫩水边的齐齐哈尔。近几年她飘流南国，我又觉得很遥远了，但又觉得近在咫尺，因为她的化身《安荻和马华》就在我的书架上，而且我始终把它视为她的可以传世的代表作。

荷兰的画坛大师梵高的作品，生前未曾得到世人的承认，后来才成为举世珍品。田琳的作品，不算很多也不能与梵氏相比。但她在沦陷期所写的作品，多年无人问津，也是事实。经过四十多年的审视，《安荻和马华》终于走进《中国新文学大系》第6卷（1938-1949），显示了它的存在和价值。然而，田琳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不知是因为对四十年代的旧作不感兴趣，还是因为她对名利淡漠。不管怎么说，生前得悉这个中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问世，该是一件幸事吧。

但娣，是她早期写作的笔名。不知为何，她所在的单位的人，有些也不为所知。可是，她写给我的一些书简，末尾却常属但娣。我想许是对一个她的早期作品读者的尊重，抑或是对一个熟人的友情的坦露。我看她谈话时，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偶而我也唤她一声但娣，她喜欢这个笔名。在谈论她的作品时，她从不说自己的作品那一篇好，似乎是让我从客观上作出审视。对她的同时代人的作品，她不多说话，也不作主观的吹嘘，从而给我留下了一种谦虚、持重的风格。有一次，她还为我朗诵了新发表的几首诗，让我评品一下，我说：“你的散文有诗情，诗就更有一些诗味了…”她听了有些不满足，张大了眼睛望着我，似乎希望我再谈出更具体的意见。我觉得她很朴素，象东北大森林中的白桦。

我想她是怀念故乡的，何况她的关系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所以去年九月初，参加东北沦陷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德信酒家又见到了她，并未感意外。会后，又同车返哈。她望着车窗外的秋野，我一时猜不透她是在想什么。她在《北方文学》月刊当了二、三十年编辑、作家，作品还有中篇小说《没有太阳的日子》（1945年冬《东北文学》），出版了译作《海誓》，写了不少散文、诗歌。我更期待着早日读到她的十万字的《文学回忆录》。可是，这次北行却成了她与故乡和文友的永诀。

同饮松花江水的萧红，当年葬身于香港浅水湾，后来吴瑛长眠在南京玄武湖畔。今天，历经风尘的田琳又谢世于南国的深圳，我自然是伤痛的。

文学与生命的小舟沉没了。但田琳的带有童稚般的语声，和温和的微笑，将长久的留在我的记忆里！

田琳逝世五日二月二十二日夜急就

（文学信息1992年2月28日）

悼田琳

梁山丁

“二月十七日，田琳在深圳逝世！”

二月二十七日午后六时来电话，传来这个噩耗。据他说刚接到陈隄来信。原来，前几天接到田琳女儿周晓琳来信，通知我，田琳在深圳入院，我刚托当代诗歌书刊发行部从沈阳汇去百元做为治病用，现在传来噩耗，这钱只好做为奠仪了。

我和田琳认识是在她留学日本时，有一年她从日本回国，来长春南湖到我家串门，由我介绍她的中篇小说《安荻和马华》在开明书局出版。算来，已半个世纪了。

一九八六年，我编《长夜萤火》时，曾选她五篇小说：《风》、《砍柴妇》《售血者》《忽玛河之夜》《安荻和马华》并写了她的简介：

但娣，原名田琳，曾用笔名：晓希、但娣、罗荔、田湘等。一九一六年八月生于黑龙江省汤原县。一九三五年毕业于黑龙江女师。一九三七年官费考入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改为奈良女子大学）一九四二年毕业回国，任开原女高教师，同年十二月因反满抗日被捕入狱。

…………

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工作，任东北电影公司编剧；一九五三年调黑龙江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发表散文诗、报告文学《一颗不灭的星》《小蓝花》等四十多篇，最近翻译出版了日本长篇小说《海誓》。现已离休，仍从事创作。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她从哈尔滨将《长夜萤火》邮来，在扉页上写着：

“送给文学老战友山丁兄指正，留念”

这本书保存在我的书架上，想不到它已成为田琳的遗物了。

她活着时，每次来信，都称我为文学上的知己。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中对田琳女作家有很高的评价（见杨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350页）

“但娣的文学视野较前述女作家开阔，把笔锋伸向社会底层，描写渔民、穷学生、孤儿乞丐、流浪汉、伤残者、卖春妇等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群。风格苍茫凄婉，有高尔基早期流浪汉小说的况味。”

我觉得杨义同志的评价是合适的。田琳在东北沦陷区的位置，是萧红出走以后，一位继起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不仅写小说，尤其散文，写得很有风采。

可惜，一代文星，又陨落了一颗。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年第三个十年的中篇小说卷，选入她的《安荻和马华》，我正在为她欢呼时，她却走了。我希望正在编辑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能将她的散文多选入几篇。（大系将由张毓茂主编，沈阳出版社出版）

田琳虽然人走了，她的作品还在，我已为她的小说集编好。邮给陈隄教授。希望能作为哈尔滨文学院系列补充教材出版。

这篇《悼田琳》就作为但娣小说选的代序吧！

一九九二、二、二八于

沈阳

(文学信息1992年3月15日)

悼念女作家田琳

李默

你曾是荒漠沙丘深处的一簇野蒿，

十四年，凄风苦雨的摧残并没能使你凋零枯槁，

丛丛青翠，唤醒了沉睡大地的滚滚春潮；

你曾是野岭峭壁缝隙的一棵小草，

十四年，酷暑严寒的磨难反倒把你的须根扎得更深更牢，

点点新绿，搅起了埋葬残冬的阵阵喧嚣！

你也是漫漫长夜一只萤火虫微弱的光亮，

颤抖着，顽强地闪烁在幽深漆暗的灌丛榛莽，

使夜行者从浑噩中辨识出绕过泥沼的方向；

你也是漫漫大海一叶轻舟单薄的帆樯，

支撑着，艰难地颠簸在湍激咆哮的惊涛骇浪，

为迷航人从惶惑里察觉到挣脱凶险漩涡的希望！

你虽不是一员奋战林海雪原的英勇抗联战将，

你却用一只秃笔当作刀枪，

屡屡把愤怒的匕首刺进异族侵略者血污的心脏；

你虽不曾浴血拼杀在硝烟弹雨的抗日战场，

你却写下了一篇篇震撼敌胆的文章，

把复仇的投枪戳穿法西斯强盗肮脏的胸膛！

你虽不曾把凶残顽敌的牢底坐穿，

你却透过严密的铁窗顽强散播了坚定的必胜信念；

你虽不曾写出过光昭日月的不朽诗篇，

你却给世人留下了《安荻和马华》的伟大形象。

你虽似过早地陨落在辛勤耕耘大半生的塞北文坛，

而你呕尽心血的光辉创作却将在这片黑土地上永远流传，永远……

（文学信息1992年3月15日）

哭田琳

陈隄

一

世路崎岖举步难，凄风苦雨夜漫漫。

尘寰撒手君归去，当做幽冥自在仙。

二

君似飘蓬我亦然，浮沉人海一年年。

而今唯有嶙嶙骨，哭己哭君泪不干。

三

解冻东风不觉寒，空庭独立望江南。

白云万里孤魂冷，再见无缘只恨天。

四

无尽哀思涌笔端，知心旧雨半黄泉。

人生原是黄粱梦，聚散何须苦苦看。

（文学信息1992年3月15日）

悼念田琳

春子

尽管你一生坎坷，

那是生命航线上的拼搏，

漫漫长夜，闪闪萤火

你写下了《风》《砍柴妇》《安荻和马华》

还有，《售血者》

它拨亮人心，消除迷惑，

人们记住，这点点萤火。

煦煦阳光，大好山河，

你激情满怀，奔向生活，

发表了《一颗不灭的星》

《小兰花》等四十多篇著作，

还翻译了《海誓》日本长篇小说。

你才华奔放，视野开阔，

文章朴实执着

我钦佩你的文采，更欣赏你的风格，

我赞美你是女中一杰，

尽管我们只见过两次，

但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如今，你去了，

我怎能不泪眼滂沱。

（文学信息1992年3月15日）

悼念田琳的遥祭仪式在沈阳举行

1. 时间：三月十日
2. 地点：辽宁作协老干部会议室
3. 参加人：（以出席先后顺序）

梁山丁 辽宁作家协会作家

刘毅 中国医大教授、笔名木风、作家

邱丽媛 大连中心医院大夫

里扬 沈阳市作协专业作家

李柯炬 沈阳市书法协会书法家、作家

朱媞 辽宁省协委、著名女作家

李素秀 辽宁省实验小学教师

郭锋 春风文艺出版社副编审

刘丹华 原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诗人

王建中 辽宁社科院文研所所长

杨絮 沈阳新华印刷厂、女作家

于雷 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审、作家、翻译家

陈南 教师

4. 由木风宣布开会（大家入场签名）然后由梁山丁介绍田琳同志生平，念百字令，以后，由女作家杨絮朗诵悼田琳诗稿、声泪俱下，刘丹华的悼文《一颗永不陨落的星》，女作家朱媞，里扬相继讲话，朱媞悲痛地回忆与田琳交游，在会场上哭泣。里扬讲到田琳的《安荻和马华》中篇小说，她说评价一个人要看他的主要表现。接着作家李柯炬回忆他编辑《东北文学》时代，田琳曾给刊物写稿，当时对别人给伪满作家扣上汉奸文人帽子，田琳立即与之展开斗争，田琳的斗争精神是令人敬佩的，文研所所长王建中发言：《长夜萤火》出版后田琳的欢呼，很欣赏，对伪满时代的作家应该有正确的看法，我认为没走的作家比那些流亡的作家条件更艰苦，可从敌伪秘件中了解到敌人是多么嚣张，活着就是斗争，这些作家是有功之臣，东北文学史上的典型人物，田琳是当之无愧。她的散文诗《小兰花》就是她的写照，给田琳的评价受到与会者的同感。接着由于雷朗诵悼田琳古体诗，郭锋也朗诵了悼田琳诗，最后由陈南回忆田琳在她家的情况，田琳和她讲述一生的历史是令人感动的。

5. 由梁山丁提出向田琳遗像三鞠躬，后照像留念。

6. 会场：横额：悼念现代著名女作家田琳同志，两旁贴挽联，上联：“重会无期，明月不归沉碧海” 下联：“遗篇传世，文章何处哭秋风” 墙上贴田琳遗像，供桌上有三盘水果两盆花，一本书《中国新文学大系》载有《安荻和马华》。

（文学信息 1992年4月5日）

悼词

木风

天哪！田琳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真的，她的这一生过的太难，走的太累了。安息吧，也是一个不幸人的幸福，但作为一个老朋友，却难于平静的将她忘掉，七十多岁了，还保有不泯的童心。她呀！终于离开这说不清的人间我怎么不老泪滂沱，呼天唤地的痛哭呢！她的音容笑貌和她闪光的作品，将永远记在心间。

（文学信息 1992年4月5日）

悼田琳

方阡

万物皆身外。五十载永驻心头，此事为爱。我欲成尘君已烬，梦里青春常在。与时新历劫难坏。似有如无浮过眼，是屋梁落月失颜色。青枫林，黑关塞。明珠薏苡应不再。且洒向青天碧海，一瓢敬酹。我有满怀心腹事，憎命文章叵奈。怎按捺思潮澎湃。老泪年来剩无几，两三滴作息偿业债。君在上，阡再拜。

（文学信息 1992年4月5日）

朱媞， “安息吧！ 田琳同志”

当我知道田琳同志故去的噩耗，我已经哭不成声。 她是我的老大姐， 也是我文学路上的前辈。 在我中学的时候， 我就爱读她的<安荻和马华>。 文学是那么清新， 感情是那么真挚， 所反映的我们生活着的时代又那么深刻。 我多么相认识她呀！ 我那时也在写小说， 写散文。 很多可以见面的机会都错过去了， 真到解放好多年以后， 才终于实现我的宿愿。

一九八六年仲夏， 为庆祝山丁同志主编的<长夜萤火>出版， 一些作者小聚在沈阳时我们相见了。 就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是那样的亲密， 那样熟悉。 在大家游福陵那天， 她自始至终一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告诉我她的生活经历和对文友的思恋之情。。。

第二天她来沈阳时住宿在我家， 我俩睡在一张大床上， 她在我的耳边低声倾述她几次婚变的痛苦， 与多次被关进监狱所受的折磨。 她的人生道路太很难太严酷了。 我边听着她的讲话， 眼睛边望着窗外远方的太空繁星， 默默无声地流淌着眼泪。

一个女人选择了文学的道路，是多么不容易， 她需要比男人？出更大的代价， 她需要从心底深处承受发生在人世间的多种苦难与折磨， 特别还要经受社会加给自己， 加给女人的折磨。 但是任凭狂风暴雨的袭击， 她仍是那么乐观， 那么坚强地去面对人生， 迎接挑战， 毅然握紧笔写下去。

最近几年我们又多次在哈尔滨， 在长春， 在沈阳， 在大连相聚。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语， 诉不完的情愫。 去年在长春参加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后， 我对她说， 和我们一起到沈阳去吧！ 她说：要去哈尔滨办转离手续， 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多孤单哪！ 她说：命里注定是一个人的！ 这时他的声音低沉，哽咽， 我当时看到她的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内心是怎样翻腾着痛苦的泼澜啊！ 我不忍心再说什么， 就这样握别了， 谁知竟成永别。 我的田琳老友， 你带走的是你的痛苦与凄凉， 你留给人民的却是不朽的作品， 它们给人热情的激动与启发人们白折不挠地奔向并非坦的明天。

(文学信息1992年4月5日)

田琳：真诚而坚强的人

李柯炬

我们的老朋友、现代著名女作家田琳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我和田琳同志是在东北大地最黑暗的敌伪统治时期相识的，一同怀着渴望光明的心，一同不畏艰险地用笔倾泻胸中的愤懑。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坎坷的命运，不寻常的遭遇，曾使我们失去联系，甚至是生死未卜。直到我们真正来到阳光下的日子里，虽然身居两地，但书信不断往来，人也不断地相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获得的最宝贵的春天，尽管已经白发苍苍，步履蹒跚。

就在此时，田琳同志却先我们而去了。抚今追昔，无比哀痛。

田琳是朋友当中一个真诚的人。她不虚伪，认定了的事便全身心地投入。对文学创作是这样，当她选定了写作这条路，这条路在那个时代无名无利但有杀身之虞的路，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波折，也义无反顾地一往直前，“虽九死而犹未悔”。她留给我们的作品可以作证，有多少是在身处敌伪警特环伺之中写下的，她的作品融进了她的生命，她的感情，她的全部内心世界。对于生活她也是这样，一经她钟爱上了的人，不论反馈给她的是怎样的折磨和灾难，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和不幸，她都甘受如饴，只追求自己的无私的奉献，虽然她一生中尝尽了本不该都属于她的苦果。

田琳在朋友当中又是一个最坚强的人。作家就注定得不到瞬息精神上的平定生活，她的充满激情的控诉旧世界的作品又带给她监狱和镣铐，在此之后，在甩掉了亡国奴的帽子时，又飞来最先出厂的“伪满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扣在她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从阴沟里向她泼来……。作一个人，当一个作家，能说容易吗？田琳就是田琳，没有写的自由，她就思索，有了写的自由，她就写作。她在成为众矢之的情况下，写出中篇《失掉太阳的日子》发表在我主编的《东北文学》上，作为她的反击，也是对我的支持。有些年，当她蒙冤失去工作，她毅然拖着病身操起铁锹去挖地，挽起裤腿赤脚下田踩格子……，田琳硬是压不倒，挤不垮，以一个强者的睥睨人世的姿态迎接来灿烂的阳光。她的坚强，如果从外貌上看瘦削的身材，说起话来慢吞吞的，使人是无法理解的。但她是真正坚强的人，我看到一部新出版的《现代女强人辞典》收进了她的小传，我初以为文不对题，其实还是有见地的。

田琳曾说过：“我这只破损了的小舟，又扬起风帆，向前远航……”纪念死者不应该是眼泪，应该珍惜还属于我们的有限岁月，用尚未磨损的秃笔，继续年轻时的初衷，写出无愧于先我们而去的老友的作品来，以慰她的在天之灵。

（文学信息1992年4月5日）

哭田琳

杨絮

田琳啊！我的好姊妹

你悄悄的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我们

你有什么事这么急

你也许感到太疲倦

想去一个地方休息

去年九月大家在长春聚首

你的身影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

你说还要飞到深圳呆上半年

时至今日还不到半年

你却撒手人间

不作片刻停留

案头上放着你的《安荻和马华》

抽屉里有你问候的书信

箱䇲里还有你的笔墨丹青

那副荷花画得多好呵

这些都是你留给我的遗念

田琳，我的好姊妹

你对我却比别人高看了一眼

我忘不了你

忘不了你呵

今天大家又在聚会

座上没有你

我们却是向你来告别

田琳呵，我的好姊妹

你若有灵，定会来到我们中间

倾听我们对你的惜别之情

青山常在

绿水永流

你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文学信息 1992年4月7日）

悼田琳

于雷

一枝冷艳斗冰天，万斛幽思注笔端。

倩影轻摇囚槛月，芳龄苦度鬼门关。

只缘热恋乌光土，不计空抛翠袖衫。

惊悉香踪缥飘去，泪沾断角怨笳篇。

哭罢田琳哭自身，同为风雨葬青春；

重修灵性方挥笔，月坠星摇梦已沉。

半世披枷步蹒跚，一朝夜晓洗沉冤；

谁知含笑姗姗去，不为虚名驻世间。

1992.3.10

(文学信息 1992年4月7日)

悼田琳

郭锋

昔年夜黑痛亡家，

冻土冰园一朵花。

东渡负笈思报国，

回乡挥笔著马华。

相识共论晴开日，

誓志再书锦绣葩。

岂料病魔夺夙愿，

风愁云怒暗天涯。

1992.3.10

注：马华、田琳著《安荻和马华》

(文学信息 1992年4月7日)

未曾相识人去远

里扬

春风乍暖，空前盆景才生气盎然。不料三月四日那天便接梁山丁兄电话说：“女作家田琳逝世”约我十日在沈开遥祭会。

我久久顿生痴想：田琳整整大我十岁，她的一生是坎坷的，尤其在她的后半生中我也曾踏过她的足迹。虽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但时间不饶人，不仅垂垂老矣，而下一站便是死亡。死亡是残酷的，不论你有未竟的事业，和等无未归的人，都不能容缓和等待。

我和田琳生就无缘“远在我十四岁时就读过她的作品《风》、《砍柴妇》等（在敌伪《大阪每日》上）但娣的笔名是我早就熟悉的。

岁月悠悠，有多少沦陷时作家的名字都随着青少年时光掠影而过。并有多少人都在历史车轮下被无情地碾来碾去无从相与闻。

78年我被“改正”之后，回到《芒种》编辑部，大约在81年我在《北方文学》上发表一篇小说《安香之囍》，藉而知道田琳也在《北方》编辑部。接着我到长春、哈尔滨去开会，感激鲁琪兄请鲁秀珍、宋学孟二友去接我，不巧那天大雨滂沱，我也无法要求再转访田琳，因此未得相见。

84年我去北京，到语言学院阎纯德（教授）家做客（阎先生正编写《文学家辞典》）阎谈及我的经历时说：“田琳比你还坎坷、凄惨；而你俩又是东北女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人。”午餐三个小时，我们几乎忘了吃、喝地只感慨万千地谈着田琳。

去年我们受到邀请，我和韩彤准备去哈参加萧红纪念会，不巧我临去又摔伤骨折，迄今才下榻走动。

想不到，这一片诚心想会会的前辈大姐，竟因阴差阳错的始终未得一见，她几次来沈都赶上我外出，如今更是连会见的希望都没有了。遗憾变成遗恨！恨这无情的病魔竟夺去了一位有刚强意志，对文学事业有着顽强的斗争精神并有卓越的贡献的大姐，实感痛心！

在三月十日这天，我们在沈的遥祭会中，我也加入了大哥大姐的这一行。我们在沉痛哀悼之中，我向着田琳大姐的遗像，深深地鞠一躬：“亲爱的田琳大姐我总算‘看见’您了”！夫复可言！可惜我们的“会”而不是“喜相知”而是“恨无缘”。但见《现代文学大系》中编进了您的《安荻和马华》稍有安慰！安息吧！你无愧于一生，我们永远纪念你，理解你！并献上一首小诗：

“小舟”扬帆人去远，

辗转漩涡五十年。

痛拭安荻招魂泪，

喜逢马华迎彼岸。

（文学信息1992年4月7日）

遥奠田琳

柳三痴

斜阳西坠欲黄昏，独向天涯吊故人。

杨柳楼头怀往事，复兴街上有屐痕。

孤舟风雨飘何地？零雁哀鸣遏九云。

大限到时撒手去，百年长恨与谁论！

自悉田琳溘逝，心情黯淡。三十年代中期，余久仰田琳之名，无由识荆，盖余秉性愚騃，不善交游，仅有咫尺一、二友好相往还，至蜚声文坛之古丁、山丁、疑迟、金音……若干子，皆光复后相识者，余与田琳识于更后，乃方曦山丁二兄相偕往访，蒙其夫妇款以酒食，至是始逐渐了解其为人，耿直热情，历经坎坷，犹笔耕不已。当其南行深圳、梅城，每岁新茶入市，必通邮寄馈赠，余懒于书，其来信三、四始作一覆。田琳居哈南岗区复兴街七号二楼，九年前，辽宁诸友好若王秋萤、梁山丁李素秀夫妇、李乔、杨絮，李柯炬、朱媞夫妇，蓝苓诸氏，咸集其家，杯酒言欢，乐何如也！其家杨柳覆窗，绿荫满室，歌声笑语，此伏彼起，若忘老之已至也。灯阑人散，送客于复兴街头，互道珍重而分袂。自田琳逝世后，余偶经其故居，但见杨柳绽青，行将婆娑而舞，仰望楼窗，若故人宛在；而复兴街上依稀有其相送之屐痕。余心不觉惨泣，余疚于心者，其几次北归，皆未尽地主之谊，尤以客岁九月其不远数千里前来出席东北沦陷时期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同车来哈，余未往视，至其离哈，余亦未往送，孰料此次之别，竟成最后一次，余心愧悔交加，无可言状！田琳有知，其恕我乎？

(文学信息 1992年4月7日)

哭田琳

冯为群

听到田琳逝世的消息，我特别悲痛。在我的脑子里好多天转不过弯来，总不相信她会死。《渴望》里有个歌不是唱“好人一生平安”吗？田琳可谓是大好人，那为什么就死了呢？！莫不是这个歌仅仅是个“祝愿”，就象诅咒坏人早死、都死终不见死净、灭绝一样？哎，人啊，好人不得好报，怎么不叫人更加痛心！

我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如果象当今的社会管顾客叫“上帝”，那么作家何尝不是我的“上帝”呢？这样的称谓他们倒不完全是因我自幼喜欢文学而对作家产生的一种信奉和崇拜，而他们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怎能不把他们当成“上帝”一样看待呢？可是真想不到“上帝”也会死！我所结识的东北沦陷时期作家，算田琳已经有三位（那两位是杲杳和李乔）先后离开了人世，并且又都是被不治之症夺去了生命，所以尽管有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还是忍不住流泪哭悼田琳。

现在有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理解万岁”，这恐怕是针对新老两代人产生的“代沟”现象由青年人发出来的感慨。是的，人需要的是理解。在活着的人种，对于他所做的一切都想报功请赏的人能有几个，而投机钻营总想达到个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更是少有；何况坎坷的人生，不平坦的道路，使多少人蒙冤受苦，如果人与人之间不互相理解，那么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幸福美好的明天？！但生活的实际往往又都是不如人心意的，不理解人的事情也屡屡发生。

比如田琳，她的一生多半是在不被人理解的情况下度过的。有谁能体谅她在日本留学时穷困潦倒，依靠卖书求生的生活？谁会想到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东北沦陷时期作家被日伪作为反满抗日的政治犯抓进监牢，而在东北解放看到曙光之后被打成“伪满作家”、“汉奸文人”和“日本特务”？如果说所有的人都希望别人理解自己，那么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怀有这种心情尤为强烈。他们生活在日本侵占的领土，过着亡国奴的生活，虽说没有屈服，但斗争还是十分艰苦的，甚至在这里斗争的艰苦程度，要超过其他地方，这似乎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然而有人就是不承认这一点，当时的作家仅仅希望个“理解”都不给，非要把他们赶到敌人那边去，结果造成了许多不应该有的悲剧，你说这能不叫人寒心吗？！

我认为，人们所喊的“理解万岁”，也就是在呼唤“实事求是万岁”。因为要去别人理解自己的人，并无所求，更无邪恶杂念，只是希望实事求是的对待他，所以我觉得这种要求并不过分。也许有人会说：“我所批判的也不是凭空捏造，所下的结论也是根据事实得出来的呀。”不错，应该承认，批判东北沦陷时期作家的人绝大多数都有根据。但是，他所根据的只是某某人在哪说了什么话，或是当了什么“官”，出席了什么会，等等，而不是从根本上全面地考查一个人。所以这种批判和得出的结论尽管根据的是“事实”，但却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实事求是既要“全面”，而又要“考查”；所谓“全面”就是一点不漏（当然更不允许寻章摘句），所谓“考查”就是分析、研究那些“全面”的事物，这样去认识和得出来的结论，才是比较正确的，才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我说那个“理解万岁”，实则就是“实事求是万岁”。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应当发扬这种传统和作风去理解每一个人，特别是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再不要去做那伤害人们心灵和纯真感情的事情了。我哭悼田琳，就是希望从她的身上吸取教训，让我们的文艺界，让文学就是人学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当然也包括那些研究文学的人），去真正的理解人，永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人。

当“理解万岁！”“实事求是万岁！”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有血有肉的实际生活的时候，那无论是对死者还是对活着的人，都是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田琳同志，安息吧，我们永远悼念您。

（文学信息 1992年5月25日）

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死

李春燕

惊闻女作家田琳逝世，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不知怎的，忽然想起去年九月在长春召开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那个会上，我因是会议筹备人之一，所以忙东忙西，陷在事务里，没有能和当时参加会议的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好好聊聊。别人都还可以，将来还有机会见面，唯独和田琳却永无再见的时候！现在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我以前曾几次痛下决心：今后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见到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都要把情叙尽，把话说完，再不能象对杲杳和李乔那样，虽经几次访问，但总感谈的不深不透，以至到他们做古离世，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可是，决心和实践往往并不相符。对于田琳，可以说除了山丁之外，就是访问她最多最细了。如果在平时也许我算知道她情况最多的人之一了，而一当失去了她，心里总感到空荡荡的，好象有好多话还没有说。于是，遗憾和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这恐怕是人的一种难以控制的感情吧！

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多愁善感的人大多喜欢悲剧。悲剧的人生，悲剧的命运，悲剧的价值和意义，有时是比那些正剧更感人肺腑，发人深思。正是在这一点上，田琳的悲剧生活深深震撼了我。在多次访问中，她敞开心扉的讲，我饱含热泪的听。求学的艰难，爱情的不幸，牢狱的痛苦，错处时的悲怆，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她当时的思想感情，都讲得一清二楚，甚至连在日本奈良留学时，她男朋友不让她见别的男人而把她锁在屋里不让出门等细节，都如实的告诉了我。

坎坷的人生却使她更坚强起来。共和国成立以后，她老老实实的工作，勤勤恳恳的创作，即使是步履艰难，她也仍然用文学报效祖国。这个悲剧的产儿，在她的一生中用她的悲剧命运教育和启迪了多少人们啊！

田琳的悲剧生活都是悲壮的，所以反映在她的创作上总能给人们以积极的力量。战争给流离失所的难民带来的不幸是深重的，安荻和马华这对小夫妻的被迫离散不就是一个明证吗？马华在流浪中投水自杀了，安荻岂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他们用血淋淋的事实证实着一个民族的悲壮历程（《安荻和马华》）。一朵漂在水中，挂在树枝上都能活，都能开着美丽的小花儿，不正是作家田琳的真实写照吗？求生的欲望，坚强的信心，旺盛的生命力，不能不说是她顽强性格浓缩出来的崇高形象。“小兰花儿爱这世界，她才挣扎着活，想装点人间。”多么宽广的心胸呀！（《小兰花》）她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的感人力量，就连日伪首都警特秘件《关于侦察利用文艺和演剧进行反满抗日活动情况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田琳作品的宣传作用。“秘件”引用田琳发表在《青年文化》上的《戒》中的话说：“当你遇到可怕的灾难时，你必须勇敢顽强斗争。真理是肯定存在的。什么也不要怕。我们必须用生命去同企图伤害我们的一切敌人进行反抗，用强烈的自信去……这样，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只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胜利必然归于我们。为什么流泪呢？只要我们做了我们应当做的一切，不就可以了吗？”“他那充满力量的话语，句句都打动了她的有着伤痕的心。”“她站起身来，她就象一个人从恶梦中醒来似的，生命的火焰开始在她的意识中燃烧起来了。”“秘件”认为，“文章通过浪漫的色彩表现了一种革命的信念。”所以田琳被列在了敌人掌握的反满抗日作家的名册上。我想，不用一一举例，田琳的创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已经很清楚了。

我作为一个文学研究人员，十多年来在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时，用心的理解着当时所有作家的创作，这之中当然也包括田琳同志在内。对当时的作家研究越细，看的越真，也就越加感觉到生活在日伪时期的作家的创作尤为艰难。他们一方面是生活中的真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真人，另一方面也必须是舞台上的角色，虽然具有真人的灵魂，但必须去扮相各种类型的人物。如果不从扮相中去识别作家，就难以寻求到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真谛。田琳同志曾说过：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是在呐喊，但我们不敢高唱反满抗日的歌，是悄声在嗓子里哼着反抗的歌，或者说，哭着唱着悲歌，以唤醒民众的觉醒。我们是在发光，但我们不敢点起烽火，”只能“象萤火虫一样，在夜里纷飞，发出绿色的金光，光虽不大但是飞的灯，有光就能划破黑暗，有光就能指明道路，有光就有希望。”（《为<长夜萤火>诞生而欢呼》）那时的人们就是靠着这股“希望”活下来的，那时的文学也就是靠着这股“希望”创作出的。复杂的时代，复杂的历史，培育出复杂的作家，复杂的文学。田琳的一生会告诉我们每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应该以怎样的感情去认识和理解作家。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不应该简单地下个结论，是不是汉奸文学或抗日文学，而应去认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复杂的历史环境，那个创作的艰难，那个作品所能反映的生活，以至还有其他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等等。

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死，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家，哪个死了呢？没有。田琳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她的作品在新时期被收进《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这更增强了她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的地位，所以，田琳不会死，她会以其作品同我们活着的人交往谈心，而我们也会从她的作品中品味人间的苦难与忧愁，共享人世的幸福与欢乐。

安息吧，田琳同志。

1992、5、4

（文学信息 1992年5月25日）

百字令——悼田琳老友

梁山丁

元宵灯落，

又匆匆，

到了“三八”佳节。

噩耗传来惊如梦，

才女殒凋寒怯。

携手江南，

重逢塞外，

渤海湾头诀！

楼空凤去，

如今花谢音绝。

看《安荻和马华》艺林选入，

声誉昭明月。

东北作家争相贺。

囹圄浩歌方彻。

婚变几番，

晚年得福，

坎坷何堪说！

文章知己，

沈城遥祭英杰。

附记：此令，三月十日遥祭田琳老友，曾当众朗诵，经张秀材兄斧正，特发表致谢！

作者

一九九二年谷雨

(文学信息1992年5月25日)

诗囊重拣忆田琳

李柯炬

东北著名女作家田琳，笔名但娣，不幸于今春二月十七日在深圳病逝。五十年前老友，同历时代风雨，几番文学上合作，堪称知交。噩耗传来，哀痛无已。翻检旧时诗集诗稿，得若干有关彼此交往即兴之作，整理于此，藉抒悼念之情。

生当雨骤风狂际，

笔底狂澜血泪诗。

何必忧怀追逝水，

寒冰解后见新枝。

此篇为一九四四年秋日，初识田琳时寄赠。她当时经历第一次婚变，归国后又因反满抗日被判刑二年。以监外执行的“罪犯”身份被安置在长春“满映”。由于她神情沮丧，意志消沉，诗以慰藉。

太阳时露复时藏，

为索新篇敢跳墙。

待月无人君莫笑，

隔帘三处卧鸳鸯。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田琳抖掉身心枷锁，开始投向新的征途。她与陈致远结婚，和李芒夫妇、姚颖夫妇合住一栋原日人的空房里，因社会治安较乱，他们堵门走窗，夜晚以床单相隔同宿一室。我每次前往探望取稿也只有跳墙钻窗而入，戏写此篇。这期间田琳写下中篇小说《失掉太阳的日子》、短篇小说《血族》、《伙伴》等，发表在我主编的《东北文学》月刊上。

宏文初见翻疑梦，

旨酒三巡信始真。

风雨硝烟成往事，

百年喜得此阳春。

暗夜长歌未晓天，

离乡去国几经年。

忧心悄付东瀛水，

拭泪书成售血篇。

古树参天发嫩枝，

劫尘历尽望丰姿。

当年投笔从戎客，

今日萧疏鬓有丝。

人生聚散真容易，

南北东西任尔飞。

且喜案头留倩影，

幽斋静对沐夕晖。

由于战争和动乱，30多年不通音讯。1981年看到报刊上介绍她的文章《破损的小舟又启航了》，从此恢复友谊交往。1984年她来沈阳和诸文友相聚，畅游福陵尽一日欢，复赠诗五首，现摘录其中四首。《售血者》是她旅日时创作的名篇小说。

南天尺素传花信，

北地冰消未见梅。

又是一年春到也，

诗情画意任徘徊。

1986年早春我去哈尔滨时，田琳已随女儿移居深圳，得手书告及彼地正繁花似锦，暇时则以写诗绘画自遣。爰寄此篇以答之。

送君北上两凄然，

聚首青春别暮年。

海角天涯何处是？

《三投炼狱》待名篇。

逾时不久，田琳函告“希望在大连做最后最珍惜的一聚”，我们遵命驰赴海滨。时为1990年6月，山丁亦在大连疗养，会晤一周，海滩浴场留下可珍贵的足印，田琳旋即北上哈尔滨办事，驿头送别，不胜留恋。《三投炼狱》是她已脱稿的长达三十万字的自传，已与出版社商洽出版。

人间万事苦分离，

缘尽长诀总有期。

今日怀君开旧箧，

断鸿何处寄哀思。

1991年在长春召开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我们的最后相聚。她认真地参加会议，并有准备地发言。分手时一再叮嘱朋友们去南方时，不要忘记看望她。1991年冬她信中说有病可能要住院，但不久传来的却是瞑目而去的噩耗。她是位真诚的朋友，坚强的女性，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著名女作家。

文学信息1992年5月25日

悼念田琳女士

冈田英树，姜美兴（译者）

从陈隄先生的信中得知田琳女士已经去世。“女作家田琳（但娣）……最近突然患肝癌病逝，享年77岁。田琳女士多苦多难的一生，在江南突然去世使我不禁流下同情之泪”。这是在2月21日的信中提到的。去年9月在长春召开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初次相见至今仅五个多月。她赠给我在那时的合影、和《季刊中国》（20号90、3、1）以及“从满洲国来的二名留学生”，还有写给我的鼓励信后仅4个月。并且组成在伪满生活的老作家访日代表团让我联系拟于今秋访问日本，田琳的芳名已被确认为该代表团的一员，不久，突然得到讣告。

10月9日在给我的信中，田琳女士是这样写的：“我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入过三次监狱，第一次是在日本统治时期。两次都是冤罪，两次结婚也都失败了。一次是与田瑯结婚，由于冤罪而离婚。第二次由于患了重病，恰似一支被暴风雨袭击、即将沉没的小船，但是我没有沉没，又拿起笔来，重新开始想要写文章，这仅是自我安慰而已。”

田琳1916年8月5日生于黑龙江省汤原县，成长于齐齐哈尔。1937年作为官费留学生留学于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苦于贫困与患病，在此期间，撰写作品发表在《华文大阪每日》报刊上。然而在留学期间，受到最大的打击是她的丈夫田瑯和她离婚。她在信中写道：“我太幼稚了，仅在19岁时，对那个人未能很好的了解”。

1942年由日本回国，计划逃亡关内而失败，被宪兵队逮捕，因逃亡罪被判处徒刑二年，关进长春监狱，由于患伤寒病而监外执行。在“满映”临时任职。祖国光复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电影公司留用。1947年组织上对她的经历有所怀疑，隔离审查三个月后，收容于佳木斯监狱18个月之久。患了淋巴腺结核与肺结核病症，于1948年8月获得释放。因为这个冤罪与第二个丈夫陈致远离婚。1953年8月担任黑龙江省文联《北方文学》的编辑。在此期间与周煌威结婚，不久周煌威患脑溢血病卧在床，死于1985年1月。1966年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家族也遭到批判，又于1968年1月第三次被关进监狱。这时的罪名为“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现行反革命”。田琳女士的正式恢复名誉是在1979年7月进行的。在中国象这样女士的经历，可谓是“坎坷的一生”然而象这样坎坷一生的人并非是田琳一个人而已，在伪满生活过来的人们与此相近似的，可以说是大有人在，我代表这些人的怨气而引用了田琳女士的发言。

确实是这位女士的怨言是中国及在解放后对她的使用不当，其原因是她在“伪满”的往事，背负所谓“满洲”的重大十字架包袱过了大半辈子的人们，请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来祈祷田琳女士的冥福。

（文学信息 1992年8月8日）

纪念田琳

梅娘

田琳临去的时刻，是她的老伴守在她身旁，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这一场景；我却确信，田琳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她终于获得了真正的爱情。

田琳的这位老伴，我还没有得到结识的机会。田琳的每次来信，都娓娓情深地叙述了他们的双栖生活。为了给我和蓝苓寄上一握新茶，田琳的这位如意郎竟跑遍了梅岭的茶家，为的是选一种最清最香的新茶。田琳寄来的照片，总是两人相依相偎。一张两人对着一摞稿纸在商谈着什么的照片十分传神；田琳似乎在喋喋，老伴专注而听，那神色绝无半点烦意。这使我联想到自己，田琳晚年重听，一件事总爱喋喋起没完。我一听她絮叨就发烦。我和田琳相交五十年，我深愧，我对她的体贴与关怀，远远抵不上她这位只相交三年的老伴。

我们这一代从遥远的三十年代末跨过来的知识女性，正值政治、经济的大动荡时期，正值新旧矛盾大交锋大较量的时期，且不说政治上经受的狂风骤雨，在爱情上更是磨劫重重。当田琳有幸得到了跨出国门到日本留学的机会，对生长在北国边陲小城的她，真是福星高照，再遂心也没有了。就在这学业开拓的同时，她陷入了又一个受践踏的低谷——她的初恋。

那是位翩翩佳公子，就读于日本名牌大学中的最名牌——京都帝国大学，学的是四十年代炙手可热的经济专业。对我们这些女留学生来说：这位公子，那是名符其实的白马王子。田琳以她外在的娇小柔媚，内在的勤奋好学，赢得了公子的青睐，两人很快就出入相随，互相为伴了。这使得我们又羡慕又妒忌，抱怨老天不公，所有的福星都降临给田琳了。

一个骤雨阵阵的夏夜，田琳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处，她失魂落魄，样子伤心已极。女高师那黑裙白衫的校服紧紧地贴在身上，短发滴着水，额头上的细血管，蚯蚓似的凸出来。显然，她已经在雨中滞留了很久，我完完全全被她的样子吓傻了。

原来那位公子占有了她，还得意地哂笑她的幼稚。并把他家乡的夫人和迷恋他的日本女招待的照片显示给田琳看。原来，公子秉承着历史中男性的特殊地位在戏弄田琳。这位佳公子利用了田琳对初恋的痴情，利用了日本那对男人宽松的环境，践踏着神圣的爱情。他告诫田琳，如要张扬，田琳就会被高师开除，且勒令回国。

时代毕竟已进入了四十年代，男人姿意横行的封建规范已是强弩之末；而田琳，毕竟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时代女性，她冲决了束缚自己的思想禁锢，向公子还击了。那位伪君子为了不在他品学兼优的前程上抹黑，不得不收敛放松了魔掌。物转星移，专攻历史的田琳，吸取了历史的教训，终于从自己的历史误区中冲了出来，投身于人类解放的大事业中，笔下，流泻出一篇又一篇鞭挞丑恶的作品。

人，毕竟是双栖的动物，合谐的、互补优缺的男女二重唱，是生理、心理的必然；是社会的必然。田琳在双鬓霜染、双耳重听的生理年龄之时，以葆有蓬勃生机的心理年龄的要求，毅然决定抛下家乡熟悉的一切远嫁南国。这使我震动于她的勇气，这不禁使我联想到那个凄风苦雨的夏夜。

田琳晚年撰写着回忆录，她说，要在爱情的折射中写出时代的印迹。我相信，她一定比以往写得更好，因为她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文学信息1992年8月8日

我为你哭泣， 也为你欣喜——悼挚友田琳

蓝苓

春风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挚爱的友啊，

你在南国繁花似锦的新兴城市①

永远地，永远地安息——

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带着对过去伤痛的记忆。

我不只为了友情哭泣，

还为了你在坎坷的一生中，

刚迎来晚年的春天，

却又悄然离去！

挚爱的友啊，

我为你哭泣，也为你欣喜：

你毕竟在饱尝生活苦果之后②，

遇到了一个忠实的伴侣。

黄昏是短暂而温馨的，

它永远属于你。

春风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挚爱的友啊，

你在南国繁花似锦的新兴城市，

永远地，永远地安息——

带着缺惨中的满足③，

带着亲人们深情的慰藉④。

挚爱的友啊，

我为你哭泣，也为你欣喜：

你在敌人的牢房里活过来了，

解放后又几经政治风雨的冲击。

1978年共和国的伟大转折，

也为你洗清了多年的冤屈。

如今我悟出一个真理，

每个人的命运都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但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的有力见证，

还要靠自己写下的历史。

春风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挚爱的友啊，

你在南国繁花似锦的新兴城市，

永远地，永远地安息——

带着党对你的关怀⑤，

带着人民给你的荣誉⑥。

从风华正茂到两鬓银丝，

我们风雨同舟，

两情依依。

挚爱的友啊，

我为我们的永别而哭泣，

也为你的永生而欣喜：

“售血者”⑦的滴滴鲜血，“安荻和马华”⑧的悲惨遭遇，

和那屈辱的“失掉太阳的日子”⑨……

将永恒地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你生命的小舟，

将继续在人们的心田上行驶。

1992年7月

**注**：

①深圳。②田琳青、中年时代曾经历两次婚变。③1989年她与黄觉同志结合，婚姻美满，相逢恨晚。④她住院时，黄觉从梅城赶至深圳，和她女儿一起照料陪伴她到逝世。⑤黑龙江省作协党组成员、《北方文学》主编韩梦杰同志亲赴深圳处理她丧后事宜。⑥她逝世后东北文艺界的朋友纷纷悼念，对她和她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⑦⑧⑨都是她的名篇。

（文学信息1992年8月8日）

重拣诗囊忆田琳

李莫

田琳和我们永别了。她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杰出的女作家，留下来近百万字文学作品。听到她在深圳逝世的噩耗，我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她。至痛无文，几次拿起笔来但都写不出。日前偶然翻检我的几本旧体诗集和杂乱还未整理好的诗稿，发现一些有关田琳的诗篇。它们是信手拈来之作，但却留下了不少可回味的记忆，是将近五十年的友谊的忠实记录。

我和田琳相识在1944年初秋。记得是国民书店为了祝贺戈禾的小说集《大凌河》、方季良的小说集《灯笼》和我的小说集《笋》首版发行，在长春北大街一家小饭庄举行了一次便宴。那天在座的文化界朋友除了张辛实、张露薇之外，就有田琳。

田琳以她的笔名但娣发表的作品，我早读过，人是第一次见面。当时她神情困怠，沉默寡言，正是经历了种种折磨，可以说是“遍体鳞伤”之后，以监外执行的“罪犯”身份被安置在长春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她没有写作和行动的自由。这一段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从此和她有了接触，有些朋友们的集会也邀请她参加，这既是个慰藉，也因此减却了她生活中不时遭到的骚扰。

我赠给她的第一首诗是：

生当雨骤风狂际，

笔底呜咽血泪诗。

何必忧心托云水，

寒冰解后见新枝。

“八·一五”东北全境光复，田琳抖掉一身枷锁，开始迈向新的征途。她第二次结了婚，也进入了第二次创作高潮，写出了短篇小说《血族》和中篇小说《失掉太阳的日子》，发表在我主编的《东北文学》月刊上。此外，她还写了一些散文和诗。

当时，长春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治安没有人维持。田琳夫妇、李芒夫妇和刘某夫妇，这三个新成立起来的家庭合并住在一栋日本人扔下的空房子里，他们用碎砖乱石堵上了门，来往要跳墙钻窗户，他们没有生活来源，把每个人有限的积蓄都拿出来，买粮买烧煤，在一起吃饭，夜间睡在楼下大房间里，中间用床单吊起来隔成各自的栖窝。

我为了取稿和送给他们稿费，曾经多次跳墙去访问他们，他们招待我的只有白开水。当时我曾写下了一首绝句：

太阳时露时复藏，

为索新篇敢跳墙。

“待月”无人君莫笑，

帘幕隔卧三鸳鸯。

1946年田琳参加东北电影公司北迁兴山，不久我到了哈尔滨。虽然张辛实担任东影厂长，他见面时只是简略地谈过田琳由于种种原因被停职审查，但我以为是暂时的事，不会有什么大波折。以后东北战场上一个战役接连一个战役，随后东北全境解放，人民共和国建立，几乎没有给人喘息思考的机会。1957年反右斗争，昔日的文化人开始噤若寒蝉，谁也不愿打听谁，至于书信往来就更不敢闯祸了。

一隔四十多年不通消息，1981年从《北方文学》上看到介绍她写作经历的一篇文章：《破损的小舟又启航了》。从这里得知她在30多年当中的悲惨遭遇，得知她终于有了一个重建起来的家和使她称心如意的文学编辑工作。我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她，又开始了我们最后一段宝贵的友谊交往。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尽管她很长时间住在哈尔滨，后来随她女儿南下深圳，但我和她一直书信不断，而且她特意到沈阳来和在沈的老朋友们欢聚，我们也曾两次去哈尔滨参加东北文学的学术讨论会，相见后总有谈不完的人生体验和写作甘辛。最值得记忆的是1984年5月她来沈阳，这里的老朋友山丁、马寻、木风、田兵、杨絮、朱媞、方谦、李乔诸人陪她游了北陵和东陵，畅叙友情，尽一日之欢。在东陵我曾田琳绝句五首，其中三首抄录如下：

宏文初见翻疑梦，

旨酒三巡信始真。

风雨硝烟成往事，

百年喜得此阳春。

暗夜长歌未晓天，

离乡去国几经年。

忧心时付东瀛水，

拭泪疾书售血篇。

古树参天抽新枝，

尘刼历尽望丰姿。

当年投笔从戎客，

今日萧疏鬓有丝。

第二首田琳特意要我写成条幅送给她，她来信说一直挂在她的卧室内，她非常喜欢。

1985年10月，东北沦陷时期的老作家，被三省社科院约请到哈尔滨开会，田琳在她新分到的三室一厅的住房里招待我们，买了很多水果和糖，拍了很多照片，大家抚今思昔，不胜感慨。

1986年6月东北女作家小说选《长夜萤火》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大家又一次欢聚一堂。这次盛会，除了沈阳和哈尔滨的朋友们之外，还迎来了北京的梅娘和蓝苓，以及锦州的小松和长春的疑迟。第二年田琳在暑天又来到沈阳，在我家住了5天，这是田琳和朱媞和我谈话最多的一次，几乎无话不谈，有时高兴得开怀大笑，有时不由得泪眼相望，无语久久。

1990年的6月，田琳突然从深圳写信来，要我们立即动身去大连，“希望在大连做最后最珍惜的一聚。”我们当然不能让她扫兴，略事安排赶到大连时，她已先我们出现在山丁住的疗养院里了。大家晤谈一周，每天中午由山丁陪她去付家庄游泳，回来我们谈笑风生，共进晚餐。田琳要去哈尔滨办事，先期动身北上，我有诗为证：

送君北上两凄然，

聚首青春别暮年。

海角天涯何处是？

三投炼狱待名篇。

《三投炼狱》是她已完成初稿的30万字回忆录的暂定题名，她在前一年寄给我，托我交付春风文艺出版社征求意见，恳切嘱我将来为她修改并写序。我把稿子交出去了，但一直没有落实出版，我是有负重托，时时引为内疚的。

大连之行并没有成为“最后一聚”。1991年9月在长春又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她犹豫再三，路太远，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两耳听力几乎到了面对面说话也无法听清的程度，但在大家劝说下终于来到长春。她参加了所有大小会，而且有准备地发了言。在人们面前她总是振作精神，似乎看不出和几年前有什么不同，但回到房间休息的时候，就暴露出她的体力和精力都消耗到了临界点，她夜里不能安眠，有时竟是吸烟到天明。

长春的分手就是最后的诀别。重新拣出关于田琳的诗稿的同时，我也一页一页地翻过她留给我的五十多封信，还有二十多张记录我们相逢话旧的照片，一种无法压抑的对她的怀念之情冲上心头。

田琳是个真诚的人，坚强的人，跌倒爬起，她挣扎着尽了做人的最大努力，天道、人道对她来说是不公允的。她唯一有幸的是她生长、生存在我们国家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丰富了她的生活体验，也锤炼了她顽强从文的意志，她留给人们的几十万字作品，证明她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土地和人民。

（《晚晴报》 1992年4月27日）

1. 吴瑛,  撀夼晕难У娜擞胱髌非嗄晡幕?,斍嗄晡幕? 1944年5月。 [↑](#footnote-ref-1)
2. 韦长明， 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 敹蔽难?, 1946年 3月。 [↑](#footnote-ref-2)
3. 上官缨,艺文乱弹, 吉林：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9. [↑](#footnote-ref-3)
4. 田琳，“三入炼狱，”10页。 [↑](#footnote-ref-4)
5. 《东北前锋日报》（沈阳）1947年7月29日。 [↑](#footnote-ref-5)
6. 梅娘：《纪念田琳》，载《梅娘近作及书简》，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第152页。 [↑](#footnote-ref-6)
7. 吴瑛：《满洲女性的人与作品》，载《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第一集），沈阳出版社1996。 [↑](#footnote-ref-7)
8. 晓戈：《有感一题》，载《东北文学》1卷2期，1946年1月。 [↑](#footnote-ref-8)
9. Norman Smith.评说梅娘[M]//梅娘.梅娘近作及书简.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8. [↑](#footnote-ref-9)
10. 田琳.东北沦陷期文学之我见[N]//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沈阳出版社，1992. 412. [↑](#footnote-ref-10)
11. 田琳.三入炼狱——一个留日女作家的浮沉.10. [↑](#footnote-ref-11)
12. 同上，第411页。 [↑](#footnote-ref-12)
13. 梅娘.纪念田琳//梅娘.梅娘近作与书简[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151. [↑](#footnote-ref-13)
14. 吴瑛.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J]. 青年文化.1944(5). [↑](#footnote-ref-14)
15. 《首警特秘发第一四一四号》是《伪满洲国特高警察秘密报告书》的一部分，见于雷翻译，李乔校对. 伪满洲国特高警察秘密报告书[J].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7(6). [↑](#footnote-ref-15)
16. 《传尸病患者》收入金音编《满洲作家小说集》中，1944年3月五星书林出版。该书共收录包括但娣、励行健、小松、吴瑛等人的小说共13篇。 [↑](#footnote-ref-16)
17. 田琳.为《长夜萤火》诞生而欢呼[J].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7(5). [↑](#footnote-ref-17)
18. 陈晓帆.又见梅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2. [↑](#footnote-ref-18)
19. 根据左蒂《女作家创作选》的介绍，但娣的笔名尚有萝荔、晓希，生于松花江上流的汤原县，1920年沿松花江移往沙漠地带的齐齐哈尔市，卒业于齐齐哈尔市的女子师范学校，后至日本的奈良女高师就读。 [↑](#footnote-ref-19)
20. 见《华文大阪每日》第四卷第六期，总号第三十四号，页36，1940年3月15日。默夫〈文评──风〉认为「以轻爽的形式装进严肃的内容原是一椿艰难的工作，但作者克服了这种艰难，给我们读到的是一篇谐和一致的『风』，我们非常赞美作者这种成就」。见《华文大阪每日》第4卷第9期（1940.5.1），总号第37号，页23。 [↑](#footnote-ref-20)
21. 见《华文大阪每日》第4卷第12期（1940.6.15），总号第40号，页34。 [↑](#footnote-ref-21)
22. 但娣，〈忽玛河之夜〉，「女子作品之卷」特辑《华文大阪每日》第7卷第4期（1941.8.15），总号第68号，页41。呼玛河发源于大兴安岭东麓，向西流经塔河县接纳塔河，在呼玛注入中俄界河黑龙江。 [↑](#footnote-ref-22)
23. 但娣，〈售血者〉，见左蒂编，《女作家创作选》，页203-218。 [↑](#footnote-ref-23)
24. 但娣，〈猎人〉，见《华文大阪每日》第4卷第5期（1940.3.1），总号第33号，页38。 [↑](#footnote-ref-24)
25. 《新满洲》第5卷第4号（1943.4），页53-54。 [↑](#footnote-ref-25)
26. 《新满洲》第5卷第10号（1943.10），页99-103。 [↑](#footnote-ref-26)
27. 《新满洲》第5卷第11号（1943.11），页41-42。 [↑](#footnote-ref-27)
28. 《新满洲》第5卷第2号（1943.2），页45-47。 [↑](#footnote-ref-28)
29. 《新满洲》第3卷第10号（1941.10），页119-124。 [↑](#footnote-ref-29)
30. 见《华文大阪每日》第六卷第九期，1941年5月 [↑](#footnote-ref-30)
31. 见彼得．艾迪(Peter Adey)着，徐苔玲、王志弘译《移动》页80，(新北市: 群学出版社，2013年9月) [↑](#footnote-ref-31)
32. 见彼得．艾迪(Peter Adey)着，徐苔玲、王志弘译《移动》页82，(新北市: 群学出版社，2013年9月) [↑](#footnote-ref-32)
33. 这篇小说是《华文大阪每日》「征募百页中篇小说审选」的得奖作品，在〈本刊征募百页中篇小说审选结果发表〉中，但娣〈安荻与马华〉得到的评价是：「入选作首席，我们推选了这是一位在学中的年轻的女人，想来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异常的欣喜，该是所有的以艰辛的努力与男人们跋涉在前进途中的女人们共同的欣喜。我是这样的欣喜，我想我有着和作者同样的心情来把这篇作品捧献给读众。我以为这是这次我们征募中篇小说最大的结果了。然而，我不是说站在女人的立场上，用这点来骄傲自豪，我们愿藉这个启示，希望与我们同感的女人或男人们，知道廿世纪也是我们女人底。尤其女人应该有这个觉醒。(张蕾)」。《华文大阪每日》第5卷第9期（1940.11.1），总号第49号，页36。 [↑](#footnote-ref-33)
34. 人员和事物的大规模移动，往往是战争和暴力的产物，如今已被视为作战关键策略。为了蓄意引发迷惘、恐慌，以及尤其是群众困苦，二次大战其间联军轰炸德国的攻击目标，就是令其流离失所。见彼得．艾迪(Peter Adey)着，徐苔玲、王志弘译《移动》页164，(新北市: 群学出版社，2013年9月) [↑](#footnote-ref-34)
35. 见彼得．艾迪(Peter Adey)着，徐苔玲、王志弘译《移动》页74，(新北市: 群学出版社，2013年9月) [↑](#footnote-ref-35)
36. 但娣，〈旷野里的故事〉，见「满洲文艺特辑」《华文每日》第11卷第5期（1943.9.1），总号第117号，页29-30。 [↑](#footnote-ref-36)
37. 发表于《青年文化》10月号（1943.10）。 [↑](#footnote-ref-37)
38. 二战时纳粹德国在占领波兰后强制驱离波兰居民，波兰意象在彼时是亡国的弱小民族代表。 [↑](#footnote-ref-38)
39. 这可能和但娣本人的背景有关。但娣的祖籍湖南，她祖父在清末赴黑龙江边境瑷珲充军，在当地和一位朝鲜孤儿结婚，也就是说，但娣本人就是中韩混血儿，带有四分之一的朝鲜血统。见阎纯德，〈破损的小舟、扬起希望的风帆——记田琳〉。载《作家的足迹》（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第454-473页。 [↑](#footnote-ref-39)
40. 见冈田英树，牛耕耘译，《论古而及今——伪满洲国的历史小说再检证》，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待发表。 [↑](#footnote-ref-40)
41. 该自传完稿于1989年，尚未发表。感谢Norman Smith先生为笔者提供此资料。 [↑](#footnote-ref-41)
42. Norman Smith, *Resisting Manchukuo: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Vancouver: UBC Press, 2007, 108-9。 [↑](#footnote-ref-42)
43. 阎纯德，《破损的小舟、扬起希望的风帆——记田琳》。载《作家的足迹》（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第454-473页。 [↑](#footnote-ref-43)
44. 傅尚逵，《访女作家田琳》，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5辑，第212页。 [↑](#footnote-ref-44)
45. 此段叙述如无特别说明，均依据但娣自传。 [↑](#footnote-ref-45)
46. 见羽田朝子，《満洲国女性作家・但娣の日本留学》，载《季刊中国》106号(2011年)，第75-88页。本文所引的羽田朝子研究成果，均依据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奈良女子大学）校史档案资料。 [↑](#footnote-ref-46)
47. 但娣自传中这个订婚仪式，被日后的许多当事人及研究者当作是结婚仪式，并认为两人于1937年在日本结婚。或许当时，但娣和田琅也并未讲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田琅因当时已在老家结婚，所以不可能再和但娣正式结婚。 [↑](#footnote-ref-47)
48. 此处到本段结尾的时间点，均按照研究者共同认可的年份记述，比但娣自传中说明的年份晚一年。因为但娣当时所发作品文末的时间标注、其它当事人回忆和文史资料所表明的年份可以互相印证，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自传中但娣本人记忆有误。 [↑](#footnote-ref-48)
49. 与此相关的论述见冈田英树，邓丽霞译，《田琳的留学时代――以“爱的破灭”为中心》，载冈田英树，邓丽霞译，《伪满洲国文学（续）》，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待出版。 [↑](#footnote-ref-49)
50. 见羽田朝子，《満洲国女性作家・但娣の日本留学》。 [↑](#footnote-ref-50)
51. 据但娣自传回忆，该小说写于1940年，但作品在《长夜萤火：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一书中，文末的标注为1942年1月5日。作品初次发表于《华文大阪每日》1942年7月15日出版的第九卷第二期，文末标注为1月5日，没有年份。鉴于1940年1月作者刚刚写出自己的处女小说作品《风》，同月5日写出《售血者》的可能性不大，故采用《长夜萤火》中的标注为信。见梁山丁编，《长夜萤火：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 [↑](#footnote-ref-51)
52. 见冈田英树，邓丽霞译，《伪满洲国文学：下》中《田琳的留学时代――以“爱的破灭”为中心》一文。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待出版。 [↑](#footnote-ref-52)
53. 但娣，《未完结的故事》，载《华文大阪每日》第四卷第二期（1940年1月15日出版），第38-39页。 [↑](#footnote-ref-53)
54. 但娣，《售血者》，载《华文大阪每日》第九卷第二期（1942年7月15日出版），第35页。 [↑](#footnote-ref-54)
55. 关于这一观点，见马伟业，《但娣——生之悲歌的吟唱者》，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第92页。既有作者自己的论述，也有对当时评论者的引述。 [↑](#footnote-ref-55)
56. 但娣，《微吟》，载但娣，《安荻和马华》，新京：开明图书公司，1943年，第17-21页。感谢冈田英树先生为笔者提供此书的复印本。 [↑](#footnote-ref-56)
57. 见羽田朝子，《満洲国女性作家・但娣の日本留学》。 [↑](#footnote-ref-57)
58. 但娣，《角涯》，载但娣，《安荻和马华》，新京：开明图书公司，1943年，第32页。 [↑](#footnote-ref-58)
59. 见但娣自传。 [↑](#footnote-ref-59)
60. 该论点可见于阎纯德《破损的小舟、扬起希望的风帆——记田琳》、马伟业《但娣——生之悲歌的吟唱者》、傅尚逵《访女作家田琳》（《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5辑，第212-215页）等。 [↑](#footnote-ref-60)
61. 见《华文大阪每日》第七卷第四期，1941年8月15日出版，第41页；但娣，《安荻和马华》，新京：开明图书公司，1943年，第192页。 [↑](#footnote-ref-61)
62. 《华文大阪每日》第七卷第四期，第41页。 [↑](#footnote-ref-62)
63. 日本在伪满洲国所宣传的”五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组合。例如，在政治宣传上，为了区分满族和汉族，以此来分化中国人群体，往往将满、汉分列，加上日、鲜，再根据需要选择“蒙”或“俄”列入五族。但是在编选文学选集时，因为满族和汉族都用中文写作，所以又会将满族和汉族作家统一标为“满”（当时日本将伪满洲国的中国人一律称为“满人”）。 [↑](#footnote-ref-63)
64. Kazuko Osada. *Myths of Multiethnic Manchukuo: The Formation of Ethnicity and Language in Manchukuo Literature*. 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12. [↑](#footnote-ref-64)
65. 美国学者Presenjit Duara 和加拿大学者Norman Smith都注意到并论述过这一点。见Prasenjit Duara, "Local World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Native Place in Modern China,"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9*.1 (2000), 第35页。; Norman Smith, *Resisting Manchukuo: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第63页。 [↑](#footnote-ref-65)
66. 石军，《边城集》，新京：大地图书公司，1944年。感谢冈田英树先生为笔者提供此书的复印本。 [↑](#footnote-ref-66)
67. 《青年文化》1943年8月号，107-115页。 [↑](#footnote-ref-67)
68. 见冈田英树，邓丽霞译，《伪满洲国文学：下》中《资料篇3：首都警察的侦查和检阅报告书》一文。在1942年，有三位伪满洲国中国作家被捕，日警要求他们撰文检举分析带有反满抗日和民族主义倾向的伪满洲国中文文学作品。在他们以日文写的检举文中，包括了对石军短篇小说《混血儿》中民族主义倾向的指摘。日文原文，见冈田英树，『続：文学にみる満洲国の位相』（東京：研文出版，2013），429-430页。 [↑](#footnote-ref-68)
69. 这样的作品非常多，比如小泉菊枝的中篇小说《満洲人の少女》（1938）、长谷川濬的短篇小说《寛城子》（1941）等。在川端康成编辑的《満洲国各民族創作選集》（第1编：1942；第2编：1944）中，收集了大量此类作品，并且作品编选方式本身也体现了同样的原则。 [↑](#footnote-ref-69)
70. 转引马伟业，《但娣——生之悲歌的吟唱者》，第89页。 [↑](#footnote-ref-70)
71. 《新满洲》1943年7月号，第44-46页。 [↑](#footnote-ref-71)
72. 《艺文志》1943年12月号，第148-167页。 [↑](#footnote-ref-72)
73. 《艺文志》1943年12月号，第168页。 [↑](#footnote-ref-73)
74. 笔者注：但娣遗作《三入炼狱：一个留日女作家的沉浮》，几经辗转被加拿大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历史系诺曼·史密斯(Norman Smith)教授收藏，并将在2015年由史密斯教授主编，与但娣其他作品合集在中国出版。 [↑](#footnote-ref-74)
75. 但娣，《忽玛河之夜》，《华文大阪每日》第7卷第4期第68号，1941年8月15日发行，第41页 [↑](#footnote-ref-75)
76. 出处同上。 [↑](#footnote-ref-76)
77. 但娣，《安荻与马华》（上），《华文大阪每日》第6卷第1期53号1941年1月1日，第42-48页。

    但娣，《安荻与马华》（下），《华文大阪每日》第6卷第2期54号，1941年1月15日，第43-50页。 [↑](#footnote-ref-77)
78. 吴瑛，原名吴玉英，另有笔名瑛子、小瑛等，伪满洲国重要的作家和编辑，也是“文丛”派的创始成员。其代表作《两极》是伪满洲国最重要的小说集之一。 [↑](#footnote-ref-78)
79. 吴瑛，《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青年文化》第2卷第5期，1944年5月，第26页 [↑](#footnote-ref-79)
80. 梁山丁，原名梁梦庚，又名邓立、笔名山丁、小菁，伪满洲国时期著名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山风》、《乡愁》、长篇小说《绿色的谷》、《梁山丁诗选》，诗集《季季草》等。 [↑](#footnote-ref-80)
81. 梁山丁，《长夜萤火》，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 [↑](#footnote-ref-81)
82. 出处同上，第238-241页 [↑](#footnote-ref-82)
83. 张毓茂，《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第4期，第118页 [↑](#footnote-ref-83)
84. 王建中，《女性文学的骄傲——评<长夜萤火>的思想艺术成就》，《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65页 [↑](#footnote-ref-84)
85. 马伟业，《但娣，生之悲歌的吟唱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3年第2期，第88页 [↑](#footnote-ref-85)
86. 游友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59页 [↑](#footnote-ref-86)
87. 徐迺翔、黄万华著，《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289页 [↑](#footnote-ref-87)
88. 孙中田，逢增玉，黄万华等著,《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72页 [↑](#footnote-ref-88)
89. 出处同上，第59页 [↑](#footnote-ref-89)
90. 但娣，《安荻与马华》（诗文合集），开明图书公司，1944年出版。 [↑](#footnote-ref-90)
91. 但娣，《三入炼狱》，第3章“第一次入狱” [↑](#footnote-ref-91)
92. 刘爱华著，《孤独的舞蹈：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北京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第245页 [↑](#footnote-ref-92)
93. 彭放编，《黑龙江文学通史》，第2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04页 [↑](#footnote-ref-93)
94. Norman Smith, *Resisting Manchukuo: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P128【加】诺曼·史密斯，《反抗满洲国——伪满洲国女作家研究》，李冉译，陈实校，刘晓丽主编“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研究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即出。 [↑](#footnote-ref-94)
95. 出处同上，第115页 [↑](#footnote-ref-95)
96. Norman Smith, The Difficulties of Despair: Dan Di and Chinese literary production in Manchukuo,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vol.18, No.1, P90 [↑](#footnote-ref-96)
97. 但娣，《三入炼狱》，第2章“东渡” [↑](#footnote-ref-97)
98. 田琳，《为长夜萤火诞生而欢呼》，《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5期（1987），第81页。 [↑](#footnote-ref-98)
99. 但娣，《血族》，《东北文学》1945年第1卷第1期（12月1日），第9-36页 [↑](#footnote-ref-99)
100. 要望，《我读了东北文学》，《光明报·副刊》， 1945年12月9日，“星火”栏目 [↑](#footnote-ref-100)
101. 但娣，《关于“奴化思想”及“伪滿作家”》，《东北文学》1946年第1卷第2期（1月1日），第8-9页 [↑](#footnote-ref-101)
102. Norman Smith, *Resisting Manchukuo: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P136 [↑](#footnote-ref-102)
103. 赵月华，《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梅娘作品修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第116-138页 [↑](#footnote-ref-103)
104. 刘晓丽，《试论伪满洲国的“附和作品”》，《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第103-112页 [↑](#footnote-ref-104)
105. 刘爱华，*《孤独的舞蹈——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长春市：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134. [↑](#footnote-ref-105)
106. 吴瑛，“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青年文化》*，满洲青少年文化社，1944. [↑](#footnote-ref-106)
107. 刘爱华，*《孤独的舞蹈》*，137. [↑](#footnote-ref-107)
108. 同上，138. [↑](#footnote-ref-108)
109. 但娣，*《风》*，原载《华文大版每日》一九四〇年四卷六期. [↑](#footnote-ref-109)
110. 作者注：本句是十八世纪德国艺术学家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对于美学内涵理解的名言，德语原句为“*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英语翻译为“noble simplicity and quiet grandeur.”在此意为无法理解但娣作品的美学内涵。 [↑](#footnote-ref-110)
111. ①已作为但娣的创作集子的集名，在昨年出版了。 [↑](#footnote-ref-111)
112. 西洋古代传说……于龙睡眠之际，由龙首切取的宝石，曰龙石。可以作妙药。 [↑](#footnote-ref-112)
113. 切取龙石时，播撒于龙的四周，不使其警觉。 [↑](#footnote-ref-113)